

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

第一卷

(1919—1949)

中共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1卷/中共萧县县委党史
研究室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199-568-6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党史—萧县 IV. D235.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117635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一卷)

作 者: 中共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黄 艳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568-6

定 价: 42.00元

本书编审委员会

主 任:孟宪会

副 主 任:王宗元 朱学亮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宇良 杨美荣 吴孝桐

邱 勇 陈安源 孟丽华

蒋翠萍

主 编:王宇良

编撰人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侠 王宇良 刘 婧

孙贤明 李 冰 吴孝桐

张祚林 欧道松 侯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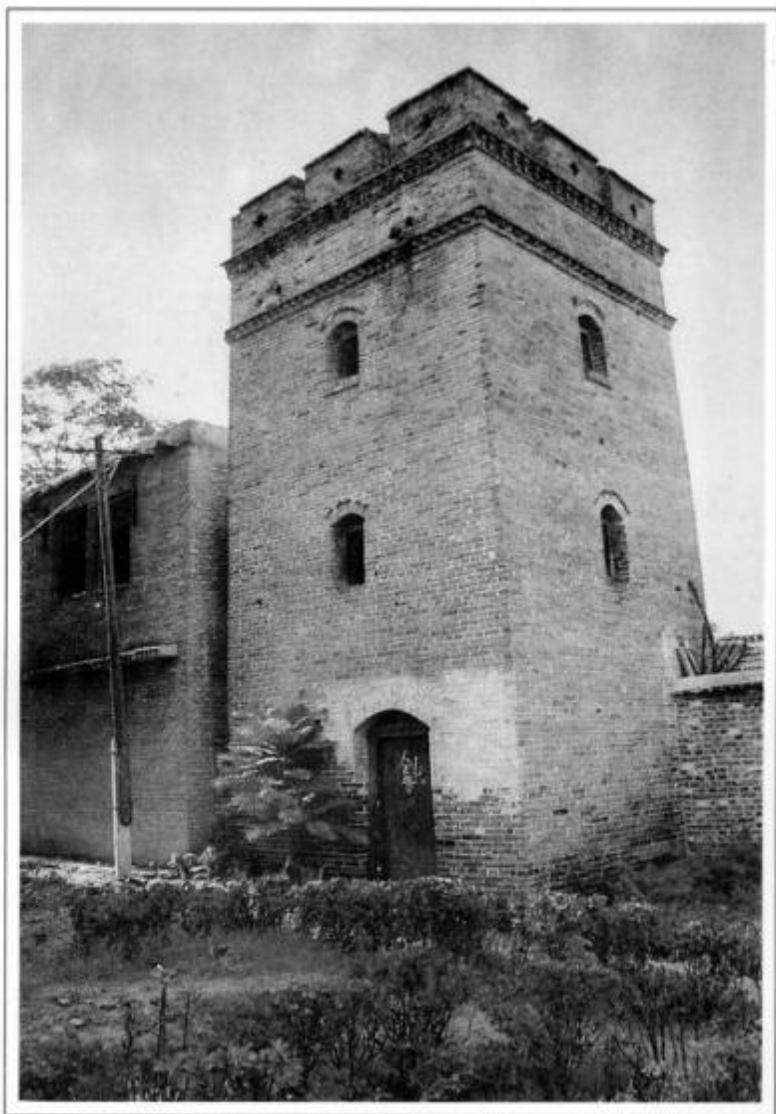
萧县孔庙旧址(现萧县博物馆)。1919年8月，萧县学生联合会在这里组织召开了近500人的群众大会。徐文雅在大会上的演讲慷慨激昂，言词犀利。他有力地痛斥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丑行与北洋政府的妥协卖国政策，号召全县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联合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第一个萧籍中共党员
李宪仲烈士。



中共萧县委员会第一任
书记孙叔平。





1930年黄口暴动旧址。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
第一任县长彭笑千。



黄庙战斗纪念碑。1938年8月23日，萧县抗日游击队在此智除日军据点，歼敌一个小队。此战，打响了萧县沦陷后萧县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首任师长彭雪枫。



1941年8月1日，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正式成立。



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主力西进豫皖苏边区，邓子恢等为彭雪枫送行。左起：刘瑞龙、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



西进途中的彭雪枫。



1944年8月21日，小朱庄战斗前夕，彭雪枫(左三)与张震(左二)、滕海清(左一)、周纯麟(左四)等在一起研究战斗部署。



小朱庄战斗缴获的部分武器。



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
旅长、继任第四师师长
张爱萍。



1945年初，为阻挠日军的军事运输，根据地军民积极参加对津浦铁路的破击战。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暨淮海战役总前委员会旧址——萧县蔡洼村杨家台子。2005年初，该旧址被国家列为100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1948年12月17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在萧县蔡洼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召开会议。图为总前委领导成员在会议期间的合影。左起：粟裕(总前委委员)、邓小平(总前委书记、常委)、刘伯承(总前委常委)、陈毅(总前委常委)、谭震林(总前委委员)。



中野主力向淮海战场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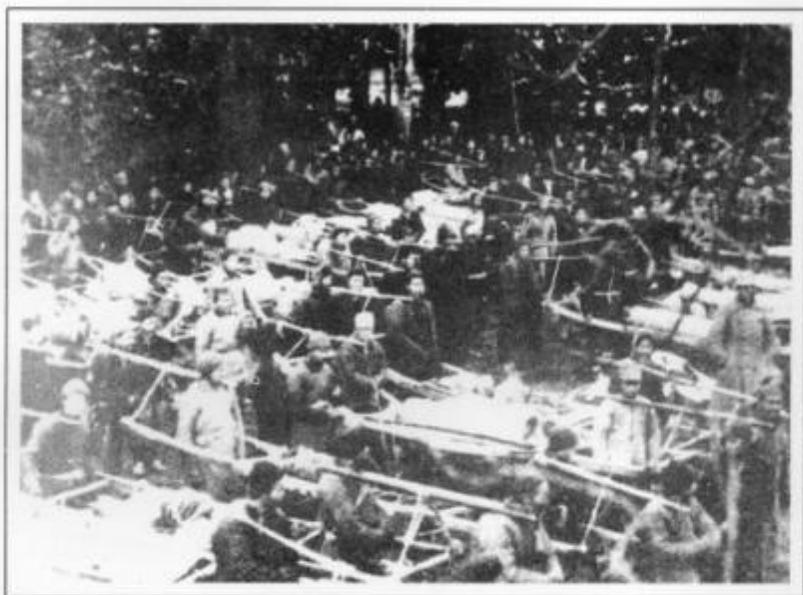
华野主力进军淮海战场。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左三)和参谋长陈士榘(左五)、副参谋长张震(左四)等在前线指挥部研究战况，指挥作战。



地方武装参战。



支前民工担架队。



担架队转运伤员。



民工给解放军运送弹药。



妇女为解放军战士赶做军鞋。



1949年1月10日晨，在萧县张老庄村被俘的杜聿明。



解放军押着俘虏，撤出淮海战场。



解放区人民欢送青壮年参军。



豫皖苏三分区淮海战役战勤总结会议全体人员合影。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运动开启了萧县历史的新篇章·····	(1)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萧县的经济和 社会概况·····	(1)
第二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	(5)
第三节 早期的党建活动·····	(10)
第二章 党组织的建立、发展与革命形势 的高涨·····	(14)
第一节 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4)
第二节 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	(21)
第三节 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25)
附：(1)萧县县委报告——关于县委 产生经过·····	(30)
(2)萧县师范学生自治会支援萧县师 范学生反对教育局开除李和祥等 七位同学运动的宣言·····	(35)

第三章 “左”倾错误路线对萧县的影响	(37)
第一节 黄口暴动	(37)
第二节 两次夭折的武装暴动	(44)
第三节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	(48)
第四节 白色恐怖笼罩下萧铜边红旗 不倒	(53)
第四章 全民抗战的良好开端	(57)
第一节 郭子化从延安来	(57)
第二节 动委会奏起抗战序曲	(61)
第三节 龙城保卫战	(67)
第四节 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72)
第五节 智除黄庙据点	(80)
第六节 活跃的彭南游击队	(87)
第五章 创建“抗日模范县”	(91)
第一节 打散维持会,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 民主政权	(91)
第二节 搞好经济工作,为敌后游击战提供 物质保障	(98)
第三节 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开创全民抗战 的新局面	(103)
第四节 敌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	(108)
第五节 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 党组织	(114)

第六节 发展地方武装,壮大主力部队	(118)
第六章 抗战道路上的挫折	(126)
第一节 东任台子事件	(126)
第二节 湖西“肃托”	(130)
第三节 王白楼子会议	(135)
第四节 耿吴刘叛变	(139)
第七章 开辟萧铜游击根据地	(148)
第一节 东撤保留了一块“跳板”	(148)
第二节 坚持争吴缓刘打朱的方针	(153)
第三节 把后勤建在敌伪据点周围	(156)
第四节 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游击 战略思想	(161)
第五节 整风与大生产运动	(166)
第六节 萧铜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	(169)
第八章 淮北地区对敌伪工作的一面旗帜	(174)
第一节 受到毛泽东赞许的对敌伪 工作	(174)
第二节 萧西党的领导机构设在敌伪 据点	(180)
第三节 萧铜在徐州开展的地下工作	(187)
第四节 适时加大对敌伪工作的力度	(190)
第九章 重建民主政权,迎接抗战胜利	(195)
第一节 小朱庄战斗	(195)

第二节	争取吴信元起义	(204)
第三节	三方政权与三面政权	(212)
第四节	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	(218)
第五节	迎来抗战胜利	(222)
第十章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24)
第一节	接收县城	(224)
第二节	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宣传 贯彻	(228)
第三节	尚口事件	(232)
第四节	从“双减”到土改	(238)
附:	为追悼“四·二七惨案”死难诸烈士 讣告	(242)
第十一章	西撤与收复	(245)
第一节	党政军西撤	(245)
第二节	艰苦的恢复工作	(250)
第三节	恢复萧县的几次重要战斗	(257)
第四节	成立萧宿县	(270)
第十二章	全力支援淮海战役	(273)
第一节	杜聿明弃徐西逃	(274)
第二节	倾家荡产,支援淮海决战	(278)
第三节	大决战中的蔡洼	(283)
第四节	杜聿明萧县被俘	(288)
第五节	总前委蔡洼会议的历史意义	(290)

附：是谁活捉了杜聿明？	(296)
第十三章 迎接新中国诞生	(298)
第一节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	(298)
第二节 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	(304)
第三节 加强党和政权建设	(307)
结语 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	(311)

附 录

中共萧县地方史大事记(1919. 5—1949. 9)	(317)
一、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319)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325)
三、抗日战争时期	(348)
四、解放战争时期	(401)
后 记	(424)

第一章

五四运动开启了萧县 历史的新篇章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给萧县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萧县人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奏响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乐章。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萧县的经济和社会概况

萧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历史上长期隶属江苏省,1955年4月1日划归安徽省宿县专员公署。它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占重要位置的县份之一,有着3000多年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鸦片战争前,萧县人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自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

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后，萧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身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与剥削。社会动乱，经济凋敝，萧县人民被推向苦难和贫困的深渊。

资本—帝国主义对萧县的侵略，首先是通过传教和倾销商品的形式进行的。自1888年始，先后有法国、意大利、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来萧县传教。他们疯狂地发展教徒，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就在萧城、黄口、马井、九店、王寨、丁里、朔里、郑庄、孟庄、程楼、吴庄等地发展教徒一万多人，并建立了教会组织。洋人以教堂为依托，通过传教、办学校、开医院、印发宣传品等手段，到处散布迷信，鼓吹“洋人好”，对萧县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他们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幌子，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残害无辜，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如马井天主教堂，因有县府所派卫队保护，肆无忌惮地公开窝藏土匪，明抢暗夺，坐地分赃。恶贯满盈的土匪马良科、马达子就是马井天主教堂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抢掠萧西大半个县，被群众捉拿送县府后，神甫勾结县府知事，当即将土匪释放，反诬百姓“有意侮辱教徒”。洋人和官府、强盗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在萧县推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仗恃着他们攫取的种种特权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争相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萧县，洋

人除利用教会霸占民田出租放债外，还通过办洋行、商业，倾销外货，排斥民族工商业。1911年后，英、法、荷、比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修通以后，外货大量流入萧县，萧城、黄口、郝集、曹村等较大集镇遂成为外货倾销的主要市场。据调查，仅萧城、黄口两地，五四前后就有大小商店170余家，规模比较大的工商业者有孙大智、崔大麻子等。这些商店大都先后成为各国洋行的经销店或代销店，外货量一般达到70%~80%，个别商店经销的商品甚至全是外货。这种状况，导致地方手工业纷纷倒闭，农民的土纺土织也因受到洋货的排挤而难以为继。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政治更加黑暗，社会更加腐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军阀的掠夺，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在农村，一些新兴地主的出现，使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萧县的刘云亭、邵世恩、刘子瑜、刘瑞岐、纵衍芬、刘献符、王孔法、朱禹九、王馨山等大地主，均有千亩或数千亩田产。尤其是萧城的大官僚地主段氏家族，在北京、天津、南京、济南、青岛、徐州等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花园、别墅、公馆。在徐州一地，西起土城门，东到火车站，北起坝子街，南至鸡嘴坝，方圆几十里皆为段家所有。段家在徐州的花园，是当时徐属八县独一无二的风雅建筑，楼台亭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在南京，连清末提督李鸿章的千余间豪宅，

后来也为段家所有。在萧县，段家不仅霸占了萧城周围的山山水水，在乡村还有 18 个庄园和 2000 多亩耕地。土地被大量兼并的直接后果，是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

另一方面，军阀混战给萧县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十分惨重的。各派军阀逐鹿中原，徐州为必争之地。与徐州唇齿相依的萧县，连年是炮火连天，兵荒马乱。军阀横征暴敛，烧杀虏掠，无恶不作。战祸所至，军阀拉丁抓夫，青年男子纷纷逃亡，造成田地荒芜，民怨沸腾。饱尝战乱之苦的萧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萧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萧县人民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近代史上，萧县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悲壮的、辉煌的。1853 年，当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路经萧县时，数以千计的青壮年参加了太平军。他们举义旗，除恶霸，吃“大户”，济平民，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1855 年，淮河两岸爆发了捻军起义。萧县人民积极响应，在左渊、吕秀盘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声势浩大的萧县捻军先后攻占了除县城以外几乎所有圩寨，铲除了地方恶霸势力，还多次在大吴集等地将清军打败。清政府派封建走卒段广瀛率兵疯狂镇压，萧县捻军一次被杀害 60 多人，左渊、吕秀盘也一并遇难。然而，屠杀并没有吓倒萧县人民，投捻的人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吓得统治者龟缩县城，惶惶不可终日。

19世纪末,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波及萧县后,声势浩大的“红拳会”、“大刀会”很快遍及全县各地,形成“村村排刀枪,乡乡练红拳”的广泛群众组织。当时,黄口、九店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吴松园(庄名)有个四老冤(绰号,本名吴德运),他的红拳半拉天,山南海北来拜师,专打洋人和贪官。”可见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吸引了许多萧县的热血青年为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解放而献身革命。以刘汉川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追随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为实现民主共和而斗争。刘汉川加入同盟会后,由孙中山举荐担任萧县民政长(即县长)。刘汉川按照三民主义政纲,废旧规,立新法,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想以此改变萧县的社会面貌。然而,随着袁世凯的篡权,辛亥革命的失败,刘汉川的幻想也随之破灭。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萧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第二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早在五四运动前,萧县的知识界就已受到新文化运

动的影响和新思想的启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伦理道德、封建礼教及封建迷信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同时，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萧县知识界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批孔、批封建专制文化的热潮。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张邃如创办的《新风》周刊，响亮地提出了打倒所谓“万世师表”的孔丘的口号。提倡男女社交，号召学生勇敢地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挑战。该校教师王子云，1918年在萧城举办绘画展览，用他的画笔抨击封建陋习，倡导社会新风。该校校长王寿桥（又名王文榜），经常向学生宣传同情革命的进步思想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向同学们介绍《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王寿桥和继任校长冯南风还注重从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省市聘请优秀教师来萧任教。这些教师带来了大量的新思想、新观念，使新思想、新文化在校园里自由的传播。这不仅使学生解放了思想，增长了知识，也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学生毕瑞生、郭清杰到徐州宣传五四精神，指导学生运动。他们联络徐属八县的学生，由各县选派代表在徐州集会，成立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萧县推选徐文雅（又名徐彬如）为代表参加学生

联合会的工作。1919年8月，徐州学生联合会派高民、徐文雅来萧县宣传五四运动。他们首先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发动，随后联络女子高等小学、县立国民小学及全县各乡村小学，成立了萧县学生联合会，推选一高学生徐志昌为会长，王宜周为副会长。学联在萧城孔庙组织召开了近500人的群众大会，徐文雅在大会上的演讲慷慨激昂，言词犀利。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丑行和北洋政府的妥协卖国政策，号召全县学生联合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会后，由学联成员领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学生们臂戴写有“救国”二字的白布袖标，贴标语，散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巴黎和会”、“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等口号。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威震萧城，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萧县学联组织了一些宣传小分队到乡村搞宣传。他们所到之处，不仅组织演讲，张贴标语，还散发了大量宣传资料。宣传小分队成员大都是比较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满腔爱国激情不仅打动了乡村学校的师生，也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了共鸣。学联还组织学生查禁日货。他们派人在县城东门检查商人从徐州购进的所有货物，不准日货进萧城。在城内，对大小商店逐个检查。华昌百货商店的老板侯太

昌拒绝检查，学生们就拉他游街示众。他们把查出来的洋布、洋油、洋火、洋烟等日货，集中到龙山脚下，并在人山人海的萧城十月古会上纵火焚烧。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县，王寨、永堽、郝集、黄口等大集镇及乡村学校热烈响应，纷纷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与学生运动的高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传播。《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越来越多地传入萧县，县内也出现了进步刊物《新声小报》。这些书刊提倡新思想、新文化，追求科学与民主，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给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吸引了众多进步青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一股时代潮流。1920年3月，徐州七师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指导下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不久，又建立了进步组织“赤潮社”，并创办了石印刊物《赤潮》旬刊，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及反帝、反封建思想。萧县在徐州十中和七师上学的青年，积极参与了“赤潮社”的宣传工作，这就使他们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如在徐州十中上学的徐文雅和石民宗，两人都是赤潮社的重要成员，徐州学运的领袖。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和探讨各种新思潮及革命理论，并把学习心得发表在《赤潮》上。七师学生还经常来萧县指导学生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些在北

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上学的萧籍青年，因较早地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思想比较进步。寒暑假期间，他们从四面八方带来了许多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就连《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由他们传入萧县的。他们以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李宪仲为首，聚会县城，宣传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探求革命真理，在萧县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正是这些在大中城市读书且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在萧县得以迅速传播。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激发了萧县大批进步青年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热情。他们有的到了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考入了黄埔军官学校，如徐文雅、纵翰民、卢亚光等；有的到了武汉，如刘亚民、谢光亚等；有的加入了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如胡玄圃、任训常等；还有的克服重重困难去法国勤工俭学，如孟棱崖等。尽管他们当时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政治倾向还不一致，但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都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这批进步青年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萧县在外地加入中共的最早一批党员。李宪仲、徐文雅等人后来还成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

在萧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先知先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广泛传播,并逐步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才使萧县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三节 早期的党建活动

大革命时期,萧县虽未建立党的组织,但中共徐州独立支部已开始在这里发展党员,并有一批外地入党回萧的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开展早期的党建工作。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党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壮大力量,推进革命,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大会强调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着重指出:共产党要努力保持自己的阶级成份,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独立地发展工人、农民组织,发动他们起来革命。四大的这些决议,对于扩大统一战线,取得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独立地发展工农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1926年春,在外地入党回萧的刘亚民,遵照中共四大的上述精神,与丁毅忱、王贞廉、石民宗、刘淑昭(女)、纵白踪等人在家乡永垆寨成立了“萧县行知学社”。他们

印发宣言，动员民众组织起来，对内铲除封建势力，对外打倒帝国主义。是年秋，刘亚民又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徐州独支农运委员郭潜飞考察了该平民学校后，在同年11月25日写给上级党委的关于《徐州农民运动报告》中说：“该县东南乡永堽寨有刘亚民同志（我党的）办一平民学校，约三十多人……将来萧县农民运动，此处可为策源地。”在萧县，这是由共产党员创办的以动员农民为自身解放而斗争为宗旨的最早的启蒙教育。

1926年冬，中共徐州独立支部派宣传委员李广琛来到萧县。表面上，李广琛是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刘汉川的委托，来视察国民党党务的，实际上是来宣传共产主义和发展共产党员的。他首先找到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丁毅忱、纵白踪，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比较，并作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丁毅忱、纵白踪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完整而彻底的革命纲领，中国的翻身富强只有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制定的三大政策方有希望。李广琛则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谋求中国人民的解放，必须遵循列宁路线，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动员广大民众起来斗争。国民党是担负不起这一历史重任的，要真革命必须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番争论、交流与沟通，丁毅忱、纵白踪接受了这一理论。两人由李广

琛、陈亚峰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并不退出国民党，而是采取“跨党”的形式，秘密地从事党的活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接受中共徐州独立支部的领导。这种现象，成为萧县早期党建工作的一个特点。

与丁毅忱、纵白踪入党的同时，萧县的许致远、邓果白、刘淑昭（女）、刘颖昭（女）、王贞树五人，经刘汉川介绍去上海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班。学习期间，许致远、邓果白两人由沈毅、邢中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于年底回到家乡薛庄村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薛庄是县城东南较大的一个村庄，90%以上的农民无地或少地，年年打长工，做短工，忍受地主的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许致远、邓果白从上海回来以后，邀约附近几个村庄的贫雇农和长短工50多人到夜校上学。夜校以教《千字课》为名，暗中向农民宣传党的主张，讲解革命道理，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随着农民阶级觉悟的逐步提高，便组织长工会、短工会和地主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后，他们便在长工会和短工会的基础上，于1927年上半年成立了薛庄农民协会，选许致远为协会主任。从此，这一带的农民运动以薛庄为中心逐步向周围村庄扩展。年底，农协会会员就发展到数百人。

实践证明：永堍、薛庄以办平民学校和夜校的形式，独立地开展农民运动，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它为萧县在农

民中发展党员和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

总之，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早期的党建活动，这些都为中共党组织在萧县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准备了条件。

第二章

党组织的建立、发展与 革命形势的高涨

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斗争，独自领导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1928年初，萧县开始有了党的组织，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萧县国民党右派大举“清党”，我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经济和政治斗争。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带来了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

第一节 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投奔各处寻求革命真理的萧籍青年纷纷返萧。萧籍共产党员刘亚民、孟庆鉴、陈令远、谢光

亚、崔健吾、朱大同等人，受组织派遣先后从外地回到萧县开展党的工作。

1928年1月，国民党萧县执监委员会恢复，刘亚民任常委，丁文魁、纵精舜任委员，朱思伦（又名朱宜之，后叛变）为秘书。他们都是中共跨党党员，巧妙地利用国民党机关作掩护，妥善安排了一批从外地陆续回萧的共产党员。在摸清萧县已有中共党员的同时，他们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建立了黄口、王寨、萧城三个支分部，已有党员25人（黄口7人，王寨8人，萧城10人）。国民党的县党部成为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这是萧县中共党组织建立初期的一大特点。

1928年2月中旬，胡玄圃、任训常、纵封亭等四位同志，受中共皖北特委（在太和杨虎城部）派遣，回萧县参加党建工作。他们很快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如戴瑞朴、陈履真、孙叔平等。这时，从外地来萧参加党建工作的还有王树璜、秦雅芬、刘石云、訾登臣等同志。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吴雨铭在巡视徐州时，听了关于萧县党建工作发展情况的汇报后，经他提议，3月份在王寨成立了中共萧县特别支部，隶属徐州县委。特支书记胡玄圃（亦说刘亚民），干事刘亚民、胡文清。

1928年4月，萧县特支利用国民党开始建政之机，按照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陈亚峰“要夺取政权”的指示，通过刘亚民等人向国民党县党部举荐一些共产党员到县

政府各部门任职。因国民党萧县县长李承霖同情并支持革命，党组织顺利地达到了目的。结果，便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局面：萧县公安局长谢光亚、督察长孟庆鉴、县常备大队长王景武、大队副陈令远、县款产处主任兼县师范学校校长刘亚民，均是共产党员。全县 16 个区的行政局长（即区长）有 7 个是共产党员，即胡玄圃（一区）、戴蕴山（戴瑞朴）（三区）、姜德伦（四区）、赵再真（六区）、任训常（八区）、陈履真（九区）、李道明（十区）。此外，一些区队长、乡长、小学校长等也是共产党员。可以说，全县党、政、军、财、学的权力，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这种情况，有效地掩护了党在基层的活动，广泛地宣传了党的主张，发展了群众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革命气氛空前活跃，一时有“赤色萧县”之说。

1928 年 5 月 5 日，萧县特别支部改组，王树璜（亦说王世德）任书记，胡玄圃、胡文清为干事。特支辖萧城、王寨、永堙三个支分部和黄口、张庄寨两个党小组。不久，因王树璜到县城贫儿教养院任院长，党的领导机构亦由王寨迁入萧城。

因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与省委失掉联系，不能上情下传，下情上达。因此，省委又派罗世藩到徐海地区巡视。1928 年 6 月 25 日，罗世藩来到萧县。他了解了萧县的情况后，决定成立萧县县委。6 月 28 日，由萧县特支干事会召集各支分部、党小组代表，罗世藩主持召开了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萧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届县委由七人组成,颛孙钧(孙叔平)为书记。颛孙钧、胡玄圃、胡文清为常委,颛孙钧、胡玄圃、胡文清、胡道敏、张得名为委员,王沛然、王树璜为候补委员。

第一届县委通过了党的发展、宣传工作、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七项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加紧反帝反封建的工作,要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健全支部,扩大党的影响。在宣传工作方面,根据党的策略,要多接近群众,多贴标语,多发传单,加强反帝反封建、反捐反税的宣传教育,以及党的政纲的宣传教育。在农民运动方面,强调利用多种形式,把农民发动并组织起来,建立和扩大农协与农委组织,积极同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在军事工作方面,应在敌军中建立党的组织,扩大政治影响,策动士兵哗变,改造土匪武装为农民武装,建立赤卫队,等等。

县委成立后,党组织迅速壮大,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仅两个月的时间,已相继建立5个支部,党员发展到60多人,秘密农协发展到200人。

192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徐海地区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徐海特委。省委代理书记李富春在会上指出:徐海地区前一阶段所谓“夺取政权”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是要夺取政权,但那是要在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立武装的基础上,用革命的力量推翻旧政权,建立革命

的政权。你们现在的做法既没有下层的基础，也没有革命的实际力量，只掌握一些上层职位是存在不住的。因此，省委决定让所有在国民党机关各部门担任上层职务的共产党员撤退下来，到农村和学校去，转入地下，隐蔽地开展的工作，尽可能地使党的力量减少损失。会后，省委派罗世藩同志到徐海地区巡视，对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严令在国民党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立即退出来，对坚持错误的同志要给予严厉的纪律处分。萧县的孟庆鉴、王景武因违令被开除了党籍，谢光亚、陈亚峰因执行命令不力被留党察看。

9月，召开了萧县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改组了第一届县委，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第二届县委仍由七人组成：贺云涛（亦说胡玄圃）任书记，贺云涛、颛孙钧、胡文清任常委，贺云涛、颛孙钧、胡文清、胡玄圃、王沛然为干事，石广宣、胡道敏为候补干事。第二届县委辖5个支部，有党员97人，并在永堙、王寨、黄口、张庄寨、薛庄、陶楼、路套等地建立了秘密农协。

10月，国民党萧县县长李承霖因同情革命被免职，刘丙晨继任萧县县长。由于政局变化，党组织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1月下旬，胡玄圃因指挥学潮的斗争而暴露，经特委同意，召开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第三届县委。选举许西林为书记，许西林、颛孙钧、胡文清为常委，许西林、颛孙钧、胡文清、张达生、萧雅忱五人为干

事，刘昭奎、石广宣两人为候补干事。县委机关设在永堙。因永堙小学的教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县委书记许西林及彭瑞、戴瑞朴、纵翰民、张舒民、陈一民等一批党的骨干先后到永堙小学任教，永堙小学即成为党的活动中心。

1929年初，萧县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在血洗南方各省市之后，开始把魔爪伸向了北方，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头子段木楨带着反动武装来萧县“清党”。段来萧后，在新任县长刘丙晨的配合下，迅速成立了“萧县清党委员会”。他们一面在县城机关、学校逐一清查，一面加强对我党活动地区的控制。短短几天，他们就逮捕了县委委员胡文清及党的骨干刘庆益、李和祥、吴孝庭等，知名的共产党员刘亚民与路继先被通缉。国民党的“清党”，使我党的组织遭到局部的摧残。

1929年5月，为使萧县全体党员同志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振奋精神，县委在许岗子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六大会议精神，分析了萧县党组织遭受破坏后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镇向农村转移的决定。会议指出：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依靠贫雇农建立和扩大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待革命高潮到来时，迅速组织武装，夺取政权。

三届县委以永堙小学为活动中心，以农民为工作重点，认真贯彻六大精神，正确执行江苏省委“从斗争中间建立党的基础”的工作路线，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使萧县的革命形势又逐渐高涨起来。

从1928年6月一届县委的成立到1930年5月下旬五届县委的产生，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虽然有党内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国民党“清党”的破坏，但党的力量依然不断壮大，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此间，全国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徐州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而萧县的革命形势却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究其原因：蒋、汪的叛变革命，虽酿成了全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但其反动势力的魔爪当时只是控制着一些中心城市，他们既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革命基础较薄弱的农村，这是萧县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萧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强烈的革命愿望，群众基础好，加之一大批党的早期创建者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这才使萧县的革命形势能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不断高涨起来。

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30年初，全县共建立4个区委，3个特支，有党员200多人，秘密农协1700人左右。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萧县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第二节 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

萧县的农民运动始于1926年冬,1928年后开始向全县发展。1929年党的工作深入农村后,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

二十年代后期,农村中生活最苦的是雇农(即长工与短工)。他们一无所有,完全靠给地主当牛做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他们的革命性最强,是农民运动的骨干。另一部分群众是贫农与佃农,他们虽有少量土地,但主要靠出卖劳力和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以致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部分群众数量较大,是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党组织在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农民协会,将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组织他们对地主阶级进行多种形式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1927年开始,在路继先、朱玉柯(又名朱玉林)领导下,杨楼地区相继在郝集、杨庄、朱小楼、单庄、路套、袁庄、鲁楼、刘套等地组织了农民协会。路继先以教书作掩护,通过办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农协会员。农协会员又分为一般会员与赤色会员,赤色会员即建党对象,党组织重点培养。

1928年春,戴瑞朴(戴蕴山)在王寨、戴楼、程庄、宁园一带领导农民运动。他首先发动贫雇农成立了“大鞭会”、“短工会”,进而成立农民协会,发展会员670多人。宁园村150户农民有140户参加了农民协会,程庄村50户农民有45户参加了农民协会,戴楼村的50户农民全部参加了农民协会。

自1928年底三届县委机关迁至永堙后,不少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永堙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他们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翻身求解放。至1930年初,永堙地区的农民协会已发展到400多人。

黄口地区的农民运动始于1929年秋,到1930年夏进入高潮。虽起步晚些,但发展迅速,仅黄口附近建立起农会组织的就有程楼、李老庄、李阁、胡庄、大杨庄、郑庄、黑楼子等20多个村庄。农民群众的组织形式也多种多样,如长工会、短工会、穷人会、拾麦队等。

总的看来,萧县各地的农民运动虽然起步时间不一,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都很迅速,尤以杨楼、黄口、王寨、永堙四地最为突出。至1929年底,全县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掀开了萧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崭新的一页。广大贫苦农民满腔热忱地团结在党

的周围，以革命生力军的姿态，英勇无畏地同敌人展开多种形式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作的精辟阐述：“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经济斗争方面，农会利用减租减息，增加长工、短工工资，抢拾地主的庄稼等斗争方式，对地主进行经济上的打击。如王寨一带，农会提出：租种地主的土地，灾年欠收少交租，不收不交租；长工每月工钱由 18 吊增加到 30 吊（1 元银币可兑换 5 吊铜钱），短工工钱由每天 15 斤小麦增加到 30 斤小麦；耨二八改为三七分或四六分；雇长工要一年为限，农闲时不得解雇。每年要给长工做一套棉衣，一床被子；年关不还地主的帐，地主必须借粮给缺粮的农民，等等。这些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地主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农民就不给地主干活，迫使地主不得不按照农会的意见办。

1928 年至 1930 年，党在全县范围内多次发动了大规模的麦收斗争、秋收斗争和年关斗争。在斗争中，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短工工作，扩大了“短工会”，号召短工上市，提出了“短工工资每天一元”（增加了一倍），“短工不做夜

工”，“不准半路开除短工”等口号，与地主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短工工资增加了一至两倍，劳动时间大为减少。1930年麦收时，王寨附近的戴楼、张绪庄、朱庄、孙大楼、李楼等村庄的农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大批妇女儿童，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宁园、东西郝楼集中，抢拾几家地主的小麦。地主武装勾结王寨区队联合镇压，因慑于群众的威力，未敢开枪，最终被群众打得抱头鼠窜。在党员的带领下，王寨的30多名农会会员，抢割了地主王孔词的小麦30多亩。宁园村的农会还迫使大地主张庆祥拿出6万多斤粮食给农民吃。

在政治斗争方面，农民协会通过开展说理斗争，游行示威等方式，清算地主的罪恶，争取民主自由，在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树立农会的权威。如郝集农民反对劣绅刘瑞岐的斗争，黄口农民反对土豪恶霸邵世恩的斗争，朱小楼子农民反对大地主刘子瑜霸占公有集市的斗争，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所有斗争中，最突出的是永堽寨农民的“罢更”斗争。永堽寨是恶霸地主刘献符的封建山寨，圩寨的面积比萧城还要略大一些。当时，土匪蜂起，地主为保护家产，依靠封建权势，强迫穷人无偿地为他们打更守夜，看家护院。农民出入圩寨还要搜查盘问。对此，农民群众非常愤恨。1928年冬，打更的长工刘志木和赵风鸣因冻得受不了，搞点柴禾烤烤火。结果，刘志木被地主毒打了一顿，赵风鸣被地主偷放在柴禾

里的子弹炸伤了脚。永堙的群众对地主的恶毒行径义愤填膺，沸腾起来。党组织认为，这是发动群众的好机会，立即组织召开了300多人的穷人大会，掀起了“罢更”斗争。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永堙区长刘秉周，向他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穷人不给地主打更看家，二是穷人买平糶粮不得不给，三是穷人出入圩寨不得搜查盘问。刘秉周不答应，群众就当场辩论，刘被问得哑口无言。为夺取“罢更”斗争的全胜，永堙党支部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由杜玉堂、张得名等党员带领三四百名农会会员和普通农民，高呼“打倒劣绅恶霸”等口号，拥进区公所，迫使刘秉周全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三项要求。

斗争的胜利，灭了地主的威风，长了农民的志气。农民群众看到了农会的威力，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入了穷人会，力量大十倍，穷人一条心，定能扭乾坤。”它生动地反映了农民斗争情绪的高涨。

萧县农民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封建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猛烈地冲击着旧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充分显示了农民中间蕴藏着的伟大革命力量，展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广阔前景。

第三节 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萧县的学生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19年

五四运动到 1927 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逐步深入,青年学生开始觉醒,出现了一批思想较进步的先进分子。他们为追求真理,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此时的学生运动,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就其本质而言,仍属于自发性的,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1928 年党组织建立后,在发展党员、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党组织也注意到对学生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这才使萧县的学生运动正式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1928 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刘亚民被党组织派往萧县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还有孙叔平、李季华与耿蕴斋。他们在校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萧师成为全县革命斗争的中心和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同年 10 月,在萧城贾巷陶家房子召开了萧县共青团支部成立会议,萧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诞生。会议选举萧师学生颢孙琨猷为支部书记,陈一民(女)为组织委员,刘庆益为宣传委员,有团员 15 人。随着团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不久又在贫儿教养院建立了一个支部,有团员 20 多人。与此同时,萧县团组织与徐海蚌特委取得联系,特委派张雨亭(即陈政齐)来萧建立团县委,萧雅忱担任团县委书记,徐秉玉(女)、颢孙琨猷为干事。团组织发展很快,萧师 150 名学生,入团的竟有 90 多人。团组织开始由

城镇向农村发展，郝集、王寨、曲里铺、张庄寨、黄口等地，都发展了不少团员。

共青团组织成为党联系青年的纽带。当时，党团组织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的，团员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没有团组织的地方，党组织也直接抓团的工作，团员不是党员的也做党的工作。这种党团合一的工作方式，直接促进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既注意思想理论教育，又注重实际斗争的锻炼。

为了活跃青年学生的思想，启发教育他们积极投身革命，萧师党团支部在学生中成立了各种学术研究会。以此作为团结教育学生的公开组织形式，吸收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座谈国家时事，探讨革命理论，交流思想认识，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为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做好思想与组织准备。

为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支持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萧县党团组织利用济南五三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真面目完全暴露的有利时机，迅速在学生中掀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高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口号，宣布学生停课，走上街头进行声讨和查禁日货。学生没收了萧城关信和等商店的洋烟、洋火、日光肥皂等 20 多箱，当众焚烧，使日货一时在市面上绝迹。学生们还到萧城周围的

大庄、丁里等地进行宣传活 动，使农民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正当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萧县教育局却以“安心读书”为借口，限制学生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并以繁重的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为手段，束缚学生的思想，压制学生的行动。于是，党团组织发动学生“罢考”，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创办了《晓声》半月刊。以此作为宣传政治形势，指导学生运动的舆论阵地。该刊虽然仅出两期就被查封，但仍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党团组织为了把学生运动推向全县，又在萧师发起了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的斗争。首先，由萧师学生向全县小学发出宣言，并派团员分赴黄口、郝集、王寨、永堙等地联络，同时要求县教育局予以承认。教育局长魏绍舜极力反对，并拉拢、收买、威吓学生，给学生施加压力。他们以实小学生的名义，炮制了一个《反对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的宣言》，并对学生原已发出的若不同意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即罢课的宣言置若罔闻，因而激起学生愤怒。萧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请愿，游行示威。他们首先驱逐了师范训育主任黄怀宇，冲出政府当局武装封锁的学校大门，包围了教育局。教育局长越墙而逃。次日，学生举行罢课，黄口、永堙、王寨、郝集等校纷纷响应，全县参加罢课的学生达千人以上。县教育局无奈，只好准许成立全县

学生联合会。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取得初步胜利，扩大了政治影响。

政府当局对学生斗争的胜利并不甘心，在全县学联即将成立时，教育局命令全县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假，致使学联未能按时成立。寒假期间，教育局免去了刘亚民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并开除了李和祥、刘庆益、陈一民等七位党团员学生。对此，党团组织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决定继续坚持斗争，一方面组织学生开学后及时到校，一方面向社会呼吁，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1929年春开学后，学校贴出了开除七名学生和丁文魁接任校长的布告。学生看了极为愤慨，当即撕去布告，宣布罢课。全县各学校都发表了声援萧师学生的声明，要求教育局收回成命。萧师等校学生再次举行请愿，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岗哨阻拦，包围了教育局，高喊“打倒魏绍舜”的口号。之后，游行队伍又赴县府请愿，迫使县长刘丙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让教育局收回成命，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斗争取得圆满胜利，各校学生派出代表，在实小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萧县学生联合会”。这场斗争前后持续达半年之久，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萧县学生运动史上前所未有。

通过一系列斗争，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并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壮大了党团队伍，使学生运动健康发展。

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下了毒手，萧县党团组织遭到破坏。萧师学生被开除 33 人，刘庆益、吴孝庭、李和祥等同学被捕，团县委被迫由萧城转移到永堙西南的张庄村继续活动。1930 年后，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导致党团组织大部分暴露。至此，萧县的学生运动也和党团组织的其它活动一样，转入低潮。

附(1)

萧县县委报告

——关于县委产生经过

(民国十七年七月八日)

省委：

萧县县委已于六月二十八日由全县代表大会产生了。今将产生经过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工作计划逐项作一报告。

1. 产生经过

此次省委代表来萧，决定萧县成立县委。由萧支干事会召集各分支各小组代表开会选举，不过通知发下甚晚，致除城内两小组，永堙一小组有正式代表到会外，其它各地代表均未到会，因而萧支干事会议强拉尚未返原校之

各地同学，充各地代表，勉强开会，等各地代表到会的时候，县委干事已经举出，许多议案已经通过了。二十八日续开会议时，即有代表发言不承认二十七日之选举及议案。最后得省委代表罗同志及多数代表之同意，推翻二十七日会议，重新开会。各列席代表七人，萧支干事三人，省委代表一人，选举结果，除三位农民同学胡文清，胡道敏，张从(得)名外，顾(颢)孙钧以七票当选，胡玄圃(圃)以六票当选，王振(树)黄以五票当选，王沛然以五票当选。顾(颢)孙钧、胡玄圃、胡文清、胡道敏、张得名五同学为正式干事，王沛然、王振(树)黄两同学为候补干事，顾(颢)孙钧、胡文清、胡玄圃三同学为常委，常委互推顾孙钧为书记，胡文清为组织干事，胡玄圃为宣传干事。县委成立经过，大约如此。

2. 萧县县委成立代表大会决议案：

A、党的组织的发展

七月份应有下列之发展

农民分子：王寨五人，永堙四人，黄口二人，城内五人，张庄(寨)二人，共十八人。

职工分子：王寨二人，永堙二人，黄口一人，城内五人，张庄(寨)二人，共十二人。

士兵分子：王寨五人，永堙二人，黄口五人，城内五人，张庄(寨)三人，共二十人。

其它(学生及知识分子)：王寨三人，黄口三人，城内

三人,张庄(寨)二人,永堙四人,共十五人。

B、宣传及训练

(1)内部训练问题:

a. 上下级党部关系要密切;b. 注意各别训练;c. 办校刊——县委通讯;d. 多派巡视员下乡巡查。

(2)外部宣传问题:

原则——根据党的策略;方法——多发传单,多接近群众,多贴标语。

C、农民运动

a. 原则——根据各地情形规定工作增加标准,对农民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但须解释清楚。

b. 指示——曹村、陶楼、杜集、赵周(庄)四地于最短期间成立农民组织。

D、职工运动

原则——对各要塞工人应竭力组织之,并领导他们作各种的斗争。

E、士兵运动

(1)调查工作——调查全县武装数目及其性质。

(2)工作原则——变化武装性质使其革命化,组织工农群众夺取武装。

(3)工作方法——普通(遍)宣传,个别谈话,派遣同学及工农分子入伍。

F、青年运动

(1)在可能范围内党应助团发展;(2)应助团组织青年群众;(3)有青年同学之处,应有团的组织。

G、其他决议:

(1)土匪中须插入同学,一方面在其中发展组织,一方面改变其性质使之革命化。

(2)对白色恐怖应用民众红色恐怖对付,不应用手枪炸弹式的恐怖对付。

(3)建议省委组织徐特委。

(4)前书记错误甚多,请省委处分。

3. 七月份工作计划

(A)对内

(1)县委的组织

县委	{	正式干事五人	{	书记……………秘书
		常委三人		宣传……………宣传委员会
				组织……………训练委员会
		候补干事二人		

(2)支部问题

王寨、县城、永堙、黄口、张庄(寨)于一礼拜内成立支部。

(3)训练问题

a. 常发训练大纲及理论的或实际工作的通告;b. 出不定期校刊——县委通讯;c. 各支部党员会或小组组长联席会议县委须派人参加;d. 县委每月须派巡视员到各

地巡视二次；e. 县委与支书每月须开联席会议一次；f. 设干部人才训练班。

(4)会议时间

a. 全县代表大会遇必要时，由县委召集；b. 县委每礼拜开会一次，遇必要时开临时会议或扩大会；c. 常委两礼拜开会一次；d. 训练委员会每礼拜开会一次；e. 活动分子会议临时召集。

(B)对外

(1)调查社会状况：a. 武器；b. 地方；c. 要求；d. 乡村生活状况。

(2)在本月内成立农民协会。

(3)工运：在一月内使黄口、永堙、王寨、县城有职工组织。

(4)士兵：在这四周内成立士兵委员会，尽量使在农者加入公安团。

(5)青年：在王寨成立团小组。

附(2)

萧县师范学生自治会支援
萧县师范学生反对教育局开除
李和祥等七位同学运动的宣言

全县各校同学们： 各界同胞们：

得闻萧县师范李和祥等七位同学被开除学籍的消息，使人不胜骇异！

成立学生自治会是在民主政治下人民应有的最低权利，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是全县学生正当的要求，对于这一行动，政府应予以大力支持。而李和祥等七位同学，是萧县师范学生民主选举，代表全体学生意见，执行学生自治会决议的，对于他们，政府应当予以保护，使他们能更好地尽到他们的职责，这是人民对政府所殷切希望的。而今乃有大谬不然者。政府对全县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既以为系“非法组织”而阻挠破坏于前，对于同学又加以“越轨行动”之名而开除学籍于后。在目前民主政治下，竟出现此等事件，实属骇人听闻！假若任意加以罪名，即可予以迫害，则违背个人意志者，无不可加以“非法”罪名之事，亦无不可加“越轨”行动之人。如此措置，民主安在？自由

何存？人民的身份自由、生命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呢？

目前萧县师范同学反对开除李和祥等七位同学的行动是正义的。为了支持萧县师范同学的正义行动，为了争取人民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我们坚决支持萧县师范同学，采取与师范同学完全一致行动，要求恢复被开除同学的学籍，并保障他们身体的自由和安全，不达目的，誓不中止！

萧县各校学生声援萧县
师范学校学生反对教育局开除
李和祥等七位同学运动后援会
一九二九年三月

第三章

“左”倾错误路线对萧县的影响

1930年夏至1932年秋两年多的时间里，在李立三与王明两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萧县的党组织发动并领导了“黄口暴动”与“张庄寨、洪河集暴动”。由于武装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两次暴动皆以失败告终。两次失败的暴动，加上两次夭折的暴动，使党团组织大暴露，从而遭到了大破坏，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1933年春，路继先与朱玉珂在萧铜边境开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第一节 黄口暴动

六大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内新军阀的混战，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全国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黄口武装暴动的失败,即是这个“沉重代价”的一部分。

1930年6月中旬,中共徐海蚌特委书记陈资平、宣传部长陈履真相继来萧,先后在永堙、戴楼、帽山窝的周庄等地,多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他们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漫山遍野都是干草,只要有人点火,马上就会燎原。”特委指示,立即实行党组织“军事化”,将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县行动委员会。各区委及下属组织也成立行动委员会,停止党、团、农协的一切活动,为武装暴动作准备。张圣和任县行动委员会书记,委员有纵翰民、张舒民、戴瑞朴、胡文清、萧雅忱、李祥龄、许致远、谢光亚等。

6月底,萧县行动委员会在李老庄村李祥龄的家中召开了扩大会议。依照特委“秘密准备,突然袭击”的指示精神,会议讨论了举行暴动的时间、地点和方法。会议决定:

7月10日(农历六月十五日),分别在群众基础较好的黄口、王寨、永堙三地同时举行暴动。黄口由张圣和、李祥龄、谢光亚负责;王寨由戴瑞朴、胡文清负责;永堙由纵翰民、萧雅忱负责。

李祥龄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黄口,连夜进行部署。他一方面对敌人力量的分布情况进行细致的侦察和分析,一方面召开一系列会议,从党内到党外,反复动员,精心策划,认真组织。

黄口位于徐州西面距徐州100华里的铁路线上,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车站。这里行栈林立,客商云集,是方圆一二百里内的工农业产品集散地,也是萧县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30年春,黄口地区已有党员20多人,附近的程楼、李老庄、李阁、胡庄等20多个村庄都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200多人。

此时,黄口驻有蒋介石第三军第二十七师的一个连。该连的三个排,分别驻在车站的北面、东面、西面三个地方,约140人。加上黄口区队和商务团的一个班的武装,总计约200人,近200支枪。我方仅有短枪3支,土造炸弹48枚。论武器,我方处于绝对劣势。我们的优势在于:一是有共产党员和农协会会员组成的骨干力量200多人。二是群众基础好。通过农协会会员的秘密串连,参加暴动的工农群众可望达到2000人。三是国民党区队长张永祥是共产党员,区队武装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此外,我们

还动员了一部分有胆识的流氓无产者参加暴动。关于商务团的武装,其任务是为商界上层人士保护财产,不介入政治斗争。他们既不会帮助我们,也不会成为我方的敌人。基于上述优势,只要我们运筹得当,动作迅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可以各个击破,速战速胜的。

李祥龄等暴动的组织者们详细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后,又研究部署了具体的战斗方案。总的思路是:让暴动队员伪装成赶集的群众,趁上午10时左右赶集人最拥挤的时候逼近敌人营房,以突然袭击的方法,首先干掉敌人的岗哨,然后闯进敌营房,白手夺枪,迫使敌人缴械投降。具体的战斗分工是:由李祥昌(党员,黄口小学教师)带领一部分突击队员进攻站东一个排的敌人;由李祥林(党员,农协会会员)带领一队人马进攻站西一个排的敌人;由包继宣带领一部分暴动队员进攻站北一个排的敌人;由李兆铭带领黄口小学的学生宣传队,在暴动开始后,上街写标语,散传单,开展政治攻势;由郑传舜(黄小教师)组织铁路工人在站东李阁村附近破坏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大家商定,以系红布条为标记,齐心协力,一齐下手。这样,一场威震徐海蚌的武装大暴动就布置就绪了。

7月10日上午,黄口镇比往常显得更加热闹,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肩摩踵接。9时许,文明街张德胜的理发店里,陆续赶来一伙青年人。他们是李祥龄、李祥昌、李兆铭、李祥

林、包继宣等。当他们向李祥龄汇报各路暴动突击队员已潜至指定地点时，李祥龄很高兴。他们简要地讨论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随后陆续走了出去。

10时，指挥所准时发出信号枪声。共产党员程瑞凯拔出短枪，首先把车站西面敌人营房的岗哨打倒，又朝营房接连扔过去几个炸弹。趁着弥漫的硝烟，20多名突击队员一齐冲了进去，高喊“缴枪不杀！”程孝思提着一桶煤油，向敌人吼道：“不缴枪，就烧死你们！”敌人吓得乱成一团，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盘踞在车站东面的一排敌人，听见西面枪响，又见一大群青年小伙子逼近营房，吓得屁滚尿流，夺路向东逃窜。我暴动队员奋起直追。这股敌人逃到黄口东北三华里的张寨村附近，就被当地群众截住。在群众的配合下，暴动队伍将敌人团团包围，迫使这一排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战斗刚一打响时，赶集的群众不明底细，吓得乱跑，商店纷纷关门，集“炸”了。黄口小学的宣传队及时冲上街头，有的写标语，有的散传单，有的向群众讲演。他们还沿街大声疾呼：“大家不要害怕，这是共产党员暴动，不是土匪抢夺东西架肉票的！”群众听说是共产党暴动，情绪马上安定下来，关了门的商店，又重新打开了门。

近午时分，盘踞在车站北面的敌连部和一排敌人还在据险顽抗。他们在墙壁上挖了许多枪眼，向我暴动队伍

瞄准射击。我暴动队的突击手程瑞凯、李祥太牺牲。因我暴动队员都是缺乏军事素养的青年农民，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仍未能取胜。鉴于这种情况，李祥龄当机立断，决定在坚持武力围攻敌连部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他派人把商会会长刘德印、唐秉五找来，动员他们为暴动立功，要他们到敌人营房后门去喊话，劝敌人投降。刘、唐二人是当地的“仁义光棍”，八面玲珑，善于应变，都表示愿意效劳。他们来到敌人营房后，向敌人高喊：“我们是商会的会长，是出面讲和的，千万不要对我们开枪。”随后，两人突然闯进敌连部，对敌人好言相劝：“这是共产党暴动，不是土匪，你们赶紧缴枪算了！愿意跟共产党干的，他们欢迎，愿意回家的听便！”趁刘、唐二人向敌人劝降之际，暴动队伍在敌人营房外点着了房子。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对处于困兽境地的敌人造成很大威胁。“缴枪不杀！投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暴动群众的怒吼声一阵高过一阵。在政治攻势和暴动群众的威逼下，这股敌人终于缴械投降了。

这时，区行政局大院里的区队武装，仍然处于持戈待命状态。李祥龄来到行政局门前，向里面一招手，张永祥就把区队带出来，交了枪。至下午3时，暴动获得全胜，缴获长短枪近200支。

暴动结束后，黄口镇上的居民和赶集的群众，纷纷出现在闹市街头，围着红色宣传队员，倾听他们宣讲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宗旨。在火车站北面的出口处，贴出一张醒目的大布告，宣布这支暴动队伍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独立营”。布告的署名是：师长张达生（张圣和），政治委员纵甸之（纵翰民），独立营营长李祥龄。布告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和政策，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下午4点钟左右，200多名武装起来的暴动队员在黄口镇南面的陈河集中。随后，暴动队员排着整齐的队伍，高擎鲜红的共产党党旗，吹着嘹亮的军号，雄赳赳，气昂昂，沿着萧黄公路向东南挺进，威胁着萧城的敌人。当夜，宿营曲里铺。次日，暴动队伍转向王寨以西进发，打算与王寨、永堙的暴动队伍会师。不料，王寨、永堙都因条件不成熟没有暴动起来，这支队伍就驻扎在王寨西面的宁园、郝楼休整。在宁园，暴动队伍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大地主郝鸣扬，并把张庆祥、郝鸣扬、郝鸣珠三家地主的粮食、牲口和农具，统统分给了贫苦群众。

7月13日，暴动队伍回师曲里铺，国民党萧县县长王公珣亲率县警备大队紧跟追击。暴动队伍中，以任爱斯为首的一部分流氓无产者乘机哗变，把装备最好的一个连的大部分人员偷偷拉走，造成一些同志情绪低落。大家感到势力单薄，在本县回旋困难，外走又无出路，决定分散隐蔽，自寻掩护，各人所带枪支亦由自己设法掩藏。这样，名震一时的黄口武装暴动队伍就烟消云散了。暴动

中，李祥龄的胞弟李祥太、程楼的程瑞凯、小李庄的李福全、单庄的单衍林英勇牺牲。他们是萧县人民为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第一批殉难者，是萧县人民永远怀念的革命先烈。

黄口暴动是萧县党组织发动并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它在萧县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对徐海蚌地区震动很大。它使盘踞在萧城的敌人惊恐万状，有的甚至逃亡徐州。尽管蒋、冯、阎大战正胶着于亳县、兰考、商丘、菏泽一线，军用物资的运输十分繁忙，而徐州至商丘的铁路交通却因这场暴动被中断了三天。特别是暴动队员在暴动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及党组织在暴动中显露出来的指挥才干，在萧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节 两次夭折的武装暴动

黄口暴动失败后，萧县行动委员会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县行动委员会派纵翰民与戴瑞朴同志去徐州向徐海蚌特委汇报暴动情况时，认为萧县武装暴动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样的暴动应立即停止。然而，他们的建议不光没有得到特委领导人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与指责，说黄口暴动的失败在于萧县行动委员会右倾，并要求他们回去继续组织暴动。特委仍旧认为：形

势如干柴烈火，只要红旗一举，群众就会响应。问题是敢不敢干，只要敢干，革命很快就会成功。并且一再指示萧县行动委员会要再接再厉，发动群众大干，一定要举起“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和“萧县苏维埃”的旗帜。随后，徐海蚌总行委委员陈履真来萧县传达总行委决定：在徐海蚌地区建立红军第十五军，由特委书记陈资平任军长。该军辖三个师，萧县暴动队伍编为第一师，张圣和任师长，纵翰民任政委。同时，建立萧县苏维埃政府，纵翰民（纵夷陀）任主席，委员有张圣和、戴晓东、萧雅忱、张舒民。并要求萧县行动委员会用真名实姓贴出布告，公开号召农民暴动。

萧县行委虽然对特委的批评想不通，对特委关于形势的分析有疑虑，对特委的指示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无条件的贯彻执行。1930年9月初，县行动委员会在吴二庄东南的周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红军师，并决定在萧城、里山、朔里、吴二庄、店子等地组织第二次暴动。会后，大家分赴各地，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暴动力量，并连夜印发了大量关于成立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师的布告。一夜之间，县城及各大集镇都贴满了布告。布告上的署名，全是萧县党组织主要领导人的真名实姓，这无异于把党的组织告诉敌人。结果，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暴动也没能举行，而国民党却掌握了我们的活动情况，到处戒备森严，搜捕共产党员。

9月7日，靳伯益、王汉民等同志召集城关学校的30多名党团员在圣泉寺开会，研究城关暴动问题。当夜，他们在靳伯益家被捕，传单也被搜去。敌人严刑拷打，甚至凶残地用子弹头撬他们的肋骨，威逼他们说暴动计划。王汉民义正辞严地驳斥敌人：“关于暴动，我们的布告上讲得明明白白，你们已经看到，何必再来问我？布告上没讲到的，你们就是把我的肋骨全撬断，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靳伯益同志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共产党组织暴动，那是你们逼出来的。共产党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你们只能伤害我的肉体，绝不能摧毁我的革命意志，更不能动摇我忠于共产党的信念。我坚信，你们的疯狂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他们的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次年4月12日，靳伯益与王汉民同志英勇就义于镇江。

暴动夭折后，敌人还在七区逮捕了纵衍朋、李兆铭两位同志，不久便被押解到镇江杀害。县行委委员胡文清在王寨被地主武装暗杀，行委负责人张圣和、纵翰民、萧雅忱、戴蕴山、李祥龄、许致远、张舒民等同志被悬赏通缉。敌人还故意将这些同志与王刘妮、三猫猴等五个惯匪写在同一张布告上，以此污蔑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的加剧使党组织的活动更加困难。为躲避逮捕，党员有的逃往外

地，有的隐蔽待机，群众的情绪也低落下来。

1930年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人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取消城市暴动计划。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及条件所限，中央的精神不能及时传达下来。直到11月份，徐海蚌总行委仍然批评萧县右倾，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萧县行委继续举行武装暴动。

1930年11月5日，纵翰民、张舒民、戴蕴山、萧雅忱四同志聚集在永堙西北的野地里开会，研究在王寨、黄口、里山、萧城、永堙等地举行暴动的问题。他们作了分工：纵翰民负责王寨，戴蕴山负责黄口，张舒民负责萧城、里山，萧雅忱负责永堙。

11月6日，萧雅忱同志在去永堙路经闸河时，被国民党永堙镇镇长王铁、地主石鸿建和劣绅刘献符事先埋伏在这里的打手刘科等人逮捕。国民党县长王公琦审讯萧雅忱时，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萧雅忱怒斥他们“是一伙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的败类！国民党人心丧尽，终究要失败，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人不怕死，怕死不干共产党，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11月23日，萧雅忱同志英勇就义于萧城北关。临刑前，他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萧雅忱同志大义凛然、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值得

萧县人民永远景仰。

由于各地的党组织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党的力量大大削弱,群众情绪低落,各地的暴动都没有发动起来,这次暴动又胎死腹中。直到11月底,特委才按照中央的精神,撤销萧县行动委员会,恢复萧县县委。

新县委由纵翰民任书记,委员有张舒民、许致远等。虽然白色恐怖严重,条件极为艰苦,经常挨饿,但同志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一腔热血,仍斗志昂扬,苦而无怨,勇敢地开展工作。到1931年,全县党组织基本得到恢复,共有支部11个,党员300多人。

第三节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王明等人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

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此时，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临时中央，既不能正确认识中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又无视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继续推行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的“左”倾冒险主义。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配合红军正面作战”一类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强令各地无条件地组织公开的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直至武装暴动，等等。

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路线，命令徐海蚌地区的党组织，立即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并将萧县西部、宿州、口子、永城划为中心暴动区域。对此，时任中共铜山中心县委书记的孙叔平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过是立三路线的翻版。省委书记王方程严厉批评了孙叔平的观点，宣布合并铜山、宿县两个中心县委，成立新的徐州特委，由孙叔平任书记，负责组织暴动。孙叔平表达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对省委的批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也不能检讨。第二，省委决定暴动，个人服从。第三，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不能当领导，请另选合适的同志当领导。孙叔平当场被降职，由书记降为秘书。其实，当时许多同志都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白暴动必然失败，但由于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的帽子，不敢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徐州特委积极执行省委的指示，命令所属各县立即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创立苏维埃红色区域。1932年秋在萧县西部举行的张庄寨、洪河集武装暴动，就是这一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

1932年6月底，中共萧县县委在任小庄召开会议，讨论武装暴动问题。县委委员李繁洲与县委书记朱大同、军事委员冷启英发生了争论。李繁洲认为暴动条件不成熟，不能把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要吸取黄口暴动的教训。朱大同则认为革命形势好得很，只要我们“秘密准备，突然进攻”，公开打出革命的红旗，群众就会一哄而起，热烈响应。他极力主张武装暴动，指责别人为右倾。尽管意见分歧，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举行武装暴动的决议。决定于8月13日（农历七月十二日）先在朔里暴动，然后再组织其它地区的暴动。参加暴动的人员一部分是冯瓦房一带的人，由冯家平带领，一部分是李酒店一带的人，由李忠道（李砥平）带领。按预定计划，两路暴动队伍于8月12日晚到朱大同住的村子朱庄集合，再往朔里进发。不料，当夜遇雨，道路泥泞，当暴动队伍赶到朱庄时，天已快亮。这样，按原计划天亮前赶到30华里外的朔里已不可能。朱大同提出改变计划，先在距朱庄较近的张庄寨、洪河集举行暴动。他和冯家平带领这支队伍攻打张庄寨区公所；李忠道去朔里了解情况，为以后组织武装暴动作准备；王德山、祖玉敏负责组织洪河集暴动。

按照新的部署，由朱大同带领暴动人员向张庄寨进发。他们挑选了37名精干队员，带了19支短枪，抬着软床子，床上睡着人，枪放在人下边，装扮成去区里打官司的。其余的暴动队员，有的挑着瓜挑子，有的背着其它东西，都装扮成赶集的群众。队伍到了张庄寨东门，天刚黎明，寨门还关着。朱大同叫门：“我们村里打死人了，来打官司，叫区长验尸！”寨门开了，朱大同带着抬软床子的人进了寨门，其他人随后也跟着进去了。他们把软床子抬到区公所门前，朱大同首先进了区公所。区队长刘须武正在洗脸，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朱大同一枪打倒。门外的暴动人员听到枪声，击毙了门岗，冲进区公所，缴了区队30余支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只有大街上一个地主的炮楼未攻下来，其余全部攻破。任贻任、王士杰、潘孝顺三同志牺牲，任予锡、侯永碧二人负伤。当国民党县长王公珩率县警大队赶到张庄寨镇压时，暴动队伍已经撤出战斗。

洪河集在张庄寨西北，是距张庄寨三四公里的一个集镇。镇长是共产党员王德山，掌握着镇公所十多人的武装。参加洪河集暴动的有祖小楼子、一条脊、海青房、洪河集等村子的党员和群众，共39人（其中党员4人），有长短枪30余支。听到张庄寨暴动的枪声，王德山、祖玉敏、李玉田等人带领镇公所的武装和来参加暴动的人员在洪河集东头集合。与此同时，他们特意对段林清、孙翠斋两

个地主说：“张庄寨出事了，我们应集中所有的枪支去救援！”段、孙二人信以为真，将他们两家的六支枪全部拿出来，交给了暴动队伍。刚出东门，段、孙二人就被捆绑起来，押回了镇公所。暴动队伍返回洪河集，作战斗准备。当日下午，县警大队与地主武装围攻洪河集。暴动队员坚持了一天一夜后，在王德山、祖玉敏带领下向西转移。段、孙两个地主因看管不严，趁机逃跑。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队伍因力量单薄，抵不住县大队与地主武装的围攻，由县委书记朱大同把队伍拉到永城县芒山一带。永城县县委书记张宗孔在韩庄暴动后，也把队伍拉到了芒山。两支暴动队伍会合后，成立了萧永红军游击大队，由朱大同任大队长。他们准备攻打永城县火神店，夺取团防队和地主的看家枪，壮大游击大队。9月，游击大队打算在火神店党组织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夺取胜利。因敌人防守严密，游击队计划不周，致使潜入火神店做内应的张宗孔等六人，未开始行动即被敌人发觉，在突围中牺牲。朱大同带领的游击队与一股土匪不期而遇，因警惕性不高，竟被强悍的土匪钳制，失去了行动自由。徐州特委派孙叔平前去解救。孙叔平进入萧永边境的虞山后，一方面利用关系与土匪周旋，一方面指示朱大同伺机逃出，到安排好的地点隐蔽。经过多方努力，朱大同与二三十名暴动队员纷纷逃离匪穴，而暴动缴获的枪支却未能带出。张庄寨、洪河集暴动，就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按照暴动前的分工,李忠道与杜慰农于张庄寨、洪河集暴动期间去朔里了解情况,作朔里暴动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在张庄寨暴动中负伤被俘的侯永碧向敌人供出了杜慰农给暴动队伍提供枪支的情况,敌人已掌握了李、杜的行踪。两人从朔里返回时,在萧城附近被国民党县警大队大队长李公达和督察长纵华甫逮捕。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以后,县委组织部长郭子化按照孙叔平的指示,抢在敌人大逮捕之前部署了党员的隐蔽工作,减少了损失。许致远、张再增、李忠道、杜慰农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后,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刑,其他因暴露身份而被通缉的同志都躲避在外。随后,国民党县政府实行了联保连坐保甲制度的反动统治,使党组织的活动比1930年黄口暴动失败后更加困难了。

萧县农民武装暴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在萧县的反动统治,使地主豪绅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暴动期间,先后有十多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产党员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鼓舞和激励着萧县人民为自由和解放坚持斗争,不屈不挠。

第四节 白色恐怖笼罩下萧铜边红旗不倒

1932年秋,朱大同调离,冷启英接任县委书记。他挑

着杂货担，走村串户，联络各地的党员同志，艰苦地进行着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1933年夏，局势更加恶化。由于徐州特委所属各县的武装暴动暴露了党的组织，吸引了敌人更多的注意力。敌人加强戒备，封锁交通，派出大批密探，疯狂地到处追踪和捕杀共产党员，进行对党组织的大破坏。其间，孙叔平与冷启英在徐州被捕，徐州地区党的活动几乎中断。

值此革命低潮时期，彭瑞、张圣和、朱大同、张远怀、高硕仁、刘德茂、李祥昌、金庆凯等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投敌，并当了国民党的特务。特别是朱大同，他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徐海蚌特别行动区特务专员，经常带领一些特务和便衣武装，在丰、沛、萧、砀、铜等县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干部，还胁迫一些党、团员自首。至1933年底，萧县先后有400多党、团员被强制办理自首登记，党、团组织被破坏殆尽。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萧县，仅在陇海铁路以北的萧铜边境地区还保存三个党支部，有党员20多人。他们在路继先与朱玉珂的领导下，隐蔽地进行革命活动。在陇海路南萧五区的李酒店与冯瓦房一带，还保存着几个农民身份的党员，如李繁洲、陈继仁、纵瑞香、沈凤鹤等。在失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们仍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

陇海路北萧铜边境的路套、朱小楼子、和尚庄三个党支部，是萧县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仅有的幸存者。它们的

存在,并非敌人的魔爪没有伸进路北,而是在大破坏之前,他们已将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早在1929年3月,路套党支部因开展打击大地主杨学勤的斗争被敌人“围剿”以后,路套与朱小楼子两个党支部的活动即转入地下,党员同志分别隐藏他乡,就地从事革命活动。在路套,个别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以开烟酒店为掩护,暗中进行党员的接头联络工作。

路继先原籍江苏省铜山县赵台子村,九岁时随家人逃荒到萧县路套村定居。他南开大学肄业后,于1928年冬在路套小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不久便发展路涤生(又名路永铮)与朱玉珂两人入党,建立了路套支部,自任支部书记。1929年4月,路套农协会会员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击大地主杨学勤、杨明哲的斗争。国民党县政府因此派军警到路套小学逮捕他。在老师和学生的掩护下,他得以脱险。之后,他到英国人在凤阳开办的门台子烟厂做苦工。时间不长,又因参加罢工斗争而被迫离开烟厂。回到徐州后,受中共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陈履真派遣,到沛县孟桥小学任教。他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沛县县委委员。因在迎接“红五月”活动中引起敌人注意,遂转入县城西王楼小学任教。不久,因组织农民开展夏收斗争,而被反动当局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他坐了一年半牢,在狱中还发展了张新亭(又名张光中)等两名党员,于1933年

3月出狱。

路继先出狱时，正值萧县的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全县。他住在老家铜山县赵台子村，常常趁夜间回路套与村内党员联络和研究工作，恢复了路套支部，路涤生任书记。同时在萧铜边境发展新党员，建立了两个支部，一个是铜山大杨庄支部，支部书记赵宜路；一个是和尚庄支部，支部书记王清惠。朱玉珂坐了三年牢后，也在此时出狱。出狱后，他也把家乡朱小楼子村失散的党员联络起来，建立了朱小楼子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这时的几个党支部，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1934年秋，苏鲁边区特委建立，郭子化任书记，张光中任宣传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路继先与张光中取得联系后，于1935年4月建立了路套区委，自任区委书记，隶属沛县县委领导。他们坚持“以职业作掩护，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待机再起”的工作方针，党组织化整为零，三至五人为一组，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主要任务是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到1936年底，党员已发展到五六十人。

这支党员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顽强地坚持斗争，为萧县的革命事业保存了火种，积蓄了力量，为日后全面恢复和发展萧县的党组织，开创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章

全民抗战的良好开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广泛团结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党的领导下，萧县人民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迅速投身全民抗战的滚滚浪潮之中，打鬼子，锄汉奸，保家卫国。

第一节 郭子化从延安来

1937年3月，郭子化在延安向党中央委派的代表朱理治汇报了边区特委的工作后，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党中

央决定让郭子化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苏区党代表会议，明确了党的新时期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日战争。而争取民主是准备和实践抗战的中心一环，坚持共产党领导则是胜利的关键。这次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要克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会议强调解决好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团结工农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走上坚决抗战的道路。郭子化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两个重要会议后，进一步明确了边区特委前进的方向。

6月底，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刚刚结束，郭子化又与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起研究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并于7月初离开了延安。途经西安时，他得知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又听西安的同志说，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郭子化重任在肩，急如星火，匆忙从西安搭乘陇海铁路的火车东

去。他在黄口车站下了车，找到了在徐州七师的同学，大革命时期入了党后又脱党的耿蕴斋、丁毅忱，帮他俩恢复了党籍，部署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工作。并要求耿蕴斋想办法当上国民党黄口区区长，取得合法地位。而后以黄口为中心，开展萧、铜、砀、丰、沛五县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要求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广泛地动员群众及各阶层的力量参加抗日工作，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以徐州为中心成立了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司令长官。徐州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要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根据形势发展和河南省委的指示，决定将边区特委迁往徐州，肩负建立徐州及苏鲁豫皖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发动全民抗战的艰巨任务。

为了开展第五战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我党在第五战区公开活动，特委机关迁到徐州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派特委委员、秘书丛林到萧县找县立师范学校校长丁毅忱，请他去徐州，通过萧县人、老同盟会员刘汉川会见李宗仁。丁毅忱到徐州后，郭子化向他说明了想法。他俩都认为刘汉川与李宗仁的关系非同一般。有一次，李宗仁去刘汉川家，听说刘母喜欢晚辈见了她叩头，李宗仁见了刘母就行跪拜大礼。刘汉川思想开朗，时任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秘书长，通过他去见

总动委会主任李宗仁是最佳人选。见了刘汉川怎么说呢？郭子化说，你就说我是从延安来，回家乡做救亡工作，想会见李宗仁先生谈第五战区的救亡工作。并说我们俩在七师上学时，都是他的学生。丁毅忱陪郭子化去见刘汉川，说明来意。刘汉川见到郭子化非常高兴，愿意陪同郭子化去见李宗仁。11月初，郭子化在刘汉川的引荐下会见了李宗仁。李宗仁为了争取第五战区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随即表示同意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李宗仁还欢迎郭子化代表我党在徐州设立办公处，公开活动，并聘请郭子化为民众抗日总动委会的专职委员，参加总动委的领导工作。

丁毅忱又同在徐州牙税局任职的叔父丁次山先生商议了郭子化在徐州设立办公处的一些具体事宜。丁次山先生和郭子化也是朋友，一提此事，丁先生立即答应，他很乐意在牙税局找房子作为特委机关的办公处。特委机关迁往徐州后，丁次山先生在各方面都给了很大帮助和支持。从此，特委就在徐州站住了脚，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

11月，边区特委在黄口西北五华里的孙庙村耿蕴斋家里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历史上称黄口会议。这是历史转折关头，共产党组织以徐州为中心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特委负责同志郭子化、刘文（原名余子彬，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为省委驻特委的代表，并参加特委为委员）、张光中（特委宣传委员）、丛林（特委委员、秘书）以及

徐州西部各县的负责人郭影秋(铜山)、路继先(萧县)、刘屏江(永城)、于化淇(特委派到黄口地区发展党组织的代表)、陈筹(丰县)、尹夷僧(砀山)、孙叔平(此时为丰县代表)、耿蕴斋(萧县)等十几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遵照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对如何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使已开始的抗日战争成为全面抗战,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等事项作了研究和部署。刘文、张光中、郭影秋等同志发了言。这次会议及时指出了边区的抗战方向,并决定各县县委和党组织立即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我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第二节 动委会奏起抗战序曲

1937年10月,路套区委改为萧铜工委,这是宿州地区乃至皖北地区第一个恢复和组建的县级党组织,书记仍由路继先担任。当时一个地方能发展五六十名党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1937年3月组建中共河南省委时,中央交给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的党员组织关系,一共460人。其中:苏鲁豫皖边区特委300多人,河南工委70人,鄂豫省委60人,皖西北特委30人。路套区委的党员人

数,占河南省的八分之一,占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六分之一。这是一簇旺盛的火苗,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我们也应看到,从党组织的成份上看,毕竟还是农民占多数。要动员和组织全民抗战,实行“土农工学商,一齐上战场”,就必须动员和组织一批有号召力、有领导能力的人士到党内来,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边区特委认为:这一地区是我党开展工作较早的,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较多。国共合作后,释放政治犯,已有一批党员从监狱中出来,他们中不少人过去曾做过党的领导工作,理论水平也较高。为了发挥这些同志的作用,边区特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经过慎重审查,弄清事实后,特委为这些同志(少数确有叛变行为的除外)有的恢复了组织关系,有的重新安排了工作。历史证明,这样做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

1937年8月,李忠道从国民党监狱里以释放政治犯的名义被放了出来。他回到家乡李酒店,积极联系失掉关系的党员。他们一边自发地进行抗日宣传,一边找党的上级组织。与李忠道一起坐牢的邳县人武广春先一步找到了党组织,向郭子化介绍了李忠道在狱中的情况。郭子化把联络任务交给了萧铜工委书记路继先,路派陈怀玉到陇海铁路南约李忠道到萧铜边境的赵台子村,共同商讨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李忠道恢复了组织关系后，又恢复了李繁洲、陈继仁、纵瑞香、沈凤鹤等同志的党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组建了李酒店、冯瓦房两个党支部。这也是萧县陇海铁路南最早恢复组建的两个党支部。以后在萧县做抗日领导工作的戴晓东、纵翰民、孙叔平，都是边区特委较早恢复组织关系的领导同志（孙叔平同志恢复不久又因故没有接上）。他们恢复组织关系后都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我党在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委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力量，郭子化通过刘汉川把中共铜山县委书记郭影秋调进总动委会，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由李宗仁的高级秘书夏次书兼任，他是挂名的，郭影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组织部是总动委会的实权机构，由此掌握在我党手里。我党在总动委会内部建立了党团支部，郭影秋任支部书记。各县建立动委会时，总动委会便向各县派指导员。各县指导员实际上就是各县的中共负责人。根据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各县动委会主任由各县县长兼任，副主任由总动委会派去的技术指导员担任，副主任处理动委会的日常工作。萧县因县长姚雪怀被日寇南京大屠杀吓破了胆，急忙辞职，逃往湖南老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命原县民政科长王雪琴为县长。

1937年12月19日，县长就职与县动委会成立同日举行。王雪琴上任伊始，坚持由总动委会派来的指导员丁

毅枕一身二任，主任、指导员一肩挑。遂由丁毅忱任县动委会主任，委员有纵翰民（兼任组织部长）、张舒民（兼任宣传部长）、李忠道（兼任军事部长）、许西连（兼任总务）。委员还有从丰县回萧的冯家平、杜慰农、马冶平、孙叔平四人，他们也参加了县动委会的领导工作。县动委会的实际工作由纵翰民负责，实权为我党所掌握。

县动委会在国民党县党部办公。在县长姚雪怀辞职逃离后，县党部书记李振祥与监督委员权万邦也弃职躲在乡下。他们听说几个原来被通缉的共产党员住进县党部，十分恼火，便赶往县城要房子。他们找到了县政府，县政府秘书彭笑千告诉他们：“县党部的房子是萧县人民的，萧县人民只能给抗日的人用！”并说这些人不识时务，“是不知亡国恨呀！”

新任县长王雪琴，也主张抗战，倾向民主，已开始与共产党接近，并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县政府秘书彭笑千此前任松江专署财粮科长，松江沦陷后回乡参加抗战，认为要抗战只有与共产党合作。

县动委会成立以后，各区也成立了分会。区政权没有经过改选，抗日热情不高，使抗日动员工作受阻。县动委会就向县政府提出改造政权，让坚持抗战的人当区长，得到王雪琴、彭笑千的同意。在姚雪怀任县长时，全县十个区已合并成五个区。动委会推荐两名共产党员当区长，一个是萧铜工委书记路继先，任四区（黄口）区长；一个是耿

蕴斋，重任三区(袁圩)区长(他由于1936年西安事变时大呼“蒋介石该杀”被撤了三区区长的职)。一名进步人士(许西连)任一区(龙城)区长。还有两名国民党员，一是汪敬民任二区(朔里)区长，一是张汝义任五区(褚兰)区长。并派共产党员王良到县常备队做政治工作，派共产党员陈继仁到车警队做旧军队的改造工作。这时，萧县再次出现了1928年“赤色萧县”的局面。

动委会是发动群众的司令部，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宣传、动员、领导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从1938年春节以后，先后开办了唐庙、瓦子口、袁圩、韦道口、路套、醴泉等抗日青年农民训练班。每期时间为十天至半个月，每期参加人数约有一二百人。教材由孙叔平编写，主讲人是当时被称为萧县三杰的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还邀请郭子化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邀请从西北特支来的老红军童陆生(解放后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讲抗日游击战术。1938年2月举办的韦道口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一二百人，多是知识青年，时间是两个星期，主持训练班和讲课的有孙叔平、耿蕴斋、曹鹏飞、冯家平等。1938年3月举办的路套训练班，时间七天，参加学习的有200多人，由纵翰民讲政治，郑子训(县大队的中队长)讲军事。同时还组织了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并在黄河滩里进行了两天的军事演习。路套党支部还找几个铁匠打了钎刀子，武装了群众。

1938年5月7日至16日举办的醴泉训练班,参加学习的90多人,由胡兴茂主持,纵翰民讲课。桃山有孙象涵、顾寒星、薛玉标、亢为德、赵书琴等20余人参加学习。纵翰民讲了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前途、组织抗日武装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使学员明确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和重大意义,为后来开展敌后游击战、培养干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沦陷后,他们就以参加训练班的人员为骨干,组建了彭南游击队,后改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十八大队。

由郭子化建议,经李宗仁同意,第五战区创办的抗敌青年训练班,也为培养抗日骨干、推动全民抗战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期于1937年10月12日在徐州中山堂举行开学典礼,共300余人,训期三个月。训练结束后,由总动委会组织部将其划分成十几个工作团,分赴徐州附近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派往萧县的有曹鹏飞、李祥顺、王瑞书、吴忠智等20人,工作团长曹鹏飞。他们在县动委会领导下,参与了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等工作。随着平、津、沪、宁、鲁流亡学生的增加,第二期增至5000人,萧县有近200人参加。不久,抗敌青年训练班更名为抗敌青年军团。徐州形势吃紧,抗敌青年军团迁往河南省潢川。李宗仁亲任主任,有匡亚明、张百川、臧克家、佟子实等一批党员和知名人士出任政治教员,培养了一批青年抗日骨干,也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人才。萧县近200名进步青年,经过

培训,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纷纷走向抗敌前线,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宗仁办抗敌青年训练班是抗战初期的一个创举,连蒋介石也为之心动,试图把青年军团纳入蒋系中央干训团第二团,李宗仁没有答应。李宗仁曾为此感到骄傲。他说:“蒋介石有中央干训团,共产党有抗大,我有青年军团。”

第三节 龙城保卫战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后,集中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8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共24万余人之兵力,沿津浦路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企图歼灭中国主力部队于徐州地区,打通津浦铁路,连通华东、华北日军占领区,尔后转兵攻取武汉,攫取中原。

在北线日军发起进攻之后,南线日军分多路北向推进。日军南线主力第三、第九、第十三师团于1938年5月3日由蚌埠、凤阳等地出发,渡过淮河,向徐州以西猛进。第九、第十三师团组成“快速”战车队向中国守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猛攻,5月9日占领蒙城,12日占领永城。随后,两师团主力直趋陇海路碭山地区,与北线第十六师团取得联系,切断了第五战区向西的退路,并向徐州迂回。

5月15日晨,第九师团的一个旅团,从百善附近出

发，分两路进犯萧县。其一部在蒋丁楼、孙圩子、瓦子口一带遭国民党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阻击，至晚才逼近龙城。与此同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下令三十二军一三九师驰援萧县。为了激励一三九师将士，奉命前来协助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允诺以5万元作守城奖金。

龙城即萧县县城。中国守军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小县城的得失，因为它距军事重镇徐州仅25公里，是徐州的西南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龙城在，徐州无恙，龙城失，徐州难保。至5月中旬，日军已完成对徐州的包围态势。为避免同日军拼消耗，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先后向豫南、皖西转移，保龙城可为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时间，这是日军合围和中国守军突围的关键一役。

5月15日午前，刚从台儿庄战场撤下来未及休整补充的三十二军一三九师2000余官兵到达龙城，迅即构筑工事。县长王雪琴配合师长李兆瑛勘察阵地，制定守城方案。他们把兵力部署在龙城周围的老虎山、凤凰山、龙山等处，严阵以待。

16日凌晨，日军1000多人，用六七门重炮，十余辆战车，猛攻县城西南的老虎山。一三九师一个营的兵力在此设防，他们借助有利地形，大量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日军久攻不下，转向城北凤凰山进攻。下午3时，日军增至2000人，又向老虎山、凤凰山发起新一轮攻击。上有飞

机，下有大炮、坦克，两山头一片火海。至晚，防御工事多被日军摧毁，老虎山、凤凰山及城郊附近其它阵地相继失守。守军遂放弃山头阵地，退入城内。

17日晨，日军又占领了城东的龙山。守军虽顽强拼杀，反复数次，终未能收复阵地。龙山附近各村落及黄山头相继失守，县城完全陷于被包围瞰制之困境。日军居高临下，用大炮、机枪封锁城内各街道，使部队调动十分困难。下午，日军在周围的山头上对城内轮番炮击，并用气球指挥飞机扫射，用坦克冲击南门。守军凭借城墙工事与敌血战，战况异常惨烈。此时，由蒙城北犯的日军，攻陷永城后，一部沿萧永公路向萧县急进，一部在碭山与从金乡、鱼台南下之敌会合并攻下黄口后，正沿萧黄公路向龙城逼近，前部已接近凤凰山北麓，即将形成对龙城的三路合围，情况十分紧急。守军一面加紧修补工事，一面迎击攻城之敌，师长李兆瑛下令用砖头、泥土堵死四门，固守城池。

当日，抗日名将张自忠所率五十军之一八〇师由孤山集附近增援龙城。该师奋勇冲杀，所属三十九旅一鼓作气攻占了离龙城六七里路的张二庄和孟油坊，与濉溪方面前来增援之敌交火，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日军吃亏后大量施放毒气，一八〇师官兵虽奋不顾身，反复拼搏，终因中毒严重，战斗力下降，被迫撤退。

5月18日，天刚破晓，日军即以密集的炮火攻城，上

午8时发起总攻。日军用坦克把北城门东侧的城墙冲开一个缺口，冲入城内。一三九师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达两小时之久，满城血肉横飞，尸体遍地。因被敌人分段包围，守城官兵伤亡惨重，损失大半，兵力难支，形势对我极端不利，师长李兆瑛遂令各部突围。

李兆瑛师长带领指挥部20多人，从东城门北侧缒城，王雪琴县长带领十余人从东南小奎楼方向缒城。他们约定，缒城后穿过东门外一条小街，奔向龙山与凤凰山之间的山坳处，然后向徐州方向撤退。李师长等人穿过小街，见敌人的火力点正好集中在龙山与凤凰山之间的山坳处，乃转变方向，沿着凤凰山上名曰十八蹬处的一条小路，且战且退，竟得以越凤山而北撤出战场。王雪琴县长因缒城时腿部受伤，由卫士李云祥背负而行，冲出小街，进入麦田。龙山与凤凰山上的敌人，以交叉的火力跟踪射击，在麦田匍匐而行的王雪琴县长及卫士等人，不幸中弹牺牲。跑在前面的县常备大队队长耿继贤，在冲出敌人的火力网后，猛然发现不见了王雪琴县长，乃回头寻觅，欲求接应。同行者虽知危险，但无法劝阻。结果，耿大队长也就永远没再回来。在突围中牺牲的还有共产党员、县常备大队政治指导员王良同志、一三九师参谋长邓佐虞、副旅长吕汝爽等人。

日军破城后，为泄遭抵御之愤，疯狂屠城。城内及四关未逃脱的军民，不问男女老幼，尽遭杀害。东城门内一

岗屋前，十八名弹尽粮绝的士兵被杀害。在不远处的三间屋框里，躺着 27 具尸体。东关外李天真一家八口藏在地窖内，日本兵闯进他家时，寻着婴儿的啼哭声找到了地窖，全家人都被鬼子用刺刀穿死。禽兽不如的鬼子，就连不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全城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由城东门到杨楼山口的五六里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在城东牛眠和城南房庄两个村子，村民及逃难群众近 2000 人被集体枪杀。为了掩盖其罪行，日军让民众自己掩埋自己。鬼子强迫民众排好队，让前排的人先挖坑，挖好后就杀掉，让后面一排的人掩埋。就这样，第二排掩埋第一排，第三排掩埋第二排。当进行到第四排时，突然有人高呼一声：“快跑吧！”话音刚落，群众便呼叫着四处逃散。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用机枪疯狂扫射，绝大多数人惨死在日军的枪林弹雨里，只有极少数年轻力壮者侥幸逃脱。

日寇在牛眠村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案的同时，还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的惨案。有的妇女被先奸后杀；有的妇女被先杀后奸；有的妇女被奸淫后，又被割去乳房，挖掉眼睛；有的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放狼狗咬死，日本兵以此取乐。在太保庙里，几个日本兵把一个妇女轮奸后，又用刺刀挑开肚子，挖出心肝……日寇蹂躏、残害妇女的手段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残忍至极，难以挂齿。在牛眠村，被日军奸淫致死的妇女达 100 多人。

日寇在龙城犯下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罄竹难书。当时，龙城镇常住人口不足 5000 人，城内及城郊附近被杀害者竟达 3000 多人。侵略者在龙城欠下的这笔血债，3000 多死难者的亡灵永在控诉！中国人民永在控诉！

5月19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猛攻徐州守军二十一军卧牛山与马山阵地，当日上午即占领徐州。

龙城保卫战将日军攻陷徐州的脚步阻滞了三天，为第五战区数十万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了时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守城军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撼人心扉的抗战悲歌！

早在日军进攻龙城之前，即刚入萧境的第一天，其第九师团之一部夜宿萧县西南孙圩子村时，被第五战区刘汝明部夜袭，伤亡惨重。日寇便在孙圩子附近的蒋丁楼进行报复，一个不满百户的小村庄被杀害 100 多人，出现了“家家皆穿孝，户户有哭声”的惨景。不少人家被杀绝，大部分家庭被洗劫一空。

侵略者在萧县犯下的累累罪行，激起萧县人民的无比仇恨，反抗的怒火在人民胸中燃烧！

第四节 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在动委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的

同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抓紧部署各县，千方百计抓武装。可是，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条例上有个规定：各级动委会，只许成立抗日团体，不许建立武装。在这个问题上，边区特委没有按照王明等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去做，而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郭子化指示：“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张，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打日本侵略者，没有我们自己的武装怎么行？我们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

可是，自己建立武装，武器、弹药和人员给养都有困难，最好是争取合法地位，解决面临的困难。郭子化就找到萧县人李明扬，李当时是徐州专员公署专员兼第五战区苏鲁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思想进步，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和刘汉川、丁毅忱，既是同乡又是老朋友。郭子化就利用这个关系找到了李明扬，想要一个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李明扬和专署秘书主任丁熙民（萧县人），都和我党保持着统战关系。可共产党要公开组织武装，此非一般问题，且违背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故李明扬也有所顾虑。他问郭子化：“你们有多少人？”郭子化随便答道：“现有200多支枪，500多人，我们还要大发展！”李明扬笑了。他说：“仅几百人还叫什么义勇军，就叫义勇队吧。共产党是爱护人民的，加上‘人民’二字，就叫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吧。”郭子化认为队亦无大小，这并不能限制我们

武装力量的发展,就表示同意。就这样,我们党从李明扬那里领回一个“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公开番号。丁熙民为表示对我党的支持,与李明扬商量先拨给 2000 元钱,作为开办经费。

早在黄口会议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安排各县党组织积极串联人枪,组织抗日武装,准备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1938 年 2 月,特委进一步作出了徐州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大体计划:即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点分成四块,徐东北包括贾汪、枣庄和鲁南山区;徐东南包括铜山南部、邳县、睢宁、宿迁;徐西南包括萧县、宿县、永城;徐西北包括丰县、沛县及萧、砀、铜陇海路北地区。这四块地方都建立区委(相当小地委),领导该地区的游击战。徐西南区委没有建立起来,属徐西北区委领导。1938 年 5 月初,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王文彬在丰县召开丰、沛、萧、砀、铜五县联防会议。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书记李忠道、陇海路北萧铜工委委员王清惠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各县积极建立抗日武装,每县至少要搞 30 条枪。

1938 年 5 月 16 日,纵翰民按照组织安排,在醴泉青年农民训练班刚一结束就赶往陇海路北去参加党的秘密工作会议。途经瓦子口时,瓦子口已被日军占领,不能通过,又转道萧城附近去了路套。路套会议决定,立即建立游击队。这时,中共萧铜工委书记、黄口区区长路继先,已

于3月中旬同萧县的路永锷、孙善佑、耿春涛一道，去河南确山县竹沟村彭雪枫办的抗日游击训练班学习，区长换成了马冶平，也是共产党员。他同区员朱玉林（中共萧铜工委委员）一起，已成功地改造了黄口区队，在区队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有效地掌握了区队武装。在日本侵略军进犯到黄口西部时，即由马冶平、朱玉林带领区队四五十人枪，拉到陇海路北萧铜边境，改编成了抗日游击队。路永锡在油庙、李庄组织了三四十人，冯蕴言、路永铮在冯庙组织了几十个人，这三支队伍合并在一起组成陇海大队，大队长由中共萧铜工委委员耿兴义担任，指导员由中共萧铜工委书记周峰担任。这支队伍于1938年6月被徐西北区委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萧县独立大队”。

5月17日，在第五战区长官部机关向徐州西南突围撤退后，郭子化也与边区特委的一些工作人员撤到滕峰边区。特委在这里的老古泉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委员，编成三个大队，一个警卫连。6月11日，中共徐西北区委宣布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亦即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总队从第五大队始编，因第一总队已有一、二、三、四大队。第二总队成立后，从第五大队一直编到二十九大队，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

徐州沦陷后，总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郭影秋跟随逃难的难民来到萧县。他先到冯瓦房与冯家平接上了头。冯家平告知了李忠道，李去冯瓦房见到郭影秋，后来又联系上耿蕴斋、陈怀玉、张舒民等，便在李酒店开了一个会议，研究抓武装问题。首先要把国民党士兵从徐州撤退时丢在萧县的枪支收集起来。在此之前，中共陇海路南区工委曾部署由共产党员掌握的两个区，先把区队改造过来。四区（黄口）按要求完成了任务。三区（袁圩）区长耿蕴斋（共产党员）、区员孟振声（共产党员），由于怕各乡乡长反对，不敢把区队长马金玲和那些不可靠的兵痞、乡丁换掉。当日军进到陈蒋山时，耿、孟把三区区队拉到赵庄后，由于没经过改造，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都带着枪跑回家了。路南区委曾对耿、孟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让他们各自回家乡组织武装。结果，耿回到家乡孙庙，孟回到家乡孟吴楼，各自拉出一支队伍，一共一百七十八人。耿拉的队伍由何光友任队长，孟拉的队伍由孟昭林任队长，纪律很差。主要是成份复杂，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愿意抗日的；二是为了保枪而参加游击队的，即地主人的枪股；三是地痞流氓、土匪。他们已把队伍拉到陇海路南张大屯、曹瓦房一带，与土匪杂八队混在一起。路南区工委曾派陈继仁、李忠信等去做改造争取工作。郭影秋知道后，也曾带着陈怀玉、冯家平、耿蕴斋、孟振声到部队住了几天，看到他们连耿蕴斋、孟振声的话都不听，回来就建议把这两支

部队拉到陇海路北丰、沛一带去整顿。在征得耿、孟同意后，由耿蕴斋、孙叔平带领去了路北。经过整顿，与路北部队一起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五、十六大队，跟随陇海路北部队活动。

郭影秋在萧县住了一个多月，还到永城、夏邑两县去了一趟。他听从陇海路北到路南联系工作的李公俭说，路北各县在拉队伍，司令员叫郭洪涛。决定先到山东找省委，要求派主力部队到路南帮助组建抗日游击队。6月中旬，他同陈怀玉一起化装上路了。刚走到丰、单边界，遇到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王文彬政委、李贞乾总队长，王、李动员他俩留下来，找省委的事可以写信请示，派专人送去。郭影秋便留下来任二总队的政治部主任，陈怀玉为丰、沛、萧、铜、砀五县巡视联络员，帮助总队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

在郭影秋没离开萧县前，送走何光友、孟昭林两支部队去路北后，郭影秋就与路南区工委的同志商量过，要建立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可是，当时只有两三支枪，组不成队伍。这时，吴蒋庄、王寨、孙庄以西地区被土匪武装占领着，以东又是地主联庄会的武装。他们相互封锁，不断发生武装冲突，游击队建立不起来。李忠道就到吴蒋庄以东地区，找到联庄会负责人吴信容做工作，宣传只有抗日才能保家的道理。他们接受了抗日保家乡的思想，参加抗日活动也很积极。

由于通过吴信容争取了吴蒋庄以东联庄会抗日,为党组织建立自己掌握的武装创造了条件。开始,参加游击队的主要是李酒店、孙大庙、冯瓦房、大吴集一带的抗日青年积极分子,还有孙清淮、石英从土匪石金玉那里动员出来的十五六个人,十来支枪,一共五六十人,十五六支枪。当游击队住在五区樊屯时,土匪头子石金玉又带着武装,把石英带来的十多人枪硬性拉走。之后,李忠道又七拼八凑组织了十来支枪,仍不敢活动。还是经孙叔平游说,才在小学教师王子石的土围子里藏了十几天,到枪支又多了一些,才敢出来活动。在筹集枪支的过程中,彭笑千还从国民党县政府留下的款子中拿出一部分,交给张舒民、许西连买了两挺机枪、三把盒子。到7月中旬,部队发展到100多人时,才在红庙附近的张屯召开萧县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大会。参加人员除李忠道、冯家平外,还有纵翰民、彭笑千、张舒民、许西连、冯蕴言等。会议推选李忠道为大队长,冯家平为指导员。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长分别是王振全、陈学文、沈凤鹤。每个中队设一个政训员,分别为纵翰民、陈继仁、陈怀玉。

萧县抗日游击队成立后,开始主要是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吴丛林驻扎时,中共徐西北区委派尹夷僧、张如来萧县,传达徐西北区委的决定。决定内容为:一、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改为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委员陈继仁、李繁洲,属中共徐西北区委领导。二、萧县抗日游击

队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七大队，李忠道任大队长。与尹夷僧、张如同来的还有五支部队。其中包括：丰县的武装，大队长冯敬樵；殳山县的武装，大队长孟宪琛；陇海路北萧铜的武装，大队长路永锡；还有两支是萧县的武装，一支由何光友担任大队长，一支由孟昭林担任大队长。萧县的两支武装调往路北整顿后，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五大队、十六大队。同来的还有耿蕴斋、孟振声、孙叔平。这是一次徐西北、徐西南的武装大会师，也是萧县知名人士的大聚会，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因领导农民暴动而被通缉者的大聚会。

从陇海路北来的五支武装同十七大队一起，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宣传。先后到王寨、瓦子口、坡里、朔里、永堙、刘行、许堂、萧城，转至六区纵井、红庙，最后到大吴集集中。部队在武装宣传过程中，每经一个村庄，均高唱歌曲，高呼抗日口号，鼓舞人心。行政人员也随军活动，每到一个集镇驻扎，都分别召开大小群众会，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起来抗日救国，不当顺民，不做亡国奴。使群众懂得并坚信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是能够胜利的。并积极物色人才，筹建乡镇抗日政权。同时派出若干宣传小组，分头到周围各村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武装。武装宣传每到一处，都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干农

活，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这次武装宣传活动，历时 20 余天，行经五个区，十多个集镇，影响广泛，对动员民众抗战、开创萧县抗战局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五节 智除黄庙据点

萧县抗日游击大队三中队政训员陈怀玉，家住陈坡村。村北一里多路就是陇海铁路，对面靠着铁路的村子是黄庙村。这里有利民沟通过，日本鬼子为了看护铁路，在利民沟上架了一座铁路桥。在黄庙村设了一个据点，驻防一个小分队，一共 21 人。鬼子兵经常白天出来骚扰百姓，当地群众非常担惊受怕。有一次陈怀玉回家，就碰到两个鬼子兵到他家要白面、鸡蛋和小鸡。邻居对他说：“真没法活下去，鬼子天天出来要东西。我租了二亩地种瓜，刚熟就被糟蹋了，瓜秧也给拔了。我今后无法生活，更无法交租子了。”还有一家王姓邻居，租了一块梨园，鬼子把梨吃了，还把梨枝砍掉。最让村民痛恨的事，是鬼子兵肆意奸淫妇女，要花姑娘。经常有村民问陈怀玉：“你们不是抗日吗？为什么咱家门口的鬼子你们不打？只是到处乱跑，你们抗什么日？”陈怀玉告诉村民们：“咱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请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找机会除掉据点里的鬼子，替大家出这口恶气。”

沦陷以前，陈怀玉在这一带搞过农运，组织过农救会。黄庙村的农救会长叫袁永赞，现在被大家推举出来当保长。张庄村的联庄队长张步清，也是农救会员。他俩见到陈怀玉就说：“咱们干吧，弄两支枪来，我俩就能把这里的鬼子干掉！”陈告诫他俩：“这是军事行动，要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要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要干就干个痛痛快快，把敌人消灭光，不要打草惊蛇，在干之前要保守军事秘密。”随后，陈怀玉又来到看桥的顾老头家里。顾老头见到陈就难过地说：“唉！我当了汉奸啦！”陈说：“你当了什么汉奸？”他说：“村子里叫我给敌人看铁桥，替敌人干事情不就成了汉奸了吗？”陈说：“你今后要多给人民办事。现在你就领我把地形和敌人的情况弄清楚，这就叫为抗日人民办事情。”顾老头领着陈到了敌人的住处，正巧从道班房里出来一个鬼子兵，要和顾老头摔跤。顾说自己老了不能摔了。鬼子兵又要和陈怀玉摔跤，陈再三推辞说不行。鬼子兵说：“你的行的行的。”他抓住陈怀玉就不放手。陈看不干不行，就和鬼子兵摔起来。结果，鬼子兵输了。鬼子兵笑着对陈说：“你的大大的！”从腰包里掏出糖果、蚕豆子给他吃。陈怀玉趁机看清了地形，大大方方地离去。

第二天，陈怀玉来到50里以外的游击队驻地，找到十七大队新任大队长李忠道，向李述说了黄庙据点的情况。这时，十七大队也正讨论能不能打鬼子，怎样打鬼子的事。他们分析了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我们的队伍成份

好，抗日热情高；二是多数人会使用枪，也有的当过兵，打过仗；三是队员在萧县土生土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熟悉地理环境。谈了有利条件，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剩下的就是怎么打，打哪里的问题。正在这时，陈怀玉带来了黄庙据点的情况。陈怀玉决心要打，李忠道认为时机已到，两人经过商量，还是再派冯家平随陈怀玉去黄庙一趟，把情况进一步搞清楚。陈、冯二人到黄庙村找到袁永赞，邀来了张步清。中午，他们正在袁永赞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打鬼子的事，突然进来两个鬼子兵，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一个鬼子兵还拿出从日本给他寄来的信和他母亲的照片给陈怀玉他们看，并说：“咱们是朋友朋友的，你们统统都是良民。”大家敷衍地笑了一下，袁永赞还伸出大拇指说：“我们都是最好的良民。”

饭后，陈怀玉和冯家平向袁、张了解了这两天工作进行的情况。袁、张告诉二人，村里已派去一个农救会员给日本人当伙伕，了解到敌人每天早上、晚上都很警惕，不好动手。白天敌人很麻痹，中午在铁路两旁桥下乘凉睡觉，都不在房里，外面只放一个岗，枪支都挂在房内墙上。鬼子最喜欢周围民众给他们“上面子”（即送礼物）。陈、冯把了解到的情况带回游击队，经与许西连、李忠道等人商量，决定采用给日本鬼子“上面子”的方式，由黄庙村的保长袁永赞，带几个游击队员，都化装成农民，去给鬼子兵送礼，进入据点内来个突袭。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

一些，还从县长彭笑千那里借了两把二十响的盒子枪。

1938年8月22日夜晩，十七大队从郝庄出发，经过夜行军，于黎明前到达黄庙附近的陈坡村。游击队进村后，立即将村子封锁起来，不许村内人出去，以防走漏风声。站在陈坡村的北面，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黄庙日军据点。虽然离据点很近，敌人毫无觉察。

当时，黄庙据点的东南边驻着孟昭勤的杂八队，如果打黄庙据点不通知他们，战斗打响后，他们可能来找麻烦。于是，由陈怀玉、许西连到孟那里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并说游击队从这里过路（过陇海铁路），一旦同日军打起来，请他们出来援助。他先是不同意，经陈、许做了一番工作，才勉强同意。

部队决定8月23日中午突袭黄庙据点，并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突击队由王振全、沈凤鹤、张庆白、袁金玲四人组成，以送礼为名，首先进入据点，投入战斗。预备队由冯家平、吴信容、陈学文等五人组成，待突击队进入据点后，立即冲入据点增援。其余人员分成两组，一组由李忠道带领，警戒可能从东面杨楼方向来的敌人，一组由陈继仁带领，警戒西边可能从黄口方向来的敌人。战斗结束后，鸣枪三声为号，立即集合队伍转移。

午后一时左右，天气炎热，鬼子兵依然在铁路边、大道旁树荫下睡觉，个别的还在水坑里洗澡。在敌人的伙伙、我们的农救会员预先告知下，鬼子兵都知道下午有

“客人”来给他们送礼，不时地有鬼子兵去桥头张望。不一会儿，王振全带领着三名队员从陈坡村出发，头上带着苇席夹子，篮子里盛着鸡蛋、桃子，手里提着小鸡，进入道班房敌人驻地。送礼的“客人”到了，鬼子喜得蹦跳起来，团团地将他们围起来，有的抓桃子，有的拿鸡蛋、提小鸡，来迟的人就争夺起来。

突击队员看见王振全用手摸一下席夹帽的信号后，立即掏枪向敌人射击。霎时间，手无寸铁、亡魂丧胆的鬼子兵被打死一片。未被打死的急忙奔向屋内拿枪，四位突击队员似猛虎一样随即向敌人扑去，预备队此时也冲进据点。跑到屋里的鬼子兵尚未来得及摘枪，就被游击队员击毙。有一个鬼子躲到床下，趁机窜出来掐一个队员的脖子，两人在地上滚成一团，其他队员很快赶上前去把鬼子兵打死。外面有两个正在洗澡的鬼子兵，听到枪响，就顺着铁路向杨楼敌据点跑去。他们遇到孟昭勤的队伍后，一个鬼子急忙往庄子里跑，钻到秫秸垛里，被孟昭勤的队伍打死了。另一个鬼子兵沿着铁路向东往徐州跑去。战斗进行约十分钟就全部结束，突击队员鸣枪三声，发出战斗胜利的信号。游击队汇合后，满载着胜利品向西南方向开拔。

这次战斗，突击队消灭了黄庙据点一个小分队的日军，击毙 19 人，被孟昭勤的部队打死 1 人，跑掉 1 人。缴获三八式步枪 18 支、歪把机枪 1 挺、日本盒子枪 1 把，还有刺刀、子弹、帐篷、慰问袋、手表、照片等物。游击队无一

人伤亡。估计敌人很可能来报复，游击队撤退时，动员陈坡、黄庙村的群众和他们一起向西南方向转移。傍晚时，走到一个村庄吃了晚饭，队员们就躺在村外场院里休息。大家都很兴奋，不断地谈论着如何消灭鬼子的情景。第二天，游击队来到吴蒋庄住下。日军知道游击队向西南方向去了，就调动黄口和永城等地的日军出来“扫荡”。他们没有追到十七大队，却把永城县磨山一带的土匪打得七零八落，东奔西逃。

开始几天，黄庙、陈坡等村的群众有的迁到外村去住，多数人白天不敢在家。鬼子兵就把剩下的老弱病残与妇女儿童集中到一起，欺骗他们说：“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打死我军的是‘猫猴子’干的。皇军爱民，凡是良民一律不要逃走，凡是逃走的都不是良民，皇军要把他们当作‘猫猴子’办理。大家应当在家安居乐业，不要自相惊扰。”一些群众被日军的欺骗宣传所蒙蔽，思想麻痹，纷纷回到家里。

大约两三天的光景，日军分三路出发，把黄庙、陈坡、孙庄三个村庄包围，把群众从田里赶到庄内。敌人到黄庙先找袁永赞。袁正在刨树，几个鬼子兵走到他跟前问他：“你就是袁永赞？”袁说：“是。”敌人凶狠地拿起棍子照袁头上就打，问他为什么打皇军。袁告诉他们说：“我抗日杀鬼子是应该的，我想把日本鬼子统统杀光。”日军把袁永赞和黄庙村的群众带到一个院子内，分成两行，持刀先砍袁的头，吓得群众爬墙就跑。这时，鬼子一面用刺刀杀人，

一面用机枪扫射，集中起来的四五十人被杀死约一半。在陈坡村，日军也搜索到四五十人。日军带着两个村的维持会长找到陈怀玉家，抓住了陈怀玉的哥哥陈怀清，问他陈怀玉的去向，他说不知道。鬼子用刺刀刺他的手，他仍然回答不知道。鬼子兵先把他杀死，然后杀其他群众。除了妇女儿童外，成年男人一个不留，共杀死 20 多人。孙庄也被杀死 20 多人，三个村子共杀死六七十人。

消灭日军一个小分队的黄庙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震动不小。日军一个军官曾说：“皇军还从来没有丢过这样的脸，二十多人的部队，被四个‘猫猴子’不到十分钟消灭光。”延安新华社 1938 年 11 月 7 日发布一条消息，表扬了黄庙战斗。山东的《大众日报》1939 年 3 月 30 日第四版，介绍了黄庙战斗的经验。刚刚组建的十七大队首战告捷，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带着战利品，每到一处，宣传一处，用生动的事实告诉群众：日军并不可怕，游击队完全能够打日寇，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

群众亲眼看到缴获的战利品，听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道理，不仅消除了“恐日病”，也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很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使十七大队的队伍迅速壮大。在十七大队奉调去丰县打汉奸王歪鼻子的时候，丰县群众听说十七大队来了，争相要看缴获的日本三八式新步枪，争着要听奇袭黄庙的故事，很多游击队员提出

要向十七大队学习。

铲除黄庙据点，也促进了地方联庄会的武装和土匪武装的转变，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抗日的部队，才能受到人民的尊敬。

第六节 活跃的彭南游击队

孙象涵、顾寒星、薛玉标、亢为德等人从萧县动委会开办的青年农民抗日训练班回家后，萧县、徐州相继沦陷。他们在家乡桃山一带，曾组织过一些维护农民权益的群众组织，如节约会、红白喜事会、“三戒”（戒烟、戒酒、戒赌）会等，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这些群众组织的基础上，他们拉起了桃山游击队。

此地因地处津浦铁路沿线，敌人控制极严，他们曾有过把队伍拉到外地活动的想法，一度随逃难群众向东撤退。5月21日到达夹沟东北的南赵楼时，突遇日本兵500多人来南赵楼一带宿营。仓促间，他们把枪埋藏好，化装成农民又返回了家。之后，他们改变了主张，决定在家乡打游击。原来的枪支失散了，还要重新解决枪支问题。孙象涵又从过去的铁路警察那里弄来三支枪，靠这三支枪活动起来。

一天，听说萧九区赵楼村的赵宗禧认贼作父，投靠日军当了汉奸，并扬言在一年半内捞回他失去的18顷地。

乡亲们很害怕。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桃山游击队决定先铲除这个民族败类。1938年6月9日，孙象涵他们打听到赵宗禧带着高四、王玉龙等六人去萧城附近找当地的汉奸。估计他们去萧城有两条路线，一是走皇藏峪北的龙岗山口，由孙象涵带着黄凤殿等人去追；一是走皇藏峪南的渺沟山口，由胡方稳带人去追。孙、黄追到高庄，赶上了赵宗禧一伙。孙象涵假装与赵拉家常，边走边谈，行至倒流河西，卯山村东，孙与赵谈着话并行，黄在后与王玉龙搭讪。乘其不备，孙突然掏枪将高四击毙。赵还没反应过来，孙一个反手又将其击毙，并补了一枪，结束了这个汉奸的性命。与此同时，黄凤殿的枪也响了，王玉龙应声倒地。其余的人听到枪声嚎叫着四处逃跑，孙象涵他们追到高粱地里又击毙一个，余二人跑掉。打死汉奸赵宗禧，群众拍手称快，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桃山抗日游击队迅速扩大，改名为“彭南游击队”。

增加人员，就得增加枪支。彭南游击队通过原在孤山煤矿当矿警的队员张振球，与矿警班长滕秉宜联系，顺利地将以前埋藏的20余支长短枪取了回来。7月中旬，为了阻挠日军的军事运输，彭南游击队发动500多名群众，破坏了三堡到曹村六孔桥的津浦铁路近两华里。敌人很恼火，第二天从三堡出发，挨村搜查。到袁洼时，遇到因事留宿该村的部分队员的奋勇抵抗，游击队牺牲了三名队员。这次破路活动，使日军的火车停开了七天，给其军事运输

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8年8月底，中共萧县工委派谢继恩通知住在苏胡的孙象涵，告知他及所领导的彭南游击队，上级决定将彭南游击队更名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八大队，请他带部队去萧西与十七大队会合，相互交流观摩。

8月底的一天，彭南游击队与十七大队在萧城南的梅村会合。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讲了话，宣布了十八大队成立及对大队长孙象涵的任命。听了王振全介绍黄庙战斗的经验，参观了缴获鬼子的武器，十八大队的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会后，两兄弟大队在萧西又活动了两天。在活动中，十八大队还跟十七大队学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纵翰民与孙象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纵告诉孙，对游击队来说，锄奸、打鬼子都很重要，但在部队逐渐壮大的情况下，要锻炼着多打鬼子，以提高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再者，对抗日牺牲的同志，要开个追悼会，好让同志们寄托哀思。孙象涵完全同意并接受了纵翰民的意见。这次会合，让孙象涵感到：有了党的领导，干革命的方向更明确了。

梅村会合不到十天，十八大队的十名勇士就进行了“官桥试武”。经过对三堡至闵贤一线的敌情侦察，游击队掌握了桃山车站邻近几处岗楼的鬼子（铁路沿线一公里一个岗楼）常赶官桥集的规律，便从大队里挑选十名突击队员，由薛玉标、亢为德率领，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执行任

务。出发前，大队领导提出要求，首先要保证只消灭鬼子，不能伤害赶集的群众。其次，要干脆、利落，不能让鬼子还枪伤害人，要彻底、全部解决。再次，要秘密，不露痕迹。按照惯例，鬼子赶集一般是八九人一道，所以部署十名队员执行任务。

等突击队员到达岗位后，只有四名鬼子进入闹市，都背着枪。不多时，有三名鬼子在亢为德、薛玉标附近蹲下来挑选桃子。亢为德见时机已到，掏出枪对蹲着的鬼子从脑袋上往下打，一反手对站着的鬼子从脑后往上打，把这个鬼子的帽子顶起老高。一眨眼的工夫，干掉了两个鬼子。与此同时，另一个鬼子也被薛玉标一枪打死。尚有一名鬼子在街北溜达，早为我队员孙云汉、黄凤殿监视。街内枪响，群众惊慌，这个鬼子也直往北跑。此时人群拥挤，孙、黄尚距鬼子五米左右，不便开枪，只好持枪尾追。待鬼子醒悟，下枪准备射击时，孙、黄枪声齐响，鬼子应声倒地。队员们经过清点，见再无鬼子，就带着四支三八式步枪、一把日式手枪等战利品进入了天门寺。等日军调集部队赶到官桥“扫荡”时，他们正在天门寺痛饮庆功酒呢。

萧西的智除黄庙据点，萧东的破路活动与官桥试武，规模虽不大，震动却不小。它的意义在于：一是早，发生在萧县、徐州沦陷不到百日，有力地消除了一些人的“恐日病”；二是奇，以少胜多，以劣质武器胜优势装备，创造了敌后游击战的典型战例。

第五章

创建“抗日模范县”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严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民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推动了萧、宿、永、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与此同时,萧县党组织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的独立性,牢牢掌握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权,使党的力量和各类抗日武装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由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较早,政绩突出,萧县被八路军与新四军誉为“抗日模范县”。

第一节 打散维持会,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随着萧县的沦陷,国民党在萧县的统治也彻底崩溃。

日本鬼子占领徐州以后，派金啸虎（朝鲜人）带领着宣抚班来到萧城，找到一区大豪绅刘云亭和曾任过国民党一区区长、家住县城的陈砚生，叫他俩领头组织汉奸维持会。维持会是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的爪牙和耳目，它的成立必然为萧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带来巨大的危害。当时，路南区工委虽然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抗日武装，但却坚定地认为：不能让伪政权站住脚，得想方设法除掉它。恰在此时，陈怀玉以五县巡视联络员的身份来到萧县，李忠道同他商量后，议定在维持会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把它消灭掉。李忠道又找吴信容和许西连研究了具体的战斗方案。大家约定：陈怀玉负责联系马井地区联庄会的马立先，李忠道负责联系红庙地区联庄会的吴信容，许西连负责联系里山联庄会的王瑞贞，三路人马按约定的时间在萧城西边的红峪山庄集中。

1938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大家会合后，马井地区联庄会的马立先，一看红庙地区联庄会的吴信容只带几个人，就生气不愿干了。吴信容自知理短，就向马立先作个揖说：“老兄别生气，以后再联合打仗时，我保证多出人不好吗？”马立先还是不干。陈怀玉就做马立先的工作：“立先哥（有亲戚关系），你能因为人少，没有机关枪，咱们就不干了吗？我在陇海路北第五大队带来了七个人，加上我共八个人，有一个机枪手，一个副机枪手，几个扛枪的，他们都有作战经验。机枪确实没有买到，你这里有机关枪，

一块用就行了，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不干了。我们不能还没去打汉奸，就自己人和自己人吵起来！立先哥，你说咱们打还是不打？不打，对我陈怀玉本人没多大关系，可是马井地区的群众都知道我们要打萧县城，结果一枪没放就回去，老百姓会怎么说我们呢？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经陈怀玉一番劝说，做好了马立先和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才决定联合起来攻打萧城。

李忠道、许西连带着一部分人从城西北角开始进攻，首先消灭了西关城楼上的敌人，缴获五支步枪。南关及东关的敌人听到枪声吓跑了。之后，他们就派人围攻县政府大院。院墙很高，又没有梯子，搭起人梯向上爬。因为大家都没有打仗的经验，前后乱放枪。马立先的人从老县府东边搭人梯爬上墙头，在混乱中被自己的人误伤一个，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战斗结束后，这位牺牲的队员被定为烈士，马井地区联庄会还为这位烈士立了碑。战斗中缴获的五支枪也都给了马井地区联庄会。此战虽然不大，但意义不小，这是萧县扛了枪的农民第一次解放县城，也是湖西地区头一个收复县城的。

打了萧城以后，日本鬼子带汽车来了一趟。过一段时间，朝奸金啸虎带着宣抚班又来了，但没敢住县城，到城南穆楼村住下了。不久，又被纵翰民、许西连带着游击队打跑了。由于汉奸被打跑两次，日本侵略者很长时间在萧城找不着当汉奸的人，组成不了维持会。萧县城离徐州仅

25公里,从5月18日萧县城沦陷,一直到9月份才有日伪驻守。其间,将近四个月萧城没有任何政权机构存在。

时间也是在6月中旬,中共陇海路南区工委书记李忠道在李酒店主持召开了区工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继仁、李繁洲、陈学文、纵翰民、孙叔平、张兆坤等同志,主要讨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孙叔平说:“最坏的抗日政府也强似无政府,最坏的无政府也强似汉奸统治。”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既然不能听任汉奸拼凑伪政权,就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府。

关于县长的人选问题,与会人员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还是由彭笑千担任县长比较合适。理由有三点:一是他抗日积极,沦陷前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得比较好。二是他原任旧政府的秘书,原来的县长牺牲了,他担任县长,容易得到民众的承认,使人感到是顺理成章的事。三是如果由孙叔平、纵翰民、张舒民、李忠道等人来担任县长,群众知道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有的坐过牢,有的被通缉过,一时难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信任。会后,纵翰民、许西连找到彭笑千,对他进行动员说服工作,彭最终同意出来代理县长。彭笑千虽然同意出任县长,拥护抗战,但却存有顾虑。他问纵翰民:“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干?”纵翰民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些武装。”他还顾虑建立县政府能不能起作用,在兵荒马乱的形势下,政令能不能推行。纵翰民邀他骑牲口(因在转移时将腿摔伤)出去走走

看看。萧县抗日游击队在7月间组织武装巡视宣传时，孙叔平又曾去请他一同看看，他表示愿意参加宣传。在水堀宣传时，地方士绅丁熙民（曾任徐州专署秘书主任）、王浩如（曾任如皋县县长）、尹聘三（曾任徐州麦作实验场场长）等人也推荐彭笑千出任县长。可见，由彭笑千出任县长，是党内外、军队和地方人士的共同意愿，是有着较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的。

1938年8月上旬，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政权初建，县政府只有县长和少数办事人员。他们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事大家分头去干。到了九、十月间，全县10个区、108个乡的政权普遍建立。各区设区长一人，助理员、办事员各两人，乡设乡长、事务员各一人。机构虽简，但却改变了无政府状态，收抚了民心，团结各阶层投入抗战，同时也打乱了日本侵略军妄图充分利用萧县这块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补给侵略战争的如意算盘。

1938年10月，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成立。为了完善政权机构，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通过与党内外人士充分协商，于同年11月在三区大演武村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萧县县政委员会。县长彭笑千任主任，委员有戴蕴山、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许西连、张舒民、崔健吾、路永铮、冯蕴言、王子石、纵止韩、马济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二，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县政府下设行政、经

济、民运、军事四科，科长均由县政委员兼任。行政科长许西连；民运科长孙叔平、副科长张舒民；经济科长先为胡育才，后为王子石、冯蕴言等；军事科长纵翰民。后又增设教育科，科长王可风；建设科，科长张立轩；粮秣局，局长单子乔；法官纵止韩。在县政委员会 13 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4 人，国民党员 3 人，其余是进步人士。这四名共产党员是戴蕴山、李忠道、纵翰民、路永铮。数量虽不占多数，但他们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沦陷前抗日动委会的负责人。从县动委会的职责来看，它已是半政权性质，现在过渡到名副其实的政权机构，有这几位共产党员参与其事，已确保共产党在该机构中的领导地位。

党在县政委员会中的领导，一靠政策，二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县委并不直接干预政府的行政事务。为了体现县政委员会是全县最高的权力机构，县委决定，县委书记戴蕴山、组织部长李忠道均不担任政府的具体职务，遇有大事党内先讨论决定，然后由戴蕴山、李忠道做党内的的工作，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做政府中的统战工作。孙、张由于历史原因，一时尚未恢复党籍，但是他们都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做得很出色。同时，要求区、乡亦注重发挥政委会优势。政务的推行，重大政令的执行，必须经过宣传鼓动，唤起民众同心干，这样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党组织还大力发动民众

参与各种救亡团体，如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把他们的爱国热情纳入到有组织的行动中去，使群团组织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既领导抗战，又推进民主，改善民生。毛泽东同志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虽然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为基本方针，利用政权的力量组织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有声有色的游击战。在推进民主方面，主要是发展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代表会议，制定组织章程和工作纲要，通过选举，建立全县领导机构。由抗日救国群众组织的选举到县、乡政权的选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进步。在改善民生方面，主要是调整好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例如，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种”，增加雇工工资，举办信贷，禁止高利贷剥削，成立合作社等。

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徐州沦陷后该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也是当时华中地区乃至新四军属地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它在全县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很高，除敌伪据点外，政令在全县范围内畅通无阻。

第二节 搞好经济工作,为敌后游击战 提供物质保障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特别重视抓好经济工作。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县长彭笑千,凭其十多年从事财政工作的经验,深知抓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战时。因为,“只有吃饱饭,才能坚持持久战。”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全民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

第一,发展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并把搞好生产、支援前线与前方拿枪打敌人同等看待,视为同样光荣。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采取的一项得力措施就是在全县全面推广“438”小麦良种。徐州“438”小麦良种是萧县人尹聘三在任徐州麦作试验场场长时,花了九年心血培育出来的,在萧县进行过区域适应性种植,证明品质优、产量高。抗日民主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将良种的繁育工作交给郝庄农场的范慕兰负责。随着抗战局势的好转,小麦“438”良种也逐年扩大种植面积,不仅成为萧县农作物种植的当家品种,也深受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广大农民的欢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乱之中仍力导新法种田、推广良种,足见其爱民之心。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鼓励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积极提倡发展副业生产。战争年代，农村副业多以生产军需民用品为主，如土盆、土缸、油坊、纺纱、织布、编席、编筐、熬盐、熬糖、熬土碱、养猪羊等。这些产品，不仅群众生活少不了，也是部队所需要的。由于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提倡，上述副业生产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提倡和发展有利于军需民用的工商业。对境内私人工商业，包括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在内，政府一律保护，保障其合法的利益和帐款收回，自由贸易，不受侵犯。政府对鼓励和提倡的工商业，如造纸、卷烟、印染、制革、文具、盐运、盐行、轧弹棉花、织袜制鞋等，还低息或无息贷予基金，减收或免收税捐，给予运输、购买原料及推销产品的方便。

抗战时期的商业贸易也很活跃，这反映了抗日民主政府有着很强的应变能力。日寇除用军事、政治手段向我进攻外，还用经济手段向我进攻，常在军事夹缝中留有市场路线。萧县境内，从吴庄、坡里到祖老楼、青龙集的市场路线，就是日伪、顽、我都允许商贩出入的路线。敌人企图利用商市推销他们的冒牌劣货，利用他们滥发的伪币吸吮民脂民膏。我方则灵活应对，凡我所需而于抗战有利的商品，即使敌货也不妨放入，如医药、电池、染料、文具等。我方的粮食、牲畜等产品，则严禁输出。一些为我所出而无补于军事者，如土产品之猪鬃、烟叶等，则允许输出。由

于有禁有放，政策界限分明，使抗日民主政府战时商市的威望很高。为了抵制日货，一些生活用品提倡用土产品代替，没有煤油点灯，用棉油、豆油；没有火柴，用火镰、火石；没有染料，用槐豆、青灰、石榴皮替代或用紫棉（土黄色）织布；没有海盐，用小盐，以解决生活用品之不足。这些东西还有个好处，那就是日军不抢。

第三，抓好财税工作，增加财政收入。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自行筹措，保证供应”的原则，做好抗战时期的财税工作，以保证部队及政府抗战经费的需要。

一是合理征收田赋。战时的田赋征收，与平时有所不同，首先改缴银（货币）为征实，以粮食结算。战时的地方政府不可能设置仓库，只有就地验收，就地交民众保管。机关、部队凭粮票在驻地支取粮食，按月按季给区、乡、保、户结算。为了实现合理负担，改按地亩普征为累进征收，地越多征得越多，地少的农民少征或免征。

二是开征工商税。抗日民主政府除设立民政、民运、经济、军事四科外，还单独设立粮秣局、工商局。粮秣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筹集、保管粮食和草料，工商局主要负责工商税的征收。由于萧县境内集市较多，商贩活跃，又因离徐州较近，交通方便，过路商人较多。他们贩卖的商品有粮食、土布、棉花、染料、食盐等。当时，吴庄、坡里、瓦子口、祖老楼、青龙集等地都有行栈，商贸活动很活跃。工商税的征收，以盐税为大宗。除此之外，抗日民主政府的财

政来源还有战争缴获、没收汉奸财产、公产租金、私人捐款和各种借款等。

三是发行“萧县地方流通券”。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38年10月开始发行萧县地方流通券。开始，因印刷困难，就借用私人钱庄（郝松云家的瑞蚨祥钱庄）所印未发行的纸币，将每张千文改为每张壹元，加盖县印，布告发行，同时明令禁止私人出票子。至1939年初，抗日民主政府从敌占区（徐州）搞来石印机和纸张后，又聘请了印刷师傅魏朝，由他带来几个徒弟，在沙河边陈楼村杜长德家印刷萧县流通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流通券不仅在县内流通，还在周边各县及伪军据点流通，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豫皖苏边区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支援了主力部队。1938年冬季，抗日民主政府一次就给苏鲁豫特委四万元，解决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冬装问题。新四军游击六支队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所需的药品，基本上都是由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用地方流通券换成伪币后，再从敌占区购进。萧县地方流通券，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两个月后开始发行，至1941年5月随新四军四师“东撤”结束，前后两年半的时间。其间，因流通券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萧县已成为豫皖苏边区的财政基地。

第四，严格财经制度，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抗战时期的财政工作，越是环境复杂、财政困难，越要加强统一

管理,统筹统支。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自力更生,就地解决,统筹统支,量入为出”的原则。在战事频繁的1939年,还精心制定了《萧县经费收支暂行办法》。在收的方面,规定“所有各种验收税款手续,由本府制定三联印收发,交经收人员或机关填用”。“收税款时,应将印收第一联掣给交款(物)人,第二联于缴款时一并呈送给本府稽核,第三联留给经收人或机关存查”。“经手人员或机关收得税款后,应随时缴解,并须于月终时按本月所收税款数目列表呈报,以备稽核”。在支出方面,县直各部门及各区和部队,分经常费和临时费两项。“经常费应按照预算列支数目填具正式领据,呈由本府核准后发给”。“临时费用动支数目在百元以下者,呈由县政核准拨发;百元以上者,须交由县常务委员会通过后,方准动用”。同时实行财务民主,帐目公开。“各领款机关或部队,应于每月终了将收支情况列表公布。例如,区公所向区务会议报告,部队向该队全体队员报告”,“县政府于每月月终,将本月份全县各项经费收支情形列表向县常委会报告”。并严格要求会计,“对于各种经费发放,须有切实根据或命令,不得任意发放。违者,依损害抗日论罪”。

在执行财经制度方面,彭笑千县长以身作则。他善理财,不贪财,以廉政名重一方。在王雪琴县长牺牲前一天(1938年5月17日)晚上,他俩商定,由他先带一部分款子出城,约定在九区会合。18日上午王县长突围中壮烈牺

性，彭笑千带出的两万多元款子，悉数交出作为开展游击战的财政经费。他任县长时，是国共合作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每月还发给他 3000 元公务费，他全部纳入县财政统一支配。发行萧县地方流通券是敌伪搜寻的重要目标，只能极其秘密地进行。票子出多少，全由他定。印刷、启运、保管、发行工作，全由他指挥。两年多的时间，从没出现任何问题。由于他勤政、廉政，政绩突出，引起敌伪的极端仇恨。敌伪抄他的家，烧他的房，抓走他的长子，以及侄子和亲戚，扬言要杀害他们。彭笑千不惧恫吓。他正告敌伪：“你们这样做，只能再予我们增加几千人枪而已。”彭笑千不谋私利，以身家性命投入抗战，给全县树立了毁家纾难的榜样，对抗日军民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第三节 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开创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做好政治动员工作，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关于抗日的政治动员工作，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

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刚开始,投入抗日行列的民众多是敌人替我们做的政治动员工作,那是敌人用炮火和飞机炸弹把他们发动起来的,其抗日行动是被动的。要使他们实现由被动抗日向积极抗日的转变,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起来抗日,掀起全民抗战的热潮,离不开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有良心和良知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他们常常置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萧县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深知这一点,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在全民动员中首先发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不论党内党外,只要有志报国者皆举而任之。在13名县政委员中,有近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1939年3月组建的萧县常备总队,辖6个营,28名营以上干部中,萧师出身的约占一半。在第五战区创办的抗敌青年训练班里,仅前两期就有萧县的知识分子200多人。青年教师、萧师学生、实小等校的高年级学生,大都参加了抗日工作。当时,萧县的知识分子曾编唱过一首抗战歌曲,歌词是:“萧县是古来的战场,英雄的故乡,好男儿要担当起国家兴亡,拿起刀枪干一场。日本帝国主义必定灭亡……”萧县知识分子的抗日激情,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初期,党组织还没有对外公开,中共萧县中心县

委机关是以县政府民运科的名义开展活动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进行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1938年12月,创办了抗战报纸——《实报》,每三天出一期,发行量近3000份。它以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唤醒各界人士及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为宗旨,极大地鼓舞了全县抗日军民的斗志。同时,抗日民主政府还以农民救国会的名义,在全县组织了六个宣传队,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启发和动员广大民众踊跃投身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此外,创作活动也非常活跃,产生了一批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文艺与理论佳作。最著名的有章文龙1938年创作的诗歌《元宵》(曾获全国诗歌大赛第一名)、孙叔平1939年撰写的《抗日农民运动讲话》,等等。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对广大农民的发动,是在形式多样且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工作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各种抗战组织中得到教育而觉醒。早在1938年冬,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救国会,并分片建立了抗日群众组织。为加强对抗日群众团体的领导,从1939年2月开始,先后在四区崔口、张寿楼等地开办抗日训练班,每期50人左右,时间是7~15天,共培训群团干部500人,分赴各区开展群团组建工作。到了夏秋,全县群团组织自下而上普遍建立,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制定组织条例和工作纲要,选举县级领导机

构。年底,全县农民救国会发展到12万人,青年救国会发展到10万人,妇女救国会发展到3万人。这些团体的成员可能有交叉,但总数不会低于20万人。当时,全县人口仅50万人,就是说,有近一半人活动在各种组织中,这还不包括遍及各村寨的儿童团。萧县形成了一个“人在组织中,组织联全县”的局面,足见其人员发动之广,组织程度之高。

随着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政府依靠群众团体,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和战勤支援。如派粮派饭,组织群众做军服、军鞋,拥军优属,照顾伤病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挖抗日沟,等等。1939年7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同志所写的《东征以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入萧境,便表现出一种新鲜的景象,抗日情绪很高。如果你没有证明文件的话,远方的人是不易行走的,必定会把你送到联保处去盘查。六七岁的儿童,口中都会唱救亡歌曲,不论是在乡村或田野中,远远就会有雄壮的歌声传来。虽然它邻近徐州,但仇货是绝对看不到的,资敌物资也没有出境的(连由他们经过的也没有)。”这就说明,通过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已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使日军侵占萧县近一年时间,找不到汉奸基础,拼凑不成维持会。一年后,日寇在三区后洼村设立据点。因在送给养的路上,不断受到自卫队、游击队的伏击,据点周围被抗日群众挖

了抗日沟，挖断了所有通往据点的大路，把据点围得水泄不通，逼得日本侵略军只呆了一个多月，便自行撤退。

在向农民进行政治动员的工作中，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针对农民的特点，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生动的政治动员，二是具体的抗日工作，三是巧妙的抗日与生活联系。以巧妙的抗日与生活联系为例，《萧县农民救国会工作纲领》在“参加抗战”一章中，列举了五项任务：第一项是参加本会及其它民众团体；二是烧茶、带路、打扫房屋，供应用具，实际帮助部队；三是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供给鞋袜、给养和经费，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侦察队、慰劳队、洗缝队、看护队，帮助抗战部队；四是动员农民加入自卫队、游击队和正规军；五是发动农民实行地方戒严和坚壁清野，困饿敌人，肃清汉奸敌探。以上五条，都作为参加抗战的实际行动，这就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抗战救国的大目标联系起来，农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被看作同前方拿枪打敌人一样光荣。参加各种抗战团体的群众，成为各项抗战工作的坚强后盾，这就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我们的后方。

在发动民众的工作中，抗日民主政府始终坚持我党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情况下的各种阶级关系，尤其注重处理好农民与地主的利益，既照顾农民的利益，也照顾地主的利益。例如，减租减息只要求灾区实行；优待对象只限于军属；救

济对象只限于难民。并实行赋税合理负担,废除高利贷,成立合作社,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的权利等。

由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严守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政治动员工作做得细致深入,民众发动得广泛,因此成为周边各县抗日的榜样。永城、砀山、灵璧等县都先后派人到萧县参观学习。

抗日救亡团体的普遍建立,民众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使大批群团干部得到锻炼而迅速成长,为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武装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敌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第四节 敌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坚持“武装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主力军作战”的基本方针,领导全县的抗日武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广泛深入的敌后游击战,主动地、灵活地打击日伪,铲锄汉奸,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扰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在1939年秋至1940年春这段时间里,数次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威力。这里,简述几次比较有影响的战斗,以反映萧县敌后游击战开展的基本状况。

攻打张大屯

萧县青红帮头子、汉奸大地主纵馨亭(外号纵二别

子),在萧永边境的张大屯设立据点,充当日本鬼子的耳目,干扰和破坏我抗日游击活动。新组建的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决定拔掉它。1938年11月初,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包括十七、十八、十九大队)及二十大队,于拂晓前包围了张大屯。十七大队中队长李忠信率先来到纵二别子的大门口。纵的大门紧闭,门前又是一片开阔地,无法靠近,只好退到场屋、车屋旁向院里射击。二十大队从东北角过了壕沟,在纵的堂屋后面向院内扔手榴弹。十八、十九大队因地形不熟,趴在东面围墙外待命。纵的围墙高,又有炮楼,易守难攻。直围到中午以后,接到情报人员送来的黄口车站鬼子出发的信息,遂撤出战斗。在撤退中,十八大队胡驰先同志头部中弹牺牲。

1939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听说在纵二别子门口唱大戏、聚赌,按照纵的说法:是为了弄几个扁食馅子钱好过年。在中心县委的部署下,由二十大队指导员张登先率麻瑞全、张宝元等17人,暗带短枪,混杂在听戏的人群中相机行事。下午3时许,活捉了纵二别子,当场夺了六支步枪,晚上纵家又送来七支步枪。次日早饭后,二十大队行军至王汉集东北,枪决了汉奸纵馨亭,扫除了地方上一个抗日的障碍,也使萧永边境的抗日烽火联成了一片。萧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三打徐楼

徐楼地处萧九区,是我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地带。徐楼

大地主李忠镐，外号李七猴。他公开勾结曹村车站的鬼子，拉来土匪张秉衡等40多人，挂起太阳旗，自设据点。我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拔掉这个据点。1938年12月18日晚上，十七、十八、二十大队和贾兴兰的游击队，齐集白土寨南边的古庙附近。县长彭笑千在庙里召开军事会议，由三支队大队长孙象涵部署战斗任务：十八大队部署在徐楼的东南部，二十大队在西南部，贾兴兰部在北部，十七大队扼守东部大、小山口，阻击从三堡、曹村增援的鬼子兵。战斗从19日清晨打响，战前也曾向村里喊话劝降，无效后即发起进攻。敌人紧闭寨门，固守寨墙，几次进攻无果。上午九点钟左右，曹村的敌人前来增援，与我十七大队在大山口展开激战。我十七大队无打援经验，远距离火力不强（短枪占多数），又存侥幸心理，认为鬼子不一定来。结果，被敌人打个措手不及。在与鬼子短兵相接中，我十七大队大队长王振全、中队长沈凤鹤及胡道恂、李忠印等七八位同志牺牲，十多位同志受伤。前方指挥所闻讯后，迅速撤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二区休整。

隔了一个多月，萧县中心县委请正在萧宿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六支队滕海清部支援，由二总队副总队长孙象涵率五连（原十八大队）配合，再次攻打徐楼。1939年2月11日，部队集结在永堙，黄昏后请来皇藏乡乡长徐明轩介绍徐楼的情况，连夜出发。到土盆村后，先派人装扮成过路部队要茶水，想趁敌人开门时乘机而入。敌人很警

惕，不愿开门。当战斗打响后，李七猴又令民众在围墙周边防守。发起几次进攻，没有攻破围墙，又怕过多伤害民众，遂令部队撤离。

两次攻打徐楼不下，李七猴怕我再攻，即把能搬的东西全装上车，携带全家逃往徐州。我九区政府于3月14日进入据点，开仓济贫，拆除工事，当地群众称之为“三打徐楼”。

在萧西枪毙了纵二别子，在萧东赶跑了李七猴，让汉奸闻之胆寒，有效地阻止了敌人随意设置据点的行动。

罗里战斗

1939年10月14日，驻濉溪的100多日伪军向北“扫荡”，萧县常备总队命令驻瓦子口、程蒋山、刘窑的二营进行伏击。扼守程蒋山的二营三连二排，共3个班，50多人，有1挺捷克式机枪。上午9时许，敌人接近二营阵地。敌方的队形：前锋为伪骑兵，约30人；中间为伪步兵，40多人；后边是日军步、骑兵，约50多人。当敌人进入三连二排伏击圈时，遭到猛烈的射击。敌人继续前进，没有还击，他们想从瓦子口过去包抄我军。敌人行至刘窑附近，三连一、三排及一连进行正面伏击。二连谢长恒原打算率部过山西到总部待命，走到老岱河发现敌情后，立即指挥部队凭借河堤投入战斗。敌人受到三面夹击，狼狈而逃。三连二排居高临下，毙伤敌十余人。有两名日军一名伪军，逃到罗里村东边一个小洼坑内，被我团团围住。我

们以小树林和坟头作掩护，边射击边喊话，敌人拒不投降。二连长谢长恒、三连二排六班长胡传林与战士王启昌，把手榴弹往坑内扔，趁着爆炸的烟尘冲上去一看，坑内抛下三具尸体。三具尸体中有大尉松井谷治，他是这股日军的头目。谢连长与胡传林各缴获三八式步枪一支，王启昌缴获龟头盒子一把，还有军用地图、指挥刀、望远镜等战利品。此外，二连还缴获一匹战马。

大吴集战斗

1939年12月5日，驻徐日军一部500余人，骑兵数十名，汽车3辆、大炮2门、小炮数门、轻重机枪数十挺，以汽车为先导，经陶楼、曲里铺等地向我大吴集进犯，妄图在大吴集设立中心据点，联防三、四、五、六区。由冯家平、程祖光率领的萧县常备总队一营，孟昭林、纵瑞香率领的萧县常备总队三营与萧支支队长吴信容率领的萧支二营，部署在阚楼、吴蒋庄、大吴集一线。

7日拂晓，敌人进入吴蒋庄，遭萧常三营阻击。萧常一营二连、三连强占了有利地形，可以随时给三营以支援，使敌人无法前进。敌人调集炮兵密集地向三营阵地阚楼发炮，直打到太阳快要平西。这时，敌人沿公路以北悄悄地向大吴集方向转移。敌人走到大吴集附近，又遭支队长吴信容率领的萧支二营猛烈痛击。因太阳快要落山，敌人焦急，不仅发疯似地用机枪扫射，还丧心病狂地施放烈性毒瓦斯和烟幕弹以掩护其逃窜。我军在追击敌人中，打

死打伤敌人 70 余人。是役，我军牺牲一名，轻伤七名。

三十六天反“扫荡”

1940 年 3 月 16 日，日伪 2000 余人（骑兵数百人），分五路“扫荡”萧、宿、永、碭地区，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歼我主力，扩大伪化区，以减少对徐州及铁路交通线的威胁。他们在萧县瓦子口、王寨、大吴集、张新集、张寿楼、祖老楼、周大楼、青龙集、王白楼、袁圩、张大屯、胡屯、曲里铺增设据点，采取步步为营，梳篦战术，日夜纵横出犯，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们采取的对策是：一、三总队转至外线作战，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使敌人处处扑空，失去主动。我区乡武装和游击小组、基干民兵则采取“人不离乡，枪不离人，到处鸣枪，就地纠缠”的麻雀战术。两者结合，加之坚壁清野，使敌人行动时“如入无人之境”，宿营时则遭“四面楚歌”。

我主力转移外线以后，先后打击了王白楼、李石林、张大屯出犯之敌，袭击了黄口车站、张大屯，围攻王白楼，血战阎井、蒋庄、丁楼。此时，区队武装和各乡镇游击小组、青年基干民兵，也积极配合主力捉汉奸，扰敌人，十分活跃。半月之内，仅一总队就击毙了敌人佐野联队长、北山大尉、板木付平少尉等以下官兵数百人。敌人恼羞成怒，集中日伪 3000 余人，于 4 月 1 日晨分四路向我进攻。敌我大战于山城集附近之僖山、磨山、李黑楼等地。我军利用壕沟等有利地形，猛击密集来犯之敌。经过一天恶战，

打死打伤日伪 300 多人，终于把敌人打退。

是役，我一总队队长鲁雨亭壮烈殉国。萧县县直干部张雪亭、卓汉章，四区区委书记、洪河大队教导员张祚瑞，洪河大队中队长杨振瀛等五、六位同志牺牲。县长纵翰民同志手部受伤，洪河大队 300 多人伤亡惨重。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粉碎了敌人要将我一网打尽的企图，取得了 36 天反“扫荡”的辉煌胜利。

第五节 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党组织

萧县沦陷前，上级党组织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黄口附近孙庙村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一次是徐西北区工委在丰县召开的丰、沛、萧、砀、铜五县党的负责人会议。这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是要求各县在抓好党领导下的武装及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注重审查和吸收新党员，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萧铜工委、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积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在恢复和建立了李酒店、冯瓦房两个党支部之后，又恢复了孙大庙村孙福田、王楼村张元清、王胡寨村杨元章、刘庄村孙清怀的党组织生活。同时恢复和发展的党员还有二区的杨兴瑞、杜玉堂、葛玉环；三区的孙大兴、戴世雅、孙成绪；四区的张祚瑞、王长信、张祚兴、张长文；六区的孙敬祖；九区的毛庭霄等。这些恢复党籍和成为新党员

的同志，有的当了区委书记，有的当了区长，有的当了农会主任，有的分配到部队工作。到1938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140多人，建立了16个党支部，30多个党小组。

中共陇海路南区工委隶属于陇海路北萧铜工委领导。随着形势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形式也不断有所变动。1938年7月中旬，中共徐西北区工委派尹夷僧、张如到陇海路南区工委及其游击队驻地吴丛林，宣布徐西北区工委的决定：一、萧县路南区工委改为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属徐西北区工委领导。二、萧县抗日游击队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七大队。这时，萧县工委与陇海路北萧铜工委已为平行关系。

1938年10月，中共苏鲁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决定撤销萧县工委，成立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派戴蕴山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李忠道任组织部长，孟宪章任宣传兼军事部长，后增补纵翰民为委员，任统战部长。中心县委辖萧县（陇海路南）、宿西、永东、砀南四县的党组织，属苏鲁豫特委领导。1939年4月，陇海路北萧铜工委改为萧铜县委，书记路继先，委员有朱玉珂、路涤生、朱传真、李华农、徐传祥、王清惠，属苏鲁豫区党委领导。1939年6月底，特委决定戴蕴山调任湖西地区任鲁西南地委书记。7月，李忠道接任中心县委书记，增补陈继仁为委员，任组织部长。193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电示，中共萧县中心县委转属豫皖苏区党委领导。12月，区党委派辛程任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陈继仁调任宿西任县委书记。此时，萧县中心县委、萧铜县委分属新四军、八路军领导。当时是党组织与武装分属两个地区领导，萧县陇海路北七、八区行政关系仍属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至1940年春，因受日伪顽夹击，萧铜县委转至陇海路南活动，至1941年东撤时结束。

1940年9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豫皖苏区党委决定撤销萧县中心县委，成立陇海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委员有何启光（组织）、张继成（宣传）、纵翰民等，辖萧县、宿西、永东、砀南。同时成立萧县县委，书记辛程，委员有纵翰民、戴世雅、夏峰、赵海丰、孙明远、孙清淮、张建淮。

这一时期，萧县党组织发展很快。由1938年初陇海路北的六七十名党员，陇海路南的20多名党员，发展到1939年底的1700多名党员。发展党员的主要形式是举办抗日训练班，通过培训抗日干部，发现和培养建党对象，发展新党员。1939年春，萧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忠道开始在四区张寿楼、崔口、小阁子等地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50人，时间半个月，对象是愿意抗日的各界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戴蕴山、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等同志分别到训练班讲课。李忠道、陈继仁在训练班负责发展党员，条件是坚持抗日，自愿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过考查即可入党。每期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分赴各区、乡参

加抗日活动。自上而下建立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至1939年夏，各区区委会相继建立，一区区委书记李继昌，二区区委书记杜玉堂，三区区委书记孙大兴，四区区委书记王长信，五区区委书记张建淮，六区区委书记田启松，七区区委书记许广陶，八区至1939年底建立区委，区委书记李华农，九区区委书记毛庭霄，十区未建立区委。至1939年秋季，县一级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分别建立起来，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这些抗日团体的乡组织，大多都有要发展的党员对象，或者已经有了党员，或者已经建立了支部。中心县委巡视员陈继仁，协助李忠道以民运科的名义，到各区乡发展党的组织。

在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的同时，注意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39年2月，萧县中心县委在六区阡楼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或区指导员，党员区长和群团组织党员负责同志，一共50多人。此会由戴蕴山、李忠道、纵翰民轮流主持，会期七天，主要传达贯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大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对党员干部教育很大。当时，在经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印刷一些重要文件和书籍，供党员、干部学习，学习气氛很浓。

萧县中心县委加强对宿西、永东、砀南党建工作的指导与帮助。1939年4月派杨元章去砀南开辟新区，在那里

发展党组织,建立了砀南县委,发动群众抗战。在永城东部及宿西地区,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永东支部负责人是盛瑞堂,宿西工委负责人是李时庄。1940年初,萧县中心县委又派陈继仁任宿西县委书记。萧县中心县委与上述三个地区的联系,一是请来汇报工作,二是派人去检查督促,三是帮助培训干部,使这三个地区的抗日工作发展很快。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对萧县党组织的领导是直接领导区委(未设立萧县县委),至1940年9月撤销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成立中共陇海路南地委时,始单独设立中共萧县县委。此时,全县党员1800余人。

第六节 发展地方武装,壮大主力部队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高度重视抗日武装的发展工作。地方武装的不断壮大,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伪,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也为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1938年9月上旬,奉湖西特委指示,由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率领十七、十八大队,去丰县参加讨伐汉奸王歪鼻子(王献臣)的战斗。参加此役的有丰、沛、萧、砀、金乡、鱼台等县武装,共4000余人。战斗自9月8日开始,至20日王献臣部撤退结束。十八大队先行回萧。十七大队留在路北整顿,并将十五大队(150人)并入十七大队,大队长

改由王振全担任，魏佑铸任指导员，于10月中旬返回萧县。十七大队回县后即与十八大队在王寨会合，由两大队各抽一部分人，加上种继臣从永东带来的二三十人，组建了第十九大队，由许致远任大队长，孟宪礼任指导员。此时，十八大队大队长由谢继恩担任，指导员为梁鸿志（顾寒星）。不久，这三个大队合编为一个支队，番号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孙象涵，教导员尹夷僧。

10月底，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决定以萧县六区联庄会武装为基础，组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大队，大队长吴信容，指导员张登先。二十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由马井联庄会的马立勋、马立业与袁金玲的自卫队组成，中队长麻瑞金；二中队由六区的联庄会自卫队组成，中队长张元宝；三中队由刘瑞岐、黄立中的游击队组成，中队长黄立中。听说陇海路边郝寨至王闸口一带建立了伪组织——爱护村（为鬼子护铁路的），黄振明在爱护村任团长。11月下旬，三支队决定派十九大队去瓦解这个伪组织。大队长许致远通过地方士绅做黄的工作，使黄发誓不当汉奸，愿意将爱护村的伪武装200多人改编成抗日游击队，随十九大队一起活动。许致远临机将这支队伍称为二十一大队，大队长刘重英，指导员刘以清（后十九大队去丰县，二十一大队即交给县政府）。与此同时，陇海铁路北耿继勋（耿聋子）的游击队，被敌人打垮后跑

到萧县六区，编为二十二大队。耿继勋部在萧县活动四个多月后，于1940年3月返回路北。以上二十一、二十二大队均系自编，不属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序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部队发展之快出人预料，二总队给萧县的番号已不敷应用。

1939年1月1日，奉湖西特委指示，萧县十七、十八、十九大队与宿县二十一、二十二大队，由耿蕴斋带队到达丰县的欢口、王楼一带，改番号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简称苏支）。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亦到达丰县，两支部队会师后由湖西特委组织联欢。在联欢会上，特委书记白子明讲话：宣布将十七大队编入苏支二营，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大队合编为三营七、八、九连，营长由郭廷万担任。十八大队暂未编入，返回萧县。1939年3月郭营南下，在相山窝与苏支二营合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祚（原苏支参谋长），政委王鸿鸣（原苏支政治处主任），参谋长阎立荣，政治处主任罗有荣。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武装编入苏支后，湖西特委决定仍以二总队的名义转移到陇海路南继续发展武装。二总队的领导人员是：总队长耿蕴斋，政委张如，副总队长孙象涵，参谋长孙鹤一，政治处主任耿荆山。此时，路南武装尚有十八大队、二十大队及孙象涵所带的三支队警卫连。

1939年3月，张登山带领二十大队送耿葺子的部队

回陇海路北，祖老楼的刘长松带来 40 多人，与麻瑞全中队合编成新二十大队，大队长仍由吴信容担任，指导员程祖光，刘长松为大队副。3 月中旬，进入路南的二总队，为了发展武装，实行东西分进，总队长耿蕴斋率总队机关部分武装向萧县西部活动。副总队长孙象涵率原三支队警卫连东进萧宿铜，老二十大队也随同前往。东西分进一个多月，武装发展到 2000 多人。5 月 13 日，二总队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集中在二区梧桐村，奉命改编为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耿蕴斋任大队长，蓝廷辉任政委，孙象涵任副大队长，耿荆山任政治处主任。七大队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吴信容，教导员张登先；二营营长李仁山，教导员魏佑铸；三营营长王运来，教导员梁鸿志。至此，二总队已不复存在。6 月，苏鲁豫支队东进萧宿铜灵开辟新区，在温山遭日本侵略军七路围攻，激战竟日，当晚撤到萧县二区休整。7 月，吴法宪率苏支一大队（胡炳云大队）东进，孙象涵率游击七大队三营及机关直属队一部 700 余人随吴法宪向东进发，至皖东发展到 1200 多人。10 月，取消七大队番号，改为苏支四大队，继而改为独立大队，为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五团的前身。耿蕴斋率游击七大队一、二营及机关直属队一部，随彭明治配合苏支主力向萧永夏一带开辟根据地，到达萧永边即与苏支三大队、独立大队（藉兴科大队）合编为苏支三大队，大队长耿蕴斋，政委郭影秋，大队副藉兴科，参谋长蓝廷辉，政治处主任耿荆山。

由于地方部队纷纷上升为主力，地方抗敌力量单薄，急需补充。萧县中心县委与抗日民主政府多渠道发展武装，一方面积极发展游击队，一方面利用政权的力量把地主组织起来的联庄会，编入区队和县常备总队。为遏制一些地主组织起来的联庄会与共产党争夺武装的领导权，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即制定新规程：一是建立武装要经县政府批准，二是批准后的武装要由县政府派人去领导。这样，就堵住了地主撇开共产党单独发展武装的路子。同时，相机把一些地方实力派和零星的地主武装先编入区队。因为这些以联庄会形式组织起来的武装，地方性很强，先编入区队，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扩大的联庄会，经过一番引导，才开始筹建“萧县常备总队”，并将其就近划分为十七个大队，直至1939年9月间，才改为营连建制。萧县常备总队总队长由县长彭笑千兼任，赵永和为副总队长，纵翰民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六个营，共3000余人，一营营长冯家平，教导员程祖光；二营营长王运来，教导员纵封泗；三营营长孟昭林，教导员纵瑞香；四营营长刘瑞岐，教导员潘静庵；五营营长谢继恩，教导员彭梦杰（后为沙枫）；特务营营长李晋卿，教导员周武烈。同时，还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小组和民兵基干队。一般是乡建立游击小组，村建立民兵基干队，全县游击小组人员2000多人，基干队员3000多人。

1940年3月，豫皖苏党政军委员会决定，将萧县常

备总队一、二、三营(约 1400 余人)编为新四军六支队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耿蕴斋、政委李耀,政治处主任宋治民,参谋长陈景龙。同年 8 月,编为八路军四纵队特务团。县常备总队四营营长刘瑞岐不听调遣,把四营拉到陇海路北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五营活动在津浦路东,后由教导员沙枫带到皖东北,编入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支队第一团。

1939 年 7 月,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将萧县一、五、六区几支游击队联合在一起,在蒋新楼成立了萧县抗日游击支队(简称萧支),从苏鲁豫抗日游击支队调回吴信容任支队长,中心县委宣传兼军事部长孟宪章兼任政委,张登先任副支队长,崔文彬任政治处主任。不久,孟宪章调津浦路东工作,由姚运良继任。同年底,宿西相山大队编入萧支。萧支为三个营的建制,一营营长麻瑞全,教导员张曼平;二营营长张登先(兼),教导员赵剑鸣;三营营长李秉枢,教导员周从裕。1940 年 8 月,萧县抗日游击支队编入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八团(后又恢复新四军番号),吴信容任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团长。同时,萧县抗敌总队亦编为四纵队特务团,总队长耿蕴斋调任豫皖苏保安司令部任司令。

从 1939 年冬开始,日寇加紧了对沦陷区的控制。至 1940 年,日寇在萧县境内设置的据点增至 40 多处,进行频繁的“扫荡”。各区、乡在反“扫荡”中重建起游击队,特

别是经过1940年4月份一个月反“扫荡”的严峻考验，游击队经受了锻炼。5月，萧县中心县委决定将各区游击队集中整编，组建萧县独立团。该团由赵海丰任团长，李忠道兼政委，王静敏任政治处主任，康平任参谋长。下辖五个营，一营营长朱大清，教导员田启松；二营营长祖玉恩，教导员葛玉环；三营营长孙成绪，教导员毛庭霄；四营属中共陇海路北萧铜县委；五营营长张长海，教导员王长信（王保哲）；六营营长李祥龄（后为李华农），教导员朱玉珂。独立团成立不久，又将五个营整编为四个营，各营分散在各区多次对敌主动进攻。

耿吴刘叛变后，为了巩固这块抗日根据地，对付日伪顽的进攻，1941年1月25日，奉上级命令，成立萧县独立旅。萧县县长纵翰民兼任旅长，中共陇海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兼政委，康平任参谋长，陈其五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一团由萧县独立团编成，团长赵海丰，政委由中共萧县县委书记辛程兼；二团由萧县特务营和主力部队一个营合编而成，团长孟振声，政委王静敏，副团长周纯麟。

1941年3月下旬，萧县独立旅接四师师部命令，由李忠道政委、康平参谋长带队赴涡北参加反顽斗争。兼任独立旅长的县长纵翰民和兼一团政委的萧县县委书记辛程，仅留二团三营随县委、县政府就地坚持。3月31日，他们与土顽及叛军吴信容部在罗河打了一仗，于当日傍晚

抵达徐暨一带宿营。4月1日晨，萧城、滩溪口、蔡里、祖楼、朔里、瓦子口的日伪约700多人，分五路向徐暨方向分进合围。战斗开始，我方看出了敌人分进合击的企图，将兵力作了如下部署：命令三营一部抢先占领制高点，运用有利地形牵制敌人；三营的另一部与八区区队配合向西突围；“亢营”的一个连与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沿山沟向东突围。经奋力拼搏，两路人马均突出重围。在突围中，“亢营”和二团三营各伤亡20多人，三营三连指导员吕渭滨和八区区队长李祥林壮烈牺牲。正是由于他们的英勇顽强，才使县委、县政府突破重围，得以安全转移。

1941年4月，根据四师命令，将萧县独立旅改编为新四军四师三十四团。团长张永远，政委李忠道，副团长张登先，副政委陈其五，政治处主任刘增奎（刘野亮）。之后，该团撤往皖东北。

1938年夏到1941年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县发展了六个团的抗日武装，计8300多人。规模较大的有：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五至二十大队、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萧县常备总队、萧县抗日游击支队、萧县抗敌总队、萧县独立团等。此外，还有遍布全县各地的不脱产与半脱产的游击小组，号称上万人枪。此间，萧县地方武装四次升编为主力部队，使苏鲁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主力部队不断壮大。

第六章

抗战道路上的挫折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在苏鲁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我党干部队伍中的“左”倾情绪有所抬头。少数领导干部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自身党性不强，理解与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水平不高，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处理重大问题时，推行“左”的一套，有时甚至带有宗派主义倾向，而且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粗暴。他们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给个别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不仅破坏了根据地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也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萧县的抗战工作深受其害。

第一节 东任台子事件

1939年3月15日，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两个连、八

路军苏鲁豫支队两个连、二总队的第十八大队等抗日武装借“联欢”之名，把宿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约300人，中队长张正福）当作“土匪”部队强行收编，造成打死打伤近百人的震惊萧宿边境的“东任台子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宿县沦陷后，于1938年11月成立了中共宿县县委，李时庄任书记。他们除抓紧发展党员、重建区委、支部外，还积极动员游击队上升为主力部队。原烈山游击大队第二中队，此时已编为宿县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张正福积极要求归属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引起同时拉起游击队的张鹤岭、张正尧的不满。张鹤岭原是国民党的联保主任，烈山游击大队第三中队是他拉起来的，张正尧是烈山游击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

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萧宿边境会师，萧县县委、县政府热情欢迎他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领导扩大武装的要求很强烈，张正尧等人趁此时机，利用关系到萧县进行阴谋活动，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张正福的部队是“土匪”，是萧宿边境的“一害”，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收编他们，把张正福的部队消灭掉。张正福的部队，一是素质较好，一部分来自矿工，一部分来自农村青年；二是武器装备也较精良。他们的枪支是国民党部队从徐州撤退时丢下的，还有重机枪和迫击炮。这支部队此

前曾到萧二区活动，二区也感到有威胁，萧县个别领导人亦有同感，就与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领导商量解决张正福部队的办法。

二团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会上，有人建议“设伏智取”，即邀请张正福的部队联欢，趁联欢之际吃掉它。因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刚到萧宿地区，两支抗日武装和当地抗日游击队在一起联欢是正常的事。趁联欢出其不意收缴张部的武器，大家认为此法可行。形成决定后，先向各营、连干部传达：以在萧县二区东任台子开联欢会的名义，强行收编张部。在举行联欢会的前一天夜里，团领导再次向营、连干部强调，因张正福部是“土匪”部队，要提高警惕，注意信号，吹哨子即是动武的信号。

游击支队二团向张正福的部队发出邀请后，于3月15日中午，游击支队二团两个连、苏鲁豫支队两个连、二总队的十八大队等部队都赶到了东任台子会场。张正福的部队按照邀请，也自东南方向以行军队形进入会场。不少人还换了新衣服，理了发，武器擦得明光闪亮，特别是那十多挺崭新的轻机枪，更是引人注目。张正福的部队被安排在会场中间，面对讲台，游击支队两个连、苏鲁豫支队两个连、二总队第十八大队等分别坐在张正福部队的左、右、后三面。讲台是用农民的车、门板等搭起来的，类似农村唱戏的戏台。

下午4时左右,联欢会开始,游击支队二团负责人和张正福先后上台讲了话。嗣后,游击支队二团负责同志宣布照相,将部队作了调整,双方干部花开坐在台子前,以表示亲热团结。张正福部队的轻重机枪摆在部队的前面,紧挨着干部。接着,主席台上令双方部队架枪,台下即骚动起来。这时,游击支队二团负责同志态度严肃起来,高声喊:“还不架枪?”因他不是当地人,口音不同,台下把“架枪”误听成“缴枪”。话音刚落,台下向台上打了一枪,台子上二团的警卫员应声倒下。台上吹起哨子。早有准备的游击支队二团、苏鲁豫支队与十八大队,听到哨声,立即抢起架在台前的张正福部队的轻、重机枪,一齐向张正福的部队开火。一阵猛射,仅3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战斗”。经打扫场地,张正福部队被缴械的七八十人,当场被打死、打伤的七八十人,逃跑中被打死的二三十人,另有一部分跑脱,张正福本人被当场打死。共收缴张正福部队的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多支,驳壳枪50多支,迫击炮2门。

张正福率领的宿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是中共宿县县委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事件发生时,宿县县委书记李时庄也在现场。既没有人打他的招牌,更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关于强行收编张正福中队之事,现场目睹这一事件全过程的萧县党政军负责人有:中心县委委员、统战部长纵翰民,县长彭笑千,从萧县走出

去的二总队总队长耿蕴斋，副总队长孙象涵等。事件发生后，部队上下议论纷纷，一些领导干部也认为，这种做法显然是犯了“左”的错误。

东任台子事件是抗日武装之间自相残杀的一场悲剧。该事件导致近百名抗日官兵被打死打伤，在萧、宿、永、砀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恶劣影响，产生了不良后果，致使一些本来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脱离了我们党，跑到国民党顽固派和伪军那里去了。

建国后，有关单位和部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求证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终于在1994年澄清事实，给张正福和其领导的第二中队以及其他受牵连人员予以平反昭雪。

第二节 湖西“肃托”

震惊全国的湖西“肃托”事件，萧县本处于漩涡之中，但由于萧县中心县委的抵制及归属的变动，得以幸免。萧县党政军干部虽未遭迫害，但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也祸及萧县。

1939年8月下旬，李忠道任萧县中心县委书记不久，接湖西区党委通知，要他去余王庄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地、县委书记会议。他准时赴会。在此之前，李忠道根本不知道“肃托”是怎么一回事。离余王庄老远，就发现岗哨密

布，戒备森严。进村后，见人人神情紧张，李忠道凭直觉猜想，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一些熟人偷偷告诉他：“区党委正在抓‘托派’，很多人都被逮捕了！”他还听说，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和宣传部的一名科长、区党委特务营营长孟宪琛等人都是“托匪”，已经被枪毙了。突然听到这些意外的消息，不能不使李忠道思想上产生疑虑，难道我们队伍里一下子出了这么多托匪？对自己的同志大开杀戒，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李忠道想不通，直接去问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白对他说：“你不知道，托匪很顽固，不打他不会招认的。”他显得很自信的样子。

会上，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分别介绍了“肃托”情况。白子明也在大会上讲“肃托”的正确性和胜利，似乎一点也不容置疑。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到会的地、县负责同志一共七人，会后有四人被扣下，说是有托派嫌疑。当时，弄得人人自危，气氛十分紧张。

“肃托”的起因是：边区湖边地委办的新党员训练班，在学习结业前分配工作时，一部分学员不想分配到外地，提出“哪里来的要分配到哪里去”的要求，与湖边地委组织部统一分配的方案不一致。加上一部分农民党员要求回家收割麦子，训练班不予准假，有的偷偷地跑回了家。地委领导人发现这些情况很惊慌，怀疑是托匪破坏，便派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到训练班了解情况。就这样，“肃托”工作领导权便落到这个来历不明、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手

里。他首先找学员谈话，捕风捉影，甚至连学员讲梦话也说是托派活动。他们将训练班教员魏定远、学员曹广善逮捕后，用严刑逼供的违法手段，迫使他俩承认自己是“托派”。接着，又逼出了所谓“托派组织”，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从训练班蔓延到鱼台等县，最后发展到区党委机关和边区很多地、县，连在那里的主力部队也卷进“肃托”了。一大批无辜的同志被逮捕，被杀害，包括许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党政军干部。

李忠道从余王庄开会回来，心情十分沉重。在回路南的途中，遇见正准备赶往路北参加“肃托”的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及其他领导同志，李忠道向他们讲了路北“肃托”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并请他们用电台向山东分局汇报，最好由分局派人来解决问题。李忠道回到萧县中心县委驻地大约十天，便听到更坏的消息，连给他们开会报告“肃托”情况的王文彬、张如同志也在群众大会上被枪毙了，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以及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等同志也被逮捕了。“肃托”的矛头还指向部队，逮捕了苏鲁豫边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李贞乾、八路军苏支副支队长梁兴初和苏支三大队政委郭影秋。这时的“肃托”已不限于逮捕杀害边区机关的干部了，而且还把边区各县区以上大部分干部集中起来，一批批逮捕杀害和软禁监视。各级党政军干部有五六百人被逮捕，惨遭杀害者近 300 人。就这

样，湖西区党委在被坏人操纵把持下，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

1939年9月上旬，区党委书记白子明通知李忠道，限他在三天时间内把萧县中心县委区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带到陇海路北指定地点去参加“肃托”。接信后，李忠道和中心县委成员很为难。他们有三点顾虑：一是这么多干部通过日伪、顽封锁线，还需要在敌占区住一宿，目标很大，怕遭敌人袭击；二是离开这个地方，日伪顽会来占据，我们会失去立脚点；三是这些干部去了，怕有被错杀的危险。萧县中心县委在四区崔口小学召集区以上干部开会，讨论了好几天，发言很激烈。总之，大家都不愿意去，不去又怕被说成不服从组织决定。大家正在为难，心情十分焦急的时候，豫皖苏边区党委派刘作孚送来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给山东分局的电报，特转知萧县中心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为了今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陇海路南、津浦路西、原属山东分局领导的这一地区的党、政、军都划归中原局豫皖苏边区党委领导。接到电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有救了。于是，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陈继仁带着中原局的电报，到湖西区党委找白子明汇报。白看了电报后说：“各地方‘肃托’都差不多了，就是你们路南没有搞了。我们不管了，让他们（指豫皖苏边区党委）去肃吧！”至此，萧县中心县委及几个县的干部才免遭其害。

同年10月，李忠道、陈继仁等同志到豫皖苏边区党委接关系时，向彭雪枫、吴芝圃等领导同志汇报了萧县中心县委的工作和湖西“肃托”的情况。彭雪枫听了汇报后笑着说：“你们不是托匪，是共产党，路北犯了‘肃托’中心论的错误。”

11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人日夜兼程，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肃托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解救了一大批同志。王须仁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杀。另一个冤案制造者、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则叛变投敌，当了汉奸。

萧县虽幸免于难，但事件对萧县的影响很大。首先，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了。一些原来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听说路北“肃托”整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吓得不敢入了。其次，陇海路北的日伪顽控制地区扩大了，八路军过陇海路到萧、宿、永地区，过津浦路到苏北支援新四军反顽斗争的交通线不畅通了。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对该事件曾作过多次处理，但因战争环境所限及“左”的思想影响，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1983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明确指出：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

第三节 王白楼子会议

1939年底,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运科长孙叔平、副科长张舒民正在张寿楼小学办抗日训练班,豫皖苏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到萧县检查工作时,当面质问孙、张二人,为什么让彭笑千当县长?周认为,彭不是中共党员怎么能当县长呢?孙、张向他汇报了萧县沦陷后的形势及萧县党组织把彭笑千请出来当县长的经过,并反问周季方:“不让彭笑千当县长让谁当呢?”1940年2月初,周季方又到萧县部署改造政权工作。他强令县委三日内接管县政府大印。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大印呢?它是国民党县政府留下来的,这块铜印也并不在彭笑千手里,而是保管在一位工作人员手里。实际上,周季方是要把彭笑千赶下台,换一位共产党员当县长。

如何执行这一指示,县委很为难。彭笑千正干得有声有色,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干呢?况且,他又不是自己要干的,是我们“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的。他在国难当头之际走马上任,任县长两年多以来,堪称政绩卓著。萧县能成为被八路军与新四军称赞的抗日模范县,彭笑千功不可没。就是这样一个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出突出贡献,有才干、有威望的党外同志,怎么能说一声不让人家干就让人家下台呢?这让人家怎么看我们的干

部政策呢？虽然思想不通，但是还得服从，因为这是上级党的决定。

萧县中心县委书记李忠道，先找与彭笑千工作上配合得最好的县政委员会中的“萧县三杰”（即孙叔平、纵翰民、张舒民）商量，让他们出面做工作，不使彭笑千感到愕然。“萧县三杰”分头去找彭笑千，与他个别交换意见。他们首先分析了萧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的特点：一是早，萧县沦陷不到三个月就建立了起来，比周围各县都早；二是广，全县十个区，108个乡全部建立了政权，无一空白；三是和平建立的，没有经过斗争。一些区、乡政权，特别是乡一级政权，有的是旧政府人员占优势。这和彭笑千当县长有一定关系，因为旧政府人员只要愿意抗日就同意他继续干。平时，倒没有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党掌握着武装，并且在群众中有威信，局面尚能控制。一旦形势起了变化，就会出问题。自去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国民党特务进来了，国共磨擦开始了，有些乡政权旧人员已不听话，有的在观望犹豫。为了坚持抗战，必须改造政权，撤换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的地方士绅。经过交谈，彭也认为局势起了变化，自己也看出了这些问题，也感到工作起来有人在捣乱。他同意撤换一些人，但不愿意自己去做。他说自己同这些人旧关系太深，下不了决心。特别是沦陷后，今天跑到这家，明天跑到那家，受过他们的保护，现在要撤换他们，下不了手。因此，

他提出暂时离开，由县委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权改造，过一段时间再回来都可以。

彭愿意暂时辞去县长职务，这样工作就好做了。党组织还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他走后谁接替他的职务最合适。他建议由行政科长许西连代理，以后再根据情况按程序选举县长。

1940年2月初，萧县县政委员会在王白楼子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彭笑千外，还有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许西连、耿蕴斋、崔健吾、王子石、马济民、纵止韩等。与会人员首先讨论形势，由孙叔平讲国民党反共给全国抗战带来的危险。同时指出，萧县国民党也和其它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样，积极反共，破坏萧县的抗战局面，准备投降，这是我们不能答应的。接着，李忠道讲了话。李是萧县中心县委书记，虽然当时党组织没有公开，可大家都知道他是萧县党组织负责人。他说：“萧县的抗战局面是共产党领导民众打开的，萧县的国民党不与共产党合作，却与顽固派朱大同相勾结，破坏萧县团结抗战的局面，宣传反共，制造磨擦，我们共产党人已经不能再容忍了……”这时，萧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子石有点紧张，一再表示他没有反共。彭笑千说：“反共就不能抗战，反共就会向日本投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在政府中的作用已经过去了，今后要发生严重的斗争，我不适应这种形势，需要比较积极的同志担任这一工作。在未选举

之前,我建议由县政府行政科长许西连代理县长职务。”这个建议获得大家同意。此后,彭笑千调任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行政处长。

1940年3月8日,新四军六支队、豫皖苏边区党委主办的《拂晓报》,刊登了2月27日六支队政治部于精忠堂开会欢迎彭笑千的消息:“萧县县长彭笑千先生于萧县沦陷前,即在萧县领导民众参加抗战。自萧县沦陷以后,为了开展萧县游击战争,实现蒋委员长‘变敌后为前线’的指示,两年以来,协同本县各党各派及社会先进人士,历千辛、冒万苦,率萧县数十万民众,英勇奋斗,动员民众,组织武装,改革行政,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使今日的萧县成为豫皖苏边区游击区实现三民主义的榜样!近因操劳过度,政躬欠和,特来后方休养。”此时,彭笑千正积极向党靠拢。

1940年3月初,豫皖苏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再来萧县,在三区王塘召开全县干部会议,怒气冲冲地批评萧县右倾,指名道姓地指责孙叔平为右的代表。不久,孙叔平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任训练部长,后任教育长。

周季方坐阵指挥萧县的政权改造。一夜之间,不通过县长把区长换掉,不通过区长把乡长换掉,全县几乎换了一遍。十区区长李瑞卿被撤换以后,觉得自己是县政府委派的,不干了,应该向县政府打个招呼。此时,许西连代理

县长。李向他回报说：“过去，县政府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不听话的地方。”许西连便说：“你过去做得很好，回去之后，你还要好好干。”李瑞卿说：“现在我不是区长了，被人家拿掉了。”许西连很尴尬。3月18日，县参议会由参议长张静波主持，在四区王柳园村召开会议，选举纵翰民为县长，冯蕴言为秘书，并定于4月1日正式宣布就职。

由于赶走了彭笑千，调走了孙叔平，在政权改造中实行一套“左”的做法，破坏了统一战线，不少一直与我们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也对我们党产生了怀疑。萧县常备总队第四营营长刘瑞岐不接受县政府领导，单独活动。

5月间，朱大同在国民党江苏省中统特务主任汤铁飞举荐下，由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派来萧县任县长，在陇海路北管粥集成立了国民党顽固派萧县县政府。刘瑞岐当上了顽县政府常备团长，后来纵止韩也投奔了顽县政府。萧县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民众称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为南政府，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为北政府。一些党外人士也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后方，有的回家，有的弃政做生意去了。

第四节 耿吴刘叛变

1940年12月中旬，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八

路军四纵队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吴信容与十七团团长刘子仁，裹胁部下 2000 人脱离了党的领导，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抗战时期发生在萧县的“耿吴刘叛变”事件。

耿蕴斋，1898 年生，萧县孙庙人，出身地主家庭。耿徐州七师毕业，于 1927 年春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萧县师范和沛县师范当过教师。1930 年脱党后当过两任国民党政权的区长；1937 年 7 月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1938 年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后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1939 年 2 月任二总队总队长，11 月任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12 月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三总队总队长；1940 年 3 月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同年 11 月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对调任保安司令一职，他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有职无权。

吴信容，1912 年生，萧县吴八庄人，出身小地主家庭，和耿蕴斋有师生关系。1938 年任六区联庄会自卫队长，同年 11 月任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二十大队大队长，于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 9 月任萧县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同年 12 月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第七团团长，后任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

1940 年 12 月初，身为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的耿蕴斋，以政治部主任刘作孚“压制”他为借口，未经请示，擅自带一个警卫连离开司令部（驻涡阳龙庙集）。起初，耿到

萧县三区北部，随同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八团（原萧县游击支队）团长吴信容，抗击日伪军的“扫荡”活动。

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彭雪枫得悉此事后，恐其图谋不轨，背叛投敌，立即派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黄思沛到陇海路南地委传达他的指示：要规劝耿速回司令部，如其不回，并与吴信容勾结叛变，就以刘子仁带领的十七团为主，萧县独立团配合，武力押送耿、吴回边区党委，再作处理。彭雪枫之所以让十七团参与处理这件事，一是因为上级派到十七团的干部多，党员多（党员占部队总人数的20%），政治条件好。二是由于刘子仁善于逢迎，平常给上级领导的印象不错。对于让刘子仁带领十七团参与处理此事，李忠道曾提出异议，但黄思沛只有传达的任务，没有改变决定的权利。这里传达一毕，他就去萧永边境十七团驻地，向刘子仁传达去了。

李忠道遵循上级指示，去做规劝耿回边区司令部的工作。他到了萧县三区北部抗击日伪“扫荡”的前沿阵地，见到耿蕴斋，就劝说他按上级要求抓紧时间回司令部。耿说在边区苦闷得很，答应过几天回去。李忠道又做吴信容的工作，并要他说服耿回边区司令部。吴说：“我虽对方（仲铎）政委有意见，但却不同意老耿的这种错误做法，我绝不会学老耿。”他表示愿意动员耿回边区司令部。李忠道认为吴信容的意见很明确，加上萧县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也不同意耿留在萧县工作，因此觉得耿回边区司令部

是迟早的事。

问题就坏在别有用心的刘子仁身上。刘是永城县磨山人，1902年生，出身大地主家庭。他1926年7月参加国民党，1936年4月加入青帮，原系国民党西北军旅长，后当永城县保安总队副总队长。日军进攻永城时，他一枪未放，逃往四川。鲁雨亭组织永城抗日游击队并参加新四军后，他又回到永城混入了抗日阵营，任鲁领导的第一总队第一团团团长，后任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七团团团长，并兼任夏永碭县县长。他当了我军的团长和县长后，还照样抽着鸦片烟。刘子仁1939年8月混进我党，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的大军一压境，他很快就与汤部挂上了钩，阴谋叛变。此人世故深，野心大，为人狡诈。当黄思沛向他传达彭雪枫的指示时，他表面上惟命是从，暗中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耿蕴斋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吴信容更是莫名其妙，尤其是把他与耿捆在一起，要武力拿办，押送边区处理，更是百思不解。他十分恼火，态度陡然间起了变化。

彭雪枫不见耿回边区，又派边区党委副书记、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来到萧县。据彭雪枫12月18日给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说：“令吴芝圃同志于7日晨即西返，8日晚赴萧县。”吴芝圃于12月10日到达萧永边境后，立即派骑兵把李忠道、刘子仁等叫来开秘密会议，商讨对耿、吴的处理措施。会上，由周季方等人提议，经吴芝圃同

意,要刘子仁出面于次日中午12点在陈楼(十七团驻地)设宴请耿、吴。刘子仁说:“不行,光我出面,他们不来怎么办?”他提出要吴芝圃带头署名,吴芝圃一点头,刘就请他起草《请柬》。吴把《请柬》起草好,刘子仁讲要誊写好以后再派人送去,随手把吴写的亲笔《请柬》拿走。刘又问吴:“酒席桌上他们要是不听咱们的怎么办?”吴芝圃回答说:“他们不听,咱们就把他们绑走,反正咱们带着神枪手!”刘子仁表示完全支持,并说:“我和耿、吴都是熟人,我比你们了解他们。他们早就铁了心要叛变了,咱们不下手他们就要下手了!”稍停片刻,刘子仁更坚定地表示:“消灭这些叛变者我打先锋,对他们应该斩草除根,决不养痍成患!”

刘子仁在派人给耿、吴送《请柬》时,竟另附一封密信。密信上说:“吴芝圃是带着神枪手吴守训和林乃清来的,他们在酒席桌上举杯为号,枪毙你们!耿、吴兄,千万不能来,这是鸿门宴!”

据神枪手吴守训1969年8月26日回忆:“扣耿蕴斋、吴信容的具体办法,是利用刘子仁和他们私人关系好,由刘子仁出面请耿、吴吃饭,在吃饭时扣,是我和林乃清(另一位营长级的神枪手)二人下手扣。如扣时他们动手,就开枪打死他们。”不管这叫不叫鸿门宴,反正是利用请耿、吴吃饭的方式“扣”或“杀”他们。

耿、吴知道了这一意图,怎肯赴宴?直到11日下午3

点,不见耿、吴赴宴。刘子仁说:“算了,他们不来,咱们自己吃!”刘子仁吃了自己准备的宴席,又派人去了耿、吴处,唆使耿、吴袭击东曹庄,消灭吴芝圃。而吴芝圃见耿、吴没有赴宴,就派李忠道去十八团驻地张三座楼,看看耿、吴为什么没有来。李忠道一到张三座楼见了吴信容,吴信容就放声大哭,质问李忠道:吴芝圃为什么暗设鸿门宴要杀他?李忠道否认此事。耿蕴斋气得亲手下了李忠道的枪,并把他软禁起来。

12月12日晨,张舒民受县长纵翰民委托去张三座楼劝阻吴信容。吴一见张舒民又是大哭。此时,刘子仁把上级派到十七团的排以上干部60多人全部扣押,吴信容则扣押了上级派到十八团的20多名干部和四纵卫生部长林士笑。刘子仁派来要耿、吴袭击东曹庄的人已到,耿、吴正调兵遣将准备袭击东曹庄。张舒民大惊,坚决不准吴信容这样干。耿、吴不听,张拍了桌子。最后,他们统一了意见:由李忠道随同耿、吴所派的部分骑兵去“请”吴芝圃到十八团驻地谈判。

吴芝圃被武装“请”到新转移的十八团驻地洪河集后,耿、吴照常敬礼、迎接,中午设了酒席。吴信容一开始又是大哭着诉冤,质问吴芝圃为什么要杀他?吴芝圃一再否认有此事。耿蕴斋要吴芝圃随他去十七团驻地陈楼,同刘子仁一起当面核对“鸿门宴”的事,因吴芝圃亲笔《请柬》在刘子仁手里,哪里肯去。左推右托之后,吴芝圃说:

“既然赞成和平解决，就该允许我们先和边区党委、地委、县委通通气，去和他们说明情况，以免发生误会。然后我们再到刘子仁那里去。”耿、吴还是坚持先去找刘。李忠道又单独找吴信容做工作，吴信容勉强点了头，并要李担保吴芝圃去一条脊村马上回来，李满口答应。耿一听要放吴、李走，气呼呼地走出门跨上马就往陈楼去找刘子仁。吴信容一见耿生了气，也忙跳上马，在后面“老师、老师”地叫着追上去。仓促中，吴信容的警卫员、共产党员李振明大吼一声：“还不赶快给副司令员备马！”吴、李趁机上马急奔一条脊村。

吴芝圃、李忠道并没在萧县县政府驻地一条脊村下马，径直去了宿西办事处，找到办事处主任李时庄，在那里给耿、吴写了一封信，说去边区党委汇报后迅即返回，继续商讨和平解决事宜。就在吴芝圃刚离开洪河集时，刘子仁派来的骑兵，各带一长一短两支枪，要耿、吴配合把吴芝圃打死在洪河里。

吴芝圃走后，耿、吴自知和平解决无望，也曾派人与陇海路北苏鲁豫边区联系，但他们不敢收留。耿、吴也曾对部属讲，要向党中央发信、发电告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这可能是欺骗部属的一种托词，未必真有此意。从此，耿、吴、刘裹挟我抗日武装 2000 人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他们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后，耿蕴斋被任命为国民党苏鲁豫皖挺进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

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支队长。

对这一事件怎么看待，众说纷纭。当时直接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吴芝圃，在其1956年4月11日写的《吴芝圃自传》里，有一段重要论述。他说：“……但对发展的方向上，地方武装政策和干部政策上，尤其在皖南事变前后，在对于自卫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犯了些带原则性的错误，以致退出津浦路西。对于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部分责任的。当时，对于这些错误的分析，华中局曾在党内发布一个决议，不需我这里重复。我在这里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关于萧县耿蕴斋、吴信容、永城县刘子仁等部地方武装的叛变问题（共两个团一个连）。”

吴芝圃叙述说：“……这次我几乎为叛徒刘子仁阴谋毒计所害。所以没有遭到危险的原因：一、当时吴信容叛变的决心还未最后下定，还在犹豫不决；二、吴信容、耿蕴斋都留后手，后来公然叛变时也未杀害我们派去的干部；三、当时萧县党内外均有一部分同志正向他们作劝告和调解工作；四、刘子仁是坚决扣押了在他部队的党员干部，夜间在捉押的地方冲出来的时候，还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估计刘子仁早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挂上了钩；五、李忠道同志对耿、吴等作了许多说服工作，起了暂时缓和作用。”吴芝圃最后作了这样的叙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吴信容叛变不久，在我们退出津浦路西以后，就和我们建立了秘密关系，到我们恢复路西

的时候，吴的部队就又反正了（当时吴信容已死，其弟吴信元代替他的职务）。耿蕴斋在自卫战争时也自动跑了回来，悔过自新了。惟有刘子仁坚决反动到底，在解放后被我们捉到处以极刑。”

耿吴刘叛变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耿、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差，组织纪律观念淡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思想作怪，是其走上叛变道路的内在因素。负责处理此事的吴芝圃等人，其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及由此衍生的简单、生硬的处理方法，特别是刘子仁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挑拨离间等因素，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外部原因。

第七章

开辟萧铜游击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我党采取了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在我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20万大军压境，加之耿吴刘叛变及反顽斗争失利造成的不利影响，形势急剧恶化。边区党委和四师奉命于1941年5月初率主力转移皖东北，同时要求各县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随主力转移。萧县党政军东撤后，少数同志留在皇藏山区坚持斗争，创建了萧铜游击根据地。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萧铜在日伪顽并存的险恶环境中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节 东撤保留了一块“跳板”

1941年4月中旬，在区党委通知萧县党政机关随主

力东撤时，县政府行政科长许西连和秘书冯蕴言主动请缨留在萧东打游击。他们认为：一是皇藏峪山区有险可凭，二是还有一支“亢营”武装（营长叫亢为德，群众即称这支武装为“亢营”）可资利用。当他们向县长纵翰民请示时，纵很为难。同意吧，已来不及开会研究，也来不及向上级请示，自己作主，显然超越了权限。不同意吧，此乃深明大义之举，没有理由拒绝。纵翰民权衡利弊，勇于承担责任，断然决定把他俩留下来。这一有胆有识的决策，不仅保持了萧县抗日民主政权的连续性，也给恢复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留下了一块跳板。

萧铜地区（萧东与宿、铜等县相接的边境地区）横跨津浦铁路，北起铜山的三堡，南至宿县的夹沟，约60华里。路东多平原，路西是山地，峰峦起伏，林木茂密。该地区对日伪、顽、我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于日伪，它是华北日伪与华中日伪的结合部和交通咽喉；于顽，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向东进击我淮北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于我，它是我军日后反击日伪夺取徐州和西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矛盾异常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日寇为保护徐州及津浦铁路的交通安全，一向把这一地区划为自己的治安区，视为禁脔。在津浦路两侧，日伪据点林立，封锁沟、封锁墙密布，稍有风吹草动，便“清乡”、“扫荡”。津浦路徐州以南有三堡、四堡、桃山、曹村、

符离集等据点；铁路西侧有庄里、孤山等据点，铁路东侧有阚疃、路疃、永安、杨楼、赵庄、褚兰、石厢、贡山、张山、云衢等十个据点。总计有鬼子 250 人，伪军 4000 余人。

1941 年 4 月 23 日，许西连与冯蕴言带了四名通讯员由萧二区出发，夜宿白顶山朱皋浦家。次日，他们到了皇藏峪土盆村，与九区皇藏乡乡长徐明轩见了面。

纵翰民东撤后，对留在萧东的许、冯仍放心不下。他参加过边区党委领导人检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仁和集会议后，立即随四师派往宿东接吴芝圃的骑兵连赶到萧东。向他们传达了仁和集会议精神，肯定了他们坚持萧东的正确性，并帮助他们制定了坚持和发展萧东的方案。

1941 年 5 月初，许致远、王可风到了萧东。他们与许西连、冯蕴言、吴端胜、徐明轩等人商量后决定，由许西连、许致远两人去路东找师部。二许和两名通讯员出发的当天，在途中遇到亢营教导员朱德群。朱也带了一名通讯员，加上带路的董永德，他们一行七人，夜宿路东赵楼董永德家。第二天清早上路，走了七八里，遇到宿东办事处主任赵一鸣。赵听他们说要去找师部，就说：“情况很紧急，你们不好走，不如先到唐河南去找四师后勤部，雷明处长在那里。”他们中午到了唐河南，看到七八个人在庄外活动，原来就是豫皖苏边区联防委财政处长、淮上行署主任雷明。见面后很热情，雷处长一边安排警卫员准备午

饭，一边在树荫下听汇报。雷明对坚持萧东十分支持。他说，能够坚持一个区、一个乡，甚至一个保也是好的。今后，过路也可作个联络点，为收复豫皖苏根据地留下一块跳板。师部方面我去汇报，请求再派一些干部去，你们先做好准备。临行前，雷处长还给了他们500元流通券，作为活动经费。

许西连等人返回后，把雷处长的指示向同志们作了传达。大家的情绪很高，仿佛他们是从异国他乡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讨论时，大家觉得要坚持得有个名称，叫什么好呢？有人提议叫“萧东办事处”。虽说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已不存在啦，但还是要打它的旗号，办事处就作为它的一个派出机构。有了这个名称，民众就会觉得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犹在，共产党没有走，一些没来得及撤退的人员将会归来。萧东办事处的人员组成是：许西连任主任，原在皇藏峪一带活动的亢营副营长吴端胜任副主任，冯蕴言任秘书，皇藏乡乡长徐明轩任九区区长，乡队升为区队。

就在成立萧东办事处的当天，萧县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朱大同，凑了路北刘瑞岐和二区窦衍辉的人马，约四五百人，在金寨、草场一带活动，计划晚上进驻许西连他们活动的土盆村，趁许西连等人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

接到情报后，大家对情报进行了分析：有人认为，当时亢营仅有35人，加上区队和警卫人员也不过六七十

人，怎能对付四五百人？有人却认为，皇藏山多沟深，土顽地形不熟，夜间打个伏击，还是有取胜把握的。亢营副营长吴端胜也同意打。于是，先安排冯蕴言带领非战斗人员转移到寺后村，佯装过路东，然后部署战斗任务。由许西连、吴端胜、许致远率亢营一部埋伏在汪庄附近的峡谷中，朱德群带区队在皇藏峪南路口堵截。

晚上9时许，当许西连带领的部队刚到汪庄东边的东西大沟，这里还有一条南北槽子路，土顽正在这条路上行军。许西连在沟内刚把兵力展开，土顽先头部队已进入伏击圈。天很黑，十米以外看不到人。等土顽与我们相距六七米的距离，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手榴弹跟着甩过去。土顽突遭袭击，调头鼠窜。这时，附近几个山头也响起枪声，弄得土顽晕头转向。加上他们多是陇海路北平川地带人，不习惯山区夜战，很多人迷失方向，乱跑一夜，仍未出十里之范围。拂晓，一些顽兵在寺后村附近被我俘虏。朱大同逃到永堙寨南，白天又遇到日寇“扫荡”，弄得狼狈不堪。

这次进犯萧东，朱大同大败而归，把刘瑞岐的老四营糟蹋得很惨，连死带伤加逃跑，一共损失百余人。刘瑞岐十分恼火。相反，汪庄一战，却稳定了萧东，成为开辟萧铜游击根据地的奠基战。

雷明将萧东的情况向豫皖苏边区党委作了汇报后，区党委当即派随军撤退的朱玉林等十位同志到萧东组建

临时县委。萧东临时县委由朱玉林任书记，路少棠、王尚三、朱德群为委员。此时，萧东的处境极端艰难，日伪加紧伪化，土顽气焰嚣张，我方公开活动的地方很小，有人形容是“南北十华里，东西一弹穿。”为适应萧东的斗争形势，有利于麻痹敌人，使我们站稳脚跟，党的活动和各项工作都采取了隐蔽的斗争形式，原在萧县有公开身份的领导干部，也都改了名字。

萧东临时县委和办事处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亢营的一小部分和萧九区区队。根据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特点，部队的活动坚持以防御和隐蔽为主的方针，视敌情的变化而采取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使日伪的“扫荡”与顽军的进犯一次次扑空。当然，隐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寻找有利战机，打击来犯之敌。

第二节 坚持争吴缓刘打朱的方针

1941年7月，许西连再次去了宿东，与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见了面。吴听了许西连的汇报后，作如下指示：一、当前我们在萧东只是有个立足点，力量很弱，不能树敌太多，应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如争取谁，打击谁，缓和谁；二、应以灰色面目出现，争取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三、把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吴信容支队的工作。萧东临时县委、萧东办事处根据吴芝圃同志的指示，制定了

争取吴信容、缓和刘瑞岐，打击朱大同的斗争策略。之后，便派谢继恩去萧西与彭笑千、张舒民交换意见。他们亦同意这个策略。

争吴缓刘打朱，缓刘是关键。刘瑞岐是实力派，他原是萧县常备总队第四营营长，后与国民党派来的萧县县长朱大同一起另立县政府，组建萧县常备团，刘任团长。刘虽是与我们的主要对象，但他以前与彭笑千私交很深，彭回萧县后，他还想借助彭笑千的威望取朱而代之当上县长。他一时不会加害于彭，是我们暂时缓和的对象。缓和他，主要是争取时间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朱大同虽是光杆县长，但他反共积极。他原是中共萧县县委书记，叛变后当了国民党特务，处处与共产党作对，应坚决打击。耿（蕴斋）吴（信容）是受刘子仁鼓动而叛变革命的。吴的部队是萧县县委一手组建的，下级干部和士兵中党员较多。有彭笑千和张舒民在那里做工作，争取是有希望的。争取他们，也是扩大他们与刘、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斗争的开展。缓刘虽是缓兵之计，但操作起来必须讲究策略。许西连不顾个人安危，曾数次单刀赴会与刘瑞岐及其代表谈判。如卯山三次，梧桐两次，郝庄、庙山窝各一次等。

1941年7月下旬，在彭笑千筹划下，许西连到六区郝庄与刘瑞岐的代表郝晴瞻会谈。当时商定的中心议题：分疆而治，划分区域，联合抗日，停止磨擦。经过这次会

谈，双方矛盾得以暂时缓和。半个月后，趁刘瑞岐去九区西部卯山驻防，彭笑千、张舒民跟踪前往，约许西连与刘见面。许、刘会谈，彭、张在座。彭先说：“萧县人民在沦陷后一直是团结抗日的，后来发生了磨擦，现在应联合起来打日本。”接着，许西连发言。他郑重声明：“我是无党无派的，一直是打日本的，凡是抗日的都是朋友，只有日本鬼子和汉奸才是敌人。”刘瑞岐最后也表了态，说了一些以后一定要携起手来打日本的门面话。这一次会谈，进一步起到了麻痹刘瑞岐的作用。有一次，彭笑千、张舒民想利用刘的扩张心理，敲他竹杠。他们问刘：“你不是想吃掉萧东吗？现在他们有困难，需要你伸手拉一把。”刘说：“我能帮什么？”彭、张就势提出要钱5000元，刘给了3000元（法币）。钱捐给许西连后，许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要，可不要又不好，怎么办？于是，许就把钱转给了吴信容部。这样，既做了争取吴的工作，又起到了缓和刘的作用。

1942年春天，中共萧东临时县委书记朱玉林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路治久又举行了梧桐会谈。我方参加人员有朱玉林、李华农、许西连、冯蕴言，国民党方面参加的人员有路治久、纵止韩。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团结抗日，避免磨擦。国民党顽固派知道朱、李是共产党员，我方也是想让他们知道萧东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执行的是既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政策。

与刘瑞岐谈判一年多后，我们的地盘已由萧东而萧

铜、萧宿铜、萧宿铜灵了，武装也由六七十人扩大到 1500 人。1942 年 5 月，朱大同被日寇捕去。不知什么原因，不久他又从日军那里出来去了临泉汤恩伯总部。刘瑞岐于是年 11 月由顽常备团长接任国民党萧县县长后，就再也容忍不了萧铜的存在了。刘瑞岐先是给萧铜办事处捎信说，在萧西还可以平分秋色，现在萧东弹丸之地，就不必再较量了。继而发文告劝降，称自己“宽大为怀，念诸同志之所以误入歧途，实有不得已者。若能幡然悔悟，毅然归来，不惟不究既往，亦必量其才能分配职务。”萧铜办事处以文对文，托便人捎给刘瑞岐的书信内容是：“今寇焰方张，国人均应同仇敌忾，相御外侮……若醉心于内部磨擦，自相损蚀，止足贻侵略者以窥视之机，人民流离，水深火热，陇海沿线，当不例外……救亡之责，愿共图之。”

此信义正辞严，情真意切，颇有文采。在唇枪舌剑的谈判中，刘瑞岐不是对手，舞文弄墨亦逊一筹！

刘瑞岐岂肯认输，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不过，萧铜这时也不是势单力薄了，文来武来都能奉陪了。

第三节 把后勤建在敌伪据点周围

1942 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萧铜游击队不断扩大，部队供应成为大问题。这里又无巩固的根据地，后勤基地设在哪里，这是县委、县总队最为焦急

的问题。首先在原有供应人员的基础上,调配力量,组成总队供应处。新成立的供应处,在1942年中秋节后由供应处长岳纲瑚,陪同县财粮科长朱传真,在津浦铁路桃山车站东奎河边瓦房村村头场屋里,召开了总队供应处党支部支委会。会上,由朱、岳二人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加强供应工作的指示,研究了在异常复杂艰苦的环境下,如何保障近2000人的县总队和部分区队指战员的供应问题。季节行将进入冬季,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已刻不容缓。同时,也应立即着手解决部队的枪弹、医药、通讯器材和其它装备问题。从长远考虑,必须有几个后勤基点,比如被服缝制、染色基点,枪弹修配、铸造基点,伤病员安置基点,医药器材储存基点等。选址条件要求:既要安全隐蔽,又要便于开展工作。这都是要急于解决的问题,但解决问题关键在党组织,关键在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支委会的认识。通过会议,党支部把支委的认识统一了起来:要随时掌握敌情变化,时刻想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要坚定地依靠党,依靠人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完成任务。随后,在地方党政机关的配合和支持下,经总队政委寿松涛、副总队长顾寒星等负责同志实地察看,供应处在沿铁路、公路和敌伪据点附近的十多个村庄设置了后勤基点,五天之内便投入工作。

被服缝制选了两个基点,一是小店子村,二是马湾

村。小店子是个既散又小的村庄，约30户人家，在铁路东半里路远。庄东边二里多路就是公路，两边都是敌伪据点、碉堡，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干工作。选址时，当地群众很支持，缝纫间设在军属万世贞家套院内。由岳邦胜、欧道升带领群众挖地下室，约九米见方，一人多深，能放下两台缝纫机，一个裁剪台，五位同志在里面工作。上面用木棒、席片搭起来，复上土，留一个小洞当门。土上面用捆好的高粱秸堆垛伪装。动工和伪装时，房东、近邻和村干部都参加干，甚至50多岁的赵大娘也主动帮忙。为怕挖出的鲜土有目标，连夜装上牛车，上面用牛粪盖上，当作肥料送到湖地里去。村里的救国会员和群众千方百计支援供应处，为的是让部队早日穿上棉衣。这种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连从伪区新动员来的带来缝纫机的王典华技师都说：“我们要努力完成任务，更好地为前方的同志服务，以报答老乡们的关怀！”由于地下工作间潮湿，工作几天后，同志们的脸色由黄变白，眼圈也黑了，但大家都以忘我的精神工作，谁也没怨言。缝制好的衣片连同布匹，都存放在军属赵家的一个夹壁墙内。

染布点选在离桃山车站只有三里路远的桃山村。全村300多户人家。村中有北到徐州、南达宿县的公路，伪军据点就设在村北头，西面铁路边设有日伪的碉堡，西北角三里就是桃山车站据点，南面十里就是曹村据点，还设有伪区公所。染布点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这

个村的群众基础好，仅参加游击队、武工队、救国会的就有近百人。过去在这里曾隐蔽过伤病员，群众曾代我们保存和采购过药品、布匹、弹药、军用器材等，还经常护送部队、干部、交通人员过铁路。染布点设在佃农凌雨家，把他家靠公路边的墙头加高，套个小后院。为避免煮布时烟向天上冒，就在锅灶旁砌个向下出烟的烟囱，地下挖一条半公尺宽，100多公尺长的斜坡，通向村东边小河的水面上散烟，烧柴也尽量用干的。当时，染料也因敌伪封锁采购困难，供应处就通过地方各级政府及救国会员，发动群众收集一部分锅灰，掺些染靛将布匹煮成灰色（当时军衣要求是灰色的）。他们白天染晒，晚上分散保管运往缝纫点裁剪。

被服工作还包括弹棉花，那是在马湾一带进行的。缝制点制成棉衣片，连同弹好的棉花，由专人运往铁路两侧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由各村妇女救国会组织妇女缝制棉衣。就这样，终于赶在立冬前后，把部队的冬衣全部发下。然后，再赶制子弹袋、马背套等装具，以完成部队所必要的补给。

枪弹修造所选在望州河与奎河之间的望州湖、姚楼、柳庄、海子等几个离敌据点较远、易于转移的村庄。由张云航、许致远等人负责。开始，先搜集国民党部队撤退时丢弃的枪炮零件和弹药，又东拼西凑安装了几件简易修械工具，技术人员也逐步增加到十人，可以修配一般枪支

了。修造所的隐蔽地，虽离敌据点较远些，但仍属敌伪“控制区”或“半控制区”。为了安全起见，工作人员有时白天干，晚上分散隐蔽；有时晚上干，白天休息。无敌情时，可以在一个村子连续住几天，有时一宿几挪。寒天和阴雨天，大都住在偏僻村庄的农民家里。夏天，大都在树林、山沟或庄稼地里宿营。每天黎明，先派人到村头看标志，再到联络地点集中。如发现村头有敌情标志，则继续隐蔽。技术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组织上总是把他们的生活调剂得好一些，有困难优先帮助解决，技术员和老师傅积极性都很高。萧铜总队东亢、西亢两个营的 12 挺机枪，有一半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通过各种渠道与关系购买和搜集零件拼凑而成的。后来，修造所不仅能修配枪支，还能拆卸日军扔下未爆炸的炸弹，用于制造手榴弹和炸药包。再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利用子弹壳加工成子弹、枪榴弹等，来弥补部队武器弹药之不足。

修造所后来发展到 30 多人，除技术人员外，大都成为多面手，既当修配员，又当采购员，还是战斗员。在一般情况下，修造所的任务是为部队服务的，后勤单位没有战斗任务。可是，为了适应千变万化的情况，除技术人员和保管员外，许致远将其余十余人组成一个游击小分队，由他带领，有敌情先隐蔽起来，视其情况，可打就打，可扰就扰，目的是保存自己，限制敌人。

伤病员医疗点，较重的伤病员安排在交通线两侧。如

放在马湾、东高庄、寺后、杨堡、王山、陈贾庄等村，隐蔽在群众家中，经常派医务人员去治疗。日伪顽搜索时，就隐蔽在夹壁墙内或转移到沟湖、草地中。伤势较轻的组成流动小医院，随卫生队留在比较稳定的奎河、望州河边的石厢、祖沟寺、王村、赵楼等地。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搞些草方、单方及代用品为伤病员治疗。总之，医护人员不辞辛劳，尽一切可能让伤病员减少痛苦，安全休养，使之早日痊愈，重返战场。

第四节 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游击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把本属于战术问题的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从战略高度看待敌后游击战争。这一指导思想对于开辟萧铜游击根据地的实践至关重要。萧铜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附近和铁路两侧不易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萧县党组织在抗战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游击战略思想的结晶。

萧东初创时，该地区不仅处在日伪的枪口下，还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豫皖苏边区党政军东撤后，只留下许西连等少数几个人在萧东。他们七拼八凑，也只有

“南北十华里，东西一弹穿，武装一个连，干部十二三”的家底。凭此家底，要在日伪顽并存的险恶环境里，在日伪据点的空隙和弹道之下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根据地，大家的信心不足。许西连就用唯其力量单薄、不显眼，才不致引起日伪顽的过分注意，这样反而易于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的道理开导大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虽然艰苦，但正由于山多沟深路险，交通不便，才更利于游击战的开展。还是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萧铜的做法，正是毛泽东这一游击战略思想的运用。

在萧铜，无论是部队，还是区乡武装及县委、办事处工作人员，很难能睡个安稳觉。因为要说敌情，时时处处都会发生敌情。一天凌晨，我们的队伍要转移，我们在这边站着，对面也站着一支部队。我们的同志想叫他们靠拢，不敢大声喊，就小声地说：“过来，过来。”喊了好几声，老不过来，我们的同志就着急地跑过去看看。一看是鬼子，头上戴着钢盔。鬼子听见我们喊话，为什么也不过问呢？原来，他们常带一部分伪军出发，认为这边站着的是伪军，是他们的人。大家知道了对面站着的是鬼子，就小声传话：“是鬼子，是鬼子，赶快转移！”直到部队离开了庄子，认为鬼子追不上了，才开枪射击。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萧铜的武装之所以能够聚则成军，散则为民，关键是能与民众打成一片。虽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县委与办事处仍不忘关心群众疾苦，改善人民生活。初到皇藏峪附近，地盘很小，国民党顽固派常来袭击，部队不敢驻在庄上，只好睡山沟、蹲苇棵、蹲水坑，甚至连开会、吃饭都得设岗哨，经常是一日战斗数次，一夜转移多处，不仅几无宁日，而且几无宁夕。尽管如此，部队仍能以模范的纪律、优良的传统影响人，以英勇无畏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人，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区乡武装、县委及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和部队一样，除冬季大风雨雪天气外，大部分时间夜宿山岗、田野、青纱帐。敌情严重时，就分散到敌伪据点附近的群众家中隐藏。大敌当前，县委与办事处每出台一项政策，既要照顾群众利益，又不能对上层人士刺激太大，否则就把他们吓跑到敌人方面去了。如执行“双减”政策，就是从实际出发，只提“让租让息”，不提“减租减息”，使政策尽量缓和一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农民都组织到各种救国团体中去。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游击队活动时就可获得较大的自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来不及走时，就化整为零，使敌人难辨是兵是民。在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使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初组连，继为营，后扩为总队。

由于我们长期处于日伪顽夹击、腹背受敌的环境里，

在巧于周旋中，也摸出了一些规律，探索出了一些应对复杂环境和敌情的方法和措施。比如，发挥狗的作用。根据日寇惯于白天侵犯而怯于夜战，国民党顽固派怕在白天与日伪遭遇，则常于夜间偷袭的特点，动员民众按照我们的要求养狗。以官桥向南至眇沟的一条公路为界，公路以西，靠西山所有大小村庄，号召各家各户都要养狗；而公路以东，靠东山以及津浦铁路两侧的所有村庄不要养狗。因国民党顽固派由西向东夜间向我进犯，经过西山的村庄时，狗吠声可为我军传递情报。萧铜西亢夜间宿营基本都是在靠东山的村庄，无狗叫可使我军夜间活动寂静无声，不易为敌发觉。同时，这些村庄也可悄无声息地去向我军报告敌情，可打则打，须避其锋芒则避之，能够掌握主动权。

再如，相机利用第三者的力量。在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中，两军交战，相机利用第三者的力量，这是一种机动灵活的战术。1942年11月，刘瑞岐亲率王传绶、赵永和两个支队向我皇藏峪大举进犯。他们驻土盆、纵窝、陈林、五眼泉一带，连营六七里，企图一口吃掉我们。路西我部避其锋芒，转向曹村、桃山日伪据点戳了几枪。于是，曹村、庄里的日军出动，分东、西两路包围皇藏峪。顽军一枪未发，仓惶而逃。我军以逸待劳，在其退至龙岗山口时教训了他们一下，毙、伤20余人。同时，根据日军活动规律，一般是出发时，刚从各地调集而来，其势汹汹；返回时，则

分散返回原防地，比较松懈。这次，我军尾随其后，亦毙、伤日伪军十余名。我军因运筹得当，巧借了第三者的力量，使顽军与日伪都受到了损失。

1943年3月，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和三十一集团军副司令王仲廉部，妄图东西夹击新四军四师和淮北抗日根据地。韩由东向西进攻，王由西向东应援。萧铜总队奉命在徐州南津浦路线三堡、桃山、夹沟等要道阻止王部东进。我们采取发动民众在津浦路两侧广贴标语的办法，大造“欢迎国军进攻徐州”的舆论，造成徐州日军极度惊慌，遂派装甲车沿铁路线日夜巡逻，王仲廉部被迫绕道宿南过路。待王部到达路东时，韩德勤部已被新四军四师全部歼灭，韩被生俘。王部又匆忙返回路西，途经萧铜地区三堡附近，遭我路西区队袭击。王部不敢恋战，仓惶西逃，沿途丢弃许多枪支弹药和马匹，均为我区乡队所获。

正因为萧铜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才使日伪无奈我何。土顽刘瑞岐、王传绶部，更拿我们没办法。刚开始，他们认为萧铜不过弹丸之地，不堪一击，经多次交手后，才知道不好对付。部队大规模进攻吧，必引起日伪警惕，则调集兵力袭击，难于立足；小股窜扰吧，萧铜县、区、乡队则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将其消灭或赶走。萧铜游击根据地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节 整风与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萧铜地区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当游击队和游击区有了一定发展以后，就挤出时间或在战斗的空隙开展党内整风和组织民众工作，这当属于巩固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战胜敌人，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2月在党内作了两次关于整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不仅在延安存在，在地方也有不同的表现。这种不良风气，不仅影响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也影响了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整风的关键是要解决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萧铜地区的整风从1943年初开始，分工县委副书记王学文(姚克)去抓。按照上级规定：区以上干部到淮北区

党委轮训班学习，乡支书到地委轮训班学习，其余党员干部采取集中学习、专人辅导的方式，或分期分批办轮训班的办法。因战时条件所限，这里的整风学习尚达不到上级要求。直到1943年8月，邳睢铜地委才召开地方区以上干部和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华中局和区党委重整“三风”的指示，始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

萧铜的整风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萧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表扬好的，批评差的，使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有了明显改善。大家联系实际回顾过去，认为萧铜从许西连决定留下来打游击，到争吴缓刘打朱方针的制定，再到向东发展战略方针的确立，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是马列主义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今后，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结合得紧，结合得好，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参加了延安整风学习的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同志，在给区党委写的信中，对淮北区五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反省。此信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对大家启发很大。他表扬了萧铜的对敌伪工作，同时指出：对于这些良好的工作萌芽，没有追根究底地加以钻研，找出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把它由感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的东西，以便再回到实践中去，推动我们的事业和继续丰富我们的理论。这既是刘子久对工

作的反省,也是对萧铜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整风促进了萧铜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发动和组织民众方面,成效显著。开始,只是在萧九区的土盆、小山口与铜七区的桃山一带,建立较隐蔽的农民互助会,发动和组织农民向日伪开展减轻负担的斗争,在农民之间开展一些互助互济活动。当游击区有所扩大以后,在发动和组织农民方面又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如减租减息,在我方“一面政权”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在敌我共管的“两面政权”地区,实行让租让息,尽量让政策缓和一些,不要把地主吓跑到敌人那里去;在纯粹敌占区,就发动群众向敌人要民主,减轻负担,改善生活。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农民互助合作,成立了变工队,帮助贫苦农民和军烈属搞好生产。一些地方还组织了铁、木、泥、石公会,把广大农民逐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再引导他们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1944年,通过“双减”、“双让”,新发展农救会员5000多人,新组建民兵2000多人。组织起来的农民,把生产、支前工作都作为抗战的实际行动。

在开展党内整风期间,同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部队除帮助农民生产外,还用武装保卫农民成熟的庄稼,并帮助农民制订兴家计划。对缺耕畜、缺种子的生产组(户),以及搞副业缺本钱的生产组(户),政府还支持一部分无息贷款。征收公粮,实行按定产计征,超产部分免征农业税。在农民中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由积极性焕发出的创造性，卓有成效地贯彻了党中央“发展生产，保障供应”的经济工作总方针。

第六节 萧铜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

上级党的重视与支持，对一个地区的坚持与发展至关重要。三年里，在异常险恶的环境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萧铜能够坚持和发展，先是把敌人的严密控制区变成我们隐蔽的游击区，并逐步发展成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级党委三次派来干部，给萧铜的各项工作带来了三次大踏步进展。当然，这也是外来干部善与本地干部合作共事、亲密团结的结果。

许西连、冯蕴言于1941年4月23日到达萧东，他俩都是民主人士，没有党的领导不行。于是，许西连在5月上旬去宿东找党的领导。区党委当即派随军撤退的朱玉林等十位同志到萧东，成立了临时县委。临时县委除与萧东办事处一起抓好武装、政权、敌工、统战工作外，侧重抓党建、群团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临时县委成立前的一段时间内，亢营进入萧铜边境，战斗连连失利，战士们情绪低落，有的跑回了家。现在看到有威望的地方领导来了，纷纷归队。路西撤退时，未来得及撤出的同志，也主动找来。因此，部队发展很快。自1941年5月到11月，在半年的

时间里，部队由六七十人扩大到 400 多人。

第二次派干部是 1941 年冬，萧东临时县委派交通员戚继升（外号老套筒）给淮北区党委和四师送信。区党委和师首长接信后，知道萧东已站住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于是，派九旅二十五团政治部主任顾寒星、指导员范文典、刘明川、滕乃彬随赴宿东的张震参谋长去萧铜工作。顾寒星等人临行前，受到师首长彭雪枫、邓子恢的接见。师首长告诉他们：一是在萧铜活动的“亢营”营长亢为德被捕后，副营长吴端胜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你（指顾）要依靠萧东临时县委接任营长，并作长期坚持的打算。二要团结好许西连、冯蕴言、张舒民等同志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三要向东发展，以开辟路东为主，坚持路西为辅。顾寒星到萧东后，依靠地方党组织顺利地接任了营长职务。该营亦划归九旅二十五团建制，为独立营。随去的范文典任营副教导员，主要负责路西整编后的一、二连。整编后的五、六连驻路东，县委与办事处随营部活动，在路东路西各留一负责人组织领导。不久，萧东临时县委改为萧铜县委，萧东办事处改为萧铜办事处。

确定向东发展的依据为：因为路东东靠淮北、北靠邳睢铜，南靠宿东，这三处的党组织均可给予支持，发展下去可联成一片，便于结束孤悬敌后的局面。向东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不再单纯地以“灰色面貌”出现和完全以隐蔽形式斗争，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隶属于九旅二

十五团,也可得到九旅的直接援助。

1942年3月3日,萧铜独立营奉命配合九旅进攻灵璧张小圩子,全歼赵觉民、许志远部,生俘灵璧县顽县长赵觉民、顽十七纵队司令许志远。我独立营第一次配合主力作战,大获全胜,兴奋异常。在返回途中,乘胜又拔除了赵庄伪据点,并迫使杨楼据点的伪军逃离。这样,就把路东铜七区南部与萧十区西部,以及宿县的股北区联成一片,在南北40华里,东西20余华里,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无敌伪据点,为向东发展,扩大根据地建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42年9月,淮北区党委和师首长为加强对萧铜地区的领导,派来了寿松涛、孙朝旭、童振铎、程祖光、李学治、李秉枢、刘为敬等。寿松涛到萧铜后,传达了区党委和师首长的指示:萧铜地区改为萧宿铜灵地区,组建萧宿铜灵县委和萧宿铜灵县政府,将宿县股北区划归萧宿铜灵县(以下简称萧铜)领导。将萧铜独立营改为萧宿铜灵总队(以下简称萧铜总队),股北大队归属萧铜总队建制。萧铜总队下辖三个营:路西部队改为总队第一营,路东部队改为第二营,股北大队改为第三营。干部任命是:寿松涛任县委书记兼总队政委,许西连为总队长,顾寒星为副总队长,孙朝旭为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李秉枢为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刘为敬为一营副营长,范文典为一营教导员;李学治为二营营长,蔡书仙为副营长,王亦平为二营教导

员；张怀禄为三营营长，冉宪义为三营教导员（后为程祖光）。经过这次调整和兵源补充，每营约500人，整个萧铜总队有1500余人，成为坚强的萧铜地区主力部队。

在萧铜总队基本上能够独立支撑这一地区的局面之后，九旅因另有任务，于1943年5月调离萧铜地区。这时，日伪顽又卷土重来，气焰十分嚣张。总队干部战士以及群众一时产生埋怨情绪，责怪主力不该撤走。上级指示：应抓紧解决干部战士依赖主力的思想，树立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思想。要集中力量，寻找战机，打一两个胜仗，提高部队的士气和信心。并将萧铜地区和萧铜总队划归三分区（邳睢铜）领导，以便得到及时的指挥和支援。

1943年六七月间，路东官庄之顽沿奎河两岸向我栏杆、孟寨驻地进攻，并有时村日伪出动配合，经刁白山向南向北夹击我栏杆、孟寨部队。路西王传绶部约两个营的兵力向我一营驻地皇藏峪进攻。显然，这是路东、路西顽军有计划且相互配合的一次进攻。三军分区赵汇川司令员统一指挥主力一部和萧铜总队二、三营，在奎河岸新庄桥向顽军展开激烈反击战，将顽击退。南路亦击退时村之日伪。路西我一营在副营长刘为敬率领下，向占领皇藏峪制高点胖妈顶之顽展开激烈争夺战，拼搏约两小时，顽不支溃退。我部队路东、路西两战皆胜，遂提高了士气，坚定了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信心。

萧铜总队战斗力不断增强，不仅能有效地防御，也能

主动出击。1943年7月27日，总队集中一、二营，把担任前卫的一个连化装成顽军，夜袭永堦顽驻地，在梧桐村与刘瑞岐纵队的赵永和支队相遇，激战一小时，毙、伤顽十余人，俘20余人，获步枪20余支，机枪1挺，战马5匹。1943年10月，路西土顽三个支队倾巢而出，分南北两路向皇藏峪山区进犯，扑空后撤回二区梧桐。我一、二营尾随至梧桐附近，拂晓前突袭王传绶部，除打死打伤者，俘顽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余支。

两次主动袭击顽军，均出奇制胜。萧铜总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邳睢铜军分区将萧铜总队上升为军分区独立团。萧铜又将总计约2000人的各区、乡队，除留一小部分外，分编成三个营，组成新的萧铜总队。总队领导干部未变。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政权建设也日趋完善。1944年4月15日，在奎西区郑楼村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萧宿铜灵抗日民主政府，选举许西连为县长。大会通过了年度财政预算和公粮累进征收办法，同时对县政府的组成人员作了安排：秘书冯蕴言、任慎修；民政科长张舒民，副科长张立轩；财粮科长朱振东、副科长徐明轩；教育科长王可风，副科长杨化龙（杨兴瑞）、王祥义；司法科长孟振声，副科长谢继恩；公安科长张建淮。至此，萧铜已成为横跨津浦铁路，辖9个区、50多个乡，方圆百余里的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第八章

淮北地区对敌伪工作的一面旗帜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萧铜横跨津浦铁路,靠近陇海铁路,属日伪的严密控制区。它不仅处于日伪的枪口下,还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在如此险恶的环境和条件下,萧铜能够存在和发展,与其对敌伪工作做得好是分不开的。萧铜党政军各层次人员,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了对敌伪工作。卓有成效的对敌伪工作,有力地支持与配合了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受到毛泽东赞许的对敌伪工作

1944年,时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子久,在延安中央党校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理论联系实际,于7月5日给区党委写了一封信,信中提

到他在淮北区党委工作期间的几个问题。此信在给区党委之前，毛泽东同志看过，认为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遂委托新华通讯社向各抗日根据地广播，还将该信作为整风参考文件。《解放日报》于是年7月27日全文刊载，并印成单行本发行。

刘子久提到的几个问题中，有一条就是要追根究底地总结萧铜地区做好对敌伪工作的经验。他说：“我回想起来，我们过去的工作当中，曾经有过不少的好东西，如几年来，宿东、萧铜的敌伪军工作……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良好工作的萌芽。中央就是从这种萌芽状态东西的研究中，找出了对敌斗争……等各种指导方针，各地并根据着这些方针，作出了辉煌的成绩。”刘子久十分惋惜没有把这些好东西总结出来，用以指导工作。他认为，这是不能很快提高、进步太慢的原因。

对于做敌伪工作的重要性，淮北区党委的认识很高，把它作为敌占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工作。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被迫参加太平洋战争。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审时度势，一个月不到，即于1942年1月1日发表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一文。文章指出：“部队党与地方党应把这项工作（敌伪工作）提高到第一等地位。”是年12月28日，由淮北区党委、四师政治部联合发出的决定中，要求“今年一年，应该把敌伪军工作及敌占区工作提到空前的极重要地位，要把一半以上的力量用在敌伪工作上。”萧

铜就是根据这些部署,全方位地开展了对敌伪工作。这也是因为萧铜的处境,不做好对敌伪工作就很难生存。当时是被国民党顽固派赶到日寇的枪口下,即赶到日寇军事要地徐州附近、津浦铁路两侧,想借日寇的手把我们消灭。因此,萧铜别无选择,只有创造性地做好对敌伪工作,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敌后游击战。

淮北区党委在1942年12月28日的决定中还特别强调:“做敌伪工作,专靠几个党员干部是完不成任务的,应该克服宗派主义观点,运用党外人士,利用他们的旧关系去做敌伪工作,应吸收他们组成工作委员会去领导这一工作。”萧铜县委书记寿松涛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特别是考虑到这一地区最初就是由几位民主人士坚持斗争的背景,迅速成立了萧铜工作委员会,把几位关键的党外人士吸收进来。报请上级党委批准,由共产党员四人(寿松涛、曹介、孙明远、顾寒星)、党外人士三人(许西连、冯蕴言、张舒民),共七人组成,寿松涛与许西连分任正、副主任。这个工作委员会,不唯做对敌伪工作,凡萧铜应兴应革事项均由这个委员会研究决定。

萧铜县委大胆任用党外人士,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更加相信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部队和地方政权的整顿得以顺利进行。并清除了不坚定分子,团结了各层次的人士,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萧铜的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合作堪称典范。在地方

部队和政权中，除少数几位外来干部外，大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党充分信任、重用、保护他们，使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他们不仅在对敌伪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建军建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萧铜工作委员会首先分析了伪军的组成成份：他们是历史剧变中出现的一群乌合之众。其中，有甘心供敌驱使的爪牙，有混水摸鱼的不良分子，有苟全生命的青年，也有不明大义浑浑噩噩的农民，等等。他们各有各的社会背景，各有各的特殊关系，不能概以罪在不赦而论。他们当中不少人中华儿女天赋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只要晓以民族大义，动以同胞之情，是能够唤起知耻知哀良心的，是能够达到“化阻力为助力”之目的。但对于民族败类，决不姑息，必采取断然之手段。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伪军组织采取的方针是：控制两面派，争取同情者，组织革命的两面派，打击最坏的汉奸。提出的口号是“不打好人，专打坏蛋”。要求把任何一个能利用的关系都利用起来，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一点一滴也好。

皇藏区区长徐明轩与伪曹村区区长杨光沂有亲戚，皇藏区、曹村区本属于萧九区，人熟地熟，徐重点做杨的工作。杨光沂是乡间知识青年，有爱国心，是当地地主为保家产把他推举出来应付日本人的。我方也想要他敷衍一下日寇，不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他很精明，各方面都应付自如，特别对我方帮助很大。我方人员往来曹村

车站封锁线畅通无阻。他还给我们送情报，购买军用物资、营救被捕人员。有时，我们的伤病员一时转移不到皖东北的就在曹村治疗。许西连曾说过：“在日伪据点里，我军可治疗伤病员，这在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罕见的。”曹村区队，三分之一的人员是我们派进去的，里边有我们情报站的人员。敌伪据点已基本上变成我们的据点。

萧县党政军东撤时，曾留下以戴世雅为书记的秘密县委。由于国民党县政府控制太严，无法活动，不久便撤向路东。在萧西建立秘密党组织的任务，后来就由我们派进路西顽方腹地祖老楼伪据点的谢长荫承担，谢在据点内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为了加强领导，萧铜县委于1943年夏天又派县委宣传部长沙效葛化名去该据点领导萧西党的秘密工作。耿吴刘叛变后，吴信容支队的地下党支部就隶属其领导。祖老楼据点的情报站，也是我方路西情报的主要来源。在成立秘密县委前，曾先在二区部署了撤退后的隐蔽斗争，留下区委组织委员郑忠勤任区委书记。为了留下他，还做了一场“戏”。他开了“小差”，我方派人去他家，把他五花大绑带出庄，后来转移时，他又“跑”掉了。就这样，他也没有呆多久。实在呆不下去了，他通过关系去了萧城，在那里找到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张笑仙。张笑仙是受淮北区党委刘子久的指派，从南京转移到萧城的，公开身份是伪萧城模范小学校长。这一层身份还不行，经过组织同意，他又担任了汪精卫的三青团萧县委员会组织

部长。张留下了郑忠勤，共同做有关伪县政府的情报工作。

以上的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同情者，如杨光沂。一种是我们派去的内线工作人员，以两面手腕取得日伪的信任，实际是做我们的工作，成为革命的两面派。以上两例，在一个县来说，也称得上是做上层的对敌伪工作。

本来是顽方把我们逼到敌伪据点前，我们却利用敌伪据点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威胁是顽伪配合或顽伪合流。他们有时是无言协定，暗中勾结，一经发现，必须坚决予以铲除，以免养痍遗患。

在萧铜，要做好对敌伪工作，首要任务就是摸清敌情，分清伪军组织哪些该拉，哪些该打，怎么拉法和打法。萧铜工作委员会认为：沿铁路的小股伪军、伪路警、伪区队，多是本地人，工作好做；大据点的伪军，经常换防，工作难度大些，但仍可以利用群众接触他们的机会，去宣传我们的政策。对比较明智的，我们就与之建立关系，对不明智且外出骚扰的，待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就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曹村附近有一岗楼，新从外地换防来一小队伪军，不仅阻碍我军政人员过往铁路，还经常扰乱地方秩序。我方曾发出两次警告，他们都不予理睬，总队决定拔掉它。我方组织了20多人的便衣队，每人配手枪一支，大刀一把，手榴弹三枚，电筒一个。通过地下工作人员摸清地形、地物，于晚间11点左右，先由两名队员将岗楼的哨

兵生俘，令其带路进入岗楼。在十分钟内，不声不响，一枪未放，将熟睡的伪军全歼。数日后，日军又派来一个小队。这个伪军小队长还算明智，他换上便衣，亲自找到我方人员，愿为效劳。

有一次，投敌的马海川支队二营驻扎在曹村附近，负有看护铁路的责任。不少人提出要吃掉它。萧铜总队考虑，铁路线是日寇控制最严密的地方，不仅铁路两侧挖有十米宽三米深的堑壕，壕沟外边架有铁丝网，每公里还设有岗楼一座，大小路口不分昼夜都有双人站岗，消灭了这个营，日寇还会派来另一个营。该营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吃掉它不如留住它对我们有利，于是决定保留这个营。

第二节 萧西党的领导机构设在敌伪据点

祖楼靠近萧永公路，是萧县西南的重要集镇，历来是军事争夺目标。1940年11月，日本鬼子在这里设了据点，看护公路，扼住咽喉。当时，县委就想派人打进去，意在夺取领导权，把敌人的据点变成我们的据点。

年底，形势急变，耿吴刘叛变，国民党20万大军压境，接着是涡北三个月反顽斗争失利，县委指示三区将祖楼、湘山两乡的党员有计划地打进去。首先是祖楼乡党员苏步周打入据点，张祚升、任伯宇、朱永章、陈行坦不久也

打了进去。

东撤前，四区已根据县委指示，让区委书记张祚兴去了他幼年学手艺的濉溪镇某村隐蔽，参加萧县地下县委的领导工作。由单线联系的党员张祚印任四区地下党书记，把原乡支书谢长荫安插在祖老楼据点，原五营三连副连长刘世卿打入青龙集附近的王楼据点。为了掩人耳目，由先打入祖老楼据点的苏步周带人把谢长荫抓进据点，强行入伙。谢长荫又设法把刘世卿安插到王楼据点。原四区堰头乡乡长谢庆露在当地已无法活动，也由谢长荫安插在王楼据点。据点内的党员与外界党组织联系，联络地点是三区的程庄、火神庙，四区的邱庄。随后打入祖楼据点的还有刘长培、刘德茂、刘先斌、刘长修等。1940年12月30日成立党小组，谢长荫担任组长，党员有苏步周、张祚升、刘长培、刘长修、刘先斌、刘德茂、朱永章等。

东撤时，上级党组织对祖楼据点内的党员提出五项要求：一是思想上要明确祖楼是战略要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斗争到底。二是“灰色”自己，认真做好交朋友工作，要求每人至少交三个朋友。采取兵对兵、将对将的方法，因人因地制宜。三是防顽打入。四是设法搞经济收入，为党的活动提供经费。五是撤到目的地后，再派人联系。

东撤后，据点内的党员向外联系地点也有变化，一是濉溪河北菜园张哑巴家，找戴世雅联系；二是濉溪南丁楼

找戴世雅、王继珍联系。在萧县地下县委并入萧铜后，联系地点改为曹村西北七里店中药铺，找张祚兴、张祚俊联系。在据点内部，党员也是单线联系。如苏步周对任伯宇，张祚升对朱永章、蒋相文，谢庆露对刘德茂，刘长培对刘先斌，谢长荫对刘长修和“萧支”地下党支委朱达川、郝长顺、姜云等。

各地党员之间联络地点有三处，一是梁巷梁浩斌家，二是谢庆露家。谢的爱人给据点磨面，经常利用送面传递信息。谢的七岁小女孩谢荣，出入据点无人怀疑，可以随时送信。此外，磨面有盈余，有能力招待过往的同志。这里已成为三、四区及萧支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经常与据点的党员碰头的地方。另一个联络点是板桥村刘长修家的中药铺。联络方法也经常变换。有一次，朱达川、郝长顺等同志为了给祖楼党组织取得联系，用两个人抬一架盒子，以送礼的方式顺利进入据点。

我党政军东撤以后，顽军乘虚逼近祖楼，千方百计向据点内渗透。我方个别人也因形势变化产生动摇。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加强据点内党的领导，1941年7月在祖楼据点建立了秘密党支部，谢长荫任书记，谢庆露任组织委员，张祚升任宣传委员。此时，因苏步周的叛变投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陈品诗是三区区委派来的秘密工作人员，其子陈兴坦，原任祖楼乡乡长，也随父来到据点协助工作。有一天，苏步周邀陈品诗去苏柘园顽方人员苏武斌家

商谈统一战线问题。临行前，谢长荫曾提醒他们：搞统战要坚持原则，学会保护自己。陈品诗到苏柘园就被顽军扣了起来，接着又把陈品诗的二儿子陈兴坦、大儿子陈兴露抓去，父子三人均惨遭杀害。

1942年秋，苏步周又向谢长荫、张祚升传送苏武斌的话说，北政府限三天期把据点内的自卫队拉出去，不然后要拔掉据点，不唯杀本人，还杀家属。许诺自卫团到北政府维持原编制，每人官升一级。谢长荫让他先召开班以上人员会议说明白。在会上，也有人说按苏的计划行动。苏步周说：“我明天就去北政府联络，让他们来接应。我去后三天就回来。”苏走后，谢长荫和张祚升连夜找谢庆露商量，决定趁苏步周去北政府期间做好工作。他们首先召开党员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挫败苏的阴谋。然后分工负责，个别串联，说服大家。其次，准备迎战。立即着手修复工事，挖单人掩体，擦好枪，充实子弹，同时将情况告知伪区长、自卫团长冯兆祥。冯立即指定张祚升负责全面指挥。第三天，苏步周回来了。由张祚升缴了苏的手枪，下了他的洋刀，把他监视起来。伪区长也把情况告诉了日本人。晚上11点钟左右，顽军准时进入祖楼东门外寨墙沟。张祚升指挥机、步枪齐鸣，顽军还了大炮、机枪。日本人听到枪声，也开了炮。顽军听到炮声撤退，苏步周乘机带两个伪军逃走了。苏步周策反未成，顽军也不再相信他，让他在顽方干了几个月事务长了事。

相山乡顽乡长谢鸿勋曾威胁本乡的共产党员到乡公所办自首手续，祖楼据点内的党组织知道后，就给谢写信。信的大意是：这几位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你们假若威胁迫害他们，我们绝饶恕不了乡公所所有人员。顽方接信后，连忙捎信给谢庆露说好话，一再表示，决不威胁。

我党在据点内的工作指导方针是“隐蔽自己，保存实力，抓枪杆子、印把子，防顽打人”。在抓枪杆子方面，原据点内自卫团副团长由苏步周担任。苏投顽后，日伪县政府派孙金波担任。党员张祚升等人抓住机会给他交朋友，有意给他一些方便。在孙调走前，就向自卫团长冯兆祥建议，说张祚升有军事才干，他走后让张任副团长。不久，张祚升提为副团长。他会同冯兆祥又提拔了一批下层小头目。一时，自卫队的小队长，正、副班长，大都由秘密共产党员和靠近党组织的忠诚群众担任。当自卫团长冯兆祥的卫兵王玉朴被顽方人员骗到祖楼西门吃西瓜，假借看看他的二十响驳壳枪，用他的枪把他打死后，冯与顽方的矛盾加深。此时，顽方到处散布“祖楼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的舆论。秘密党员就请冯喝酒，想试探他的口气，看他是否有所觉察。冯酒后说：“在这样的年月里，要凭良心，福庭（谢长荫的号）咱爷们都是老邻世交，两三代人都相处很好，友谊深厚，今后做事也还是要靠朋友帮忙。”他说得很动情，并没有怀疑谁是共产党。顽方的恶意宣传并没有起作用，倒是我们提醒冯“利用朋友关系保护自己”

起了作用。

1943年,根据需要,秘密党支部进一步充实了支部组成人员,支部书记仍为谢长荫,委员有谢庆露、张祚升、刘长培、刘德玲。这年冬,支部研究决定,由谢长荫去萧东找萧铜县委汇报工作。谢长荫通过关系过了两道封锁线,在萧东找到了萧铜路西工委委员张祚兴与张祚俊,向他们汇报了工作,并分析了苏步周投顽后可能带来的危害。根据这一情况,他提出两条打算,一是要求县委派得力干部加强对祖楼的领导。二是撤出祖楼据点,要求县委派干部接应。张祚兴向县委书记寿松涛作了汇报。县委研究后,同意第一个方案,决定派县委宣传部长沙效葛(化名张振元)去祖楼据点主持工作,并明确萧西的秘密党组织均属其领导。萧支与祖楼之间的联络员是萧支特务连文书谢方中,他还负责把萧铜县委的密件转送给在萧支做策反工作的彭笑千。

1944年8月,四师西进,首战小朱庄,让敌顽丧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恢复萧县、永城和宿县的广大地区。9月,恢复萧四区政权,张祚俊任区委书记,祖楼秘密党支部书记谢长荫任区委委员、副区长。这年冬,祖楼秘密党支部支委谢庆露到伪湘山乡刘保昌处去玩,刚坐下,伪军一个团参谋进来问伪乡长刘保昌:“你们这里哪个是‘智信’?”刘保昌没有回答。谢庆露从容地说:“我们这里有个王志信,早就回家了。”伪参谋没有说话,停了一会就

走了。谢庆露心里明白，“智信”代号已经暴露。原来，上级党组织为了方便秘密工作，给据点内五位党的骨干编了绝密代号，仁（刘长培）、义（刘德玲）、礼（张祚升）、智（谢长荫）、信（谢庆露），祖楼据点的代号简称“智信”。现在代号暴露，这不是小事情，有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此时，谢长荫已去四区工作。谢庆露就找张祚升商量，由张祚升连夜赶到王寨附近的宁园村，找到县委书记孙明远，汇报了代号暴露的情况。孙明远书记明确指示：据点的同志应撤出来。他还部署了撤出的方法、路线和集合地点，等人员撤出后，由谢长荫接应。张祚升回到据点，经与谢庆露等人商量，决定当夜零点集合，犹豫、拖延将会发生不必要的损失。撤出来的一共4个班，40多人，30多支枪，还有家属。天亮以前，他们顺利到达王寨附近的宁园村，副县长张舒民接见了大家。张副县长讲话说：“你们在祖楼是地下工作，已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现在你们撤出来了，由过去的隐蔽斗争到今天的公开抗日斗争。”随后，县委将撤出的人员与三区区队合编为一个连，张祚升任连长，谢庆露任指导员。该连成为三区一支很活跃的游击队。

从1940年11月至1944年冬，一些同志在日伪祖老楼据点经历了四年隐蔽战线的斗争，既打击了民族敌人，也打击了民族叛逆——伪顽，同时也锻炼了自己，提高了在复杂环境下开展对敌斗争的本领。这些同志，当时都是

党组织选拔的政治坚定的同志。他们以各种身份打进敌伪据点，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当时“功实显而名不彰”。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今天，我们记载党的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第三节 萧铜在徐州开展的地下工作

萧铜县委在徐州开展地下工作，是从1941年开始的。这一年秋天，经萧铜县委研究决定，由县委敌工部部长路继先负责此项工作。他派往徐州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蒋若是和石西岩（化名石随风，1942年以后转交给淮北区党委及徐州工委领导）两人。

1942年底，萧铜县委敌工部又派许广智打入驻萧县孤山的伪军中当兵，后来调往徐州，升为排长。他曾向县委敌工部多次汇报过徐州日伪军驻防及活动的情况。

1944年，派郑达、孟捷、吴孝书三人，通过报考徐州中学进入徐州，在学生中做学运工作，搜集情报。郑达任党小组长。他们曾利用同乡关系，同在日本人控制的特高科当便衣特务的唐朝举结朋友，逐步争取唐转变，为我方搜集情报。至1945年夏，发现敌人对唐产生怀疑，为防不测，唐朝举带短枪两支，逃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5年，县委敌工部部长李华农，派党员孟繁超利

用亲友关系打入徐州市内，在坝子街某粮行当伙计。后来被特务发现，遂撤出。

为保证联络畅通和安全，我方还在徐州外围设立了两个秘密工作联络站，一处是徐州南三堡车站联络站，站长朱传友。一处是徐州西黄口车站联络站，站长胡道民。并配有秘密交通员朱世福等。朱世福家住徐州大同街，负责交通联络工作。

上述地下党员及其工作关系，在徐州活动时间最长的是蒋若是。1941年上半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磨擦的影响下，我津浦路两侧抗日根据地形势日趋恶化，坚持在皇藏峪一带活动的萧铜县委派蒋若是通过亲戚关系，把全家搬到徐州居住，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工作。

一、掩护同志。当时的津浦铁路，路东和路西虽然只有一路之隔，但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想越过铁路是非常危险的。路东的同志要到路西去，就得在津浦铁路的官桥车站上车，经徐州转道西去，再到陇海铁路的杨楼车站下车。路西的同志到路东去，也得经徐州转道南去。这样，蒋若是的家成了我方的“交通站”。为了使来往的同志安全进出徐州，必须持有“良民证”，否则就无法通过“卡子”，也无法应付敌人经常在夜间进行的突击查户口。为此，蒋若是想方设法结交了一个管户籍的警官叫默景彩，从他那里搞到户籍证明。开始，偶尔托他办一个、两个，后来关系混熟了，这个姓默的又升了“巡官”，办理“良民证”的钢

印在他手里掌握着,就更方便了。

二、搜集情报。主要是了解敌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军事行动(如日伪军搞“扫荡”)等情报。地下工作者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较大。因为同日本人不好结交,语言不通,伪军根本不了解日军的意图,等到伪军知道消息后,送情报的时间已来不及了。蒋若是利用同日本人接触较多,而又经常受日本人气的一个朝鲜人,千方百计搜集情报。这个朝鲜人叫田伊佑绪,他以随军经商为名,最初在启明路开了一家商店,娶了一个中国老婆姓王。这个朝鲜人的真实身份,蒋若是并不很清楚,但发现他经常同日本人一起喝酒。有一次,在日本人开的饭馆里吃饭,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被日本人狠揍了一顿,回家后直骂娘。蒋若是借这个机会请他喝酒,说一些安慰的话,渐渐和他交上了“朋友”,一有机会就拉他到徐州西南郊的鱼湖去钓鱼。通过接触,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日伪军方面的情报。

日本投降后,蒋若是接受了新的任务,搞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当时,徐州有个国民党元老叫刘汉川,萧县人,与蒋若是有亲戚关系。刘此时在徐州市担任中央银行董事长,住在表年路西头一家茶叶庄的后院南屋。西屋住着一个陕西人,据说是杜聿明早年的老师。蒋若是依靠与刘汉川的亲戚关系,设法搬进这个院子与刘汉川为邻,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例如,1947年春,徐州中央银行宴请驻军的将领,以招揽军界大人物,吸收存款。蒋若是利

用帮助银行抄写请贴的机会，搜集到了一部分驻军的番号、驻地、长官姓名等资料。

三、采购药品。由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使解放区的医药极为匮乏。有时派人到城里购买到一点，也不容易运出城去。而且，如盘尼西林、六〇六等一些紧缺药品，需要量比较大，购买时容易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蒋若是就想法结识了一个年轻朋友叫许瑞华。此人在世界药房当店员，通过他从内部购买，然后再通过中学时的同学刘文奎（他父亲在徐州西关教会医院当医生），把药品放在车兜里往外运，躲过“卡子”口的检查。万一被敌人查出来，就是说给郊区诊所送的。这样带了几次，都很顺利，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第四节 适时加大对敌伪工作的力度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确定对敌伪工作的形式和目标，适时加大工作力度，这是做好对敌伪工作的重要环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等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挑起太平洋战争。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运输供应困难，日寇已陷入泥淖不能自拔，在占领区仅能维持点线，并出现40多岁的老兵和十几岁的娃娃兵，往南洋调兵时，有的哭泣，有的

逃跑。我们决不放过这一动摇日军军心的极好机会，便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国际形势的变化，让日军增加思乡、悲观、厌战乃至反战情绪。

桃山车站附近有个看护铁路的岗楼，住着两个日本兵和一班伪军，其中有个外号叫“豁鬼子”的日本兵，名叫滕（或金）山四郎，是日本反战同盟的。听了我们的宣传后，他主动与我们联系，经常化装成农民给我们送情报和购买药品。有一次，豁鬼子买了好多西药，放在口袋里，化装成农民给我们送来，被旺山的民兵盘查住了。不管问他什么，他就是不讲话，手握住口袋头死也不让民兵看，民兵气了，打了他。他还是不讲话，也不让看。民兵感到奇怪。这时，他在地上写了个“许”字，又往东南方向指了指。民兵心想，他可能是找许西连，就把他送到萧铜办事处住地。许西连了解内情，向他道了歉，并招待了他，还派了民兵护送他回岗楼。

豁鬼子他们主要是看铁路，铁路以外的事情不管。有一次，我们的游击队在豁鬼子管辖的范围内拔了一根铁轨上的道钉。他就找到游击队说：“要扒路你们就扒一段，这说明你们人来得多，我没办法。你们只拔一根道钉，说明你们人来得少，这么少的人我都看不住，没法向上交待。”他请我们高抬贵手。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照顾他一下，有时破击铁路，就跳过他管辖的范围。日本人也怕下属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容易出问题，经常换防。有一段时

间，豁鬼子换防到海州，他原来管辖的一段铁路就老出问题，又不得不把他从海州调回来。

我们的对敌伪工作，除做好基层外，也做上层。例如，做好“徐州王”郝鹏举的工作。郝原任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后任淮海省长。他曾劝告汪伪政府参谋次长张耀震说：“南京不是久留之地，徐州是五省通衢，战略要地，自古以来为兵家所必争。将来盟军和重庆部队如果从连云港登陆，我们可以策应。如果他们反攻华北，我们可以联络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孙殿英、庞炳辉。他们都是老西北军的人，结成一个阵营，不怕重庆方面不重视我们。”此话流露出郝对汪伪政府并非忠贞不二，已预留后路。我们就利用他的这种矛盾心理去做工作。同时，我们了解到郝不是蒋的嫡系，受黄埔军人的排挤，在西安时因触犯了胡宗南，差点丢了性命。于是，他跑出来投靠了汪精卫。新四军军部及三、四师首长正在思考这一问题，恰巧，萧籍回家探亲的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中央委员张云川，去了华中根据地访问。陈毅、罗炳辉、谭震林、邓子恢、彭雪枫等领导接见了。临别时，张云川向陈毅提出：“愿意去争取和说服他的老朋友郝鹏举，让他与新四军建立密切的联系，将来大反攻到来时待机反击，希望陈毅能网开一面。”陈毅当即表态：“我军为着调动千军万马的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历来强调要组成最广泛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一切人员，包括上层人物，只

要他幡然悔悟，真心实意参加抗日事业，我们就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于抗日事业，都是有利的。同样，只要郝鹏举愿意和新四军建立秘密联系，我们也竭诚欢迎。”

张云川辞别陈毅到了重庆，复于1944年到郝鹏举处，郝把张云川奉为上宾。此后，张云川代表郝鹏举秘密来到淮北地区与四师联系，达成一些协议。稍后，四师派九旅参谋长冯文华，以冯玉祥的侄孙、郝的老友身份去郝处密会。郝说：“文华兄请放心，我郝某长期受冯先生教诲，始终未忘西北军救国爱民的传统。前陈毅将军派张先生前来我处，我即遵命不主动向新四军出击，并通过张先生与四师保持了联系。张爱萍、邓子恢的联络参谋（柏寒）与乜子嘉（即乜庭宾）接洽，我亲自批准子嘉兄与贵方保持密切联系。凡此种种，均表白郝某心向贵军，决不与贵军为敌。”

经过淮北区党委、四师及中共徐州工委、邳睢铜、萧铜多方面的工作，以及上层民主人士、基层各方面的关系，通过几条线，抓住几个关键人物，不仅使郝鹏举身边的智囊、军师人物成为中共特别党员，郝鹏举四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师长，也是邓子恢亲自批准的中共特别党员，即一师师长乜庭宾，二师师长张奇。乜庭宾师的一个团，1000余人，长期驻扎萧县。也曾安排该团有关人员寻找我地方党组织，终因无可靠关系没有联系上。我党的策反工

作,对促进郝鹏举 1946 年 1 月 9 日率其两万人马起义起了关键作用。虽然郝起义之后又背叛了人民,但卞庭宾、张奇等人又二次起义,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卞曾任江苏省淮阴军分区司令员、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等职。

萧铜的对敌伪工作之所以做得好,之所以能够形成四面八方分层做敌伪工作的局面,是因为上下都认真贯彻执行了 1942 年底和 1944 年初淮北区党委的两个重要文件,把对敌伪工作及敌占区工作提高到空前的重要地位,把一半以上的力量放在了对敌伪工作上,并抽出党性坚强的干部,适时派人伪军内部,派人据点,做长期打算。就以当时萧铜的路东路西来说,祖老楼据点,主要是三、四区区委派去的共产党员;争取曹村区伪区长杨光沂的工作是萧铜利用关系进行的;萧城、徐州的地下党组织,则与萧铜及淮北区党委有联系;郝鹏举的工作,主要是四师做的。这几层虽然互不交叉,但是工作成果是共享的,萧铜也深受其益。如四师与郝鹏举达成的一个协议,郝承诺决不主动向新四军出击,这就减轻了萧铜一带日伪“清乡”、“扫荡”所受的危害。若不是祖老楼日伪据点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萧铜党政军在萧西几无立足之地。至于曹村车站,已成为沟通我路东、路西的联络点,四师西进时,成万人马,就是从这里通过日伪封锁线的。上述情况,充分显示了萧铜对敌伪工作的显著成效。

第九章

重建民主政权，迎接抗战胜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重重难关，进入再发展时期。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奉命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巩固的萧铜游击根据地，为四师挥师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权重建不到一年，萧县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小朱庄战斗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坠之势，日寇在太平洋战线也逐渐失利，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侵华日寇为挽救败局，乃调集五六万人，发动河南战

役。国民党蒋鼎文、汤恩伯等部 40 万大军望风披靡，在 37 天之内，洛阳、郑州等 38 个市、县相继陷落，汤恩伯损兵 20 万，中原正面战场告急。

8 月，党中央明令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挥师西征，收复失地，牵制敌人，配合正面作战，抢救中原危局。8 月 15 日，在洪泽湖畔的半城，四师举行誓师大会。彭师长斗志昂扬，振臂高呼：“同志们，时候到了，为配合正面作战，我们一定要打回路西去，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原人民。”广场上顿时爆发出气壮山河的震天吼声。

彭雪枫师长亲率十一旅全部，九旅二十五团、师骑兵团及地方党政干部和武装，夜行昼宿，杀向被日、伪、顽蹂躏着的津浦路西。

时大雨滂沱，行军急速，每天要行百十里路，彭师长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经六个夜间的急行军，20 日晚，部队在曹村车站与夹沟车站之间越过津浦铁路，向西挺进。其时，日伪控制着铁路、公路交通要道。由于我们几年来对敌伪工作做得比较好，伪军中多有我们秘密派入的人员。因此，在我部队过铁路时，各主要路口都是我们派去的人站岗，使我军畅行无阻。

徐州以南，津浦路西，有几道蜿蜒南北百余里的山峦，挡住了西进的道路。西进必须通过永堽寨、梧桐寨、白顶山寨、时村寨。这一带山寨恰恰是国民党顽固派苦心经营的所谓“东方防线”。他们就在这几个隘口的中心地带

——小朱庄,安设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据点。

小朱庄据点是一个深沟高垒的土圩子,圩墙内侧挖了能绕圩子转一周的地下坑道,每隔数米筑地乌龟一个。地乌龟和暗坑上用木板门为盖,上复厚土,每个地乌龟内向圩墙外掏枪眼三个,配机枪一挺,长枪两支,在地乌龟内能够随时监视村外任何细微的活动。土壕宽一丈五尺,深两丈,四角都建有射孔的碉堡,还有一座石头炮楼。每座炮楼下均设有地下室。地下室与坑道连为一体,能随时调整圩内的部队和火力部署。土壕外边,围绕村子又加设鹿寨一道。圩内以房屋筑堡,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

盘踞在小朱庄一带的号称“路西东方铁军”之主力顽鲁苏豫皖边区第四十纵队王传绶部,约1600多人,有八二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千余支。王与永城的刘子仁、萧县的刘瑞岐、铜山的耿继勋互为犄角,结成所谓津浦路西“东方防线”,妄图阻我西进。此外,王传绶还在小朱庄东面山区的白顶山寨、梧桐寨、时村寨各驻一个营,高山上设瞭望哨,并派巡逻队,日夜巡逻于通道隘口,防范十分严密。

21日晨,进至津浦路西的新四军健儿,以战斗队形继续前进,三十一团为左翼,三十二团为右翼,二十五团、四师骑兵团尾三十二团前进。驻在梧桐寨的顽军警戒分队,企图阻我右路大军,稍一接触即逃至小朱庄,我遂占

领悟桐寨。我左翼大军进至白顶山，顽军以一个营的兵力，连续反扑三次。见我来势猛烈，即溃退西撤。三十二团为策应左翼，即向小朱庄前进。21日16时，对小朱庄形成包围。

21日夜，彭师长主持召开会议，地方干部参加的有许西连、纵翰民等同志。会议决定由四师主力担任主攻，萧铜总队担任北部外围警戒及地方工作。是夜，纵翰民、许西连率领随军西进的地方干部分赴小朱庄周围各乡，搞给养、担架，设立战地医院，并组织群众去小朱庄周围挖交通沟。

深夜，四师部队采取了佯攻，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数千名民工，利用小朱庄周围原有的河沟，改挖交通沟。

当顽军参谋人员向王传绶报告说，看来势此部队像新四军主力时，王传绶非常武断地说，这是几个“土八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22日拂晓，王传绶登楼眺望，见小朱庄周围挖了许多沟，顺着这些沟，随时都能靠近小朱庄。这时的王传绶才认为新四军主力确实过路了，他来不及吃饭就组织突围，在新四军的猛烈炮火打击下，几次突围都被打了回去。

天亮以后，彭师长又带着干部到阵地前沿侦察地形。他爬上一间茅草屋顶，伏在麻袋垒起的掩体后面，面向小朱庄里面观察，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可是他却镇静如

常。看过了地形之后，彭师长向各团下达了战斗任务：三十一团为主攻，向南面和西面采取多箭头突击。三十二团为助攻，攻正北和西北，东南面故意空着。因东南方离村子二里多路有一条河沟，师长估计，经我军猛烈攻击之后，顽军可能从这里突围。因此，师长要骑兵隐蔽在这条河沟里不要暴露，等敌人突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二十五团进至小朱庄西北坡里集一带，阻击西北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师山炮连和平射炮（迫击炮改装）配合，在小朱庄西南方向支援三十一团。经过一番布置之后，22日中午，我步兵在机枪的掩护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一个班上去了，两个班上去了，敌人的机枪、手榴弹像冰雹似地打在壕沟的两边，泥水溅起老高。狡猾的敌人忽然把火力从地下战壕里搬到地面，从群众家里向三十一团一营射击。我军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一营的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王传绶以13挺机枪，一会儿从群众家里射击，一会儿从地乌龟里向外射击，再加上炮楼上的炮火，都集中封锁水壕子，致使一营伤亡很大。

强攻小朱庄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墙高沟深，原先准备攻打圩子的梯子也不够长，加上刚下过大雨，地上滑得站不住脚，很多同志没爬上圩墙就倒下了。少数同志冲过火力网，爬上墙头，又被敌人的刺刀推了下来。

圩墙爬不上去，一些同志想从庄门突进去，但敌人的机枪火力封锁得十分严密，上去一个倒下一个。

第一次攻击失败了，伤员被抢救下来，阵地上变得一片沉寂。

晚上，为了疲惫敌人，集中了整个部队的司号员，在小朱庄周围一阵一阵地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同时派出几个小分队，带着机枪、步枪、手榴弹不断搅扰敌人。这一来，吓得顽军又是打枪，又是打炮，一夜没有睡觉。

小朱庄西南角，有一所小学，房屋较高，彭雪枫师长便把前沿指挥所搬到这里。

8月23日凌晨，彭雪枫、张震、滕海清以及许西连、纵翰民等同志对何时打下小朱庄作了研究，决定当天12时发起总攻。

我军从小朱庄西南角发起冲锋。彭雪枫、张震、滕海清、许西连、纵翰民等同志，都以普通战斗员的身份在交通沟里参加战斗。彭雪枫同志有时还爬到前沿指挥所的房顶上，用重机枪指挥战士们冲锋。

小朱庄的地下战壕是从土墙往外掏的死枪眼，当我部战士靠近土墙，爬上梯子时，敌人战壕的火力就失灵了。王传绶一见小朱庄有失守的危险，就组织一支敢死队，赤臂提刀，在圩墙上来回督战。我指战员几次爬上云梯，都被砍伤落水。

王传绶从敢死队中选拔出几十个特别凶残的亡命之徒，赤臂挥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在圩墙上和我战士拼搏，阻拦我部不能迅速攻入圩内。

8月23日上午12时,彭雪枫一声令下,嘹亮的军号声,震撼着龙河、闸河两岸,四师的英雄们向小朱庄守敌发起了总攻。

骑兵团在政委姚运良、团长周纯麟的带领下,在小朱庄东南的小河滩里摆下了数里路长的骑兵埋伏阵,三匹马一组,持戈待命。

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四师主攻部队,在萧铜总队及各乡民兵、担架队的配合下,像潮水一样席卷而上。

我军组织了投弹组,专门向圩子里投掷手榴弹。步兵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往圩子里猛攻。阵阵枪声和密集的手榴弹爆炸之后,西南角的突击队便迅速穿过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开阔地,一下子扑进了外壕。战士们放下扶梯,越过外壕,随即扔出一批手榴弹,借着烟幕的掩护,一口气冲到墙根,放下梯子,飞快地爬上圩墙。

刚一上去,只见一群敌人发疯似地从圩子下跃起,端着刺刀反扑过来。战士们轮起大刀,端起刺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激烈地争夺着圩墙的一角。十几个敌人全被我们砍死了,上去的突击队员也牺牲了几个,剩下的几个朝墙内又扔出了几颗手榴弹,趁势突进了圩墙。

我军发起总攻后,平射炮首先轰击了土圩子西南角和东南方向的土炮楼。这时,王传绶把火力全部集中在圩子的正南和西南方向,圩子的西北方向空虚着。三十二团在三十一团发起攻击时,乘圩子西北空虚,顺利攻入圩

内。攻入圩内的三十一团与三十二团的几股力量，相互呼应，扩大战果。顽军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反扑，战斗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西南角被我突破后，南、西、北三面也攻了进去。当我军向纵深发展时，顽军退到村东头的一个大院里继续顽抗。凶残的顽军把大院周围的房子都点着了火，熊熊的大火加上顽军的火力封锁，部队被迫停了下来。

这些情况，彭师长在圩墙上看得很清楚，他告诉大家把衣服浸湿，利用老百姓的家具作掩护，又叫前沿的指挥员组织火力封锁顽军的枪眼。部队稍停之后，又发起了新的冲锋。

在猛烈的炮火中，部队逐渐逼近大院。负隅顽抗的敌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开始向村东蠕动。师长命令周纯麟团长赶快回去作好准备，并嘱咐他等顽军全部出了圩子再打。周团长立刻飞马赶回骑兵团阵地。

河沟里，骑兵团的战士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周团长传达了命令之后，一个个摩拳擦掌，立即勒紧了马肚带，拉紧了缰绳，抽出了大刀，随时准备上马厮杀。

大家精神抖擞，注视着圩子里的动静。忽然，一个战士高喊：“团长，敌人来了！”果然从圩墙里涌出一群人，像一片蝗虫，你碰我砸，愈来愈多，不一会儿就离开了圩子。周团长立即命令司号长李玉兴吹号上马，并叫通信员发出冲锋的信号。

“上马!”随着各级指挥员的口令,战士们一个个纵身跳上战马,猛抖僵绳冲上河岸。拥挤的敌群在我第一批马队的机枪扫射下被打散了,第二批马队冲过去又砍又劈。雪亮的马刀在敌群中上下翻飞,刀声、枪声、马叫声、人喊声混杂在一起,战斗场面惊天动地。

骑兵团战士冲过去又杀过来,直杀得敌人晕头转向。队伍里到处喊着:“不要放过缺耳朵的王传绶!”“活捉王传绶!”

骑兵团五大队给养战士王长金,是一个大个子红军。这时,他正带着几个炊事员来给部队送饭,看到战士们在敌群中纵横驰骋,砍杀敌人,他也立即跃马挥刀杀入敌群。正杀得酣畅,忽然看到十几个长短枪齐备的家伙,簇拥着一个光着脊梁的大个子,枪打不散,边打边跑。王长金纵马追去,当他的战马驰进敌群时,他对准那个大个子猛砍一刀。忽然有一个敌人向他的腹部捅了一刀。王长金一阵剧痛,身子一晃就倒在马背上了。顷刻间,当他抬头看时,发现几个敌人架着那个大个子又继续逃跑了。王长金同志忍着伤口的剧痛,拨转马头再次冲进敌群,对准那个大个子的脑袋又狠狠地劈了下去。敌人又向他打了两枪,王长金同志全身是三处受伤了。有一个战士看到王长金满身是血,连忙喊道:“看你肚子上拖的什么?”王长金低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肠子已从伤口处拖了出来。没走多远,他一头栽下马来,英勇牺牲了。后来查明,被他砍死

的那个高个子正是罪恶累累的王传绶。

小朱庄的激烈战斗历经三个小时结束。共击毙顽四十纵队司令王传绶等 300 多人,俘纵队副司令王忠鼎、政治部副主任张小侠(张学印)以下 1300 多人,缴获八二迫击炮 2 门,轻重机枪 35 挺,步枪千余支,子弹一大批。这次战斗,是我军攻坚战、歼灭战的辉煌战例。

刘瑞岐闻知王传绶被围,于 8 月 23 日日夜兼程赶来增援。其先头部队与我萧铜总队相遇,一触即溃,刘瑞岐率部逃到陇海路北去了。永城的刘子仁与王传绶曾喝过鸡血酒,盟过誓,闻王传绶被围,他从保安山带两个团前来增援,行至王柳园村一带,听说王传绶部全部被歼,即率部调头西逃。8 月 24 日,吴信元部起义。至此,王传绶等结成的津浦路西“军事同盟”被彻底打垮,为我军收复中原扫除了一大障碍。

第二节 争取吴信元起义

吴信容带领的原八路军四纵六旅第十八团,前身是萧县抗日游击支队。该团干部和士兵中党员很多,只要做好工作,使之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可能性很大。当时,耿蕴斋的部队很少,主要是依托吴的部队活动。因此,争取耿关键是做吴的工作。况且,吴的态度很明朗,对他不仅是争取,而且要团结。指导思想就是团结吴、争取耿。

早在1941年5月东撤时,作为党外人士,已卸任一年多的原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笑千,没有跟随豫皖苏边区党政军人员一起撤往皖东北,而是留在了宿西,住在柳子村陈辑武家。吴信容从彭笑千的本家侄子彭梦楼那里得知彭笑千没有走,就叫他想法找到彭笑千。6月中旬,彭笑千从宿西来到萧六区彭瓦房村彭梦楼家,见到了留在萧西的张舒民。他俩商量后,认为要想办法联系上在萧东坚持打游击的许西连。许西连应邀在六区东部薛村山窝会见彭、张。此后,许去宿东向吴芝圃汇报了情况。吴芝圃听了汇报后,作出了让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吴信容支队的争取工作的指示。

吴芝圃到达淮北区党委以后,说明了情况。为了进一步促成此事,又由彭雪枫、张震、吴芝圃三人联名致函彭笑千,委以在萧西坚持斗争的重任,同时将一封三人联名给耿吴的信请他转交。彭笑千约吴信容到六区车牛返村晤面,将彭雪枫、张震、吴芝圃三人联名给他与耿蕴斋的信交给了他。吴看过信,悲悔交集,痛哭不已,深为此诚恳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所感动。之后,彭笑千即移住吴部,耐心细致地做吴的思想工作。吴信容不仅思想上有所悔悟,而且有具体的表现:一、吴信容没有亲自去接受国民党的番号和委任状,而是一直穿着新四军的旧军装;二、他不要国民党派来的干部,也不准国民党县党部在萧支搞共产党员的自首登记;三、吴信容把进步人士胡先洲、

杜尉农、张兆坤等一批人保护了下来。后来，四师首长又联名给胡仙洲写信，请他配合彭笑千共同做好萧支的转化工作。为了方便萧支与淮北区党委和四师的联系，1942年8月间，决定在萧县黄口车站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由胡道民负责，杨醒参加。为防失密，双方来往信件均不署名，只在信皮上写“西”（津浦路西）和“东”（津浦路东）字样。至此，渠道开通，联系频繁。

国民党顽固派是不能容许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耿吴转化工作的。首先由汤恩伯出面，于1941年秋电告耿蕴斋去后方，委以少将副司令的闲职，在沙河边过着垂钓生活。1942年3月上旬，又是汤恩伯出面，亲笔致函彭笑千，要彭去临泉汤总部面谈。彭去后，即把他扣押在临泉城北乌庄。是年底，萧县土顽刘瑞岐也容不得张舒民留在萧西，曾派人暗杀他，逼得张去了萧铜地区。

在彭笑千、张舒民在萧支做争取工作的同时，淮北区党委和四师责成萧铜县委选派政治坚定、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进入萧支。萧铜县委设在路西日伪祖老楼据点的地下党领导机构，决定派中共党员朱达川打入萧支，做党的秘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朱达川和姜云、杜长苓、郝长顺等人取得联系，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朱达川任支部书记，姜云、杜长苓、郝长顺任支部委员。秘密党支部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广大官兵，掌握萧支武装，争取萧

支早日归队。

朱达川依托姜云、杜长苓、郝长顺在萧支的位置和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站住了脚跟,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们利用亲友、同学、同乡、宗族、帮会等各种关系把一大批中下层军官拉到自己身边,并在他们中间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晓以民族大义。使广大官兵明确:一、萧支原是我党创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应发扬光荣传统。二、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坚持抗日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三、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狼狈为奸,假抗日真反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通过宣传,使广大官兵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

国民党顽固派也深知共产党在萧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一天也没有放松对萧支的渗透和干预。他们一方面对萧支上、中、下层军官进行收买利诱,并利用萧支中的反动分子孙以仁(时任参谋长)、王启贞(参加过国民党临泉县训练班,系军统特务)等人进行奸细活动,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官兵,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汤恩伯派来中将特务张荣田给吴信容施加压力,要向萧支各营、连派国民党党代表,企图进一步控制萧支。我党得知这一情况后,采取相应对策,首先通过彭笑千、张舒民、胡仙洲、杜慰农等人,就国民党向萧支派员一事从不同角度向吴信容晓以利害,揭穿国民党妄图削弱、瓦解萧支的阴谋。其次,秘密党支部发动中下层官兵起来抵制。在绝大多数官兵的

强烈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一计未成，又施一计，1941年12月，孙以仁、王启贞与萧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路治久勾结，炮制出要萧支共产党员“登记自首”的花招。萧支秘密党支部立即向祖老楼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情况。地下党组织作如下指示：一、想尽一切办法，粉碎敌人的阴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同志留下，没条件的撤出。二、与彭笑千等人联系，由他们设法制止。朱达川回到支队将指示向党员作了传达后，一方面在中下层军官中大造舆论，指出“登记自首”是对跟共产党干的人人格上的侮辱。跟共产党干的都是坚决抗日的，这不是什么污点，而是抗日有功，为什么要“自首”？何过之有？何罪之有？群情激愤。另一方面，通过彭笑千以及进步的中层军官向吴信容做工作。他们对吴说，孙以仁等人事前未向您请示，事后又未见您点头，他们自作主张，运来表格要官兵“自首”。这是对萧支的侮辱，也是对您的侮辱，这明明是拆您的台！一下子把吴信容激怒了。吴大发雷霆，令孙以仁等人当众烧掉了“自首书”。

吴信容叛变后，虽然干了一些破坏萧县抗战局面、危害萧县人民的坏事，但在我党上下结合、“两轮并进”的攻势下，吴信容还是步步回头，明显地站在了进步势力一边，逐步向党靠拢。吴的这些表现，已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猜忌。刘子仁就趁机向汤恩伯密报说，吴信容有通共之

嫌。刘子仁早有吞并萧支之心，当初煽动蒙骗吴信容叛变是满足一时之需，如今为了满足他更大的政治野心，想借汤恩伯之手吞并萧支，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吴信容这时已认清了刘子仁的险恶用心，悔恨不已。秘密党支部和进步民主人士都坚信，只要继续争取，吴信容率部“反正”是指日可待的。遗憾的是，吴信容的觉悟迟了一步，国民党顽固派是容不得他觉悟的。1942年3月中旬的一天，吴信容应国民党军统特务钱某之邀，到萧县四区王柳园村王延年家赴宴。宴毕，于当日暴病，延至七八天（3月24日）而死，年仅30岁。疑为刘子仁借军统特务之手害死吴信容，使萧支群龙无首，趁机吞并。

吴信容突然亡故，萧支出现了动荡，各方面纷纷插手。刘子仁认为操纵萧支命运的机会到了，极力推荐自己的势力攫取萧支的指挥权。萧县国民党实力派刘瑞岐，全力保举国民党将领王仲廉的妹夫陈德增接任。萧支的指挥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事关萧支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非常时期的关键时刻，秘密党支部以及仍留在萧支的进步民主人士胡先洲、杜尉农、欧阳圣德等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取得如下共识：由吴信容之弟吴信元出任支队长最为合适。这样，一是迎合了部分人的宗法观念，可孚众望，能消除内部分歧；二是可以阻止国民党反动势力插手；三是可以麻痹刘子仁，稳定局势（刘向来认为吴信元年轻无经验，可以拉拢）。淮北区党委和四师得知这一情

况后，即派石西岩到路西同胡先洲、杜慰农等人会晤，了解情况，并传达淮北区党委和四师的意见：严防国民党顽固派对萧支的插手，制止分裂。要说服全体官兵，由吴信容胞弟吴信元继任支队长。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进步民主人士和秘密党支部在广大官兵中极力宣传吴信元的才干，树立其威信，很快赢得了大多数官兵的认可，统一了各方面的意见，使吴信元顺利地完成接交任务，稳定了局势。

1942年9月，彭雪枫、张震、吴芝圃联名致函吴信元，对吴信容的去世深表哀悼，并附抚恤金一百块大洋，交吴信容家属以资慰问。吴信元遂回信致谢。

刘子仁、刘瑞岐夺取萧支领导权的阴谋被挫败后，复以两项措施想挽回残局。他们先打出武力解决的牌，联合国民党正规军合剿萧支。萧支获悉国民党于学忠部向萧支运动的态势，便依靠萧县老区的群众基础，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使国民党摸不到萧支活动的规律。刘子仁与刘瑞岐又张开经济封锁的网，既不接济粮饷，也不准萧支在活动区域内征收田赋。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秘密党支部号召党员拿出自己的津贴给萧支作军需，带头吃糠咽菜，用省下的钱买枪支弹药。党员的言传身教，影响很大，军饷发不出官兵也无怨言，同甘共苦，为萧支的生存而战。秘密党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1942年底，已有27名党员。其中，12名党员担任连排干部。

1943年底，当形势发生变化，萧支遇到困难的时候，淮北区党委以陈毅、彭雪枫的名义给彭笑千写信，托民主人士张云川捎到太和，请彭笑千火速返回萧县，做萧支的起义归队工作。彭笑千接信后，从太和国立二十一中逃回萧县，迅即潜入萧支。吴部虽已兄死弟代，但对彭笑千的敬重和欢迎依然如故。此时，彭笑千、吴信元最想了解的是边区党委的政策和四师的发展状况。听说张舒民在萧铜地区，便邀他面谈。张舒民把自己去淮北区党委汇报工作时遇到的情况和陈毅、彭雪枫争取吴的渴望，以及准备收复豫皖苏边区的打算，详尽地告诉了彭、吴。两人兴奋不已，进一步坚定了起义的信心。

1944年8月，张舒民忽然接到彭雪枫发来的电报，通报了四师即将过路西的决定，要他先期到达萧西配合彭笑千策动吴信元起义。8月23日，彭雪枫率部首战小朱庄获胜。次日，吴信元率1500名官兵在吴集北大孙庄宣布起义。至此，离开党近四年之久的萧支，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1945年3月，萧支改为萧县独立旅时，四师首长张爱萍、张震、吴芝圃亲临大会祝贺。张爱萍师长代表师党委讲话：“萧支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队伍，中间虽然走了一段弯路，最后终归回到党的怀抱。同志们放心，所有坚持过来的都是抗日军人，抗日牺牲的同志为烈士。从此以后，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直到取得抗日战

争的最后胜利。”

第三节 三方政权与三面政权

杭州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仓修良，曾对萧县的抗战史有过研究。他在论述其三方政权的一篇文章中说：“同一个时期存在三个不同性质的政权，时间达五、六年之久，而且全面开展了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再典型不过了，记载下来将对历史学界是个大贡献。”

抗战期间，萧县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三方政权，在一个县主政的有 3 个县政府，3 个县长；10 个区，有 30 多个区长。

萧县抗战首举义旗的是共产党，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十个区长。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我党政军被迫东撤，这里只剩下一个乡政权。国民党此时建立县政府，重新委派十个区长。在萧东，我们在一个乡的基础上，又发展到拥有九个区的政权，成立了萧铜县政府。与此同时，日伪把萧县划分成 12 个区，委派 12 个区长。在一个区之内委派几个区长的事是常有的。比如六区，我方委派孙清怀为区委书记兼区长，国民党县政府委派王士秀任区长，一个在路南，一个在路北。王士秀经常夜间带人到路南拉户抢劫，使人不得安宁，我方端掉他设在陶楼的情报网后，社会秩序才安定下来。日伪县政府先委派

耿辑五,后委派王德平为六区区长,区公所设在曲里铺。

政权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政令的五花八门,各行其是。日伪、顽、友、我之间的各种矛盾与斗争交织在一起,集中了国际国内多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在一县之内出现这种情况历史少有。三方政权势均力敌,全面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更是全国罕见。

萧县的三方政权,始于1940年3月至4月间。2月,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笑千辞职。3月,县参议会在四区王柳园村开会,推选纵翰民为县长。4月,日伪成立县公署,邵世恩任知事。5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任命朱大同为萧县县长。从此,三方政权形成。当时,因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在陇海铁路以外,群众称为“北政府”。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在陇海铁路以南,群众称为“南政府”。

三方政权形成势均力敌之势,则是始于1942年,成于1943年。豫皖苏边区党政军1941年5月东撤,萧县国民党顽固派从路北向路南扩张。原抗日民主政府行政科长许西连,经批准留在萧东打游击。此时,抗日民主政府只有一个乡的弹丸之地。经过两年奋斗,夹缝中求生存,发展成方圆百里包括9个区、50多个乡的游击根据地,成立了萧宿铜灵县政府。它不仅包括萧县的地盘(萧县只有九、十区),还包括铜山的五区、七区,宿县北部的股东与股西区,以及灵璧的一小片地方。利用两省四县犄角地带,开展敌后游击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萧县抗日武装,有先后组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萧县常备总队、萧县抗日游击支队、萧县独立团、萧县独立旅,共6个团,8300人,陆续上升为主力部队。东撤后,留下部分同志坚持萧东抗战,只剩下不足一个连的兵力。经过半年努力,组建了萧铜独立营,发展到400多人。1942年9月改建萧铜总队,下辖3个营,1500余人。1944年初,萧铜总队提升为邳睢铜军分区独立团之后,萧铜又在区、乡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萧铜总队。

刘瑞岐当上国民党萧县县长后,在萧县西部安营扎寨,把南北之争变成东西对峙,三分天下有其二,国民党县政府称为“极盛时期”。兵力拥有刘瑞岐鲁苏豫皖边区第三纵队,2000余人;王传绶的边区第四十纵队,1500余人;十区谢碧如支队与二区郭效冉支队,共1000余人。这还不包括耿吴刘叛变后,吴信容部改编的边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的1500人。

萧县日伪的武装力量,根据1942年9月30日伪县政府统计:县警备队803人,枪634支;各区自卫队907人,枪690支;警察局264人,枪91支;计1974人,枪1415支。日伪地方武装力量虽不多,但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却驻有重兵。徐州郝鹏举部也庭宾师常驻萧县1个团,约1000余人。日伪在萧县的总兵力,加在一起约3000人。

在战争时期,三方都把抓军事作为头等大事,这是必然的。与军事斗争不可分割的,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比如,三方都加强政党建设。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国民党奉行“以组织对组织”的方针,在组建县政府的同时,即设立了国民党萧县县党部,积极发展国民党党员。汪伪政权也不甘示弱,成立了汪伪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委员会。

抗日战争前,萧县没有中学,只有一所简师。为了争夺青年,争夺人才,三方都办中学。国民党县政府在四区守备庄、张三座楼办了萧县中学,抗日民主政府在路东办了萧铜中学,日伪县政府在黄口办了西萌中学,收留因战火而失学的青年,培养对自己有用的人。其办学性质,正如陈毅在淮北行署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日伪为顺民教育,国民党为愚民教育,我们为反帝反封建的、大众的、科学的教育。”

为了增强自己的财力,三方都有自己的纸币。抗日民主政府发行了“萧县流通券”,国民党县政府发行了“萧县兑换券”。汪伪县政府虽未发行地方纸币,但却利用去徐州购货非用日币和汪伪政府出的联银券不可的特殊条件,在县城设了专门兑换处,民众只有用在当地流行的流通券换成法币,用法币再兑换联银券,才能去徐州购货。日伪坐收其利。

三方舆论界都有地方上小有名气的笔杆子，笔战也十分激烈。三方都办了报刊，抗日民主政府办了《萧县实报》，国民党县政府办了《萧县导报》，日伪县政府出了《宣传周刊》。

三方政权为什么能在萧县形成鼎足之势，而且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萧县地处四省犄角地带并有两条被日伪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国共双方都凭借两条铁路作为屏障，利用几省、县交界处作为回旋余地，才得以周旋，站得住脚。1940年底，国民党县政府凭借陇海铁路得以在路北发迹。1944年8月，四师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国民党县政府又缩回陇海路北，把管粥集一带作为栖息之地。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1941年5月，豫皖苏党政军人员东撤，许西连等人所以能在萧东坚持斗争，除山区有险可凭外，也是因为津浦铁路作屏障，能减少和避免与国民党顽固派直接冲突。

由于三方政权带来基层政权的多元性，在日伪、顽、我边缘地带，一些乡政权与不少保政权，是两面或三面政权。它们中间，有进步的，有中间的，也有死心塌地投靠敌伪的，形成一面、两面、三面、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局面。

当时的萧铜根据地，从日伪的地图上看，全是日伪的“治安区”或“半治安区”，一条铁路将其分成东西两大片。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建我方政权，完全是从日伪手里一点一滴掰出来的。我们的起点，只是一个乡的政权。先是通

过游击活动与附近乡、村建立一般联系,让他们送粮、送草、送情报,次数多了,由一般联系变成我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也就成为既为我们办事,也为敌伪办事的两面政权。对这种政权的乡、村主持人物,如乡长、保长,少不了一些威慑手段,使他们既老老实实为我们办事,又不敢给敌人通风报信。当我们认为靠得住时,即可化装分散,隐蔽在他们中间。因为与敌短兵相接,只有聚则成军,散则为民,才能坚持下去。这里首要的条件,就是群众能保护我们。

对改造日伪严密控制下的政权,不可操之过急,不然树敌过多,欲速则不达。但也不可优柔寡断,能改造也不敢进行大胆改造,错过时机。条件一旦成熟,就要大胆地将“两面政权”改造成为“两重政权”。所谓“两重政权”,就是两个乡长、两个保长,分别办公。也就是我们要及时地指派自己的乡长、保长,使进步的与腐朽的两种政权并存,让群众加以鉴别。群众认识提高之时,也就是敌伪政权废除之日。这就是我们将敌伪的“一面政权”变成“两面政权”、“两重政权”的过程,萧铜抗日民主政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作后盾,改造敌伪政权是随着武装斗争的推进而扩展的。

1944年11月萧铜分建时,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8个区公所,72个乡政权。据统计,在这72个乡政权中,有一面政权30个,两面政权31个,三面政权11个。

第四节 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

小朱庄战斗胜利结束,吴信元率部起义,为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基层政权的多主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抗日民主政权作用的发挥。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急剧发展变化的需要,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已刻不容缓。9月初,萧县政权重建。开始是萧县新收复地区与萧铜县合并,仍沿用萧铜县的名称。

新组建的县委,由纵翰民任书记,孙明远为副书记,委员有扶廷修、王尚三、朱玉林、孙清怀。抗日民主政府由彭笑千任县长,许西连为副县长,秘书冯蕴言,民政科长张舒民,财粮科长朱振东,司法科长谢继恩,教育科长杨兴瑞,公安局长王尚三、副局长单劲之,交通局长刘建生。建立了十个区委,一区区委书记林星锐,二区区委书记葛玉环,三区区委书记孙明远(兼),四区区委书记张祚俊,五区区委书记李繁洲,六区区委书记孙清怀,七区区委书记朱玉林,八区区委书记李华农,九区(天门区)区委书记武玉振。后来,为了开辟徐州西南外围的工作,建立了阾河区,调葛玉环主持该区工作。各区区长大部分由区委书记兼任。全县绝大部分乡、村政权,已从顽伪手中接管过来,只有边沿地区保留小部分两面政权。二、九区大部,

三、四、五区全部,六、八区一部分,均为我较稳固的管辖范围。

新组建的抗日民主政府,其构成人员基本上仍是东撤前的领导框架,国民党顽固派已经分化出去。如原县政委员会中的王子石、马济民、纵止韩等。一些民主人士,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加靠近党组织。如他们中的彭笑千、许西连、冯蕴言、张舒民、谢继恩等。这些进步的民主人士,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共赴国难。他们关心政治,有“天将降大任与斯人”的抱负。他们由同情革命到投身革命,直到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彭笑千担任三个月萧县县长以后,1944年11月豫皖苏边区二专署成立,他奉调担任专员。此时萧铜分建,重建中共萧县县委,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成立,许西连任县长,张舒民任副县长。萧铜独立团第三营留在路西,改为萧县总队,许西连兼任总队长。

县政府恢复初期,社会秩序相当混乱,顽军散兵游荡,土匪很多。我们一方面对破坏社会秩序的阶级敌人坚决打击,一方面约法三章,贯彻“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既往不咎”的政策,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使阶级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迫使土顽党政军数千人纷纷投案自首。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注重履行自己的职责,抗日与民

主一肩挑。首先是抗日,这是属于民族斗争的范围,但也不忘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矛盾范围)。因为不解决民主与民生问题,就不能广泛发动民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44年11月4日,新组建的抗日民主政府召开行政扩大会议,部署冬季开展的大规模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在边沿地区,加强对日伪顽的斗争。在“双减”和反霸斗争中,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在减租减息方面,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种”,也有的实行倒“四六”,减三至四成。通过“双减”和反霸斗争,农民获得了斗争果实,有了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而组织起来的愿望。抗日民主政府因势利导,发展了农民救国会组织,扩大了民兵队伍,大力表彰送子送郎参军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县总队由西进时的5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双减”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四、五、三、二区,每区都建立了100多人的区队,其余各区区队也有五六十人。边沿乡镇政权还建立了乡队。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基干民兵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了重建的政权,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成果。

在1944年至1945年的群众运动中,也发展了一批贫雇农先进分子入党,以二、三、四、五区党组织发展得较好。1944年党员人数是350多人,建立了21个支部,49个小组,分布在48个村庄。到1945年上半年,党员人数

已发展到 420 人，建立了 24 个支部，55 个小组，分布在 85 个村庄。

重建县政一开始，县民主政府就注重恢复学校。相继开学的有高小 10 多处，学生 650 人；初小 224 处，学生 6000 多人；教员 315 人。每区还开办冬学 5 处。1944 年 11 月份，着手创办萧县中学，校长杨兴瑞，招收学生 220 人，教员 12 人，确立了抗日爱国教育、民主教育、生产教育的方针。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在四区杭子一带流动教学。1945 年 2 月，淮北二专署将萧县中学与永城中学合并，在萧县四区张庄寨成立建设中学，专员彭笑千兼任校长，副校长为王卓然。4 月开学，学生 600 多人，设师范、中学、建设 3 个部。暑后招收新生 300 人，在王白楼子村设了分校，年底迁往永城，至 1946 年 8 月停办。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1945 年 7 月上旬，中共萧县县委在四区刘店子村张家祠堂召开了 500 多人的党员活动分子大会，吴芝圃传达了中共中央七大精神，并用一周时间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会后，萧县县委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三项工作：一、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减租减息运动；二、整编和扩大抗日武装，对敌发动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迫使敌人成为瓮中之鳖。三、发动轰轰烈烈的劳武结合的军民

大生产运动。

第五节 迎来抗战胜利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8月9日，四面楚歌的日本法西斯向中、美、苏、英发出了乞降照会。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8月11日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8月13日，淮北二地委在萧县传达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并宣布了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布的有关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当日夜，中共萧县县委研究了接收萧县境内敌伪据点的具体方案，并以萧县总队的名义向驻守在萧城、黄口等地的日伪军、伪政权发出了通牒，令其在限期内向我党领导的萧县人民军队缴械投降。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

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苦难而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以不同方式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萧县的抗战史,始于1938年5月18日萧城沦陷。七年来,萧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由抗战初期的1个区委、6个支部、65名党员发展到10个区委、71个支部、1457名党员。地方武装的发展更快,除去陆续上升主力部队的部分,萧县总队尚有1000多人。各区都有50~100人的区队,边缘地区的乡政权还有基干武装。此时,日伪据点普遍处于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包围之中。

第十章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战胜利后，我们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内战的方式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为争取和平民主，萧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与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

第一节 接收县城

抗战胜利后，萧县人民的心情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消除内战，从此摆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生活，休

养生息,重建家园,安居乐业。但是,与人民意愿背道而驰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蓄意制造内战,谋求独裁统治,不惜将人民重新推向战争的灾难之中。

8月18日,侵华日军秉承美国和蒋介石的旨意,武器只交付国民党方面,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中共中央据此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的伟大号召。萧县县委以萧县总队的名义,向县内各日伪据点的日伪军、伪政权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缴械投降。这个通牒没有发生效力。

8月底,萧县军民开始对敌伪展开猛烈的攻击。新四军十二旅三十四团配合萧县总队第三营攻打陶楼伪据点,激战中,萧城伪军五六百人出城接应,被萧县总队击退。陶楼据点的日伪军100多人束手就降。接着,又连续攻克了丁里、吴庄集、岱桥、郭洼、大吴集、青龙集等十余处日伪据点。黄口车站是徐州西陇海铁路上较大的日伪据点,驻日军一个小队,伪军200多人,工事构筑比较坚固,又在交通线上。萧县总队接收据点时,日伪军不愿缴械,武力顽抗,未克,后被国民党接收了。

盘据在萧城的伪军刘胡邦部,800余人,凭借坚固的工事,拒不向新四军缴械。由张震任旅长的四师十一旅,奉命于10月中旬用武力解决萧城拒不投降的伪军。10月2日,长期搞顽伪合流的国民党萧县县政府和伪军暗中勾

结,接收了萧城的伪军。是可忍孰不可忍?旅部决定:按原作战计划执行。为了摸清变化了的情况,张震旅长亲临前线勘察地形,了解工事部署情况,并责令地下党组织详查城内的兵力、火力。为了便于指挥,张震移旅部于县城近郊的老宅子村。待摸清情况后,借鉴过去的攻城经验,反复研究打法。总的部署:三十一团担任主攻;三十三团负责歼灭城北凤凰山之敌,占领制高点;骑兵大队在萧永公路警戒待机;萧县独立旅部署于城东山口,防敌突围,阻敌增援。三十一团第一营加强迫击炮连一个,山炮一门,担任主攻,由城西北角突破。第二营加强迫击炮连一个,担任助攻,由西门相机突破。第三营为团预备队,尾第二营跟进。各营明确任务后,从思想、战术、战斗动作、战斗器材以及步、炮协同诸方面,均作了缜密准备。

10月17日下午3时许,部队从驻地坡里集葛塘出发北行,向萧城开进。行进中,各营、连严密封锁消息。18日零时30分,第一营隐蔽地进至西北角城墙下,占领有利地形。二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西关守敌,并顺利地攻下西关炮楼,瞰制西门。三营紧随团指挥部,进至西关北侧待命。凌晨4时许,攻击开始。霎时间,枪声大作,炮弹轰鸣,喊声四起,萧城上空已是火光一片,突破与反突破的激战顿时展开。

在城西北角主攻方向,一营爆破组在城墙上爆破成功,炸开了一个二三十米宽的缺口。三连迎着炮弹和炸药的

烟尘，迅猛地越过护城河，在城墙缺口处架梯登城。守敌突遭猛烈进击，仓惶溃逃。一、二连紧随三连乘机突入城内，直插东门。敌军很快以一个连的兵力向一营反扑，妄图趁我立足未稳封锁突破口，遭到一营有力地冲击后，残敌调头鼠窜。

在城西门助攻方向，二营积极地组织战斗，以吸引敌人的火力，支援一营登城。他们不顾伤亡，首次爆破未成功，又迅速组织第二次爆破。四连在炸药爆炸的声浪中，将数副云梯靠上城墙。勇士们不怕牺牲，争先踏梯登城，打退城墙上的守敌，冲入城内，打开西门，迎接后续部队进入城内，与敌人逐屋逐院地争夺，战斗十分激烈。为迅速扩大战果，团首长命令二梯队三营从西门进入城内，投入战斗。三营以一个排的兵力沿南城墙内侧向南门方向猛插，防敌从南门逃窜。其余兵力与二营并肩战斗，向东突击，扩大战果。

在各营与敌军进行激烈巷战时，一个敌军官督百余名敌兵，拼命向城北门反扑，妄图重新控制北门，夺取制高点，封锁突破口，以便夺路逃跑。一营二连两个排的战士，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居高临下，猛烈还击，毙敌 20 余人，残敌在混乱中往东回窜。

6 时许，守敌已被逼至东门两侧。一营包围敌一个中队，在火力攻击和政治争取下，迫敌举旗投降。200 余敌人龟缩到预先设防的两个大院内，被三营团团围住。我军乘

胜组织攻击，摧毁工事，冲进院中，生俘残敌 200 人。二营围困的敌人，固守在一个核心阵地中，一时未能将其歼灭。团首长调集火力支援二营，连续对敌射击，敌阵地千疮百孔，防御力量再衰三竭，二营乘势攻克，歼灭残敌。退守城东南之各处敌兵，负隅顽抗，与我展开激烈的反复争夺。激战至 12 时，三十一团及萧县独立旅将城内守敌全部歼灭。

三十三团在主力攻城时也对城北高地守敌发起进攻，迅速歼灭守敌，从而保证了主攻部队三十一团战斗的顺利进行。持续 7 个多小时的萧城攻坚战斗结束了，守敌及其一切装备、物资被全部缴获，俘 70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2 挺，长短枪 700 余支，马 20 匹。

萧城的收复，使淮京津浦路西根据地宣告全部解放，并连成一片。

第二节 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宣传贯彻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对当前时局的宣言》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党把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作为奋斗目标，首先提

了出来。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多有论述，这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一个新的策略性的口号。当时的形势是：中国革命经过抗日战争，虽然取得很大发展，但同反革命力量相比，仍然是敌强我弱，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夺取政权的时机，因此需要一个准备过程。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党在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时候，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战争的准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准备，才能在全面内战爆发时从容上阵。同时，由于我们党有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策略口号，党的一切军事行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击，以至用武装夺取政权，就变得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显然，当时提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或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绝不同于过去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路线。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述，在萧县曾有过学习、宣传、贯彻的过程。此时，萧县的隶属关系也有变动。1945年10月，县委由原来隶属淮北区党委二地委改属华中分局八地委，县民主政府由原隶属苏皖边区行署二专署改属华中八专署，由孙明远任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许西连任县长兼总队队长。

1946年2月底，华中分局八地委为了传达上级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精神，在地委驻地濉溪南丁楼召开了全地区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实际性质是个党校轮训班。萧县派了几十个人，由县委书

记孙明远带队，编成几个组参加学习。学习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澄清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认识。地委书记吴芝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浩然、副政委寿松涛分别到会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要有新的方针、新的任务；讲和平民主已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讲做好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地委要求各县、区的同志回去要进行传达、贯彻。

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地委秘书长孙叔平又亲来萧县，进一步讲解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参加听讲讨论的主要是县科局长以上的干部，也有一些社会贤达、民主人士。孙叔平的讲话，大体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和平这个旗子共产党要高举。如果不举这个旗子要遭到国内外的反对，陷于孤立。因为国民党当时大肆造谣说共产党好战，一些不明真相以及存在正统观念的人就容易被国民党的谣言所迷惑。二是中国必须和平，不能再搞战争。抗战八年死了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要恢复元气，必须搞和平建设，再打内战，经济上也是不许可的。三是国内有许多人怕打内战。国际上也有人说，如果我们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同时，孙叔平也分析了竭力宣传和平对于左右形势将起着一定作用的道理。虽然蒋介石想打内战，但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他也必须有所收敛。在分析了必须和平、能够和平的有利条件以后，孙叔平又分析了内战的可能性。因此，他要求大家充分做好两

手准备，即以革命的两手去反对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但在当时比较稳定的形势下，主要还是竭力宣传和平，否则就会上敌人的当。孙叔平的讲话深入浅出，受到好评。

根据上级的部署，萧县县委专门召开区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宣传贯彻的问题，确定以区为单位先传达到乡级干部，然后由各乡以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逐级宣传，层层贯彻，让群众理解和平、相信和平。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通过逐级宣传贯彻，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全县人民群众渴望和平，但多数人从内心深处根本不相信会有和平。他们认为，日本鬼子是投降了，但蒋介石会千方百计抢夺胜利果实，能不打吗？非打不可，讲和平只是暂时的。在知识界和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憧憬着自由化的生活，和平的调子唱得较高，至于内战的危险却考虑的不多。有产阶级中，极少数的人认为天下只能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是正统。

党政干部中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反应。一种反应是，认为尽管我党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平，广大人民渴望和平，但和平的可能性不大，必须作好打的准备。他们埋怨上级和平讲得多，备战讲得少。另一种反应是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因而放松了警惕。还有一种反应是，认为马上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占三分之一，将来进联合政府的人只能是有文化的

能文能武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偏低的人,到时候说不定就要解甲归田,没有什么干头了。因而,在干部队伍中不正常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不像以往那样艰苦朴素了,吃穿用都比较讲究了;有的干部把家属接到机关和部队驻地长时间居住;有的练兵活动抓得不紧,消极等待复员。

形势发展的情况表明,共产党人太热爱和平与民主,过高地估计了莫斯科三国会议决议的可靠性,过分地相信蒋介石的诺言,致使一些干部片面地理解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精神,过分强调和平的一面,忽视了武装斗争的一面。思想上想的是和平,组织上想的是建立联合政府,行动上想的是划地为界,占住地盘。在解放区边沿设立据点,被认为就是占领地盘的好办法,于是才有了尚口据点与尚口事件。

第三节 尚口事件

深受日寇侵华战争创伤的萧县人民,为开创和平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善良的人民正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一再玩弄假和平真内战反革命伎俩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磨刀霍霍。1946年4月下旬,国民党八十八军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并强占了我尚口据点,造成我萧县总队200多人牺牲,100多人被俘的惨案。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发生在萧县的尚口事件。

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刚刚生效，就遭到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肆意践踏。萧县县委指示全县人民武装只在边沿区防守，决不进入国民党占领区。而国民党李默庵部一个师便急急忙忙从江南调来徐州三堡、夹河寨驻扎，并强占了新四军控制的卧牛山、汉王山、王门、义安山、南北望、姚楼一带大片地区。他们还构筑工事，来势汹汹。1月15日，国民党萧县县长黄体润率两个大队，在国民党铜山县县长耿继勋部两个团的配合下，进犯萧城。3月30日，国民党耿继勋部配合驻杨楼车站的八十八军六十三团向七区区队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八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夏邑县介绍了建立据点可以封锁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经验，地委和军分区的负责同志认为这一经验很好，可以推广。鉴于萧县境内铁路沿线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断向解放区侵犯，抢粮、抢物，妄图扩张地盘的情况，地委与军分区党委决定在萧县的尚口等地设立据点。

对在解放区边沿地带设立据点的问题，在萧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中间有过争论。有的人认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敌不过我们的正规军，不敢轻举妄动，建立据点，既可以控制敌人，也能以此为界，达到占地盘的目的，是新形势下的新办法。有的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暗藏杀机，蠢蠢欲动，尽管我解放区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总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不宜设立据点。虽然对设不设据点有不

同观点，不同意见，萧县县委却没有向上级反应，而是坚决执行地委、军分区党委的决定。

尚口的位置在萧县县城西北，陇海铁路南侧约 5 公里处，东距徐州 30 公里。它是萧县六、七区的结合部，是国民党萧县土顽进犯县城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点建在尚口村北半部地势较高的地方，周围挖有两丈宽、一丈五尺深的壕沟，翻土朝里作为屏障，沟外布置一圈鹿寨。据点大门朝南，留有壕沟的一段没有挖断，是唯一的出入口。据点内构筑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4 月中旬，据点建好后，华中八分区萧县总队副总队长刘为敬、政治处主任张庆怀率直属队和三营的七、九两个连进驻尚口。同时，八分区主力三十四团和骑兵大队一部驻扎在距离据点五华里的陶楼等数村，村与村之间交通沟相连，以便随时相互接应。另有三十四团的四连，由副营长任侠率领，驻守在尚口据点外 200 米处的丁庄，实为据点之桥头堡。

盘踞在陇海铁路北萧县七、八区的国民党萧县反动政府，把尚口据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地伺机破坏。施工前后，其保安团就多次向尚口一带进犯。他们以国民党萧县县长黄体润为首，纠集萧籍 30 多名反动分子，拜请驻徐州的国民党某师师长方先觉攻打尚口。方根据其主子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旨意，当即应允，愿全力支持萧县反动政府攻打尚口。在尚口据点修建过程中，国民党

反动派曾多次派飞机到尚口据点上空盘旋、侦察。

4月26日晚9时，敌情发生急变。据夹河寨地下情报站送来的紧急情报：夹河寨、郝寨、杨楼、黄口等车站均突然增加大量的敌兵，企图不明，要特别注意。刘为敬、张庆怀二人据情报分析，国民党正规军在和谈期间调兵遣将，可能图谋不轨。随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军分区首长与兄弟部队三十四团，并立即向据点内的连排干部作了传达，要求干部战士加强警戒，注意敌情。27日凌晨，国民党八十八军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分数路包围了尚口据点。

27日晨6时许，据点内的部队刚收早操，正在开饭，外面突然几声枪响，全体指战员迅速进入阵地。敌人分数路由南向北压来，重点攻击的目标是作为据点外围桥头堡的丁庄村。敌人开始用一个营的兵力猛攻，四连战士在丁庄顽强地防守。经过数次反复冲杀，敌人死伤过半。

战斗打响后，驻守在尚口外围的八分区主力三十四团，也遭到敌人两个团兵力的包围，企图以优势兵力吃掉三十四团。三十四团全体指战员坚决反击，遂与敌人展开激战，双方来回冲杀，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毙敌300余人。三十四团也有较大伤亡，其中一营被敌人冲垮。八分区首长和三十四团领导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如继续与敌人打消耗战，将会陷入欲胜不得、欲撤不能的局面，不仅达不到援救县总队的目的，且有被敌吃掉的危险。鉴于

此，便让三十四团于中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内地撤退。敌恐中计，未敢尾追。

下午1时，敌人集中炮火轰击尚口据点，在方圆不足300米的据点里，落下敌人800多发炮弹，据点内的工事遭到严重破坏。

敌人用一个团的兵力再次向丁庄猛烈攻击，三十四团四连的全体指战员顽强抗击，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直坚持到下午3时。由于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四连的临时工事大多被摧毁，人员伤亡过大，弹药消耗殆尽，副营长任侠负伤，连排指挥员也大部分牺牲，不得不撤出丁庄，进入据点。

丁庄失守后，据点便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敌人占领了据点南门外的几间民房，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向据点内射击。据点内的部队无法运动，情况十分紧急。政治处主任张庆怀在观察地形时，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副总队长刘为敬面对烈士的遗体，义愤填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重新组织剩余武装，狠狠打击敌人。

战斗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敌人以排为单位从南门口向据点冲锋，刘为敬将八挺机枪配备在南门口地堡内，另配子弹、手榴弹十余箱，重点阻击南门冲上来的敌人。敌人组织的六七次冲锋，每次都要付出重大伤亡。激战到黄昏时分，敌人以连营为单位进行大规模冲锋，潮水般涌向据点，在一阵机枪的扫射和手榴弹的轰鸣中一片片地

倒下去。在据点内坚守的总队战士也有较大的伤亡。在弹药耗尽后，他们继续以石块、白刃相交，以赤拳搏斗，坚持到晚上7点多钟，刘为敬组织余下战士，下达了突围命令。数十名战士紧随刘为敬，乘夜黑向西南方向冲杀。敌人发现后，便集中炮火向突围方向猛轰，突围的队伍已经到达壕外的麦田里，刘为敬不幸中弹牺牲。

尚口据点被敌人占领，据点内400多名指战员，200多人牺牲，100多人被俘，突出重围者仅20余人。

敌人伤亡500多人，强占了尚口。

5月8日，中共萧县县委、县民主政府在萧城举行了“四·二七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后，我方将事件经过向徐州“三人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作了反映。三人小组来萧县调查处理尚口事件时，美国代表哈里曼察看萧城无战事痕迹，又不愿再去尚口，便驱车返徐。

尚口事件用血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教育了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修建据点打阵地战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在战斗打响后，仍死守阵地，伤亡惨重，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另一方面，过于迷信和谈，有麻痹轻敌思想，总认为敌人在和谈期间不敢明目张胆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对于敌情的掌握，我方仅侧重于对地方反动派的了解，而对敌人正规部队的动向，则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分析。

第四节 从“双减”到土改

为了发动农民参军参战,壮大革命力量,巩固解放区,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我党必须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46年5月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个指示将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以各种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目标。指示要求全党“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工作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嚣,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不正确的观点,应给以教育。”这表明了党中央解决土地问题的坚决态度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5月11日至24日,地委在濉溪南丁楼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五四指示》,萧县县委书记胡天禧带队参加了会议。之后,萧县县委于6月中旬在三区的石桃园召开了有区委书记、区长、农会主任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县委副书记朱玉林对前段工作作了总结,传达了八地委5月28日形成的《群众工作会议决议》、华中分局6月9日下发的《关于在减

租减息清算中解决土地问题办法的指示》等文件。县委书记胡天禧在会上作了《果实分配问题》的专题报告。会议决定：一、全面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反奸反霸斗争。二、建立健全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各级农协（农民协会）机关并配备干部，大量发展会员，要求中心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边远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要把所有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区、乡工联（工会联合会）组织，每乡工人 30 人左右者，会长可脱离生产。中心区要建立各级妇联（妇女联合会）组织，配备妇联干部。每乡有一人脱离生产，区二至三人，会员数不少于农协会的三分之一。三、发展民兵，建立民兵领导系统。民兵数目要求占农协会会员的百分之十。区设大队部，一至二人脱离生产；乡设中队部，一人脱离生产；中队以下不脱离生产。四、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中心区每村都要有党员，所有党员都编入组织，数量要求占会员的百分之一点五。五、改造基层政权。中心区要做到乡村制，彻底改造基层政权，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提出的宣传动员口号是：“减租又减息，多置二亩地”、“新旧帐目都能算，农民一齐起来干”、“工农青妇一家人，联合起来好翻身”、“农民要翻身，土地便是根”等等。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全县的土改工作，并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建立各级清算委员会，专门领导反奸清算。

二区与四区的清算试点工作是麦收前开始的。第一步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在贫、雇农中培养积极分子。积

极分子的条件是：出身好，觉悟高，作风正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然后组织农会，建立基干武装，开展忆苦教育，启发群众觉悟，进行“双减”，清算旧帐，反奸除霸，把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发起来。第二步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土地改革。通过调查摸底，根据政策划分成份，分配土地。在土改中动员学校的教员参加丈量土地，工作队员向群众宣传讲解党的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者等政策。

通过试点，摸索出了经验，反奸除霸即在一、二、三、四、五区的全部和六、九区的大部，七、八区的小部分地区迅速开展起来。建设中学 200 多名师生亦深入各区乡，开展宣传、贯彻《五四指示》的工作。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地委决定重建萧县总队。因在尚口事件中，副总队长刘为敬、政治处主任张庆怀、副参谋长阎延年等人牺牲，人员伤亡惨重，萧县总队解体。5月，地委决定重建萧县总队。萧县县长许西连兼任总队长，范文典（原三十四团二营营长）任副总队长，薛光（原分区直属队总支副书记）任政治处主任，李拂光任参谋长，郝长顺（原分区独立旅二团三营营长）任副参谋长。重建的萧县总队编制六个连。从分区独立旅调来一个营编为一、二、三连，县委、县政府警卫连改编为四连，由尚口突围出来的 20 余名同志与三、六区区队编为五、六连，番号仍为华中八分区萧县总队，对外称萧县独立团。

5月中旬的一天，在徐油坊村召开县总队成立大会。

村口设有岗哨警卫，麦场上搭起台子，台前坐着整齐的部队，群众喜气洋洋地围坐四周。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讲了话，农会、妇联会、青联会及各区代表上台祝贺。热情洋溢的讲话，道出军民的鱼水深情，激起一阵又一阵掌声。“热烈祝贺县总队的成立”、“感谢党和人民的支持”、“为尚口烈士报仇”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云霄。

萧县总队成立大会以后，总队领导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五四指示》；同时将总队由张绪庄转移到子观寺进行整训。整训的内容：一是对部队进行土改教育。通过学习和召开诉苦大会，使全体指战员弄清楚是农民养活地主，地主剥削农民，“土地还家，合理合法”。二是进行形势教育。以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依据，向战士们讲五次“围剿”、皖南事变、竹沟惨案、尚口事件等，使大家认清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革命本质。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土地改革，时刻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的进攻。三是进行军事训练。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总队以连、排为单位进行射击、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军事技术的训练。通过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6月，麦子成熟，县政府派出工作队下乡进行土改试点，同时开展夏收保护工作。总队研究决定，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麦收和土改，提出了“保卫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麦收”、“保卫土地改革顺利进行”的口号。为此，将部队部署在可能出现敌人干扰的重要位置上。副总队长范文典、

政治处主任薛光带领三个连驻防永堙、毛郢孜、姚楼一线，警戒徐州方向的敌人。副参谋长郝长顺带两个连活动在马井、曲里铺、东镇店一带，警戒黄口方向的敌人。另留一个连警卫县委、县政府机关。

在永堙附近，群众反映国民党白土乡公所武装经常出来骚扰，抓丁抢粮，百姓不得安宁。范文典派出一个连在夜间隐蔽突袭，活捉其十多个乡丁。一次，国民党县保安团一个连带着几辆大车到毛郢孜一带村庄抢粮，范文典带两个连于中途伏击，保安团被打得懵头转向，扭头向徐州方向逃窜。总队战士追击一阵之后，返回毛郢孜休息。此战使保安团伤亡 20 余人，10 多人被俘。

两次战斗虽小，在群众中影响较大，人民传递着胜利的消息，神秘地传说：“新四军又打回来了。”在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区乡公所不敢下乡催粮催款，保安团也不敢出动骚扰。

附：

为追悼“四·二七惨案” 死难诸烈士讣告

敬启者：军事停战令下，政协会议结束，和平有望，全国欢腾。在兴奋鼓舞之余，更期民主早日实现。詎料国民

党二中全会，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政协决议一手推翻，包藏祸心之反动派，倒行逆施，更变本加厉。

近月来，我萧县边区，部队被袭击，人民遭暗杀，群众被抢掠，荼毒地方事件层出不穷。三月三十日国民党军耿鞞子黄体润部配合驻杨楼站之国民党八十八军六十三团南犯，向我不满三十人之七区队进攻；四月二日国民党孙启元部伙同驻黄口站之国民党八十八军六十三团二营南犯，围攻我驻单庄之八区队，被俘四同志，均遭活埋；四月十六日晚，我五区赵庄乡李乡长被国民党部杜庆年派入我内地之奸细暗杀，甚至无辜群众，亦同时遭活埋，遭抢掠，损失至为惨重。我为顾全大局，每逢来犯，均予退让。

由于顽之抢掠，群众曾再要求我部队驻扎尚口（去年八月为我解放）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国民党八十八军十九日竟然以数千人并配合飞机三架，向我尚口驻军进攻，我军被迫自卫，始将向我进攻之国民党军击退。并向徐州执行小组提出交涉。满望双方严守第六号命令，不料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顾祝同集合八十八军、五十一军两军之众，分数路向我进攻，将尚口包围，即以大炮数十门，机枪数百挺，飞机八架猛烈轰击。我尚口守军，在刘总队副为敬、张主任庆怀同志英勇指挥下，浴血奋战，虽众寡悬殊，仍坚持一日，弹尽援绝，继之以石块、白刃相交，赤拳搏斗，最后我刘、张同志及官兵二百余名，均先后壮烈牺牲。

刘总队副、张主任以及尚口驻守之武装同志，多年敌后抗战，与日寇周旋身历百险，功在国家民族。今在外侮既除，国内停战之后，竟死于国内反动派之手，此足以令广大人民痛心疾首，洒泪疚心。为安慰死者，我们应以复仇之决心，完成未竟之志——革命事业。兹特定于五月八日举行“四·二七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大会。如蒙惠赠挽联、哀词、花圈及烈士遗物等，务请于五月八日前送交县委会、县政府秘书处，并盼届时莅临参加为盼。

“四·二七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会萧县筹备会启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十一章

西 撤 与 收 复

蒋介石在完成了发动内战的准备之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6年7月，国民党军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等交通线部署了27万余兵力，疯狂进犯豫皖苏根据地，萧县首当其冲。萧县党政军团结一致，就地坚持，积极反击。9月，形势逐渐恶化，被迫西撤。一年后，萧县军民为恢复萧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第一节 党政军西撤

1946年6月中旬，八地委召开了由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重点是对当时形势的三点估计：一是通过斗争，造成国共两党联合的局面。对这一点，在传达时已认为可能性

较小。二是国共双方形成拉锯战的局面，我们借以发展武装，巩固根据地。三是在蒋介石重点围攻的形势下，我们有可能丢掉阵地，撤到华北，甚至被挤到中蒙边境活动。这时，地方的公开组织要转为地下活动，地方的革命干部已公开身份不好留下的可跟部队撤走，原来身份不公开的，可留下坚持秘密活动，必要的时候可向敌人假自首。会议认为，全面内战的形势不会很快到来。然而，他们错了。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7月上旬，国民党驻徐州的交通警察二总队侵入萧县城内，接着占领了瓦子口，向三、四、五、六、七区进犯。与此同时，国民党五十八师也进驻徐州以南津浦线上，从萧县九区经永堙向西进犯。萧县瓦子口以东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一区区区长林星锐、副区长丁戒山在执行税收任务时牺牲。八地委、八分区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动员全区党政军民积极开展自卫反击战。为打乱国民党原定的战略部署，迟滞敌人的军事行动，策应中原我军突围，支援苏北、晋南等各地战场，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上级指示，于8月中旬发起对陇海铁路汴徐段300多公里路段的破击战。李庄车站至杨楼车站段长约60华里，由萧县负责破击。萧县总队布置在杨楼车站一带，担任破路和打援任务。萧县的区、乡武装和4000余名民工日夜不停地破坏铁路和桥涵，把铁路来了个大翻身，挖坏了路

基,沿途的通讯设施被破坏无遗,有效地协同主力部队阻击了敌人。

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萧县人民武装部队边战边退,县委、县政府机关先是撤到王寨南孙陶楼,后又撤到四区的胡楼。卫生所、修械所等县政府的下属机关和一区、二区、夹河区的区乡干部,建设中学的部分师生,县直机关的伤病员等,都撤退到李石林西北的朱大楼、洪河集一带萧永边界上。县委、县政府的负责人带领县总队在前方与驻扎在萧县内地的敌人周旋,各区、乡的武装仍坚持与敌人斗争。仗是天天打,路要天天跑,有时一天数仗,一夜几次转移,形势越来越紧张。

8月20日,国民党新五军从蚌埠出发,经濉溪苗桥、萧西一带拉宽40里向西北进犯,驻扎在萧永边界朱大楼、玉皇阁一带的萧县人民政府后方机关受到冲击。由于不明敌情,在公安局副局长单劲之的带领下,由公安局一个排护卫,被迫向西北方向撤离。先到夏邑,从柳堤圈横跨陇海铁路,经虞城、单县、成武、巨野到了郓城,找到冀鲁豫三地委。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王尚三因病随卫生所也撤到路北,后与单劲之相会。两人研究决定,把萧县各区、乡撤出来的七八百人编在一起,统称萧县大队,单劲之任大队长,王尚三任政委。后来,冀鲁豫三分区与路南八分区领导研究决定,身体差的和没有战斗力的人员由王尚三带队过黄河,归冀鲁豫区党委管辖。另挑选精干力量60

多人，由单劲之带队回路南，寻找撤退中失散的县政府人员。他们于9月下旬过陇海铁路，经多方联系，最后到夏邑县的胡桥一带与萧县县政府会合。

1946年8月下旬，在国民党新五军过境的同时，国民党交警二总队也更加猖狂。9月，国民党五十八师与交警二总队会合，在国民党县、区、乡武装配合下，沿陇海路南，从东向西，大肆围歼我县、区、乡革命武装力量。他们每到一处，便网罗特务，抓捕革命家属，并安设据点，建立国民党政权。县长兼总队长许西连临危不惧，指挥果断，县总队副队长范文典英勇善战。他们带领武装力量，日夜转战，坚持游击战，与敌人周旋。由于主力外线作战，游击队内地坚持，总队的武装与追击的敌人日夜战斗，疲惫不堪。永北、砀南、宿西等地也先后被敌占领，萧县处于孤军作战的局面，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补给困难，吃饭、医疗没有保障，再加上阴雨连绵，天气转冷，战士尚无寒衣，霍乱病流行，伤病员日增，全分区都处于受敌攻击的紧张局面，处境十分艰难。为有利于就地坚持对敌斗争，县委研究，拟建议地委成立萧永指挥部。决定由县委书记胡天禧、副县长张舒民去地委请示，同时把体弱多病的县、区、乡干部和伤员百余人送到分区，派总队一个连护送。不幸，到永城县薛湖附近与敌人的主力部队遭遇，一个连的武装被敌人击垮，干部被冲散。县委书记胡天禧失去联系，只身去了后方，中途被敌人俘去。

形势极为严峻,为了改变困难局面,地委于10月初决定将全区划分为四个工委,武装编为四个支队。萧(县)永(城)两县的武装合并为萧永支队,行政上改为萧永办事处,萧、永县委合并为萧永工委。全地区八个县的干部编成一个大队,叫五支队。11月初,为摆脱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围追,分区命令各支队分路西撤睢杞太解放区。

党政军西撤后,萧县陷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一时。萧县的土豪劣绅与恶霸地主组成“还乡团”,朱大同任团长。于1946年秋进驻萧城,开始对革命家属、积极分子进行普遍登记,全面清查,然后进行抄家、封门。他们疯狂地进行收租、倒租、敲诈勒索。一些革命家属被抓捕后,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仅帽山一带农会会员的革命家属,被捆绑吊打的就有30多户,抄家封门的15户,外逃避难的5户,逮捕农村干部2人。还乡团还规定,家属都要出去找自己的丈夫、兄弟、儿子,非得找回,方准回家。在马井一带,敌人对革命家属采取“赶出封门,家产冲光,树木刨净”的办法,并扬言:谁给革命家属一口凉水喝,一律同罪。南海乡乡长朱言喜被抓去打死,袁圩村基干队员梁三、梁五兄弟俩被“还乡团”抓去活埋。李九店乡吴庄村农会主任张佩清全家八口,除儿媳走娘家未回而幸免外,其余七口人,三人被枪杀,三人被活埋,一个小孩被活活摔死。

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于1946年秋由管粥集搬到县城,

在组织上开始实行强化政策。他们实行“党网化”，在全县成立了11个区党部，108个区分部。他们把民主人士当成不纯分子进行监视。特务机构国民党萧县调查室，加强其党政军特种策报活动，与行政、军警配合，对我党政军西撤后的掉队人员及地下党组织进行侦察搜捕。还开办“感训所”，对我自首人员进行“训话”。

国民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地租与高利贷的盘剥，天灾人祸的侵袭，弄得广大群众缺衣少食，民不聊生，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九店乡农民吴忠义，因遭水灾，租种的土地颗粒无收，实在拿不起繁重的赋税，被国民党乡长孙运堂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当时，黄口地区逃荒要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0%以上。在黄口、杨楼等铁路沿线的车站，难民不顾生命危险爬车外逃，轧死轧伤的事故不断发生。

第二节 艰苦的恢复工作

萧县党政军的西撤是被迫的，恢复萧县的工作始终是艰苦的。1946年冬，党中央派吴芝圃、张国华到陇海路南的豫东地区，12月12日成立了豫皖苏区党委、豫皖苏行政公署、豫皖苏军区。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彭笑千任行政公署副主任。萧县西撤的武装部队及王尚三带往路北的萧

县武装(此时已回到路南),被编入军区警卫团,范文典任团长(因负伤未到任,不久牺牲),王尚三任副政委。

12月17日,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平岗召开了原八分区县区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吴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西撤的经验教训,指出八分区所以没有能够就地坚持而全部撤退的内在原因,主要是“方针不明,决心不够”。他还严肃批评了那种“大敌当前,自动解除武器”的错误,号召大家要以勇取胜,坚决打回去,恢复根据地。会议同时撤销原华中分局八分区建制,成立豫皖苏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寿松涛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许西连任专署专员,李浩然任军分区司令员。

12月下旬,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成立萧县县委、县政府,任命朱玉林为县委书记,张舒民为县长。在此之前,朱玉林、许西连曾派五区区长李建华回萧县做党的地下工作,建立萧西工委,李建华为书记,盛玉峰为副书记,李乐敏为委员,吴武周也积极参与了工委的地下活动。工委的主要任务:一、和留下的同志以及革命家属取得联系,听取反映,互通情报,并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念。二、向周围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宣传革命道理,讲述革命形势,鼓励他们走向革命。三、编印、张贴、散发宣传材料,揭露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四、收集情报,及时转送县委。五、掩护同志。工委还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组织群众撤了作恶多端的顽韦里乡乡长和腰庄、韦道口、

李老家三个顽保长,换上比较进步的民主人士担任。萧西工委当时活动的主要范围是五、八区。地下活动开展比较好的,还有三区的老王庄支部,西杨楼支部,四区的个别支部,等等。在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收复萧县重建政权方面,它们都作了必要的准备。萧县西撤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派孙东民、朱世福作为交通员,与萧西工委经常保持联络。成立县委、县政府以后,又于春节期间派孟繁超等九人,便衣潜入萧西、萧城,分别了解敌情。

豫皖苏军区组建后,于1947年1月,打涡阳,克龙岗,歼灭了国民党五十八师二十九、三十两个团2000多人,很快恢复了陇海路南永、夏、亳、涡、宿西、砀南等广大地区,打开了三分区的局面。2月,为有利于开展活动,三地委指示撤销县的建制,以萧县西南部、宿县西部、永城县的东部三县结合地域成立中共萧宿永工委,书记李华农,副书记单劲之,工委大队长朱若平。工委成立后,东进开辟萧宿永地区,在夏邑县南骆天庙遭敌人三个连武装的袭击。工委大队仅三个排的武装,他们与敌英勇拼杀,部队伤亡较大,朱若平牺牲。此后,单劲之被分配到商亳县任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不久又去开辟商南,任商南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原萧县县委委员孙清淮也分配到商亳鹿拓县任县长,李华农调回地委城工部任副部长,萧宿永工委实际解体。因东进斗争形势的需要,工委于6月撤销,成立了中共萧宿永县委,隶属关系及活动范围不

变。书记田启松，县长李品立，大队长由李品立兼任。

1947年9月，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大军主力在徐州与开封之间分五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豫皖苏地区，并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以纵队为单位，分散展开，肃清敌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大力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其所属第三纵队，经萧县东部攻克濉溪口，兵临宿州城下，横扫徐州外围敌之据点。一时，萧（县）宿（县）永（城）等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国民党萧县保安团及区乡武装惊魂未定，不敢远离徐州活动，这是恢复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10月，中共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撤销中共萧宿永县委，恢复萧县、宿西、永城三县。成立了萧县县委，任命朱玉林为书记，王尚三为副书记。11月7日，豫皖苏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训令：撤销萧宿永县政府，成立萧县民主政府，县长由朱玉林兼，副县长单劲之。同时建立了萧县县大队，6个连800多人，大队长与政委皆由朱玉林兼任，副大队长孟庆祥。

萧县县委一方面继续扩大武装，一方面发动、组织群众斗地主分浮财，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至年底，全县建立了石林、袁圩、大屯、王寨、祖楼、红庙、东镇、龙城、穆集、坡里、天门、蔡里12个区政权，大部分区都成立了区队。全县一半乡建立了政权，县大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萧县党政军西撤前的一段时间，曾认真宣传贯彻过《五四指示》，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对于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壮大革命队伍，巩固解放区，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都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因当时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国共关系即将破裂，党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大局，特别是为争取中间势力，以巩固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又必须采取为各方面人士所能接受的适当的土地政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制定《五四指示》是正确的。但是，《五四指示》并没有完全废止减租减息政策，也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其条文，只能部分地改变封建土地关系，而不能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平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党中央批准，将这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文件于10月10日公布于世。

《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这正是《五四指示》中所缺少的内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标志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由部分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土地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使农

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的行动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1947年底,萧县党、政权、武装的建设均有了较大发展。根据地委指示,萧县认真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在中心区搞土改。先是一个区选一个村搞试点,取得经验再行推开。通过土改,发动农民,巩固根据地。二区的葛张庄,在西撤前搞土改时,根据当时地主的表现,作了宽大处理。西撤后他们投靠国民党,打击报复,迫害贫雇农。这次土改,葛张庄的贫雇农自动起来,伸冤诉苦,根据政策同地主面对面斗争,分了地主的浮财。其他各区的试点工作进展较好,大部分群众被发动起来,组织了农民协会。此时,陈粟大军转赴中原战场,萧县国民党政府又回据萧城,整顿武装,组织黑杀队、突击队与我争夺,向人民反攻倒算,妄图扼杀我新恢复的人民政权于摇篮之中。三区区长贾绪朋就是被敌人的突击队杀害的。由于形势紧张,土改工作没有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1948年,是萧县对敌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以军事斗争为主,敌我双方开展了残酷、激烈、反复的争夺。当时,敌人的主力为保住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要地,加强防务,对革命武装不断“清剿”、“扫荡”,并增设据点,扶植地方反动武装。萧县顽政府就是在他们的扶植下,组建了四个营的保安团和实力较强的区队、乡队等多层次的武装力量,装备与其正规部队一样,有的还配备了重机枪、

迫击炮等重武器。

萧县县大队上升为分区五团以后，县区武装也仅有400多人，而且武器低劣，弹药缺乏。敌人的兵力多于我们数倍，我们以巧妙灵活的战术，英勇果断的战斗作风与敌人周旋。1947年10月至1948年1月这段时间，敌人趁我主力外线作战，区、乡队武装就地坚持的空隙，采取夜袭方式向我连续进攻。我二、三、五、六、八区均遭到敌人袭击，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牺牲区长两名，区委书记一名，一般干部战士百余人。我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相机同敌人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遭到严重打击后，改变战术，在二区的丁里，三区的王寨、吴楼，四区的孟油坊、徐庄，五区的孙庄，六区的王新庄等处设立据点，深沟高垒，鹿砦碉堡，驻以重兵。各据点配合作战，一处有事各处支援，并与濉溪的顽敌实行联防，互相呼应，形成严密的碉堡网，构成“萧西的铜墙铁壁”。二、三、六、八区都处在敌人碉堡网的包围之中，地方武装活动比较困难，只能白天隐蔽，夜间活动，避锐击弱，相机作战，打击分散之敌，争取与主力配合，拔掉敌人的据点。

1948年春，国民党萧县县长换了李公达，李扬言“三个月消灭共匪”。他脚穿草鞋，手持大枪，亲临火线。为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他改用远道奔袭，迂回包围，连续“扫荡”，配合主力，全力出击的战术。这时，在军事力量上萧县人民武装仍处于劣势。为了站稳脚跟，县大队和三、六

区区队百余武装,于8月插入敌人腹地接驿集隐蔽。隐蔽的同时,我县、区武装常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李公达和他的主子蒋介石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我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下,以李公达为首的萧县国民党反动武装节节败退。萧县的形势逐渐好转。

第三节 恢复萧县的几次重要战斗

萧县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经过一年多艰苦的恢复工作,已由弱到强,开创了萧县的大好局面。这主要是依靠良好的群众基础与一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扬英勇果断的战斗作风,顽强战斗,艰苦拼搏。其间,有几次重要的战斗,对于扭转萧县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丁庄战斗

1947年11月,萧县刚恢复建制,县大队副大队长孟庆祥即进入萧县,在孙楼、崔口、李石林等地集合起20多名战士,编了两个班,这就是当时县武装力量的雏形。

为帮助萧县开展工作,分区三十六团由柯志强团长率领,活动在萧县西部的三、四、五区,寻机消灭敌人。孟庆祥带领武装人员跟随三十六团活动。一日,孟庆祥获得

可靠情报，国民党保安二团由孟昭信带一个营到大吴集设据点。孟庆祥与柯志强研究，决定消灭这个营，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

当晚，部队从孙楼集出发，深夜到达郝新庄宿营。布置了侦察任务后，孟庆祥带两个班的战士潜入公路边的丁庄，找来几个卖油、卖豆腐的老乡，让他们早上至岱山口、南瓦房几个村探听敌人的动向。敌人一出动，就让他们在庄上大声吆喝“卖千张豆腐皮喽”，同时使劲敲油梆子，以此作为敌人出动的信号，便于我方立即组织部队投入战斗。安排完毕，孟庆祥他们即返回郝新庄。

次日天亮以后，东边村子里传来了吆喝声，孟昭信的保安团果然出动了。孟庆祥和柯志强团长把部队布置在丁庄附近的公路两侧，专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圈。不凑巧的是，敌人走在前面的是郝新庄的乡队，刚到丁庄就打响了。也算孟昭信狡猾，他骑马走在队伍的后面，听到了丁庄响起枪声，就在公路上停下来，接着便命令他的保安团慢慢向后缩。柯团长一看，事不宜迟，便决定出击。孟庆祥早耐不住了，没等柯团长下达冲锋的命令，他就飞身上马，左手提着缰绳，右手高举起马刀，高呼“骑兵排跟我冲啊！”柯团长在后面想喊住他，孟庆祥心急，哪里听得见叫声，就和骑兵排的同志一鼓作气冲到郝瓦房东北地里，和孟昭信的队伍打了起来。他刀劈了敌人的机枪手，待下马夺机枪时，他的战马中弹而亡。孟昭信不敢骑马，混在人

群之中，被裹挟着落荒而逃。

这次战斗，敌人被击毙 10 多人，俘虏 30 多人，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40 余支。从此，孟庆祥被誉为“萧县的夏伯阳”。

小杨楼战斗

萧县恢复政权后，县委、县政府带领县大队武装经常活动在四区的李石林，崔口一带。为了坚持用鲜血开辟的地区，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三区便成了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恢复三区政权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已由 1 个班不过 10 人的区队发展成 1 个排 30 多人的武装。为接受过去的教训，既坚持上级提出的“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原则，又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由于环境恶化，区队常采取白天撤出去，黑夜插进来的办法进行活动。有时插进敌战区，在敌人不注意的空隙地带，住上一天两天，寻机打击敌人的乡公所、保公所的土顽。既对敌人形成威胁，又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成了国民党三区区长颢孙炎宗的眼中钉。

1947 年冬，为加强三区的工作，县委调孟繁超任三三区区委书记。孟繁超到任不久，发现通讯班长刘立本经常一个人外出，有时彻夜不归，行为反常。这是个危险信号，不仅影响个人的安全，也影响区机关与区队的安全。

由于长期残酷的斗争环境的锻炼，孟繁超同区长吴精忠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他们找刘立本谈话，耐心

地对其说服教育，刘承认自己已被顽三区区队长孙孝祖和顽保长孙宣由用 2000 元大洋收买，作为他们的内应，准备乘三区区委机关、区队宿营时，里应外合一网打尽。

面对这一情况，孟繁超与吴精忠决定将计就计，诱敌就范。在做好刘立本工作的基础上，让其与孙宣由约定农历腊月十四日举事。

三区区队当时只有 30 多支步枪和 1 挺轻机枪，而步枪半数为土造，难以对付进攻。于是，他们采取了三项对策：一、及时向县委、分区主力部队（五团）汇报，请求批准作战方案并给予支援。二、通知区队、乡队不要惊扰。三、与兄弟区队联系，请求他们向三区靠拢。

三天过后，分区五团的领导与县委领导共同商定作战方案：以三区区队作钓饵，诱敌上钩，五团再把敌人包围起来，里外夹击，消灭敌人。

具体作战计划：一、由县大队抽调一个加强排，配合三区区队于腊月十三日 11 点前驻进小杨楼，做好工事，封锁消息。二、由刘立本带领敌人上钩。三、五团在天黑后驻进小杨楼西四里的苏庄、王塘。四、整个战斗由县委领导和五团领导共同指挥，小杨楼内由孟庆祥（县大队副大队长）统一指挥。

时值隆冬，天降大雪，地面积雪一尺多厚。区队按计划驻进小杨楼，挖枪眼，堵大门，构筑工事。11 时许，战士们便进入阵地，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深夜，国民党三区区队约 300 多人鱼贯进村。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射程后，顿时枪声大作。敌人看攻不进院内，便放火烧房。房上堆满积雪，哪里烧得着。敌人便向院内、枪眼内投掷手榴弹。我们的战士坚守阵地，英勇杀敌，战斗呈胶着状态，有的院落有被攻破的危险。这时，远处传来五团战士的枪声，由远而近。敌人知道中计，趁五团没有形成包围圈之际，丢盔弃甲，夺路而逃。

此战，击溃敌人两个连，毙敌 12 人，生俘敌排长、突击队长以下 36 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子弹数千发。

马山战斗

国民党县政府于 1947 年底在五区的孙庄安设据点，驻保安团一个营。敌人以据点为依托，经常出来抢粮逼款，坑害百姓。

1948 年 1 月 27 日，我五区区委从情报员那里得悉：次日晨 5 点，保安团两个连出据点，经史庄南去抢粮。

县委书记朱玉林接到情报后，立即同县大队副大队长孟庆祥、分区五团蒋汉卿团长研究，决定吃掉这股出扰之敌。由县大队 3 个连，分区五团 2 个连，五区区队 90 多人共同作战，由孟庆祥统一指挥。

次日拂晓前，部队埋伏在史庄、李九店之间的港河里。部队的几个负责同志背起粪箕，伪装拾粪，随时观察敌人的动态，等待敌人出犯时围而歼之。

敌人果然按时出动了。他们从孙庄据点的西南角出来，一溜长蛇阵，300多人断断续续，走走停停。停住就不能打，一打他们便要往回缩，打不着了。乘敌人继续前进时，县大队四连跟着骑兵排，从西北边插了过去，切断了敌人逃回据点的退路。然后，集中火力在敌人背后猛射。敌人见状，乱作一团，急不择路，慌慌张张向南逃窜。

孟庆祥下达追击命令，埋伏的部队揪住敌人不放，奋起直追。一鼓作气追了20多里。敌人见我穷追不舍，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惊惶失措地上了马山，妄图凭借马山之险，固守待援。

我全体战士在山下抓紧吃了早饭，趁敌人未及构筑工事之际开始攻击。县大队的一连是华东野战军的休养连，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能攻善守，石连长要求担任主攻。孟庆祥、蒋团长作了战斗部署，确定一连担任主攻，二连火力掩护，四连和五团的战士在马山的东北角布防，不使敌人漏网。

保安团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现在已溃不成军。一连攻上山去，敌人哪有招架之力，便分散往山下逃跑，我五团战士迅速包围上去。那个石连长真够厉害的，他带两个班的战士截住敌人一挺重机枪，顶住射击，不让敌人抬下山去。

午后，战斗胜利结束，敌人死伤数十人，被俘130多人，我无一伤亡。这次战斗，共缴获1挺重机枪（五团带

走),4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

吴楼战斗

1948年3月,李公达调任国民党萧县县长。李一到任,即制订了他的所谓防务计划:一、加强保安团实力,充实兵员。二、与宿县、永城、砀山等县实行联防,互相支援。三、在萧西三区吴楼,四区孟油坊、徐庄设立据点,三点连成一线,构成萧西的坚固防线。

3月底,李公达免去保安团团长丁广惠之职,任命王德厚为保安团中校副团长,履行团长职务。王一到任,便亲率保安团2个步兵营,1个机炮连,配合三区、四区、五区区公所及区队计1000多人驻守吴楼据点,对萧西进行“清剿”。

吴楼在王寨西十里,筑有土圩子,外挖宽六米深四米的壕沟,沟外栽木城,架鹿砦,设四层屏障。敌人据守深沟高垒,做着万无一失的美梦。

据点建成,百姓遭殃。保安团、区队日夜出动,抓差,抓丁,拉伕,抢粮,奸淫妇女,捉我革命战士,抓我工作人员家属。据点建成后三个月的时间里,群众被无辜杀害者达170多人。

5月中旬,县委派人对吴楼据点进行了一次周密细致的侦察,将兵力、兵种、武器配备情况以及工事的设置详图等,分别上报给地委和边区党委。边区党委遂作出决定,拔掉吴楼据点,为民除害。

麦收迫近。5月下旬的一天,军区独立旅旅长金绍山亲率三十团、三十四团和一个炮兵营,计2500人,突然出现在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庄。下午5时,部队从吴楼西北入毛河东进至崔庄、梁巷,接着分兵进至张曹庄、任楼、小王塘、小柘园、苏柘园、欧庄、徐河涯等村,把吴楼据点团团围住。当晚,部队休息待命。深夜,部队开始构筑工事,挖300米长的交通沟两条,一条由据点北的崔庄直抵据点外的壕沟,另一条由梁巷直通据点东北角的碉堡。

次日4时许,金绍山旅长下达攻击命令,三十团主攻,炮兵营配合,三十四团打援。在迫击炮的掩护下,我三十团的全体健儿向敌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霎时,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我主攻部队沿交通沟从敌东北角的碉堡处冲了进去,敌众我寡,无法扩大战果。后续部队拥挤在狭小的交通沟内、圩壕内,冲不进去,冲进去的战士也只好退了下来。激战至上午9时,连续发起了三次猛攻,均未奏效。于是,调整部署,继续构筑工事,用土装入麻袋,用条囤垒起七八米高的堡垒,以便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敌据点内射击。火力攻击的同时,我军还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下最后通牒,“如不缴械,弃暗投明,我们动用大炮,后悔晚矣!”

深夜,我军对顽抗的敌人开始全面攻击。我军利用机枪,在垒起的一个个制高点上向据点内的敌人猛扫,用大炮向敌人的指挥所、碉堡猛轰。敌人惊恐万状,坚持到次

日凌晨 5 时许，便弃圩向东南方向逃窜，复遭我驻徐河涯等村的三十四团的迎头痛击。敌人溃不成军，一个个抱头鼠窜，各自逃命。天亮前，敌吴楼据点被攻克。

此战，歼敌 500 多人，敌保安团营长刘安良被击毙，还俘虏 150 多人，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

神树歼灭战

吴楼据点被军区独立旅拔除后，四区的徐庄、孟油坊两据点不攻自破，李公达吹嘘的萧西铜墙铁壁已不复存在。这时，我县大队武装已升编为分区新五团。新成立的县大队编制 2 个连，实有 100 多人枪。萧西大片地区一时成了真空地带。

顽三区区长侯克祥狼子野心，带领他的区队夜宿瓦子口，白天沿萧永公路西犯。

我县政府及武装人员在萧永边活动。由于力量比较单薄，长途奔袭已不可能，打分散孤立之敌实为上策。副县长单劲之、县大队副队长孟庆祥分析了打顽三区区队的三个有利条件：一、顽三区区队力量不大；二、顽区长侯克祥作恶累累，民愤极大；三、我们对三区的地形熟悉，青纱帐里活动比较方便。之后，又议定了作战方案。

1948 年 8 月，单劲之、孟庆祥留下县大队的后方机关，率两个连的精干武装，配合王寨区区队，由五区张集子出发，一下插到萧永公路侧的接驿集驻下。接驿集在萧永公路南侧 300 米处，是一个普通的穷村子。村外四面是

沟，易守难攻，容易封锁消息，军事上是难得的地利。

21日，天未亮，队伍便吃了早饭。为及时捕捉敌情，我部分干部、战士换上便衣，在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干农活。单劲之、孟庆祥两人坐在村后一片坟地的坟头上，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静，指挥全局。

上午七八点钟，敌人在公路上出现了。120多人的队伍，向神树方向运动。

“追上去，别让敌人溜掉！”单劲之下达了作战命令。孟庆祥迅速整理队伍，如猛虎下山扑向神树村。

队伍到了村东头，遇到下地干农活的老乡。老乡告诉他们，顽三区区长侯克祥和他的区队，正在村里吃派饭。队伍停在神树村后的小河里，单劲之、孟庆祥作了简短的动员，分析了敌情，要求速战速决。接着布置战斗任务：王寨区区长吴精忠带领区队绕到神树村南的河里埋伏，防止敌人南犯。村北枪不响，村南不准动；一连连长张瑞武率队从村东突破；二连连长张梦朗率队由村北楔入，再分兵扩大战果；孟庆祥冲锋，单劲之带一个排作为预备队留守村东北，指挥全局，严防敌人向东北逃窜。

一声令下，两连战士直插村里。敌人进了神树村后，只在村西南方向设了岗哨，就以班为单位把枪架起来吃饭。饭还没吃完，有的就被击毙，有的被活捉。

侯克祥、蒋相增一伙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弄得晕头转向，慌忙躲进一大户人家的院落里。这时，顽区队长杜

文美想出去看个究竟，刚出大门，就被机枪打断了双腿，旋即而死。

这座大院被县大队一、二两连的指战员围了个水泄不通，机枪封住了院门，战士们往院里猛掷手榴弹，敌人在院子里已无险可守，只有等死。蒋相增一伙高喊：“你们别打了，我们投降！”随后，他们便把枪交出来，当了俘虏。亡命徒侯克祥，躲到一幢砖墙瓦顶的西屋负隅顽抗。孟庆祥看到一时不能结束战斗，焦急万分，匣子枪推上顶门火就要冲上去。张瑞武一把按住了他，说了声“我去”，随即扔了两颗手榴弹，冲了上去。刚冲到门口，侯克祥一梭子子弹打来，张瑞武肩下连中三弹，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前胸，负了重伤，当即晕倒在地。正面冲不上去怎么办？二连连长张梦朗命令几个战士爬上房顶，揭开瓦片，往屋里扔手榴弹。侯克祥便往屋顶扫射，二连又有几个战士被打伤。

时间不允许再拖下去，驻在滩溪口的敌人、驻在崔口的敌保安团，离神树村都不足20华里，很可能出来支援。侯克祥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不除，战斗不能结束。孟庆祥急中生智，利用与侯的表亲关系，向侯喊话：“表叔，你不要打了，再打你就活不成了，缴枪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侯克祥嚎叫了一声“你说话可要算数”，就把枪扔了出来，承认了他的失败。

大家打扫战场，迅速撤出战斗。一场歼灭战，仅用了

40分钟就结束了。此战，毙敌30多人，俘敌三区区长侯克祥、区党部书记蒋相增等50余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受到豫皖苏军区的表扬。群众拍手称快，欢呼“歼灭了侯克祥，除了个活阎王”。

傅庄战斗

1948年10月间，国民党主力部队某师配合萧县保安团三、四个营，永城县刘子仁部的两个团及永城县的部分土顽，向萧西寻我作战。军分区邢天仁副司令员、余辉副政委率领分区机炮连、萧县县大队两个连、永城县大队一个连、砀南大队一个连和萧县四、五、六几个区的区队退至萧永边界。一日晚得悉，国民党某师正由瓦子口向徐州方向撤走。

当晚，邢副司令员、余副政委召开会议，研究敌情。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主力撤走，其萧县保安团及刘子仁部不敢在这一地区停留，必向陇海路边撤退。我们可在敌撤退的路上阻击一下，击溃其一部。我方将兵力部署在傅庄以西十华里的几个村庄，由东向西的次序为：萧县县大队、分区机炮连、永城县大队、砀南县大队。六区区队共计七八十人，担任保卫萧县县政府机关的任务，同时也作为预备队驻东西一条布兵线的北边，即傅庄东南300米的王庄。敌人在我布兵线南边八九华里的几个村庄。

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六区区队在天亮前进入王庄。拂晓前，我们的哨兵发现傅庄似有哨兵走动，不能断定是敌

是我。六区区委书记孟繁超当即通知大家准备战斗。敌人采取包围的阵势，分两路如钳形，以密集队形向我进攻。这时天已大亮，清楚地看出敌人有数百人，后续部队还不知多少。区队仓促应战。敌人以压倒的优势，几分钟后已把我区队的一个班赶出阵地。敌右翼随即占据了王庄西南角的一片房屋，与我阵地相距三四十米远，继续向我猛攻。敌左翼已进逼王庄后，与我逐屋争夺，我区队腹背受敌。敌众我寡，撤退定会造成惨重损失，坚持已无险可守。千钧一发之际，孟繁超振臂高呼“冲啊”，战士们迅速向左翼敌群中猛冲过去。狭路相逢勇者胜，敌先头部队百余人在我区队的勇猛冲杀下，始之愕然，继之调头逃跑。我区队弃却阵地，全部投入追击中。敌右翼随即占领了我们的阵地。但他们发现其左翼已败退，正惊骇不定。这时，孟庆祥率领的萧县县大队两个连（驻王庄西一公里的破阁村）听到枪声，未暇整队，即蜂拥而至，在区队的右后方呐喊助战，势如山崩地裂。敌左翼百多人见大势已去，向西北方向逃跑。区队正追击敌之左翼，发现敌之右翼在其背后，随即调转方向扭住这股敌人在傅庄展开战斗。区队把敌人压缩到一个大院中，孟繁超正指挥战士用手榴弹进攻时，敌拒守的院墙上探出一个人头，说他是院中的百姓，告知我方院中的敌人愿意缴械。孟繁超遂率领几个战士冲进院中，发现敌人已把枪械堆在一起了。

参战的敌方是刘子仁的一个团。他的另一个团驻傅

庄东北的中南海村，正准备参加战斗，看到前线已溃退下来，风声鹤唳，又不知我军之虚实，被他们的败兵冲了下去。

这次战斗，我们虽只数十人的区队，但有萧县大队、永城大队、砀南大队、分区机炮连作为后盾，敌人在摸不清我之实力的情况下，虽有装备精良的 3000 多人却不敢决战而败北了。

这次战斗共俘敌官兵 90 多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战马 1 匹，小炮 1 门。从此，萧县之敌龟缩到徐州近郊，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第四节 成立萧宿县

1948 年 3 月，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成立萧宿县，建立县委、县政府。县委由王尚三、张岸、张健生（张浩然）组成，王尚三任书记，二张为委员。张岸任县长，张健生任副县长。所辖区域包括萧县的龙山（一区）、朔里（二区）、天门（九区）及宿西县的张集、溪河、蔡里、濉溪镇、相山区等。时值国民党萧县县长李公达配合国民党主力部队大举向萧县西部进犯，萧县和宿西县的正面斗争十分艰苦。三专署专员许西连组织武装在徐暨与顽敌打了一仗后，组织萧县、萧宿县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开展两县的工作。会后，萧县与萧宿县就分开活动了。

萧宿县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是向东发展到津浦铁路沿线的一个空档。增设萧宿县，有利于我们开展徐州西南地区的活动，增加了一个打击敌人的拳头。

萧宿县县委、县政府隶属中共豫皖苏三地委、三专署。随着斗争的开展，组建了县大队，开始仅四五十人，后扩充到两个连，隶属豫皖苏三分区。大队长张岸（兼）、政委王尚三（兼）、副大队长张绍烈（兼），经常活动在濉溪口西刘桥、张集一带。

萧宿县初建，敌我斗争形势严峻，又值青黄不接之际，群众缺衣少食。政权机关人少，部队装备较差，又严重缺粮，经常在张集、蔡里等地筹粮。李公达不断带领保安团骚扰他们，将其挤到西北苗桥附近活动。他们有时带领部队到二、九区活动，有时在铁路沿线的大五柳、镇头寺宿营。一段时间里，他们大都在东部地区开展活动，打击敌人，在游击斗争中发展力量，没有遭到大的损失。

1948年夏，陈粟大军南下，萧宿县配合分区武装向徐州外围开展活动。为配合主力部队反攻，萧宿县军民曾组织两次津浦铁路大破击，翻轨数华里。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为了做好支前工作，萧宿县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豫皖苏三地委的部署，很快行动起来。县设立支前指挥部，张绍烈任指挥，王尚三任政委，赵俊德、李辉为指挥部成员，谢兰、徐钦民为办公室负责人。各区指挥部都是区长任指挥，区委书记任政

委。

根据前线军需粮秣的需要,萧宿县分批成立了粮站、兵站和民站。全县设立的粮站有 33 个。朔里区 8 个:段庄、房武楼、黄湾、吴双楼、丁庄、永堙、后土型和石台子;天门区有 4 个:孤山、寺后、白庄、庄里;丁里区有 2 个:梅村、丁里;蔡里区有 4 个:前土型、蔡里、蒋疃、五柳;濉溪周围有戴圩子、李桥子、仲大庄子、郭楼、渠沟、黄庄、丁楼、王店子、张集子、刘桥、小城子、宋疃、濉溪口、烈山、钟楼等 15 个。兵站有戴圩子、李桥子和丁庄 3 个。各区都有民站,主要负责担架、车辆的安排及民工的食宿问题。

淮海战役期间,萧宿县军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力做好支前工作。战役结束后,又协同萧、永两县积极做好善后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及战后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十二章

全力支援淮海战役

1948年秋，蒋介石集团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调集了7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约80万人，集结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与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妄图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阻止我军南下。针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及时作出了歼敌于长江以北的战略决策。辽沈战役刚结束，党中央即电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阔地区，发起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

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历时66天。萧县地处淮海战役的中心战场。在中共萧县县委、县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萧县人民倾其所有，尽其

所能，冒着枪林弹雨，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支援淮海战役，为人民解放军夺取战役的完全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杜聿明弃徐西逃

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我军歼灭从海州西撤的黄百韬兵团以后，为了防止徐州之敌南逃和蚌埠之敌北援，中原野战军于1948年11月16日解放了宿县城，截断了徐蚌段铁路，使徐州之敌成了瓮中之鳖。国民党“徐州剿总”企图夺回宿县，打通津浦路，于11月25日至28日，派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沿津浦铁路西侧，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沿津浦路东侧南进。第十六兵团四十一军于11月25日夜向萧县孤山集之笔架山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进攻，发生激战。26日，敌一二二师等部向守卫孤山集东南纱帽山的两广纵队进攻。敌以飞机、大炮猛轰，并动用化学炮，两广纵队稍作撤退。是日，国民党第十六兵团的一二二师、一二四师、一二七师又向卢村园山一线华野三纵发起进攻，战斗激烈，敌遭重大伤亡后撤退。28日至29日，华野三纵发动反击，打败一二二师与一二四师，收复孤山集阵地。

在这次战斗中，萧县祖楼区担架团出色地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早在8月29日，豫皖苏边区三地委就向各县发出关于组织常备担架团的通知。10月初，萧县县委

决定由祖楼区组织一个担架团，任命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兼祖楼区委书记王继冉担任团长兼政委，区委副书记张亚南担任副团长兼副政委。担架团共 162 副担架，972 人。另有 1 个民兵排，20 多人，全副武装，负责全团警戒。祖楼常备担架团随华野两广纵队活动，驻防在徐州西部及南部山区。没有伤员时，担架团就帮助部队挖战壕，修工事等。孤山集战斗期间，担架团共运送伤员三次。每次都是全团出动，把伤员在包扎所包扎好，由津浦路前线运到萧县西部张大屯一带的野战医院。担架团不畏敌机轰炸，夜以继日，先后将数百名伤员从前线运到后方，受到上级赞扬。豫皖苏三分区办的《反攻报》报道：“萧县祖楼区担架队，在转移孤山战役伤员时，表现非常好。从包扎所出发至某转运站，往返一百六十里路，又有很多难走的山路，他们不顾一切疲劳，两天就返回了。”

国民党军队打不通津浦路徐蚌段，自觉固守徐州前途暗淡，蒋介石遂决定向西南撤退。1948 年 11 月 30 日晚，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以及徐州地区国民党军政机关、后方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约 30 万人，放弃徐州，分多路经萧城向西南滚进。华野指挥部当即命令 11 个纵队的强大兵力，采取多层、多路尾追和迂回拦击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全线猛烈追击。12 月 1 日，杜聿明的指挥部到达萧县大吴集，邱清泉的兵团司令部到达王寨，孙元良的兵团司令部到达红庙，李弥的兵团

司令部到达曲里铺。3日，杜聿明的指挥部及邱清泉兵团到达永城县的陈官庄。李弥兵团驻李石林，后迁驻青龙集。孙元良兵团驻王白楼，后迁驻李石林。此时，他们接到蒋介石手谕，改变方向向南靠拢，企图援救被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我华野三纵、八纵、九纵从桃山集、城阳、永堙等地，经瓦子口向祖楼方向追击敌人。其中一部已于3日拂晓追至永城县的大茴村，与敌先头部队遭遇。华野的一纵、四纵、十二纵从褚兰出发，以一昼夜一百二三十里的急行军，在张寿楼一带，与敌人的掩护部队遭遇。其余二纵、十纵、十一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渤海纵队，也从不同方向配合追击，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合围。至4日，已形成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圈。12月6日晚，孙元良兵团从王白楼、赵破楼等地向西突围被歼，孙元良化装逃走。华野各纵缩小包围圈，将敌压缩在萧永边境以陈官庄、青龙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敌人突围，我军猛追。一夜之间，突然在萧县境内集中了五六十万部队，比当时全县人口还多，凡地图上标上的村庄都驻上了部队。县政府开始摸不清情况，先迁至子观寺，后移至刘憩集，等摸清情况返回时，已找不到住处。因地图上的村庄都被我方主力住上了，县政府人员只好夜宿秫秸庵子。后来有人提议，再找找军事地图没有标上的村庄，果然灵验。于是，县政府先移住吴集西南角菜园村，后移住任楼。

在此之前，萧县县委、县政府已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支前上。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及县大队副大队长孟庆祥，带领两个连在陇海铁路沿线的萧县七、八区和铜山县四区筹粮并组织运输力量，同时扫荡残顽的地方武装，安定人心，组建和恢复区、乡政权。11月27日，他们接到徐州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敌人向西突围的情报。孟庆祥把情报转交给朱玉林，朱玉林马上抄送分区、专署。分区回信指示：严密侦察徐州动向。29日，孟庆祥带一排人到权楼向王闸口方向侦察。30日晚上11时，即看到敌人出来了。他们一方面派人向上级报告，一方面派副排长带一个班去冲击一下敌人，要求要冲击到敌人开炮，动用轻、重机枪，借以向我后方报警。这个班很快就在韩庄东南角的朱大楼村与敌人接上了火，诱使敌人开了炮，动用了轻重机枪，自己打了自己人。孟庆祥带领县大队撤到郝集一带，在这里收缴了砀山保安团的机枪4挺，步枪200多支。

据豫皖苏军区参谋长陈明义写的《淮海战役中豫皖苏军民》一文记载：“一次，萧县大队大队长孟庆祥带领武装人员插入了杜聿明总部所在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杜聿明一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次，崔口乡民兵队长朱国勋配合华野部队，插入敌人心脏，奇袭敌军一个指挥部，立下了战功。杜聿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他写道：“少数解放军深入蒋军内部到处打枪，弄得蒋军草木皆兵，敌我不分，各据一村，彻夜混战。甚至

指挥部及邱清泉兵团所在地，内外亦发生混战。4日夜，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拂晓前始渐行沉寂。”

第二节 倾家荡产，支援淮海决战

11月上旬，萧县支前指挥部在王寨成立，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与副县长单劲之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各区乡也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各村成立了支前小组。大吴集、黄口、王寨、梅村、瓦子口、杜集等地设立了随军粮站。

杜聿明从徐州撤出的第三天，副县长单劲之就见到了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刘瑞龙。他交待的任务是，部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主要是粮食跟不上，要就地借粮。当时，山东随军支前指挥部也同县长朱玉林联系，要求萧县就地借粮500万斤。他们还担心，在短时间内筹这么多粮，会不会官逼民反？朱玉林回答，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萧县人民已经喊出了“倾家荡产，支援淮海决战”的口号。上级分配给萧县的借粮任务，仅半个月就完成了。三分区《反攻报》作了这样的报道：“白军西进被我主力包围后，各地粮站不能及时建立，别处的粮食又不能及时运来，萧县全体干部和群众响应了上级的借粮号召，半个月的时间（12月3日至17日），五百万斤的借粮任务已大部分完成（祖楼、袁圩、石林三个区因区境有敌人部队，是就地借粮的，数目在五十万斤以上，尚

不在五百万斤以内)。”

一县之内,短时间内筹集500万斤粮食,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对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部队来说,又是杯水车薪,仅够一天的粮食。刘瑞龙在《人民全力支前,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文中写道:“这一阶段,由于中原、华东野战军迅速转移集中于一个地区连续作战,前方有一百五十万人吃粮(注:包括支前民工),支前任务空前繁重,急需大批军需物资,每天仅粮食就需五百万斤,运输工作极度紧张。”12月12日,由老解放区运来的几百万斤粮面到达黄口车站,全县迅速组织300辆牛车运输。在十天内,把全部粮面运到大吴集、王桃园、郝新庄、王枣园、东镇店等粮站,及时供应主力部队。

在支前工作中,王寨区表现尤为突出。该区共筹粮120万斤,烧柴400多万斤,大白菜100多万斤,组织大车20多辆,独轮车30多辆,担架20多副。支前委员韩克均亲自带领民工送粮送菜,20副担架跟随四纵战士多次深入前线抢运伤员。另外,王寨区还组织了一个向导队,专门给解放军带路;组织了慰问团两次慰问部队,宰了8头猪、60多只羊,其它慰问品多种;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由15个烟酒小贩轮流到战地销售烟酒等日用品。南郭庄村13名党员组织4个村的群众,从淮海战役开始到结束,共支援军鞋100双,衣服60多件,送煮熟的青菜1万多斤,鸡蛋1000多个,小鸡2000多只,猪肉5000多

斤，丸子 3000 多斤，甘蔗 3 万多斤。为了支前，许多群众把房子拆了，把房梁、门板送给部队构筑工事。刚汇集而来的部队，一时粮食跟不上，群众就有什么拿什么，连山芋都吃光了，留下来的种子也拿出来给战士们吃了。王寨区的支前工作，受到了解放军指战员的交口称赞。该区被评为支前模范单位。

在支前的民工中，不仅有萧县的，更多是外地的。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操着不同的口音，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支援解放军全歼敌人，夺取战役的全胜。由于缺乏现代交通工具，运输主要是人背、肩挑、担架抬、小车推、牛车拉、骡马驮。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忍着风雪饥寒，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日夜奋战在运输线上，穿梭于前线与后方，形成了一支亘古未有、气势磅礴的支前大军。陈毅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一词中，对此壮观情景有着生动地描述：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后方群众不分男女老幼，昼夜不停地加工军粮，赶做军衣、军鞋，筹集粮草及修筑工事所需材料，照顾伤员，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中，萧县（不包括划归萧宿县的一、二、九区）的支前工作成绩大致如下：动员民工（包括随军转运民工和临时民工）近10万人；筹粮1095万多斤，柴草3133万多斤；组织担架5700多副，大小车辆8500多辆。还有诸多难以数计的菜、禽、蛋、油、肉等吃食，以及军衣、军鞋、布匹、木料、家具、棺木、牲畜，等等。

在做好各项支前工作的同时，县、区、乡武装及广大民兵，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据不完全统计，战役期间，我地方武装曾单独参加较大战斗290多次，配合主力作战160多次。此外，还担负着捕捉散兵、看押俘虏、清剿土匪、维持治安等任务。例如，1948年12月3日拂晓，萧县八区颜店村李子原等8人捉了6个敌军散兵，缴步枪6支。同日下午及4日拂晓，李子原带领本村5个农民又捉了12个敌兵，缴步枪12支。该村村民朱小楼、朱传杨、朱传德等8人，带3支“土压五”来到庄北三里的马庄，冲进一处住着14个敌兵的房子，当即缴获步枪11支。4日午后，五区王屯、杨庄、崔小庄的群众，看到杨庄庄前停着敌人一辆满

载军火的大卡车，大家拿着锄头、铁锹等农具，蜂拥而上，把五个押车的敌兵吓跑，缴获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1 挺及炮弹、电台等军用物资。当日下午，他们便把全部缴获品交给了正在追击逃敌的某部解放军。五区民主政府于数日内即收到各村群众送来缴获的步枪 90 支，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1 挺，电台 3 部、弹药 10 余箱。该区各乡办公处亦普遍收到了群众缴来的枪支弹药。五区吴楼村的吴忠奎老先生，自己双目失明，便叫两个孩子去路上拾子弹。13 日下午，他亲自背了 700 发子弹送到区政府。此类事例甚多，举不胜举。

自我军发动淮海战役以来（尤其是徐州解放后），萧县地方武装就积极活动，对地方土匪、散敌进行清剿与政治争取工作，散匪纷纷向我县、区、乡人民政府投诚。国民党萧县保安团副团长胡映熙与一、二大队队长韩登云、杨俊领等集体投诚，交出步枪 150 余支，机枪 15 挺，子弹数千发。大屯区收缴枪支 80 余支，七区 100 余支，八区 150 支。王寨区机枪 3 挺，步枪 40 余支，还有子弹、炮弹等一批军用物资。萧县县大队在截击徐州逃敌中，缴获重炮 1 门，迫击炮 1 门，小炮 20 余门，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30 余挺，步枪百余支，战马 15 匹。

总之，萧县党政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历尽艰辛，不惜倾家荡产，舍生忘死，全力以赴支援和配合子弟兵作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节 大决战中的蔡洼

萧县县城西南十多公里处，有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蔡洼。在中国两个命运的决战中，这里却发生了值得永远纪念的大事件。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委会议即在此召开，并留下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总前委领导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熟悉淮海战役的人都知道，打一场淮海战役的建议，最早是由粟裕提出的，围歼杜、邱、李集团的最后决战，又是粟裕指挥的。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最关键时期，在这里度过了28个日日夜夜。

一代名将粟裕为什么要把指挥部选在这里呢？1948年12月15日夜，黄维兵团被全歼，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为了就近指挥各纵队发动总攻，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华野指挥部从宿县孟圩子移驻蔡洼。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移住后，最先接到的电报就是毛主席代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致粟裕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二是“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电告我们修改播发”。此后，华野即按此指示部署实施。为配合平津战役，进行了20天的战场休整，围

而不打，主要是对杜聿明集团进行政治攻势。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预见歼灭杜聿明集团不成问题，于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请刘、陈、邓、粟、谭五位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的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到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

不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所料，三天后黄维兵团残部被歼。12月16日晚饭后，刘伯承司令员、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乘坐吉普车，从中野指挥部所在地——小李庄出发，沿土公路向30公里外的华野指挥部所在地——蔡洼开去。晚上9点钟左右，粟裕同志听到汽车声，迎到村口，第一个同刘伯承握手。他高兴地对伯承同志说：“啊呀！我们已有十七年没有见面了。”17年前，那是1931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在连续四次获得反“围剿”胜利后，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红军失败，根据地丧失，五位首长先后分手。1934年，先是粟裕随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后是刘、邓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陈毅和谭震林留在赣南和闽西南坚持游击战。17年前的分离与此时的重新会合，标志着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

晚上，刘、陈、邓三位首长住在粟裕住处，即蔡洼村杨

家台子李春华家后院的五间堂屋里。第二天天刚亮，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赶来。吃过早饭，就在粟裕住处开会。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淮海战役结束后渡江作战的问题与部队整编方案。

会间，粟裕拿出一份军委电报，高兴地递给大家看。电文称：“淮海战役已进行月余，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张（震）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烟者，得以其它等价物品代替。此项物款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均担。”大家看了电文都很高兴，粟裕更是兴奋，因为头天早上华野才电请军委准予慰劳部队每人半斤猪肉、五包香烟，谁知军委当天就批准，第二天就把电报发回，并且把每人半斤猪肉增至一斤。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华野请示慰劳部队的电文发到西柏坡后，是周恩来副主席先看到的。周副主席当即代军委起草了这份电报，并请毛主席、朱总司令审批，毛主席、朱总司令马上同意，当即发回淮海前线。

同一天，新华社还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为淮海前线司令部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一篇情文并茂、说理透彻的不朽之作，是射向敌人的重型炮弹。对该文的连续广播覆盖了萧县、永城边境上空，促使杜聿明集团的官兵纷纷弃暗投明。

此次总前委会议，是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休息时，五位首长一起走出屋来，在屋前由随军记者陆仁生拍了一张合影，真实地记录了从指挥百万大军的战场上归来的将领风采。那威威乎大将风度，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跃然合影之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欣赏这张合影时，那定格的画面在记忆的闪回中给了我们诸多新的思索与遐想。

12月17日开了一天会。散会后，邓小平政委回到小李庄，刘、陈两位司令员则驱车北上，赶去西柏坡开会，接受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粟裕仍在总前委开会的地方指挥决战。

这是一处二进的院落，粟裕住的五间堂屋是后院。后院里的东屋是电台所在地，西屋是总机所在地。前院为参谋、秘书和警卫人员住处。就是在这个农家院落，粟裕前后调动16个纵队的兵力，全歼被围困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杜聿明集团的26万人马。在这28天里，粟裕既部署军事攻势，又部署政治攻势，既指挥自己的队伍，又按预定的方案安排敌人的末日。

1949年元旦前后，发现敌方部队调动频繁，有的西去，有的东去，敌人想干什么？华野指挥部忙碌起来，诸位首长作出各种各样的预测。粟裕在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作出结论性的发言：“杜聿明现在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天天挨炮，天也和他作对，大雪纷纷，飞机只能高空飞行。因此，敌人见天上地下来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能企图

拼死突围。虽然敌人是关在笼里的老虎，但要准备它逃出笼来打。”根据这个分析，作战参谋们拿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抽出一些部队在永城东南与东北面组织第二防线，布置一个口袋；第二方案：不让敌人突围，而乘敌人调整部署、兵马混乱时发起进攻。1949年1月2日，粟裕按照第二方案，请示前委并经毛主席同意，于蔡洼下达了作战命令：趁杜聿明集团恐慌之际发起总攻，按先分割包围李弥残部、再歼灭邱清泉残部的计划，各部统一于1月6日发起战斗。

总攻于1月6日下午3时30分开始，顷刻间，敌人的阵地和据点变成一片浓烟火海。我军经过休整，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大军像从天而降，如猛虎下山，枪炮声、冲杀声响成一片。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坦克，加上人吼马嘶，撼天动地。东集团由三、四、十、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一、三旅组成，主攻青龙集方向李弥兵团，由宋时伦司令员和刘培善政委统一指挥。经过两天激战，李弥兵团于8日仓促放弃青龙集向邱清泉兵团靠拢。青龙集被我军占领，杜聿明总部受到严重威胁。杜、邱下令死守青龙集以西罗河两岸工事最坚固的阵地，这里有遍布村内村外的环形防卫体系，给进攻增加了困难。我军正如《奇袭青龙集》一诗中所描述的：“奇袭青龙费苦心，天兵豪气贯星辰；疆场杀敌猛如虎，神出雄狮百战身。”经过罗河攻坚战，东集团很快与西集团、北集团汇合，最后突破了敌人

用汽车、坦克排成的环形围墙。这时，已是1月10日天亮时分，敌人大部已停止抵抗，坐下缴枪。我军迅速占领陈官庄。最后四天激战，后勤司令刘瑞龙有诗曰：“四晚总攻同捣蒜，贼军穷蹙终败亡；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第四节 杜聿明萧县被俘

1949年1月9日深夜，在淮海战役的枪炮声中，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带着副官、卫士等一行14人，从国民党新五军驻地陈官庄，经萧县的夏寨向东北仓惶逃跑。途中，副官尹东生给杜聿明剃去小胡子，并换上士兵的衣服，妄图漏网。

10日黎明，萧县四区张老庄村的村民段庆香父子正在村外拾粪，发现了杜聿明一伙行动鬼祟的人。这伙人不走大路，却踏着麦田里的残雪乱七八糟地簇拥在一起。段庆香抗战初期曾担任过抗日民主政府的情报站站长，略具军事常识，此情此景使他十分诧异，当即安排他父亲回村报告驻军。

副官尹东生跑到段庆香跟前，央求给弄件便衣换上。段说：“我哪里给你弄便衣去。”尹问：“你们村里有部队吗？”段说：“周围几十里、上百里都驻满了解放军。”尹一下子紧张起来了，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金戒指塞给段

庆香,叫他不要声张,妄图溜之大吉。段正焦急万分,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知村外发现敌情的张老庄驻军四纵队十一师卫生处通讯员范正国、崔喜云赶上来了。杜聿明一伙发现有人追来,准备抵抗。崔、范二人借助坟头的有利地形,大声喊道:“什么人,上来一个!”自称是队长的尹东生走上来反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范正国答道:“我们是四纵十一师的。你们是哪部分的?”尹狡猾地回答:“我们也是四纵十一师的,原来咱们是一个师的。”小范又问道:“师长姓什么?”尹答不上了。范正国对他说:“对不起,请把你的枪交给我。这是上级的命令,如确实是自己人,一定还给你。”说话间,范正国已下了尹的枪,并把子弹推上膛,对着尹的胸口命令道:“叫他们全部缴枪!”这伙人便驯服地交出了四支汤姆、一支卡宾、四支快慢机和四支加拿大手枪。这时,休养连的轻伤员也闻讯赶到,将这伙人押回了张老庄村。然后转送到四纵十一师政治部审查。

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把自称蒋军十三兵团“军需高文明”的反复审问,他左支右吾,不肯吐露真情,只是把纸烟一支接一支地猛吸。当“军需”又拿出一支纸烟衔在嘴里时,他身旁的一个伙伴立即打燃火机,慌忙给“军需”点火。我政治部陈主任见此情景,心里揣摩,此人一定来头不小,就一个劲地追问他:“你到底是什么官,还是坦白交待吧,抵赖是枉费心机的。黄维、吴绍周都被清查出来了,你是蒙混不过去的。”“军需”听说黄维被查,蓦地一

惊，忙问：“黄维现在在哪里？”政治部主任告诉他：“你们不久就会见面的。”此时，“军需”语无伦次地连续发问：“你是不是陈毅司令？你是不是纵队司令？”

饭后，政治部把“军需高文明”看押在一间房子内。他乘人不备，拣起一块半头砖，对着自己的额角一击，敲破了头皮，把血涂了一脸，倒在地上装死。解放军的医生替他包扎时，他光是哼哼，一句话也不说。当政治部的同志拿出敌工部门送来的杜聿明的照片和这个“军需高文明”对照时，发现他和杜聿明一模一样，只是少掉一撮小胡子。当天晚上，从被俘的徐州“剿总司令部”副官口中证实，这个装死的“高文明”就是头等战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因为铁证如山，“高文明”自知无法抵赖，才绝望地低下头，胆怯地说：“我……我是杜聿明。”

段庆香发现杜聿明等人并报告给当地驻军，使杜聿明等人被俘，这是萧县人民为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作出的又一贡献。

第五节 总前委蔡洼会议的历史意义

淮海战役总前委，是根据战役的发展，我军参战部队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为了加强前线的统一指挥，于1948年11月16日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决定成立的。中央

军委在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使中野、华野两大主力作战及后勤支前等各项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更加有机地协同作战，是夺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总前委成立后，统筹指挥各部，很快全歼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全歼在望，杜聿明集团也投入了罗网。这时，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主席已经考虑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如何乘胜前进，进军江南，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便于1948年12月12日电示总前委召开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邓小平书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统筹安排。在会议召开的时间上，选择在1948年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之后，而华野完成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尚未围歼之前的作战间隙。在会议召开的地

点上,考虑到华野正在围歼杜聿明集团,作为代司令员、代政委的粟裕和副政委谭震林很难分身的实际情况,将会址选在华野指挥部所在地——萧县蔡洼,并于12月16日安排好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的工作,当晚同刘伯承、陈毅司令员一起,驱车赶到蔡洼与粟裕会合。

时任华野副参谋长、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其1997年2月19日所写的《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1948年底。此时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成为南线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在以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中野、华野两支大军并肩作战,仗打得非常好。”

“1948年12月中旬,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黄维兵团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啃掉,杜聿明集团也已成瓮中之鳖。考虑到平津战场的需要,为防止蒋介石下决心命傅作义集团南调,毛主席要求淮海前线部队,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之余部,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2月12日又电示要总前委开一次会,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并将意见由伯承同志带中央。这样,总前委就决定在华野司令部召开一次会议。”

“当时,华野司令部住在萧县西南一个名叫蔡洼的村子里。听说小平和伯承、陈毅同志要来,我们都非常兴奋。

粟裕同志带着我们一块到村边去迎接。我记得他们几个人坐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小平同志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那么大的村子，不怕国民党的飞机把你们炸了？还是要怕死一点啰。’说得大家哈哈笑了起来。我赶忙插上一句话：‘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得来炸我们了。’面对淮海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军已成强弩之末的大好形势，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在蔡洼，总前委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已经不是淮海战役本身，而是关于渡江作战的问题了。大家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敌人的江防部署，对我军实施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讨论了两大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兵力编成和部署，以及渡江作战的时机和协同等问题。会议休息时，总前委还在一起照了相，就是那张著名的五人合影，使今天的人们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的战斗风采。当时，我们华野三大部门领导同志在旁边，照相时总前委首长拉我们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前去。今天想起来，真有点后悔，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历史镜头啊！会后，伯承和陈毅同志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返回中野司令部。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和总前委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张震同志的上述回忆里，我们不难看出：蔡洼会议

是邓小平书记主持召开的唯一的总前委会议，关系到淮海和渡江两大战役的胜利，历史地位十分重要。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总前委成员、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副政委谭震林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会议的要求，在蔡洼发出了《华野战字第十五号命令》，组织各纵抓紧时机进行战场休整，一面组织兵员和武器装备的补充，充实作战部队，一面抓住战斗间隙，进行战术、技术的研究训练，总结经验教训，使华野全军由 36.9 万人发展到近 50 万人。同时，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和广大指挥员深入前线，深入基层，广泛开展立功选模、火线庆功、战地诉苦等生动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活动，使华野各部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战场休整中，各纵还利用天降大雪，被困之敌饥寒交迫的困境，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政治攻势，使敌人军心涣散。据有关资料记载，从 1948 年 12 月 16 日至 1949 年 1 月 5 日的 20 天中，敌军官兵投降者达 1.3 万人。1949 年 1 月 2 日，粟裕代司令员在蔡洼下达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华野战字第 16 号命令》。1 月 6 日发起总攻，到 10 日 16 时，全歼杜聿明集团 26.2 万余人，击毙邱清泉，活捉杜聿明。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西柏坡举行会议，刘伯承和陈毅同志代表淮海战役总前委，就蔡洼会议形成的渡江作战意见，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专题汇报。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的

决议,明确提出淮海、平津战役后,“几大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并通知第三野战军粟裕、陈士榘、张震:“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部署,迅速投入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1949年2月11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再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康生、粟裕、谭震林:“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这已明示:淮海战役总前委负有渡江战役指挥之责。蔡洼会议形成的渡江作战意见,已进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并付诸实施。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我军发布渡江作战命令。当日晚,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九兵团强渡长江。21日晚,第一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四兵团、第五兵团和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十兵团同时发起突击。到24日晚,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筹指挥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接着又夺取了淞沪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总前委蔡洼会议研究决定的作战方案是正确可行的。它对两大战役的

胜利,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附:

是谁活捉了杜聿明?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没有比杜聿明的官位更大的了。杜聿明为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黄埔一期。

杜聿明是被谁活捉的呢?毫无疑问是解放军官兵。可是,还有一个人现在被很多人忘记了。

据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是“一个老百姓。”

据1949年1月18日《大众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战犯杜聿明落网记》的通讯说,是“一位老乡”。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萧县志》记载:1949年1月10日凌晨,杜聿明化名“高文明”,逃到了萧县的张老庄附近,遇到一位拾粪的农民段庆香。杜的副官把金戒指塞到段的手中,企图让段帮他们换一身便衣。段看他们是大官儿的模样,便向驻在庄上的部队卫生院报告。卫生院官兵便赶上去抓住了“高文明”……

事情很明显,假如没有这位“老百姓”、“老乡”、“拾粪农民”的警觉,杜聿明能否抓住,都很难说。抓不到杜聿

明，淮海战役的战果固然仍是辉煌的，可是，总有点减色。抓不到杜聿明，杜聿明的后半生会成为什么样子？至少全国政协要少一名常委。

电影《大决战》在结束语中，引用了斯大林和美国军事家的惊叹：淮海战役中，“共产党怎么会用六十万军队战胜国民党八十万军队？”其中的奥妙可以从活捉杜聿明的经过中找到答案。

今后，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在中国大概是不会再发生了。可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仍然喜欢把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比作“淮海战役”。历史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人们不大喜欢用“战役”作比，而喜欢用“工程”二字了。如今，名目繁多的工程不绝于耳。用“工程”作比，增强了工作的科学性。而要办成一件大事，首先要科学态度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同时，也要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争取老百姓的支持。

应该记住在活捉杜聿明的过程中，那种依靠“老百姓”、依靠“老乡”、依靠“拾粪农民”的解放军作风，不要太相信“上智下愚”的陈腐观念。不是么，那位参与活捉杜聿明的老百姓，不就是不受黄金的诱惑吗？刚刚解放没几天的老百姓尚且有那么高的道德水平，已经解放四十八年的老百姓，怎么会低呢？

（注：此文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所作，发表在1997年11月16日的《拂晓报》上。）

第十三章

迎接新中国诞生

淮海战役结束，萧县人民获得了解放。但是，连年的战争已使萧县千疮百孔，满目凄凉，加之国民党特务及各种反动势力的捣乱与破坏，萧县的社会秩序动乱不安，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在上级党的关心支持下，中共萧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渡道道难关，以实际行动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第一节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

萧县处于淮海战役的漩涡之中。以青龙集、李石林为中心，方圆 40 里，大地看不见树木，村庄看不到房屋，154 个村庄的 24600 间房屋全部被战火吞噬，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废墟。3 万多灾民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在战役中，群众死亡 1681 人，伤 690 多人，失踪 272 人，损失牲

畜 3900 多头。大战后，留下的纵横交错的网式战壕，折合 7 万多亩。据不完全统计，萧永边境（缺六个村庄）的群众六天共掩埋敌尸 15192 具（其中包括被葬在大屯区单庄村村后的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的尸体）。陈尸遍野导致疾病流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因伤寒、痢疾、脑膜炎、天花等疾病死亡的群众就达 554 人，身染重病的 2152 人。

惨重的战灾加上迅疾蔓延的疾病，严重威胁着战后的萧县人民。1949 年元月下旬，上级紧急从外地调来中外医生 727 人（包括国际红十字会中牟分会派来的医疗队）。其中，内科 393 人，外科 173 人，眼科 161 人。他们组建了 35 个医疗队和 4 个小型临时医院，一天最多治疗 800 人，共使 3 万多患者得到了较好的治疗，治愈 1.8 万多人。医疗队还把治病与防疫相结合，普遍为灾民打了防疫针，尸体多的地方撒了石灰水，对水井进行消毒，等等。

为了使全县人民尤其是灾区群众顺利渡过难关，尽快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县委、县民主政府虽僻处乡间，并没有急于搬进萧城，而是及时成立了由副县长单劲之为主任的“支前、救灾委员会”，紧急动员全县人民，起来进行战场救灾。该委员会下设调查登记、粮食保管、生产建设、卫生防疫四个股，各区、乡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在做好支援渡江战役有关工作的同时，紧张有序地开展战后恢复工作。

县委、县政府对战灾作出了这样的分析,认为它与其它灾害不同,战争把一切化为灰烬,使灾民倾家荡产,必须突击进行救助,迟了会死人。正因为如此,救灾委员会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帮助灾民兴家立业,恢复家园”的口号,要求努力做到四条:第一条,不饿死一个人;第二条,不荒一亩地;第三条,午收前先建一部分贴墙屋,秋种前每户盖一至两间房;第四条,通过救灾,改造旧政权,发展党组织。

为了做到不因饥饿而死亡一个人,县政府先给灾民发放了一部分安家粮。1949年3月,每人发红白面粉15公斤,秋粮25公斤,盐2公斤。随后,又陆续从老解放区运来粮食、棉絮等物资。按灾情程度发放,重灾区每人152.5公斤,二等灾区每人102.5五公斤,三等灾区每人75公斤,共发放粮食434万公斤,棉絮5000公斤。募捐物资的发放,重灾区每人合八尺白布,一至两件衣服(多数是部队捐献的军装),铁锅一户一口,农具每户两镰一锄。重灾区每户还发放能盖一间屋的柴草和木料,让灾民先建一间草房或贴墙屋,暂时栖身。

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是救灾的另一个好办法。罗河(又名王引河)位于萧、永边境,是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阵地,弹坑累累,尸横盈河。县政府经请示上级批准,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灾民进行治理。灾民共出工10670人,每人每天发粮3公斤。原计划5天完

成,结果只用了三天半时间,就完成了64万土方任务,共发粮14万公斤。

由于萧县长期处于拉锯式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敌我双方争夺激烈,战事频繁,以致于河道长期失修,灾荒不断。1949年初夏的两场暴雨,使奎、龙、闸、岱、沙五条河的干流河道全部决口,支流平塌。全县平地积水,86万多亩农田受淹,朔里、陶楼等区发生夏荒。秋季又遭一场大雨,灾民由31万人增加到41万人。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县(缺一个区)逃荒的1.1万户,2.6万人;断炊的3.8万户,13万人。长期战灾加上严重的水灾,导致全县灾情逐渐加重,形成了断炊户逐渐增加的趋势。为了帮助萧县人民渡过难关,1949年国家给萧县发放各种救济粮近2000万公斤。

国家的救济只能缓解萧县人民暂时的困难,医治战争创伤与救灾的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也是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以后对经济上翻身的迫切要求。县委、县政府在解决全县人民特别是灾民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

第一,解决灾民恢复生产、生活存在的困难。县政府在玉皇阁、华祖庙等地建了五座铁工厂,利用战场上丢弃的废汽车、坦克、弹皮等,生产铁犁、铡刀、镰刀、铁锹、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品,无偿地发给灾民。县政府发的农具,

加上灾民非正式的代用农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灾民的农具已恢复到半数以上。

耕牛是农民的宝贝。灾民的耕牛在战火中损失殆尽,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没有它是不行的。为解决耕牛问题,县委、县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发放购买耕牛的补助粮 20 万公斤。重灾区每户 200 公斤,轻灾区每户 150 公斤。一户没能力买,提倡两户、三户合伙买。少买公牛,多买母牛,加速幼畜繁殖。二是组织互助组,采取帮牛腿、搁犴、当牛耳朵等办法耕种土地。三是发动非战区的农民组织代耕队,每保出一犴牲口,自带吃用草料。全县共出动 750 犴牲口,奔赴战区代耕春地 1.5 万亩。

1949 年 6 月,县政府在石林区崔口乡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基层合作社,代购代销农副产品,经销生产、生活用品,方便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

第二,启动和发展农副业生产。当时,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是涝灾。县委、县政府统筹安排,统一部署,对境内龙、岱、奎、闸、沙等河的干流河道,进行固堤、补岸、清淤,对支流也进行了整治,并开挖了不少泄水沟。这样,初步缓解了水灾的威胁,为抗灾夺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副业生产方面,共摸排 120 多种副业门路,其中大多是四坊五匠,搞得好的也能养家糊口。通过摸底统计,全县共有木匠铺 3000 户,铁匠铺 1500 户,石匠 1000 户,香油坊 3000 户,粉丝加工 600 户,豆腐坊 2000 户,编

织 5000 户，弹花轧花 1000 户，捕鱼摸虾 6000 户，纺车 93163 辆，织布机 13537 架，商店 6000 家，中西医药铺 350 个。根据上述情况，县委、县政府很快在全县建立起 14 个基层合作社，为上述副业生产牵线搭桥，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服务。例如，对于当地有原料，或已加工成成品，而且又有销路的苇席、棉花、豆油等，由合作社或专业公司收购；对花生、黄花菜、烟叶、石榴、鸡蛋、土布等农副产品，则由合作社帮助找销路；对以粮食为原料，销量又不大的粉丝，则限制生产，等等。此外，还组织油坊为政府加工豆油。政府每发 100 斤大豆，要求交 70 斤饼与 8 斤油，剩下归己。油坊户每加工 100 斤大豆，自己便可得到 15~25 斤粮。仅此一项，全县就获粮 120 多万公斤。

第三，组织互助合作，开展劳动竞赛。从 1949 年春开始，县政府即在救灾过程中组织劳动互助，除耕、种互助外，还把男劳力组织起来搞副业。全县共组织副业组 5726 个，有 10 万多人参加，盈利明显。与此同时，还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劳模，奖励生产能手。

第四，学习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县委、县政府鼓励干部、群众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如在农作物栽培上提倡等距、全苗、密植、合理施肥等，推广劳模的经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注重推广优良品种。小麦推广的“438”、红秃头、红花雾等品种，都是当时公认的优良品种。

总之，上级党的关心，县委、县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萧县人民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广大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第二节 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蒋介石反动集团为挽回败局，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或美苏出面“调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为了给自己争取喘息时间，他们打着“愿以中共所提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的幌子，一方面紧锣密鼓地部署长江防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另一方面，则是向解放区派遣了大批特务，使之与其党政军逃离时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一起，搜罗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勾结地方恶霸、土匪、反动道会门头子、反动党团分子等各种反动势力，采取造谣煽动，组织暴动，暗杀革命干部，袭击我基层政权，抢劫枪支与财物等手段，作垂死挣扎。

1949年初，国民党少将衔军统特务头子李华堂，勾结萧县“先天道”与“红旗门”道首，笼络1000多道众组成“先天剿匪总队”，活动于苏鲁豫皖边境地区。3月，他们在黄口南殷楼村组织武装暴动，杀害了数名六区（陶楼区）干部和民兵。在萧、宿、永三县交界地带，国民党特务纠合

土匪、道会门兴风作浪，活动猖獗，制造了多起暗杀与暴动事件。7月初，百余微山湖土匪窜入萧县七区（郝集区）与铜山县交界处，杀人越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7月中旬，又有砀山县唐寨区南蔡庄一带的土匪十余人窜扰萧县。与此同时，县城北关一国民党特务用“拜把子”、“美人计”等手段，拉拢县大队一伤员，与之串通一气，里应外合谋杀县长。段庄乡吴老庙村一国民党军官，与潜伏在县大队的特务相勾结，策动武装叛乱，等等。此外，成股的土匪、特务偷袭乡村政权，杀害基层干部和民兵，抢劫公粮，假冒人民解放军向群众派粮要款等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严重地危害着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宁，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打击敌人的种种破坏活动，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成为县委、县政府亟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及时下发了一系列关于做好剿匪肃特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文件，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及注意事项。1949年2月始，首先进行反动党、团、特人员的摸底登记工作。至4月上旬，县委、县政府两次发布通告，要求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及其它一切反动组织之蒋方人员，携带区介绍信、证件、照片等，由保证人带领，限期到指定地点登记。4月底止，上自团级军官与县党部委员，下至一般士兵及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全县共登记蒋方党、团、特人员1500余人。登记

后,由于救灾任务重,支援渡江战役工作繁杂而紧迫,县委、县政府对这些人员控制不力,致使为首分子大部分逃走,有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

1949年4月,打击反动道会门与剿匪肃特工作全面展开。萧县境内,反动道会门组织名称繁杂,有“一贯道”、“先天道”、“圣贤道”、“中方道”、“先天玄关大道”、“天门道”、“红旗门”、“黄旗门”、“黑旗门”等38种,活动于全县22个乡,650多个村庄。建国前,这些道会门组织共发展各类道首963人,道众9500余人。国民党特务勾结反动道首秘密集会,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建设。鉴于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对反动道会门组织的打击,坚持了争取、瓦解与镇压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主要方法是派公安人员打入其内部,摸清情况,适时对其进行分化瓦解,着重打击反动道首,全面摧毁其组织。与此同时,对一般道众及广大群众,普遍进行反对反动道会门的思想教育。

在打击反动道会门的同时,剿匪肃特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为了集中力量打击萧、宿、永边之匪特,宿县地委于4月6日成立了由11名地、县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萧宿永边剿匪工作委员会”,萧县公安局副局长胡石生为委员。剿工委指挥三县部队、民兵及公安人员,迅速扑灭了这股匪特。青纱帐期间,匪特利用青纱帐作掩护,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和抢劫。特别是在龙城、北

望、郝集等区，匪特活动尤为猖獗。县委、县政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指挥公安干警、地方部队和民兵，三方协同作战，采取政策攻心与军事清剿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匪特组织，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军事镇压。

据1949年萧县公安工作年终总结显示，在9~11月三个月的剿匪工作中，击毙的除外，共抓捕土匪、特务、恶霸、道会门等反动分子485人，缴获各类枪支394支。至11月底，剿匪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卓有成效的剿匪工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反霸斗争全面展开，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 加强党和政权建设

1949年2月，县委、县政府从城西任楼迁入萧城。3月，中共豫皖苏分局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归河南、安徽、江苏建制。萧县划属河南省商丘专员公署代管。萧宿县同时撤销，其辖区内原属萧县的一、二、九区仍划归萧县。此外，原属铜山县的郝集、北望、棠张三个区也划归萧县。此时，萧县共12个区，1个镇，208乡，1494个行政村，93万多人。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副书记戴世雅，副县长单劲之。4月，萧县划归皖北行政公署宿县专区。

为了支援渡江战役，萧县人民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踊跃送夫送子参军。县委、县政府在做好其它支前工作的同时，又从县大队 2000 人的武装中挑选出 700 精兵，由副大队长孟庆祥率领，编入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十八军序列，参加了渡江战役。渡江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

早在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反动集团、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49 年 3 月，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值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萧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好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于 7 月中旬召开了为期两周的组织与宣传工作会议，县、区、乡及地方武装的领导干部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上级党的一系列文件。此次会议，以加强萧县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

设,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与文化水平,使之跟上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步伐,宣传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促进政权建设为宗旨。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功臣思想、太平观念、享乐主义等个人主义不良倾向,少数干部工作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现象及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内部整顿。与会人员对照二中全会精神,在进行自我思想教育、自我检查的基础上,找出了党员、干部队伍工作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极少数违法乱纪的蜕化变质分子,给予了严肃处理。会议还对发展党员、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与文化学习、干部的选拔与培养、区乡干部的轮训、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与贯彻等方面的工作作了部署,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次会议,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与作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至10月底,县委下辖12个区委,123个支部,共有党员1914人(含1117名候补党员)。

党的建设的加强促进了政权建设。基层政权普遍建立,县政府的教育、民政、司法等工作机构和公安、工商税务、粮食、银行、邮政等职能部门相继成立并正常工作,地方武装发展壮大,萧县总工会、青年运动萧县工作委员会、萧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先后建立,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出现了百废俱兴的景象。在淮海战役结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所取得的

巨大成绩，赢得了全县人民的信赖，提高了党的威望。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光荣诞生，宣告了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宣告了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萧县后，古萧大地，万众欢腾。萧县党政军民纷纷集会、游行，以不同方式纵情欢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从此，萧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新征程。

结 语

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

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萧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此间，仅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者就达 15000 多人，其中 3500 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凝聚成一种崇高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自由民主、不畏强敌、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精神的一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悲壮历史过程中，从嘉兴南湖启航的一叶小舟，最终负载起了我们民族走向独立与自由的重大使命——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为了民族

的独立与兴旺,萧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认识了共产党,从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畏行动中选择了共产党。

早在五四运动前,萧县的知识界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新思想的启蒙下,掀起了批孔、批封建专制文化的热潮。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萧县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纷纷去外地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李宪仲、徐文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萧县广泛传播,并逐步影响到社会各阶层。马克思主义唤醒了萧县人民,使萧县人民明白了这样一个革命道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要获得独立和解放,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萧县人民的觉醒,为中共党团组织在萧县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准备了条件。

大革命后期,中共徐州独立支部开始在萧县发展党员,并有一些外地入党回萧的共产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上级党组织先后派人来萧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8年1月,在国民党萧县执监委员会任职的刘亚民等共产党员筹备建立的黄口、王寨、萧城三个支部,是萧县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同年6月,在上级党组织的

关心和指导下，中共萧县第一届县委诞生。在县委的领导下，萧县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形势持续高涨。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的逐步提高，农民运动的兴起，形成了党领导下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1930年夏至1932年秋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的一系列农民武装暴动，虽然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萧县的嚣张气焰，震撼了其在萧县的反动统治，提高了党的威信，但却使萧县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暴动中显示出来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鼓舞和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革命低潮时期，萧县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党员，在萧铜边境坚持斗争，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积蓄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把一个醒来的民族凝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先士卒，将千百万庄稼汉锤炼成了一支无所不在、战无不胜的抗日大军。萧县的各级抗日武装和各类抗日救亡群团组织，即是这支抗日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8月，萧县沦陷后不到三个月建立起来的“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当时华中地区乃至新四军属地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县委、县抗

日民主政府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建立各级各类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使萧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当时，全县人口 50 万，有近一半人活动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中，实实在在地“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与此同时，县委始终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注重在抗日烽火中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建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抗日武装，支援主力部队，使萧县成为八路军与新四军公认的“抗日模范县”。

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创建的萧铜游击根据地，由于有新四军四师和淮北区党委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它在日伪顽并存的险恶环境里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其开展的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的对敌伪工作，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巩固的萧铜游击根据地，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游击战略思想的典范。它为新四军四师挥师西进痛击日伪顽反动势力，收复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进步终将战胜反动。历史雄辩地证

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萧县的抗战史，就是中共萧县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县一切爱国力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浴血奋战的过程。

解放战争时期，萧县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在党的领导下与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特别是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中，萧县人民倾家荡产，舍生忘死，全力支持淮海决战。为支援渡江战役，萧县人民踊跃送夫送子参军。编入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十八军序列的七百萧县英豪，参加了渡江战役、成都战役后，奉命进军西藏。为了西藏的解放与安宁，他们无怨无悔地浴血奋战在雪域高原上。总之，萧县人民为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萧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热血和生命把这段历史抒写得悲壮而辉煌。在这段历史里，中共萧县党组织领导萧县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萧县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一真理，坚持和弘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原则和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和智慧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世纪里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附录：

中共萧县地方史大事记

(1919.5—1949.9)

一、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1919年

5月—7月 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不久,北京大学的学生郭清杰和徐州七师的学生到萧县宣传。他们首先把徐属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县)、宿(迁)、铜(山)、睢(宁)八县的学生联络起来,由各县的代表集会徐州,成立八县学生联合会,领导八县的反帝爱国运动。萧县推选徐文雅为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7月—8月 李宪仲等人在萧县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暑假期间,萧县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读书的进步学生李宪仲等人,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带回萧县,并以李宪仲为首聚会萧城,探求革命道

理,宣传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意义,并第一次在萧县喊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

8月 徐州学生联合会派高民、徐文雅来萧县宣传五四运动。他们首先在县第一高等小学发动,然后联络女子学堂、县立国民小学以及全县各乡村小学,成立萧县学生联合会,一高学生徐志昌为会长,王宜周为副会长。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上街游行示威,贴标语、散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巴黎和会”、“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有力地声援了五四运动。

1920年

春 在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下,萧县学联组织“十人团”(即由十人组成的宣传队),分头下乡巡回宣传演讲。先后到瓦子口、白土、永堙、王寨等集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宣传活动。

徐文雅和石民宗两人同在徐州十中就学,同是徐州学运的领袖。他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各种新思潮、革命道理,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俄国革命上,把学习心得通过徐州《赤潮》旬刊发表出来。他们的思想在萧县青少年中颇有影响。萧县也编印了宣传新思想、提倡科学和民主的

《新声小报》。

11月 徐文雅回到萧城，在孔庙召开四五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会后，学生都用白布写上“救国”二字缠在臂上游行示威，并到各商店查禁日货，把查出的日货趁萧城十月古会时拉到龙山脚下纵火焚烧。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1923年

李宪仲 1920年毕业于徐州市立十中，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萧籍学生在外地入党的最早的党员。

1925年

徐文雅于1923年在徐州市立第十中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取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25年在中山大学入党，不久担任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兼粤州区区委学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和李宪仲在广州相会，谈论家乡党的建设，后李宪仲去武汉，他俩分别在广州和武汉以不同方式为萧县早期的党建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夏 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分子开枪镇压学生、工人的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萧县，萧县工、商、学界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将查缴的日货、英货焚烧，把募捐的钱邮汇上海，救济烈士家属。

秋 戴天盆到萧县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戴天盆(共产党员)来萧县后，向各界人士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报告。通过签名，发展国民党员，7月1日主持成立了国民党萧县执行委员会。

1926年

秋 刘亚民在萧县永堙乡办平民学校。在外地入党的中共党员刘亚民(跨党)受组织派遣，由武汉回到家乡萧县永堙开展革命活动，开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培训农民运动骨干，有30多位农民参加学习。

中共徐州独支派三名党员来萧县活动。

11月 郭潜飞到萧县调查农民运动。中共徐州独支农运负责人郭潜飞调查徐州周围的农民运动等情况。在萧县调查后，认为党员刘亚民在永堙办平民学校，教育农民取得显著成效，将来萧县的农民运动，必以此为策源地。

12月 许致远、邓果白等五人从上海农民运动训练班学习归来。许致远、邓果白在上海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

班学习时，由沈毅、邢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月底结业回县后，在家乡薛庄办起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后邓又去武汉学习。

李广琛到萧县进行革命活动。中共徐州独支党员李广琛，趁来萧县视察国民党党务之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国民党县党部的执委丁文魁（丁毅忱）、纵精舜（纵白踪）二人为中共党员（跨党）。翌年春，两人在徐州履行入党仪式，是在萧县入党最早的中共党员。此时，萧籍在外地入党的中共党员还有黄化育、石民宗、徐学曾、卢亚光等人。有的后来回到萧县，参加了萧县的党建活动，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

1月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萧县革命青年纷纷前去武汉参加国民革命。他们分别在政治军事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驻武汉党政训练班学习，有的参加了“二次北伐”，随军开展农民运动；有的参加了讨伐夏斗寅、许克祥的战斗。在这时入党的萧籍青年有谢光亚、孟庆鉴、崔健吾、朱大同、范自中等（皆为跨党）。

6月初 萧城军民欢迎慰问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第十军于6月2日占领徐州。王部路经萧县时，县城军民郊迎20里，并在南书院举行

欢迎会，向官兵赠送慰问袋。

6月中下旬 汪精卫、蒋介石等密谋合作反共。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19日，蒋介石率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迎接冯玉祥，在萧县黄口车站举行欢迎仪式。20日—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将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7月15日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原武汉政治军事学校等处的萧籍青年，随着形势的恶化纷纷离开武汉，寻求新的革命之路。

7月 萧县国民党进行“清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李轩到萧县以整理党务为名进行“清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

8月 直奉军阀反攻，宁汉双方武装均向南撤退，萧县国民党人亦随之星散。有的随王天培的部队去了南京；有的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转移到皖北太和一带。在杨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任训常、胡玄圃等人。他们在该部队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9月 武汉方面撤离出来的萧籍中共党团员相继到达南京，如石民宗、刘亚民、孟庆鉴、谢光亚、陈令远等人。他们聚集在以张原石为首的“中共江苏省委直辖特别小组”（清凉山小组），以临时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联络及组织发展工作。在这一时期入党后来又回到萧县的有王景武（铜山人），陈一民（萧县人），秦雅芬（宿迁人），刘石云（铜山人）等。

12月中旬 国民党军队再次占领徐州，在外地的萧籍革命青年纷纷返萧。这时，刘亚民、孟庆鉴、谢光亚、陈令远、王景武等受党组织派遣也回到萧县工作。他们通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刘汉川（刘云昭，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依国民党机关作掩护，秘密开展中共萧县党组织的筹建活动。

1928年

1月 萧县国民党恢复执监委员会，中共跨党党员刘亚民任常委，丁文魁、纵精舜为委员，朱思伦（朱宜之、后叛变）为秘书。他们对外地回萧的共产党员，通过摸底登记，先后建立了黄口、王寨、萧城三个支分部。时有党员25人（黄口7人，王寨8人，萧城10人）；同时，发展农协会员600人，分布在黄口、王寨、永堙等地。

2月中旬 胡玄圃、任训常、纵封亭等四同志，受中共皖北特委（在太和杨虎城部）派遣，回萧县指导工作。他们和武汉回来的同志共同研究，成立了中共萧县特别支部。胡玄圃任书记，刘亚民、胡文清为干事，受铜山县委领导。而后，胡玄圃去王寨小学任教，借以掩护党的工作。此时，睢宁县共产党员王树璜经组织介绍，到王寨小学任教务主任，协助特支开展工作。

2月底 刘亚民介绍徐州市共产党员王圣时、白夫

桥(后叛变)、沙文生(女)、王承恩(女)到永堙小学任教员,与杜玉堂一起建立永堙党的小组。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组织秘密农协,发展党的组织。

3月14日 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陈亚峰(化名“寅谷”)来萧,在县城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指示“要夺取政权”,即掌握国民党县党部,把国民党员中的进步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争取中间势力,打击国民党守旧派,把全县的党务、政务、财务及武装等重要职权抓到共产党员手里,一时放松了群众工作。

3月底 萧县师范学生罢考,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争取学生的合法权利。4月初选举产生“萧县师范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庆益(刘永之),副主席李和祥,委员有颛孙琨猷(组织)、刘庆澄(宣传)等。

4月中旬 国民党开始在萧县建政,李承霖任县长。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举荐,共产党员谢光亚任公安局长,孟庆鉴任督察长,王景武任县常备大队长,陈令远任副大队长,刘亚民任县款产处主任兼萧县师范校长。他们以执政党的姿态进行活动,逮捕了民愤极大的劣绅邵世恩、刘瑞岐,押送江苏省特别法庭,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全县16个行政局(区)长有半数为共产党员担任。特支书记胡玄圃担任了一区区长,党的机关亦随之由王寨移至县城。

4月 朱大同去张庄寨小学任教,先后发展祖玉敏

(校长)、祖玉英(行政局科长)、祖玉金(农民)、王德山(镇长)等为共产党员(均跨党),组成张庄寨党小组。

夏 共青团萧县支部建立,许西林任书记,有团员10人(知识分子6人,工人1人,农民3人)。

5月5日 中共萧县特别支部改组,王树璜(时为贫儿教养院院长)任书记,干事有胡玄圃、胡文清。

5月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萧县师范学生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实行对日绝交”和“抵制日货”等口号,并组织“反帝大同盟”,深入街道、农村开展反帝宣传。为配合宣传活动,萧师学生自治会创办《晓声》半月刊。

5月底 贺维中(贺云涛,铜山人),王嘉楷由东江经香港、上海返回铜山。通过中共徐州县委介绍,来萧县参加党的活动。在此前后来萧县的外籍党员还有申朝宗、韩均等。

6月25日 中共江苏省委代表罗世藩来萧,决定成立县委。28日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共萧县第一届县委,颛孙钧(孙叔平)、胡文清、胡玄圃、张得名、胡道敏为干事,王树璜、王沛然为候补干事。颛孙钧、胡玄圃、胡文清为常委,颛孙钧为书记。通过了党的组织发展、宣传及训练、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士兵运动、青年运动及其它工作等七项决议案;同时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要求一周

内建立黄口、王寨、县城、永堙和张庄寨党的支部。

7月下旬 前特支书记王树璜(徐海巡视员寅谷报告为王世德),因县委成立大会弹劾其十大错误,并报省委予以处分。他未经县委同意,骗取省委通讯处而离开萧县。

8月 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徐海蚌地区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徐海蚌特委。省委代理书记李富春指出徐海地区前一阶段“夺取政权”的做法是错误的,既没有下层的基础,也没有革命的实际力量,只掌握一些上层职位是存在不住的,要求各县担任上层职务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政府机关,到农村、学校去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

9月 省委派罗世藩同志到徐视察,对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严令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退出,对坚持错误的分别给予党纪处分。萧县的孟庆鉴、王景武被开除党籍;谢光亚、陈亚峰受留党察看处分。萧县的共产党员除个别人外,绝大部分同志都从国民党机关中退了出来。

中共萧县县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改组为二届县委。二届县委仍由七人组成:贺云涛、颢孙钧、胡文清、胡玄圃、王沛然为干事;石广宣、胡道敏为候补干事。贺云涛、颢孙钧、胡文清任常委,贺云涛任书记。

秋 在二届县委领导下,永堙、王寨、黄口、张庄寨、

薛庄、陶楼、郝集、路套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朱小楼子农协在朱玉珂等人领导下，向官僚地主刘子瑜开展了反霸占公集的斗争。

10月 萧县师范学生自治会发起罢课斗争，要求驱逐教导主任黄怀宇、成立全县学生自治联合会。同时，张贴标语、发宣言，号召全县学生总罢课。王寨、永堌、黄口、郝集等学校立即响应，参加总罢课的学生达千余人，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迫使县教育局答应学生的要求。11月初，各校选派代表成立了全县学生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11月 胡玄圃发展路继先入党。而后，又吸收朱玉珂、路永铮（路涤生）、路永圜等为党员，于翌年2月建立路套特支，路继先为书记，路永铮、朱玉珂为干事。有党员15人（农民9人，知识分子6人），分布在路套、杨庄、朱小楼子等村。农协秘密发展会员到四五百人。

11月下旬 胡玄圃因指导萧师学潮斗争而暴露，经特委同意，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三届县委，选举正式干事五人：许西林、颢孙钧、胡文清、张达生、萧雅忱；候补干事刘昭奎、石广宣；常委有许西林、颢孙钧、胡文清；书记许西林。三届县委下辖四个区委、三个特别支部，党员总数200人。

12月5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在邳县八义集附近之曹庄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第六次代

表大会决议,萧县县委出席代表一人(农),参加一人。

12月 萧县教育局为镇压萧县师范学生运动,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同时免去刘亚民师范校长职务,开除李和祥、刘庆益、颢孙琨猷、陈一民、彭瑞、吴孝庭、张长生等七名学生。

冬 永堙农民开展罢更斗争。300多农协会员向国民党永堙区长刘秉周提出:(1)穷人不给富人打更守夜;(2)穷人买平糶粮不准不给;(3)穷人出入自由,不得把穷人当作坏人、土匪盘问。通过说理斗争,迫使刘秉周答应了农协的要求。

1929年

1月初 共青团萧县县委建立。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张雨亭(陈政齐)来萧,在萧城纵大院召开团员代表会议,成立县委。萧雅忱任书记,徐秉玉(女)、颢孙琨猷为干事。

2月初 萧县农民开展年关斗争。县委在旧历年前领导各地农协,发起年关斗争,提出“年关不还帐”、“年关穷人帮穷人”、“年关向地主借粮”等口号。斗争取得许多胜利。

2月 萧县师范学生开展斗争。萧师校方在开学之际,先后贴出开除学生及任命丁文魁为代理校长的布告,

激起学生的愤慨，遂撕去布告，宣布罢课。全县各校学生纷纷成立声援会，支持萧师学生的斗争。3月初，萧师学生游行示威，包围了县教育局，并赴县府请愿，迫使县长刘丙晨答应学生的要求，宣布撤销教育局的布告，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继之，又在实小召开全县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

黄口特别支部成立，李祥龄为书记，郑传舜（郑觉山）、张永祥（老安）为干事。时有党员30人（知识分子3人，农民27人），秘密农协会会员400多人。

路套特支成立，路继先（路少棠）任书记。特支成立后，即领导农协发起反对地主杨学勤的斗争。

春 国民党永堍区公所为加强对该区的控制，架设电线，安装电话。中共永堍支部组织群众三次砍断电线八华里，造成敌人通讯联络中断。

4月下旬 萧县党组织遭大破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段木楨来萧县“清党”。萧师学生刘庆益、李和祥、吴孝庭3人被捕，通缉八九人；路套纵白踪、朱世昌、朱黑等4人被捕，通缉7人。6月间，又相继捕去县委委员胡文清、路套支部委员朱玉珂，团县委委员徐秉玉。全县共被捕13人，被通缉四五十人，不少同志逃往外地，萧县党的组织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5月 中共萧县县委在许岗子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西林、颀孙钧、胡文清、萧雅忱、戴瑞朴

(戴晓东、戴蕴山)、徐秉玉等。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批判和纠正了前一时期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确定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在基层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待革命高潮到来时,以便组织武装,夺取政权。会后,萧雅忱到黄口、郝集,戴蕴山到王寨,许西林在永堙,分头进行基层组织的发展工作。一些已暴露的党员,如萧师学生张兆坤、冯家平等都转入农村进行革命活动。

6月初 中共萧县县委发动群众开展麦收斗争。王寨“农协”在共产党员唐继敏的领导下,组织了30多人的割麦队,三个晚上割了王窑、王庄、王寨大地主的小麦15亩。后因白色恐怖的到来,刚刚发动起来的麦收斗争即停止了。

6月17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撤销,萧县县委遂直属江苏省委领导。

8月 县委委员颛孙钧调睢宁任特支书记。

中共萧县县委在戴楼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3天。县委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总结了前段工作,要求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秋收斗争。

9月 萧县各地普遍发动秋收斗争,提出“大领工资增加三分之一”、“反对冬闲辞退大领”、“榜二八要改为三七或四六分”。王寨、宁园、东西郝楼的大领成立了“大鞭

会”，迫使地主答应长工的要求，长工增加工资 70~150 斤粮食。

萧县师范学生利用罢考、罢课、游行及向新任县长侯绍龙说理等方式开展增膳(增加伙食补贴)斗争。国民党当局极力镇压，三次解散学生自治会，并将学生领袖冯安远、孙启庚、王绍孟等拘留 15 天。

秋 郝集小学团支部建立，方登瑞(女)为书记，朱延贞、纵瑞香为干事。

10 月 全县教师加薪斗争取得胜利。中共黄口特支书记李祥龄联合黄口小学、郝集小学的进步教师，成立了加薪委员会，向县政府要求薪金由每月 20 元增加 20%。全县教师云集县城，多次游行示威，贴标语、呼口号，赴县府请愿，斗争持续两月之久，终于取得胜利。

11 月 利用农村集市、古会举行飞行集会。11 月 18 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李立三的“左”倾观点，确定了“进攻路线”、“准备地方暴动”、“走向地方暴动”的总路线。在这个“左”的路线指导下，萧县党的组织利用农村集市和古会，先后在朔里、永堙、瓦子口、萧城等地散发传单，举行飞行集会，开展革命宣传。11 月 27 日(旧历十月二十三日)萧城古会，萧县师范学生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从县城东门一直散到龙山脚下。

年底 全县发展党员 200 多人，建立了 11 个支部，发展秘密农协会会员 3000 多人。

1930年

1月 中共萧县县委改组,彭瑞(彭复中)任书记,委员有萧雅忱、纵翰民、张舒民、刘昭奎、石广宣等。

3月初 中共徐海蚌特委恢复,陈资平任书记,委员有颛孙叔陶(孙叔平)、组织部长孔子寿、宣传部长陈履真,秘书先为秦雅芬,后换孙叔平。同时恢复了团特委。特委恢复后,萧县县委和砀山县委、宿县县委、泗县县委及烈山特支重归其领导。

3月8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对各县发布7条指示:(1)坚决组织同盟政治罢工;(2)做好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3)反对改组派和取消派;(4)在反帝反对国民党的同时,要联系到“七二一”惨案;(5)在两路两矿的罢工中,抓紧建立赤色工会;(6)加紧建立武装、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7)做好童工、女工工作。

3月28日 萧县师范共青团骨干冯安远、孙启庚、王绍孟等多人被捕。

4月6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发出“五·一”总示威及整个红五月工作计划大纲。计划要求一些县的农民斗争尽量深入扩大,坚决的领导武装冲突转变到游击战争。为适应斗争需要,各县要按分配数字快速发展党团员。各县党、团县委合并,组成中心支部,建立行动委员会。通过红

五月纪念活动,发动群众、发展组织,掀起革命高潮。

5月 中共萧县县委在李老庄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纵翰民、萧雅忱、李祥龄、谢光亚、冯家腾等10余人。会议由新任县委书记张圣和(张达生,化名宋治邦)主持。会议根据特委指示,讨论了“红五月”的工作,成立了县委行动委员会,张圣和任书记。

全县全面开展“红五月”活动,中共萧县县委成立“纪念筹备委员会”,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九”、“五卅”等都开展纪念活动。五一节组织准备更加充分,一夜之间城乡到处是标语、传单。白天到集市上散传单、搞飞行集会,在人多的地方作简短演说,说了就走。5月4日,黄口小学举行浩大示威游行,抗议反动当局压制学生运动,全校举行罢课,并驱逐了训育主任王体鹏、教务主任吴忠贞。通过红五月活动,党团组织迅速扩大,萧县师范共青团员发展到90多人。革命群众进一步发动,为武装暴动作了准备。

6月上旬 萧县行委在黄口、王寨等地发动麦收斗争。组织短工会,提出“短工上市,工资每天一元”、“短工不做夜工”、“不准中途解雇短工”等口号。通过斗争,短工工资增加1~2倍。同时,组织妇女、儿童拾麦队,抢拾地主的小麦,每人达百斤。麦收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群众组织的力量。

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

通过了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6月13日 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第23号通告，要求徐海地区以徐州为中心布置地方暴动。

6月21日 萧师革命学生二人被捕。国民党萧县县长王公珣亲自带人闯进萧县师范搜查，在李乐智等学生的床下搜出革命传单、标语，遂将李乐智、孙启曾捕去。李乐智于9月21日在镇江英勇就义。

6月 徐海蚌特委召开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农民暴动。开会时被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部发觉，当即派兵包围，由于转移迅速，仅特委秘书秦雅芬1人被捕。

萧县行委部署农民暴动。中共徐海蚌特委书记陈资平、宣传部长陈履真相继来萧，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组织农民暴动的精神。在永堙、戴楼、周庄、李老庄等地多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案。县行委根据特委指示，先后在永堙、戴楼、张绪庄等地召开会

议，增补戴蕴山、胡文清、许致远等为行委委员，决定7月10日（旧历前六月十五）于黄口、王寨、永堙三处举行暴动。其组织暴动的负责人：黄口是张圣和、李祥龄、谢光亚；王寨是戴瑞朴、胡文清；永堙是张舒民、萧雅忱。待三处暴动成功后，会合队伍集中力量夺取县城。

7月10日 黄口暴动。上午10时许，中共萧县县委委员李祥龄等指挥各路暴动骨干力量200余人，随赶集人群分别云集到三处进攻目标附近。在指挥所发出信号枪声之后，突击队以短枪、炸弹攻击敌驻黄口的营房，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小时后，消灭了车站东西两个排。下午3时，消灭了车站北面的一个排。暴动开始后，由黄口小学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上街写标语、散传单、高呼口号，鼓舞群众，动摇敌人。铁路工人于李阁附近破坏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敌黄口区队在地下共产党员张永祥的带领下，参加了暴动队伍。此次暴动，共缴获敌人长、短枪近200支，俘虏100多人。暴动队员程瑞凯、李祥太、李福全、单玉（单衍林）四人壮烈牺牲。11日，黄口暴动队伍按预定计划向王寨转移，打算与王寨、永堙两处的暴动队伍会师。不料，这两处都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同时配合行动。黄口暴动队伍当即在宁园、郝楼休整一日，分了大地主张庆祥、郝鸣扬、郝鸣珠的粮食、马匹、农具给贫苦农民。13日回师曲里铺。黄口暴动使陇海铁路的交通中断了三天，敌人震惊，国民党萧县县长王公珣亲率县警备大队紧跟

追击，暴动队伍分散隐蔽。

7月 胡文清牺牲。县行委委员胡文清、戴瑞朴隐蔽在王寨以西活动。夜间转移时，张棠坊地主张祚敬指使狗腿子埋伏路旁，群枪射击。胡文清身负重伤，在送往洪河集医治的途中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8月底 萧县苏维埃和红十五军第一师成立。徐海蚌总行委宣传部长陈履真到萧县，在帽山窝的周庄召开县行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萧县苏维埃和红十五军第一师，并在萧城、里山、朔里、蔡庄等地再次举行暴动。县苏维埃主席纵翰民（纵夷陀）；红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张圣和、政委纵翰民。会后，连夜准备了军旗、布告和传单。分头去召开会议，加紧暴动的各项准备。

9月7日 靳伯益等被捕。是日下午，萧县行委委员张舒民将暴动宣言和皮球炸弹运进县城。当晚，在靳伯益家的几个党员骨干传达了县行委在萧城暴动的指示后出城，靳伯益、王汉民等人继续开会，讨论次日召开县城党团员会议的问题。夜11时许，他们被国民党县政府公安局科长张祚申捕去。继之，国民党萧县当局又在七区捕去李兆铭、纵衍鹏。经刑讯后，11月2日解往镇江。翌年4月12日，靳伯益、王汉民、李兆铭、纵衍鹏英勇就义。靳伯益等同志被捕后，县行委张圣和、纵翰民、萧雅忱、戴瑞朴、张舒民、许致远被悬赏通缉，革命再次受挫。

11月 中共徐海蚌特委分为三个特委。10月29日，

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蚌埠特委(长淮特委)之后,11月上旬蚌埠特委即从徐海蚌特委析出,特委书记陈履真。后江苏省委又决定将徐海地区划分为徐州、海州(东海)两个特委。徐州特委代理书记孙叔平,萧县、砀山、宿县隶属徐州特委领导。共青团徐海蚌特委随之三分。

11月5日 中共萧县县委在永堙开会,研究第三次暴动。决定纵翰民负责王寨、张舒民负责县城,萧雅忱负责永堙。6日,萧雅忱去永堙开展工作,途经闸河时被捕去,23日在县城英勇就义。

11月7日 为纪念十月革命节,共青团徐州特委举行飞行集会,萧籍学生冯甦(冯安远)、张逸生在黄河滩把戏场散发传单时被捕。12月5日,冯甦在徐州黄河滩英勇就义。

11月下旬 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江苏省委指示,徐海蚌总行委撤销,恢复徐海蚌特委,书记陈资平,宣传部长孙叔平,组织部长孔子寿,秘书戴蕴山。萧县行动委员会亦随之撤销,恢复中共萧县县委,纵翰民任书记,戴瑞朴、张舒民、许致远为委员,同时取消区委,成立中心支部,就近领导几个支部。

1931年

春 中共萧县县委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艰苦奋斗,

顽强工作，先后恢复和发展了 11 个支部，300 多名党员，分布在 32 个村庄。

3 月 中共徐州特委分成铜山、宿县、宿迁三个中心县委。萧县县委归铜山中心县委领导，原县委书记纵翰民调任宿迁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朱大同接任萧县县委书记，委员有张远怀、冷启英、李繁洲等。

夏 团萧县县委重新建立。1930 年 11 月 6 日，共青团萧县县委书记萧雅忱被捕后，萧县团的工作瘫痪。1931 年夏张逸生在徐州出狱，受共青团徐州特委书记派遣，来萧县开展团的恢复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宣传发动，使许多同志重新振奋起来，重新建立了共青团萧县县委，冯家平任书记，张逸生、邓世昌（邓赛林）、朱振琪为委员（后增补李振海）。

9—10 月 抗议日本侵略东北三省。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制造借口进攻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接着侵占东北三省。消息传到萧县，全县各界在黄口召开万人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会后，学生停课宣传。共青团萧县师范支部书记朱延贞到东镇店小学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惨状，唤起群众觉醒。

秋 萧县师范团支部发起驱逐校长孙梅生的斗争。通过说理、请愿、游行等方式，迫使县政府撤销孙梅生师范校长的职务。

冬 萧县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萧县师范、实验小学

以共青团员为核心，自发地组织“萧县学生抗日救国会”。祖宇恩任会长，委员有欧阳道力、王继元、孟凡超等。救国会宣传抗日，查禁日货，发展会员。翌年暑假，各校救国会活动骨干多次被校方宣布停学。

12月18日 中共江苏省委对徐海蚌地区各县的军事工作发出指示信，要求立即组织群众武装，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将萧县西部、宿县、濉溪、永城划为徐海蚌游击中心区的第三区，要求县委制定计划，集中枪支，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

2月初 许致远被捕。同年10月解往苏州，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抗战开始后出狱。

3月 县委发动夺枪暴动。中共萧县县委为贯彻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群众先后发动了夺取张寿楼地主张梦新和王寨地主徐作栋的枪支的暴动，共产党员唐继敏、王洪彬被捕，同年被杀害于镇江。

6月 铜山、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重建徐州特委，特委书记由吴国治代理。新的徐州特委成立后，中共宿县县委、萧县县委、砀山县委归属其领导。

7月 贫儿教养院学生在共青团组织领导下举行罢课。提出“改善生活”、“实行半工半读”、“权太丰(县贫儿

教养院院长、国民党员)吃苦孩子的钱要退回”等要求。经过反复斗争,迫使县长王公珩答应了学生的要求。斗争结束后,领导罢课的谢庆云等学生被开除。

县委贯彻反富农路线。县委委员冷启英在县城召开共青团组织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反富农路线的指示。共青团萧县县委委员朱振琪、李振海、张逸生等被撤消职务,由冯家平另选工农分子组成新的团县委。

7月底 中共萧县县委在五区任小庄召开会议,讨论暴动问题。决定以“秘密准备,突然进攻”的方式举行暴动。计划武装暴动于8月13日首先夺取朔里区公所,然后再向其它各区发展。这次会议参加者有朱大同、冷启英、李繁洲、任予锡、冯家平、张兆坤等。

8月13日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8月12日夜,暴动队伍在王寨西朱庄集中,因途中遇雨,延误了时间,遂决定暴动在张庄寨、洪河集举行。13日上午,朱大同、冯家平带领人员伪装突袭张庄寨区公所,打死区队长刘须武,缴长、短枪30支,共产党员任贻任、王士杰、潘孝顺三人牺牲。洪河集方面,在王德山、祖玉敏带领下,接到张庄寨暴动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将地主段林清、孙翠斋绑押,缴枪6支。午后,洪河集被县警备队包围,暴动队伍坚持了一天一夜,遂向西突围。终因警惕性不高,我暴动人员被股匪裹挟到土匪老巢窑山集,一场胜利的暴动又失败了。

8月20日 李忠道(李砥平)、杜慰农被捕。洪河集

暴动之后，李忠道、杜慰农去朔里了解情况，准备再次组织暴动，返回时在萧城附近被捕。其他一些暴露身份的党团员被通缉而外出躲避，萧县革命转入低潮。

8月23日 共产党员唐继敏(戴楼人)、王洪彬(又名王梦涛,永堙人)被捕。二人同年被杀害于镇江。

秋 党、团县委改组。县委书记朱大同调往徐州特委工作，冷启英任萧县县委书记，团县委书记冯家平调团徐州特委工作，高硕仁任团县委书记。

10月 陈履真、万金培被捕。中共徐州特委书记万金培和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陈履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孙叔平接任特委书记。他即刻通知各县改变活动方式，严防叛徒和特务的破坏，使基层党的组织暂时避免了敌人的破坏。

1933年

春 县委书记冷启英调往中共徐州特委任秘书。

4月 国民党中统特务(CC)机关——徐海蚌特别行动区迁到徐州，派遣其组训股长周传家为萧县肃反专员，彭复中(彭瑞,叛变分子)为助理员，对萧县党团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破坏活动。

8月初 共青团徐州特委组织部长练育才(练登魁,永城人)被捕叛变。他假借特委书记名义召集会议，配合

行动区于徐州南天桥附近将特委委员及各县团委书记逮捕，使徐州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叛徒练育才、高硕仁（徐州人）、张桐（宿迁人）、窦远辉（萧县人）等自首后即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录用为行动人员。

8月30日 国民党徐海蚌特别行动区派张树培（叛徒）带领高硕仁来萧县，国民党县长王公珣派便衣协助，逮捕了公安局警士、萧县师范师生、帽山窝农民中的党团员数十人，由高硕仁亲自动员办理自首。

1934年

初 中共徐州特委巡视员朱大同在徐州叛变，并参加了特务组织。同时，在萧县被捕叛变的有张远怀、刘德茂等。朱大同叛变后，经过短期特务训练，于1935年1月担任国民党徐海特区特务专员。

4月 国民党萧县特务室（36号）成立，苏一山（睢宁人，叛徒）任主任，张桐（宿迁人，叛徒）任助理，强制办理中共党团员的自首和登记。至1936年底，萧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强制自首者达400余人。叛变后当特务者有张圣和、彭瑞、许文远、李祥昌、金庆凯（金漫生）、窦远辉、高硕仁、朱大同、张远怀、刘德茂等10余人。

秋 郭子化在枣庄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派张光中到铜山县赵台子（故黄河北）与路继先接上了关系，

先后恢复了杨庄支部(支书张广亮)、朱小楼子支部(支书朱玉珂)。他们坚持“以职业作掩护,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待机再起”的方针,隐蔽地发展党的组织。

1935年

年初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郭子化任书记。

夏秋 先后恢复了路套支部(支书路永铮)、铜山大杨庄支部(支书赵宜路),新建了铜山和尚庄支部(支书王清惠)。

9月 中共路套区委(萧铜边区委)成立,路继先(路少棠)任书记。隶属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所属沛县县委。

11月 郭子化通过宋绮云(中共党员、邳县人)、徐彬如(中共西北特支成员、萧县人),使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与中共西北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6年

年底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

经过一年多隐蔽发展,萧铜边区党员已发展到50多人,积蓄了革命力量。

1937年

3月 郭子化代表特委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中央批准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及其活动，并将其划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

7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由延安回到特委辖区,沿途部署抗日工作。在黄口找到丁毅忱、耿蕴斋,并恢复了耿蕴斋的党籍,安排他们在萧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把黄口地区作为丰县、沛县、萧县、砀山抗日工作的中心。

8月20日 国民党在南京释放政治犯,萧县共产党员李忠道(李砥平)出狱。

10月 中共路套区委改为中共萧铜工委,路继先任书记,委员有耿兴义、王清惠、路永铮、周峰。

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为委员,中共铜山县委书记郭影秋为组织部副部长。

11月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扩大会议在萧县黄口地区孙庙召开。出席会议的除特委委员外,还有丰、沛、萧、砀、铜等县党的负责人。会上,郭子化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他要求各县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待徐州沦陷后,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李忠道同志与行委接上组织关系,负责在萧县陇海路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派于化琪到黄口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在孟吴楼等村发展了孟振声、孟昭林、何光友等人入党。

12月19日 王雪琴任县长,彭笑千(彭其汶,字效騫)任县政府秘书。同时,成立萧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丁毅忱任主任,委员有纵翰民、张舒民、许西连、孙叔平、李忠道、冯家平、杜慰农、张兆坤等,实际工作由纵翰民主持。萧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萧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8年

1月 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曹鹏、李祥顺等20余人组成的民众动员工作团来萧县,在县动员委员会领导下参加民众动员工作。

2月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建立,李忠道同志任书记,陈继仁、李繁洲为委员,隶属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工委下辖李酒店、冯瓦房两个支部,有党员20多人。

2—3月 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先后在唐庙、瓦子口、袁圩、韦道口、路套、醴泉等地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7~15天,每班100~200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亲自来萧县讲民主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介绍老红军童陆生教游击战术,常流教抗日救亡歌曲。

3月中旬 路继先、路永锜、孙善佑、耿春涛等受特委派遣,去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村参加抗日游击训练班。中共萧铜工委书记由周峰同志接任。

4月 中共徐西北区委建立,王文彬任书记,委员有郝中士、陈筹等。萧铜工委、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属中共徐西北区委领导。

5月初 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王文彬在沛县三河涧召开丰、沛、萧、砀、铜五县联防会议,成立五县联防办事处。李忠道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建立抗日武装,加强各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月18日 萧城沦陷。日军第九师团一部自15日起进攻县城,萧城守军国民党军三十二军一三九师及县大队与日军激战两昼夜。18日拂晓,日军攻进县城。当日10时,师长李兆瑛下令突围,萧城失陷。萧县县长王雪琴、

大队长耿继贤和政治指导员王良守城殉职。日军盘踞萧城，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全县民众被杀害者数千人，以牛眠、房庄为甚。

5月下旬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建立。中共萧铜工委组织的陇海大队约200人枪，在周峰同志带领下活动在萧铜边境；孟振声（孟宪铮）、孙善佑同志组织的抗日游击队90多人，孟昭林为队长，活动在四区北部和五区南部；耿蕴斋在孙庙拉起抗日游击队100多人，何光友为队长，活动在五区西北部张大屯、曹瓦房一带。

5月底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在李酒店召开会议，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党团书记郭影秋来到萧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迅速建立党的骨干武装，同时决定派一些同志到孟昭林、何光友的队伍中去，帮助其进行部队的整顿工作。数日后，郭影秋等同志发现该部队成份复杂，纪律很差，乃向工委建议调往湖西整训。

6月9日 孙象涵、黄凤殿、胡方稳等在九区高庄打死赵楼汉奸赵宗禧，举起抗日锄奸的义旗。12日在铜山伊桥建立武装，活动在徐州以南津浦铁路两侧，称彭南抗日游击队。

6月中旬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在李酒店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陈继仁、陈学文、张兆坤等。决定：（一）到联庄会地区开展统战

工作,联合联庄会武装打击驻在县城的汉奸伪组织;(二)将原有武装带到湖西整训,抓紧动员人枪建立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三)动员原县政府秘书彭笑千出任萧县县长,酝酿建立抗日县政权。

7月初 李忠道、陈怀玉(张庆林)、许西连等联合一、六区联庄会及马井的武装,将城南豪绅刘云亭的维持会赶出了县城,并缴获五支步枪。后来又在城南穆楼、城东毛庄及城北营子多处追击、打垮了汉奸伪组织,迫使日军宣抚班头子金啸虎(朝鲜人)逃回徐州。

7月中旬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萧县抗日游击队在六区张屯建立,李忠道任大队长,冯家平任指导员,共三个中队,六七十人枪。时,中共徐西北区委派尹夷僧、张如带丰、矜及萧县去湖西整训的武装来萧县,并传达了特委的决定:(一)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改为中共萧县工委;(二)将萧县抗日武装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五大队(何光友)、第十六大队(孟昭林)、第十七大队(李忠道),陇海路北萧铜工委组织的武装为独立大队(冯坤远)。两支部队于吴丛林会师后,旋即在全县开展武装宣传。

8月初 部队移驻永堙寨,经过党内外同志再次集议,公推彭笑千为县长,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8月中旬 武装宣传结束,除十七大队留下部分人员外,各部队再次去湖西整训。

8月23日 李忠道、许西连、陈怀玉等带领十七大队部分人员，化装奇袭黄庙敌据点。由王振全、沈凤鹤、袁金玲、张庆白四人组成的突击队以送礼为名，打死岗哨，进入据点，趁日军午睡，冲进去盒子枪一阵射击，由冯家平、陈学文、吴信容等人组成的预备队这时也冲进据点参加战斗。21名日军被击毙20名，逃跑1人，仅用10分钟就结束战斗。歼灭日军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1挺、三八式步枪18支、龟头盒子1把，我无一伤亡。黄庙战斗是萧县抗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它的胜利，鼓舞了抗日战士的斗志，消除了群众的“恐日病”，推动了萧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8月底 彭南抗日游击队在梅村与十七大队会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八大队，大队长孙象涵，指导员李祥云。

9月初 十八大队亢为德、薛玉标等10名战士乘官桥逢集之机潜入集内，打死三堡据点赶集的日军士兵4人，缴三八式步枪4支。

9月中旬 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十七、十八大队为骨干，联合王孝礼、孟昭勤、贾兴兰等游击武装，组织群众破击津浦铁路三堡——曹村段、陇海铁路郝寨——李庄段，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

9月20日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五区胡集召开

2000 多人的抗日联庄大会，揭露张大屯劣绅纵衍芬（纵馨亭，外号纵二别子）的汉奸罪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会后，县政府派纵翰民、孟振声前去警告，要求交出全部枪支并解散维持会，纵衍芬躲藏起来。

10 月中旬 我抗日游击队各大队参加讨王战斗（打丰县汉奸王献臣）返萧，在王寨再行整编。十五、十六大队并入十七大队，又由十七、十八大队编余人员组成十九大队。三个大队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孙象涵，教导员尹夷僧。各大队组织序列为：十七大队大队长王振全，指导员魏佑铸；十八大队大队长谢继恩，指导员李祥云；十九大队大队长许致远，指导员孟宪礼。后又建立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二十大队，大队长吴信容，指导员张登先。

10 月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亦称“中共萧宿永中心县委”）建立。戴蕴山任书记，委员有李忠道（组织部长）、孟宪章（宣传兼军事部长）、纵翰民（统战部长）。中共萧县中心县委辖萧县七个区委、永东支部（支书盛瑞堂）、宿县县委（书记李时庄）、砀南特支（翌年 5 月建立，书记杨元章）。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纸币——萧县地方流通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地方流通券除在县内流通外，周围各县及伪据点都能通用。地方流通券的发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对解决抗战经费的困难起了

重要作用。

10月下旬 十七、十八、二十大队于某日拂晓将张大屯包围，天明发起攻击。因墙高水深，久攻不下。午后得知黄口日军增援，各大队即先后撤出战斗。至翌年2月13日（旧历腊月二十五日），趁纵衍芬唱年戏之机，我二十大队张登先等17名战士潜入会场，当场将纵捉住，并夺取步枪6支，勒缴7支。次日，将纵衍芬处决于行军途中。

11月 在二区纵瓦房村纵翰民家召开萧县东部一、二区抗日群团组织发动工作会议，到会30多人，纵翰民、张舒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从此，开始组织区乡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救国团，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大演武召开首次县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区、乡各界代表40多人，正式选举彭笑千为县长。同时选举彭笑千、纵翰民、孙叔平、李忠道、许西连、张舒民、崔健吾、路涤生（路永铮）、纵止韩等13人组成县政委员会，彭笑千任主任。县政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关县内重大问题通过集体讨论决定。

12月 成立萧县人民救国会，纵翰民同志任主任，张舒民任副主任。在同民运科的配合下，救国会以宣传抗战，发动民众，筹建抗日群众团体，发展抗日武装为主要任务。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机关报——《实报》创刊。社长王继尧，编辑张笑仙（1939年夏任社长）。三日一期，每期发

行 200 多份,最多时达 3000 份,发行萧、宿、永、碭各县。1940 年 9 月转属中共陇海路南地委,社长由地委宣传部长张维诚兼任。1941 年 3 月停刊。

12 月 19 日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七、十八、二十大队和贾兴兰游击队联合攻打九区伪据点——徐楼。十七大队埋伏在大小山口,阻击曹村、三堡方向的增援日军。午前,埋伏在大山口之一、三两个中队与曹村增援日军遭遇,经我奋力抗阻,打死打伤日军 10 多人。是役,我十七大队大队长王振全及以下干部战士沈凤鹤、胡道恂、孙乐祥、王绍兰、刘明金、李忠印等壮烈牺牲;政治指导员孟宪琛、大队副陈伯英、中队长孟昭林,战士曹林、李风兰、王帮云等光荣负伤。王振全同志牺牲后,张善祥接任十七大队大队长。

1939 年

1 月 1 日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陇海路南各大队奉命去湖西整编。十七大队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第二营,十九大队编入第三营。部队整编后,二总队转至陇海路南继续发展武装。这时,总队长耿蕴斋,政委张如(后为蓝廷辉),总队副孙象涵,政治处主任耿荆山,参谋长孙鹤一。

2 月初 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团来萧。在二总队武

装配合下，团长滕海清亲自率队于中旬再次攻打徐楼伪据点。由于敌人闭寨固守，我多次发起进攻皆未奏效。为避免伤害群众，遂决定撤出战斗。不几日，徐楼汉奸李忠镐乃携家逃往徐州，该据点遂被我九区区队拆除。

2月下旬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在六区阚楼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党员区长以及机关、部队、群团组织的党员干部40多人，戴蕴山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经过一周的学习、讨论，到会同志普遍掌握了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方针政策。

2月 县民运科在王寨、张寿楼、崔口、小阁子等地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50人左右，时间7~15天，至9月，共训练500多人。中心县委负责同志轮流到训练班讲课，并积极培养建党对象，发展党员。训练班结业后，学员分至各区、乡开展抗日活动。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三区王洼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发动各区办学。提出“以抗战教育协助抗日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使学生具有爱国热情、民族意识，从而培养抗战人才”的教育方针。同时成立教育救国会，组织力量编写小学1~6年级的教材。是年秋，县民主政府设立教育科，王继尧任科长。年底，全县办起高小十几所，初小60多所，在校学生达2.4万多人。

3月 县抗日民主政府组建萧县常备总队。县长彭

笑千任总队长，纵翰民任政治部主任，赵蓝修（赵永和）任参谋长（后任总队副，李耀任参谋长）。是年6月，发展到17个大队，8月整训，9月1日改为营连建制，组成6个营，计3000人枪。

3月15日 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初到萧宿边境，在没有全面了解情况之下，于萧县二区东任台子村借与宿县抗日游击总队五大队第二中队联欢之际，采取突然袭击，打死中队长张正福，并打死打伤其部下150余人，收缴张正福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支、驳壳枪50余支、迫击炮2门。这一事件不仅造成我地方抗日武装的重大损失，而且对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亦造成不良影响。1994年，此事经有关部门调查后澄清事实，并报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已对这一事件中错杀的人员给予平反昭雪，并作了妥善处理。

3月下旬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为发展武装，开辟新区，实行东西分进。大队长耿蕴斋率大队部及部分武装向萧县西部活动，大队副孙象涵率警卫连及第三营向津浦路东萧宿铜地区开展活动。月余，二总队武装发展至2000人。5月13日在梧桐整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至此，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全部结束。

4月初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各大队转移到陇海路南萧宿永地区活动，应萧十区群众请求，支队长彭明治在彭

笑千县长陪同下率队东进。途经铜七区杨庄时，瓦解周学堂、周学义股匪一部，缴枪 10 余支。中旬，支队抵达解集、贡山山区，在萧十区区队和六抗三支队赵汇川部的配合下，以突然动作攻克宿东重镇——时村，歼灭日军 80 余人，伪军 300 余人，活捉汉奸金耀三，给铜、灵之杂八队以极大威胁。一时，八路军声威大振，我萧十区抗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4 月 日军在二区王台子和三区后洼安设据点，在送给养的路上到处遭我游击队的截击，据点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两三个月后，日军不得不动撤离。

5 月 14 日 中共苏鲁豫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陇海路北萧铜区委改为中共萧铜县委，路继先为书记，委员有朱玉珂、李华农、朱传真、徐传祥。

5 月 21 日 苏鲁豫支队各大队越津浦路东进，活动于萧、宿、灵边解集、张山、贡山，栏杆一带。31 日，敌 7000 余人，加上汽车 50 辆、炮 20 门、坦克 4 辆、骑兵 100 余人，由徐州、宿县、睢宁、灵璧等地分七路向我“扫荡”。6 月 1 日，苏支各大队在张山、贡山、温山、前杨庄等地与敌激战，毙敌 300 余，当夜转移到津浦路西休整。6 月 4 日，向我追击之敌 2000 余，加上汽车 15 辆、炮 5 门、坦克 2 辆，于渺沟、前白庄等地遭我伏击，敌伤亡 300 余而退。6 月 5 日，苏支各部移至萧县二区。朔里出扰之敌 200 余，

行至时村以西,被我苏支三大队杀伤 100 余人。当晚,苏支各部即脱离敌人向永、碭边境转移。

5 月下旬 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移驻土型。拂晓前,濉溪日伪军 300 余人向我三营驻地进攻。三营迅速撤至庄外,占领闸河,大队警卫连亦展开占领阵地,双方展开猛烈射击。中午,敌见势不利,乃向东南方向撤离。是役,我副连长胡方稳牺牲,连长蒋相训、排长张学智等数人负伤。

5 月 26 日(旧历四月初八) 日军 200 多人,伪军 1000 余人,加上汽车 30 余辆,由徐州、萧城经瓦子口向西行进。萧县常备队获得情报后,在上杜集至孟庄寨地区伏击。上午 8 时与敌人接触,我向敌反复射击,使敌不能前进一步。上午 11 时,我即迅速转移阵地。是役,日伪军伤亡数百人,我无大的伤亡。午后,日军对我进行报复,杀害上杜集群众百余人。

6 月中旬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在四区崔口举办党员训练班。时间一个月零四天。参加学习的有支部书记,区、乡党员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 120 人。主要学习党章、党史、群众工作及党的建设。杨兴瑞担任训练班班主任,县委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这期训练班的学习,为区、乡党的组织培训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6 月 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来苏鲁豫支队视察工作。决定分兵进击,开辟抗日根据地:一、苏支四大队

(大队长梁兴初,政委王鸿鸣)返回陇海路北,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以保持华北、山东八路军的联系;二、苏支三大队、七大队(含一、二营)、独立大队合编为苏支第七大队(大队长耿蕴斋、政委郭影秋、参谋长田文扬、主任邱子明),随支队部活动于萧、宿、永、夏、砀等县,与新四军游击支队相配合,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三、苏支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游击七大队之三营(由大队副孙象涵带领),随代政委吴法宪东进,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经十几天急行军,跨越津浦铁路,于7月中旬到达宿东。

6月底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书记戴蕴山调鲁西南地委工作,李忠道同志继任中心县委书记,陈继仁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夏 萧县青年救国团(后改为青年救国会)成立。主任吴忠培、组织部长王彦(王尚三)、宣传部长欧阳如文。(青救会主任在吴忠培之后,有杨兴瑞、姜克、王彦先后接任)。

7月 县委根据湖西区党委指示,研究成立萧县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委员会,彭笑千任主任委员,戴晓东、纵翰民、李忠道、孙叔平、王子石、马济民、李厚庵任委员,并派纵翰民去湖西区党委报告。区党委发给贺信,作为统一战线组织。

7月7日 萧县军民近万人在张新集召开抗战两周

周年纪念大会。我党、政、军负责人在大会上发言，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阐明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7月29日 宿县、永城、萧城、黄口之敌步骑500余，向我芒砀山苏鲁豫支队驻地分进合击。其南路经大茴村、李石林抵达王白楼子宿营，北路进抵西镇店。支队部发现敌情后，营长周长胜率三连至南路敌后尾追。30日拂晓，南路之敌步骑各百人进至朱大厂、小刘庄一线，向我僖山阵地开炮；北路之敌步骑300余经鱼山进至刘厂、小马沟一带，对我驻僖山教导大队形成包围。上午11时许，教导大队沉着应战，待敌迫近时发起射击。三连于敌后开展麻雀战，对敌造成威胁。下午四时，营长周长胜带三连摧毁朱大厂敌炮兵阵地，迫敌仓惶后撤，我教导大队遂发起追击。是役，共毙伤敌300余，打死战马数十匹，取得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

8月 萧县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在四区梅庄成立。县委妇委书记张明任妇救会主任，陈一民、单继英任副主任，委员有刘天钧、韩志清等。

8月下旬 萧县抗日游击支队（简称萧支）在蒋新楼建立。支队长吴信容、政委孟宪章、政治处主任崔文彬，共三个营（相山大队年底编为第三营），1500人枪。

秋 萧县农民救国会（简称农救会）在四区张寿楼召开成立大会。会议讨论了“农民救国会”的宗旨、组织原

则,规定不分阶级、阶层,凡愿意抗战救国之农民,均可吸收为会员。农民救国会分县、区、乡三级。通过选举,张舒民为县农民救国会主任,孙清淮、沈修德为总干事,杨兴瑞、张祚兴、张长文、孟晴辉、祁世华为委员。秋后,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普遍建立。至年底,全县农民救国会会员达12万人,青年救国会会员10万人,妇女救国会会员3万多人。各区分别建立了党的区委和支部,中共党员发展至2000人。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一年,坚持领导萧县人民抗战,获得上级表扬。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来到萧县视察工作时,称赞萧县为“抗日模范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来萧视察后著文有如下记述:萧县是江苏一个边沿县,该县在彭县长领导下,抗战情绪高,群众组织的好,减轻农民的负担,一入萧境,便表现一种新的景象。如果你没有证明文件,远方来人是行不通的,必须把你送到联保处对你进行盘查。六、七岁的儿童,口中都会唱救亡歌曲,不论在乡村或田野中,远远就会有歌声传来。虽然临近徐州,但仇货是绝对看不到的,资敌物资也没有出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该县公民实行抗战总动员令,坚持执行中央各项法令。

9月10日 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致电彭明治、吴法宪,传达中央指示:陇海路南之皖北、苏北地区划归中原局领导。路南之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调往陇海路北。同时,

中共豫皖苏区党委派刘作孚持电报前来萧县传达中央决定，萧县党的关系即从此由中共苏鲁豫区党委转属中共豫皖苏区党委。

9月 县长彭笑千率警卫连去萧十区开展工作，途经白土镇，得悉日军50余乘军车三辆于次日上午由徐州去孤山敌据点。特务连、“萧常”五营和陈文海游击小组相配合，埋伏在张山口萧桃公路两侧，并设置路障。中午，敌军车驶入我伏击圈，遭我突然袭击。敌弃车而逃，我获得大批军用物资，三辆汽车遂被我烧毁。

9月底 由王寨出扰之敌百余人，携小炮数门，在神树与我萧常一营一连遭遇，一连后撤。上午八时，敌追至郭楼与我一营三连接触。三连占据有利地形向敌射击，敌多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战斗中，我三连二排排长孙启厚见敌溃败，跃出工事向敌夺枪，不幸中弹牺牲。下午四时，接营部通知，三连即撤出战斗。是役，毙敌数十名。

10月14日 驻濉溪日伪军步骑百余人，沿滂汪山东侧向北“扫荡”。待敌进至刘窑、罗里村我“萧常”三营二、三连伏击圈时，被我三面包围，敌乃仓惶南逃。是役，我毙伤日军大尉松井谷治以下十多人，缴战马一匹，皮带、望远镜等战利品。

11月7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新四军六支队驻地——涡北新兴集。他指出：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

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和改造政权。将永城、夏邑、萧县、宿县联成一片，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刘少奇走后，刘瑞龙留下参加区党委的工作。

11月21日夜 铜山县国民党顽固派耿继勋集中五六百人之兵力包围了八路军铜北办事处——千里井，打死我干部战士20余人，俘我办事处副主任阎树堂以下百余人。后又枪杀、活埋办事处干部阎树堂、路继光、贾挺模及其家属、革命群众数百人。这一反共事件对萧县抗战形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共陇海路北萧铜县委及其武装遂转至陇海路南活动。

11月下旬 县长彭笑千带萧县常备队一营、特务营一个连及总队剧团去陇海路北宣传抗战，孤立、打击顽固派，影响四区刘瑞岐。当部队驻扎在三座楼、纵老楼、梁老楼等村时，萧城、郝寨、曲里铺之敌400余人分三路向我进攻，萧县常备队一营坚决予以还击。当晚撤出战斗，彭去陇海路北活动计划未成。

12月5日 驻徐日军步兵500余人，骑兵数十人，附汽车三辆、大炮两门、小炮数门、轻重机枪数十挺，经陶楼、曲里铺等地，企图占我大吴集为据点。7日，萧县常备队一、二营和萧支二营在阚楼、吴蒋庄、大吴集与日军激战，击毙敌70余人，我军伤亡8人。

12月中旬 萧常副参谋长种继臣去十区接任五营营长，途经夹沟东北杨柳堤村时，被顽固派张立钧部捉去

活埋。

12月17日 民运科长孙叔平著《抗日农民运动讲话》，印成32开石印本在广大干部中散发。这篇讲话对农村中的各阶级、农村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农民运动者的任务、领导农民的艺术等方面作了精辟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抗日救国实际结合起来，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对广大抗日干部战士、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教育，深入人心，使抗日群众组织很快发展到铁路沿线、县城周围和徐州附近，推动了萧县抗日农民运动深入发展。

12月 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成立。耿蕴斋任总队长，谭友林任政委，辖萧县抗日游击队（即第七团）和宿西独立团（即八团）。

12月21日 萧、宿、永、碭及陇海路之敌对我萧宿永地区进行“扫荡”。我萧县之抗日部队分别置于机动位置，配合一、三总队与敌周旋。23日，敌由萧城分三路向西进犯。24日，各路“扫荡”之敌会合于永城东北之刘河。六支队主力一个营深入敌后游击。25日晨，我一总队各部埋伏于李石林西之枣园，截击由刘河东进之敌步骑炮联合兵种千余人，汽车12辆。我以机枪齐集射击，激战5小时，敌因道路破坏，不便行动，复遭我前后夹击，乃分数路向濉溪、瓦子口方向逃窜。该敌在溃散途中，于李石林焚尸16具，祖老楼焚尸41具。是役，我伤亡47人。28日，各路“扫荡”之敌撤回原地，我获得冬季反“扫荡”之重大

胜利。

1939 年底 县委社会部调查情况不细，被日伪特工欺骗，误派吴孝香等五人两次进入徐州日伪机关，致使吴孝香被诱捕干伪，张祚胜牺牲，这是县敌工工作的一大教训。

12 月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继仁调任宿西县委书记，辛程同志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0 年

1 月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宣传兼军事部长孟宪章调往皖东北工作，夏峰继任宣传部长，姚运良任萧县抗日游击支队政委。

新四军六支队派李耀任萧县常备总队参谋长，褚精益任政治部副主任，沙枫任萧常五营教导员。

1 月中旬 驻孟庄寨伪军 200 余人向上杜集进犯，萧常一营置一、二连于赵庄、彭瓦房，三连置上杜集村东抗日沟内。待敌距我不到百米时，三连首先开火，一、二连在侧翼猛烈射击。敌见遭我伏击，大部分都滚到抗日沟内。我完成阻击任务后立即向他处转移。是役，毙敌十多人，获战马一匹。

2 月初 豫皖苏区党委派组织部长周季方来萧县传达形势，提出改造政权。强令县委于三日内接管县政府的

大印,换成共产党员当县长。在区党委的压力之下,萧县县政委员会在王白楼子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许西连、崔健吾、王子石、马济民、纵止韩等。会议是利用分别交换意见的形式进行的。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的形势,讨论了萧县的政权改造。会上,彭笑千提出辞职,并建议县长职务由民政科长许西连代理。

2月27日 彭笑千等到达涡北新兴集,新四军六支队政治部在精忠堂举行欢迎大会。会上,彭笑千详细介绍了萧县抗战工作的基本经验:第一,统一战线比较巩固,国共两党能够团结,共同协商,共同领导,共同工作。第二,各种工作能够把握时机,随各种环境的发展而变化。第三,得到新四军、八路军的帮助和影响,使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第四,有坚决抗战、不畏难不怕苦、积极工作的干部,这是工作开展的中心动力。

3月初 抗日民主政权县参议会成立。张静波任参议长,孟晴辉、路继先任副参议长,张舒民、胡海平任秘书。

3月8日 萧县妇女救国会代表大会在王柳园召开。到会代表300多人,会期5天。会议制定了萧县妇女救国会章程和工作纲要,选举陈一民为妇女救国会主任。同时,大会还编写了《萧县妇女救国会组织概况》,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致敬电。会议期间,张明调出,都志(李伯

仲)任县委妇委书记。

3月上旬 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一团(孙象涵部)一、九连在萧十区活动,与萧常五营相配合,在时窑伏击云台出来抢粮之日军。九连埋伏于时窑,二连占领后山,萧常五营在青冢湖、张山等处保障侧翼。上午九时许,敌进入我伏击圈。我机、步枪同时射击,给敌以大量杀伤。黄昏时,时村日军派汽车增援,我遂撤出战斗。是役,毙伤敌近百人,我伤亡20余人。

3月16日 日伪军步骑炮联合兵种2000余人,汽车百余辆,从萧城分五路向萧永边境大规模“扫荡”。18日占据瓦子口、祖老楼、高窑、李石林、王白楼子、张大屯、大吴集等地,构筑工事,四处烧杀淫掠。我一、三总队及地方武装以内线坚持,主力转至外线与敌周旋。24日,我主力部队开始总攻,先后打击了李石林、王白楼子、张大屯、青龙集、程蒋山出扰之敌,并袭击了黄口之敌。

3月18日 第一次参议会在王柳园召开,选举纵翰民为县长,冯蕴言为县政府秘书。同时决定于4月1日县长宣誓就职。

3月 孙大兴(孙明远)任县农民救国会主任。以后,农救会主任依次是:颀孙敬祖、戴世雅、朱庄俊(朱渭川)。

萧县常备总队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萧县抗敌总队(简称萧总)。耿蕴斋任总队长,李耀任政委,参谋长陈景龙,政治处主任褚精益(后宋治民)。萧常改编后,特务营

留下不到两个连，营长孟振声，教导员周武烈。后特务营编走，只留下两个排。

4月1日晨 我一、三总队及萧总各一部与砀山、永城、王白楼子、黄口、张大屯各路围攻之敌千余人激战于磨山、禧山、陶山、柿园、李黑楼一带。突围战斗自晨至晚，我反复冲杀，战况十分激烈。先后毙敌300余人，敌终被击退。是役，我伤亡200余人。一总队队长鲁雨亭壮烈殉国，萧县县直干部张雪亭、卓汉章及洪河大队教导员张祚瑞、中队长杨振瀛等英勇牺牲，县长纵翰民负伤。

4月上旬 萧铜办事处（一区东北部）主任孙亦庄（孙朝州）、中共一区区委书记兼农民救国会主任李继昌在郝寨被敌捕去，解送县城，月余被杀害。

4月 萧县伪政权建立，邵世恩为县知事。

由于敌人“扫荡”，萧常五营400余人在沙枫带领下跳出包围圈，转移皖东北，编入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一团。

5月 萧县独立团建立。团长赵海丰，政委李忠道，参谋长康平，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共六个营（含中共陇海路北萧铜县委一个营），1700余人。

苏皖纵队陇海支队第一团（孙象涵部）派二营营长亢为德率六连返回萧铜地区。不久，部队发展到两个连，形成了营的建制。亢为德为营长，朱德群为教导员，吴端胜为副营长，群众称之为“亢营”。“亢营”在萧铜地区津浦路

两侧坚持游击战，对打击敌伪，保护抗日战士家属，巩固我抗日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5月14日 萧县国民党县长朱大同在陇海路北管粥集宣布就职，并组织县政府，成立常备团与我抗日民主政府相对峙。从而使萧县形成了顽、伪、我三方面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

6月初 我六区区队蒋正红率一个班到古城乡保卫麦收，同时动员新兵入伍，遭到国民党刘瑞岐部队的突然袭击，俘去全班战士，排长蒋正红被杀害。

6月中旬 萧支支队长吴信容率九连奔袭刘瑞岐，至萧张公路北黑柳树，刘顽北逃，九连返回郝新庄宿营。次日晨，伪军20多人押送十辆大车沿萧张公路东来，九连赶至公路截击。当一排登上公路拦车时，百多名日军从对面路沟中钻出，双方战斗胶着。下午，支队部派二营支援，九连方得以撤出战斗。是役，我伤10余人。

6月中旬 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其第一梯队（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六八九团及新二旅之六团）进入萧境后留下六八七团活动数日，与永城东来之敌400余人（附汽车18辆）在瓦子口激战一个下午，毙伤敌百余人。敌溃。

6月24日 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为支援新四军途经萧境，于下杜集附近二鬼台与蔡里、烈山、濉溪口、永堙、瓦子口之敌激战竟日，毙伤敌百余人。敌退。

7月 八路军三四四旅和新二旅与新四军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下旬，黄克诚率三个团东进，四纵队重新整编为四、五、六三个旅，原活动在萧宿永之一、三总队编入主力部队。一总队改编为六旅十七团（团长刘子仁），三总队七团编为六旅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八团（宿西独立团）编入四纵队特务团。

县独立团六营在杨洼村伏击由黄口据点出扰的日伪军。因侦察敌情不准确，战斗打响后发现日军竟有50多人，还配有钢炮、机枪。此战我伤亡十余人，牺牲排长一人。不久，营长李祥龄被解职后调任区长。

7月10日 萧总二营、萧县独立团五营分别驻在吴老家、吴酒店牵制敌人，确保我主力部队作战计划的实施。次日晨，突然遭到黄口、曲里铺、东镇店之敌包围，奋战四小时，我借青纱帐安全突围。是役，萧总二营营长陈芳明负伤。

7月至秋收前 县委在张庄寨至袁圩一带活动，曾组织农、青、妇群团接连办了几期训练班，每期50~60人。针对反顽斗争形势进行深入教育，提高了区乡干部的思想认识，更加坚定了反顽斗志。

8月 豫皖苏区党委派萧望东、向明等来萧县，在张庄寨组织萧、宿、永、夏、砀反顽指挥部。并在锦桥村召开萧县党、政、军数百人大会，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与国民党

顽固派作坚决斗争。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陇海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组织部长何启光，宣传部长张维诚。路南地委辖萧、宿西、夏永碭三个县委。萧县县委由辛程任书记，委员有戴世雅、夏峰、纵翰民、赵海丰、张元卿、孙清淮。

8月21日晨，敌从马阁进占孙庄，萧总一部进至杜马庄与敌接火。经过猛烈射击，杀伤大量敌人。敌复以炮火还击，萧总因五名干部负伤而撤出战斗。敌追至戴柿园，遭一连伏击，死伤十多人，恼羞成怒，竟放火烧群众房屋。

9月1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 萧县独立团二营驻陶墟。庄里据点日伪军21人，携大车10多辆到田窝抢粮。参谋长康平当即指挥二营阻击。因敌据石塘窝顽抗，二营请“亢营”三排增援，激战一日，将敌全部歼灭。是役，计毙敌16名(日军9人，伪军7人)，俘伪军5人；缴获掷弹筒1具，机枪1挺，步枪16支，手枪1支，指挥刀1把。“亢营”三排长孙修义英勇牺牲。

秋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减租减息章程，并先后在李石林、三河、红亭、宁园、葛张庄等处开展试点。

10月 萧总二营在永城县大苗村附近对日作战。撤退时，因交通沟中断，我牺牲副指导员刘仁芝以下30多人。

10月19日 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豫皖苏边区首当其冲。

11月初 萧县抗敌总队奉命调往淮上，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特务团。总队长耿蕴斋调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

11月7日 驻瓦子口之敌出来“扫荡”，十八团政委方中铎率队与敌周旋。政治处主任喻新华带领团直机关人员向山城集方向转移，行到张大屯西南傅庄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机关人员被冲散，宣传队多人被俘。

12月12日 耿吴刘叛变。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彭雪枫进军淮上，豫皖苏根据地中心区兵力较少时，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耿蕴斋、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团长吴信容，在第六旅十七团团团长刘子仁的阴谋策划下，于12月12日在萧永边境叛变，扣押我党政军干部八九十人，造成流血事件。随后，耿吴刘挟持其所属部队近2000人投降汤恩伯，使萧县、砀山、永城北等地为其控制，豫皖苏边根据地受到重大损失。

12月 镇头寺突围。亢为德营和两个区队驻镇头寺，遭到徐州、曹村、夹沟等处数百敌人的包围，亢营借助浓雾突围脱险。

12月底 八路军第四纵队及豫皖苏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动员，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撤销了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整顿各县地方武装，并为四纵所属各旅划定活

动区。区党委在涡北召开干部会议，吴芝圃作了《关于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耿吴刘事件经过的报告。

1941年

1月1日 吴信容亲自率队冲进五区区队驻地董屯，缴去长短枪数十支，捕去干部及区队人员。同日，又收缴四区区队一个排的武装，四、五区抗日政权遭到破坏。

1月 孙大兴任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派遣陈品诗、张祚升等打入祖老楼日伪据点，为我收集日伪情报，并掩护我抗日军政人员。

1月27日 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主力旅。同时成立萧县独立旅，纵翰民任旅长，李忠道任政委，康平任参谋长，陈其五任政治部主任。独立旅下属两个团：一团团长赵海丰，政委辛程；二团团长孟振声，政委王静敏，副团长周纯麟。

3月20日 萧县独立旅一部在永城南消灭汝中区顽区署，缴获步枪17支，俘虏47人，我无伤亡。

3月31日 土顽刘瑞岐乘刘、耿、吴叛变之机，明目张胆地大举向我进攻。我独立旅部署在萧县四区朱楼、何桥、夏寨一线准备迎敌。下午三时，我主力向崔口刘瑞岐主力驻地出击，计划先消灭刘瑞岐，然后再向西扩大战

果。不料，敌情突然变化，刘先向罗河（又称“王引河”）方向我独立旅二团三营防地进攻，使我主力扑空。三营与四区区队在罗河与敌激战三个小时，因敌兵力增多，遂沿河向东南方向撤退。是役，我三营损失近百人，副营长萧新庭被俘。四区区队损失惨重，区长张长文牺牲。

4月1日晨 萧城、朔里、祖楼、瓦子口、濉溪等处日伪军数百人，从东、西、南三面向我县政府驻地——徐暨分进合击。事先未获情报，战斗全面展开后，我了解到敌人意图，遂决定突围跳出外线作战。三营一部抢先占领制高点，运用地形牵制敌人；另一部分与八区区队配合向西冲杀，突出重围；县政府部分人员随“亢营”沿山沟向东突围。经过反复冲杀，敌人被我击退。下午五时，小雨沥沥，各路枪声稀疏，我县政府和作战部队安全转移。是役，我伤亡20多人。三营三连指导员吕渭滨和八区区队长李祥林壮烈牺牲，孙启诗右肩中弹不下火线，某15岁小战士以小马枪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其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4月4日 “亢营”移驻龙泉寺。夜间，副营长吴端胜将六连战士骗至梁庄，欲投顽县长朱大同。次日晨，亢为德营长得知后，即派连长蔡书仙前去劝阻。许西连也前去做争取工作。数日后，吴承认了错误，又将部队带回了营部。

4月初 萧县独立旅警卫营在宿西与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因荣易治带宿西大队叛变投顽，营长王长信（王保

哲)被捕。

4月12日 新四军四师反顽战斗失利,萧县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奉命赴涡北集中。县政府许西连、冯蕴言及张立轩、王可风(王继尧)等七八位同志提出并经县长纵翰民同意,留在萧县坚持斗争。他们于24日转移到皇藏山区,在“亢营”及九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活动。

4月 萧县独立旅在参加涡北反顽战斗时部队减员,后编入新四军四师十二旅三十四团。团长张永远,政委李忠道,参谋长孟振声。

5月3日 萧县独立旅二团一营营长周武烈(时为抗大四分校学员),在濉溪南苗庄与国民党骑八师作战中牺牲。

5月4日 新四军四师转移至皖东北地区,萧县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亦随军转移。县直机关干部编为干部大队二中队,纵翰民任中队长。各区武装编为萧县大队,大队长孙清淮,政委辛程。下属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周××;二中队队长葛玉环;三中队队长孙明远。东撤之后,区党委派何启光在宿西召开会议,安排地下工作,指定戴世雅、张祚兴、王纪珍三同志组成萧县地下县委,戴世雅任书记。他们分别隐蔽在濉溪城郊,联络没有撤退的党员,开展秘密工作。陇海路北萧铜县委干部跟随东撤,萧铜县委结束。

5月初 萧东办事处成立。许西连任主任,冯蕴言任

秘书，吴端胜为办事处副主任。同时，成立九区区公所，徐明轩任区长，以皇藏、官桥、桃山三个乡为依托，公开坚持抗日活动。当时，国民党顽县长朱大同乘我立足未稳，亲率两个营（400多人）的武装向萧东进攻。我事先得到情报，分两路设下埋伏：一路由许西连、许致远、蔡书仙带“亢营”两个排埋伏在汪庄北头沟里，一路由朱德群带“亢营”一个排和九区区队埋伏在皇藏峪南山。这天夜间九时许，土顽进入我汪庄伏击圈。我先发制人，以机、步枪猛烈射击，顽军大乱，四处溃逃，我获全胜。此役，打击了朱大同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萧东军民的斗志，“亢营”两个连失散人员尽快归队，恢复了原来的阵容，为坚持萧东抗战奠定了基础。

5月上旬 许西连、朱德群、许致远三同志去宿东，见到淮上行署主任雷明，汇报了萧东的情况，并请他转告区党委。雷明同志对坚持萧东抗战非常支持，临行时给活动经费500元（边币）。

5月下旬 中共豫皖苏区党委派遣随军东撤的朱玉林（朱玉珂）、路少棠（路继先）、王尚三（王彦）、徐林生（徐学龙）、朱若平（朱延贞）、朱振东、朱传真、谢继恩、冯家香、毛廷秀等返回萧东，与许西连等配合，领导萧东斗争。

6月 中共萧东临时县委建立，朱玉林为书记，路少棠、王尚三、朱德群为委员，隶属宿东地委。

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民政处长彭笑千没有随军东

撤而返回萧县，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秘书张舒民等人一起做吴信容部的争取工作，要求其“坚持抗战，反对磨擦”。

6月下旬 国民党县政府驻七区刘庄，夜间遭黄口伪军包围。书记员苗光远被打死，县长朱大同及其政府人员被俘，仅县政府秘书赵闾仙只身逃脱。

7月 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去宿东，向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吴芝圃同志汇报工作。吴芝圃指示：(1)当前我们在萧东只是有个立足点，力量很弱，尽量隐蔽，不能树敌太多，应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如争取谁、打击谁、缓和谁；(2)应采取灰色面目出现，要求两党停止磨擦，共同抗战，以利发展自己的武装；(3)把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吴信容支队的争取工作。萧东临时县委、萧东办事处根据吴芝圃的指示，遂确定了“争取吴信容，缓和刘瑞岐，打击朱大同”的斗争策略。并派谢继恩去萧西，与彭笑千、张舒民交换意见，他们亦同意这个策略。

7月下旬 在彭笑千的活动下，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到六区郝庄寨，与刘瑞岐的代表郝晴瞻就双方划分地区、停止磨擦、联合抗日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 “亢营”深入萧县二区活动，乘机打垮了国民党二区区队（区长窦远辉，系朱大同的嫡系，国民党特务）。

刘瑞岐方面以潘静庵、赵闾仙等为代表，萧东办事处

以民政科长张立轩为代表,于九区卯山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萧东办事处及“亢营”以九、十区为活动范围,刘瑞岐则活动于二区以西,停止磨擦,联合抗日。

仁和集会议后,纵翰民请示区党委同意,来萧东向许西连、冯蕴言等党外同志检讨县委在东撤前所犯的错误,并取得了党外同志的谅解,加强了党与他们的联系。

10月 亢为德为办“良民证”去南京看病,在宿东时村镇照相时被叛徒发现而被敌人捕去。

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带部队驻二区庙山坳,刘瑞岐派政治部主任潘静庵前来慰问,企图改编萧东武装。许西连严词拒绝了刘瑞岐的要求。

11月 新四军四师将“亢营”改编为九旅二十五团独立营(亦称萧铜独立营),派二十五团政治处主任顾寒星(梁鸿志)为营长。“亢营”经过整顿后,很快发展到四个连。一、二连由副教导员范文典带领活动于津浦路西;五、六连由营长顾寒星和教导员王亦平带领,随县委活动于津浦路东。

1942年

2月 吴信容支队地下党支部建立,朱达川为书记,时有党员10余人。

津浦路西国民党地方武装王传绶部分三路向我活动

中心白场、沈峪进犯，我萧铜独立营一、二连予以痛击，歼敌一个排，俘虏 20 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 20 余支。接着，五、六连在津浦路东又打退了刘子正（驻股北区顽军）、张立钧（铜山顽伪）的进攻。通过两次战斗，控制了皇藏山区，建立了路东区 and 路西区，成立了区队和乡武工队。

3 月 3 日（旧历正月十七） 萧铜独立营配合九旅进攻灵北张小圩子，全歼土顽赵觉民、徐志远部千余人。接着，乘胜回师，拔掉赵庄伪据点，迫使杨楼敌据点撤离，建立了萧十区，使萧铜地区联成一片。

3 月上旬 彭笑千被国民党押去临泉，被汤恩伯部软禁起来，我萧西统战工作受挫。

3 月 24 日（旧历二月初八） 吴信容暴病而死，其弟吴信元接任支队长。

3 月 中共萧东临时县委改为“中共萧铜县委”，增补孙明远为副书记，顾寒星为委员。同时，萧东办事处亦改为“萧铜办事处”，许西连任主任。

王子石任国民党萧县县长，三个月后，由刘瑞岐接任。

春 由于环境恶化，隐蔽在濉溪镇近郊的萧县地下县委负责人戴世雅、王纪珍去宿东，张祚兴去萧铜。萧西地下工作即由萧铜县委负责。

我九区区委书记毛庭霄在白庄活动时，遭曹村日军

的突袭而牺牲。

8月 中共萧铜县委书记朱玉林被伪军张立钧部捕去，曹介任县委书记，委员增补朱冬岩、沙效葛。

9月 萧铜独立营整编为萧铜总队。编制三个营，1500人，总队长许西连，政委寿松涛，副总队长顾寒星，政治处主任孙朝旭，参谋长吴端胜。

萧铜办事处由王可风、刘永之等在津浦路东郑楼创办萧宿铜中学。根据服务于抗战的教学目的，开设政治课、文化课，采取短期培训的办法，每期50~60人，至1946年停办。

刘瑞岐以两个支队约3000人的兵力于某日拂晓向萧铜抗日根据地沈峪、白场一带实行包围。萧铜总队一营隐蔽在小山口、泉口附近，以小股部队与敌作麻雀战。黄昏后，乘敌撤退之机，于张山口、孟村一带进行伏击战，给敌重创。

10月 彭雪枫师长在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表扬萧铜边区抗日游击战时说：“九旅独立营（萧铜独立营）在许西连、顾寒星等同志领导下，夹着津浦路，时而路东，时而路西，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

刘瑞岐对萧铜总队一营进行搜索，追至铜山县蛤针窝。一营留小部在山上垒石作工事，佯装阻击，暗中将主力转至铁路附近。当晚，一营沿津浦铁路夜行60里至曹

村南旺庄宿营。九区区队到铁路附近隐蔽。

11月 刘瑞岐亲率王传绶、赵永和两个支队向我皇藏峪大举进犯。他们驻土盆、纵窝、陈林、五眼泉一带，连营六七里，企图一举将我吃掉。我部在路西分散隐蔽，使顽军扑空。庄里、曹村两据点之日军闻讯出动，分东、西两路包围皇藏峪，顽军仓惶而逃。待通过龙岗山口时，朱若平同志率九区区队给以猛烈射击，毙伤顽 20 余人，粉碎了刘瑞岐的大规模进攻。

冬 我一营驻张山口东孟村，铜山土顽耿继勋（耿聋子）一部在郭公礼带领下对我夜袭，被我一营发现后奋起阻击，在杨堡将其击溃，郭公礼被我击伤。

1943 年

1月13日（旧历腊月初七） 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挺进第一纵队马海川支队投敌，编入伪军郝鹏举部。此时，日伪以大吴集、黄口、朔里、曹村等为中心，在全县设立了 24 个据点。

2月6日（旧历正月初二） 刘瑞岐在萧西实行恐怖政策，张舒民、冯家平被迫转移到萧铜地区。

3月 萧铜地区成立党政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寿松涛，副主任许西连，委员有曹介、孙明远、顾寒星、冯蕴言、张舒民。

3月11日 国民党第2路挺进军总司令王仲廉率55军李守正部三个团及江苏保安第三、第八两个团东进，配合八十九军韩德勤部向新四军四师及淮北根据地进攻。萧铜总队奉命在津浦铁路三堡至夹沟段负责阻击。我一方面将部队部署在铁路两侧阻击，一方面大造“欢迎国军反攻徐州”的强大舆论。同时，破坏铁路、袭扰敌人，造成日军对铁路加强控制，日夜巡逻，使王顽被迫于21日绕道宿南任桥过路。待王顽越过铁路时，韩德勤部已被四师主力歼灭。28日，王仲廉又匆忙率部向津浦路西撤退，行至三堡附近，复遭我路西区队袭击。王顽不敢恋战，在仓惶西逃之际，丢弃许多枪支、弹药和马匹，均为我区、乡队所获。

4月3日 中共萧铜县委书记曹介同志在闵贤集葛王村召开会议时被夹沟日伪军包围，区长赵成智当场牺牲，曹介同志被捕，后被日军杀害于宿城。曹介同志被捕后，姚克(王学文)接任萧铜县委书记。

4月4日 我九旅二十七团与萧铜总队二营袭击奎河岸老庄之顽二挺七纵朱大同部500余人，毙敌43人，伤20余人，俘官兵24人；缴获步马枪24支，子弹520发。我伤亡20人。

4月17日 伪苏淮特区淮北剿匪司令胡泽普，派出步兵2个中队，骑兵60余，并强拉民夫，妄图在萧铜云台修据点。当日晚，我萧铜总队向该敌强袭，约两小时，敌伪

逃窜。我获步枪9支，驳壳枪1支，手榴弹8枚，子弹273发，俘伪分队长以下10余人，将所修工事全部拆除。

4月30日 顽第七纵队朱大同部袭击我驻新庄子之三分区独立营及股北大队，当即发生战斗。是役，我缴获步马枪2支，俘敌1人，毙敌20余人。我消耗子弹500余发，伤战士7人。

5月初 张震同志来萧铜，研究扩大武装，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之事。决定将宿县股北区、灵北尤集区划归萧铜地区领导，萧铜办事处改为萧宿铜灵办事处。将股北大队编为萧铜总队第三营，营长张怀禄，教导员冉宪义。

5月26日 顽保安三团配合挺进七纵朱大同部在官庄设据点，会合顽萧十区谢璧如的萧东支队，计1300余人，窃取官庄、前程两个村庄的房屋、土地，砍伐了周围10多里内的树木，修围寨、筑木城、设牢房，捕杀我抗日军政人员，为害当地群众，造成数十户人家流落在外，逃荒要饭。

夏初 萧十区顽区长谢璧如在桂山乡谢小庄，将我区委书记张立平（张祖英）、财粮员陈陶二同志捕去。张、陈经严刑拷打，始终不屈，被残酷杀害于后马家顽据点。

夏 中共萧宿铜县委改为萧宿铜灵县委，寿松涛任县委书记，姚克（王学文）任副书记，委员有顾寒星、孙明远、孙朝旭等。同时成立了路西工委，姚克兼书记，李华农为副书记，李秉枢、张祚兴为委员。

中共萧宿铜县委派宣传部长沙效葛(化名张振远)去萧西祖老楼日伪据点,领导萧西秘密党的工作,建立了祖老楼地下党支部(有党员8人)。而后,沙又去青龙集伪据点开展秘密工作。

6—7月 日伪、顽联合向我萧宿铜地区进攻。路东官庄顽军沿奎河向栏杆、孟寨我萧铜总队驻地进攻;时村日伪经刁白山由南向北夹击我栏杆、孟寨部队;路西王传绶部约两个营向我一营驻地皇藏峪进攻。我萧铜总队与九旅二十七团相配合,于奎河岸新庄桥向顽军展开激烈的反击战,顽军被我击退。继而,又打退时村敌伪,取得了路东战斗的胜利。我一营在路西由副营长刘为敬率领,登陈林西山岭、刀山(胖妈顶)制高点布置阻击。不料,敌先头部队与我同时到达,随即同顽敌展开了对刀山制高点的争夺战。我副营长刘为敬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二连连长孟庆祥随之英勇冲杀,战士们斗志高昂,无不以一当十。激战两小时,顽军不支,狼狈向西溃逃。是役,毙伤顽数十人,俘虏20余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50余支。我副营长刘为敬光荣负伤。

7月27日 我萧铜总队六、七连过路西与一、二连会合后,当夜向梧桐一带搜索。28日晨在梧桐发现刘瑞岐之四支队(赵永和部)6个连,当即将其包围,令二连突入村内,激战一小时将顽击溃。后我分头进击,上午10时结束战斗,计毙伤顽10余人,俘顽20余人,缴轻机枪一挺,

马5匹，子弹数百发。我伤亡3人。

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五) 我在镇疃寺召开保长和开明士绅会议，宣布成立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祖宇恩，副区长李星原。同时，区委和区队亦宣告成立，张祚兴任区委副书记。

秋 在奎西区和萧十区，以张汝义(原国民党区长)、郑振辉(反动地主)为首，与派进来的国民党特务郑月桥相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发起反革命暴乱，被我抗日民主政权破获，并予以镇压。

萧铜七区胡锡三以教会为掩护，发展反动组织，并建立情报站，进行反共活动。被我查获后，捕送我淮北行署处理。

10月 萧铜办事处在活动中心区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对开明地主，通过政策教育说服他们接受“双减”；对拒不接受教育而又民愤很大的地主，组织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如皇藏乡地主胡兴理，拒不减租，继续放高利贷，并虐待保姆和雇工，群众意见很大。经过说理斗争，打击了他的威风，维护了群众的利益。

官庄伪军八九百人，押着十几辆大车从栏杆过奎河向袁庄、黄庄、赵庄、新庄子一带抢粮。我萧铜总队三营得情报后，部署七连沿奎河南进，从新庄子东头攻击；九连从新庄子西头、赵庄东头出击；八连从北面向新庄子突击。我军士气旺盛，一举将敌人冲垮。敌丢下大车狼狈逃

窜。此役，毙伤敌 10 多人，俘虏 3 人，缴枪 3 支。我八连一排长马文化负伤。

路西土顽王传绶、刘瑞岐两个支队，吴信元支队在刘子仁命令下也派一个营配合，分南北两路，进入皇藏地区，夹击我萧铜总队。我总队一、二营部署在曹村、泉口一带隐蔽，用区乡队搞麻雀战袭扰他们。顽军扑空后，回到二区梧桐宿营。我一、二营尾随至梧桐附近隐蔽，拂晓前突然袭击王传绶部。除打死打伤者外，王部被我俘虏 20 余人，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20 余支。待其摸清情况后，我已回到九区休息。

10 月底 萧铜地区日伪、顽、我斗争日益尖锐，顽固派策反活动猖獗，办事处副主任吴端胜的重要亲信已叛变投敌，造成我根据地内部有些动荡。为稳定局面，巩固内部，纯洁革命队伍，县委决定将吴端胜及王凤楼、欧如亮、王茂松等分别予以处理。吴端胜在送往邳睢铜军区改造教育期间，持刀行凶，砍伤我警卫人员，遂被军分区决定处决。

11 月 17 日 我萧宿铜县总队副总队长顾寒星率三营七、八连于凌晨进攻赵庄伪据点。由于我地下人员孙成绪、盛玉珍(曼侠)作内应，在我进攻之时放下了吊桥，结果一枪未发即将伪军解决。缴枪 40 支，俘伪区长阎维新以下 50 余人。

冬 我萧宿铜县党、政、军干部开展整风学习，除少

数领导骨干到华中分局及淮北区党委轮训外，多数干部坚持岗位，每天挤出一些时间，阅读整风文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写学习笔记，然后由组织分别进行考核。经过一冬春的学习，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我军西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作好了思想准备。

我萧宿铜县总队一营在路西区队配合下，对南犯铜山土顽进行一次集中打击。某日拂晓，我进驻汉沟、蛤针窝，严密封锁消息。下午三时，沿汉王庙、周棚、闸河口等十几个村庄进行兜剿。次日拂晓前到朱庄发现驻敌，随即进行包围。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将铜山土顽仲延标两个连及其营部击溃，俘虏20余人。经此打击后，铜山土顽很长时间不敢南犯。

1943年冬—1944年春 萧宿铜县领导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发动群众大搞生产互助，学习吴满友经验，推广奎西段庄组织起来生产铁木工具的试点经验，同时开展“让租让息”，削弱封建剥削，兴修水利，救灾度荒等工作，以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1944年

1月初 顽三十三师段海洲部张大傻纠合官庄、后马家与马栏伪军张立钧部，分四路向我铜七区杨庄、官庄

一带抢粮。我萧铜总队六、七连在顽撤回途中予以截击，断其尾部，歼敌一个排，俘虏10余人，缴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我追张部至宝光寺，其躲进据点内不敢出来应战。

2月 彭笑千从太和国立21中逃回萧县，继续做争取吴信元支队的工作。

3月初 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二纵队(刘瑞岐部)改编为第七纵队。其第五支队王传绶部扩编为第四十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一一八支队(支队长胡应西)，一一九支队(支队长谢壁如)，一二〇支队(支队长郭孝冉)，计1500余人，配有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1000多支，炮2门。活动于萧县二区以东，专门对付我路东新四军及萧宿铜抗日根据地。

3月下旬 后马家、宝光寺顽军三十三师张大傻(张克修)部近千人，到杨庄集东南官庄一带抢粮。萧铜总队政委寿松涛，副总队长顾寒星率二营(缺五连)及三营出击。我六连受阻，七连被火力压制，总队又令四、八、九连进攻。在冲锋中突破敌人防线，敌溃退。是役，毙伤敌30多人，俘虏10余人，七连缴获捷克式机枪一挺。我七连长周纯朴、九连排长李惠田牺牲，八连班长王正连、三营通讯班长张兴文负重伤。

4月初 萧铜总队一营驻宿北区冯庄、胡疃，夹沟伪军一个中队出来扫荡，遭我一营和宿北区队的严重打击。

伪军伤亡中队长张朝瑞(张海侠)以下 20 多人,我伤亡战士 7 名。

4 月上旬 萧铜总队一营驻镇疃寺、胡疃等村,日军 30 余人去大五柳抢粮,途中遭我伏击,敌人溃散。我乘机将敌人包围在胡疃山上,后曹村、夹沟之敌前来增援,被围之敌乘机突围,我与之进行肉搏。此役,计毙伤敌 10 多人,我伤 3 人。

4 月 15 日 在奎西区郑楼召开萧铜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萧宿铜灵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许西连为县长,陈敬伍为县参议会参议长。大会通过了年度财政预算和公粮累进征收办法。同时,对县政府机关的人事作了安排。秘书:冯蕴言、任慎修;民政科长张舒民,副科长张立轩;财粮科长朱振东,副科长徐明轩、朱传真;教育科长王可风,副科长杨化龙(杨兴瑞)、王祥义;司法科长孟振声,副科长谢继恩;公安科长张建淮(张元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对两面、三面政权的改造,进一步扩大了我一面抗日政权。

4 月中旬 我萧铜总队一营驻宿北区,某日夜袭击清水沟日伪据点。宿北大队扒铁路、切电线,给予有力配合。白海龙(尖山人,铁匠)在据点内作内应。经过一阵激战,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是役,我拔除了清水沟据点,俘伪军 30 多人,缴弯把机枪一挺,步枪 20 余支。我副教导员张恩远同志牺牲。

初夏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集中五六万兵力向中原地区进攻。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部 40 万人望风而逃，38 个市、县沦入敌手。为挽救中原危局，新四军四师准备西征。此时，我萧宿铜党政军干部组织专人收集情报，筹集物资，为迎接新四军四师西进作好充分准备。

5 月 17 日 我萧铜总队二、三营和民兵大部对萧宿铜中心区阚疃伪据点进行围困，打时村、路疃增援之敌。围困五天敌人未来增援，我便采取强攻，不到半小时阚疃之敌 50 余人全部投降。我部队撤出阚疃进驻林湖休息，同时组织群众拆除据点。这时，时村日军 20 余人，胡泽普伪军千余人前来阚疃驱逐我拆据点的群众，并占领了阚疃。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周纯麟团长令总队火速将阚疃之敌击退，师骑兵大队隐蔽在奎河岸内准备迎敌。我再次向阚疃攻击，敌向时村撤退，骑兵大队跃马挥戈将敌分割包围，我获全胜。此役计砍死砍伤敌百余人，俘敌 200 余人，缴获机步枪 200 余支，平射炮一门。

6 月 萧铜总队部及所属三营驻段庄，曹村日伪军 100 余人到阻沟寺抢粮，寿松涛政委令三营派少数人前往草堂子伏击，排长赵承胜率队前往。当我前哨班杀伤敌人后，由于部队联络中断，没能及时撤退，田勇云、武思良等三人牺牲。敌因情况不明，亦很快退回据点。

我萧铜总队战士孙元卿、钱书才、孟庆林、赵玉明四人，于上楼村击毙王传绶部连长兼陶墟乡乡长王志忠及

其护兵多人，缴获长短枪 5 支，挖掉萧县土顽东犯的耳目及先锋，受到我县政府和县总队的嘉奖。

7 月 萧铜总队奉命改编为淮北军区三分区萧铜独立团，团长顾寒星、政委寿松涛。

8 月初 张舒民奉彭雪枫师长指示，绕道兼程返回萧西，配合彭笑千策动吴信元部起义。

8 月 20 日夜 我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九旅二十五团和骑兵团，由彭雪枫师长率领于曹村北桃山地段分数路快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萧县境内。萧宿铜部分党政干部及萧铜独立团一、二营随军西进。

8 月 21 日 小朱庄战斗。是日晨，我十一旅由城阳分两路向前后梧桐、时村土顽王传绶部发起攻击。王传绶集中四十纵一一八支队、三纵七支队一大队（刘瑞岐部）及四十纵警卫连、独立大队共 15 个连，约 1600 人，于小朱庄固守待援。我 21 日中午完成包围后即作攻坚准备。23 日即行炮火轰击，轻重机枪于屋顶瞰射。经四个小时炮火射击后，王顽前沿阵地被摧毁。13 时发起总攻，三十一团一营向南门攻击，一举占领西南角土堡。三十二团一营由西北突入，与顽对峙格斗占领围墙。王顽不支，亲率 300 余人，从东圩突围。我三十二团和骑兵团奋起阻击，前后战斗约两个小时，计毙伤顽纵队司令王传绶以下 300 多人，俘纵队副司令王忠鼎以下 1300 多人，缴获炮 2 门、轻重机枪 35 挺，步枪千余支，子弹万余发。

8月24日 小朱庄战斗结束后，二十八纵队三支队吴信元部于吴集北大孙庄宣布起义。顽第三纵队刘瑞岐闻讯后即率部及县府人员 3000 余窜往陇海路北，二纵一支队刘子仁部亦迅速退至永城境内。

9月1日 徐州敌千余人集结于曹村、夹沟附近，5日越津浦路西占领萧县之城阳、梧桐、白顶山、杜集等地，7日返回徐州。

9月4日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姚运良政委亲率三大队，配合吴信元部向穆集以东顽三纵七支队奔袭，土顽相机逃窜。我追至陇海路附近，将顽七区队全歼，俘 25 人、毙 2 人，缴步枪 13 支。

萧县新开辟地区与萧宿铜暂时合并，仍称萧宿铜县，纵翰民任县委书记兼萧铜总队政委，彭笑千任县长，许西连任副县长兼总队长。时，已发展区乡武装百余人。

9月11日 夏邑县八里庄战斗，我新四军四师歼灭顽二十八纵李光明部。师长彭雪枫不幸殉国，遗体送萧县王白楼子村装棺入殓，次年 2 月葬于洪泽县半城。

9月12日 路东顽段海洲率三十三师一部、特务团及补充一、二团为右纵队，经由灵北朱山子、北马集、张山、贡山到孙寨韦集集结；顽十四纵苗秀霖率二、三、八三个团为左纵队，经由渔沟、尤集、贡山，向刁山、白山集结。该两部共 6 个团的兵力，经由符离集以北地区西窜。在韦国清、彭明治的指挥下，我萧铜独立团三营配合七旅及九

旅将其一、二、八团一部，三团全部共千余人截歼于刁山、白山、周场一带。残敌退回永安集、时村等伪据点附近，其西进计划被粉碎。

9月下旬 商丘之敌奔袭萧西王白楼子、王柳园我军驻地，并继续在萧永地区“扫荡”，27日返回商丘。

9月 为稳定社会秩序，学校相继开学。时有高小10多处，初小224处，冬学每区5处，教员315人。高小学生650人，初小学生约6000人。县民主政府还创办了萧县中学，校长杨兴瑞，教导主任黄维华，总务主任郑趣白，设中学和师范两部。11月底招收学生220人，教员12人，规定了生产教育、民主教育、爱国教育的方针，没有固定校舍，在四区杭子一带流动教学。

10月中旬 顽暂一军军长王郁文亲率暂十四师、骑八师、五纵魏振铎、二十八纵刘子仁、二十九纵蒋心亮等部万余人，由涡、蒙地区向我萧宿永地区进攻。韦国清、彭明治复率七旅全部、九旅一部西进与路西部队会合。我萧铜独立团一、二营及萧县独立旅置陇海路附近，阻止路北耿继勋部及刘瑞岐部南进。16日，我军于永东菊集、阎楼附近与顽接触，迫顽暂停北进。19日，顽步、骑6000余人向我永北保安山、夫子崖阵地进攻。我环保安山、芒碭山等地构有工事，顽势不猛，且慎重前进，我为紊乱顽之部署，争取时间，待路北八路军到达后再行出击，故以三十二团、三十一团小部出击。20日，顽骑八师开始向我后洼、

芒碭山阵地进攻。我将其击溃后，复以二十、二十六团出击，当晚击溃其军部。21日，我全线出击，顽不支即退。我跟踪至永西酃阳集，歼其暂十四师一团及二团一部。该师溃不成军，骑八师亦被击溃，王郁文几乎被俘。此役，计毙俘顽千余人，我追至涡阳北关而止。

11月4日 萧宿铜抗日民主政府召开行政扩大会议，确定五项工作：（一）用各种会议和方法转变干部的旧作风、旧观念；（二）根据政府减租减息法令协助群众工作；（三）减租减息法令要切实执行；（四）武装配合作好边缘区工作，积极开展对顽伪的斗争；（五）在萧县征收公粮1000万斤，以粮食收流通券3000万元，并规定了征收办法。

11月24日 新四军三师七旅配合萧县独立旅越过陇海路奔袭萧县土顽刘瑞岐。刘部自我西进后，盘踞陇海路北，与敌伪勾结并不断南来我根据地侵扰。25日拂晓，我遂向郝集、段庄、刘套、彭新庄、迎风口、刘店等处发起围歼。俘顽政治部主任潘静庵以下300多人，刘瑞岐部支队长赵永和起义，孔广玉、刘典邦等投降日伪，刘瑞岐带40余人逃窜。是役，我毙顽营长1人，我牺牲营长1人，伤10余人。陇海路北顽据点均被我拆毁，我南北地区联成一片。

11月下旬 萧、宿、永、夏地区顽军大部肃清，我开始转入政权建设。淮北苏皖行署二专署成立，彭笑千任专员，纵翰民任副专员。萧铜分别建县，原萧铜县三分之二

干部调来萧县，成立萧县县委和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属淮北二专署)，县委书记由孙明远接任，县长许西连，副县长张舒民。萧铜独立团一营留萧县组建萧县总队，县长许西连兼任总队长，县委书记孙明远兼政委，总队副扶廷修，参谋长刘为敬。这时，全县已建立了5个区委、8个区公署，72个乡政权(其中一面政权30个，两面政权31个，三面政权11个)，新发展区乡武装783人。

11月下旬—12月 为肃清土顽残余，维护新生政权，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出布告，要国民党党政军(包括三青团分部、国民党区分部、区分队以上骨干，连以上)人员向政府登记自首，并交出党证、团证、名册等。对主动登记自首的宽大处理，对罪大恶极而又拒不自首的予以镇压，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有很大一批人向政府作了自首，对从政治上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5年

1月 中共萧县县委在二、三、四、五、六区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通过运动，建立各级农民救国会，发展武装，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2月6日 四区区委在屈楼发动周围1000多农民

群众,开展对屈楼大地主屈大瞎、屈培经、屈三妮的说理斗争。使屈楼三家地主退回谢楼、李平庄等九个村佃户的地租 17067 斤。

2月16日 伪淮海省长郝鹏举应萧县土顽刘焕文之请求,派七庭宾师向萧县西部“扫荡”。萧县独立旅、萧县总队配合四师十一旅,在张震同志指挥下,于祖老楼、青龙集之间痛歼伪顽,并乘胜拔除了青龙集、祖老楼等伪据点。是役,我歼敌 500 余人,余敌窜回徐州,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 300 余支。四师参谋长张震负伤。

2月 建立萧县总队第三营,孙清淮任营长兼教导员,孟庆祥为副营长,陈海波为副教导员,全营 200 多人,活动于五、六、七、八区。

淮北二专署将萧县中学与永城中学合并,在萧县四区张庄寨成立建设中学。专员彭笑千兼校长,副校长王卓然,教务主任张宇锐,教导主任李维夫,总务主任黄维华。4月开学,招收学生 600 人,设师范、中学、建设三部。暑后在王白楼子设立分校,招收新生 300 人,年底迁往永城县丁陈集、郭窑,至 1946 年 8 月停办。

3月14日 六区区委副书记阎继文在王楼召开对地主郝云松、王德昌的说理斗争大会,参加群众 2000 多人。群众揭发郝、王曾杀人行凶,一致要求偿命。郝云松当场低头认罪,交出步枪 2 支、盒子枪 1 把,倒回粮食 5000 余斤。

3月中旬 吴信元支队4个营1500余人,改编为萧县独立旅,吴信元任旅长,副旅长欧阳圣德,政治部主任杜慰农。该旅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麻瑞全,二团团长郝长桂。

3月 成立夹河区,葛玉环任区委书记兼区长,闵凯任副书记,邓塞林任副区长。

4月 县委设立城市工作部,部长姚一非,副部长李华农、张笑仙。后姚一非调走,李华农任部长。

5月 二区先后在葛塘、葛张庄等地发动组织三次说理斗争大会,开展减租减息,县委副书记朱玉林亲自参加大会,到会群众4000余人。群众对葛塘地主葛元赞展开说理斗争,葛元赞低头认罪,当场向佃户退租。

夏 全县农民救国会普遍建立,各区区队分别发展到50~100人,绝大多数的乡建立了基干队,村建立了民兵组织。

7月上旬 中共萧县县委在四区张寿楼召开500人的党员活动分子大会,地委书记吴芝圃传达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并用一周时间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会后,萧县县委领导群众开展了三项工作:一、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二、整编并扩大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三、发动轰轰烈烈的劳武结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7月 县政府教育科长王可风在四区锦桥村举办全

县教师训练班。

8月13日 淮北二地委在萧县传达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宣布了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的七道进军命令。中共萧县县委于13日夜即研究了接收萧县境内敌伪据点的具体方案。并以萧县总队的名义向驻萧城、黄口等地的日伪军、伪政权发出通牒，令其在限期内向我缴械投降。但由于蒋介石命令日伪就地“维持治安”，我们的通牒没有发生效力。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萧县总队在党的领导下，及时拔除了丁里、大庄、吴庄集、陶楼、岱桥、郭洼等日伪据点，使陇海路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萧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四、解 放 战 争 时 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1945年

8月 二区在符离集以北、小李庄以南的津浦铁路线上,组织了1000多人用两三天时间扒铁路,孤立和打击日伪据点。

8月底 新四军十二旅三十四团配合县总队第三营攻打陶楼据点,激战中萧城伪军一三九团500多人出城接应,被我击退。陶楼据点的伪军100多人就降。接着,又赶跑了岱桥、郭洼等据点的伪军。

9月初 我县总队攻打黄口据点。黄口是一个较大的日伪据点,有日军1个中队,伪军200多人。未克。

10月2日 国民党县政府抢先派人接收了萧城的伪军政人员,形成顽伪合流。

10月18日 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一团在萧县独

立旅和萧县总队的配合下，攻克萧城。全歼守敌 700 多人，缴获机枪 12 挺，长短枪 600 余支。国民党萧县十三支队长孔广玉、二区区长郭效冉、二区驻萧城办事处主任陈凌霄被俘。

10 月下旬 为了巩固抗日胜利成果，县委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决定将郭效冉、孔广玉拉出示众，彻底清算其罪行。县委在坡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将郭、孔二人枪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10 月 29 日 将淮北二地委、二专署、二分区改为华中八地委、八专署、八分区，萧县隶属八地委领导。

12 月 7 日 黄体润任国民党萧县县长，加强了顽萧县反共势力。

12 月中旬 八分区将萧县总队一、二营升编到分区十二旅三十四团，县总队副扶廷修任团长，王枫任县总队副队长。

12 月底 萧县总队第三营升编为分区主力。

年底 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全县有 87 个支部，1457 名党员。

1946 年

1 月初 将战斗力较强的区、乡队上升编成新的萧县总队，共 400 余人。县长许西连兼总队长，县委书记孙

明远兼总队政委，刘为敬任副总队长，张庆怀任政治处主任。

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双方颁布了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协议的规定，徐州地区也成立了“三人军事调处执行小组”。萧县县委指示全县人民武装，只在我边沿区防守，决不进入国民党占领区。

1月13日 国民党李默庵部一个师从江南开到徐州三堡、夹河寨，向我解放区进攻。凌晨，国民党以一个团的兵力公然向我姚楼进犯。为维护停战协定，我县大队三连和夹河区队在姚楼东进行阻击，激战半日，后因众寡悬殊，我方于上午11时撤出阵地，姚楼遂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随后，他们又强占了我解放区的王闸口、王门、义安山、北望、南望等大片村庄，并构筑工事，准备继续向我军进攻。

1月15日 国民党县长黄体润率两个大队，在国民党铜山县长耿继勋（耿聋子）部两个团的配合下进犯萧城。在龙山子、郝店一带遭我县总队的打击。激战数小时后，我军撤出战斗，萧城遂被占领，至下午3时国民党军撤离萧城。

1月 由于国民党军不断向我边沿区进犯，萧县县委一面向全县人民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一面向华中八地委和八分区报告。分区于22日派联

络部长毛更甃及陆一函、张笑仙赴徐州和军调三人小组我方代表韦国清联络，在王门被国民党驻军无理拦阻，软拘一天一夜，对方最后以“安全无保障”为托词，予以拒绝。

2月 八地委在濉溪南丁楼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县委书记孙明远带领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后，八专署秘书孙叔平又专来萧县讲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进行逐级贯彻，在学、政、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3月 县委书记孙明远调地委工作，胡天禧接任县委书记。

因敌人对津浦铁路严密封锁，路东和路西联络困难。经华中分局批准，将原萧宿铜县路西之天门、路西、宿北三个区划归路西八地委、八分区领导。其中，天门、路西两区归属萧县，宿北区归属宿西县。同时将原夹河区和路西区合并，仍称路西区。

3月30日 国民党军队耿继勋部配合驻杨楼车站的八十八军六十三团南犯，向我七区区队进攻。

3月底 八地委、八分区决定在萧县的尚口等地设立据点，以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陇海两铁路向我解放区进犯。

4月初 国民党县政府对我设立尚口据点大为恼

火，多次派兵袭扰。我县总队之七、九连和分区三十四团二营四连在尚口据点驻守，三十四团在尚口外围陶楼等地防守。

4月19日 国民党八十八军一部配合萧县保安团向尚口进攻。我县总队在三十四团的配合下，激战1天，毙敌100余人，晚上将敌击退。

4月27日 国民党八十八军和萧县保安团约8000余人，从黄口、杨楼、夹河寨分数路向尚口据点围攻，凌晨将尚口包围。在空军的配合下，他们以大炮数十门、机枪数百挺的强大火力向我尚口据点猛烈攻击。我驻守部队县总队二营奋起迎战，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攻击。我伤亡惨重，坚持一天，最后弹尽援绝，副总队长刘为敬、政治处主任张庆怀和200余战士壮烈牺牲，100多人被俘，仅20多人突围。我驻陶楼之三十四团增援无效，被迫撤退。

5月初 徐州三人小组来萧县调查处理尚口事件，美国代表哈里曼借口萧城无战事痕迹，拒绝去尚口，便返回徐州。

八分区帮助萧县重建县总队，从萧县独立旅抽调1个营，又从分区十二旅调来范文典、薛光分别担任副总队长和政治处主任。

5月8日 县委、县政府举行了“四·二七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大会。

5月中旬 县委在徐油坊召开了庆祝重建萧县县总

队大会，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讲了话。

5月11日—24日 地委在濉溪南丁楼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县委书记胡天禧带队参加了会议。

6月20日 县委在三区的石桃园召开了有区委书记、区长和农会主任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县委副书记朱玉林作了前段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组织到会人员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并对斗争地主的策略和果实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会后，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短期训练，并建立了专门领导反奸清算的组织——清算委员会。

6月26日 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全面内战。

7月初 县委以贯彻《五四指示》为中心，分别在二、四区进行清算试点工作。接着，反奸清算斗争即在一、二、三、四、五区的全部，六、九区的大部和七、八区的小部分地区迅速开展起来，建设中学的师生200多人亦深入各区开展宣传，贯彻《五四指示》。

7月18日 国民党交警二总队从夹河寨进犯并占领萧城，19日占领了圣泉寺、岱山口、瓦子口等处后，继续向我三、四、五、六、七区进犯。7月18日，徐州以南津浦线上的国民党五十八师一八三旅从九区经永堌向西进

犯，我区乡武装被迫向西转移。

8月8日 我一区区长林星锐和分区情报分站站长孙东民一同去杜集接收情报，被敌包围袭击。区长林星锐和随后前往的副区长丁戒山牺牲，乡长刘步廷及彭瑞昌被俘，后被敌人惨杀在萧城。孙东民突围，县政府又任命孙东民为一区区长。

8月10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的敌人出击，发起了陇海路破击战。一夜之间，占领了砀山、兰考、杨集、李庄等10余个城镇。我县总队配合八分区武装攻克黄口镇和黄口车站，消灭黄口守敌数十人。同时，县委发动了四五千民工，在孙清淮等同志的带领下，经过两三天的奋战，将杨楼车站至李庄车站四十余里的铁路、桥梁、通讯设施全部破坏。

8月中旬 岱山口至瓦子口以东地区被敌人占领，后又不断向西蚕食。县委、县政府先后撤到了三区的孙桃楼，四区的胡楼，卫生所、修械所等一些非战斗机关和一区、二区、夹河区的区、乡干部，建设中学的师生及伤病员等，都撤到了李石林西北朱大楼、洪河集一带的萧永边界上。

8月20日 国民党新五军从蚌埠出发，经濉溪苗桥、萧西一带向陇海路急进。驻在朱大楼、洪河集一带的萧县后方机关受到冲击，由公安局副局长单衍纯带领向西北撤退，公安局长王尚三也随卫生所撤到陇海路北与

单衍纯会合。北撤人员，被冀鲁豫军区编为两个大队：武装人员编为陇海支队萧县武装大队，大队长孟庆祥，政委王尚三；干部及其他人员编为干部大队，大队长单衍纯，政委由王尚三兼任。

9月初 国民党五十八师的三个团和江苏省保安团与交警二总队在萧县会合，挤得我县、区、乡武装无地存身。县长许西连、副总队长范文典带队与敌周旋，于9月下旬被迫撤离萧县。

9月3日 由朱大同任团长的地主“还乡团”进驻萧县，对我革命家属和积极分子进行残酷迫害，我区、乡、村基层政权全部被摧毁。还乡地主趁机进行反攻倒算，勒索群众，全县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9月下旬 单衍纯从北撤人员中挑选精干力量60多人，越过陇海路，到永城的胡桥与我县政府会合。其余人员由王尚三带过黄河，由冀鲁豫区党委分配工作或安排学习。

9月底 县委书记胡天禧，副县长张舒民带领区乡干部、勤杂人员、年老体弱的干部和伤病员百余人，由县总队第三连护送去地委汇报工作，途中经永碭公路时与国民党军交警二总队遭遇，经短时间战斗，向南撤退到毛河涯，胡天禧失散，被敌人俘去。

10月初 地委为了改变困难局面，决定将全区划分为4个工委，武装编为4个支队。萧、永两县武装合并为

萧永支队，行政为萧永办事处，党内为萧永工委。

10月7日 八分区副政委寿松涛，带领分区三十四团、骑兵大队、萧永一支队，在潘道口与敌交警二总队激战一天，晚上进入萧县，经樊小屯、大吴集、陈庄、任楼、蒋新楼、张湾子等村，一直打到濉溪西、永城南，一路与敌多次激战。对那些反攻倒算，罪恶多，民愤大的还乡地主豪绅作了惩处，为人民壮了胆，解了恨，基本上灭掉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

10月8日 分区参谋处副处长孙以仁叛变，向敌人泄露了我军的机密，使我西撤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10月 地委为了保存干部，减轻战斗部队的负担，决定送一批干部去冀鲁豫六分区。其中有萧县的高钧泰、杨道昭等数十人。

11月初 我西撤人员全部撤离八分区，进入睢杞太解放区，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

11月 在八区成立了萧西工委，李建华任书记，盛玉峰任副书记，李乐敏为委员。

12月初 范文典在柘城东杨塘与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张岚峰部作战时负重伤。

12月12日 豫皖苏区党委、豫皖苏军区成立，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萧县西撤武装及由王尚三带往陇海路北的武装被编入军区的警卫团。范文典任团长（范因伤未到任，不久牺牲），王尚

三任副政委。

12月17日 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平岗召开了原八分区县区以上干部大会,并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西撤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八分区在坚持对敌斗争中“方针不明,决心不够”的错误。同时,宣布成立豫皖苏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撤销八分区建制。他号召全体干部坚决打回去,收复根据地。

12月下旬 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成立萧县县委、县政府,任命朱玉林为县委书记,张舒民为县长。派孟繁超等九人便衣从永西插入萧城、萧西了解敌情,为收复萧县作准备。

12月30日 朱玉林派孙东民、朱世福到萧县与萧西地下工委书记李建华联系,传达县委指示。要求他们联络西撤时失掉联系的党员、干部,为恢复萧县政权作准备。

1947年

1月1日 豫皖苏区党委召开了东进誓师大会,接着即开拔东征。途中战涡阳、克龙岗,歼敌2000余人,很快收复了陇海路南永、夏、亳、涡、宿西、砀南等广大地区。

1月中旬 地委指示撤销萧县建制,成立萧宿永工委,工委书记李华农,副书记单衍纯(劲之),大队长朱若

平。

2月初 工委东进开辟萧宿永地区，途中受阻，骆天庙一战朱若平在追击逃敌时牺牲。4月，因东进斗争形势变化，工委撤销。

3月 敌人以永城为中心，继续向我“扫荡”。三地委动员全体干部和指战员与敌斗争，口号是“开辟永东，确保永西”。

春 国民党县党部根据上级的命令，在县、区设立工作小组，实行“党网化”，全县组织了15个工作小组，成员有123人，致使我党员很难活动。不少党员、干部、积极分子被迫自首，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叛变投敌。

5月12日 豫皖苏三地委决定，以分区主力一个连配合原萧宿永工委干部组成一支精干武装，由田启松带领进入永东，开展游击战。

6月 成立萧宿永县，县委书记田启松，县长李品立，副县长谢继恩，孟庆祥任县大队副大队长。

夏秋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各种苛捐杂税的加重，加上8月连续15天的水灾和接踵而来的霍乱流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缺衣少食和乞讨异乡的悲惨境地。黄口、杨楼车站爬车逃生的难民不断被轧伤轧死，真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9月16日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陈毅、粟裕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第三纵队进入豫

皖苏地区,从黄口、杨楼之间横跨陇海铁路,经萧县西部和南部东进。国民党县政府人员仓惶出逃,国民党徐州外围的大部分武装很快被扫除。

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口号。同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陈粟大军回师途中,在萧县的南部进行宣传。

11月17日 三地委决定撤销萧宿永县,恢复萧县、宿西县。任命朱玉林为萧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单衍纯为副县长、县委委员,不久调王尚三任县委副书记,张祚兴为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并成立了萧县县大队,朱玉林任大队长,孟庆祥任副大队长。

11月 县大队在分区五团支援下,于城西丁庄伏击顽保安二团1个营,歼敌10多人,俘敌30余人,缴机枪1挺,步枪40多支,顽营长孟昭信逃掉。

12月初 我袁圩区公所被敌偷袭,牺牲7人,失枪3支。

12月5日 我王寨区公所遭敌三区区队袭击,区委书记兼区长贾绪朋等二人牺牲,副区长梁浩斌、副区长李玉林负伤。

12月 根据地委指示,县委认真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首先在石林、袁圩、王寨、朔里、大屯等解放区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并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农

村，发动群众斗地主，分浮财。

年底 全县建立了石林、袁圩、大屯、王寨、祖楼、陶楼、黄口、天门、朔里等区政权，大部分区都建立了区队，全县近一半乡建立了政权。县大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948年

1月1日凌晨 我驻蒋新楼之五区公所，遭到国民党四、五区区队袭击，牺牲区队长韩云璋和一名班长，被俘去战士五名，在县城被杀害。

1月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有些地区在批判和纠正了“土地会议”之前强调的“九照顾一批准”的右倾错误后又发生了“左”的倾向，有些同志犯了急性病，将地主扫地出门，使地主大批逃亡，对中农利益亦有侵犯。针对这些问题，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及时、坚决地给予纠正，进一步贯彻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使土改运动得以顺利发展。

1月18日 我黄口区区长蒋相善在大屯区的胡屯被驻黄口的国民党伞兵袭击牺牲。

1月24日 我王寨区区队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在王寨西南的小杨楼组织了一次诱敌入窟的战斗——小杨楼吊坏战。此役，击溃敌2个连，毙敌12人，生俘敌排长、突

击队长以下 36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数十支，子弹数千发。

1 月 29 日 豫皖苏军区独立五团和我县大队在史庄设伏，把春节前出来抢东西的孙庄据点的敌人三面包围。敌向西南逃窜，直追 20 余里至马山，歼敌 200 余人，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8 挺，步枪百余支。这一胜利对萧县的恢复有重要意义。

2 月 27 日 国民党正规军二十四师两个团配合萧县保安团、人民自卫总队共 3000 余人向我控制地区“扫荡”。我县大队组织各区区队英勇奋战，打击敌人。经大小 30 余次战斗，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坚定了战胜敌人、保卫我解放区的信心。

2 月下旬 我县大队升编为豫皖苏第三军分区新五团，副大队长孟庆祥和邢志和随县大队升编，邢任参谋长，孟任副参谋长，郝长顺任副主任。

3 月 8 日 我新五团在王寨西南郭楼设伏，计划歼灭王寨据点出犯的敌人。战斗中，在张湾子与敌整编八十八师二十一旅遭遇。是役，虽然我们只有 6 个连的兵力，同数倍于我们的敌正规军激战一上午，但却以牺牲 18 人的代价，赢得了毙敌 200 余人的胜利。

3 月 10 日 成立萧宿县，王尚三任县委书记，张岸任县长，张绍烈任副县长。萧县一、二、九区和蔡里划属萧宿县。

3月17日 国民党起用沦陷前曾任过萧县公安局长的李公达任县长。李一上任就招徕重兵,增设据点,构成所谓“萧西的铜墙铁壁”,将我挤到萧永边境,加之我县大队升编,活动更加困难。敌人组织黑杀队,经常袭击我区、乡武装。

3月18日 在分区主力配合下,拔除了王寨顽据点。

3月底 新成立了县大队,调新五团副参谋长孟庆祥任副大队长,郝长顺任副政委。

5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旅长金绍山率部攻打敌人的重要据点吴楼,三十团配合炮兵营主攻,三十四团打援。凌晨4时开始攻击,次日凌晨5时攻克,歼敌500余人。我三分区新五团赶跑了徐楼据点的敌人,孟油坊据点的敌人也仓惶龟缩到萧城,萧西的“铜墙铁壁”即告坍塌。

5月底 我主力调走,敌人不断从萧城西犯。主力一来,他们就龟缩萧城。此时,萧县处于拉锯状态,萧宿县武装也被挤到濉溪以西的苗桥北部一带活动。

7月上旬 我六区副区长张福成在大吴集北陶楼遭敌袭击牺牲。

8月初 我县大队一部在石林区杜庄村击垮敌四区四区队一个排。

8月21日 单劲之(单衍纯)、孟庆祥率领县大队在

神树村出奇制胜,仅用 40 多分钟时间就歼灭了国民党三区区队,打死打伤敌 40 多人,生俘 50 多人。敌三区区长侯克祥,区党部书记蒋相增被生擒,缴获轻机枪 2 挺,步枪数十支。此一战基本上扭转了萧县的局势,受到豫皖苏军区通报表扬。

9 月 县委指示石林区试行小乡制,彻底废除保甲制,乡直辖自然村。

萧宿县配合分区主力对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进行破击,翻轨数里,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的战役。

9 月 20 日 萧县成立战勤指挥部,朱玉林任政委,单劲之任司令员,冯子均(家平)任副司令员,下设组教、保卫、供给、总务四个股。

9 月底 在分区副司令员邢天仁的指挥下,我碭南大队、雪枫大队、萧县大队,分区机炮连等在中南海村以南摆开东西 10 余里的阵势,准备迎击由南而来的刘子仁部。早晨,敌在傅庄与我军接触,我红庙区队配合萧县大队奋起迎战,俘敌 80 多人,缴获步枪 80 余支,战马 1 匹。

10 月初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县委决定祖楼区组织一个担架团,任命王继冉(县农工部副部长兼祖楼区区委书记)为团长兼政委,张亚南(祖楼区区委副书记)为副团长兼副政委,全团担架队员 972 人,162 付担架。

10 月 在全国大反攻的形势下,县委指示,对萧县

的国民党开展一次政治攻势，争取分化瓦解敌人。

10月中旬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向徐州方向运动，国民党军纷纷向徐州龟缩。10月上旬，萧县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纷纷逃往徐州，萧县形势迅速好转。

10月29日 各区区队升编县大队200余人。

11月6日 淮海战役开始。根据支前总指挥部的命令，萧县祖楼区常备担架团出动，随设防在徐州南津浦线上的我两广纵队活动。该纵队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四昼夜，顶住了敌孙元良兵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猛攻，尤以萧县境内的卢村寨、大方山激战最烈，工事大部被毁，我军伤亡严重，但阵地始终为两广纵队英勇坚守，粉碎了敌人南逃的企图。其间，祖楼区常备担架团除转运伤员数百人外，还帮助部队赶修工事。12月初，担架团复员回县，两广纵队首长给萧县县委写信赞扬了担架团的工作成绩，三地委《反攻报》刊登了担架团的事迹。

11月初 华野部队在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萧宿县供应粮食，抢运伤员，给以大力支援。县委书记王尚三任萧宿县支前指挥部指挥，带领全县军民积极投入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11月上旬 萧县在王寨成立了淮海战役支前指挥部，朱玉林任指挥，单劲之任副指挥。各区乡也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各行政村成立支前小组，大吴集、黄口、王寨、梅村、瓦子口、杜集等地设立随军粮站。全县的支前工作

迅速展开。

朱玉林带领县大队两个连到陇海路沿线(当时的七、八区和铜山县的第四区)扫荡残顽,安定人心,恢复区乡政权,筹粮、组织运输力量支前。敌保安团副团长胡映熙与大队长韩登云、杨俊领等 200 余人投诚,交出步枪 150 余支,轻机枪 15 挺,子弹数千发。大屯、王寨、郝集、黄口等区均收缴了一批土顽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

11 月 13 日 人民解放军进驻萧城,萧县全境解放。

11 月 24 日 为支前需要,县政府发出训令,修复瓦子口至王寨、张大屯、黄口和瓦子口至胡庄桥(萧永公路上)两条公路。沿路区乡发动组织群众,仅用五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两条干线的修复任务,并将各区内的所有公路、桥梁等运输必经之路修建完竣。

11 月 我华东野战军歼灭敌军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圩,豫南来援之敌军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于双堆集,迫使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于 11 月 30 日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经萧县向西南逃跑。华东野战军在 200 里宽的大地上分四路展开追击。

12 月 1 日 奉军分区指示,孟庆祥带县大队一个排武装侦察敌情,在城北李庄与徐州西逃之敌相遇,随向逃敌开火,借以向我后方报警。后将小屯村里的顽砭山保安团 400 人包围缴械,计机枪 4 挺,驳壳枪 10 支,步枪 200

余支。

12月4日 杜聿明部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于萧县西南、永城东北的李石林、青龙集、陈官庄一带，歼灭了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孙只身逃窜。前线我军转入战场休整。

12月15日 全歼黄维突围残部，华东野战军又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标志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第三阶段开始。为方便指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从宿县孟圩子移驻萧县朔里区蔡洼村，至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结束，共住28天。

12月17日 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华野指挥部蔡洼村杨家台子召开总前委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方略、渡江作战的计划和方案以及部队整编问题。会议休息时，五位首长在粟裕住地杨家台子李春华家后院的五间堂屋前石榴树旁，由随军记者陆仁生照了相，留下了总前委五位首长具有历史意义的唯一的合影照。会址1949年列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9年

1月6日 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开始发起总攻，10日全歼该敌26万多人，击毙敌第二兵团司

令邱清泉,李弥化装逃跑。至此,淮海战役结束。

1月10日 杜聿明一行10余人化装逃跑,被萧县四区张老庄村农民段庆香发现,遂向驻该村的华野四纵十一师卫生处休养连报告,卫生处通讯员范正国、崔喜云立即追捕,活捉杜聿明等人。

1月 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军民从掩埋敌人的尸体着手,做好战区的善后工作。萧县处于战场中心,共有154个村庄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毁掉房屋24600多间,死亡群众1681人,伤690多人,失踪272人,损失牲畜3900余头。县、区、乡分别成立了支前救灾委员会,单劲之任萧县支前救灾委员会主任,一面支援大军渡江,一面开展战后恢复工作。全县发放灾民安家粮1000多万斤,耕牛贷款粮300多万斤,建立了5个农具加工厂,用战场上的废铁赶制农具9526件,免费发给灾民。上级紧急从外地调来中外医生700多人,国际红十字会中牟联谊会也派来了医疗队,组织了35个医疗队,4个小型临时医院,先后为灾民注射防疫针6万多人次,有3万多人得到了较好的治疗。

1月25日 县委在任楼召开支前总结会议。在70多天的支前工作中总共筹粮1095万斤,柴草3100多万斤,组织担架5700多付,牛车8000多辆,小车540多辆,民工9万多人。

2月 萧县县大队编升到十八军。

县委、县政府机关从城西任楼迁入萧城。

3月 县委发出指示，在积极抓好战后救灾工作的同时，要加强教育工作及严防反动道会门活动。

萧宿县撤销，原属萧县的龙山区、朔里区、天门区仍归属萧县。同时，又将铜山五、七区的一部分划为萧县路西区，并对部分区作了调整，时为十个区。至6月，萧铜县撤销，棠张、褚兰两个区又划属萧县，路西区改为北望区。此时，萧县共12个区，208个乡。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副书记戴世雅，副县长单劲之。

为修复陇海铁路萧县支援枕木2万多根。

县委成立萧县总工会，主任陈玉山，副主任汪友云。

3月底 豫皖苏三分区、三专署、三地委撤销，萧县由河南省商丘专署代管。4月成立宿县地委、宿县专署，萧县属宿县地委、专署领导。

4月初 为了支援战区群众春耕生产，全县发动二、三、五、六、七、八区计750具牲口，带全套农具、口粮、草料，并自带粮种25500余斤和各种菜种、瓜种支援战区，单劲之住魏桥指挥。

4月 宿县地委为集中力量扑灭萧、宿、永边区之特务、股匪及反动道会门组织，成立了萧、宿、永边区剿匪工作委员会，委员由11人组成，萧县公安局副局长胡石生为委员。

县委成立萧县青年工作委员会，李建华任书记。

4月底 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各区分别作了工作汇报。副县长单劲之就淮海战役战场情况及战区救灾方针、任务作了报告。

5月1日 全县各区举行了庆祝大游行。

5月 县委为保护好解放后第一个麦收，根据地委指示精神，作了组织看麦队的补充指示。

发还因为支前超额支用农民的粮食151万斤。

5月底 县委召开午征工作会议，县委委员、区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搞好午收、午征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从而保证了解放后第一个麦收的顺利进行。

6月初 为切实搞好午征，县委再次召开午征扩大会议，朱玉林、单劲之分别作了重要报告。会议决定开始实行农业累进税。

6月19日 县委决定扩充地方武装千人，输送主力部队200人。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并成立了萧县独立团。

7月 县委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县委副书记戴世雅作了总结报告。这次会议对壮大党的队伍，搞好干部的培养与选拔以及做好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7月中旬 县委发出关于排除夏季水患、加紧修岸补堤、快种晚秋、排解群众纠纷、反对悲观思想的指示。

7月底 县委召开县委委员会议，各委员分别报告了下乡了解的情况。

9月初 县委发出关于审查内部的紧急指示。

9月 为支援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萧县运送粮食1200万斤,于9月15日完成。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萧县人民饱享这胜利的喜悦,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10月1日 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全县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奔走相告。

后 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暨中共萧县地方党组织建立 78 周年之际,我们谨将《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一卷)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是萧县党史工作者 20 多年来在史料征集、整理、编纂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省、市委党史部门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在萧县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亲自过问和指导该书的编写工作,中共萧县县委书记孟宪会、县长王宗元非常关心该书的编写工作,并给予经费上的保障。县委副书记朱学亮多次听取党史研究室负责人的专题汇报,了解和指导该书的编撰工作。

本书是经有关业务人员集体研究讨论,分工执笔完成初稿的。第一、二、三章由王宇良执笔;第四、五、六、七、八、九章由吴孝桐执笔;第十、十一、十二章由张祚林执

笔；第十三章及结语由王宇良执笔。大事记部分，1983年完成初稿，至2001年又两易其稿。这期间，于凡洲、王于柱、侯丙生、张祚林、胡永善、徐孝敬、彭宜亭、程祖光、张笑仙、孙贤明、欧道松等同志，先后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在大事记不断充实与提高的过程中，侯丙生、孙贤明做了较多的工作。插图部分，由县文联主席李鹏与王宇良整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宇良对全部书稿作了统一的修改和把关。

本书的编写，吸取了周边市、县中共地方史的编撰经验。书稿完成后，分别呈送中共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萧县县委领导审读。县委书记孟宪会审阅了书稿后，欣然为之作序。

编著这样一部政治性、学术性都很强的党史著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尝试。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做到忠于史实，客观公正，秉笔直书，写出信史。但由于年代久远，部分资料欠缺，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所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2006年7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1卷/中共萧县县委党史
研究室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199-568-6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党史—萧县 IV. D235.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117635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一卷)

作 者: 中共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黄 艳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568-6

定 价: 42.00元

第一章

五四运动开启了萧县 历史的新篇章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给萧县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萧县人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奏响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乐章。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萧县的经济和社会概况

萧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历史上长期隶属江苏省,1955年4月1日划归安徽省宿县专员公署。它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占重要位置的县份之一,有着3000多年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鸦片战争前,萧县人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自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

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后，萧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身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与剥削。社会动乱，经济凋敝，萧县人民被推向苦难和贫困的深渊。

资本—帝国主义对萧县的侵略，首先是通过传教和倾销商品的形式进行的。自1888年始，先后有法国、意大利、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来萧县传教。他们疯狂地发展教徒，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就在萧城、黄口、马井、九店、王寨、丁里、朔里、郑庄、孟庄、程楼、吴庄等地发展教徒一万多人，并建立了教会组织。洋人以教堂为依托，通过传教、办学校、开医院、印发宣传品等手段，到处散布迷信，鼓吹“洋人好”，对萧县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他们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幌子，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残害无辜，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如马井天主教堂，因有县府所派卫队保护，肆无忌惮地公开窝藏土匪，明抢暗夺，坐地分赃。恶贯满盈的土匪马良科、马达子就是马井天主教堂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抢掠萧西大半个县，被群众捉拿送县府后，神甫勾结县府知事，当即将土匪释放，反诬百姓“有意侮辱教徒”。洋人和官府、强盗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在萧县推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仗恃着他们攫取的种种特权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争相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萧县，洋

人除利用教会霸占民田出租放债外，还通过办洋行、商业，倾销外货，排斥民族工商业。1911年后，英、法、荷、比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修通以后，外货大量流入萧县，萧城、黄口、郝集、曹村等较大集镇遂成为外货倾销的主要市场。据调查，仅萧城、黄口两地，五四前后就有大小商店170余家，规模比较大的工商业者有孙大智、崔大麻子等。这些商店大都先后成为各国洋行的经销店或代销店，外货量一般达到70%~80%，个别商店经销的商品甚至全是外货。这种状况，导致地方手工业纷纷倒闭，农民的土纺土织也因受到洋货的排挤而难以继。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政治更加黑暗，社会更加腐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军阀的掠夺，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在农村，一些新兴地主的出现，使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萧县的刘云亭、邵世恩、刘子瑜、刘瑞岐、纵衍芬、刘献符、王孔法、朱禹九、王馨山等大地主，均有千亩或数千亩田产。尤其是萧城的大官僚地主段氏家族，在北京、天津、南京、济南、青岛、徐州等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花园、别墅、公馆。在徐州一地，西起土城门，东到火车站，北起坝子街，南至鸡嘴坝，方圆几十里皆为段家所有。段家在徐州的花园，是当时徐属八县独一无二的风雅建筑，楼台亭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在南京，连清末提督李鸿章的千余间豪宅，

后来也为段家所有。在萧县，段家不仅霸占了萧城周围的山山水水，在乡村还有 18 个庄园和 2000 多亩耕地。土地被大量兼并的直接后果，是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

另一方面，军阀混战给萧县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十分惨重的。各派军阀逐鹿中原，徐州为必争之地。与徐州唇齿相依的萧县，连年是炮火连天，兵荒马乱。军阀横征暴敛，烧杀虏掠，无恶不作。战祸所至，军阀拉丁抓夫，青年男子纷纷逃亡，造成田地荒芜，民怨沸腾。饱尝战乱之苦的萧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萧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萧县人民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近代史上，萧县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悲壮的、辉煌的。1853 年，当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路经萧县时，数以千计的青壮年参加了太平军。他们举义旗，除恶霸，吃“大户”，济平民，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1855 年，淮河两岸爆发了捻军起义。萧县人民积极响应，在左渊、吕秀盘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声势浩大的萧县捻军先后攻占了除县城以外几乎所有圩寨，铲除了地方恶霸势力，还多次在大吴集等地将清军打败。清政府派封建走卒段广瀛率兵疯狂镇压，萧县捻军一次被杀害 60 多人，左渊、吕秀盘也一并遇难。然而，屠杀并没有吓倒萧县人民，投捻的人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吓得统治者龟缩县城，惶惶不可终日。

19世纪末,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波及萧县后,声势浩大的“红拳会”、“大刀会”很快遍及全县各地,形成“村村排刀枪,乡乡练红拳”的广泛群众组织。当时,黄口、九店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吴松园(庄名)有个四老冤(绰号,本名吴德运),他的红拳半拉天,山南海北来拜师,专打洋人和贪官。”可见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吸引了许多萧县的热血青年为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解放而献身革命。以刘汉川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追随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为实现民主共和而斗争。刘汉川加入同盟会后,由孙中山举荐担任萧县民政长(即县长)。刘汉川按照三民主义政纲,废旧规,立新法,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想以此改变萧县的社会面貌。然而,随着袁世凯的篡权,辛亥革命的失败,刘汉川的幻想也随之破灭。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萧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第二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早在五四运动前,萧县的知识界就已受到新文化运

动的影响和新思想的启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伦理道德、封建礼教及封建迷信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同时，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萧县知识界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批孔、批封建专制文化的热潮。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张邃如创办的《新风》周刊，响亮地提出了打倒所谓“万世师表”的孔丘的口号。提倡男女社交，号召学生勇敢地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挑战。该校教师王子云，1918年在萧城举办绘画展览，用他的画笔抨击封建陋习，倡导社会新风。该校校长王寿桥（又名王文榜），经常向学生宣传同情革命的进步思想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向同学们介绍《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王寿桥和继任校长冯南风还注重从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省市聘请优秀教师来萧任教。这些教师带来了大量的新思想、新观念，使新思想、新文化在校园里自由的传播。这不仅使学生解放了思想，增长了知识，也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学生毕瑞生、郭清杰到徐州宣传五四精神，指导学生运动。他们联络徐属八县的学生，由各县选派代表在徐州集会，成立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萧县推选徐文雅（又名徐彬如）为代表参加学生

联合会的工作。1919年8月，徐州学生联合会派高民、徐文雅来萧县宣传五四运动。他们首先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发动，随后联络女子高等小学、县立国民小学及全县各乡村小学，成立了萧县学生联合会，推选一高学生徐志昌为会长，王宜周为副会长。学联在萧城孔庙组织召开了近500人的群众大会，徐文雅在大会上的演讲慷慨激昂，言词犀利。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丑行和北洋政府的妥协卖国政策，号召全县学生联合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会后，由学联成员领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学生们臂戴写有“救国”二字的白布袖标，贴标语，散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巴黎和会”、“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等口号。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威震萧城，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萧县学联组织了一些宣传小分队到乡村搞宣传。他们所到之处，不仅组织演讲，张贴标语，还散发了大量宣传资料。宣传小分队成员大都是比较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满腔爱国激情不仅打动了乡村学校的师生，也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了共鸣。学联还组织学生查禁日货。他们派人在县城东门检查商人从徐州购进的所有货物，不准日货进萧城。在城内，对大小商店逐个检查。华昌百货商店的老板侯太

昌拒绝检查，学生们就拉他游街示众。他们把查出来的洋布、洋油、洋火、洋烟等日货，集中到龙山脚下，并在人山人海的萧城十月古会上纵火焚烧。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县，王寨、永堽、郝集、黄口等大集镇及乡村学校热烈响应，纷纷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与学生运动的高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传播。《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越来越多地传入萧县，县内也出现了进步刊物《新声小报》。这些书刊提倡新思想、新文化，追求科学与民主，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给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吸引了众多进步青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一股时代潮流。1920年3月，徐州七师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指导下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不久，又建立了进步组织“赤潮社”，并创办了石印刊物《赤潮》旬刊，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及反帝、反封建思想。萧县在徐州十中和七师上学的青年，积极参与了“赤潮社”的宣传工作，这就使他们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如在徐州十中上学的徐文雅和石民宗，两人都是赤潮社的重要成员，徐州学运的领袖。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和探讨各种新思潮及革命理论，并把学习心得发表在《赤潮》上。七师学生还经常来萧县指导学生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些在北

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上学的萧籍青年，因较早地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思想比较进步。寒暑假期间，他们从四面八方带来了许多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就连《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由他们传入萧县的。他们以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李宪仲为首，聚会县城，宣传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探求革命真理，在萧县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正是这些在大中城市读书且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在萧县得以迅速传播。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激发了萧县大批进步青年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热情。他们有的到了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考入了黄埔军官学校，如徐文雅、纵翰民、卢亚光等；有的到了武汉，如刘亚民、谢光亚等；有的加入了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如胡玄圃、任训常等；还有的克服重重困难去法国勤工俭学，如孟棱崖等。尽管他们当时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政治倾向还不一致，但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都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这批进步青年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萧县在外地加入中共的最早一批党员。李宪仲、徐文雅等人后来还成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

在萧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先知先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广泛传播,并逐步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才使萧县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三节 早期的党建活动

大革命时期,萧县虽未建立党的组织,但中共徐州独立支部已开始在这里发展党员,并有一批外地入党回萧的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开展早期的党建工作。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党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壮大力量,推进革命,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大会强调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着重指出:共产党要努力保持自己的阶级成份,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独立地发展工人、农民组织,发动他们起来革命。四大的这些决议,对于扩大统一战线,取得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独立地发展工农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1926年春,在外地入党回萧的刘亚民,遵照中共四大的上述精神,与丁毅忱、王贞廉、石民宗、刘淑昭(女)、纵白踪等人在家乡永垆寨成立了“萧县行知学社”。他们

印发宣言，动员民众组织起来，对内铲除封建势力，对外打倒帝国主义。是年秋，刘亚民又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徐州独支农运委员郭潜飞考察了该平民学校后，在同年11月25日写给上级党委的关于《徐州农民运动报告》中说：“该县东南乡永堙寨有刘亚民同志（我党的）办一平民学校，约三十多人……将来萧县农民运动，此处可为策源地。”在萧县，这是由共产党员创办的以动员农民为自身解放而斗争为宗旨的最早的启蒙教育。

1926年冬，中共徐州独立支部派宣传委员李广琛来到萧县。表面上，李广琛是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刘汉川的委托，来视察国民党党务的，实际上是来宣传共产主义和发展共产党员的。他首先找到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丁毅忱、纵白踪，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比较，并作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丁毅忱、纵白踪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完整而彻底的革命纲领，中国的翻身富强只有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制定的三大政策方有希望。李广琛则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谋求中国人民的解放，必须遵循列宁路线，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动员广大民众起来斗争。国民党是担负不起这一历史重任的，要真革命必须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番争论、交流与沟通，丁毅忱、纵白踪接受了这一理论。两人由李广

琛、陈亚峰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并不退出国民党，而是采取“跨党”的形式，秘密地从事党的活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接受中共徐州独立支部的领导。这种现象，成为萧县早期党建工作的一个特点。

与丁毅忱、纵白踪入党的同时，萧县的许致远、邓果白、刘淑昭(女)、刘颖昭(女)、王贞树五人，经刘汉川介绍去上海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班。学习期间，许致远、邓果白两人由沈毅、邢中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于年底回到家乡薛庄村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薛庄是县城东南较大的一个村庄，90%以上的农民无地或少地，年年打长工，做短工，忍受地主的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许致远、邓果白从上海回来以后，邀约附近几个村庄的贫雇农和长短工50多人到夜校上学。夜校以教《千字课》为名，暗中向农民宣传党的主张，讲解革命道理，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随着农民阶级觉悟的逐步提高，便组织长工会、短工会和地主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后，他们便在长工会和短工会的基础上，于1927年上半年成立了薛庄农民协会，选许致远为协会主任。从此，这一带的农民运动以薛庄为中心逐步向周围村庄扩展。年底，农协会会员就发展到数百人。

实践证明：永堦、薛庄以办平民学校和夜校的形式，独立地开展农民运动，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它为萧县在农

民中发展党员和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

总之，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萧县的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早期的党建活动，这些都为中共党组织在萧县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准备了条件。

第二章

党组织的建立、发展与 革命形势的高涨

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斗争，独自领导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1928年初，萧县开始有了党的组织，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萧县国民党右派大举“清党”，我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经济和政治斗争。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带来了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

第一节 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投奔各处寻求革命真理的萧籍青年纷纷返萧。萧籍共产党员刘亚民、孟庆鉴、陈令远、谢光

亚、崔健吾、朱大同等人，受组织派遣先后从外地回到萧县开展党的工作。

1928年1月，国民党萧县执监委员会恢复，刘亚民任常委，丁文魁、纵精舜任委员，朱思伦（又名朱宜之，后叛变）为秘书。他们都是中共跨党党员，巧妙地利用国民党机关作掩护，妥善安排了一批从外地陆续回萧的共产党员。在摸清萧县已有中共党员的同时，他们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建立了黄口、王寨、萧城三个支分部，已有党员25人（黄口7人，王寨8人，萧城10人）。国民党的县党部成为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这是萧县中共党组织建立初期的一大特点。

1928年2月中旬，胡玄圃、任训常、纵封亭等四位同志，受中共皖北特委（在太和杨虎城部）派遣，回萧县参加党建工作。他们很快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如戴瑞朴、陈履真、孙叔平等。这时，从外地来萧参加党建工作的还有王树璜、秦雅芬、刘石云、訾登臣等同志。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吴雨铭在巡视徐州时，听了关于萧县党建工作发展情况的汇报后，经他提议，3月份在王寨成立了中共萧县特别支部，隶属徐州县委。特支书记胡玄圃（亦说刘亚民），干事刘亚民、胡文清。

1928年4月，萧县特支利用国民党开始建政之机，按照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陈亚峰“要夺取政权”的指示，通过刘亚民等人向国民党县党部举荐一些共产党员到县

政府各部门任职。因国民党萧县县长李承霖同情并支持革命，党组织顺利地达到了目的。结果，便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局面：萧县公安局长谢光亚、督察长孟庆鉴、县常备大队长王景武、大队副陈令远、县款产处主任兼县师范学校校长刘亚民，均是共产党员。全县 16 个区的行政局长（即区长）有 7 个是共产党员，即胡玄圃（一区）、戴蕴山（戴瑞朴）（三区）、姜德伦（四区）、赵再真（六区）、任训常（八区）、陈履真（九区）、李道明（十区）。此外，一些区队长、乡长、小学校长等也是共产党员。可以说，全县党、政、军、财、学的权力，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这种情况，有效地掩护了党在基层的活动，广泛地宣传了党的主张，发展了群众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革命气氛空前活跃，一时有“赤色萧县”之说。

1928 年 5 月 5 日，萧县特别支部改组，王树璜（亦说王世德）任书记，胡玄圃、胡文清为干事。特支辖萧城、王寨、永堙三个支分部和黄口、张庄寨两个党小组。不久，因王树璜到县城贫儿教养院任院长，党的领导机构亦由王寨迁入萧城。

因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与省委失掉联系，不能上情下传，下情上达。因此，省委又派罗世藩到徐海地区巡视。1928 年 6 月 25 日，罗世藩来到萧县。他了解了萧县的情况后，决定成立萧县县委。6 月 28 日，由萧县特支干事会召集各支分部、党小组代表，罗世藩主持召开了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萧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届县委由七人组成,颛孙钧(孙叔平)为书记。颛孙钧、胡玄圃、胡文清为常委,颛孙钧、胡玄圃、胡文清、胡道敏、张得名为委员,王沛然、王树璜为候补委员。

第一届县委通过了党的发展、宣传工作、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七项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加紧反帝反封建的工作,要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健全支部,扩大党的影响。在宣传工作方面,根据党的策略,要多接近群众,多贴标语,多发传单,加强反帝反封建、反捐反税的宣传教育,以及党的政纲的宣传教育。在农民运动方面,强调利用多种形式,把农民发动并组织起来,建立和扩大农协与农委组织,积极同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在军事工作方面,应在敌军中建立党的组织,扩大政治影响,策动士兵哗变,改造土匪武装为农民武装,建立赤卫队,等等。

县委成立后,党组织迅速壮大,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仅两个月的时间,已相继建立5个支部,党员发展到60多人,秘密农协发展到200人。

192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徐海地区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徐海特委。省委代理书记李富春在会上指出:徐海地区前一阶段所谓“夺取政权”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是要夺取政权,但那是要在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立武装的基础上,用革命的力量推翻旧政权,建立革命

的政权。你们现在的做法既没有下层的基础，也没有革命的实际力量，只掌握一些上层职位是存在不住的。因此，省委决定让所有在国民党机关各部门担任上层职务的共产党员撤退下来，到农村和学校去，转入地下，隐蔽地开展的工作，尽可能地使党的力量减少损失。会后，省委派罗世藩同志到徐海地区巡视，对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严令在国民党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立即退出来，对坚持错误的同志要给予严厉的纪律处分。萧县的孟庆鉴、王景武因违令被开除了党籍，谢光亚、陈亚峰因执行命令不力被留党察看。

9月，召开了萧县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改组了第一届县委，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第二届县委仍由七人组成：贺云涛（亦说胡玄圃）任书记，贺云涛、颢孙钧、胡文清任常委，贺云涛、颢孙钧、胡文清、胡玄圃、王沛然为干事，石广宣、胡道敏为候补干事。第二届县委辖5个支部，有党员97人，并在永堍、王寨、黄口、张庄寨、薛庄、陶楼、路套等地建立了秘密农协。

10月，国民党萧县县长李承霖因同情革命被免职，刘丙晨继任萧县县长。由于政局变化，党组织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1月下旬，胡玄圃因指挥学潮的斗争而暴露，经特委同意，召开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第三届县委。选举许西林为书记，许西林、颢孙钧、胡文清为常委，许西林、颢孙钧、胡文清、张达生、萧雅忱五人为干

事，刘昭奎、石广宣两人为候补干事。县委机关设在永堙。因永堙小学的教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县委书记许西林及彭瑞、戴瑞朴、纵翰民、张舒民、陈一民等一批党的骨干先后到永堙小学任教，永堙小学即成为党的活动中心。

1929年初，萧县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在血洗南方各省市之后，开始把魔爪伸向了北方，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头子段木楨带着反动武装来萧县“清党”。段来萧后，在新任县长刘丙晨的配合下，迅速成立了“萧县清党委员会”。他们一面在县城机关、学校逐一清查，一面加强对我党活动地区的控制。短短几天，他们就逮捕了县委委员胡文清及党的骨干刘庆益、李和祥、吴孝庭等，知名的共产党员刘亚民与路继先被通缉。国民党的“清党”，使我党的组织遭到局部的摧残。

1929年5月，为使萧县全体党员同志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振奋精神，县委在许岗子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六大会议精神，分析了萧县党组织遭受破坏后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镇向农村转移的决定。会议指出：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依靠贫雇农建立和扩大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待革命高潮到来时，迅速组织武装，夺取政权。

三届县委以永堙小学为活动中心，以农民为工作重点，认真贯彻六大精神，正确执行江苏省委“从斗争中间建立党的基础”的工作路线，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使萧县的革命形势又逐渐高涨起来。

从1928年6月一届县委的成立到1930年5月下旬五届县委的产生，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虽然有党内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国民党“清党”的破坏，但党的力量依然不断壮大，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此间，全国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徐州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而萧县的革命形势却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究其原因：蒋、汪的叛变革命，虽酿成了全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但其反动势力的魔爪当时只是控制着一些中心城市，他们既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革命基础较薄弱的农村，这是萧县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萧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强烈的革命愿望，群众基础好，加之一大批党的早期创建者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这才使萧县的革命形势能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不断高涨起来。

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30年初，全县共建立4个区委，3个特支，有党员200多人，秘密农协1700人左右。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萧县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第二节 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

萧县的农民运动始于1926年冬,1928年后开始向全县发展。1929年党的工作深入农村后,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

二十年代后期,农村中生活最苦的是雇农(即长工与短工)。他们一无所有,完全靠给地主当牛做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他们的革命性最强,是农民运动的骨干。另一部分群众是贫农与佃农,他们虽有少量土地,但主要靠出卖劳力和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以致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部分群众数量较大,是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党组织在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农民协会,将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组织他们对地主阶级进行多种形式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1927年开始,在路继先、朱玉柯(又名朱玉林)领导下,杨楼地区相继在郝集、杨庄、朱小楼、单庄、路套、袁庄、鲁楼、刘套等地组织了农民协会。路继先以教书作掩护,通过办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农协会会员。农协会会员又分为一般会员与赤色会员,赤色会员即建党对象,党组织重点培养。

1928年春,戴瑞朴(戴蕴山)在王寨、戴楼、程庄、宁园一带领导农民运动。他首先发动贫雇农成立了“大鞭会”、“短工会”,进而成立农民协会,发展会员670多人。宁园村150户农民有140户参加了农民协会,程庄村50户农民有45户参加了农民协会,戴楼村的50户农民全部参加了农民协会。

自1928年底三届县委机关迁至永堙后,不少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永堙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他们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翻身求解放。至1930年初,永堙地区的农民协会已发展到400多人。

黄口地区的农民运动始于1929年秋,到1930年夏进入高潮。虽起步晚些,但发展迅速,仅黄口附近建立起农会组织的就有程楼、李老庄、李阁、胡庄、大杨庄、郑庄、黑楼子等20多个村庄。农民群众的组织形式也多种多样,如长工会、短工会、穷人会、拾麦队等。

总的看来,萧县各地的农民运动虽然起步时间不一,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都很迅速,尤以杨楼、黄口、王寨、永堙四地最为突出。至1929年底,全县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掀开了萧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崭新的一页。广大贫苦农民满腔热忱地团结在党

的周围，以革命生力军的姿态，英勇无畏地同敌人展开多种形式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作的精辟阐述：“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经济斗争方面，农会利用减租减息，增加长工、短工工资，抢拾地主的庄稼等斗争方式，对地主进行经济上的打击。如王寨一带，农会提出：租种地主的土地，灾年欠收少交租，不收不交租；长工每月工钱由 18 吊增加到 30 吊（1 元银币可兑换 5 吊铜钱），短工工钱由每天 15 斤小麦增加到 30 斤小麦；榜二八改为三七分或四六分；雇长工要一年为限，农闲时不得解雇。每年要给长工做一套棉衣，一床被子；年关不还地主的帐，地主必须借粮给缺粮的农民，等等。这些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地主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农民就不给地主干活，迫使地主不得不按照农会的意见办。

1928 年至 1930 年，党在全县范围内多次发动了大规模的麦收斗争、秋收斗争和年关斗争。在斗争中，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短工工作，扩大了“短工会”，号召短工上市，提出了“短工工资每天一元”（增加了一倍），“短工不做夜

工”，“不准半路开除短工”等口号，与地主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短工工资增加了一至两倍，劳动时间大为减少。1930年麦收时，王寨附近的戴楼、张绪庄、朱庄、孙大楼、李楼等村庄的农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大批妇女儿童，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宁园、东西郝楼集中，抢拾几家地主的小麦。地主武装勾结王寨区队联合镇压，因慑于群众的威力，未敢开枪，最终被群众打得抱头鼠窜。在党员的带领下，王寨的30多名农会会员，抢割了地主王孔词的小麦30多亩。宁园村的农会还迫使大地主张庆祥拿出6万多斤粮食给农民吃。

在政治斗争方面，农民协会通过开展说理斗争，游行示威等方式，清算地主的罪恶，争取民主自由，在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树立农会的权威。如郝集农民反对劣绅刘瑞岐的斗争，黄口农民反对土豪恶霸邵世恩的斗争，朱小楼子农民反对大地主刘子瑜霸占公有集市的斗争，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所有斗争中，最突出的是永堽寨农民的“罢更”斗争。永堽寨是恶霸地主刘献符的封建山寨，圩寨的面积比萧城还要略大一些。当时，土匪蜂起，地主为保护家产，依靠封建权势，强迫穷人无偿地为他们打更守夜，看家护院。农民出入圩寨还要搜查盘问。对此，农民群众非常愤恨。1928年冬，打更的长工刘志木和赵风鸣因冻得受不了，搞点柴禾烤烤火。结果，刘志木被地主毒打了一顿，赵风鸣被地主偷放在柴禾

里的子弹炸伤了脚。永堙的群众对地主的恶毒行径义愤填膺，沸腾起来。党组织认为，这是发动群众的好机会，立即组织召开了300多人的穷人大会，掀起了“罢更”斗争。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永堙区长刘秉周，向他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穷人不给地主打更看家，二是穷人买平糶粮不得不给，三是穷人出入圩寨不得搜查盘问。刘秉周不答应，群众就当场辩论，刘被问得哑口无言。为夺取“罢更”斗争的全胜，永堙党支部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由杜玉堂、张得名等党员带领三四百名农会会员和普通农民，高呼“打倒劣绅恶霸”等口号，拥进区公所，迫使刘秉周全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三项要求。

斗争的胜利，灭了地主的威风，长了农民的志气。农民群众看到了农会的威力，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入了穷人会，力量大十倍，穷人一条心，定能扭乾坤。”它生动地反映了农民斗争情绪的高涨。

萧县农民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封建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猛烈地冲击着旧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充分显示了农民中间蕴藏着的伟大革命力量，展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广阔前景。

第三节 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萧县的学生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19年

五四运动到1927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逐步深入,青年学生开始觉醒,出现了一批思想较进步的先进分子。他们为追求真理,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此时的学生运动,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就其本质而言,仍属于自发性的,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1928年党组织建立后,在发展党员、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党组织也注意到对学生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这才使萧县的学生运动正式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刘亚民被党组织派往萧县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还有孙叔平、李季华与耿蕴斋。他们在校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萧师成为全县革命斗争的中心和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同年10月,在萧城贾巷陶家房子召开了萧县共青团支部成立会议,萧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诞生。会议选举萧师学生颢孙琨猷为支部书记,陈一民(女)为组织委员,刘庆益为宣传委员,有团员15人。随着团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不久又在贫儿教养院建立了一个支部,有团员20多人。与此同时,萧县团组织与徐海蚌特委取得联系,特委派张雨亭(即陈政齐)来萧建立团县委,萧雅忱担任团县委书记,徐秉玉(女)、颢孙琨猷为干事。团组织发展很快,萧师150名学生,入团的竟有90多人。团组织开始由

城镇向农村发展，郝集、王寨、曲里铺、张庄寨、黄口等地，都发展了不少团员。

共青团组织成为党联系青年的纽带。当时，党团组织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的，团员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没有团组织的地方，党组织也直接抓团的工作，团员不是党员的也做党的工作。这种党团合一的工作方式，直接促进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既注意思想理论教育，又注重实际斗争的锻炼。

为了活跃青年学生的思想，启发教育他们积极投身革命，萧师党团支部在学生中成立了各种学术研究会。以此作为团结教育学生的公开组织形式，吸收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座谈国家时事，探讨革命理论，交流思想认识，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为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做好思想与组织准备。

为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支持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萧县党团组织利用济南五三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真面目完全暴露的有利时机，迅速在学生中掀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高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口号，宣布学生停课，走上街头进行声讨和查禁日货。学生没收了萧城关信和等商店的洋烟、洋火、日光肥皂等 20 多箱，当众焚烧，使日货一时在市面上绝迹。学生们还到萧城周围的

大庄、丁里等地进行宣传活动，使农民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正当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萧县教育局却以“安心读书”为借口，限制学生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并以繁重的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为手段，束缚学生的思想，压制学生的行动。于是，党团组织发动学生“罢考”，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创办了《晓声》半月刊。以此作为宣传政治形势，指导学生运动的舆论阵地。该刊虽然仅出两期就被查封，但仍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党团组织为了把学生运动推向全县，又在萧师发起了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的斗争。首先，由萧师学生向全县小学发出宣言，并派团员分赴黄口、郝集、王寨、永堙等地联络，同时要求县教育局予以承认。教育局长魏绍舜极力反对，并拉拢、收买、威吓学生，给学生施加压力。他们以实小学生的名义，炮制了一个《反对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的宣言》，并对学生原已发出的若不同意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即罢课的宣言置若罔闻，因而激起学生愤怒。萧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请愿，游行示威。他们首先驱逐了师范训育主任黄怀宇，冲出政府当局武装封锁的学校大门，包围了教育局。教育局长越墙而逃。次日，学生举行罢课，黄口、永堙、王寨、郝集等校纷纷响应，全县参加罢课的学生达千人以上。县教育局无奈，只好准许成立全县

学生联合会。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取得初步胜利，扩大了政治影响。

政府当局对学生斗争的胜利并不甘心，在全县学联即将成立时，教育局命令全县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假，致使学联未能按时成立。寒假期间，教育局免去了刘亚民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并开除了李和祥、刘庆益、陈一民等七位党团员学生。对此，党团组织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决定继续坚持斗争，一方面组织学生开学后及时到校，一方面向社会呼吁，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1929年春开学后，学校贴出了开除七名学生和丁文魁接任校长的布告。学生看了极为愤慨，当即撕去布告，宣布罢课。全县各学校都发表了声援萧师学生的声明，要求教育局收回成命。萧师等校学生再次举行请愿，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岗哨阻拦，包围了教育局，高喊“打倒魏绍舜”的口号。之后，游行队伍又赴县府请愿，迫使县长刘丙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让教育局收回成命，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斗争取得圆满胜利，各校学生派出代表，在实小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萧县学生联合会”。这场斗争前后持续达半年之久，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萧县学生运动史上前所未有。

通过一系列斗争，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并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壮大了党团队伍，使学生运动健康发展。

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下了毒手，萧县党团组织遭到破坏。萧师学生被开除 33 人，刘庆益、吴孝庭、李和祥等同学被捕，团县委被迫由萧城转移到永堙西南的张庄村继续活动。1930 年后，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导致党团组织大部分暴露。至此，萧县的学生运动也和党团组织的其它活动一样，转入低潮。

附(1)

萧县县委报告

——关于县委产生经过

(民国十七年七月八日)

省委：

萧县县委已于六月二十八日由全县代表大会产生了。今将产生经过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工作计划逐项作一报告。

1. 产生经过

此次省委代表来萧，决定萧县成立县委。由萧支干事会召集各分支各小组代表开会选举，不过通知发下甚晚，致除城内两小组，永堙一小组有正式代表到会外，其它各地代表均未到会，因而萧支干事会议强拉尚未返原校之

各地同学，充各地代表，勉强开会，等各地代表到会的时候，县委干事已经举出，许多议案已经通过了。二十八日续开会议时，即有代表发言不承认二十七日之选举及议案。最后得省委代表罗同志及多数代表之同意，推翻二十七日会议，重新开会。各列席代表七人，萧支干事三人，省委代表一人，选举结果，除三位农民同学胡文清，胡道敏，张从（得）名外，顾（颢）孙钧以七票当选，胡玄圃（圃）以六票当选，王振（树）黄以五票当选，王沛然以五票当选。顾（颢）孙钧、胡玄圃、胡文清、胡道敏、张得名五同学为正式干事，王沛然、王振（树）黄两同学为候补干事，顾（颢）孙钧、胡文清、胡玄圃三同学为常委，常委互推顾孙钧为书记，胡文清为组织干事，胡玄圃为宣传干事。县委成立经过，大约如此。

2. 萧县县委成立代表大会决议案：

A、党的组织的发展

七月份应有下列之发展

农民分子：王寨五人，永堙四人，黄口二人，城内五人，张庄（寨）二人，共十八人。

职工分子：王寨二人，永堙二人，黄口一人，城内五人，张庄（寨）二人，共十二人。

士兵分子：王寨五人，永堙二人，黄口五人，城内五人，张庄（寨）三人，共二十人。

其它（学生及知识分子）：王寨三人，黄口三人，城内

三人,张庄(寨)二人,永堙四人,共十五人。

B、宣传及训练

(1)内部训练问题:

a. 上下级党部关系要密切;b. 注意各别训练;c. 办校刊——县委通讯;d. 多派巡视员下乡巡查。

(2)外部宣传问题:

原则——根据党的策略;方法——多发传单,多接近群众,多贴标语。

C、农民运动

a. 原则——根据各地情形规定工作增加标准,对农民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但须解释清楚。

b. 指示——曹村、陶楼、杜集、赵周(庄)四地于最短期间成立农民组织。

D、职工运动

原则——对各要塞工人应竭力组织之,并领导他们作各种的斗争。

E、士兵运动

(1)调查工作——调查全县武装数目及其性质。

(2)工作原则——变化武装性质使其革命化,组织工农群众夺取武装。

(3)工作方法——普通(遍)宣传,个别谈话,派遣同学及工农分子入伍。

F、青年运动

(1)在可能范围内党应助团发展;(2)应助团组织青年群众;(3)有青年同学之处,应有团的组织。

G、其他决议:

(1)土匪中须插入同学,一方面在其中发展组织,一方面改变其性质使之革命化。

(2)对白色恐怖应用民众红色恐怖对付,不应用手枪炸弹式的恐怖对付。

(3)建议省委组织徐特委。

(4)前书记错误甚多,请省委处分。

3. 七月份工作计划

(A)对内

(1)县委的组织

县委	{	正式干事五人	{	书记……………秘书
		常委三人		宣传……………宣传委员会
				组织……………训练委员会
		候补干事二人		

(2)支部问题

王寨、县城、永堙、黄口、张庄(寨)于一礼拜内成立支部。

(3)训练问题

a. 常发训练大纲及理论的或实际工作的通告;b. 出不定期校刊——县委通讯;c. 各支部党员会或小组组长联席会议县委须派人参加;d. 县委每月须派巡视员到各

地巡视二次；e. 县委与支书每月须开联席会议一次；f. 设干部人才训练班。

(4)会议时间

a. 全县代表大会遇必要时，由县委召集；b. 县委每礼拜开会一次，遇必要时开临时会议或扩大会；c. 常委两礼拜开会一次；d. 训练委员会每礼拜开会一次；e. 活动分子会议临时召集。

(B)对外

(1)调查社会状况：a. 武器；b. 地方；c. 要求；d. 乡村生活状况。

(2)在本月内成立农民协会。

(3)工运：在一月内使黄口、永堙、王寨、县城有职工组织。

(4)士兵：在这四周内成立士兵委员会，尽量使在农者加入公安团。

(5)青年：在王寨成立团小组。

附(2)

萧县师范学生自治会支援
萧县师范学生反对教育局开除
李和祥等七位同学运动的宣言

全县各校同学们： 各界同胞们：

得闻萧县师范李和祥等七位同学被开除学籍的消息，使人不胜骇异！

成立学生自治会是在民主政治下人民应有的最低权利，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是全县学生正当的要求，对于这一行动，政府应予以大力支持。而李和祥等七位同学，是萧县师范学生民主选举，代表全体学生意见，执行学生自治会决议的，对于他们，政府应当予以保护，使他们能更好地尽到他们的职责，这是人民对政府所殷切希望的。而今乃有大谬不然者。政府对全县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既以为系“非法组织”而阻挠破坏于前，对于同学又加以“越轨行动”之名而开除学籍于后。在目前民主政治下，竟出现此等事件，实属骇人听闻！假若任意加以罪名，即可予以迫害，则违背个人意志者，无不可加以“非法”罪名之事，亦无不可加“越轨”行动之人。如此措置，民主安在？自由

何存？人民的身份自由、生命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呢？

目前萧县师范同学反对开除李和祥等七位同学的行动是正义的。为了支持萧县师范同学的正义行动，为了争取人民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我们坚决支持萧县师范同学，采取与师范同学完全一致行动，要求恢复被开除同学的学籍，并保障他们身体的自由和安全，不达目的，誓不中止！

萧县各校学生声援萧县
师范学校学生反对教育局开除
李和祥等七位同学运动后援会
一九二九年三月

第三章

“左”倾错误路线对萧县的影响

1930年夏至1932年秋两年多的时间里，在李立三与王明两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萧县的党组织发动并领导了“黄口暴动”与“张庄寨、洪河集暴动”。由于武装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两次暴动皆以失败告终。两次失败的暴动，加上两次夭折的暴动，使党团组织大暴露，从而遭到了大破坏，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1933年春，路继先与朱玉珂在萧铜边境开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第一节 黄口暴动

六大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内新军阀的混战，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全国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黄口武装暴动的失败,即是这个“沉重代价”的一部分。

1930年6月中旬,中共徐海蚌特委书记陈资平、宣传部长陈履真相继来萧,先后在永堙、戴楼、帽山窝的周庄等地,多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他们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漫山遍野都是干草,只要有人点火,马上就会燎原。”特委指示,立即实行党组织“军事化”,将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县行动委员会。各区委及下属组织也成立行动委员会,停止党、团、农协的一切活动,为武装暴动作准备。张圣和任县行动委员会书记,委员有纵翰民、张舒民、戴瑞朴、胡文清、萧雅忱、李祥龄、许致远、谢光亚等。

6月底,萧县行动委员会在李老庄村李祥龄的家中召开了扩大会议。依照特委“秘密准备,突然袭击”的指示精神,会议讨论了举行暴动的时间、地点和方法。会议决定:

7月10日(农历六月十五日),分别在群众基础较好的黄口、王寨、永堙三地同时举行暴动。黄口由张圣和、李祥龄、谢光亚负责;王寨由戴瑞朴、胡文清负责;永堙由纵翰民、萧雅忱负责。

李祥龄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黄口,连夜进行部署。他一方面对敌人力量的分布情况进行细致的侦察和分析,一方面召开一系列会议,从党内到党外,反复动员,精心策划,认真组织。

黄口位于徐州西面距徐州100华里的铁路上,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车站。这里行栈林立,客商云集,是方圆一二百里内的工农业产品集散地,也是萧县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30年春,黄口地区已有党员20多人,附近的程楼、李老庄、李阁、胡庄等20多个村庄都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200多人。

此时,黄口驻有蒋介石第三军第二十七师的一个连。该连的三个排,分别驻在车站的北面、东面、西面三个地方,约140人。加上黄口区队和商务团的一个班的武装,总计约200人,近200支枪。我方仅有短枪3支,土造炸弹48枚。论武器,我方处于绝对劣势。我们的优势在于:一是有共产党员和农协会会员组成的骨干力量200多人。二是群众基础好。通过农协会会员的秘密串连,参加暴动的工农群众可望达到2000人。三是国民党区队长张永祥是共产党员,区队武装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此外,我们

还动员了一部分有胆识的流氓无产者参加暴动。关于商务团的武装,其任务是为商界上层人士保护财产,不介入政治斗争。他们既不会帮助我们,也不会成为我方的敌人。基于上述优势,只要我们运筹得当,动作迅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可以各个击破,速战速胜的。

李祥龄等暴动的组织者们详细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后,又研究部署了具体的战斗方案。总的思路是:让暴动队员伪装成赶集的群众,趁上午10时左右赶集人最拥挤的时候逼近敌人营房,以突然袭击的方法,首先干掉敌人的岗哨,然后闯进敌营房,白手夺枪,迫使敌人缴械投降。具体的战斗分工是:由李祥昌(党员,黄口小学教师)带领一部分突击队员进攻站东一个排的敌人;由李祥林(党员,农协会会员)带领一队人马进攻站西一个排的敌人;由包继宣带领一部分暴动队员进攻站北一个排的敌人;由李兆铭带领黄口小学的学生宣传队,在暴动开始后,上街写标语,散传单,开展政治攻势;由郑传舜(黄小教师)组织铁路工人在站东李阁村附近破坏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大家商定,以系红布条为标记,齐心协力,一齐下手。这样,一场威震徐海蚌的武装大暴动就布置就绪了。

7月10日上午,黄口镇比往常显得更加热闹,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肩摩踵接。9时许,文明街张德胜的理发店里,陆续赶来一伙青年人。他们是李祥龄、李祥昌、李兆铭、李祥

林、包继宣等。当他们向李祥龄汇报各路暴动突击队员已潜至指定地点时，李祥龄很高兴。他们简要地讨论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随后陆续走了出去。

10时，指挥所准时发出信号枪声。共产党员程瑞凯拔出短枪，首先把车站西面敌人营房的岗哨打倒，又朝营房接连扔过去几个炸弹。趁着弥漫的硝烟，20多名突击队员一齐冲了进去，高喊“缴枪不杀！”程孝思提着一桶煤油，向敌人吼道：“不缴枪，就烧死你们！”敌人吓得乱成一团，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盘踞在车站东面的一排敌人，听见西面枪响，又见一大群青年小伙子逼近营房，吓得屁滚尿流，夺路向东逃窜。我暴动队员奋起直追。这股敌人逃到黄口东北三华里的张寨村附近，就被当地群众截住。在群众的配合下，暴动队伍将敌人团团包围，迫使这一排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战斗刚一打响时，赶集的群众不明底细，吓得乱跑，商店纷纷关门，集“炸”了。黄口小学的宣传队及时冲上街头，有的写标语，有的散传单，有的向群众讲演。他们还沿街大声疾呼：“大家不要害怕，这是共产党员暴动，不是土匪抢夺东西架肉票的！”群众听说是共产党暴动，情绪马上安定下来，关了门的商店，又重新打开了门。

近午时分，盘踞在车站北面的敌连部和一排敌人还在据险顽抗。他们在墙壁上挖了许多枪眼，向我暴动队伍

瞄准射击。我暴动队的突击手程瑞凯、李祥太牺牲。因我暴动队员都是缺乏军事素养的青年农民，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仍未能取胜。鉴于这种情况，李祥龄当机立断，决定在坚持武力围攻敌连部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他派人把商会会长刘德印、唐秉五找来，动员他们为暴动立功，要他们到敌人营房后门去喊话，劝敌人投降。刘、唐二人是当地的“仁义光棍”，八面玲珑，善于应变，都表示愿意效劳。他们来到敌人营房后，向敌人高喊：“我们是商会的会长，是出面讲和的，千万不要对我们开枪。”随后，两人突然闯进敌连部，对敌人好言相劝：“这是共产党暴动，不是土匪，你们赶紧缴枪算了！愿意跟共产党干的，他们欢迎，愿意回家的听便！”趁刘、唐二人向敌人劝降之际，暴动队伍在敌人营房外点着了房子。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对处于困兽境地的敌人造成很大威胁。“缴枪不杀！投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暴动群众的怒吼声一阵高过一阵。在政治攻势和暴动群众的威逼下，这股敌人终于缴械投降了。

这时，区行政局大院里的区队武装，仍然处于持戈待命状态。李祥龄来到行政局门前，向里面一招手，张永祥就把区队带出来，交了枪。至下午3时，暴动获得全胜，缴获长短枪近200支。

暴动结束后，黄口镇上的居民和赶集的群众，纷纷出现在闹市街头，围着红色宣传队员，倾听他们宣讲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宗旨。在火车站北面的出口处，贴出一张醒目的大布告，宣布这支暴动队伍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独立营”。布告的署名是：师长张达生（张圣和），政治委员纵甸之（纵翰民），独立营营长李祥龄。布告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和政策，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下午4点钟左右，200多名武装起来的暴动队员在黄口镇南面的陈河集中。随后，暴动队员排着整齐的队伍，高擎鲜红的共产党党旗，吹着嘹亮的军号，雄赳赳，气昂昂，沿着萧黄公路向东南挺进，威胁着萧城的敌人。当夜，宿营曲里铺。次日，暴动队伍转向王寨以西进发，打算与王寨、永堙的暴动队伍会师。不料，王寨、永堙都因条件不成熟没有暴动起来，这支队伍就驻扎在王寨西面的宁园、郝楼休整。在宁园，暴动队伍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大地主郝鸣扬，并把张庆祥、郝鸣扬、郝鸣珠三家地主的粮食、牲口和农具，统统分给了贫苦群众。

7月13日，暴动队伍回师曲里铺，国民党萧县县长王公珣亲率县警备大队紧跟追击。暴动队伍中，以任爱斯为首的一部分流氓无产者乘机哗变，把装备最好的一个连的大部分人员偷偷拉走，造成一些同志情绪低落。大家感到势力单薄，在本县回旋困难，外走又无出路，决定分散隐蔽，自寻掩护，各人所带枪支亦由自己设法掩藏。这样，名震一时的黄口武装暴动队伍就烟消云散了。暴动

中，李祥龄的胞弟李祥太、程楼的程瑞凯、小李庄的李福全、单庄的单衍林英勇牺牲。他们是萧县人民为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第一批殉难者，是萧县人民永远怀念的革命先烈。

黄口暴动是萧县党组织发动并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它在萧县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对徐海蚌地区震动很大。它使盘踞在萧城的敌人惊恐万状，有的甚至逃亡徐州。尽管蒋、冯、阎大战正胶着于亳县、兰考、商丘、菏泽一线，军用物资的运输十分繁忙，而徐州至商丘的铁路交通却因这场暴动被中断了三天。特别是暴动队员在暴动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及党组织在暴动中显露出来的指挥才干，在萧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节 两次夭折的武装暴动

黄口暴动失败后，萧县行动委员会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县行动委员会派纵翰民与戴瑞朴同志去徐州向徐海蚌特委汇报暴动情况时，认为萧县武装暴动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样的暴动应立即停止。然而，他们的建议不光没有得到特委领导人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与指责，说黄口暴动的失败在于萧县行动委员会右倾，并要求他们回去继续组织暴动。特委仍旧认为：形

势如干柴烈火，只要红旗一举，群众就会响应。问题是敢不敢干，只要敢干，革命很快就会成功。并且一再指示萧县行动委员会要再接再厉，发动群众大干，一定要举起“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和“萧县苏维埃”的旗帜。随后，徐海蚌总行委委员陈履真来萧县传达总行委决定：在徐海蚌地区建立红军第十五军，由特委书记陈资平任军长。该军辖三个师，萧县暴动队伍编为第一师，张圣和任师长，纵翰民任政委。同时，建立萧县苏维埃政府，纵翰民（纵夷陀）任主席，委员有张圣和、戴晓东、萧雅忱、张舒民。并要求萧县行动委员会用真名实姓贴出布告，公开号召农民暴动。

萧县行委虽然对特委的批评想不通，对特委关于形势的分析有疑虑，对特委的指示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无条件的贯彻执行。1930年9月初，县行动委员会在吴二庄东南的周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红军师，并决定在萧城、里山、朔里、吴二庄、店子等地组织第二次暴动。会后，大家分赴各地，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暴动力量，并连夜印发了大量关于成立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师的布告。一夜之间，县城及各大集镇都贴满了布告。布告上的署名，全是萧县党组织主要领导人的真名实姓，这无异于把党的组织告诉敌人。结果，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暴动也没能举行，而国民党却掌握了我们的活动情况，到处戒备森严，搜捕共产党员。

9月7日，靳伯益、王汉民等同志召集城关学校的30多名党团员在圣泉寺开会，研究城关暴动问题。当夜，他们在靳伯益家被捕，传单也被搜去。敌人严刑拷打，甚至凶残地用子弹头撬他们的肋骨，威逼他们说暴动计划。王汉民义正辞严地驳斥敌人：“关于暴动，我们的布告上讲得明明白白，你们已经看到，何必再来问我？布告上没讲到的，你们就是把我的肋骨全撬断，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靳伯益同志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共产党组织暴动，那是你们逼出来的。共产党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你们只能伤害我的肉体，绝不能摧毁我的革命意志，更不能动摇我忠于共产党的信念。我坚信，你们的疯狂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他们的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次年4月12日，靳伯益与王汉民同志英勇就义于镇江。

暴动夭折后，敌人还在七区逮捕了纵衍朋、李兆铭两位同志，不久便被押解到镇江杀害。县行委委员胡文清在王寨被地主武装暗杀，行委负责人张圣和、纵翰民、萧雅忱、戴蕴山、李祥龄、许致远、张舒民等同志被悬赏通缉。敌人还故意将这些同志与王刘妮、三猫猴等五个惯匪写在同一张布告上，以此污蔑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的加剧使党组织的活动更加困难。为躲避逮捕，党员有的逃往外

地，有的隐蔽待机，群众的情绪也低落下来。

1930年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人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取消城市暴动计划。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及条件所限，中央的精神不能及时传达下来。直到11月份，徐海蚌总行委仍然批评萧县右倾，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萧县行委继续举行武装暴动。

1930年11月5日，纵翰民、张舒民、戴蕴山、萧雅忱四同志聚集在永堙西北的野地里开会，研究在王寨、黄口、里山、萧城、永堙等地举行暴动的问题。他们作了分工：纵翰民负责王寨，戴蕴山负责黄口，张舒民负责萧城、里山，萧雅忱负责永堙。

11月6日，萧雅忱同志在去永堙路经闸河时，被国民党永堙镇镇长王铁、地主石鸿建和劣绅刘献符事先埋伏在这里的打手刘科等人逮捕。国民党县长王公琦审讯萧雅忱时，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萧雅忱怒斥他们“是一伙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的败类！国民党人心丧尽，终究要失败，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人不怕死，怕死不干共产党，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11月23日，萧雅忱同志英勇就义于萧城北关。临刑前，他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萧雅忱同志大义凛然、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值得

萧县人民永远景仰。

由于各地的党组织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党的力量大大削弱,群众情绪低落,各地的暴动都没有发动起来,这次暴动又胎死腹中。直到11月底,特委才按照中央的精神,撤销萧县行动委员会,恢复萧县县委。

新县委由纵翰民任书记,委员有张舒民、许致远等。虽然白色恐怖严重,条件极为艰苦,经常挨饿,但同志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一腔热血,仍斗志昂扬,苦而无怨,勇敢地开展工作。到1931年,全县党组织基本得到恢复,共有支部11个,党员300多人。

第三节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王明等人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

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此时，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临时中央，既不能正确认识中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又无视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继续推行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的“左”倾冒险主义。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配合红军正面作战”一类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强令各地无条件地组织公开的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直至武装暴动，等等。

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路线，命令徐海蚌地区的党组织，立即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并将萧县西部、宿州、口子、永城划为中心暴动区域。对此，时任中共铜山中心县委书记的孙叔平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过是立三路线的翻版。省委书记王方程严厉批评了孙叔平的观点，宣布合并铜山、宿县两个中心县委，成立新的徐州特委，由孙叔平任书记，负责组织暴动。孙叔平表达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对省委的批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也不能检讨。第二，省委决定暴动，个人服从。第三，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不能当领导，请另选合适的同志当领导。孙叔平当场被降职，由书记降为秘书。其实，当时许多同志都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白暴动必然失败，但由于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的帽子，不敢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徐州特委积极执行省委的指示，命令所属各县立即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创立苏维埃红色区域。1932年秋在萧县西部举行的张庄寨、洪河集武装暴动，就是这一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

1932年6月底，中共萧县县委在任小庄召开会议，讨论武装暴动问题。县委委员李繁洲与县委书记朱大同、军事委员冷启英发生了争论。李繁洲认为暴动条件不成熟，不能把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要吸取黄口暴动的教训。朱大同则认为革命形势好得很，只要我们“秘密准备，突然进攻”，公开打出革命的红旗，群众就会一哄而起，热烈响应。他极力主张武装暴动，指责别人为右倾。尽管意见分歧，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举行武装暴动的决议。决定于8月13日（农历七月十二日）先在朔里暴动，然后再组织其它地区的暴动。参加暴动的人员一部分是冯瓦房一带的人，由冯家平带领，一部分是李酒店一带的人，由李忠道（李砥平）带领。按预定计划，两路暴动队伍于8月12日晚到朱大同住的村子朱庄集合，再往朔里进发。不料，当夜遇雨，道路泥泞，当暴动队伍赶到朱庄时，天已快亮。这样，按原计划天亮前赶到30华里外的朔里已不可能。朱大同提出改变计划，先在距朱庄较近的张庄寨、洪河集举行暴动。他和冯家平带领这支队伍攻打张庄寨区公所；李忠道去朔里了解情况，为以后组织武装暴动作准备；王德山、祖玉敏负责组织洪河集暴动。

按照新的部署,由朱大同带领暴动人员向张庄寨进发。他们挑选了37名精干队员,带了19支短枪,抬着软床子,床上睡着人,枪放在人下边,装扮成去区里打官司的。其余的暴动队员,有的挑着瓜挑子,有的背着其它东西,都装扮成赶集的群众。队伍到了张庄寨东门,天刚黎明,寨门还关着。朱大同叫门:“我们村里打死人了,来打官司,叫区长验尸!”寨门开了,朱大同带着抬软床子的人进了寨门,其他人随后也跟着进去了。他们把软床子抬到区公所门前,朱大同首先进了区公所。区队长刘须武正在洗脸,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朱大同一枪打倒。门外的暴动人员听到枪声,击毙了门岗,冲进区公所,缴了区队30余支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只有大街上一个地主的炮楼未攻下来,其余全部攻破。任贻任、王士杰、潘孝顺三同志牺牲,任予锡、侯永碧二人负伤。当国民党县长王公珩率县警大队赶到张庄寨镇压时,暴动队伍已经撤出战斗。

洪河集在张庄寨西北,是距张庄寨三四公里的一个集镇。镇长是共产党员王德山,掌握着镇公所十多人的武装。参加洪河集暴动的有祖小楼子、一条脊、海青房、洪河集等村子的党员和群众,共39人(其中党员4人),有长短枪30余支。听到张庄寨暴动的枪声,王德山、祖玉敏、李玉田等人带领镇公所的武装和来参加暴动的人员在洪河集东头集合。与此同时,他们特意对段林清、孙翠斋两

个地主说：“张庄寨出事了，我们应集中所有的枪支去救援！”段、孙二人信以为真，将他们两家的六支枪全部拿出来，交给了暴动队伍。刚出东门，段、孙二人就被捆绑起来，押回了镇公所。暴动队伍返回洪河集，作战斗准备。当日下午，县警大队与地主武装围攻洪河集。暴动队员坚持了一天一夜后，在王德山、祖玉敏带领下向西转移。段、孙两个地主因看管不严，趁机逃跑。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队伍因力量单薄，抵不住县大队与地主武装的围攻，由县委书记朱大同把队伍拉到永城县芒山一带。永城县县委书记张宗孔在韩庄暴动后，也把队伍拉到了芒山。两支暴动队伍会合后，成立了萧永红军游击大队，由朱大同任大队长。他们准备攻打永城县火神店，夺取团防队和地主的看家枪，壮大游击大队。9月，游击大队打算在火神店党组织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夺取胜利。因敌人防守严密，游击队计划不周，致使潜入火神店做内应的张宗孔等六人，未开始行动即被敌人发觉，在突围中牺牲。朱大同带领的游击队与一股土匪不期而遇，因警惕性不高，竟被强悍的土匪钳制，失去了行动自由。徐州特委派孙叔平前去解救。孙叔平进入萧永边境的虞山后，一方面利用关系与土匪周旋，一方面指示朱大同伺机逃出，到安排好的地点隐蔽。经过多方努力，朱大同与二三十名暴动队员纷纷逃离匪穴，而暴动缴获的枪支却未能带出。张庄寨、洪河集暴动，就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按照暴动前的分工,李忠道与杜慰农于张庄寨、洪河集暴动期间去朔里了解情况,作朔里暴动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在张庄寨暴动中负伤被俘的侯永碧向敌人供出了杜慰农给暴动队伍提供枪支的情况,敌人已掌握了李、杜的行踪。两人从朔里返回时,在萧城附近被国民党县警大队大队长李公达和督察长纵华甫逮捕。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以后,县委组织部长郭子化按照孙叔平的指示,抢在敌人大逮捕之前部署了党员的隐蔽工作,减少了损失。许致远、张再增、李忠道、杜慰农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后,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刑,其他因暴露身份而被通缉的同志都躲避在外。随后,国民党县政府实行了联保连坐保甲制度的反动统治,使党组织的活动比1930年黄口暴动失败后更加困难了。

萧县农民武装暴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在萧县的反动统治,使地主豪绅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暴动期间,先后有十多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产党员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鼓舞和激励着萧县人民为自由和解放坚持斗争,不屈不挠。

第四节 白色恐怖笼罩下萧铜边红旗不倒

1932年秋,朱大同调离,冷启英接任县委书记。他挑

着杂货担，走村串户，联络各地的党员同志，艰苦地进行着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1933年夏，局势更加恶化。由于徐州特委所属各县的武装暴动暴露了党的组织，吸引了敌人更多的注意力。敌人加强戒备，封锁交通，派出大批密探，疯狂地到处追踪和捕杀共产党员，进行对党组织的大破坏。其间，孙叔平与冷启英在徐州被捕，徐州地区党的活动几乎中断。

值此革命低潮时期，彭瑞、张圣和、朱大同、张远怀、高硕仁、刘德茂、李祥昌、金庆凯等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投敌，并当了国民党的特务。特别是朱大同，他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徐海蚌特别行动区特务专员，经常带领一些特务和便衣武装，在丰、沛、萧、砀、铜等县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干部，还胁迫一些党、团员自首。至1933年底，萧县先后有400多党、团员被强制办理自首登记，党、团组织被破坏殆尽。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萧县，仅在陇海铁路以北的萧铜边境地区还保存三个党支部，有党员20多人。他们在路继先与朱玉珂的领导下，隐蔽地进行革命活动。在陇海路南萧五区的李酒店与冯瓦房一带，还保存着几个农民身份的党员，如李繁洲、陈继仁、纵瑞香、沈凤鹤等。在失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们仍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

陇海路北萧铜边境的路套、朱小楼子、和尚庄三个党支部，是萧县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仅有的幸存者。它们的

存在,并非敌人的魔爪没有伸进路北,而是在大破坏之前,他们已将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早在1929年3月,路套党支部因开展打击大地主杨学勤的斗争被敌人“围剿”以后,路套与朱小楼子两个党支部的活动即转入地下,党员同志分别隐藏他乡,就地从事革命活动。在路套,个别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以开烟酒店为掩护,暗中进行党员的接头联络工作。

路继先原籍江苏省铜山县赵台子村,九岁时随家人逃荒到萧县路套村定居。他南开大学肄业后,于1928年冬在路套小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不久便发展路涤生(又名路永铮)与朱玉珂两人入党,建立了路套支部,自任支部书记。1929年4月,路套农协会会员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击大地主杨学勤、杨明哲的斗争。国民党县政府因此派军警到路套小学逮捕他。在老师和学生的掩护下,他得以脱险。之后,他到英国人在凤阳开办的门台子烟厂做苦工。时间不长,又因参加罢工斗争而被迫离开烟厂。回到徐州后,受中共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陈履真派遣,到沛县孟桥小学任教。他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沛县县委委员。因在迎接“红五月”活动中引起敌人注意,遂转入县城西王楼小学任教。不久,因组织农民开展夏收斗争,而被反动当局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他坐了一年半牢,在狱中还发展了张新亭(又名张光中)等两名党员,于1933年

3月出狱。

路继先出狱时，正值萧县的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全县。他住在老家铜山县赵台子村，常常趁夜间回路套与村内党员联络和研究工作，恢复了路套支部，路涤生任书记。同时在萧铜边境发展新党员，建立了两个支部，一个是铜山大杨庄支部，支部书记赵宜路；一个是和尚庄支部，支部书记王清惠。朱玉珂坐了三年牢后，也在此时出狱。出狱后，他也把家乡朱小楼子村失散的党员联络起来，建立了朱小楼子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这时的几个党支部，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1934年秋，苏鲁边区特委建立，郭子化任书记，张光中任宣传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路继先与张光中取得联系后，于1935年4月建立了路套区委，自任区委书记，隶属沛县县委领导。他们坚持“以职业作掩护，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待机再起”的工作方针，党组织化整为零，三至五人为一组，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主要任务是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到1936年底，党员已发展到五六十人。

这支党员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顽强地坚持斗争，为萧县的革命事业保存了火种，积蓄了力量，为日后全面恢复和发展萧县的党组织，开创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章

全民抗战的良好开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广泛团结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党的领导下，萧县人民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迅速投身全民抗战的滚滚浪潮之中，打鬼子，锄汉奸，保家卫国。

第一节 郭子化从延安来

1937年3月，郭子化在延安向党中央委派的代表朱理治汇报了边区特委的工作后，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党中

央决定让郭子化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苏区党代表会议，明确了党的新时期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日战争。而争取民主是准备和实践抗战的中心一环，坚持共产党领导则是胜利的关键。这次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要克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会议强调解决好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团结工农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走上坚决抗战的道路。郭子化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两个重要会议后，进一步明确了边区特委前进的方向。

6月底，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刚刚结束，郭子化又与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起研究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并于7月初离开了延安。途经西安时，他得知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又听西安的同志说，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郭子化重任在肩，急如星火，匆忙从西安搭乘陇海铁路的火车东

去。他在黄口车站下了车，找到了在徐州七师的同学，大革命时期入了党后又脱党的耿蕴斋、丁毅忱，帮他俩恢复了党籍，部署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工作。并要求耿蕴斋想办法当上国民党黄口区区长，取得合法地位。而后以黄口为中心，开展萧、铜、砀、丰、沛五县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要求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广泛地动员群众及各阶层的力量参加抗日工作，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以徐州为中心成立了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司令长官。徐州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要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根据形势发展和河南省委的指示，决定将边区特委迁往徐州，肩负建立徐州及苏鲁豫皖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发动全民抗战的艰巨任务。

为了开展第五战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我党在第五战区公开活动，特委机关迁到徐州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派特委委员、秘书丛林到萧县找县立师范学校校长丁毅忱，请他去徐州，通过萧县人、老同盟会员刘汉川会见李宗仁。丁毅忱到徐州后，郭子化向他说明了想法。他俩都认为刘汉川与李宗仁的关系非同一般。有一次，李宗仁去刘汉川家，听说刘母喜欢晚辈见了她叩头，李宗仁见了刘母就行跪拜大礼。刘汉川思想开朗，时任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秘书长，通过他去见

总动委会主任李宗仁是最佳人选。见了刘汉川怎么说呢？郭子化说，你就说我是从延安来，回家乡做救亡工作，想会见李宗仁先生谈第五战区的救亡工作。并说我们俩在七师上学时，都是他的学生。丁毅忱陪郭子化去见刘汉川，说明来意。刘汉川见到郭子化非常高兴，愿意陪同郭子化去见李宗仁。11月初，郭子化在刘汉川的引荐下会见了李宗仁。李宗仁为了争取第五战区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随即表示同意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李宗仁还欢迎郭子化代表我党在徐州设立办公处，公开活动，并聘请郭子化为民众抗日总动委会的专职委员，参加总动委的领导工作。

丁毅忱又同在徐州牙税局任职的叔父丁次山先生商议了郭子化在徐州设立办公处的一些具体事宜。丁次山先生和郭子化也是朋友，一提此事，丁先生立即答应，他很乐意在牙税局找房子作为特委机关的办公处。特委机关迁往徐州后，丁次山先生在各方面都给了很大帮助和支持。从此，特委就在徐州站住了脚，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

11月，边区特委在黄口西北五华里的孙庙村耿蕴斋家里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历史上称黄口会议。这是历史转折关头，共产党组织以徐州为中心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特委负责同志郭子化、刘文（原名余子彬，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为省委驻特委的代表，并参加特委为委员）、张光中（特委宣传委员）、丛林（特委委员、秘书）以及

徐州西部各县的负责人郭影秋(铜山)、路继先(萧县)、刘屏江(永城)、于化淇(特委派到黄口地区发展党组织的代表)、陈筹(丰县)、尹夷僧(砀山)、孙叔平(此时为丰县代表)、耿蕴斋(萧县)等十几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遵照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对如何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使已开始的抗日战争成为全面抗战,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等事项作了研究和部署。刘文、张光中、郭影秋等同志发了言。这次会议及时指出了边区的抗战方向,并决定各县县委和党组织立即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我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第二节 动委会奏起抗战序曲

1937年10月,路套区委改为萧铜工委,这是宿州地区乃至皖北地区第一个恢复和组建的县级党组织,书记仍由路继先担任。当时一个地方能发展五六十名党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1937年3月组建中共河南省委时,中央交给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的党员组织关系,一共460人。其中:苏鲁豫皖边区特委300多人,河南工委70人,鄂豫省委60人,皖西北特委30人。路套区委的党员人

数,占河南省的八分之一,占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六分之一。这是一簇旺盛的火苗,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我们也应看到,从党组织的成份上看,毕竟还是农民占多数。要动员和组织全民抗战,实行“士农工学商,一齐上战场”,就必须动员和组织一批有号召力、有领导能力的人士到党内来,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边区特委认为:这一地区是我党开展工作较早的,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较多。国共合作后,释放政治犯,已有一批党员从监狱中出来,他们中不少人过去曾做过党的领导工作,理论水平也较高。为了发挥这些同志的作用,边区特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经过慎重审查,弄清事实后,特委为这些同志(少数确有叛变行为的除外)有的恢复了组织关系,有的重新安排了工作。历史证明,这样做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

1937年8月,李忠道从国民党监狱里以释放政治犯的名义被放了出来。他回到家乡李酒店,积极联系失掉关系的党员。他们一边自发地进行抗日宣传,一边找党的上级组织。与李忠道一起坐牢的邳县人武广春先一步找到了党组织,向郭子化介绍了李忠道在狱中的情况。郭子化把联络任务交给了萧铜工委书记路继先,路派陈怀玉到陇海铁路南约李忠道到萧铜边境的赵台子村,共同商讨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李忠道恢复了组织关系后，又恢复了李繁洲、陈继仁、纵瑞香、沈凤鹤等同志的党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组建了李酒店、冯瓦房两个党支部。这也是萧县陇海铁路南最早恢复组建的两个党支部。以后在萧县做抗日领导工作的戴晓东、纵翰民、孙叔平，都是边区特委较早恢复组织关系的领导同志（孙叔平同志恢复不久又因故没有接上）。他们恢复组织关系后都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我党在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委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力量，郭子化通过刘汉川把中共铜山县委书记郭影秋调进总动委会，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由李宗仁的高级秘书夏次书兼任，他是挂名的，郭影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组织部是总动委会的实权机构，由此掌握在我党手里。我党在总动委会内部建立了党团支部，郭影秋任支部书记。各县建立动委会时，总动委会便向各县派指导员。各县指导员实际上就是各县的中共负责人。根据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各县动委会主任由各县县长兼任，副主任由总动委会派去的技术指导员担任，副主任处理动委会的日常工作。萧县因县长姚雪怀被日寇南京大屠杀吓破了胆，急忙辞职，逃往湖南老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命原县民政科长王雪琴为县长。

1937年12月19日，县长就职与县动委会成立同日举行。王雪琴上任伊始，坚持由总动委会派来的指导员丁

毅枕一身二任，主任、指导员一肩挑。遂由丁毅忱任县动委会主任，委员有纵翰民（兼任组织部长）、张舒民（兼任宣传部长）、李忠道（兼任军事部长）、许西连（兼任总务）。委员还有从丰县回萧的冯家平、杜慰农、马冶平、孙叔平四人，他们也参加了县动委会的领导工作。县动委会的实际工作由纵翰民负责，实权为我党所掌握。

县动委会在国民党县党部办公。在县长姚雪怀辞职逃离后，县党部书记李振祥与监督委员权万邦也弃职躲在乡下。他们听说几个原来被通缉的共产党员住进县党部，十分恼火，便赶往县城要房子。他们找到了县政府，县政府秘书彭笑千告诉他们：“县党部的房子是萧县人民的，萧县人民只能给抗日的人用！”并说这些人不识时务，“是不知亡国恨呀！”

新任县长王雪琴，也主张抗战，倾向民主，已开始与共产党接近，并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县政府秘书彭笑千此前任松江专署财粮科长，松江沦陷后回乡参加抗战，认为要抗战只有与共产党合作。

县动委会成立以后，各区也成立了分会。区政权没有经过改选，抗日热情不高，使抗日动员工作受阻。县动委会就向县政府提出改造政权，让坚持抗战的人当区长，得到王雪琴、彭笑千的同意。在姚雪怀任县长时，全县十个区已合并成五个区。动委会推荐两名共产党员当区长，一个是萧铜工委书记路继先，任四区（黄口）区长；一个是耿

蕴斋，重任三区(袁圩)区长(他由于1936年西安事变时大呼“蒋介石该杀”被撤了三区区长的职)。一名进步人士(许西连)任一区(龙城)区长。还有两名国民党员，一是汪敬民任二区(朔里)区长，一是张汝义任五区(褚兰)区长。并派共产党员王良到县常备队做政治工作，派共产党员陈继仁到车警队做旧军队的改造工作。这时，萧县再次出现了1928年“赤色萧县”的局面。

动委会是发动群众的司令部，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宣传、动员、领导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从1938年春节以后，先后开办了唐庙、瓦子口、袁圩、韦道口、路套、醴泉等抗日青年农民训练班。每期时间为十天至半个月，每期参加人数约有一二百人。教材由孙叔平编写，主讲人是当时被称为萧县三杰的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还邀请郭子化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邀请从西北特支来的老红军童陆生(解放后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讲抗日游击战术。1938年2月举办的韦道口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一二百人，多是知识青年，时间是两个星期，主持训练班和讲课的有孙叔平、耿蕴斋、曹鹏飞、冯家平等。1938年3月举办的路套训练班，时间七天，参加学习的有200多人，由纵翰民讲政治，郑子训(县大队的中队长)讲军事。同时还组织了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并在黄河滩里进行了两天的军事演习。路套党支部还找几个铁匠打了钎刀子，武装了群众。

1938年5月7日至16日举办的醴泉训练班,参加学习的90多人,由胡兴茂主持,纵翰民讲课。桃山有孙象涵、顾寒星、薛玉标、亢为德、赵书琴等20余人参加学习。纵翰民讲了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前途、组织抗日武装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使学员明确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和重大意义,为后来开展敌后游击战、培养干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沦陷后,他们就以参加训练班的人员为骨干,组建了彭南游击队,后改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十八大队。

由郭子化建议,经李宗仁同意,第五战区创办的抗敌青年训练班,也为培养抗日骨干、推动全民抗战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期于1937年10月12日在徐州中山堂举行开学典礼,共300余人,训期三个月。训练结束后,由总动委会组织部将其划分成十几个工作团,分赴徐州附近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派往萧县的有曹鹏飞、李祥顺、王瑞书、吴忠智等20人,工作团长曹鹏飞。他们在县动委会领导下,参与了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等工作。随着平、津、沪、宁、鲁流亡学生的增加,第二期增至5000人,萧县有近200人参加。不久,抗敌青年训练班更名为抗敌青年军团。徐州形势吃紧,抗敌青年军团迁往河南省潢川。李宗仁亲任主任,有匡亚明、张百川、臧克家、佟子实等一批党员和知名人士出任政治教员,培养了一批青年抗日骨干,也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人才。萧县近200名进步青年,经过

培训,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纷纷走向抗敌前线,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宗仁办抗敌青年训练班是抗战初期的一个创举,连蒋介石也为之心动,试图把青年军团纳入蒋系中央干训团第二团,李宗仁没有答应。李宗仁曾为此感到骄傲。他说:“蒋介石有中央干训团,共产党有抗大,我有青年军团。”

第三节 龙城保卫战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后,集中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8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共24万余人之兵力,沿津浦路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企图歼灭中国主力部队于徐州地区,打通津浦铁路,连通华东、华北日军占领区,尔后转兵攻取武汉,攫取中原。

在北线日军发起进攻之后,南线日军分多路北向推进。日军南线主力第三、第九、第十三师团于1938年5月3日由蚌埠、凤阳等地出发,渡过淮河,向徐州以西猛进。第九、第十三师团组成“快速”战车队向中国守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猛攻,5月9日占领蒙城,12日占领永城。随后,两师团主力直趋陇海路砀山地区,与北线第十六师团取得联系,切断了第五战区向西的退路,并向徐州迂回。

5月15日晨,第九师团的一个旅团,从百善附近出

发，分两路进犯萧县。其一部在蒋丁楼、孙圩子、瓦子口一带遭国民党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阻击，至晚才逼近龙城。与此同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下令三十二军一三九师驰援萧县。为了激励一三九师将士，奉命前来协助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允诺以5万元作守城奖金。

龙城即萧县县城。中国守军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小县城的得失，因为它距军事重镇徐州仅25公里，是徐州的西南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龙城在，徐州无恙，龙城失，徐州难保。至5月中旬，日军已完成对徐州的包围态势。为避免同日军拼消耗，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先后向豫南、皖西转移，保龙城可为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时间，这是日军合围和中国守军突围的关键一役。

5月15日午前，刚从台儿庄战场撤下来未及休整补充的三十二军一三九师2000余官兵到达龙城，迅即构筑工事。县长王雪琴配合师长李兆瑛勘察阵地，制定守城方案。他们把兵力部署在龙城周围的老虎山、凤凰山、龙山等处，严阵以待。

16日凌晨，日军1000多人，用六七门重炮，十余辆战车，猛攻县城西南的老虎山。一三九师一个营的兵力在此设防，他们借助有利地形，大量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日军久攻不下，转向城北凤凰山进攻。下午3时，日军增至2000人，又向老虎山、凤凰山发起新一轮攻击。上有飞

机，下有大炮、坦克，两山头一片火海。至晚，防御工事多被日军摧毁，老虎山、凤凰山及城郊附近其它阵地相继失守。守军遂放弃山头阵地，退入城内。

17日晨，日军又占领了城东的龙山。守军虽顽强拼杀，反复数次，终未能收复阵地。龙山附近各村落及黄山头相继失守，县城完全陷于被包围瞰制之困境。日军居高临下，用大炮、机枪封锁城内各街道，使部队调动十分困难。下午，日军在周围的山头上对城内轮番炮击，并用气球指挥飞机扫射，用坦克冲击南门。守军凭借城墙工事与敌血战，战况异常惨烈。此时，由蒙城北犯的日军，攻陷永城后，一部沿萧永公路向萧县急进，一部在砀山与从金乡、鱼台南下之敌会合并攻下黄口后，正沿萧黄公路向龙城逼近，前部已接近凤凰山北麓，即将形成对龙城的三路合围，情况十分紧急。守军一面加紧修补工事，一面迎击攻城之敌，师长李兆瑛下令用砖头、泥土堵死四门，固守城池。

当日，抗日名将张自忠所率五十军之一八〇师由孤山集附近增援龙城。该师奋勇冲杀，所属三十九旅一鼓作气攻占了离龙城六七里路的张二庄和孟油坊，与濉溪方面前来增援之敌交火，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日军吃亏后大量施放毒气，一八〇师官兵虽奋不顾身，反复拼搏，终因中毒严重，战斗力下降，被迫撤退。

5月18日，天刚破晓，日军即以密集的炮火攻城，上

午8时发起总攻。日军用坦克把北城门东侧的城墙冲开一个缺口，冲入城内。一三九师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达两小时之久，满城血肉横飞，尸体遍地。因被敌人分段包围，守城官兵伤亡惨重，损失大半，兵力难支，形势对我极端不利，师长李兆瑛遂令各部突围。

李兆瑛师长带领指挥部20多人，从东城门北侧缒城，王雪琴县长带领十余人从东南小奎楼方向缒城。他们约定，缒城后穿过东门外一条小街，奔向龙山与凤凰山之间的山坳处，然后向徐州方向撤退。李师长等人穿过小街，见敌人的火力点正好集中在龙山与凤凰山之间的山坳处，乃转变方向，沿着凤凰山上名曰十八蹬处的一条小路，且战且退，竟得以越凤山而北撤出战场。王雪琴县长因缒城时腿部受伤，由卫士李云祥背负而行，冲出小街，进入麦田。龙山与凤凰山上的敌人，以交叉的火力跟踪射击，在麦田匍匐而行的王雪琴县长及卫士等人，不幸中弹牺牲。跑在前面的县常备大队队长耿继贤，在冲出敌人的火力网后，猛然发现不见了王雪琴县长，乃回头寻觅，欲求接应。同行者虽知危险，但无法劝阻。结果，耿大队长也就永远没再回来。在突围中牺牲的还有共产党员、县常备大队政治指导员王良同志、一三九师参谋长邓佐虞、副旅长吕汝爽等人。

日军破城后，为泄遭抵御之愤，疯狂屠城。城内及四关未逃脱的军民，不问男女老幼，尽遭杀害。东城门内一

岗屋前，十八名弹尽粮绝的士兵被杀害。在不远处的三间屋框里，躺着 27 具尸体。东关外李天真一家八口藏在地窖内，日本兵闯进他家时，寻着婴儿的啼哭声找到了地窖，全家人都被鬼子用刺刀穿死。禽兽不如的鬼子，就连不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全城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由城东门到杨楼山口的五六里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在城东牛眠和城南房庄两个村子，村民及逃难群众近 2000 人被集体枪杀。为了掩盖其罪行，日军让民众自己掩埋自己。鬼子强迫民众排好队，让前排的人先挖坑，挖好后就杀掉，让后面一排的人掩埋。就这样，第二排掩埋第一排，第三排掩埋第二排。当进行到第四排时，突然有人高呼一声：“快跑吧！”话音刚落，群众便呼叫着四处逃散。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用机枪疯狂扫射，绝大多数人惨死在日军的枪林弹雨里，只有极少数年轻力壮者侥幸逃脱。

日寇在牛眠村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案的同时，还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的惨案。有的妇女被先奸后杀；有的妇女被先杀后奸；有的妇女被奸淫后，又被割去乳房，挖掉眼睛；有的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放狼狗咬死，日本兵以此取乐。在太保庙里，几个日本兵把一个妇女轮奸后，又用刺刀挑开肚子，挖出心肝……日寇蹂躏、残害妇女的手段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残忍至极，难以挂齿。在牛眠村，被日军奸淫致死的妇女达 100 多人。

日寇在龙城犯下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罄竹难书。当时，龙城镇常住人口不足 5000 人，城内及城郊附近被杀害者竟达 3000 多人。侵略者在龙城欠下的这笔血债，3000 多死难者的亡灵永在控诉！中国人民永在控诉！

5月19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猛攻徐州守军二十一军卧牛山与马山阵地，当日上午即占领徐州。

龙城保卫战将日军攻陷徐州的脚步阻滞了三天，为第五战区数十万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了时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守城军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撼人心扉的抗战悲歌！

早在日军进攻龙城之前，即刚入萧境的第一天，其第九师团之一部夜宿萧县西南孙圩子村时，被第五战区刘汝明部夜袭，伤亡惨重。日寇便在孙圩子附近的蒋丁楼进行报复，一个不满百户的小村庄被杀害 100 多人，出现了“家家皆穿孝，户户有哭声”的惨景。不少人家被杀绝，大部分家庭被洗劫一空。

侵略者在萧县犯下的累累罪行，激起萧县人民的无比仇恨，反抗的怒火在人民胸中燃烧！

第四节 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在动委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的

同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抓紧部署各县，千方百计抓武装。可是，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条例上有个规定：各级动委会，只许成立抗日团体，不许建立武装。在这个问题上，边区特委没有按照王明等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去做，而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郭子化指示：“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张，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打日本侵略者，没有我们自己的武装怎么行？我们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

可是，自己建立武装，武器、弹药和人员给养都有困难，最好是争取合法地位，解决面临的困难。郭子化就找到萧县人李明扬，李当时是徐州专员公署专员兼第五战区苏鲁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思想进步，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和刘汉川、丁毅忱，既是同乡又是老朋友。郭子化就利用这个关系找到了李明扬，想要一个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李明扬和专署秘书主任丁熙民（萧县人），都和我党保持着统战关系。可共产党要公开组织武装，此非一般问题，且违背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故李明扬也有所顾虑。他问郭子化：“你们有多少人？”郭子化随便答道：“现有200多支枪，500多人，我们还要大发展！”李明扬笑了。他说：“仅几百人还叫什么义勇军，就叫义勇队吧。共产党是爱护人民的，加上‘人民’二字，就叫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吧。”郭子化认为队亦无大小，这并不能限制我们

武装力量的发展,就表示同意。就这样,我们党从李明扬那里领回一个“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公开番号。丁熙民为表示对我党的支持,与李明扬商量先拨给 2000 元钱,作为开办经费。

早在黄口会议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安排各县党组织积极串联人枪,组织抗日武装,准备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1938 年 2 月,特委进一步作出了徐州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大体计划:即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点分成四块,徐东北包括贾汪、枣庄和鲁南山区;徐东南包括铜山南部、邳县、睢宁、宿迁;徐西南包括萧县、宿县、永城;徐西北包括丰县、沛县及萧、砀、铜陇海路北地区。这四块地方都建立区委(相当小地委),领导该地区的游击战。徐西南区委没有建立起来,属徐西北区委领导。1938 年 5 月初,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王文彬在丰县召开丰、沛、萧、砀、铜五县联防会议。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书记李忠道、陇海路北萧铜工委委员王清惠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各县积极建立抗日武装,每县至少要搞 30 条枪。

1938 年 5 月 16 日,纵翰民按照组织安排,在醴泉青年农民训练班刚一结束就赶往陇海路北去参加党的秘密工作会议。途经瓦子口时,瓦子口已被日军占领,不能通过,又转道萧城附近去了路套。路套会议决定,立即建立游击队。这时,中共萧铜工委书记、黄口区区长路继先,已

于3月中旬同萧县的路永锷、孙善佑、耿春涛一道，去河南确山县竹沟村彭雪枫办的抗日游击训练班学习，区长换成了马冶平，也是共产党员。他同区员朱玉林（中共萧铜工委委员）一起，已成功地改造了黄口区队，在区队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有效地掌握了区队武装。在日本侵略军进犯到黄口西部时，即由马冶平、朱玉林带领区队四五十人枪，拉到陇海路北萧铜边境，改编成了抗日游击队。路永锡在油庙、李庄组织了三四十人，冯蕴言、路永铮在冯庙组织了几十个人，这三支队伍合并在一起组成陇海大队，大队长由中共萧铜工委委员耿兴义担任，指导员由中共萧铜工委书记周峰担任。这支队伍于1938年6月被徐西北区委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萧县独立大队”。

5月17日，在第五战区长官部机关向徐州西南突围撤退后，郭子化也与边区特委的一些工作人员撤到滕峰边区。特委在这里的老古泉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委员，编成三个大队，一个警卫连。6月11日，中共徐西北区委宣布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亦即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总队从第五大队始编，因第一总队已有一、二、三、四大队。第二总队成立后，从第五大队一直编到二十九大队，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

徐州沦陷后，总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郭影秋跟随逃难的难民来到萧县。他先到冯瓦房与冯家平接上了头。冯家平告知了李忠道，李去冯瓦房见到郭影秋，后来又联系上耿蕴斋、陈怀玉、张舒民等，便在李酒店开了一个会议，研究抓武装问题。首先要把国民党士兵从徐州撤退时丢在萧县的枪支收集起来。在此之前，中共陇海路南区工委曾部署由共产党员掌握的两个区，先把区队改造过来。四区（黄口）按要求完成了任务。三区（袁圩）区长耿蕴斋（共产党员）、区员孟振声（共产党员），由于怕各乡乡长反对，不敢把区队长马金玲和那些不可靠的兵痞、乡丁换掉。当日军进到陈蒋山时，耿、孟把三区区队拉到赵庄后，由于没经过改造，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都带着枪跑回家了。路南区委曾对耿、孟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让他们各自回家乡组织武装。结果，耿回到家乡孙庙，孟回到家乡孟吴楼，各自拉出一支队伍，一共一百七十八人。耿拉的队伍由何光友任队长，孟拉的队伍由孟昭林任队长，纪律很差。主要是成份复杂，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愿意抗日的；二是为了保枪而参加游击队的，即地主人的枪股；三是地痞流氓、土匪。他们已把队伍拉到陇海路南张大屯、曹瓦房一带，与土匪杂八队混在一起。路南区工委曾派陈继仁、李忠信等去做改造争取工作。郭影秋知道后，也曾带着陈怀玉、冯家平、耿蕴斋、孟振声到部队住了几天，看到他们连耿蕴斋、孟振声的话都不听，回来就建议把这两支

部队拉到陇海路北丰、沛一带去整顿。在征得耿、孟同意后，由耿蕴斋、孙叔平带领去了路北。经过整顿，与路北部队一起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五、十六大队，跟随陇海路北部队活动。

郭影秋在萧县住了一个多月，还到永城、夏邑两县去了一趟。他听从陇海路北到路南联系工作的李公俭说，路北各县在拉队伍，司令员叫郭洪涛。决定先到山东找省委，要求派主力部队到路南帮助组建抗日游击队。6月中旬，他同陈怀玉一起化装上路了。刚走到丰、单边界，遇到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王文彬政委、李贞乾总队长，王、李动员他俩留下来，找省委的事可以写信请示，派专人送去。郭影秋便留下来任二总队的政治部主任，陈怀玉为丰、沛、萧、铜、砀五县巡视联络员，帮助总队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

在郭影秋没离开萧县前，送走何光友、孟昭林两支部队去路北后，郭影秋就与路南区工委的同志商量过，要建立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可是，当时只有两三支枪，组不成队伍。这时，吴蒋庄、王寨、孙庄以西地区被土匪武装占领着，以东又是地主联庄会的武装。他们相互封锁，不断发生武装冲突，游击队建立不起来。李忠道就到吴蒋庄以东地区，找到联庄会负责人吴信容做工作，宣传只有抗日才能保家的道理。他们接受了抗日保家乡的思想，参加抗日活动也很积极。

由于通过吴信容争取了吴蒋庄以东联庄会抗日,为党组织建立自己掌握的武装创造了条件。开始,参加游击队的主要是李酒店、孙大庙、冯瓦房、大吴集一带的抗日青年积极分子,还有孙清淮、石英从土匪石金玉那里动员出来的十五六个人,十来支枪,一共五六十人,十五六支枪。当游击队住在五区樊屯时,土匪头子石金玉又带着武装,把石英带来的十多人枪硬性拉走。之后,李忠道又七拼八凑组织了十来支枪,仍不敢活动。还是经孙叔平游说,才在小学教师王子石的土围子里藏了十几天,到枪支又多了一些,才敢出来活动。在筹集枪支的过程中,彭笑千还从国民党县政府留下的款子中拿出一部分,交给张舒民、许西连买了两挺机枪、三把盒子。到7月中旬,部队发展到100多人时,才在红庙附近的张屯召开萧县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大会。参加人员除李忠道、冯家平外,还有纵翰民、彭笑千、张舒民、许西连、冯蕴言等。会议推选李忠道为大队长,冯家平为指导员。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长分别是王振全、陈学文、沈凤鹤。每个中队设一个政训员,分别为纵翰民、陈继仁、陈怀玉。

萧县抗日游击队成立后,开始主要是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吴丛林驻扎时,中共徐西北区委派尹夷僧、张如来萧县,传达徐西北区委的决定。决定内容为:一、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改为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委员陈继仁、李繁洲,属中共徐西北区委领导。二、萧县抗日游击

队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七大队，李忠道任大队长。与尹夷僧、张如同来的还有五支部队。其中包括：丰县的武装，大队长冯敬樵；殳山县的武装，大队长孟宪琛；陇海路北萧铜的武装，大队长路永锡；还有两支是萧县的武装，一支由何光友担任大队长，一支由孟昭林担任大队长。萧县的两支武装调往路北整顿后，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五大队、十六大队。同来的还有耿蕴斋、孟振声、孙叔平。这是一次徐西北、徐西南的武装大会师，也是萧县知名人士的大聚会，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因领导农民暴动而被通缉者的大聚会。

从陇海路北来的五支武装同十七大队一起，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宣传。先后到王寨、瓦子口、坡里、朔里、永堙、刘行、许堂、萧城，转至六区纵井、红庙，最后到大吴集集中。部队在武装宣传过程中，每经一个村庄，均高唱歌曲，高呼抗日口号，鼓舞人心。行政人员也随军活动，每到一个集镇驻扎，都分别召开大小群众会，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起来抗日救国，不当顺民，不做亡国奴。使群众懂得并坚信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是能够胜利的。并积极物色人才，筹建乡镇抗日政权。同时派出若干宣传小组，分头到周围各村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武装。武装宣传每到一处，都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干农

活，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这次武装宣传活动，历时 20 余天，行经五个区，十多个集镇，影响广泛，对动员民众抗战、开创萧县抗战局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五节 智除黄庙据点

萧县抗日游击大队三中队政训员陈怀玉，家住陈坡村。村北一里多路就是陇海铁路，对面靠着铁路的村子是黄庙村。这里有利民沟通过，日本鬼子为了看护铁路，在利民沟上架了一座铁路桥。在黄庙村设了一个据点，驻防一个小分队，一共 21 人。鬼子兵经常白天出来骚扰百姓，当地群众非常担惊受怕。有一次陈怀玉回家，就碰到两个鬼子兵到他家要白面、鸡蛋和小鸡。邻居对他说：“真没法活下去，鬼子天天出来要东西。我租了二亩地种瓜，刚熟就被糟蹋了，瓜秧也给拔了。我今后无法生活，更无法交租子了。”还有一家王姓邻居，租了一块梨园，鬼子把梨吃了，还把梨枝砍掉。最让村民痛恨的事，是鬼子兵肆意奸淫妇女，要花姑娘。经常有村民问陈怀玉：“你们不是抗日吗？为什么咱家门口的鬼子你们不打？只是到处乱跑，你们抗什么日？”陈怀玉告诉村民们：“咱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请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找机会除掉据点里的鬼子，替大家出这口恶气。”

沦陷以前，陈怀玉在这一带搞过农运，组织过农救会。黄庙村的农救会长叫袁永赞，现在被大家推举出来当保长。张庄村的联庄队长张步清，也是农救会员。他俩见到陈怀玉就说：“咱们干吧，弄两支枪来，我俩就能把这里的鬼子干掉！”陈告诫他俩：“这是军事行动，要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要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要干就干个痛痛快快，把敌人消灭光，不要打草惊蛇，在干之前要保守军事秘密。”随后，陈怀玉又来到看桥的顾老头家里。顾老头见到陈就难过地说：“唉！我当了汉奸啦！”陈说：“你当了什么汉奸？”他说：“村子里叫我给敌人看铁桥，替敌人干事情不就成了汉奸了吗？”陈说：“你今后要多给人民办事。现在你就领我把地形和敌人的情况弄清楚，这就叫为抗日人民办事情。”顾老头领着陈到了敌人的住处，正巧从道班房里出来一个鬼子兵，要和顾老头摔跤。顾说自己老了不能摔了。鬼子兵又要和陈怀玉摔跤，陈再三推辞说不行。鬼子兵说：“你的行的行的。”他抓住陈怀玉就不放手。陈看不干不行，就和鬼子兵摔起来。结果，鬼子兵输了。鬼子兵笑着对陈说：“你的大大的！”从腰包里掏出糖果、蚕豆子给他吃。陈怀玉趁机看清了地形，大大方方地离去。

第二天，陈怀玉来到50里以外的游击队驻地，找到十七大队新任大队长李忠道，向李述说了黄庙据点的情况。这时，十七大队也正讨论能不能打鬼子，怎样打鬼子的事。他们分析了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我们的队伍成份

好，抗日热情高；二是多数人会使用枪，也有的当过兵，打过仗；三是队员在萧县土生土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熟悉地理环境。谈了有利条件，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剩下的就是怎么打，打哪里的问题。正在这时，陈怀玉带来了黄庙据点的情况。陈怀玉决心要打，李忠道认为时机已到，两人经过商量，还是再派冯家平随陈怀玉去黄庙一趟，把情况进一步搞清楚。陈、冯二人到黄庙村找到袁永赞，邀来了张步清。中午，他们正在袁永赞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打鬼子的事，突然进来两个鬼子兵，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一个鬼子兵还拿出从日本给他寄来的信和他母亲的照片给陈怀玉他们看，并说：“咱们是朋友朋友的，你们统统都是良民。”大家敷衍地笑了一下，袁永赞还伸出大拇指说：“我们都是最好的良民。”

饭后，陈怀玉和冯家平向袁、张了解了这两天工作进行的情况。袁、张告诉二人，村里已派去一个农救会员给日本人当伙伕，了解到敌人每天早上、晚上都很警惕，不好动手。白天敌人很麻痹，中午在铁路两旁桥下乘凉睡觉，都不在房里，外面只放一个岗，枪支都挂在房内墙上。鬼子最喜欢周围民众给他们“上面子”（即送礼物）。陈、冯把了解到的情况带回游击队，经与许西连、李忠道等人商量，决定采用给日本鬼子“上面子”的方式，由黄庙村的保长袁永赞，带几个游击队员，都化装成农民，去给鬼子兵送礼，进入据点内来个突袭。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

一些，还从县长彭笑千那里借了两把二十响的盒子枪。

1938年8月22日夜晩，十七大队从郝庄出发，经过夜行军，于黎明前到达黄庙附近的陈坡村。游击队进村后，立即将村子封锁起来，不许村内人出去，以防走漏风声。站在陈坡村的北面，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黄庙日军据点。虽然离据点很近，敌人毫无觉察。

当时，黄庙据点的东南边驻着孟昭勤的杂八队，如果打黄庙据点不通知他们，战斗打响后，他们可能来找麻烦。于是，由陈怀玉、许西连到孟那里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并说游击队从这里过路（过陇海铁路），一旦同日军打起来，请他们出来援助。他先是不同意，经陈、许做了一番工作，才勉强同意。

部队决定8月23日中午突袭黄庙据点，并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突击队由王振全、沈凤鹤、张庆白、袁金玲四人组成，以送礼为名，首先进入据点，投入战斗。预备队由冯家平、吴信容、陈学文等五人组成，待突击队进入据点后，立即冲入据点增援。其余人员分成两组，一组由李忠道带领，警戒可能从东面杨楼方向来的敌人，一组由陈继仁带领，警戒西边可能从黄口方向来的敌人。战斗结束后，鸣枪三声为号，立即集合队伍转移。

午后一时左右，天气炎热，鬼子兵依然在铁路边、大道旁树荫下睡觉，个别的还在水坑里洗澡。在敌人的伙伙、我们的农救会员预先告知下，鬼子兵都知道下午有

“客人”来给他们送礼，不时地有鬼子兵去桥头张望。不一会儿，王振全带领着三名队员从陈坡村出发，头上带着苇席夹子，篮子里盛着鸡蛋、桃子，手里提着小鸡，进入道班房敌人驻地。送礼的“客人”到了，鬼子喜得蹦跳起来，团团地将他们围起来，有的抓桃子，有的拿鸡蛋、提小鸡，来迟的人就争夺起来。

突击队员看见王振全用手摸一下席夹帽的信号后，立即掏枪向敌人射击。霎时间，手无寸铁、亡魂丧胆的鬼子兵被打死一片。未被打死的急忙奔向屋内拿枪，四位突击队员似猛虎一样随即向敌人扑去，预备队此时也冲进据点。跑到屋里的鬼子兵尚未来得及摘枪，就被游击队员击毙。有一个鬼子躲到床下，趁机窜出来掐一个队员的脖子，两人在地上滚成一团，其他队员很快赶上前去把鬼子兵打死。外面有两个正在洗澡的鬼子兵，听到枪响，就顺着铁路向杨楼敌据点跑去。他们遇到孟昭勤的队伍后，一个鬼子急忙往庄子里跑，钻到秫秸垛里，被孟昭勤的队伍打死了。另一个鬼子兵沿着铁路向东往徐州跑去。战斗进行约十分钟就全部结束，突击队员鸣枪三声，发出战斗胜利的信号。游击队汇合后，满载着胜利品向西南方向开拔。

这次战斗，突击队消灭了黄庙据点一个小分队的日军，击毙 19 人，被孟昭勤的部队打死 1 人，跑掉 1 人。缴获三八式步枪 18 支、歪把机枪 1 挺、日本盒子枪 1 把，还有刺刀、子弹、帐篷、慰问袋、手表、照片等物。游击队无一

人伤亡。估计敌人很可能来报复，游击队撤退时，动员陈坡、黄庙村的群众和他们一起向西南方向转移。傍晚时，走到一个村庄吃了晚饭，队员们就躺在村外场院里休息。大家都很兴奋，不断地谈论着如何消灭鬼子的情景。第二天，游击队来到吴蒋庄住下。日军知道游击队向西南方向去了，就调动黄口和永城等地的日军出来“扫荡”。他们没有追到十七大队，却把永城县磨山一带的土匪打得七零八落，东奔西逃。

开始几天，黄庙、陈坡等村的群众有的迁到外村去住，多数人白天不敢在家。鬼子兵就把剩下的老弱病残与妇女儿童集中到一起，欺骗他们说：“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打死我军的是‘猫猴子’干的。皇军爱民，凡是良民一律不要逃走，凡是逃走的都不是良民，皇军要把他们当作‘猫猴子’办理。大家应当在家安居乐业，不要自相惊扰。”一些群众被日军的欺骗宣传所蒙蔽，思想麻痹，纷纷回到家里。

大约两三天的光景，日军分三路出发，把黄庙、陈坡、孙庄三个村庄包围，把群众从田里赶到庄内。敌人到黄庙先找袁永赞。袁正在刨树，几个鬼子兵走到他跟前问他：“你就是袁永赞？”袁说：“是。”敌人凶狠地拿起棍子照袁头上就打，问他为什么打皇军。袁告诉他们说：“我抗日杀鬼子是应该的，我想把日本鬼子统统杀光。”日军把袁永赞和黄庙村的群众带到一个院子内，分成两行，持刀先砍袁的头，吓得群众爬墙就跑。这时，鬼子一面用刺刀杀人，

一面用机枪扫射，集中起来的四五十人被杀死约一半。在陈坡村，日军也搜索到四五十人。日军带着两个村的维持会长找到陈怀玉家，抓住了陈怀玉的哥哥陈怀清，问他陈怀玉的去向，他说不知道。鬼子用刺刀刺他的手，他仍然回答不知道。鬼子兵先把他杀死，然后杀其他群众。除了妇女儿童外，成年男人一个不留，共杀死 20 多人。孙庄也被杀死 20 多人，三个村子共杀死六七十人。

消灭日军一个小分队的黄庙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震动不小。日军一个军官曾说：“皇军还从来没有丢过这样的脸，二十多人的部队，被四个‘猫猴子’不到十分钟消灭光。”延安新华社 1938 年 11 月 7 日发布一条消息，表扬了黄庙战斗。山东的《大众日报》1939 年 3 月 30 日第四版，介绍了黄庙战斗的经验。刚刚组建的十七大队首战告捷，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带着战利品，每到一处，宣传一处，用生动的事实告诉群众：日军并不可怕，游击队完全能够打日寇，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

群众亲眼看到缴获的战利品，听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道理，不仅消除了“恐日病”，也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很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使十七大队的队伍迅速壮大。在十七大队奉调去丰县打汉奸王歪鼻子的时候，丰县群众听说十七大队来了，争相要看缴获的日本三八式新步枪，争着要听奇袭黄庙的故事，很多游击队员提出

要向十七大队学习。

铲除黄庙据点，也促进了地方联庄会的武装和土匪武装的转变，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抗日的部队，才能受到人民的尊敬。

第六节 活跃的彭南游击队

孙象涵、顾寒星、薛玉标、亢为德等人从萧县动委会开办的青年农民抗日训练班回家后，萧县、徐州相继沦陷。他们在家乡桃山一带，曾组织过一些维护农民权益的群众组织，如节约会、红白喜事会、“三戒”（戒烟、戒酒、戒赌）会等，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这些群众组织的基础上，他们拉起了桃山游击队。

此地因地处津浦铁路沿线，敌人控制极严，他们曾有过把队伍拉到外地活动的想法，一度随逃难群众向东撤退。5月21日到达夹沟东北的南赵楼时，突遇日本兵500多人来南赵楼一带宿营。仓促间，他们把枪埋藏好，化装成农民又返回了家。之后，他们改变了主张，决定在家乡打游击。原来的枪支失散了，还要重新解决枪支问题。孙象涵又从过去的铁路警察那里弄来三支枪，靠这三支枪活动起来。

一天，听说萧九区赵楼村的赵宗禧认贼作父，投靠日军当了汉奸，并扬言在一年半内捞回他失去的18顷地。

乡亲们很害怕。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桃山游击队决定先铲除这个民族败类。1938年6月9日，孙象涵他们打听到赵宗禧带着高四、王玉龙等六人去萧城附近找当地的汉奸。估计他们去萧城有两条路线，一是走皇藏峪北的龙岗山口，由孙象涵带着黄凤殿等人去追；一是走皇藏峪南的渺沟山口，由胡方稳带人去追。孙、黄追到高庄，赶上了赵宗禧一伙。孙象涵假装与赵拉家常，边走边谈，行至倒流河西，卯山村东，孙与赵谈着话并行，黄在后与王玉龙搭讪。乘其不备，孙突然掏枪将高四击毙。赵还没反应过来，孙一个反手又将其击毙，并补了一枪，结束了这个汉奸的性命。与此同时，黄凤殿的枪也响了，王玉龙应声倒地。其余的人听到枪声嚎叫着四处逃跑，孙象涵他们追到高粱地里又击毙一个，余二人跑掉。打死汉奸赵宗禧，群众拍手称快，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桃山抗日游击队迅速扩大，改名为“彭南游击队”。

增加人员，就得增加枪支。彭南游击队通过原在孤山煤矿当矿警的队员张振球，与矿警班长滕秉宜联系，顺利地将以前埋藏的20余支长短枪取了回来。7月中旬，为了阻挠日军的军事运输，彭南游击队发动500多名群众，破坏了三堡到曹村六孔桥的津浦铁路近两华里。敌人很恼火，第二天从三堡出发，挨村搜查。到袁洼时，遇到因事留宿该村的部分队员的奋勇抵抗，游击队牺牲了三名队员。这次破路活动，使日军的火车停开了七天，给其军事运输

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8年8月底，中共萧县工委派谢继恩通知住在苏胡的孙象涵，告知他及所领导的彭南游击队，上级决定将彭南游击队更名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八大队，请他带部队去萧西与十七大队会合，相互交流观摩。

8月底的一天，彭南游击队与十七大队在萧城南的梅村会合。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讲了话，宣布了十八大队成立及对大队长孙象涵的任命。听了王振全介绍黄庙战斗的经验，参观了缴获鬼子的武器，十八大队的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会后，两兄弟大队在萧西又活动了两天。在活动中，十八大队还跟十七大队学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纵翰民与孙象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纵告诉孙，对游击队来说，锄奸、打鬼子都很重要，但在部队逐渐壮大的情况下，要锻炼着多打鬼子，以提高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再者，对抗日牺牲的同志，要开个追悼会，好让同志们寄托哀思。孙象涵完全同意并接受了纵翰民的意见。这次会合，让孙象涵感到：有了党的领导，干革命的方向更明确了。

梅村会合不到十天，十八大队的十名勇士就进行了“官桥试武”。经过对三堡至闵贤一线的敌情侦察，游击队掌握了桃山车站邻近几处岗楼的鬼子（铁路沿线一公里一个岗楼）常赶官桥集的规律，便从大队里挑选十名突击队员，由薛玉标、亢为德率领，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执行任

务。出发前，大队领导提出要求，首先要保证只消灭鬼子，不能伤害赶集的群众。其次，要干脆、利落，不能让鬼子还枪伤害人，要彻底、全部解决。再次，要秘密，不露痕迹。按照惯例，鬼子赶集一般是八九人一道，所以部署十名队员执行任务。

等突击队员到达岗位后，只有四名鬼子进入闹市，都背着枪。不多时，有三名鬼子在亢为德、薛玉标附近蹲下来挑选桃子。亢为德见时机已到，掏出枪对蹲着的鬼子从脑袋上往下打，一反手对站着的鬼子从脑后往上打，把这个鬼子的帽子顶起老高。一眨眼的工夫，干掉了两个鬼子。与此同时，另一个鬼子也被薛玉标一枪打死。尚有一名鬼子在街北溜达，早为我队员孙云汉、黄凤殿监视。街内枪响，群众惊慌，这个鬼子也直往北跑。此时人群拥挤，孙、黄尚距鬼子五米左右，不便开枪，只好持枪尾追。待鬼子醒悟，下枪准备射击时，孙、黄枪声齐响，鬼子应声倒地。队员们经过清点，见再无鬼子，就带着四支三八式步枪、一把日式手枪等战利品进入了天门寺。等日军调集部队赶到官桥“扫荡”时，他们正在天门寺痛饮庆功酒呢。

萧西的智除黄庙据点，萧东的破路活动与官桥试武，规模虽不大，震动却不小。它的意义在于：一是早，发生在萧县、徐州沦陷不到百日，有力地消除了一些人的“恐日病”；二是奇，以少胜多，以劣质武器胜优势装备，创造了敌后游击战的典型战例。

第五章

创建“抗日模范县”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严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民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推动了萧、宿、永、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与此同时,萧县党组织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的独立性,牢牢掌握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权,使党的力量和各类抗日武装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由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较早,政绩突出,萧县被八路军与新四军誉为“抗日模范县”。

第一节 打散维持会,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随着萧县的沦陷,国民党在萧县的统治也彻底崩溃。

日本鬼子占领徐州以后，派金啸虎（朝鲜人）带领着宣抚班来到萧城，找到一区大豪绅刘云亭和曾任过国民党一区区长、家住县城的陈砚生，叫他俩领头组织汉奸维持会。维持会是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的爪牙和耳目，它的成立必然为萧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带来巨大的危害。当时，路南区工委虽然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抗日武装，但却坚定地认为：不能让伪政权站住脚，得想方设法除掉它。恰在此时，陈怀玉以五县巡视联络员的身份来到萧县，李忠道同他商量后，议定在维持会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把它消灭掉。李忠道又找吴信容和许西连研究了具体的战斗方案。大家约定：陈怀玉负责联系马井地区联庄会的马立先，李忠道负责联系红庙地区联庄会的吴信容，许西连负责联系里山联庄会的王瑞贞，三路人马按约定的时间在萧城西边的红峪山庄集中。

1938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大家会合后，马井地区联庄会的马立先，一看红庙地区联庄会的吴信容只带几个人，就生气不愿干了。吴信容自知理短，就向马立先作个揖说：“老兄别生气，以后再联合打仗时，我保证多出人不好吗？”马立先还是不干。陈怀玉就做马立先的工作：“立先哥（有亲戚关系），你能因为人少，没有机关枪，咱们就不干了吗？我在陇海路北第五大队带来了七个人，加上我共八个人，有一个机枪手，一个副机枪手，几个扛枪的，他们都有作战经验。机枪确实没有买到，你这里有机关枪，

一块用就行了，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不干了。我们不能还没去打汉奸，就自己人和自己人吵起来！立先哥，你说咱们打还是不打？不打，对我陈怀玉本人没多大关系，可是马井地区的群众都知道我们要打萧县城，结果一枪没放就回去，老百姓会怎么说我们呢？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经陈怀玉一番劝说，做好了马立先和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才决定联合起来攻打萧城。

李忠道、许西连带着一部分人从城西北角开始进攻，首先消灭了西关城楼上的敌人，缴获五支步枪。南关及东关的敌人听到枪声吓跑了。之后，他们就派人围攻县政府大院。院墙很高，又没有梯子，搭起人梯向上爬。因为大家都没有打仗的经验，前后乱放枪。马立先的人从老县府东边搭人梯爬上墙头，在混乱中被自己的人误伤一个，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战斗结束后，这位牺牲的队员被定为烈士，马井地区联庄会还为这位烈士立了碑。战斗中缴获的五支枪也都给了马井地区联庄会。此战虽然不大，但意义不小，这是萧县扛了枪的农民第一次解放县城，也是湖西地区头一个收复县城的。

打了萧城以后，日本鬼子带汽车来了一趟。过一段时间，朝奸金啸虎带着宣抚班又来了，但没敢住县城，到城南穆楼村住下了。不久，又被纵翰民、许西连带着游击队打跑了。由于汉奸被打跑两次，日本侵略者很长时间在萧城找不着当汉奸的人，组成不了维持会。萧县城离徐州仅

25公里,从5月18日萧县城沦陷,一直到9月份才有日伪驻守。其间,将近四个月萧城没有任何政权机构存在。

时间也是在6月中旬,中共陇海路南区工委书记李忠道在李酒店主持召开了区工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继仁、李繁洲、陈学文、纵翰民、孙叔平、张兆坤等同志,主要讨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孙叔平说:“最坏的抗日政府也强似无政府,最坏的无政府也强似汉奸统治。”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既然不能听任汉奸拼凑伪政权,就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府。

关于县长的人选问题,与会人员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还是由彭笑千担任县长比较合适。理由有三点:一是他抗日积极,沦陷前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得比较好。二是他原任旧政府的秘书,原来的县长牺牲了,他担任县长,容易得到民众的承认,使人感到是顺理成章的事。三是如果由孙叔平、纵翰民、张舒民、李忠道等人来担任县长,群众知道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有的坐过牢,有的被通缉过,一时难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信任。会后,纵翰民、许西连找到彭笑千,对他进行动员说服工作,彭最终同意出来代理县长。彭笑千虽然同意出任县长,拥护抗战,但却存有顾虑。他问纵翰民:“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干?”纵翰民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些武装。”他还顾虑建立县政府能不能起作用,在兵荒马乱的形势下,政令能不能推行。纵翰民邀他骑牲口(因在转移时将腿摔伤)出去走走

看看。萧县抗日游击队在7月间组织武装巡视宣传时，孙叔平又曾去请他一同看看，他表示愿意参加宣传。在水堀宣传时，地方士绅丁熙民（曾任徐州专署秘书主任）、王浩如（曾任如皋县县长）、尹聘三（曾任徐州麦作实验场场长）等人也推荐彭笑千出任县长。可见，由彭笑千出任县长，是党内外、军队和地方人士的共同意愿，是有着较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的。

1938年8月上旬，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政权初建，县政府只有县长和少数办事人员。他们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事大家分头去干。到了九、十月间，全县10个区、108个乡的政权普遍建立。各区设区长一人，助理员、办事员各两人，乡设乡长、事务员各一人。机构虽简，但却改变了无政府状态，收抚了民心，团结各阶层投入抗战，同时也打乱了日本侵略军妄图充分利用萧县这块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补给侵略战争的如意算盘。

1938年10月，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成立。为了完善政权机构，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通过与党内外人士充分协商，于同年11月在三区大演武村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萧县县政委员会。县长彭笑千任主任，委员有戴蕴山、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许西连、张舒民、崔健吾、路永铮、冯蕴言、王子石、纵止韩、马济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二，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县政府下设行政、经

济、民运、军事四科，科长均由县政委员兼任。行政科长许西连；民运科长孙叔平、副科长张舒民；经济科长先为胡育才，后为王子石、冯蕴言等；军事科长纵翰民。后又增设教育科，科长王可风；建设科，科长张立轩；粮秣局，局长单子乔；法官纵止韩。在县政委员会 13 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4 人，国民党员 3 人，其余是进步人士。这四名共产党员是戴蕴山、李忠道、纵翰民、路永铮。数量虽不占多数，但他们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沦陷前抗日动委会的负责人。从县动委会的职责来看，它已是半政权性质，现在过渡到名副其实的政权机构，有这几位共产党员参与其事，已确保共产党在该机构中的领导地位。

党在县政委员会中的领导，一靠政策，二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县委并不直接干预政府的行政事务。为了体现县政委员会是全县最高的权力机构，县委决定，县委书记戴蕴山、组织部长李忠道均不担任政府的具体职务，遇有大事党内先讨论决定，然后由戴蕴山、李忠道做党内的的工作，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做政府中的统战工作。孙、张由于历史原因，一时尚未恢复党籍，但是他们都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做得很出色。同时，要求区、乡亦注重发挥政委会优势。政务的推行，重大政令的执行，必须经过宣传鼓动，唤起民众同心干，这样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党组织还大力发动民众

参与各种救亡团体，如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把他们的爱国热情纳入到有组织的行动中去，使群团组织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既领导抗战，又推进民主，改善民生。毛泽东同志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虽然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为基本方针，利用政权的力量组织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有声有色的游击战。在推进民主方面，主要是发展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代表会议，制定组织章程和工作纲要，通过选举，建立全县领导机构。由抗日救国群众组织的选举到县、乡政权的选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进步。在改善民生方面，主要是调整好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例如，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种”，增加雇工工资，举办信贷，禁止高利贷剥削，成立合作社等。

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徐州沦陷后该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也是当时华中地区乃至新四军属地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它在全县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很高，除敌伪据点外，政令在全县范围内畅通无阻。

第二节 搞好经济工作,为敌后游击战 提供物质保障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特别重视抓好经济工作。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县长彭笑千,凭其十多年从事财政工作的经验,深知抓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战时。因为,“只有吃饱饭,才能坚持持久战。”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全民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

第一,发展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并把搞好生产、支援前线与前方拿枪打敌人同等看待,视为同样光荣。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采取的一项得力措施就是在全县全面推广“438”小麦良种。徐州“438”小麦良种是萧县人尹聘三在任徐州麦作试验场场长时,花了九年心血培育出来的,在萧县进行过区域适应性种植,证明品质优、产量高。抗日民主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将良种的繁育工作交给郝庄农场的范慕兰负责。随着抗战局势的好转,小麦“438”良种也逐年扩大种植面积,不仅成为萧县农作物种植的当家品种,也深受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广大农民的欢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乱之中仍力导新法种田、推广良种,足见其爱民之心。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鼓励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积极提倡发展副业生产。战争年代，农村副业多以生产军需民用品为主，如土盆、土缸、油坊、纺纱、织布、编席、编筐、熬盐、熬糖、熬土碱、养猪羊等。这些产品，不仅群众生活少不了，也是部队所需要的。由于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提倡，上述副业生产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提倡和发展有利于军需民用的工商业。对境内私人工商业，包括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在内，政府一律保护，保障其合法的利益和帐款收回，自由贸易，不受侵犯。政府对鼓励和提倡的工商业，如造纸、卷烟、印染、制革、文具、盐运、盐行、轧弹棉花、织袜制鞋等，还低息或无息贷予基金，减收或免收税捐，给予运输、购买原料及推销产品的方便。

抗战时期的商业贸易也很活跃，这反映了抗日民主政府有着很强的应变能力。日寇除用军事、政治手段向我进攻外，还用经济手段向我进攻，常在军事夹缝中留有市场路线。萧县境内，从吴庄、坡里到祖老楼、青龙集的市场路线，就是日伪、顽、我都允许商贩出入的路线。敌人企图利用商市推销他们的冒牌劣货，利用他们滥发的伪币吸吮民脂民膏。我方则灵活应对，凡我所需而于抗战有利的商品，即使敌货也不妨放入，如医药、电池、染料、文具等。我方的粮食、牲畜等产品，则严禁输出。一些为我所出而无补于军事者，如土产品之猪鬃、烟叶等，则允许输出。由

于有禁有放，政策界限分明，使抗日民主政府战时商市的威望很高。为了抵制日货，一些生活用品提倡用土产品代替，没有煤油点灯，用棉油、豆油；没有火柴，用火镰、火石；没有染料，用槐豆、青灰、石榴皮替代或用紫棉（土黄色）织布；没有海盐，用小盐，以解决生活用品之不足。这些东西还有个好处，那就是日军不抢。

第三，抓好财税工作，增加财政收入。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自行筹措，保证供应”的原则，做好抗战时期的财税工作，以保证部队及政府抗战经费的需要。

一是合理征收田赋。战时的田赋征收，与平时有所不同，首先改缴银（货币）为征实，以粮食结算。战时的地方政府不可能设置仓库，只有就地验收，就地交民众保管。机关、部队凭粮票在驻地支取粮食，按月按季给区、乡、保、户结算。为了实现合理负担，改按地亩普征为累进征收，地越多征得越多，地少的农民少征或免征。

二是开征工商税。抗日民主政府除设立民政、民运、经济、军事四科外，还单独设立粮秣局、工商局。粮秣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筹集、保管粮食和草料，工商局主要负责工商税的征收。由于萧县境内集市较多，商贩活跃，又因离徐州较近，交通方便，过路商人较多。他们贩卖的商品有粮食、土布、棉花、染料、食盐等。当时，吴庄、坡里、瓦子口、祖老楼、青龙集等地都有行栈，商贸活动很活跃。工商税的征收，以盐税为大宗。除此之外，抗日民主政府的财

政来源还有战争缴获、没收汉奸财产、公产租金、私人捐款和各种借款等。

三是发行“萧县地方流通券”。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38年10月开始发行萧县地方流通券。开始，因印刷困难，就借用私人钱庄（郝松云家的瑞蚨祥钱庄）所印未发行的纸币，将每张千文改为每张壹元，加盖县印，布告发行，同时明令禁止私人出票子。至1939年初，抗日民主政府从敌占区（徐州）搞来石印机和纸张后，又聘请了印刷师傅魏朝，由他带来几个徒弟，在沙河边陈楼村杜长德家印刷萧县流通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流通券不仅在县内流通，还在周边各县及伪军据点流通，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豫皖苏边区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支援了主力部队。1938年冬季，抗日民主政府一次就给苏鲁豫特委四万元，解决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冬装问题。新四军游击六支队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所需的药品，基本上都是由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用地方流通券换成伪币后，再从敌占区购进。萧县地方流通券，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两个月后开始发行，至1941年5月随新四军四师“东撤”结束，前后两年半的时间。其间，因流通券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萧县已成为豫皖苏边区的财政基地。

第四，严格财经制度，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抗战时期的财政工作，越是环境复杂、财政困难，越要加强统一

管理,统筹统支。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自力更生,就地解决,统筹统支,量入为出”的原则。在战事频繁的1939年,还精心制定了《萧县经费收支暂行办法》。在收的方面,规定“所有各种验收税款手续,由本府制定三联印收发,交经收人员或机关填用”。“收税款时,应将印收第一联掣给交款(物)人,第二联于缴款时一并呈送给本府稽核,第三联留给经收人或机关存查”。“经手人员或机关收得税款后,应随时缴解,并须于月终时按本月所收税款数目列表呈报,以备稽核”。在支出方面,县直各部门及各区和部队,分经常费和临时费两项。“经常费应按照预算列支数目填具正式领据,呈由本府核准后发给”。“临时费用动支数目在百元以下者,呈由县政核准拨发;百元以上者,须交由县常务委员会通过后,方准动用”。同时实行财务民主,帐目公开。“各领款机关或部队,应于每月终了将收支情况列表公布。例如,区公所向区务会议报告,部队向该队全体队员报告”,“县政府于每月月终,将本月份全县各项经费收支情形列表向县常委会报告”。并严格要求会计,“对于各种经费发放,须有切实根据或命令,不得任意发放。违者,依损害抗日论罪”。

在执行财经制度方面,彭笑千县长以身作则。他善理财,不贪财,以廉政名重一方。在王雪琴县长牺牲前一天(1938年5月17日)晚上,他俩商定,由他先带一部分款子出城,约定在九区会合。18日上午王县长突围中壮烈牺

性，彭笑千带出的两万多元款子，悉数交出作为开展游击战的财政经费。他任县长时，是国共合作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每月还发给他 3000 元公务费，他全部纳入县财政统一支配。发行萧县地方流通券是敌伪搜寻的重要目标，只能极其秘密地进行。票子出多少，全由他定。印刷、启运、保管、发行工作，全由他指挥。两年多的时间，从没出现任何问题。由于他勤政、廉政，政绩突出，引起敌伪的极端仇恨。敌伪抄他的家，烧他的房，抓走他的长子，以及侄子和亲戚，扬言要杀害他们。彭笑千不惧恫吓。他正告敌伪：“你们这样做，只能再予我们增加几千人枪而已。”彭笑千不谋私利，以身家性命投入抗战，给全县树立了毁家纾难的榜样，对抗日军民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第三节 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开创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做好政治动员工作，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关于抗日的政治动员工作，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

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刚开始,投入抗日行列的民众多是敌人替我们做的政治动员工作,那是敌人用炮火和飞机炸弹把他们发动起来的,其抗日行动是被动的。要使他们实现由被动抗日向积极抗日的转变,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起来抗日,掀起全民抗战的热潮,离不开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有良心和良知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他们常常置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萧县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深知这一点,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在全民动员中首先发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不论党内党外,只要有志报国者皆举而任之。在13名县政委员中,有近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1939年3月组建的萧县常备总队,辖6个营,28名营以上干部中,萧师出身的约占一半。在第五战区创办的抗敌青年训练班里,仅前两期就有萧县的知识分子200多人。青年教师、萧师学生、实小等校的高年级学生,大都参加了抗日工作。当时,萧县的知识分子曾编唱过一首抗战歌曲,歌词是:“萧县是古来的战场,英雄的故乡,好男儿要担当起国家兴亡,拿起刀枪干一场。日本帝国主义必定灭亡……”萧县知识分子的抗日激情,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初期,党组织还没有对外公开,中共萧县中心县

委机关是以县政府民运科的名义开展活动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进行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1938年12月,创办了抗战报纸——《实报》,每三天出一期,发行量近3000份。它以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唤醒各界人士及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为宗旨,极大地鼓舞了全县抗日军民的斗志。同时,抗日民主政府还以农民救国会的名义,在全县组织了六个宣传队,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启发和动员广大民众踊跃投身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此外,创作活动也非常活跃,产生了一批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文艺与理论佳作。最著名的有章文龙1938年创作的诗歌《元宵》(曾获全国诗歌大赛第一名)、孙叔平1939年撰写的《抗日农民运动讲话》,等等。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对广大农民的发动,是在形式多样且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工作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各种抗战组织中得到教育而觉醒。早在1938年冬,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救国会,并分片建立了抗日群众组织。为加强对抗日群众团体的领导,从1939年2月开始,先后在四区崔口、张寿楼等地开办抗日训练班,每期50人左右,时间是7~15天,共培训群团干部500人,分赴各区开展群团组建工作。到了夏秋,全县群团组织自下而上普遍建立,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制定组织条例和工作纲要,选举县级领导机

构。年底,全县农民救国会发展到12万人,青年救国会发展到10万人,妇女救国会发展到3万人。这些团体的成员可能有交叉,但总数不会低于20万人。当时,全县人口仅50万人,就是说,有近一半人活动在各种组织中,这还不包括遍及各村寨的儿童团。萧县形成了一个“人在组织中,组织联全县”的局面,足见其人员发动之广,组织程度之高。

随着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政府依靠群众团体,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和战勤支援。如派粮派饭,组织群众做军服、军鞋,拥军优属,照顾伤病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挖抗日沟,等等。1939年7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同志所写的《东征以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入萧境,便表现出一种新鲜的景象,抗日情绪很高。如果你没有证明文件的话,远方的人是不易行走的,必定会把你送到联保处去盘查。六七岁的儿童,口中都会唱救亡歌曲,不论是在乡村或田野中,远远就会有雄壮的歌声传来。虽然它邻近徐州,但仇货是绝对看不到的,资敌物资也没有出境的(连由他们经过的也没有)。”这就说明,通过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已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使日军侵占萧县近一年时间,找不到汉奸基础,拼凑不成维持会。一年后,日寇在三区后洼村设立据点。因在送给养的路上,不断受到自卫队、游击队的伏击,据点周围被抗日群众挖

了抗日沟，挖断了所有通往据点的大路，把据点围得水泄不通，逼得日本侵略军只呆了一个多月，便自行撤退。

在向农民进行政治动员的工作中，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针对农民的特点，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生动的政治动员，二是具体的抗日工作，三是巧妙的抗日与生活联系。以巧妙的抗日与生活联系为例，《萧县农民救国会工作纲领》在“参加抗战”一章中，列举了五项任务：第一项是参加本会及其它民众团体；二是烧茶、带路、打扫房屋，供应用具，实际帮助部队；三是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供给鞋袜、给养和经费，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侦察队、慰劳队、洗缝队、看护队，帮助抗战部队；四是动员农民加入自卫队、游击队和正规军；五是发动农民实行地方戒严和坚壁清野，困饿敌人，肃清汉奸敌探。以上五条，都作为参加抗战的实际行动，这就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抗战救国的大目标联系起来，农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被看作同前方拿枪打敌人一样光荣。参加各种抗战团体的群众，成为各项抗战工作的坚强后盾，这就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我们的后方。

在发动民众的工作中，抗日民主政府始终坚持我党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情况下的各种阶级关系，尤其注重处理好农民与地主的利益，既照顾农民的利益，也照顾地主的利益。例如，减租减息只要求灾区实行；优待对象只限于军属；救

济对象只限于难民。并实行赋税合理负担,废除高利贷,成立合作社,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的权利等。

由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严守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政治动员工作做得细致深入,民众发动得广泛,因此成为周边各县抗日的榜样。永城、砀山、灵璧等县都先后派人到萧县参观学习。

抗日救亡团体的普遍建立,民众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使大批群团干部得到锻炼而迅速成长,为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武装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敌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第四节 敌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坚持“武装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主力军作战”的基本方针,领导全县的抗日武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广泛深入的敌后游击战,主动地、灵活地打击日伪,铲锄汉奸,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扰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在1939年秋至1940年春这段时间里,数次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威力。这里,简述几次比较有影响的战斗,以反映萧县敌后游击战开展的基本状况。

攻打张大屯

萧县青红帮头子、汉奸大地主纵馨亭(外号纵二别

子),在萧永边境的张大屯设立据点,充当日本鬼子的耳目,干扰和破坏我抗日游击活动。新组建的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决定拔掉它。1938年11月初,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包括十七、十八、十九大队)及二十大队,于拂晓前包围了张大屯。十七大队中队长李忠信率先来到纵二别子的大门口。纵的大门紧闭,门前又是一片开阔地,无法靠近,只好退到场屋、车屋旁向院里射击。二十大队从东北角过了壕沟,在纵的堂屋后面向院内扔手榴弹。十八、十九大队因地形不熟,趴在东面围墙外待命。纵的围墙高,又有炮楼,易守难攻。直围到中午以后,接到情报人员送来的黄口车站鬼子出发的信息,遂撤出战斗。在撤退中,十八大队胡驰先同志头部中弹牺牲。

1939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听说在纵二别子门口唱大戏、聚赌,按照纵的说法:是为了弄几个扁食馅子钱好过年。在中心县委的部署下,由二十大队指导员张登先率麻瑞全、张宝元等17人,暗带短枪,混杂在听戏的人群中相机行事。下午3时许,活捉了纵二别子,当场夺了六支步枪,晚上纵家又送来七支步枪。次日早饭后,二十大队行军至王汉集东北,枪决了汉奸纵馨亭,扫除了地方上一个抗日的障碍,也使萧永边境的抗日烽火联成了一片。萧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三打徐楼

徐楼地处萧九区,是我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地带。徐楼

大地主李忠镐，外号李七猴。他公开勾结曹村车站的鬼子，拉来土匪张秉衡等40多人，挂起太阳旗，自设据点。我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拔掉这个据点。1938年12月18日晚上，十七、十八、二十大队和贾兴兰的游击队，齐集白土寨南边的古庙附近。县长彭笑千在庙里召开军事会议，由三支队大队长孙象涵部署战斗任务：十八大队部署在徐楼的东南部，二十大队在西南部，贾兴兰部在北部，十七大队扼守东部大、小山口，阻击从三堡、曹村增援的鬼子兵。战斗从19日清晨打响，战前也曾向村里喊话劝降，无效后即发起进攻。敌人紧闭寨门，固守寨墙，几次进攻无果。上午九点钟左右，曹村的敌人前来增援，与我十七大队在大山口展开激战。我十七大队无打援经验，远距离火力不强（短枪占多数），又存侥幸心理，认为鬼子不一定来。结果，被敌人打个措手不及。在与鬼子短兵相接中，我十七大队大队长王振全、中队长沈凤鹤及胡道恂、李忠印等七八位同志牺牲，十多位同志受伤。前方指挥所闻讯后，迅速撤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二区休整。

隔了一个多月，萧县中心县委请正在萧宿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六支队滕海清部支援，由二总队副总队长孙象涵率五连（原十八大队）配合，再次攻打徐楼。1939年2月11日，部队集结在永堙，黄昏后请来皇藏乡乡长徐明轩介绍徐楼的情况，连夜出发。到土盆村后，先派人装扮成过路部队要茶水，想趁敌人开门时乘机而入。敌人很警

惕，不愿开门。当战斗打响后，李七猴又令民众在围墙周边防守。发起几次进攻，没有攻破围墙，又怕过多伤害民众，遂令部队撤离。

两次攻打徐楼不下，李七猴怕我再攻，即把能搬的东西全装上车，携带全家逃往徐州。我九区政府于3月14日进入据点，开仓济贫，拆除工事，当地群众称之为“三打徐楼”。

在萧西枪毙了纵二别子，在萧东赶跑了李七猴，让汉奸闻之胆寒，有效地阻止了敌人随意设置据点的行动。

罗里战斗

1939年10月14日，驻濉溪的100多日伪军向北“扫荡”，萧县常备总队命令驻瓦子口、程蒋山、刘窑的二营进行伏击。扼守程蒋山的二营三连二排，共3个班，50多人，有1挺捷克式机枪。上午9时许，敌人接近二营阵地。敌方的队形：前锋为伪骑兵，约30人；中间为伪步兵，40多人；后边是日军步、骑兵，约50多人。当敌人进入三连二排伏击圈时，遭到猛烈的射击。敌人继续前进，没有还击，他们想从瓦子口过去包抄我军。敌人行至刘窑附近，三连一、三排及一连进行正面伏击。二连谢长恒原打算率部过山西到总部待命，走到老岱河发现敌情后，立即指挥部队凭借河堤投入战斗。敌人受到三面夹击，狼狈而逃。三连二排居高临下，毙伤敌十余人。有两名日军一名伪军，逃到罗里村东边一个小洼坑内，被我团团围住。我

们以小树林和坟头作掩护，边射击边喊话，敌人拒不投降。二连长谢长恒、三连二排六班长胡传林与战士王启昌，把手榴弹往坑内扔，趁着爆炸的烟尘冲上去一看，坑内抛下三具尸体。三具尸体中有大尉松井谷治，他是这股日军的头目。谢连长与胡传林各缴获三八式步枪一支，王启昌缴获龟头盒子一把，还有军用地图、指挥刀、望远镜等战利品。此外，二连还缴获一匹战马。

大吴集战斗

1939年12月5日，驻徐日军一部500余人，骑兵数十名，汽车3辆、大炮2门、小炮数门、轻重机枪数十挺，以汽车为先导，经陶楼、曲里铺等地向我大吴集进犯，妄图在大吴集设立中心据点，联防三、四、五、六区。由冯家平、程祖光率领的萧县常备总队一营，孟昭林、纵瑞香率领的萧县常备总队三营与萧支支队长吴信容率领的萧支二营，部署在阚楼、吴蒋庄、大吴集一线。

7日拂晓，敌人进入吴蒋庄，遭萧常三营阻击。萧常一营二连、三连强占了有利地形，可以随时给三营以支援，使敌人无法前进。敌人调集炮兵密集地向三营阵地阚楼发炮，直打到太阳快要平西。这时，敌人沿公路以北悄悄地向大吴集方向转移。敌人走到大吴集附近，又遭支队长吴信容率领的萧支二营猛烈痛击。因太阳快要落山，敌人焦急，不仅发疯似地用机枪扫射，还丧心病狂地施放烈性毒瓦斯和烟幕弹以掩护其逃窜。我军在追击敌人中，打

死打伤敌人 70 余人。是役，我军牺牲一名，轻伤七名。

三十六天反“扫荡”

1940 年 3 月 16 日，日伪 2000 余人（骑兵数百人），分五路“扫荡”萧、宿、永、碭地区，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歼我主力，扩大伪化区，以减少对徐州及铁路交通线的威胁。他们在萧县瓦子口、王寨、大吴集、张新集、张寿楼、祖老楼、周大楼、青龙集、王白楼、袁圩、张大屯、胡屯、曲里铺增设据点，采取步步为营，梳篦战术，日夜纵横出犯，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们采取的对策是：一、三总队转至外线作战，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使敌人处处扑空，失去主动。我区乡武装和游击小组、基干民兵则采取“人不离乡，枪不离人，到处鸣枪，就地纠缠”的麻雀战术。两者结合，加之坚壁清野，使敌人行动时“如入无人之境”，宿营时则遭“四面楚歌”。

我主力转移外线以后，先后打击了王白楼、李石林、张大屯出犯之敌，袭击了黄口车站、张大屯，围攻王白楼，血战阎井、蒋庄、丁楼。此时，区队武装和各乡镇游击小组、青年基干民兵，也积极配合主力捉汉奸，扰敌人，十分活跃。半月之内，仅一总队就击毙了敌人佐野联队长、北山大尉、板木付平少尉等以下官兵数百人。敌人恼羞成怒，集中日伪 3000 余人，于 4 月 1 日晨分四路向我进攻。敌我大战于山城集附近之僖山、磨山、李黑楼等地。我军利用壕沟等有利地形，猛击密集来犯之敌。经过一天恶战，

打死打伤日伪 300 多人，终于把敌人打退。

是役，我一总队队长鲁雨亭壮烈殉国。萧县县直干部张雪亭、卓汉章，四区区委书记、洪河大队教导员张祚瑞，洪河大队中队长杨振瀛等五、六位同志牺牲。县长纵翰民同志手部受伤，洪河大队 300 多人伤亡惨重。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粉碎了敌人要将我一网打尽的企图，取得了 36 天反“扫荡”的辉煌胜利。

第五节 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党组织

萧县沦陷前，上级党组织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黄口附近孙庙村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一次是徐西北区工委在丰县召开的丰、沛、萧、砀、铜五县党的负责人会议。这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是要求各县在抓好党领导下的武装及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注重审查和吸收新党员，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萧铜工委、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积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在恢复和建立了李酒店、冯瓦房两个党支部之后，又恢复了孙大庙村孙福田、王楼村张元清、王胡寨村杨元章、刘庄村孙清怀的党组织生活。同时恢复和发展的党员还有二区的杨兴瑞、杜玉堂、葛玉环；三区的孙大兴、戴世雅、孙成绪；四区的张祚瑞、王长信、张祚兴、张长文；六区的孙敬祖；九区的毛庭霄等。这些恢复党籍和成为新党员

的同志，有的当了区委书记，有的当了区长，有的当了农会主任，有的分配到部队工作。到1938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140多人，建立了16个党支部，30多个党小组。

中共陇海路南区工委隶属于陇海路北萧铜工委领导。随着形势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形式也不断有所变动。1938年7月中旬，中共徐西北区工委派尹夷僧、张如到陇海路南区工委及其游击队驻地吴丛林，宣布徐西北区工委的决定：一、萧县路南区工委改为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属徐西北区工委领导。二、萧县抗日游击队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七大队。这时，萧县工委与陇海路北萧铜工委已为平行关系。

1938年10月，中共苏鲁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决定撤销萧县工委，成立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派戴蕴山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李忠道任组织部长，孟宪章任宣传兼军事部长，后增补纵翰民为委员，任统战部长。中心县委辖萧县（陇海路南）、宿西、永东、砀南四县的党组织，属苏鲁豫特委领导。1939年4月，陇海路北萧铜工委改为萧铜县委，书记路继先，委员有朱玉珂、路涤生、朱传真、李华农、徐传祥、王清惠，属苏鲁豫区党委领导。1939年6月底，特委决定戴蕴山调任湖西地区任鲁西南地委书记。7月，李忠道接任中心县委书记，增补陈继仁为委员，任组织部长。193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电示，中共萧县中心县委转属豫皖苏区党委领导。12月，区党委派辛程任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陈继仁调任宿西任县委书记。此时，萧县中心县委、萧铜县委分属新四军、八路军领导。当时是党组织与武装分属两个地区领导，萧县陇海路北七、八区行政关系仍属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至1940年春，因受日伪顽夹击，萧铜县委转至陇海路南活动，至1941年东撤时结束。

1940年9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豫皖苏区党委决定撤销萧县中心县委，成立陇海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委员有何启光（组织）、张继成（宣传）、纵翰民等，辖萧县、宿西、永东、砀南。同时成立萧县县委，书记辛程，委员有纵翰民、戴世雅、夏峰、赵海丰、孙明远、孙清淮、张建淮。

这一时期，萧县党组织发展很快。由1938年初陇海路北的六七十名党员，陇海路南的20多名党员，发展到1939年底的1700多名党员。发展党员的主要形式是举办抗日训练班，通过培训抗日干部，发现和培养建党对象，发展新党员。1939年春，萧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忠道开始在四区张寿楼、崔口、小阁子等地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50人，时间半个月，对象是愿意抗日的各界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戴蕴山、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等同志分别到训练班讲课。李忠道、陈继仁在训练班负责发展党员，条件是坚持抗日，自愿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过考查即可入党。每期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分赴各区、乡参

加抗日活动。自上而下建立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至1939年夏，各区区委会相继建立，一区区委书记李继昌，二区区委书记杜玉堂，三区区委书记孙大兴，四区区委书记王长信，五区区委书记张建淮，六区区委书记田启松，七区区委书记许广陶，八区至1939年底建立区委，区委书记李华农，九区区委书记毛庭霄，十区未建立区委。至1939年秋季，县一级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分别建立起来，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这些抗日团体的乡组织，大多都有要发展的党员对象，或者已经有了党员，或者已经建立了支部。中心县委巡视员陈继仁，协助李忠道以民运科的名义，到各区乡发展党的组织。

在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的同时，注意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39年2月，萧县中心县委在六区阡楼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或区指导员，党员区长和群团组织党员负责同志，一共50多人。此会由戴蕴山、李忠道、纵翰民轮流主持，会期七天，主要传达贯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大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对党员干部教育很大。当时，在经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印刷一些重要文件和书籍，供党员、干部学习，学习气氛很浓。

萧县中心县委加强对宿西、永东、砀南党建工作的指导与帮助。1939年4月派杨元章去砀南开辟新区，在那里

发展党组织,建立了砀南县委,发动群众抗战。在永城东部及宿西地区,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永东支部负责人是盛瑞堂,宿西工委负责人是李时庄。1940年初,萧县中心县委又派陈继仁任宿西县委书记。萧县中心县委与上述三个地区的联系,一是请来汇报工作,二是派人去检查督促,三是帮助培训干部,使这三个地区的抗日工作发展很快。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对萧县党组织的领导是直接领导区委(未设立萧县县委),至1940年9月撤销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成立中共陇海路南地委时,始单独设立中共萧县县委。此时,全县党员1800余人。

第六节 发展地方武装,壮大主力部队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高度重视抗日武装的发展工作。地方武装的不断壮大,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伪,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也为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1938年9月上旬,奉湖西特委指示,由萧县工委书记李忠道率领十七、十八大队,去丰县参加讨伐汉奸王歪鼻子(王献臣)的战斗。参加此役的有丰、沛、萧、砀、金乡、鱼台等县武装,共4000余人。战斗自9月8日开始,至20日王献臣部撤退结束。十八大队先行回萧。十七大队留在路北整顿,并将十五大队(150人)并入十七大队,大队长

改由王振全担任，魏佑铸任指导员，于10月中旬返回萧县。十七大队回县后即与十八大队在王寨会合，由两大队各抽一部分人，加上种继臣从永东带来的二三十人，组建了第十九大队，由许致远任大队长，孟宪礼任指导员。此时，十八大队大队长由谢继恩担任，指导员为梁鸿志（顾寒星）。不久，这三个大队合编为一个支队，番号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孙象涵，教导员尹夷僧。

10月底，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决定以萧县六区联庄会武装为基础，组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大队，大队长吴信容，指导员张登先。二十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由马井联庄会的马立勋、马立业与袁金玲的自卫队组成，中队长麻瑞金；二中队由六区的联庄会自卫队组成，中队长张元宝；三中队由刘瑞岐、黄立中的游击队组成，中队长黄立中。听说陇海路边郝寨至王闸口一带建立了伪组织——爱护村（为鬼子护铁路的），黄振明在爱护村任团长。11月下旬，三支队决定派十九大队去瓦解这个伪组织。大队长许致远通过地方士绅做黄的工作，使黄发誓不当汉奸，愿意将爱护村的伪武装200多人改编成抗日游击队，随十九大队一起活动。许致远临机将这支队伍称为二十一大队，大队长刘重英，指导员刘以清（后十九大队去丰县，二十一大队即交给县政府）。与此同时，陇海铁路北耿继勋（耿聋子）的游击队，被敌人打垮后跑

到萧县六区，编为二十二大队。耿继勋部在萧县活动四个多月后，于1940年3月返回路北。以上二十一、二十二大队均系自编，不属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序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部队发展之快出人预料，二总队给萧县的番号已不敷应用。

1939年1月1日，奉湖西特委指示，萧县十七、十八、十九大队与宿县二十一、二十二大队，由耿蕴斋带队到达丰县的欢口、王楼一带，改番号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简称苏支）。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亦到达丰县，两支部队会师后由湖西特委组织联欢。在联欢会上，特委书记白子明讲话：宣布将十七大队编入苏支二营，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大队合编为三营七、八、九连，营长由郭廷万担任。十八大队暂未编入，返回萧县。1939年3月郭营南下，在相山窝与苏支二营合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祚（原苏支参谋长），政委王鸿鸣（原苏支政治处主任），参谋长阎立荣，政治处主任罗有荣。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武装编入苏支后，湖西特委决定仍以二总队的名义转移到陇海路南继续发展武装。二总队的领导人员是：总队长耿蕴斋，政委张如，副总队长孙象涵，参谋长孙鹤一，政治处主任耿荆山。此时，路南武装尚有十八大队、二十大队及孙象涵所带的三支队警卫连。

1939年3月，张登山带领二十大队送耿葺子的部队

回陇海路北，祖老楼的刘长松带来 40 多人，与麻瑞全中队合编成新二十大队，大队长仍由吴信容担任，指导员程祖光，刘长松为大队副。3 月中旬，进入路南的二总队，为了发展武装，实行东西分进，总队长耿蕴斋率总队机关部分武装向萧县西部活动。副总队长孙象涵率原三支队警卫连东进萧宿铜，老二十大队也随同前往。东西分进一个多月，武装发展到 2000 多人。5 月 13 日，二总队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集中在二区梧桐村，奉命改编为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耿蕴斋任大队长，蓝廷辉任政委，孙象涵任副大队长，耿荆山任政治处主任。七大队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吴信容，教导员张登先；二营营长李仁山，教导员魏佑铸；三营营长王运来，教导员梁鸿志。至此，二总队已不复存在。6 月，苏鲁豫支队东进萧宿铜灵开辟新区，在温山遭日本侵略军七路围攻，激战竟日，当晚撤到萧县二区休整。7 月，吴法宪率苏支一大队（胡炳云大队）东进，孙象涵率游击七大队三营及机关直属队一部 700 余人随吴法宪向东进发，至皖东发展到 1200 多人。10 月，取消七大队番号，改为苏支四大队，继而改为独立大队，为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五团的前身。耿蕴斋率游击七大队一、二营及机关直属队一部，随彭明治配合苏支主力向萧永夏一带开辟根据地，到达萧永边即与苏支三大队、独立大队（藉兴科大队）合编为苏支三大队，大队长耿蕴斋，政委郭影秋，大队副藉兴科，参谋长蓝廷辉，政治处主任耿荆山。

备总队一、二、三营(约 1400 余人)编为新四军六支队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耿蕴斋、政委李耀,政治处主任宋治民,参谋长陈景龙。同年 8 月,编为八路军四纵队特务团。县常备总队四营营长刘瑞岐不听调遣,把四营拉到陇海路北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五营活动在津浦路东,后由教导员沙枫带到皖东北,编入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支队第一团。

1939 年 7 月,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将萧县一、五、六区几支游击队联合在一起,在蒋新楼成立了萧县抗日游击支队(简称萧支),从苏鲁豫抗日游击支队调回吴信容任支队长,中心县委宣传兼军事部长孟宪章兼任政委,张登先任副支队长,崔文彬任政治处主任。不久,孟宪章调津浦路东工作,由姚运良继任。同年底,宿西相山大队编入萧支。萧支为三个营的建制,一营营长麻瑞全,教导员张曼平;二营营长张登先(兼),教导员赵剑鸣;三营营长李秉枢,教导员周从裕。1940 年 8 月,萧县抗日游击支队编入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八团(后又恢复新四军番号),吴信容任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团长。同时,萧县抗敌总队亦编为四纵队特务团,总队长耿蕴斋调任豫皖苏保安司令部任司令。

从 1939 年冬开始,日寇加紧了对沦陷区的控制。至 1940 年,日寇在萧县境内设置的据点增至 40 多处,进行频繁的“扫荡”。各区、乡在反“扫荡”中重建起游击队,特

别是经过1940年4月份一个月反“扫荡”的严峻考验，游击队经受了锻炼。5月，萧县中心县委决定将各区游击队集中整编，组建萧县独立团。该团由赵海丰任团长，李忠道兼政委，王静敏任政治处主任，康平任参谋长。下辖五个营，一营营长朱大清，教导员田启松；二营营长祖玉恩，教导员葛玉环；三营营长孙成绪，教导员毛庭霄；四营属中共陇海路北萧铜县委；五营营长张长海，教导员王长信（王保哲）；六营营长李祥龄（后为李华农），教导员朱玉珂。独立团成立不久，又将五个营整编为四个营，各营分散在各区多次对敌主动进攻。

耿吴刘叛变后，为了巩固这块抗日根据地，对付日伪顽的进攻，1941年1月25日，奉上级命令，成立萧县独立旅。萧县县长纵翰民兼任旅长，中共陇海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兼政委，康平任参谋长，陈其五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一团由萧县独立团编成，团长赵海丰，政委由中共萧县县委书记辛程兼；二团由萧县特务营和主力部队一个营合编而成，团长孟振声，政委王静敏，副团长周纯麟。

1941年3月下旬，萧县独立旅接四师师部命令，由李忠道政委、康平参谋长带队赴涡北参加反顽斗争。兼任独立旅长的县长纵翰民和兼一团政委的萧县县委书记辛程，仅留二团三营随县委、县政府就地坚持。3月31日，他们与土顽及叛军吴信容部在罗河打了一仗，于当日傍晚

抵达徐暨一带宿营。4月1日晨，萧城、滩溪口、蔡里、祖楼、朔里、瓦子口的日伪约700多人，分五路向徐暨方向分进合围。战斗开始，我方看出了敌人分进合击的企图，将兵力作了如下部署：命令三营一部抢先占领制高点，运用有利地形牵制敌人；三营的另一部与八区区队配合向西突围；“亢营”的一个连与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沿山沟向东突围。经奋力拼搏，两路人马均突出重围。在突围中，“亢营”和二团三营各伤亡20多人，三营三连指导员吕渭滨和八区区队长李祥林壮烈牺牲。正是由于他们的英勇顽强，才使县委、县政府突破重围，得以安全转移。

1941年4月，根据四师命令，将萧县独立旅改编为新四军四师三十四团。团长张永远，政委李忠道，副团长张登先，副政委陈其五，政治处主任刘增奎（刘野亮）。之后，该团撤往皖东北。

1938年夏到1941年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县发展了六个团的抗日武装，计8300多人。规模较大的有：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五至二十大队、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萧县常备总队、萧县抗日游击支队、萧县抗敌总队、萧县独立团等。此外，还有遍布全县各地的不脱产与半脱产的游击小组，号称上万人枪。此间，萧县地方武装四次升编为主力部队，使苏鲁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主力部队不断壮大。

第六章

抗战道路上的挫折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在苏鲁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我党干部队伍中的“左”倾情绪有所抬头。少数领导干部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自身党性不强，理解与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水平不高，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处理重大问题时，推行“左”的一套，有时甚至带有宗派主义倾向，而且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粗暴。他们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给个别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不仅破坏了根据地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也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萧县的抗战工作深受其害。

第一节 东任台子事件

1939年3月15日，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两个连、八

路军苏鲁豫支队两个连、二总队的第十八大队等抗日武装借“联欢”之名，把宿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约300人，中队长张正福）当作“土匪”部队强行收编，造成打死打伤近百人的震惊萧宿边境的“东任台子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宿县沦陷后，于1938年11月成立了中共宿县县委，李时庄任书记。他们除抓紧发展党员、重建区委、支部外，还积极动员游击队上升为主力部队。原烈山游击大队第二中队，此时已编为宿县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张正福积极要求归属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引起同时拉起游击队的张鹤岭、张正尧的不满。张鹤岭原是国民党的联保主任，烈山游击大队第三中队是他拉起来的，张正尧是烈山游击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

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萧宿边境会师，萧县县委、县政府热情欢迎他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领导扩大武装的要求很强烈，张正尧等人趁此时机，利用关系到萧县进行阴谋活动，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张正福的部队是“土匪”，是萧宿边境的“一害”，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收编他们，把张正福的部队消灭掉。张正福的部队，一是素质较好，一部分来自矿工，一部分来自农村青年；二是武器装备也较精良。他们的枪支是国民党部队从徐州撤退时丢下的，还有重机枪和迫击炮。这支部队此

前曾到萧二区活动，二区也感到有威胁，萧县个别领导人亦有同感，就与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领导商量解决张正福部队的办法。

二团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会上，有人建议“设伏智取”，即邀请张正福的部队联欢，趁联欢之际吃掉它。因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刚到萧宿地区，两支抗日武装和当地抗日游击队在一起联欢是正常的事。趁联欢出其不意收缴张部的武器，大家认为此法可行。形成决定后，先向各营、连干部传达：以在萧县二区东任台子开联欢会的名义，强行收编张部。在举行联欢会的前一天夜里，团领导再次向营、连干部强调，因张正福部是“土匪”部队，要提高警惕，注意信号，吹哨子即是动武的信号。

游击支队二团向张正福的部队发出邀请后，于3月15日中午，游击支队二团两个连、苏鲁豫支队两个连、二总队的十八大队等部队都赶到了东任台子会场。张正福的部队按照邀请，也自东南方向以行军队形进入会场。不少人还换了新衣服，理了发，武器擦得明光闪亮，特别是那十多挺崭新的轻机枪，更是引人注目。张正福的部队被安排在会场中间，面对讲台，游击支队两个连、苏鲁豫支队两个连、二总队第十八大队等分别坐在张正福部队的左、右、后三面。讲台是用农民的车、门板等搭起来的，类似农村唱戏的戏台。

下午4时左右,联欢会开始,游击支队二团负责人和张正福先后上台讲了话。嗣后,游击支队二团负责同志宣布照相,将部队作了调整,双方干部花开坐在台子前,以表示亲热团结。张正福部队的轻重机枪摆在部队的前面,紧挨着干部。接着,主席台上令双方部队架枪,台下即骚动起来。这时,游击支队二团负责同志态度严肃起来,高声喊:“还不架枪?”因他不是当地人,口音不同,台下把“架枪”误听成“缴枪”。话音刚落,台下向台上打了一枪,台子上二团的警卫员应声倒下。台上吹起哨子。早有准备的游击支队二团、苏鲁豫支队与十八大队,听到哨声,立即抢起架在台前的张正福部队的轻、重机枪,一齐向张正福的部队开火。一阵猛射,仅3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战斗”。经打扫场地,张正福部队被缴械的七八十人,当场被打死、打伤的七八十人,逃跑中被打死的二三十人,另有一部分跑脱,张正福本人被当场打死。共收缴张正福部队的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多支,驳壳枪50多支,迫击炮2门。

张正福率领的宿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是中共宿县县委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事件发生时,宿县县委书记李时庄也在现场。既没有人打他的招牌,更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关于强行收编张正福中队之事,现场目睹这一事件全过程的萧县党政军负责人有:中心县委委员、统战部长纵翰民,县长彭笑千,从萧县走出

去的二总队总队长耿蕴斋，副总队长孙象涵等。事件发生后，部队上下议论纷纷，一些领导干部也认为，这种做法显然是犯了“左”的错误。

东任台子事件是抗日武装之间自相残杀的一场悲剧。该事件导致近百名抗日官兵被打死打伤，在萧、宿、永、砀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恶劣影响，产生了不良后果，致使一些本来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脱离了我们党，跑到国民党顽固派和伪军那里去了。

建国后，有关单位和部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求证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终于在1994年澄清事实，给张正福和其领导的第二中队以及其他受牵连人员予以平反昭雪。

第二节 湖西“肃托”

震惊全国的湖西“肃托”事件，萧县本处于漩涡之中，但由于萧县中心县委的抵制及归属的变动，得以幸免。萧县党政军干部虽未遭迫害，但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也祸及萧县。

1939年8月下旬，李忠道任萧县中心县委书记不久，接湖西区党委通知，要他去余王庄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地、县委书记会议。他准时赴会。在此之前，李忠道根本不知道“肃托”是怎么一回事。离余王庄老远，就发现岗哨密

布，戒备森严。进村后，见人人神情紧张，李忠道凭直觉猜想，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一些熟人偷偷告诉他：“区党委正在抓‘托派’，很多人都被逮捕了！”他还听说，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和宣传部的一名科长、区党委特务营营长孟宪琛等人都是“托匪”，已经被枪毙了。突然听到这些意外的消息，不能不使李忠道思想上产生疑虑，难道我们队伍里一下子出了这么多托匪？对自己的同志大开杀戒，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李忠道想不通，直接去问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白对他说：“你不知道，托匪很顽固，不打他不会招认的。”他显得很自信的样子。

会上，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分别介绍了“肃托”情况。白子明也在大会上讲“肃托”的正确性和胜利，似乎一点也不容置疑。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到会的地、县负责同志一共七人，会后有四人被扣下，说是有托派嫌疑。当时，弄得人人自危，气氛十分紧张。

“肃托”的起因是：边区湖边地委办的新党员训练班，在学习结业前分配工作时，一部分学员不想分配到外地，提出“哪里来的要分配到哪里去”的要求，与湖边地委组织部统一分配的方案不一致。加上一部分农民党员要求回家收割麦子，训练班不予准假，有的偷偷地跑回了家。地委领导人发现这些情况很惊慌，怀疑是托匪破坏，便派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到训练班了解情况。就这样，“肃托”工作领导权便落到这个来历不明、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手

里。他首先找学员谈话，捕风捉影，甚至连学员讲梦话也说是托派活动。他们将训练班教员魏定远、学员曹广善逮捕后，用严刑逼供的违法手段，迫使他俩承认自己是“托派”。接着，又逼出了所谓“托派组织”，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从训练班蔓延到鱼台等县，最后发展到区党委机关和边区很多地、县，连在那里的主力部队也卷进“肃托”了。一大批无辜的同志被逮捕，被杀害，包括许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党政军干部。

李忠道从余王庄开会回来，心情十分沉重。在回路南的途中，遇见正准备赶往路北参加“肃托”的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及其他领导同志，李忠道向他们讲了路北“肃托”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并请他们用电台向山东分局汇报，最好由分局派人来解决问题。李忠道回到萧县中心县委驻地大约十天，便听到更坏的消息，连给他们开会报告“肃托”情况的王文彬、张如同志也在群众大会上被枪毙了，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以及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等同志也被逮捕了。“肃托”的矛头还指向部队，逮捕了苏鲁豫边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李贞乾、八路军苏支副支队长梁兴初和苏支三大队政委郭影秋。这时的“肃托”已不限于逮捕杀害边区机关的干部了，而且还把边区各县区以上大部分干部集中起来，一批批逮捕杀害和软禁监视。各级党政军干部有五六百人被逮捕，惨遭杀害者近300人。就这

样，湖西区党委在被坏人操纵把持下，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

1939年9月上旬，区党委书记白子明通知李忠道，限他在三天时间内把萧县中心县委区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带到陇海路北指定地点去参加“肃托”。接信后，李忠道和中心县委成员很为难。他们有三点顾虑：一是这么多干部通过日伪、顽封锁线，还需要在敌占区住一宿，目标很大，怕遭敌人袭击；二是离开这个地方，日伪顽会来占据，我们会失去立脚点；三是这些干部去了，怕有被错杀的危险。萧县中心县委在四区崔口小学召集区以上干部开会，讨论了好几天，发言很激烈。总之，大家都不愿意去，不去又怕被说成不服从组织决定。大家正在为难，心情十分焦急的时候，豫皖苏边区党委派刘作孚送来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给山东分局的电报，特转知萧县中心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为了今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陇海路南、津浦路西、原属山东分局领导的这一地区的党、政、军都划归中原局豫皖苏边区党委领导。接到电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有救了。于是，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陈继仁带着中原局的电报，到湖西区党委找白子明汇报。白看了电报后说：“各地方‘肃托’都差不多了，就是你们路南没有搞了。我们不管了，让他们（指豫皖苏边区党委）去肃吧！”至此，萧县中心县委及几个县的干部才免遭其害。

同年10月,李忠道、陈继仁等同志到豫皖苏边区党委接关系时,向彭雪枫、吴芝圃等领导同志汇报了萧县中心县委的工作和湖西“肃托”的情况。彭雪枫听了汇报后笑着说:“你们不是托匪,是共产党,路北犯了‘肃托’中心论的错误。”

11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人日夜兼程,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肃托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解救了一大批同志。王须仁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杀。另一个冤案制造者、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则叛变投敌,当了汉奸。

萧县虽幸免于难,但事件对萧县的影响很大。首先,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了。一些原来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听说路北“肃托”整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吓得不敢入了。其次,陇海路北的日伪顽控制地区扩大了,八路军过陇海路到萧、宿、永地区,过津浦路到苏北支援新四军反顽斗争的交通线不畅通了。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对该事件曾作过多次处理,但因战争环境所限及“左”的思想影响,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1983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明确指出: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

第三节 王白楼子会议

1939年底,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运科长孙叔平、副科长张舒民正在张寿楼小学办抗日训练班,豫皖苏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到萧县检查工作时,当面质问孙、张二人,为什么让彭笑千当县长?周认为,彭不是中共党员怎么能当县长呢?孙、张向他汇报了萧县沦陷后的形势及萧县党组织把彭笑千请出来当县长的经过,并反问周季方:“不让彭笑千当县长让谁当呢?”1940年2月初,周季方又到萧县部署改造政权工作。他强令县委三日内接管县政府大印。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大印呢?它是国民党县政府留下来的,这块铜印也并不在彭笑千手里,而是保管在一位工作人员手里。实际上,周季方是要把彭笑千赶下台,换一位共产党员当县长。

如何执行这一指示,县委很为难。彭笑千正干得有声有色,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干呢?况且,他又不是自己要干的,是我们“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的。他在国难当头之际走马上任,任县长两年多以来,堪称政绩卓著。萧县能成为被八路军与新四军称赞的抗日模范县,彭笑千功不可没。就是这样一个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出突出贡献,有才干、有威望的党外同志,怎么能说一声不让人家干就让人家下台呢?这让人家怎么看我们的干

部政策呢？虽然思想不通，但是还得服从，因为这是上级党的决定。

萧县中心县委书记李忠道，先找与彭笑千工作上配合得最好的县政委员会中的“萧县三杰”（即孙叔平、纵翰民、张舒民）商量，让他们出面做工作，不使彭笑千感到愕然。“萧县三杰”分头去找彭笑千，与他个别交换意见。他们首先分析了萧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的特点：一是早，萧县沦陷不到三个月就建立了起来，比周围各县都早；二是广，全县十个区，108个乡全部建立了政权，无一空白；三是和平建立的，没有经过斗争。一些区、乡政权，特别是乡一级政权，有的是旧政府人员占优势。这和彭笑千当县长有一定关系，因为旧政府人员只要愿意抗日就同意他继续干。平时，倒没有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党掌握着武装，并且在群众中有威信，局面尚能控制。一旦形势起了变化，就会出问题。自去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国民党特务进来了，国共磨擦开始了，有些乡政权旧人员已不听话，有的在观望犹豫。为了坚持抗战，必须改造政权，撤换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的地方士绅。经过交谈，彭也认为局势起了变化，自己也看出了这些问题，也感到工作起来有人在捣乱。他同意撤换一些人，但不愿意自己去做。他说自己同这些人旧关系太深，下不了决心。特别是沦陷后，今天跑到这家，明天跑到那家，受过他们的保护，现在要撤换他们，下不了手。因此，

他提出暂时离开，由县委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权改造，过一段时间再回来都可以。

彭愿意暂时辞去县长职务，这样工作就好做了。党组织还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他走后谁接替他的职务最合适。他建议由行政科长许西连代理，以后再根据情况按程序选举县长。

1940年2月初，萧县县政委员会在王白楼子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彭笑千外，还有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许西连、耿蕴斋、崔健吾、王子石、马济民、纵止韩等。与会人员首先讨论形势，由孙叔平讲国民党反共给全国抗战带来的危险。同时指出，萧县国民党也和其它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样，积极反共，破坏萧县的抗战局面，准备投降，这是我们不能答应的。接着，李忠道讲了话。李是萧县中心县委书记，虽然当时党组织没有公开，可大家都知道他是萧县党组织负责人。他说：“萧县的抗战局面是共产党领导民众打开的，萧县的国民党不与共产党合作，却与顽固派朱大同相勾结，破坏萧县团结抗战的局面，宣传反共，制造磨擦，我们共产党人已经不能再容忍了……”这时，萧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子石有点紧张，一再表示他没有反共。彭笑千说：“反共就不能抗战，反共就会向日本投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在政府中的作用已经过去了，今后要发生严重的斗争，我不适应这种形势，需要比较积极的同志担任这一工作。在未选举

之前,我建议由县政府行政科长许西连代理县长职务。”这个建议获得大家同意。此后,彭笑千调任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行政处长。

1940年3月8日,新四军六支队、豫皖苏边区党委主办的《拂晓报》,刊登了2月27日六支队政治部于精忠堂开会欢迎彭笑千的消息:“萧县县长彭笑千先生于萧县沦陷前,即在萧县领导民众参加抗战。自萧县沦陷以后,为了开展萧县游击战争,实现蒋委员长‘变敌后为前线’的指示,两年以来,协同本县各党各派及社会先进人士,历千辛、冒万苦,率萧县数十万民众,英勇奋斗,动员民众,组织武装,改革行政,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使今日的萧县成为豫皖苏边区游击区实现三民主义的榜样!近因操劳过度,政躬欠和,特来后方休养。”此时,彭笑千正积极向党靠拢。

1940年3月初,豫皖苏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再来萧县,在三区王塘召开全县干部会议,怒气冲冲地批评萧县右倾,指名道姓地指责孙叔平为右的代表。不久,孙叔平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任训练部长,后任教育长。

周季方坐阵指挥萧县的政权改造。一夜之间,不通过县长把区长换掉,不通过区长把乡长换掉,全县几乎换了一遍。十区区长李瑞卿被撤换以后,觉得自己是县政府委派的,不干了,应该向县政府打个招呼。此时,许西连代理

县长。李向他回报说：“过去，县政府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不听话的地方。”许西连便说：“你过去做得很好，回去之后，你还要好好干。”李瑞卿说：“现在我不是区长了，被人家拿掉了。”许西连很尴尬。3月18日，县参议会由参议长张静波主持，在四区王柳园村召开会议，选举纵翰民为县长，冯蕴言为秘书，并定于4月1日正式宣布就职。

由于赶走了彭笑千，调走了孙叔平，在政权改造中实行一套“左”的做法，破坏了统一战线，不少一直与我们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也对我们党产生了怀疑。萧县常备总队第四营营长刘瑞岐不接受县政府领导，单独活动。

5月间，朱大同在国民党江苏省中统特务主任汤铁飞举荐下，由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派来萧县任县长，在陇海路北管粥集成立了国民党顽固派萧县县政府。刘瑞岐当上了顽县政府常备团长，后来纵止韩也投奔了顽县政府。萧县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民众称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为南政府，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为北政府。一些党外人士也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后方，有的回家，有的弃政做生意去了。

第四节 耿吴刘叛变

1940年12月中旬，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八

路军四纵队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吴信容与十七团团长刘子仁，裹胁部下 2000 人脱离了党的领导，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抗战时期发生在萧县的“耿吴刘叛变”事件。

耿蕴斋，1898 年生，萧县孙庙人，出身地主家庭。耿徐州七师毕业，于 1927 年春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萧县师范和沛县师范当过教师。1930 年脱党后当过两任国民党政权的区长；1937 年 7 月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1938 年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后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1939 年 2 月任二总队总队长，11 月任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12 月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三总队总队长；1940 年 3 月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同年 11 月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对调任保安司令一职，他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有职无权。

吴信容，1912 年生，萧县吴八庄人，出身小地主家庭，和耿蕴斋有师生关系。1938 年任六区联庄会自卫队长，同年 11 月任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二十大队大队长，于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 9 月任萧县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同年 12 月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第七团团长，后任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

1940 年 12 月初，身为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的耿蕴斋，以政治部主任刘作孚“压制”他为借口，未经请示，擅自带一个警卫连离开司令部（驻涡阳龙庙集）。起初，耿到

萧县三区北部，随同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八团（原萧县游击支队）团长吴信容，抗击日伪军的“扫荡”活动。

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彭雪枫得悉此事后，恐其图谋不轨，背叛投敌，立即派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黄思沛到陇海路南地委传达他的指示：要规劝耿速回司令部，如其不回，并与吴信容勾结叛变，就以刘子仁带领的十七团为主，萧县独立团配合，武力押送耿、吴回边区党委，再作处理。彭雪枫之所以让十七团参与处理这件事，一是因为上级派到十七团的干部多，党员多（党员占部队总人数的20%），政治条件好。二是由于刘子仁善于逢迎，平常给上级领导的印象不错。对于让刘子仁带领十七团参与处理此事，李忠道曾提出异议，但黄思沛只有传达的任务，没有改变决定的权利。这里传达一毕，他就去萧永边境十七团驻地，向刘子仁传达去了。

李忠道遵循上级指示，去做规劝耿回边区司令部的工作。他到了萧县三区北部抗击日伪“扫荡”的前沿阵地，见到耿蕴斋，就劝说他按上级要求抓紧时间回司令部。耿说在边区苦闷得很，答应过几天回去。李忠道又做吴信容的工作，并要他说服耿回边区司令部。吴说：“我虽对方（仲铎）政委有意见，但却不同意老耿的这种错误做法，我绝不会学老耿。”他表示愿意动员耿回边区司令部。李忠道认为吴信容的意见很明确，加上萧县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也不同意耿留在萧县工作，因此觉得耿回边区司令部

是迟早的事。

问题就坏在别有用心的刘子仁身上。刘是永城县磨山人，1902年生，出身大地主家庭。他1926年7月参加国民党，1936年4月加入青帮，原系国民党西北军旅长，后当永城县保安总队副总队长。日军进攻永城时，他一枪未放，逃往四川。鲁雨亭组织永城抗日游击队并参加新四军后，他又回到永城混入了抗日阵营，任鲁领导的第一总队第一团团团长，后任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七团团团长，并兼任夏永碭县县长。他当了我军的团长和县长后，还照样抽着鸦片烟。刘子仁1939年8月混进我党，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的大军一压境，他很快就与汤部挂上了钩，阴谋叛变。此人世故深，野心大，为人狡诈。当黄思沛向他传达彭雪枫的指示时，他表面上惟命是从，暗中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耿蕴斋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吴信容更是莫名其妙，尤其是把他与耿捆在一起，要武力拿办，押送边区处理，更是百思不解。他十分恼火，态度陡然间起了变化。

彭雪枫不见耿回边区，又派边区党委副书记、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来到萧县。据彭雪枫12月18日给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说：“令吴芝圃同志于7日晨即西返，8日晚赴萧县。”吴芝圃于12月10日到达萧永边境后，立即派骑兵把李忠道、刘子仁等叫来开秘密会议，商讨对耿、吴的处理措施。会上，由周季方等人提议，经吴芝圃同

意,要刘子仁出面于次日中午12点在陈楼(十七团驻地)设宴请耿、吴。刘子仁说:“不行,光我出面,他们不来怎么办?”他提出要吴芝圃带头署名,吴芝圃一点头,刘就请他起草《请柬》。吴把《请柬》起草好,刘子仁讲要誊写好以后再派人送去,随手把吴写的亲笔《请柬》拿走。刘又问吴:“酒席桌上他们要是不听咱们的怎么办?”吴芝圃回答说:“他们不听,咱们就把他们绑走,反正咱们带着神枪手!”刘子仁表示完全支持,并说:“我和耿、吴都是熟人,我比你们了解他们。他们早就铁了心要叛变了,咱们不下手他们就要下手了!”稍停片刻,刘子仁更坚定地表示:“消灭这些叛变者我打先锋,对他们应该斩草除根,决不养痍成患!”

刘子仁在派人给耿、吴送《请柬》时,竟另附一封密信。密信上说:“吴芝圃是带着神枪手吴守训和林乃清来的,他们在酒席桌上举杯为号,枪毙你们!耿、吴兄,千万不能来,这是鸿门宴!”

据神枪手吴守训1969年8月26日回忆:“扣耿蕴斋、吴信容的具体办法,是利用刘子仁和他们私人关系好,由刘子仁出面请耿、吴吃饭,在吃饭时扣,是我和林乃清(另一位营长级的神枪手)二人下手扣。如扣时他们动手,就开枪打死他们。”不管这叫不叫鸿门宴,反正是利用请耿、吴吃饭的方式“扣”或“杀”他们。

耿、吴知道了这一意图,怎肯赴宴?直到11日下午3

点,不见耿、吴赴宴。刘子仁说:“算了,他们不来,咱们自己吃!”刘子仁吃了自己准备的宴席,又派人去了耿、吴处,唆使耿、吴袭击东曹庄,消灭吴芝圃。而吴芝圃见耿、吴没有赴宴,就派李忠道去十八团驻地张三座楼,看看耿、吴为什么没有来。李忠道一到张三座楼见了吴信容,吴信容就放声大哭,质问李忠道:吴芝圃为什么暗设鸿门宴要杀他?李忠道否认此事。耿蕴斋气得亲手下了李忠道的枪,并把他软禁起来。

12月12日晨,张舒民受县长纵翰民委托去张三座楼劝阻吴信容。吴一见张舒民又是大哭。此时,刘子仁把上级派到十七团的排以上干部60多人全部扣押,吴信容则扣押了上级派到十八团的20多名干部和四纵卫生部长林士笑。刘子仁派来要耿、吴袭击东曹庄的人已到,耿、吴正调兵遣将准备袭击东曹庄。张舒民大惊,坚决不准吴信容这样干。耿、吴不听,张拍了桌子。最后,他们统一了意见:由李忠道随同耿、吴所派的部分骑兵去“请”吴芝圃到十八团驻地谈判。

吴芝圃被武装“请”到新转移的十八团驻地洪河集后,耿、吴照常敬礼、迎接,中午设了酒席。吴信容一开始又是大哭着诉冤,质问吴芝圃为什么要杀他?吴芝圃一再否认有此事。耿蕴斋要吴芝圃随他去十七团驻地陈楼,同刘子仁一起当面核对“鸿门宴”的事,因吴芝圃亲笔《请柬》在刘子仁手里,哪里肯去。左推右托之后,吴芝圃说:

“既然赞成和平解决，就该允许我们先和边区党委、地委、县委通通气，去和他们说明情况，以免发生误会。然后我们再到刘子仁那里去。”耿、吴还是坚持先去找刘。李忠道又单独找吴信容做工作，吴信容勉强点了头，并要李担保吴芝圃去一条脊村马上回来，李满口答应。耿一听要放吴、李走，气呼呼地走出门跨上马就往陈楼去找刘子仁。吴信容一见耿生了气，也忙跳上马，在后面“老师、老师”地叫着追上去。仓促中，吴信容的警卫员、共产党员李振明大吼一声：“还不赶快给副司令员备马！”吴、李趁机上马急奔一条脊村。

吴芝圃、李忠道并没在萧县县政府驻地一条脊村下马，径直去了宿西办事处，找到办事处主任李时庄，在那里给耿、吴写了一封信，说去边区党委汇报后迅即返回，继续商讨和平解决事宜。就在吴芝圃刚离开洪河集时，刘子仁派来的骑兵，各带一长一短两支枪，要耿、吴配合把吴芝圃打死在洪河里。

吴芝圃走后，耿、吴自知和平解决无望，也曾派人与陇海路北苏鲁豫边区联系，但他们不敢收留。耿、吴也曾对部属讲，要向党中央发信、发电告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这可能是欺骗部属的一种托词，未必真有此意。从此，耿、吴、刘裹挟我抗日武装 2000 人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他们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后，耿蕴斋被任命为国民党苏鲁豫皖挺进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

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支队长。

对这一事件怎么看待，众说纷纭。当时直接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吴芝圃，在其1956年4月11日写的《吴芝圃自传》里，有一段重要论述。他说：“……但对发展的方向上，地方武装政策和干部政策上，尤其在皖南事变前后，在对于自卫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犯了些带原则性的错误，以致退出津浦路西。对于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部分责任的。当时，对于这些错误的分析，华中局曾在党内发布一个决议，不需我这里重复。我在这里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关于萧县耿蕴斋、吴信容、永城县刘子仁等部地方武装的叛变问题（共两个团一个连）。”

吴芝圃叙述说：“……这次我几乎为叛徒刘子仁阴谋毒计所害。所以没有遭到危险的原因：一、当时吴信容叛变的决心还未最后下定，还在犹豫不决；二、吴信容、耿蕴斋都留后手，后来公然叛变时也未杀害我们派去的干部；三、当时萧县党内外均有一部分同志正向他们作劝告和调解工作；四、刘子仁是坚决扣押了在他部队的党员干部，夜间在捉押的地方冲出来的时候，还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估计刘子仁早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挂上了钩；五、李忠道同志对耿、吴等作了许多说服工作，起了暂时缓和作用。”吴芝圃最后作了这样的叙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吴信容叛变不久，在我们退出津浦路西以后，就和我们建立了秘密关系，到我们恢复路西

的时候，吴的部队就又反正了（当时吴信容已死，其弟吴信元代替他的职务）。耿蕴斋在自卫战争时也自动跑了回来，悔过自新了。惟有刘子仁坚决反动到底，在解放后被我们捉到处以极刑。”

耿吴刘叛变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耿、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差，组织纪律观念淡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思想作怪，是其走上叛变道路的内在因素。负责处理此事的吴芝圃等人，其指导思想“左”的倾向及由此衍生的简单、生硬的处理方法，特别是刘子仁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挑拨离间等因素，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外部原因。

第七章

开辟萧铜游击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我党采取了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在我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20万大军压境，加之耿吴刘叛变及反顽斗争失利造成的不利影响，形势急剧恶化。边区党委和四师奉命于1941年5月初率主力转移皖东北，同时要求各县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随主力转移。萧县党政军东撤后，少数同志留在皇藏山区坚持斗争，创建了萧铜游击根据地。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萧铜在日伪顽并存的险恶环境中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节 东撤保留了一块“跳板”

1941年4月中旬，在区党委通知萧县党政机关随主

力东撤时，县政府行政科长许西连和秘书冯蕴言主动请缨留在萧东打游击。他们认为：一是皇藏峪山区有险可凭，二是还有一支“亢营”武装（营长叫亢为德，群众即称这支武装为“亢营”）可资利用。当他们向县长纵翰民请示时，纵很为难。同意吧，已来不及开会研究，也来不及向上级请示，自己作主，显然超越了权限。不同意吧，此乃深明大义之举，没有理由拒绝。纵翰民权衡利弊，勇于承担责任，断然决定把他俩留下来。这一有胆有识的决策，不仅保持了萧县抗日民主政权的连续性，也给恢复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留下了一块跳板。

萧铜地区（萧东与宿、铜等县相接的边境地区）横跨津浦铁路，北起铜山的三堡，南至宿县的夹沟，约60华里。路东多平原，路西是山地，峰峦起伏，林木茂密。该地区对日伪、顽、我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于日伪，它是华北日伪与华中日伪的结合部和交通咽喉；于顽，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向东进击我淮北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于我，它是我军日后反击日伪夺取徐州和西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矛盾异常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日寇为保护徐州及津浦铁路的交通安全，一向把这一地区划为自己的治安区，视为禁脔。在津浦路两侧，日伪据点林立，封锁沟、封锁墙密布，稍有风吹草动，便“清乡”、“扫荡”。津浦路徐州以南有三堡、四堡、桃山、曹村、

符离集等据点；铁路西侧有庄里、孤山等据点，铁路东侧有阚疃、路疃、永安、杨楼、赵庄、褚兰、石厢、贡山、张山、云衢等十个据点。总计有鬼子 250 人，伪军 4000 余人。

1941 年 4 月 23 日，许西连与冯蕴言带了四名通讯员由萧二区出发，夜宿白顶山朱皋浦家。次日，他们到了皇藏峪土盆村，与九区皇藏乡乡长徐明轩见了面。

纵翰民东撤后，对留在萧东的许、冯仍放心不下。他参加过边区党委领导人检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仁和集会议后，立即随四师派往宿东接吴芝圃的骑兵连赶到萧东。向他们传达了仁和集会议精神，肯定了他们坚持萧东的正确性，并帮助他们制定了坚持和发展萧东的方案。

1941 年 5 月初，许致远、王可风到了萧东。他们与许西连、冯蕴言、吴端胜、徐明轩等人商量后决定，由许西连、许致远两人去路东找师部。二许和两名通讯员出发的当天，在途中遇到亢营教导员朱德群。朱也带了一名通讯员，加上带路的董永德，他们一行七人，夜宿路东赵楼董永德家。第二天清早上路，走了七八里，遇到宿东办事处主任赵一鸣。赵听他们说要去找师部，就说：“情况很紧急，你们不好走，不如先到唐河南去找四师后勤部，雷明处长在那里。”他们中午到了唐河南，看到七八个人在庄外活动，原来就是豫皖苏边区联防委财政处长、淮上行署主任雷明。见面后很热情，雷处长一边安排警卫员准备午

饭，一边在树荫下听汇报。雷明对坚持萧东十分支持。他说，能够坚持一个区、一个乡，甚至一个保也是好的。今后，过路也可作个联络点，为收复豫皖苏根据地留下一块跳板。师部方面我去汇报，请求再派一些干部去，你们先做好准备。临行前，雷处长还给了他们500元流通券，作为活动经费。

许西连等人返回后，把雷处长的指示向同志们作了传达。大家的情绪很高，仿佛他们是从异国他乡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讨论时，大家觉得要坚持得有个名称，叫什么好呢？有人提议叫“萧东办事处”。虽说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已不存在啦，但还是要打它的旗号，办事处就作为它的一个派出机构。有了这个名称，民众就会觉得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犹在，共产党没有走，一些没来得及撤退的人员将会归来。萧东办事处的人员组成是：许西连任主任，原在皇藏峪一带活动的亢营副营长吴端胜任副主任，冯蕴言任秘书，皇藏乡乡长徐明轩任九区区长，乡队升为区队。

就在成立萧东办事处的当天，萧县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朱大同，凑了路北刘瑞岐和二区窦衍辉的人马，约四五百人，在金寨、草场一带活动，计划晚上进驻许西连他们活动的土盆村，趁许西连等人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

接到情报后，大家对情报进行了分析：有人认为，当时亢营仅有35人，加上区队和警卫人员也不过六七十

人，怎能对付四五百人？有人却认为，皇藏山多沟深，土顽地形不熟，夜间打个伏击，还是有取胜把握的。亢营副营长吴端胜也同意打。于是，先安排冯蕴言带领非战斗人员转移到寺后村，佯装过路东，然后部署战斗任务。由许西连、吴端胜、许致远率亢营一部埋伏在汪庄附近的峡谷中，朱德群带区队在皇藏峪南路口堵截。

晚上9时许，当许西连带领的部队刚到汪庄东边的东西大沟，这里还有一条南北槽子路，土顽正在这条路上行军。许西连在沟内刚把兵力展开，土顽先头部队已进入伏击圈。天很黑，十米以外看不到人。等土顽与我们相距六七米的距离，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手榴弹跟着甩过去。土顽突遭袭击，调头鼠窜。这时，附近几个山头也响起枪声，弄得土顽晕头转向。加上他们多是陇海路北平川地带人，不习惯山区夜战，很多人迷失方向，乱跑一夜，仍未出十里之范围。拂晓，一些顽兵在寺后村附近被我俘虏。朱大同逃到永堙寨南，白天又遇到日寇“扫荡”，弄得狼狈不堪。

这次进犯萧东，朱大同大败而归，把刘瑞岐的老四营糟蹋得很惨，连死带伤加逃跑，一共损失百余人。刘瑞岐十分恼火。相反，汪庄一战，却稳定了萧东，成为开辟萧铜游击根据地的奠基战。

雷明将萧东的情况向豫皖苏边区党委作了汇报后，区党委当即派随军撤退的朱玉林等十位同志到萧东组建

临时县委。萧东临时县委由朱玉林任书记，路少棠、王尚三、朱德群为委员。此时，萧东的处境极端艰难，日伪加紧伪化，土顽气焰嚣张，我方公开活动的地方很小，有人形容是“南北十华里，东西一弹穿。”为适应萧东的斗争形势，有利于麻痹敌人，使我们站稳脚跟，党的活动和各项工作都采取了隐蔽的斗争形式，原在萧县有公开身份的领导干部，也都改了名字。

萧东临时县委和办事处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亢营的一小部分和萧九区区队。根据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特点，部队的活动坚持以防御和隐蔽为主的方针，视敌情的变化而采取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使日伪的“扫荡”与顽军的进犯一次次扑空。当然，隐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寻找有利战机，打击来犯之敌。

第二节 坚持争吴缓刘打朱的方针

1941年7月，许西连再次去了宿东，与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见了面。吴听了许西连的汇报后，作如下指示：一、当前我们在萧东只是有个立足点，力量很弱，不能树敌太多，应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如争取谁，打击谁，缓和谁；二、应以灰色面目出现，争取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三、把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吴信容支队的工作。萧东临时县委、萧东办事处根据吴芝圃同志的指示，制定了

争取吴信容、缓和刘瑞岐，打击朱大同的斗争策略。之后，便派谢继恩去萧西与彭笑千、张舒民交换意见。他们亦同意这个策略。

争吴缓刘打朱，缓刘是关键。刘瑞岐是实力派，他原是萧县常备总队第四营营长，后与国民党派来的萧县县长朱大同一起另立县政府，组建萧县常备团，刘任团长。刘虽是与我们的主要对象，但他以前与彭笑千私交很深，彭回萧县后，他还想借助彭笑千的威望取朱而代之当上县长。他一时不会加害于彭，是我们暂时缓和的对象。缓和他，主要是争取时间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朱大同虽是光杆县长，但他反共积极。他原是中共萧县县委书记，叛变后当了国民党特务，处处与共产党作对，应坚决打击。耿（蕴斋）吴（信容）是受刘子仁鼓动而叛变革命的。吴的部队是萧县县委一手组建的，下级干部和士兵中党员较多。有彭笑千和张舒民在那里做工作，争取是有希望的。争取他们，也是扩大他们与刘、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斗争的开展。缓刘虽是缓兵之计，但操作起来必须讲究策略。许西连不顾个人安危，曾数次单刀赴会与刘瑞岐及其代表谈判。如卯山三次，梧桐两次，郝庄、庙山窝各一次等。

1941年7月下旬，在彭笑千筹划下，许西连到六区郝庄与刘瑞岐的代表郝晴瞻会谈。当时商定的中心议题：分疆而治，划分区域，联合抗日，停止磨擦。经过这次会

谈，双方矛盾得以暂时缓和。半个月后，趁刘瑞岐去九区西部卯山驻防，彭笑千、张舒民跟踪前往，约许西连与刘见面。许、刘会谈，彭、张在座。彭先说：“萧县人民在沦陷后一直是团结抗日的，后来发生了磨擦，现在应联合起来打日本。”接着，许西连发言。他郑重声明：“我是无党无派的，一直是打日本的，凡是抗日的都是朋友，只有日本鬼子和汉奸才是敌人。”刘瑞岐最后也表了态，说了一些以后一定要携起手来打日本的门面话。这一次会谈，进一步起到了麻痹刘瑞岐的作用。有一次，彭笑千、张舒民想利用刘的扩张心理，敲他竹杠。他们问刘：“你不是想吃掉萧东吗？现在他们有困难，需要你伸手拉一把。”刘说：“我能帮什么？”彭、张就势提出要钱5000元，刘给了3000元（法币）。钱捐给许西连后，许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要，可不要又不好，怎么办？于是，许就把钱转给了吴信容部。这样，既做了争取吴的工作，又起到了缓和刘的作用。

1942年春天，中共萧东临时县委书记朱玉林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路治久又举行了梧桐会谈。我方参加人员有朱玉林、李华农、许西连、冯蕴言，国民党方面参加的人员有路治久、纵止韩。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团结抗日，避免磨擦。国民党顽固派知道朱、李是共产党员，我方也是想让他们知道萧东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执行的是既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政策。

与刘瑞岐谈判一年多后，我们的地盘已由萧东而萧

铜、萧宿铜、萧宿铜灵了，武装也由六七十人扩大到 1500 人。1942 年 5 月，朱大同被日寇捕去。不知什么原因，不久他又从日军那里出来去了临泉汤恩伯总部。刘瑞岐于是年 11 月由顽常备团长接任国民党萧县县长后，就再也容忍不了萧铜的存在了。刘瑞岐先是给萧铜办事处捎信说，在萧西还可以平分秋色，现在萧东弹丸之地，就不必再较量了。继而发文告劝降，称自己“宽大为怀，念诸同志之所以误入歧途，实有不得已者。若能幡然悔悟，毅然归来，不惟不究既往，亦必量其才能分配职务。”萧铜办事处以文对文，托便人捎给刘瑞岐的书信内容是：“今寇焰方张，国人均应同仇敌忾，相御外侮……若醉心于内部磨擦，自相损蚀，止足贻侵略者以窥视之机，人民流离，水深火热，陇海沿线，当不例外……救亡之责，愿共图之。”

此信义正辞严，情真意切，颇有文采。在唇枪舌剑的谈判中，刘瑞岐不是对手，舞文弄墨亦逊一筹！

刘瑞岐岂肯认输，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不过，萧铜这时也不是势单力薄了，文来武来都能奉陪了。

第三节 把后勤建在敌伪据点周围

1942 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萧铜游击队不断扩大，部队供应成为大问题。这里又无巩固的根据地，后勤基地设在哪里，这是县委、县总队最为焦急

的问题。首先在原有供应人员的基础上,调配力量,组成总队供应处。新成立的供应处,在1942年中秋节后由供应处长岳纲瑚,陪同县财粮科长朱传真,在津浦铁路桃山车站东奎河边瓦房村村头场屋里,召开了总队供应处党支部支委会。会上,由朱、岳二人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加强供应工作的指示,研究了在异常复杂艰苦的环境下,如何保障近2000人的县总队和部分区队指战员的供应问题。季节行将进入冬季,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已刻不容缓。同时,也应立即着手解决部队的枪弹、医药、通讯器材和其它装备问题。从长远考虑,必须有几个后勤基点,比如被服缝制、染色基点,枪弹修配、铸造基点,伤病员安置基点,医药器材储存基点等。选址条件要求:既要安全隐蔽,又要便于开展工作。这都是要急于解决的问题,但解决问题关键在党组织,关键在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支委会的认识。通过会议,党支部把支委的认识统一了起来:要随时掌握敌情变化,时刻想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要坚定地依靠党,依靠人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完成任务。随后,在地方党政机关的配合和支持下,经总队政委寿松涛、副总队长顾寒星等负责同志实地察看,供应处在沿铁路、公路和敌伪据点附近的十多个村庄设置了后勤基点,五天之内便投入工作。

被服缝制选了两个基点,一是小店子村,二是马湾

村。小店子是个既散又小的村庄，约30户人家，在铁路东半里路远。庄东边二里多路就是公路，两边都是敌伪据点、碉堡，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干工作。选址时，当地群众很支持，缝纫间设在军属万世贞家套院内。由岳邦胜、欧道升带领群众挖地下室，约九米见方，一人多深，能放下两台缝纫机，一个裁剪台，五位同志在里面工作。上面用木棒、席片搭起来，复上土，留一个小洞当门。土上面用捆好的高粱秸堆垛伪装。动工和伪装时，房东、近邻和村干部都参加干，甚至50多岁的赵大娘也主动帮忙。为怕挖出的鲜土有目标，连夜装上牛车，上面用牛粪盖上，当作肥料送到湖地里去。村里的救国会员和群众千方百计支援供应处，为的是让部队早日穿上棉衣。这种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连从伪区新动员来的带来缝纫机的王典华技师都说：“我们要努力完成任务，更好地为前方的同志服务，以报答老乡们的关怀！”由于地下工作间潮湿，工作几天后，同志们的脸色由黄变白，眼圈也黑了，但大家都以忘我的精神工作，谁也没怨言。缝制好的衣片连同布匹，都存放在军属赵家的一个夹壁墙内。

染布点选在离桃山车站只有三里路远的桃山村。全村300多户人家。村中有北到徐州、南达宿县的公路，伪军据点就设在村北头，西面铁路边设有日伪的碉堡，西北角三里就是桃山车站据点，南面十里就是曹村据点，还设有伪区公所。染布点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这

个村的群众基础好，仅参加游击队、武工队、救国会的就有近百人。过去在这里曾隐蔽过伤病员，群众曾代我们保存和采购过药品、布匹、弹药、军用器材等，还经常护送部队、干部、交通人员过铁路。染布点设在佃农凌雨家，把他家靠公路边的墙头加高，套个小后院。为避免煮布时烟向天上冒，就在锅灶旁砌个向下出烟的烟囱，地下挖一条半公尺宽，100多公尺长的斜坡，通向村东边小河的水面上散烟，烧柴也尽量用干的。当时，染料也因敌伪封锁采购困难，供应处就通过地方各级政府及救国会员，发动群众收集一部分锅灰，掺些染靛将布匹煮成灰色（当时军衣要求是灰色的）。他们白天染晒，晚上分散保管运往缝纫点裁剪。

被服工作还包括弹棉花，那是在马湾一带进行的。缝制点制成棉衣片，连同弹好的棉花，由专人运往铁路两侧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由各村妇女救国会组织妇女缝制棉衣。就这样，终于赶在立冬前后，把部队的冬衣全部发下。然后，再赶制子弹袋、马背套等装具，以完成部队所必要的补给。

枪弹修造所选在望州河与奎河之间的望州湖、姚楼、柳庄、海子等几个离敌据点较远、易于转移的村庄。由张云航、许致远等人负责。开始，先搜集国民党部队撤退时丢弃的枪炮零件和弹药，又东拼西凑安装了几件简易修械工具，技术人员也逐步增加到十人，可以修配一般枪支

了。修造所的隐蔽地，虽离敌据点较远些，但仍属敌伪“控制区”或“半控制区”。为了安全起见，工作人员有时白天干，晚上分散隐蔽；有时晚上干，白天休息。无敌情时，可以在一个村子连续住几天，有时一宿几挪。寒天和阴雨天，大都住在偏僻村庄的农民家里。夏天，大都在树林、山沟或庄稼地里宿营。每天黎明，先派人到村头看标志，再到联络地点集中。如发现村头有敌情标志，则继续隐蔽。技术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组织上总是把他们的生活调剂得好一些，有困难优先帮助解决，技术员和老师傅积极性都很高。萧铜总队东亢、西亢两个营的 12 挺机枪，有一半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通过各种渠道与关系购买和搜集零件拼凑而成的。后来，修造所不仅能修配枪支，还能拆卸日军扔下未爆炸的炸弹，用于制造手榴弹和炸药包。再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利用子弹壳加工成子弹、枪榴弹等，来弥补部队武器弹药之不足。

修造所后来发展到 30 多人，除技术人员外，大都成为多面手，既当修配员，又当采购员，还是战斗员。在一般情况下，修造所的任务是为部队服务的，后勤单位没有战斗任务。可是，为了适应千变万化的情况，除技术人员和保管员外，许致远将其余十余人组成一个游击小分队，由他带领，有敌情先隐蔽起来，视其情况，可打就打，可扰就扰，目的是保存自己，限制敌人。

伤病员医疗点，较重的伤病员安排在交通线两侧。如

放在马湾、东高庄、寺后、杨堡、王山、陈贾庄等村，隐蔽在群众家中，经常派医务人员去治疗。日伪顽搜索时，就隐蔽在夹壁墙内或转移到沟湖、草地中。伤势较轻的组成流动小医院，随卫生队留在比较稳定的奎河、望州河边的石厢、祖沟寺、王村、赵楼等地。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搞些草方、单方及代用品为伤病员治疗。总之，医护人员不辞辛劳，尽一切可能让伤病员减少痛苦，安全休养，使之早日痊愈，重返战场。

第四节 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游击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把本属于战术问题的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从战略高度看待敌后游击战争。这一指导思想对于开辟萧铜游击根据地的实践至关重要。萧铜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附近和铁路两侧不易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萧县党组织在抗战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游击战略思想的结晶。

萧东初创时，该地区不仅处在日伪的枪口下，还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豫皖苏边区党政军东撤后，只留下许西连等少数几个人在萧东。他们七拼八凑，也只有

“南北十华里，东西一弹穿，武装一个连，干部十二三”的家底。凭此家底，要在日伪顽并存的险恶环境里，在日伪据点的空隙和弹道之下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根据地，大家的信心不足。许西连就用唯其力量单薄、不显眼，才不致引起日伪顽的过分注意，这样反而易于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的道理开导大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虽然艰苦，但正由于山多沟深路险，交通不便，才更利于游击战的开展。还是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萧铜的做法，正是毛泽东这一游击战略思想的运用。

在萧铜，无论是部队，还是区乡武装及县委、办事处工作人员，很难能睡个安稳觉。因为要说敌情，时时处处都会发生敌情。一天凌晨，我们的队伍要转移，我们在这边站着，对面也站着一支部队。我们的同志想叫他们靠拢，不敢大声喊，就小声地说：“过来，过来。”喊了好几声，老不过来，我们的同志就着急地跑过去看看。一看是鬼子，头上戴着钢盔。鬼子听见我们喊话，为什么也不过问呢？原来，他们常带一部分伪军出发，认为这边站着的是伪军，是他们的人。大家知道了对面站着的是鬼子，就小声传话：“是鬼子，是鬼子，赶快转移！”直到部队离开了庄子，认为鬼子追不上了，才开枪射击。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萧铜的武装之所以能够聚则成军，散则为民，关键是能与民众打成一片。虽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县委与办事处仍不忘关心群众疾苦，改善人民生活。初到皇藏峪附近，地盘很小，国民党顽固派常来袭击，部队不敢驻在庄上，只好睡山沟、蹲苇棵、蹲水坑，甚至连开会、吃饭都得设岗哨，经常是一日战斗数次，一夜转移多处，不仅几无宁日，而且几无宁夕。尽管如此，部队仍能以模范的纪律、优良的传统影响人，以英勇无畏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人，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区乡武装、县委及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和部队一样，除冬季大风雨雪天气外，大部分时间夜宿山岗、田野、青纱帐。敌情严重时，就分散到敌伪据点附近的群众家中隐藏。大敌当前，县委与办事处每出台一项政策，既要照顾群众利益，又不能对上层人士刺激太大，否则就把他们吓跑到敌人方面去了。如执行“双减”政策，就是从实际出发，只提“让租让息”，不提“减租减息”，使政策尽量缓和一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农民都组织到各种救国团体中去。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游击队活动时就可获得较大的自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来不及走时，就化整为零，使敌人难辨是兵是民。在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使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初组连，继为营，后扩为总队。

由于我们长期处于日伪顽夹击、腹背受敌的环境里，

在巧于周旋中，也摸出了一些规律，探索出了一些应对复杂环境和敌情的方法和措施。比如，发挥狗的作用。根据日寇惯于白天侵犯而怯于夜战，国民党顽固派怕在白天与日伪遭遇，则常于夜间偷袭的特点，动员民众按照我们的要求养狗。以官桥向南至眇沟的一条公路为界，公路以西，靠西山所有大小村庄，号召各家各户都要养狗；而公路以东，靠东山以及津浦铁路两侧的所有村庄不要养狗。因国民党顽固派由西向东夜间向我进犯，经过西山的村庄时，狗吠声可为我军传递情报。萧铜西亢夜间宿营基本都是在靠东山的村庄，无狗叫可使我军夜间活动寂静无声，不易为敌发觉。同时，这些村庄也可悄无声息地去向我军报告敌情，可打则打，须避其锋芒则避之，能够掌握主动权。

再如，相机利用第三者的力量。在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中，两军交战，相机利用第三者的力量，这是一种机动灵活的战术。1942年11月，刘瑞岐亲率王传绶、赵永和两个支队向我皇藏峪大举进犯。他们驻土盆、纵窝、陈林、五眼泉一带，连营六七里，企图一口吃掉我们。路西我部避其锋芒，转向曹村、桃山日伪据点戳了几枪。于是，曹村、庄里的日军出动，分东、西两路包围皇藏峪。顽军一枪未发，仓惶而逃。我军以逸待劳，在其退至龙岗山口时教训了他们一下，毙、伤20余人。同时，根据日军活动规律，一般是出发时，刚从各地调集而来，其势汹汹；返回时，则

分散返回原防地，比较松懈。这次，我军尾随其后，亦毙、伤日伪军十余名。我军因运筹得当，巧借了第三者的力量，使顽军与日伪都受到了损失。

1943年3月，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和三十一集团军副司令王仲廉部，妄图东西夹击新四军四师和淮北抗日根据地。韩由东向西进攻，王由西向东应援。萧铜总队奉命在徐州南津浦路线三堡、桃山、夹沟等要道阻止王部东进。我们采取发动民众在津浦路两侧广贴标语的办法，大造“欢迎国军进攻徐州”的舆论，造成徐州日军极度惊慌，遂派装甲车沿铁路线日夜巡逻，王仲廉部被迫绕道宿南过路。待王部到达路东时，韩德勤部已被新四军四师全部歼灭，韩被生俘。王部又匆忙返回路西，途经萧铜地区三堡附近，遭我路西区队袭击。王部不敢恋战，仓惶西逃，沿途丢弃许多枪支弹药和马匹，均为我区乡队所获。

正因为萧铜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才使日伪无奈我何。土顽刘瑞岐、王传绶部，更拿我们没办法。刚开始，他们认为萧铜不过弹丸之地，不堪一击，经多次交手后，才知道不好对付。部队大规模进攻吧，必引起日伪警惕，则调集兵力袭击，难于立足；小股窜扰吧，萧铜县、区、乡队则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将其消灭或赶走。萧铜游击根据地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节 整风与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萧铜地区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当游击队和游击区有了一定发展以后，就挤出时间或在战斗的空隙开展党内整风和组织民众工作，这当属于巩固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战胜敌人，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2月在党内作了两次关于整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不仅在延安存在，在地方也有不同的表现。这种不良风气，不仅影响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也影响了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整风的关键是要解决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萧铜地区的整风从1943年初开始，分工县委副书记王学文(姚克)去抓。按照上级规定：区以上干部到淮北区

党委轮训班学习，乡支书到地委轮训班学习，其余党员干部采取集中学习、专人辅导的方式，或分期分批办轮训班的办法。因战时条件所限，这里的整风学习尚达不到上级要求。直到1943年8月，邳睢铜地委才召开地方区以上干部和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华中局和区党委重整“三风”的指示，始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

萧铜的整风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萧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表扬好的，批评差的，使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有了明显改善。大家联系实际回顾过去，认为萧铜从许西连决定留下来打游击，到争吴缓刘打朱方针的制定，再到向东发展战略方针的确立，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是马列主义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今后，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结合得紧，结合得好，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参加了延安整风学习的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同志，在给区党委写的信中，对淮北区五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反省。此信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对大家启发很大。他表扬了萧铜的对敌伪工作，同时指出：对于这些良好的工作萌芽，没有追根究底地加以钻研，找出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把它由感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的东西，以便再回到实践中去，推动我们的事业和继续丰富我们的理论。这既是刘子久对工

作的反省,也是对萧铜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整风促进了萧铜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发动和组织民众方面,成效显著。开始,只是在萧九区的土盆、小山口与铜七区的桃山一带,建立较隐蔽的农民互助会,发动和组织农民向日伪开展减轻负担的斗争,在农民之间开展一些互助互济活动。当游击区有所扩大以后,在发动和组织农民方面又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如减租减息,在我方“一面政权”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在敌我共管的“两面政权”地区,实行让租让息,尽量让政策缓和一些,不要把地主吓跑到敌人那里去;在纯粹敌占区,就发动群众向敌人要民主,减轻负担,改善生活。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农民互助合作,成立了变工队,帮助贫苦农民和军烈属搞好生产。一些地方还组织了铁、木、泥、石公会,把广大农民逐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再引导他们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1944年,通过“双减”、“双让”,新发展农救会员5000多人,新组建民兵2000多人。组织起来的农民,把生产、支前工作都作为抗战的实际行动。

在开展党内整风期间,同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部队除帮助农民生产外,还用武装保卫农民成熟的庄稼,并帮助农民制订兴家计划。对缺耕畜、缺种子的生产组(户),以及搞副业缺本钱的生产组(户),政府还支持一部分无息贷款。征收公粮,实行按定产计征,超产部分免征农业税。在农民中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由积极性焕发出的创造性，卓有成效地贯彻了党中央“发展生产，保障供应”的经济工作总方针。

第六节 萧铜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

上级党的重视与支持，对一个地区的坚持与发展至关重要。三年里，在异常险恶的环境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萧铜能够坚持和发展，先是把敌人的严密控制区变成我们隐蔽的游击区，并逐步发展成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级党委三次派来干部，给萧铜的各项工作带来了三次大踏步进展。当然，这也是外来干部善与本地干部合作共事、亲密团结的结果。

许西连、冯蕴言于1941年4月23日到达萧东，他俩都是民主人士，没有党的领导不行。于是，许西连在5月上旬去宿东找党的领导。区党委当即派随军撤退的朱玉林等十位同志到萧东，成立了临时县委。临时县委除与萧东办事处一起抓好武装、政权、敌工、统战工作外，侧重抓党建、群团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临时县委成立前的一段时间内，亢营进入萧铜边境，战斗连连失利，战士们情绪低落，有的跑回了家。现在看到有威望的地方领导来了，纷纷归队。路西撤退时，未来得及撤出的同志，也主动找来。因此，部队发展很快。自1941年5月到11月，在半年的

时间里，部队由六七十人扩大到 400 多人。

第二次派干部是 1941 年冬，萧东临时县委派交通员戚继升（外号老套筒）给淮北区党委和四师送信。区党委和师首长接信后，知道萧东已站住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于是，派九旅二十五团政治部主任顾寒星、指导员范文典、刘明川、滕乃彬随赴宿东的张震参谋长去萧铜工作。顾寒星等人临行前，受到师首长彭雪枫、邓子恢的接见。师首长告诉他们：一是在萧铜活动的“亢营”营长亢为德被捕后，副营长吴端胜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你（指顾）要依靠萧东临时县委接任营长，并作长期坚持的打算。二要团结好许西连、冯蕴言、张舒民等同志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三要向东发展，以开辟路东为主，坚持路西为辅。顾寒星到萧东后，依靠地方党组织顺利地接任了营长职务。该营亦划归九旅二十五团建制，为独立营。随去的范文典任营副教导员，主要负责路西整编后的一、二连。整编后的五、六连驻路东，县委与办事处随营部活动，在路东路西各留一负责人组织领导。不久，萧东临时县委改为萧铜县委，萧东办事处改为萧铜办事处。

确定向东发展的依据为：因为路东东靠淮北、北靠邳睢铜，南靠宿东，这三处的党组织均可给予支持，发展下去可联成一片，便于结束孤悬敌后的局面。向东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不再单纯地以“灰色面貌”出现和完全以隐蔽形式斗争，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隶属于九旅二

十五团,也可得到九旅的直接援助。

1942年3月3日,萧铜独立营奉命配合九旅进攻灵璧张小圩子,全歼赵觉民、许志远部,生俘灵璧县顽县长赵觉民、顽十七纵队司令许志远。我独立营第一次配合主力作战,大获全胜,兴奋异常。在返回途中,乘胜又拔除了赵庄伪据点,并迫使杨楼据点的伪军逃离。这样,就把路东铜七区南部与萧十区西部,以及宿县的股北区联成一片,在南北40华里,东西20余华里,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无敌伪据点,为向东发展,扩大根据地建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42年9月,淮北区党委和师首长为加强对萧铜地区的领导,派来了寿松涛、孙朝旭、童振铎、程祖光、李学治、李秉枢、刘为敬等。寿松涛到萧铜后,传达了区党委和师首长的指示:萧铜地区改为萧宿铜灵地区,组建萧宿铜灵县委和萧宿铜灵县政府,将宿县股北区划归萧宿铜灵县(以下简称萧铜)领导。将萧铜独立营改为萧宿铜灵总队(以下简称萧铜总队),股北大队归属萧铜总队建制。萧铜总队下辖三个营:路西部队改为总队第一营,路东部队改为第二营,股北大队改为第三营。干部任命是:寿松涛任县委书记兼总队政委,许西连为总队长,顾寒星为副总队长,孙朝旭为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李秉枢为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刘为敬为一营副营长,范文典为一营教导员;李学治为二营营长,蔡书仙为副营长,王亦平为二营教导

员；张怀禄为三营营长，冉宪义为三营教导员（后为程祖光）。经过这次调整和兵源补充，每营约500人，整个萧铜总队有1500余人，成为坚强的萧铜地区主力部队。

在萧铜总队基本上能够独立支撑这一地区的局面之后，九旅因另有任务，于1943年5月调离萧铜地区。这时，日伪顽又卷土重来，气焰十分嚣张。总队干部战士以及群众一时产生埋怨情绪，责怪主力不该撤走。上级指示：应抓紧解决干部战士依赖主力的思想，树立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思想。要集中力量，寻找战机，打一两个胜仗，提高部队的士气和信心。并将萧铜地区和萧铜总队划归三分区（邳睢铜）领导，以便得到及时的指挥和支援。

1943年六七月间，路东官庄之顽沿奎河两岸向我栏杆、孟寨驻地进攻，并有时村日伪出动配合，经刁白山向南向北夹击我栏杆、孟寨部队。路西王传绶部约两个营的兵力向我一营驻地皇藏峪进攻。显然，这是路东、路西顽军有计划且相互配合的一次进攻。三军分区赵汇川司令员统一指挥主力一部和萧铜总队二、三营，在奎河岸新庄桥向顽军展开激烈反击战，将顽击退。南路亦击退时村之日伪。路西我一营在副营长刘为敬率领下，向占领皇藏峪制高点胖妈顶之顽展开激烈争夺战，拼搏约两小时，顽不支溃退。我部队路东、路西两战皆胜，遂提高了士气，坚定了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信心。

萧铜总队战斗力不断增强，不仅能有效地防御，也能

主动出击。1943年7月27日，总队集中一、二营，把担任前卫的一个连化装成顽军，夜袭永堦顽驻地，在梧桐村与刘瑞岐纵队的赵永和支队相遇，激战一小时，毙、伤顽十余人，俘20余人，获步枪20余支，机枪1挺，战马5匹。1943年10月，路西土顽三个支队倾巢而出，分南北两路向皇藏峪山区进犯，扑空后撤回二区梧桐。我一、二营尾随至梧桐附近，拂晓前突袭王传绶部，除打死打伤者，俘顽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余支。

两次主动袭击顽军，均出奇制胜。萧铜总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邳睢铜军分区将萧铜总队上升为军分区独立团。萧铜又将总计约2000人的各区、乡队，除留一小部分外，分编成三个营，组成新的萧铜总队。总队领导干部未变。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政权建设也日趋完善。1944年4月15日，在奎西区郑楼村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萧宿铜灵抗日民主政府，选举许西连为县长。大会通过了年度财政预算和公粮累进征收办法，同时对县政府的组成人员作了安排：秘书冯蕴言、任慎修；民政科长张舒民，副科长张立轩；财粮科长朱振东、副科长徐明轩；教育科长王可风，副科长杨化龙（杨兴瑞）、王祥义；司法科长孟振声，副科长谢继恩；公安科长张建淮。至此，萧铜已成为横跨津浦铁路，辖9个区、50多个乡，方圆百余里的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第八章

淮北地区对敌伪工作的一面旗帜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萧铜横跨津浦铁路,靠近陇海铁路,属日伪的严密控制区。它不仅处于日伪的枪口下,还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在如此险恶的环境和条件下,萧铜能够存在和发展,与其对敌伪工作做得好是分不开的。萧铜党政军各层次人员,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了对敌伪工作。卓有成效的对敌伪工作,有力地支持与配合了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受到毛泽东赞许的对敌伪工作

1944年,时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子久,在延安中央党校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理论联系实际,于7月5日给区党委写了一封信,信中提

到他在淮北区党委工作期间的几个问题。此信在给区党委之前，毛泽东同志看过，认为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遂委托新华通讯社向各抗日根据地广播，还将该信作为整风参考文件。《解放日报》于是年7月27日全文刊载，并印成单行本发行。

刘子久提到的几个问题中，有一条就是要追根究底地总结萧铜地区做好对敌伪工作的经验。他说：“我回想起来，我们过去的工作当中，曾经有过不少的好东西，如几年来，宿东、萧铜的敌伪军工作……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良好工作的萌芽。中央就是从这种萌芽状态东西的研究中，找出了对敌斗争……等各种指导方针，各地并根据着这些方针，作出了辉煌的成绩。”刘子久十分惋惜没有把这些好东西总结出来，用以指导工作。他认为，这是不能很快提高、进步太慢的原因。

对于做敌伪工作的重要性，淮北区党委的认识很高，把它作为敌占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工作。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被迫参加太平洋战争。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审时度势，一个月不到，即于1942年1月1日发表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一文。文章指出：“部队党与地方党应把这项工作（敌伪工作）提高到第一等地位。”是年12月28日，由淮北区党委、四师政治部联合发出的决定中，要求“今年一年，应该把敌伪军工作及敌占区工作提到空前的极重要地位，要把一半以上的力量用在敌伪工作上。”萧

铜就是根据这些部署,全方位地开展了对敌伪工作。这也是因为萧铜的处境,不做好对敌伪工作就很难生存。当时是被国民党顽固派赶到日寇的枪口下,即赶到日寇军事要地徐州附近、津浦铁路两侧,想借日寇的手把我们消灭。因此,萧铜别无选择,只有创造性地做好对敌伪工作,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敌后游击战。

淮北区党委在1942年12月28日的决定中还特别强调:“做敌伪工作,专靠几个党员干部是完不成任务的,应该克服宗派主义观点,运用党外人士,利用他们的旧关系去做敌伪工作,应吸收他们组成工作委员会去领导这一工作。”萧铜县委书记寿松涛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特别是考虑到这一地区最初就是由几位民主人士坚持斗争的背景,迅速成立了萧铜工作委员会,把几位关键的党外人士吸收进来。报请上级党委批准,由共产党员四人(寿松涛、曹介、孙明远、顾寒星)、党外人士三人(许西连、冯蕴言、张舒民),共七人组成,寿松涛与许西连分任正、副主任。这个工作委员会,不唯做对敌伪工作,凡萧铜应兴应革事项均由这个委员会研究决定。

萧铜县委大胆任用党外人士,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更加相信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部队和地方政权的整顿得以顺利进行。并清除了不坚定分子,团结了各层次的人士,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萧铜的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合作堪称典范。在地方

部队和政权中，除少数几位外来干部外，大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党充分信任、重用、保护他们，使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他们不仅在对敌伪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建军建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萧铜工作委员会首先分析了伪军的组成成份：他们是历史剧变中出现的一群乌合之众。其中，有甘心供敌驱使的爪牙，有混水摸鱼的不良分子，有苟全生命的青年，也有不明大义浑浑噩噩的农民，等等。他们各有各的社会背景，各有各的特殊关系，不能概以罪在不赦而论。他们当中不少人中华儿女天赋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只要晓以民族大义，动以同胞之情，是能够唤起知耻知哀良心的，是能够达到“化阻力为助力”之目的。但对于民族败类，决不姑息，必采取断然之手段。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伪军组织采取的方针是：控制两面派，争取同情者，组织革命的两面派，打击最坏的汉奸。提出的口号是“不打好人，专打坏蛋”。要求把任何一个能利用的关系都利用起来，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一点一滴也好。

皇藏区区长徐明轩与伪曹村区区长杨光沂有亲戚，皇藏区、曹村区本属于萧九区，人熟地熟，徐重点做杨的工作。杨光沂是乡间知识青年，有爱国心，是当地地主为保家产把他推举出来应付日本人的。我方也想要他敷衍一下日寇，不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他很精明，各方面都应付自如，特别对我方帮助很大。我方人员往来曹村

车站封锁线畅通无阻。他还给我们送情报，购买军用物资、营救被捕人员。有时，我们的伤病员一时转移不到皖东北的就在曹村治疗。许西连曾说过：“在日伪据点里，我军可治疗伤病员，这在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罕见的。”曹村区队，三分之一的人员是我们派进去的，里边有我们情报站的人员。敌伪据点已基本上变成我们的据点。

萧县党政军东撤时，曾留下以戴世雅为书记的秘密县委。由于国民党县政府控制太严，无法活动，不久便撤向路东。在萧西建立秘密党组织的任务，后来就由我们派进路西顽方腹地祖老楼伪据点的谢长荫承担，谢在据点内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为了加强领导，萧铜县委于1943年夏天又派县委宣传部长沙效葛化名去该据点领导萧西党的秘密工作。耿吴刘叛变后，吴信容支队的地下党支部就隶属其领导。祖老楼据点的情报站，也是我方路西情报的主要来源。在成立秘密县委前，曾先在二区部署了撤退后的隐蔽斗争，留下区委组织委员郑忠勤任区委书记。为了留下他，还做了一场“戏”。他开了“小差”，我方派人去他家，把他五花大绑带出庄，后来转移时，他又“跑”掉了。就这样，他也没有呆多久。实在呆不下去了，他通过关系去了萧城，在那里找到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张笑仙。张笑仙是受淮北区党委刘子久的指派，从南京转移到萧城的，公开身份是伪萧城模范小学校长。这一层身份还不行，经过组织同意，他又担任了汪精卫的三青团萧县委员会组织

部长。张留下了郑忠勤，共同做有关伪县政府的情报工作。

以上的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同情者，如杨光沂。一种是我们派去的内线工作人员，以两面手腕取得日伪的信任，实际是做我们的工作，成为革命的两面派。以上两例，在一个县来说，也称得上是做上层的对敌伪工作。

本来是顽方把我们逼到敌伪据点前，我们却利用敌伪据点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威胁是顽伪配合或顽伪合流。他们有时是无言协定，暗中勾结，一经发现，必须坚决予以铲除，以免养痍遗患。

在萧铜，要做好对敌伪工作，首要任务就是摸清敌情，分清伪军组织哪些该拉，哪些该打，怎么拉法和打法。萧铜工作委员会认为：沿铁路的小股伪军、伪路警、伪区队，多是本地人，工作好做；大据点的伪军，经常换防，工作难度大些，但仍可以利用群众接触他们的机会，去宣传我们的政策。对比较明智的，我们就与之建立关系，对不明智且外出骚扰的，待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就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曹村附近有一岗楼，新从外地换防来一小队伪军，不仅阻碍我军政人员过往铁路，还经常扰乱地方秩序。我方曾发出两次警告，他们都不予理睬，总队决定拔掉它。我方组织了20多人的便衣队，每人配手枪一支，大刀一把，手榴弹三枚，电筒一个。通过地下工作人员摸清地形、地物，于晚间11点左右，先由两名队员将岗楼的哨

兵生俘，令其带路进入岗楼。在十分钟内，不声不响，一枪未放，将熟睡的伪军全歼。数日后，日军又派来一个小队。这个伪军小队长还算明智，他换上便衣，亲自找到我方人员，愿为效劳。

有一次，投敌的马海川支队二营驻扎在曹村附近，负有看护铁路的责任。不少人提出要吃掉它。萧铜总队考虑，铁路线是日寇控制最严密的地方，不仅铁路两侧挖有十米宽三米深的堑壕，壕沟外边架有铁丝网，每公里还设有岗楼一座，大小路口不分昼夜都有双人站岗，消灭了这个营，日寇还会派来另一个营。该营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吃掉它不如留住它对我们有利，于是决定保留这个营。

第二节 萧西党的领导机构设在敌伪据点

祖楼靠近萧永公路，是萧县西南的重要集镇，历来是军事争夺目标。1940年11月，日本鬼子在这里设了据点，看护公路，扼住咽喉。当时，县委就想派人打进去，意在夺取领导权，把敌人的据点变成我们的据点。

年底，形势急变，耿吴刘叛变，国民党20万大军压境，接着是涡北三个月反顽斗争失利，县委指示三区将祖楼、湘山两乡的党员有计划地打进去。首先是祖楼乡党员苏步周打入据点，张祚升、任伯宇、朱永章、陈行坦不久也

打了进去。

东撤前，四区已根据县委指示，让区委书记张祚兴去了他幼年学手艺的濉溪镇某村隐蔽，参加萧县地下县委的领导工作。由单线联系的党员张祚印任四区地下党书记，把原乡支书谢长荫安插在祖老楼据点，原五营三连副连长刘世卿打入青龙集附近的王楼据点。为了掩人耳目，由先打入祖老楼据点的苏步周带人把谢长荫抓进据点，强行入伙。谢长荫又设法把刘世卿安插到王楼据点。原四区堰头乡乡长谢庆露在当地已无法活动，也由谢长荫安插在王楼据点。据点内的党员与外界党组织联系，联络地点是三区的程庄、火神庙，四区的邱庄。随后打入祖楼据点的还有刘长培、刘德茂、刘先斌、刘长修等。1940年12月30日成立党小组，谢长荫担任组长，党员有苏步周、张祚升、刘长培、刘长修、刘先斌、刘德茂、朱永章等。

东撤时，上级党组织对祖楼据点内的党员提出五项要求：一是思想上要明确祖楼是战略要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斗争到底。二是“灰色”自己，认真做好交朋友工作，要求每人至少交三个朋友。采取兵对兵、将对将的方法，因人因地制宜。三是防顽打入。四是设法搞经济收入，为党的活动提供经费。五是撤到目的地后，再派人联系。

东撤后，据点内的党员向外联系地点也有变化，一是濉溪河北菜园张哑巴家，找戴世雅联系；二是濉溪南丁楼

找戴世雅、王继珍联系。在萧县地下县委并入萧铜后，联系地点改为曹村西北七里店中药铺，找张祚兴、张祚俊联系。在据点内部，党员也是单线联系。如苏步周对任伯宇，张祚升对朱永章、蒋相文，谢庆露对刘德茂，刘长培对刘先斌，谢长荫对刘长修和“萧支”地下党支部朱达川、郝长顺、姜云等。

各地党员之间联络地点有三处，一是梁巷梁浩斌家，二是谢庆露家。谢的爱人给据点磨面，经常利用送面传递信息。谢的七岁小女孩谢荣，出入据点无人怀疑，可以随时送信。此外，磨面有盈余，有能力招待过往的同志。这里已成为三、四区及萧支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经常与据点的党员碰头的地方。另一个联络点是板桥村刘长修家的中药铺。联络方法也经常变换。有一次，朱达川、郝长顺等同志为了给祖楼党组织取得联系，用两个人抬一架盒子，以送礼的方式顺利进入据点。

我党政军东撤以后，顽军乘虚逼近祖楼，千方百计向据点内渗透。我方个别人也因形势变化产生动摇。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加强据点内党的领导，1941年7月在祖楼据点建立了秘密党支部，谢长荫任书记，谢庆露任组织委员，张祚升任宣传委员。此时，因苏步周的叛变投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陈品诗是三区区委派来的秘密工作人员，其子陈兴坦，原任祖楼乡乡长，也随父来到据点协助工作。有一天，苏步周邀陈品诗去苏柘园顽方人员苏武斌家

商谈统一战线问题。临行前，谢长荫曾提醒他们：搞统战要坚持原则，学会保护自己。陈品诗到苏柘园就被顽军扣了起来，接着又把陈品诗的二儿子陈兴坦、大儿子陈兴露抓去，父子三人均惨遭杀害。

1942年秋，苏步周又向谢长荫、张祚升传送苏武斌的话说，北政府限三天期把据点内的自卫队拉出去，不然后要拔掉据点，不唯杀本人，还杀家属。许诺自卫团到北政府维持原编制，每人官升一级。谢长荫让他先召开班以上人员会议说明白。在会上，也有人说按苏的计划行动。苏步周说：“我明天就去北政府联络，让他们来接应。我去后三天就回来。”苏走后，谢长荫和张祚升连夜找谢庆露商量，决定趁苏步周去北政府期间做好工作。他们首先召开党员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挫败苏的阴谋。然后分工负责，个别串联，说服大家。其次，准备迎战。立即着手修复工事，挖单人掩体，擦好枪，充实子弹，同时将情况告知伪区长、自卫团长冯兆祥。冯立即指定张祚升负责全面指挥。第三天，苏步周回来了。由张祚升缴了苏的手枪，下了他的洋刀，把他监视起来。伪区长也把情况告诉了日本人。晚上11点钟左右，顽军准时进入祖楼东门外寨墙沟。张祚升指挥机、步枪齐鸣，顽军还了大炮、机枪。日本人听到枪声，也开了炮。顽军听到炮声撤退，苏步周乘机带两个伪军逃走了。苏步周策反未成，顽军也不再相信他，让他在顽方干了几个月事务长了事。

相山乡顽乡长谢鸿勋曾威胁本乡的共产党员到乡公所办自首手续，祖楼据点内的党组织知道后，就给谢写信。信的大意是：这几位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你们假若威胁迫害他们，我们绝饶恕不了乡公所所有人员。顽方接信后，连忙捎信给谢庆露说好话，一再表示，决不威胁。

我党在据点内的工作指导方针是“隐蔽自己，保存实力，抓枪杆子、印把子，防顽打人”。在抓枪杆子方面，原据点内自卫团副团长由苏步周担任。苏投顽后，日伪县政府派孙金波担任。党员张祚升等人抓住机会给他交朋友，有意给他一些方便。在孙调走前，就向自卫团长冯兆祥建议，说张祚升有军事才干，他走后让张任副团长。不久，张祚升提为副团长。他会同冯兆祥又提拔了一批下层小头目。一时，自卫队的小队长，正、副班长，大都由秘密共产党员和靠近党组织的忠诚群众担任。当自卫团长冯兆祥的卫兵王玉朴被顽方人员骗到祖楼西门吃西瓜，假借看看他的二十响驳壳枪，用他的枪把他打死后，冯与顽方的矛盾加深。此时，顽方到处散布“祖楼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的舆论。秘密党员就请冯喝酒，想试探他的口气，看他是否有所觉察。冯酒后说：“在这样的年月里，要凭良心，福庭（谢长荫的号）咱爷们都是老邻世交，两三代人都相处很好，友谊深厚，今后做事也还是要靠朋友帮忙。”他说得很动情，并没有怀疑谁是共产党。顽方的恶意宣传并没有起作用，倒是我们提醒冯“利用朋友关系保护自己”

起了作用。

1943年,根据需要,秘密党支部进一步充实了支部组成人员,支部书记仍为谢长荫,委员有谢庆露、张祚升、刘长培、刘德玲。这年冬,支部研究决定,由谢长荫去萧东找萧铜县委汇报工作。谢长荫通过关系过了两道封锁线,在萧东找到了萧铜路西工委委员张祚兴与张祚俊,向他们汇报了工作,并分析了苏步周投顽后可能带来的危害。根据这一情况,他提出两条打算,一是要求县委派得力干部加强对祖楼的领导。二是撤出祖楼据点,要求县委派干部接应。张祚兴向县委书记寿松涛作了汇报。县委研究后,同意第一个方案,决定派县委宣传部长沙效葛(化名张振元)去祖楼据点主持工作,并明确萧西的秘密党组织均属其领导。萧支与祖楼之间的联络员是萧支特务连文书谢方中,他还负责把萧铜县委的密件转送给在萧支做策反工作的彭笑千。

1944年8月,四师西进,首战小朱庄,让敌顽丧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恢复萧县、永城和宿县的广大地区。9月,恢复萧四区政权,张祚俊任区委书记,祖楼秘密党支部书记谢长荫任区委委员、副区长。这年冬,祖楼秘密党支部支委谢庆露到伪湘山乡刘保昌处去玩,刚坐下,伪军一个团参谋进来问伪乡长刘保昌:“你们这里哪个是‘智信’?”刘保昌没有回答。谢庆露从容地说:“我们这里有个王志信,早就回家了。”伪参谋没有说话,停了一会就

走了。谢庆露心里明白，“智信”代号已经暴露。原来，上级党组织为了方便秘密工作，给据点内五位党的骨干编了绝密代号，仁（刘长培）、义（刘德玲）、礼（张祚升）、智（谢长荫）、信（谢庆露），祖楼据点的代号简称“智信”。现在代号暴露，这不是小事情，有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此时，谢长荫已去四区工作。谢庆露就找张祚升商量，由张祚升连夜赶到王寨附近的宁园村，找到县委书记孙明远，汇报了代号暴露的情况。孙明远书记明确指示：据点的同志应撤出来。他还部署了撤出的方法、路线和集合地点，等人员撤出后，由谢长荫接应。张祚升回到据点，经与谢庆露等人商量，决定当夜零点集合，犹豫、拖延将会发生不必要的损失。撤出来的一共4个班，40多人，30多支枪，还有家属。天亮以前，他们顺利到达王寨附近的宁园村，副县长张舒民接见了大家。张副县长讲话说：“你们在祖楼是地下工作，已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现在你们撤出来了，由过去的隐蔽斗争到今天的公开抗日斗争。”随后，县委将撤出的人员与三区区队合编为一个连，张祚升任连长，谢庆露任指导员。该连成为三区一支很活跃的游击队。

从1940年11月至1944年冬，一些同志在日伪祖老楼据点经历了四年隐蔽战线的斗争，既打击了民族敌人，也打击了民族叛逆——伪顽，同时也锻炼了自己，提高了在复杂环境下开展对敌斗争的本领。这些同志，当时都是

党组织选拔的政治坚定的同志。他们以各种身份打进敌伪据点，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当时“功实显而名不彰”。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今天，我们记载党的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第三节 萧铜在徐州开展的地下工作

萧铜县委在徐州开展地下工作，是从1941年开始的。这一年秋天，经萧铜县委研究决定，由县委敌工部部长路继先负责此项工作。他派往徐州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蒋若是和石西岩（化名石随风，1942年以后转交给淮北区党委及徐州工委领导）两人。

1942年底，萧铜县委敌工部又派许广智打入驻萧县孤山的伪军中当兵，后来调往徐州，升为排长。他曾向县委敌工部多次汇报过徐州日伪军驻防及活动的情况。

1944年，派郑达、孟捷、吴孝书三人，通过报考徐州中学进入徐州，在学生中做学运工作，搜集情报。郑达任党小组长。他们曾利用同乡关系，同在日本人控制的特高科当便衣特务的唐朝举结朋友，逐步争取唐转变，为我方搜集情报。至1945年夏，发现敌人对唐产生怀疑，为防不测，唐朝举带短枪两支，逃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5年，县委敌工部部长李华农，派党员孟繁超利

用亲友关系打入徐州市内，在坝子街某粮行当伙计。后来被特务发现，遂撤出。

为保证联络畅通和安全，我方还在徐州外围设立了两个秘密工作联络站，一处是徐州南三堡车站联络站，站长朱传友。一处是徐州西黄口车站联络站，站长胡道民。并配有秘密交通员朱世福等。朱世福家住徐州大同街，负责交通联络工作。

上述地下党员及其工作关系，在徐州活动时间最长的是蒋若是。1941年上半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磨擦的影响下，我津浦路两侧抗日根据地形势日趋恶化，坚持在皇藏峪一带活动的萧铜县委派蒋若是通过亲戚关系，把全家搬到徐州居住，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工作。

一、掩护同志。当时的津浦铁路，路东和路西虽然只有一路之隔，但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想越过铁路是非常危险的。路东的同志要到路西去，就得在津浦铁路的官桥车站上车，经徐州转道西去，再到陇海铁路的杨楼车站下车。路西的同志到路东去，也得经徐州转道南去。这样，蒋若是的家成了我方的“交通站”。为了使来往的同志安全进出徐州，必须持有“良民证”，否则就无法通过“卡子”，也无法应付敌人经常在夜间进行的突击查户口。为此，蒋若是想方设法结交了一个管户籍的警官叫默景彩，从他那里搞到户籍证明。开始，偶尔托他办一个、两个，后来关系混熟了，这个姓默的又升了“巡官”，办理“良民证”的钢

印在他手里掌握着,就更方便了。

二、搜集情报。主要是了解敌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军事行动(如日伪军搞“扫荡”)等情报。地下工作者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较大。因为同日本人不好结交,语言不通,伪军根本不了解日军的意图,等到伪军知道消息后,送情报的时间已来不及了。蒋若是利用同日本人接触较多,而又经常受日本人气的一个朝鲜人,千方百计搜集情报。这个朝鲜人叫田伊佑绪,他以随军经商为名,最初在启明路开了一家商店,娶了一个中国老婆姓王。这个朝鲜人的真实身份,蒋若是并不很清楚,但发现他经常同日本人一起喝酒。有一次,在日本人开的饭馆里吃饭,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被日本人狠揍了一顿,回家后直骂娘。蒋若是借这个机会请他喝酒,说一些安慰的话,渐渐和他交上了“朋友”,一有机会就拉他到徐州西南郊的鱼湖去钓鱼。通过接触,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日伪军方面的情报。

日本投降后,蒋若是接受了新的任务,搞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当时,徐州有个国民党元老叫刘汉川,萧县人,与蒋若是有亲戚关系。刘此时在徐州市担任中央银行董事长,住在表年路西头一家茶叶庄的后院南屋。西屋住着一个陕西人,据说是杜聿明早年的老师。蒋若是依靠与刘汉川的亲戚关系,设法搬进这个院子与刘汉川为邻,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例如,1947年春,徐州中央银行宴请驻军的将领,以招揽军界大人物,吸收存款。蒋若是利

用帮助银行抄写请贴的机会，搜集到了一部分驻军的番号、驻地、长官姓名等资料。

三、采购药品。由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使解放区的医药极为匮乏。有时派人到城里购买到一点，也不容易运出城去。而且，如盘尼西林、六〇六等一些紧缺药品，需要量比较大，购买时容易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蒋若是就想法结识了一个年轻朋友叫许瑞华。此人在世界药房当店员，通过他从内部购买，然后再通过中学时的同学刘文奎（他父亲在徐州西关教会医院当医生），把药品放在车兜里往外运，躲过“卡子”口的检查。万一被敌人查出来，就是说给郊区诊所送的。这样带了几次，都很顺利，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第四节 适时加大对敌伪工作的力度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确定对敌伪工作的形式和目标，适时加大工作力度，这是做好对敌伪工作的重要环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等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挑起太平洋战争。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运输供应困难，日寇已陷入泥淖不能自拔，在占领区仅能维持点线，并出现40多岁的老兵和十几岁的娃娃兵，往南洋调兵时，有的哭泣，有的

逃跑。我们决不放过这一动摇日军军心的极好机会，便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国际形势的变化，让日军增加思乡、悲观、厌战乃至反战情绪。

桃山车站附近有个看护铁路的岗楼，住着两个日本兵和一班伪军，其中有个外号叫“豁鬼子”的日本兵，名叫滕（或金）山四郎，是日本反战同盟的。听了我们的宣传后，他主动与我们联系，经常化装成农民给我们送情报和购买药品。有一次，豁鬼子买了好多西药，放在口袋里，化装成农民给我们送来，被旺山的民兵盘查住了。不管问他什么，他就是不讲话，手握住口袋头死也不让民兵看，民兵气了，打了他。他还是不讲话，也不让看。民兵感到奇怪。这时，他在地上写了个“许”字，又往东南方向指了指。民兵心想，他可能是找许西连，就把他送到萧铜办事处住地。许西连了解内情，向他道了歉，并招待了他，还派了民兵护送他回岗楼。

豁鬼子他们主要是看铁路，铁路以外的事情不管。有一次，我们的游击队在豁鬼子管辖的范围内拔了一根铁轨上的道钉。他就找到游击队说：“要扒路你们就扒一段，这说明你们人来得多，我没办法。你们只拔一根道钉，说明你们人来得少，这么少的人我都看不住，没法向上交待。”他请我们高抬贵手。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照顾他一下，有时破击铁路，就跳过他管辖的范围。日本人也怕下属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容易出问题，经常换防。有一段时

间，豁鬼子换防到海州，他原来管辖的一段铁路就老出问题，又不得不把他从海州调回来。

我们的对敌伪工作，除做好基层外，也做上层。例如，做好“徐州王”郝鹏举的工作。郝原任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后任淮海省长。他曾劝告汪伪政府参谋次长张耀震说：“南京不是久留之地，徐州是五省通衢，战略要地，自古以来为兵家所必争。将来盟军和重庆部队如果从连云港登陆，我们可以策应。如果他们反攻华北，我们可以联络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孙殿英、庞炳辉。他们都是老西北军的人，结成一个阵营，不怕重庆方面不重视我们。”此话流露出郝对汪伪政府并非忠贞不二，已预留后路。我们就利用他的这种矛盾心理去做工作。同时，我们了解到郝不是蒋的嫡系，受黄埔军人的排挤，在西安时因触犯了胡宗南，差点丢了性命。于是，他跑出来投靠了汪精卫。新四军军部及三、四师首长正在思考这一问题，恰巧，萧籍回家探亲的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中央委员张云川，去了华中根据地访问。陈毅、罗炳辉、谭震林、邓子恢、彭雪枫等领导接见了。临别时，张云川向陈毅提出：“愿意去争取和说服他的老朋友郝鹏举，让他与新四军建立密切的联系，将来大反攻到来时待机反击，希望陈毅能网开一面。”陈毅当即表态：“我军为着调动千军万马的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历来强调要组成最广泛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一切人员，包括上层人物，只

要他幡然悔悟，真心实意参加抗日事业，我们就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于抗日事业，都是有利的。同样，只要郝鹏举愿意和新四军建立秘密联系，我们也竭诚欢迎。”

张云川辞别陈毅到了重庆，复于1944年到郝鹏举处，郝把张云川奉为上宾。此后，张云川代表郝鹏举秘密来到淮北地区与四师联系，达成一些协议。稍后，四师派九旅参谋长冯文华，以冯玉祥的侄孙、郝的老友身份去郝处密会。郝说：“文华兄请放心，我郝某长期受冯先生教诲，始终未忘西北军救国爱民的传统。前陈毅将军派张先生前来我处，我即遵命不主动向新四军出击，并通过张先生与四师保持了联系。张爱萍、邓子恢的联络参谋（柏寒）与乜子嘉（即乜庭宾）接洽，我亲自批准子嘉兄与贵方保持密切联系。凡此种种，均表白郝某心向贵军，决不与贵军为敌。”

经过淮北区党委、四师及中共徐州工委、邳睢铜、萧铜多方面的工作，以及上层民主人士、基层各方面的关系，通过几条线，抓住几个关键人物，不仅使郝鹏举身边的智囊、军师人物成为中共特别党员，郝鹏举四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师长，也是邓子恢亲自批准的中共特别党员，即一师师长乜庭宾，二师师长张奇。乜庭宾师的一个团，1000余人，长期驻扎萧县。也曾安排该团有关人员寻找我地方党组织，终因无可靠关系没有联系上。我党的策反工

作,对促进郝鹏举 1946 年 1 月 9 日率其两万人马起义起了关键作用。虽然郝起义之后又背叛了人民,但卞庭宾、张奇等人又二次起义,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卞曾任江苏省淮阴军分区司令员、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等职。

萧铜的对敌伪工作之所以做得好,之所以能够形成四面八方分层做敌伪工作的局面,是因为上下都认真贯彻执行了 1942 年底和 1944 年初淮北区党委的两个重要文件,把对敌伪工作及敌占区工作提高到空前的重要地位,把一半以上的力量放在了对敌伪工作上,并抽出党性坚强的干部,适时派人伪军内部,派人据点,做长期打算。就以当时萧铜的路东路西来说,祖老楼据点,主要是三、四区区委派去的共产党员;争取曹村区伪区长杨光沂的工作是萧铜利用关系进行的;萧城、徐州的地下党组织,则与萧铜及淮北区党委有联系;郝鹏举的工作,主要是四师做的。这几层虽然互不交叉,但是工作成果是共享的,萧铜也深受其益。如四师与郝鹏举达成的一个协议,郝承诺决不主动向新四军出击,这就减轻了萧铜一带日伪“清乡”、“扫荡”所受的危害。若不是祖老楼日伪据点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萧铜党政军在萧西几无立足之地。至于曹村车站,已成为沟通我路东、路西的联络点,四师西进时,成万人马,就是从这里通过日伪封锁线的。上述情况,充分显示了萧铜对敌伪工作的显著成效。

第九章

重建民主政权，迎接抗战胜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重重难关，进入再发展时期。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奉命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巩固的萧铜游击根据地，为四师挥师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权重建不到一年，萧县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小朱庄战斗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坠之势，日寇在太平洋战线也逐渐失利，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侵华日寇为挽救败局，乃调集五六万人，发动河南战

役。国民党蒋鼎文、汤恩伯等部 40 万大军望风披靡，在 37 天之内，洛阳、郑州等 38 个市、县相继陷落，汤恩伯损兵 20 万，中原正面战场告急。

8 月，党中央明令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挥师西征，收复失地，牵制敌人，配合正面作战，抢救中原危局。8 月 15 日，在洪泽湖畔的半城，四师举行誓师大会。彭师长斗志昂扬，振臂高呼：“同志们，时候到了，为配合正面作战，我们一定要打回路西去，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原人民。”广场上顿时爆发出气壮山河的震天吼声。

彭雪枫师长亲率十一旅全部，九旅二十五团、师骑兵团及地方党政干部和武装，夜行昼宿，杀向被日、伪、顽蹂躏着的津浦路西。

时大雨滂沱，行军急速，每天要行百十里路，彭师长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经六个夜间的急行军，20 日晚，部队在曹村车站与夹沟车站之间越过津浦铁路，向西挺进。其时，日伪控制着铁路、公路交通要道。由于我们几年来对敌伪工作做得比较好，伪军中多有我们秘密派入的人员。因此，在我部队过铁路时，各主要路口都是我们派去的人站岗，使我军畅行无阻。

徐州以南，津浦路西，有几道蜿蜒南北百余里的山峦，挡住了西进的道路。西进必须通过永堽寨、梧桐寨、白顶山寨、时村寨。这一带山寨恰恰是国民党顽固派苦心经营的所谓“东方防线”。他们就在这几个隘口的中心地带

——小朱庄,安设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据点。

小朱庄据点是一个深沟高垒的土圩子,圩墙内侧挖了能绕圩子转一周的地下坑道,每隔数米筑地乌龟一个。地乌龟和暗坑上用木板门为盖,上复厚土,每个地乌龟内向圩墙外掏枪眼三个,配机枪一挺,长枪两支,在地乌龟内能够随时监视村外任何细微的活动。土壕宽一丈五尺,深两丈,四角都建有射孔的碉堡,还有一座石头炮楼。每座炮楼下均设有地下室。地下室与坑道连为一体,能随时调整圩内的部队和火力部署。土壕外边,围绕村子又加设鹿寨一道。圩内以房屋筑堡,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

盘踞在小朱庄一带的号称“路西东方铁军”之主力顽鲁苏豫皖边区第四十纵队王传绶部,约1600多人,有八二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千余支。王与永城的刘子仁、萧县的刘瑞岐、铜山的耿继勋互为犄角,结成所谓津浦路西“东方防线”,妄图阻我西进。此外,王传绶还在小朱庄东面山区的白顶山寨、梧桐寨、时村寨各驻一个营,高山上设瞭望哨,并派巡逻队,日夜巡逻于通道隘口,防范十分严密。

21日晨,进至津浦路西的新四军健儿,以战斗队形继续前进,三十一团为左翼,三十二团为右翼,二十五团、四师骑兵团尾三十二团前进。驻在梧桐寨的顽军警戒分队,企图阻我右路大军,稍一接触即逃至小朱庄,我遂占

领悟桐寨。我左翼大军进至白顶山，顽军以一个营的兵力，连续反扑三次。见我来势猛烈，即溃退西撤。三十二团为策应左翼，即向小朱庄前进。21日16时，对小朱庄形成包围。

21日夜，彭师长主持召开会议，地方干部参加的有许西连、纵翰民等同志。会议决定由四师主力担任主攻，萧铜总队担任北部外围警戒及地方工作。是夜，纵翰民、许西连率领随军西进的地方干部分赴小朱庄周围各乡，搞给养、担架，设立战地医院，并组织群众去小朱庄周围挖交通沟。

深夜，四师部队采取了佯攻，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数千名民工，利用小朱庄周围原有的河沟，改挖交通沟。

当顽军参谋人员向王传绶报告说，看来势此部队像新四军主力时，王传绶非常武断地说，这是几个“土八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22日拂晓，王传绶登楼眺望，见小朱庄周围挖了许多沟，顺着这些沟，随时都能靠近小朱庄。这时的王传绶才认为新四军主力确实过路了，他来不及吃饭就组织突围，在新四军的猛烈炮火打击下，几次突围都被打了回去。

天亮以后，彭师长又带着干部到阵地前沿侦察地形。他爬上一间茅草屋顶，伏在麻袋垒起的掩体后面，面向小朱庄里面观察，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可是他却镇静如

常。看过了地形之后，彭师长向各团下达了战斗任务：三十一团为主攻，向南面和西面采取多箭头突击。三十二团为助攻，攻正北和西北，东南面故意空着。因东南方离村子二里多路有一条河沟，师长估计，经我军猛烈攻击之后，顽军可能从这里突围。因此，师长要骑兵隐蔽在这条河沟里不要暴露，等敌人突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二十五团进至小朱庄西北坡里集一带，阻击西北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师山炮连和平射炮（迫击炮改装）配合，在小朱庄西南方向支援三十一团。经过一番布置之后，22日中午，我步兵在机枪的掩护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一个班上去了，两个班上去了，敌人的机枪、手榴弹像冰雹似地打在壕沟的两边，泥水溅起老高。狡猾的敌人忽然把火力从地下战壕里搬到地面，从群众家里向三十一团一营射击。我军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一营的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王传绶以13挺机枪，一会儿从群众家里射击，一会儿从地乌龟里向外射击，再加上炮楼上的炮火，都集中封锁水壕子，致使一营伤亡很大。

强攻小朱庄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墙高沟深，原先准备攻打圩子的梯子也不够长，加上刚下过大雨，地上滑得站不住脚，很多同志没爬上圩墙就倒下了。少数同志冲过火力网，爬上墙头，又被敌人的刺刀推了下来。

圩墙爬不上去，一些同志想从庄门突进去，但敌人的机枪火力封锁得十分严密，上去一个倒下一个。

第一次攻击失败了，伤员被抢救下来，阵地上变得一片沉寂。

晚上，为了疲惫敌人，集中了整个部队的司号员，在小朱庄周围一阵一阵地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同时派出几个小分队，带着机枪、步枪、手榴弹不断搅扰敌人。这一来，吓得顽军又是打枪，又是打炮，一夜没有睡觉。

小朱庄西南角，有一所小学，房屋较高，彭雪枫师长便把前沿指挥所搬到这里。

8月23日凌晨，彭雪枫、张震、滕海清以及许西连、纵翰民等同志对何时打下小朱庄作了研究，决定当天12时发起总攻。

我军从小朱庄西南角发起冲锋。彭雪枫、张震、滕海清、许西连、纵翰民等同志，都以普通战斗员的身份在交通沟里参加战斗。彭雪枫同志有时还爬到前沿指挥所的房顶上，用重机枪指挥战士们冲锋。

小朱庄的地下战壕是从土墙往外掏的死枪眼，当我部战士靠近土墙，爬上梯子时，敌人战壕的火力就失灵了。王传绶一见小朱庄有失守的危险，就组织一支敢死队，赤臂提刀，在圩墙上来回督战。我指战员几次爬上云梯，都被砍伤落水。

王传绶从敢死队中选拔出几十个特别凶残的亡命之徒，赤臂挥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在圩墙上和我战士拼搏，阻拦我部不能迅速攻入圩内。

8月23日上午12时,彭雪枫一声令下,嘹亮的军号声,震撼着龙河、闸河两岸,四师的英雄们向小朱庄守敌发起了总攻。

骑兵团在政委姚运良、团长周纯麟的带领下,在小朱庄东南的小河滩里摆下了数里路长的骑兵埋伏阵,三匹马一组,持戈待命。

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四师主攻部队,在萧铜总队及各乡民兵、担架队的配合下,像潮水一样席卷而上。

我军组织了投弹组,专门向圩子里投掷手榴弹。步兵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往圩子里猛攻。阵阵枪声和密集的手榴弹爆炸之后,西南角的突击队便迅速穿过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开阔地,一下子扑进了外壕。战士们放下扶梯,越过外壕,随即扔出一批手榴弹,借着烟幕的掩护,一口气冲到墙根,放下梯子,飞快地爬上圩墙。

刚一上去,只见一群敌人发疯似地从圩子下跃起,端着刺刀反扑过来。战士们轮起大刀,端起刺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激烈地争夺着圩墙的一角。十几个敌人全被我们砍死了,上去的突击队员也牺牲了几个,剩下的几个朝墙内又扔出了几颗手榴弹,趁势突进了圩墙。

我军发起总攻后,平射炮首先轰击了土圩子西南角和东南方向的土炮楼。这时,王传绶把火力全部集中在圩子的正南和西南方向,圩子的西北方向空虚着。三十二团在三十一团发起攻击时,乘圩子西北空虚,顺利攻入圩

内。攻入圩内的三十一团与三十二团的几股力量，相互呼应，扩大战果。顽军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反扑，战斗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西南角被我突破后，南、西、北三面也攻了进去。当我军向纵深发展时，顽军退到村东头的一个大院里继续顽抗。凶残的顽军把大院周围的房子都点着了火，熊熊的大火加上顽军的火力封锁，部队被迫停了下来。

这些情况，彭师长在圩墙上看得很清楚，他告诉大家把衣服浸湿，利用老百姓的家具作掩护，又叫前沿的指挥员组织火力封锁顽军的枪眼。部队稍停之后，又发起了新的冲锋。

在猛烈的炮火中，部队逐渐逼近大院。负隅顽抗的敌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开始向村东蠕动。师长命令周纯麟团长赶快回去作好准备，并嘱咐他等顽军全部出了圩子再打。周团长立刻飞马赶回骑兵团阵地。

河沟里，骑兵团的战士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周团长传达了命令之后，一个个摩拳擦掌，立即勒紧了马肚带，拉紧了缰绳，抽出了大刀，随时准备上马厮杀。

大家精神抖擞，注视着圩子里的动静。忽然，一个战士高喊：“团长，敌人来了！”果然从圩墙里涌出一群人，像一片蝗虫，你碰我砸，愈来愈多，不一会儿就离开了圩子。周团长立即命令司号长李玉兴吹号上马，并叫通信员发出冲锋的信号。

“上马!”随着各级指挥员的口令,战士们一个个纵身跳上战马,猛抖僵绳冲上河岸。拥挤的敌群在我第一批马队的机枪扫射下被打散了,第二批马队冲过去又砍又劈。雪亮的马刀在敌群中上下翻飞,刀声、枪声、马叫声、人喊声混杂在一起,战斗场面惊天动地。

骑兵团战士冲过去又杀过来,直杀得敌人晕头转向。队伍里到处喊着:“不要放过缺耳朵的王传绶!”“活捉王传绶!”

骑兵团五大队给养战士王长金,是一个大个子红军。这时,他正带着几个炊事员来给部队送饭,看到战士们在敌群中纵横驰骋,砍杀敌人,他也立即跃马挥刀杀入敌群。正杀得酣畅,忽然看到十几个长短枪齐备的家伙,簇拥着一个光着脊梁的大个子,枪打不散,边打边跑。王长金纵马追去,当他的战马驰进敌群时,他对准那个大个子猛砍一刀。忽然有一个敌人向他的腹部捅了一刀。王长金一阵剧痛,身子一晃就倒在马背上了。顷刻间,当他抬头看时,发现几个敌人架着那个大个子又继续逃跑了。王长金同志忍着伤口的剧痛,拨转马头再次冲进敌群,对准那个大个子的脑袋又狠狠地劈了下去。敌人又向他打了两枪,王长金同志全身是三处受伤了。有一个战士看到王长金满身是血,连忙喊道:“看你肚子上拖的什么?”王长金低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肠子已从伤口处拖了出来。没走多远,他一头栽下马来,英勇牺牲了。后来查明,被他砍死

的那个高个子正是罪恶累累的王传绶。

小朱庄的激烈战斗历经三个小时结束。共击毙顽四十纵队司令王传绶等 300 多人,俘纵队副司令王忠鼎、政治部副主任张小侠(张学印)以下 1300 多人,缴获八二迫击炮 2 门,轻重机枪 35 挺,步枪千余支,子弹一大批。这次战斗,是我军攻坚战、歼灭战的辉煌战例。

刘瑞岐闻知王传绶被围,于 8 月 23 日日夜兼程赶来增援。其先头部队与我萧铜总队相遇,一触即溃,刘瑞岐率部逃到陇海路北去了。永城的刘子仁与王传绶曾喝过鸡血酒,盟过誓,闻王传绶被围,他从保安山带两个团前来增援,行至王柳园村一带,听说王传绶部全部被歼,即率部调头西逃。8 月 24 日,吴信元部起义。至此,王传绶等结成的津浦路西“军事同盟”被彻底打垮,为我军收复中原扫除了一大障碍。

第二节 争取吴信元起义

吴信容带领的原八路军四纵六旅第十八团,前身是萧县抗日游击支队。该团干部和士兵中党员很多,只要做好工作,使之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可能性很大。当时,耿蕴斋的部队很少,主要是依托吴的部队活动。因此,争取耿关键是做吴的工作。况且,吴的态度很明朗,对他不仅是争取,而且要团结。指导思想就是团结吴、争取耿。

早在1941年5月东撤时,作为党外人士,已卸任一年多的原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笑千,没有跟随豫皖苏边区党政军人员一起撤往皖东北,而是留在了宿西,住在柳子村陈辑武家。吴信容从彭笑千的本家侄子彭梦楼那里得知彭笑千没有走,就叫他想法找到彭笑千。6月中旬,彭笑千从宿西来到萧六区彭瓦房村彭梦楼家,见到了留在萧西的张舒民。他俩商量后,认为要想办法联系上在萧东坚持打游击的许西连。许西连应邀在六区东部薛村山窝会见彭、张。此后,许去宿东向吴芝圃汇报了情况。吴芝圃听了汇报后,作出了让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吴信容支队的争取工作的指示。

吴芝圃到达淮北区党委以后,说明了情况。为了进一步促成此事,又由彭雪枫、张震、吴芝圃三人联名致函彭笑千,委以在萧西坚持斗争的重任,同时将一封三人联名给耿吴的信请他转交。彭笑千约吴信容到六区车牛返村晤面,将彭雪枫、张震、吴芝圃三人联名给他与耿蕴斋的信交给了他。吴看过信,悲悔交集,痛哭不已,深为此诚恳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所感动。之后,彭笑千即移住吴部,耐心细致地做吴的思想工作。吴信容不仅思想上有所悔悟,而且有具体的表现:一、吴信容没有亲自去接受国民党的番号和委任状,而是一直穿着新四军的旧军装;二、他不要国民党派来的干部,也不准国民党县党部在萧支搞共产党员的自首登记;三、吴信容把进步人士胡先洲、

杜尉农、张兆坤等一批人保护了下来。后来，四师首长又联名给胡仙洲写信，请他配合彭笑千共同做好萧支的转化工作。为了方便萧支与淮北区党委和四师的联系，1942年8月间，决定在萧县黄口车站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由胡道民负责，杨醒参加。为防失密，双方来往信件均不署名，只在信皮上写“西”（津浦路西）和“东”（津浦路东）字样。至此，渠道开通，联系频繁。

国民党顽固派是不能容许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耿吴转化工作的。首先由汤恩伯出面，于1941年秋电告耿蕴斋去后方，委以少将副司令的闲职，在沙河边过着垂钓生活。1942年3月上旬，又是汤恩伯出面，亲笔致函彭笑千，要彭去临泉汤总部面谈。彭去后，即把他扣押在临泉城北乌庄。是年底，萧县土顽刘瑞岐也容不得张舒民留在萧西，曾派人暗杀他，逼得张去了萧铜地区。

在彭笑千、张舒民在萧支做争取工作的同时，淮北区党委和四师责成萧铜县委选派政治坚定、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进入萧支。萧铜县委设在路西日伪祖老楼据点的地下党领导机构，决定派中共党员朱达川打入萧支，做党的秘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朱达川和姜云、杜长苓、郝长顺等人取得联系，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朱达川任支部书记，姜云、杜长苓、郝长顺任支部委员。秘密党支部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广大官兵，掌握萧支武装，争取萧

支早日归队。

朱达川依托姜云、杜长苓、郝长顺在萧支的位置和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站住了脚跟,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们利用亲友、同学、同乡、宗族、帮会等各种关系把一大批中下层军官拉到自己身边,并在他们中间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晓以民族大义。使广大官兵明确:一、萧支原是我党创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应发扬光荣传统。二、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坚持抗日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三、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狼狈为奸,假抗日真反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通过宣传,使广大官兵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

国民党顽固派也深知共产党在萧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一天也没有放松对萧支的渗透和干预。他们一方面对萧支上、中、下层军官进行收买利诱,并利用萧支中的反动分子孙以仁(时任参谋长)、王启贞(参加过国民党临泉县训练班,系军统特务)等人进行奸细活动,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官兵,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汤恩伯派来中将特务张荣田给吴信容施加压力,要向萧支各营、连派国民党党代表,企图进一步控制萧支。我党得知这一情况后,采取相应对策,首先通过彭笑千、张舒民、胡仙洲、杜慰农等人,就国民党向萧支派员一事从不同角度向吴信容晓以利害,揭穿国民党妄图削弱、瓦解萧支的阴谋。其次,秘密党支部发动中下层官兵起来抵制。在绝大多数官兵的

强烈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一计未成，又施一计，1941年12月，孙以仁、王启贞与萧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路治久勾结，炮制出要萧支共产党员“登记自首”的花招。萧支秘密党支部立即向祖老楼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情况。地下党组织作如下指示：一、想尽一切办法，粉碎敌人的阴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同志留下，没条件的撤出。二、与彭笑千等人联系，由他们设法制止。朱达川回到支队将指示向党员作了传达后，一方面在中下层军官中大造舆论，指出“登记自首”是对跟共产党干的人人格上的侮辱。跟共产党干的都是坚决抗日的，这不是什么污点，而是抗日有功，为什么要“自首”？何过之有？何罪之有？群情激愤。另一方面，通过彭笑千以及进步的中层军官向吴信容做工作。他们对吴说，孙以仁等人事前未向您请示，事后又未见您点头，他们自作主张，运来表格要官兵“自首”。这是对萧支的侮辱，也是对您的侮辱，这明明是拆您的台！一下子把吴信容激怒了。吴大发雷霆，令孙以仁等人当众烧掉了“自首书”。

吴信容叛变后，虽然干了一些破坏萧县抗战局面、危害萧县人民的坏事，但在我党上下结合、“两轮并进”的攻势下，吴信容还是步步回头，明显地站在了进步势力一边，逐步向党靠拢。吴的这些表现，已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猜忌。刘子仁就趁机向汤恩伯密报说，吴信容有通共之

嫌。刘子仁早有吞并萧支之心，当初煽动蒙骗吴信容叛变是满足一时之需，如今为了满足他更大的政治野心，想借汤恩伯之手吞并萧支，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吴信容这时已认清了刘子仁的险恶用心，悔恨不已。秘密党支部和进步民主人士都坚信，只要继续争取，吴信容率部“反正”是指日可待的。遗憾的是，吴信容的觉悟迟了一步，国民党顽固派是容不得他觉悟的。1942年3月中旬的一天，吴信容应国民党军统特务钱某之邀，到萧县四区王柳园村王延年家赴宴。宴毕，于当日暴病，延至七八天（3月24日）而死，年仅30岁。疑为刘子仁借军统特务之手害死吴信容，使萧支群龙无首，趁机吞并。

吴信容突然亡故，萧支出现了动荡，各方面纷纷插手。刘子仁认为操纵萧支命运的机会到了，极力推荐自己的势力攫取萧支的指挥权。萧县国民党实力派刘瑞岐，全力保举国民党将领王仲廉的妹夫陈德增接任。萧支的指挥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事关萧支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非常时期的关键时刻，秘密党支部以及仍留在萧支的进步民主人士胡先洲、杜尉农、欧阳圣德等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取得如下共识：由吴信容之弟吴信元出任支队长最为合适。这样，一是迎合了部分人的宗法观念，可孚众望，能消除内部分歧；二是可以阻止国民党反动势力插手；三是可以麻痹刘子仁，稳定局势（刘向来认为吴信元年轻无经验，可以拉拢）。淮北区党委和四师得知这一情

况后，即派石西岩到路西同胡先洲、杜慰农等人会晤，了解情况，并传达淮北区党委和四师的意见：严防国民党顽固派对萧支的插手，制止分裂。要说服全体官兵，由吴信容胞弟吴信元继任支队长。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进步民主人士和秘密党支部在广大官兵中极力宣传吴信元的才干，树立其威信，很快赢得了大多数官兵的认可，统一了各方面的意见，使吴信元顺利地完成接交任务，稳定了局势。

1942年9月，彭雪枫、张震、吴芝圃联名致函吴信元，对吴信容的去世深表哀悼，并附抚恤金一百块大洋，交吴信容家属以资慰问。吴信元遂回信致谢。

刘子仁、刘瑞岐夺取萧支领导权的阴谋被挫败后，复以两项措施想挽回残局。他们先打出武力解决的牌，联合国民党正规军合剿萧支。萧支获悉国民党于学忠部向萧支运动的态势，便依靠萧县老区的群众基础，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使国民党摸不到萧支活动的规律。刘子仁与刘瑞岐又张开经济封锁的网，既不接济粮饷，也不准萧支在活动区域内征收田赋。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秘密党支部号召党员拿出自己的津贴给萧支作军需，带头吃糠咽菜，用省下的钱买枪支弹药。党员的言传身教，影响很大，军饷发不出官兵也无怨言，同甘共苦，为萧支的生存而战。秘密党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1942年底，已有27名党员。其中，12名党员担任连排干部。

1943年底，当形势发生变化，萧支遇到困难的时候，淮北区党委以陈毅、彭雪枫的名义给彭笑千写信，托民主人士张云川捎到太和，请彭笑千火速返回萧县，做萧支的起义归队工作。彭笑千接信后，从太和国立二十一中逃回萧县，迅即潜入萧支。吴部虽已兄死弟代，但对彭笑千的敬重和欢迎依然如故。此时，彭笑千、吴信元最想了解的是边区党委的政策和四师的发展状况。听说张舒民在萧铜地区，便邀他面谈。张舒民把自己去淮北区党委汇报工作时遇到的情况和陈毅、彭雪枫争取吴的渴望，以及准备收复豫皖苏边区的打算，详尽地告诉了彭、吴。两人兴奋不已，进一步坚定了起义的信心。

1944年8月，张舒民忽然接到彭雪枫发来的电报，通报了四师即将过路西的决定，要他先期到达萧西配合彭笑千策动吴信元起义。8月23日，彭雪枫率部首战小朱庄获胜。次日，吴信元率1500名官兵在吴集北大孙庄宣布起义。至此，离开党近四年之久的萧支，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1945年3月，萧支改为萧县独立旅时，四师首长张爱萍、张震、吴芝圃亲临大会祝贺。张爱萍师长代表师党委讲话：“萧支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队伍，中间虽然走了一段弯路，最后终归回到党的怀抱。同志们放心，所有坚持过来的都是抗日军人，抗日牺牲的同志为烈士。从此以后，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直到取得抗日战

争的最后胜利。”

第三节 三方政权与三面政权

杭州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仓修良，曾对萧县的抗战史有过研究。他在论述其三方政权的一篇文章中说：“同一个时期存在三个不同性质的政权，时间达五、六年之久，而且全面开展了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再典型不过了，记载下来将对历史学界是个大贡献。”

抗战期间，萧县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三方政权，在一个县主政的有3个县政府，3个县长；10个区，有30多个区长。

萧县抗战首举义旗的是共产党，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十个区长。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我党政军被迫东撤，这里只剩下一个乡政权。国民党此时建立县政府，重新委派十个区长。在萧东，我们在一个乡的基础上，又发展到拥有九个区的政权，成立了萧铜县政府。与此同时，日伪把萧县划分成12个区，委派12个区长。在一个区之内委派几个区长的事是常有的。比如六区，我方委派孙清怀为区委书记兼区长，国民党县政府委派王士秀任区长，一个在路南，一个在路北。王士秀经常夜间带人到路南拉户抢劫，使人不得安宁，我方端掉他设在陶楼的情报网后，社会秩序才安定下来。日伪县政府先委派

耿辑五,后委派王德平为六区区长,区公所设在曲里铺。

政权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政令的五花八门,各行其是。日伪、顽、友、我之间的各种矛盾与斗争交织在一起,集中了国际国内多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在一县之内出现这种情况历史少有。三方政权势均力敌,全面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更是全国罕见。

萧县的三方政权,始于1940年3月至4月间。2月,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笑千辞职。3月,县参议会在四区王柳园村开会,推选纵翰民为县长。4月,日伪成立县公署,邵世恩任知事。5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任命朱大同为萧县县长。从此,三方政权形成。当时,因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在陇海铁路以外,群众称为“北政府”。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在陇海铁路以南,群众称为“南政府”。

三方政权形成势均力敌之势,则是始于1942年,成于1943年。豫皖苏边区党政军1941年5月东撤,萧县国民党顽固派从路北向路南扩张。原抗日民主政府行政科长许西连,经批准留在萧东打游击。此时,抗日民主政府只有一个乡的弹丸之地。经过两年奋斗,夹缝中求生存,发展成方圆百里包括9个区、50多个乡的游击根据地,成立了萧宿铜灵县政府。它不仅包括萧县的地盘(萧县只有九、十区),还包括铜山的五区、七区,宿县北部的股东与股西区,以及灵璧的一小片地方。利用两省四县犄角地带,开展敌后游击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萧县抗日武装,有先后组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萧县常备总队、萧县抗日游击支队、萧县独立团、萧县独立旅,共6个团,8300人,陆续上升为主力部队。东撤后,留下部分同志坚持萧东抗战,只剩下不足一个连的兵力。经过半年努力,组建了萧铜独立营,发展到400多人。1942年9月改建萧铜总队,下辖3个营,1500余人。1944年初,萧铜总队提升为邳睢铜军分区独立团之后,萧铜又在区、乡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萧铜总队。

刘瑞岐当上国民党萧县县长后,在萧县西部安营扎寨,把南北之争变成东西对峙,三分天下有其二,国民党县政府称为“极盛时期”。兵力拥有刘瑞岐鲁苏豫皖边区第三纵队,2000余人;王传绶的边区第四十纵队,1500余人;十区谢碧如支队与二区郭效冉支队,共1000余人。这还不包括耿吴刘叛变后,吴信容部改编的边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的1500人。

萧县日伪的武装力量,根据1942年9月30日伪县政府统计:县警备队803人,枪634支;各区自卫队907人,枪690支;警察局264人,枪91支;计1974人,枪1415支。日伪地方武装力量虽不多,但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却驻有重兵。徐州郝鹏举部也庭宾师常驻萧县1个团,约1000余人。日伪在萧县的总兵力,加在一起约3000人。

在战争时期,三方都把抓军事作为头等大事,这是必然的。与军事斗争不可分割的,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比如,三方都加强政党建设。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国民党奉行“以组织对组织”的方针,在组建县政府的同时,即设立了国民党萧县县党部,积极发展国民党党员。汪伪政权也不甘示弱,成立了汪伪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委员会。

抗日战争前,萧县没有中学,只有一所简师。为了争夺青年,争夺人才,三方都办中学。国民党县政府在四区守备庄、张三座楼办了萧县中学,抗日民主政府在路东办了萧铜中学,日伪县政府在黄口办了西萌中学,收留因战火而失学的青年,培养对自己有用的人。其办学性质,正如陈毅在淮北行署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日伪为顺民教育,国民党为愚民教育,我们为反帝反封建的、大众的、科学的教育。”

为了增强自己的财力,三方都有自己的纸币。抗日民主政府发行了“萧县流通券”,国民党县政府发行了“萧县兑换券”。汪伪县政府虽未发行地方纸币,但却利用去徐州购货非用日币和汪伪政府出的联银券不可的特殊条件,在县城设了专门兑换处,民众只有用在当地流行的流通券换成法币,用法币再兑换联银券,才能去徐州购货。日伪坐收其利。

三方舆论界都有地方上小有名气的笔杆子，笔战也十分激烈。三方都办了报刊，抗日民主政府办了《萧县实报》，国民党县政府办了《萧县导报》，日伪县政府出了《宣传周刊》。

三方政权为什么能在萧县形成鼎足之势，而且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萧县地处四省犄角地带并有两条被日伪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国共双方都凭借两条铁路作为屏障，利用几省、县交界处作为回旋余地，才得以周旋，站得住脚。1940年底，国民党县政府凭借陇海铁路得以在路北发迹。1944年8月，四师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国民党县政府又缩回陇海路北，把管粥集一带作为栖息之地。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1941年5月，豫皖苏党政军人员东撤，许西连等人所以能在萧东坚持斗争，除山区有险可凭外，也是因为津浦铁路作屏障，能减少和避免与国民党顽固派直接冲突。

由于三方政权带来基层政权的多元性，在日伪、顽、我边缘地带，一些乡政权与不少保政权，是两面或三面政权。它们中间，有进步的，有中间的，也有死心塌地投靠敌伪的，形成一面、两面、三面、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局面。

当时的萧铜根据地，从日伪的地图上看，全是日伪的“治安区”或“半治安区”，一条铁路将其分成东西两大片。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建我方政权，完全是从日伪手里一点一滴掰出来的。我们的起点，只是一个乡的政权。先是通

过游击活动与附近乡、村建立一般联系,让他们送粮、送草、送情报,次数多了,由一般联系变成我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也就成为既为我们办事,也为敌伪办事的两面政权。对这种政权的乡、村主持人物,如乡长、保长,少不了一些威慑手段,使他们既老老实实为我们办事,又不敢给敌人通风报信。当我们认为靠得住时,即可化装分散,隐蔽在他们中间。因为与敌短兵相接,只有聚则成军,散则为民,才能坚持下去。这里首要的条件,就是群众能保护我们。

对改造日伪严密控制下的政权,不可操之过急,不然树敌过多,欲速则不达。但也不可优柔寡断,能改造也不敢进行大胆改造,错过时机。条件一旦成熟,就要大胆地将“两面政权”改造成为“两重政权”。所谓“两重政权”,就是两个乡长、两个保长,分别办公。也就是我们要及时地指派自己的乡长、保长,使进步的与腐朽的两种政权并存,让群众加以鉴别。群众认识提高之时,也就是敌伪政权废除之日。这就是我们将敌伪的“一面政权”变成“两面政权”、“两重政权”的过程,萧铜抗日民主政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作后盾,改造敌伪政权是随着武装斗争的推进而扩展的。

1944年11月萧铜分建时,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8个区公所,72个乡政权。据统计,在这72个乡政权中,有一面政权30个,两面政权31个,三面政权11个。

第四节 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

小朱庄战斗胜利结束,吴信元率部起义,为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基层政权的多主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抗日民主政权作用的发挥。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急剧发展变化的需要,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已刻不容缓。9月初,萧县政权重建。开始是萧县新收复地区与萧铜县合并,仍沿用萧铜县的名称。

新组建的县委,由纵翰民任书记,孙明远为副书记,委员有扶廷修、王尚三、朱玉林、孙清怀。抗日民主政府由彭笑千任县长,许西连为副县长,秘书冯蕴言,民政科长张舒民,财粮科长朱振东,司法科长谢继恩,教育科长杨兴瑞,公安局长王尚三、副局长单劲之,交通局长刘建生。建立了十个区委,一区区委书记林星锐,二区区委书记葛玉环,三区区委书记孙明远(兼),四区区委书记张祚俊,五区区委书记李繁洲,六区区委书记孙清怀,七区区委书记朱玉林,八区区委书记李华农,九区(天门区)区委书记武玉振。后来,为了开辟徐州西南外围的工作,建立了阾河区,调葛玉环主持该区工作。各区区长大部分由区委书记兼任。全县绝大部分乡、村政权,已从顽伪手中接管过来,只有边沿地区保留小部分两面政权。二、九区大部,

三、四、五区全部,六、八区一部分,均为我较稳固的管辖范围。

新组建的抗日民主政府,其构成人员基本上仍是东撤前的领导框架,国民党顽固派已经分化出去。如原县政委员会中的王子石、马济民、纵止韩等。一些民主人士,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加靠近党组织。如他们中的彭笑千、许西连、冯蕴言、张舒民、谢继恩等。这些进步的民主人士,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共赴国难。他们关心政治,有“天将降大任与斯人”的抱负。他们由同情革命到投身革命,直到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彭笑千担任三个月萧县县长以后,1944年11月豫皖苏边区二专署成立,他奉调担任专员。此时萧铜分建,重建中共萧县县委,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成立,许西连任县长,张舒民任副县长。萧铜独立团第三营留在路西,改为萧县总队,许西连兼任总队长。

县政府恢复初期,社会秩序相当混乱,顽军散兵游荡,土匪很多。我们一方面对破坏社会秩序的阶级敌人坚决打击,一方面约法三章,贯彻“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既往不咎”的政策,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使阶级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迫使土顽党政军数千人纷纷投案自首。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注重履行自己的职责,抗日与民

主一肩挑。首先是抗日,这是属于民族斗争的范围,但也不忘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矛盾范围)。因为不解决民主与民生问题,就不能广泛发动民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44年11月4日,新组建的抗日民主政府召开行政扩大会议,部署冬季开展的大规模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在边沿地区,加强对日伪顽的斗争。在“双减”和反霸斗争中,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在减租减息方面,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种”,也有的实行倒“四六”,减三至四成。通过“双减”和反霸斗争,农民获得了斗争果实,有了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而组织起来的愿望。抗日民主政府因势利导,发展了农民救国会组织,扩大了民兵队伍,大力表彰送子送郎参军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县总队由西进时的5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双减”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四、五、三、二区,每区都建立了100多人的区队,其余各区区队也有五六十人。边沿乡镇政权还建立了乡队。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基干民兵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了重建的政权,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成果。

在1944年至1945年的群众运动中,也发展了一批贫雇农先进分子入党,以二、三、四、五区党组织发展得较好。1944年党员人数是350多人,建立了21个支部,49个小组,分布在48个村庄。到1945年上半年,党员人数

已发展到 420 人,建立了 24 个支部,55 个小组,分布在 85 个村庄。

重建县政一开始,县民主政府就注重恢复学校。相继开学的有高小 10 多处,学生 650 人;初小 224 处,学生 6000 多人;教员 315 人。每区还开办冬学 5 处。1944 年 11 月份,着手创办萧县中学,校长杨兴瑞,招收学生 220 人,教员 12 人,确立了抗日爱国教育、民主教育、生产教育的方针。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在四区杭子一带流动教学。1945 年 2 月,淮北二专署将萧县中学与永城中学合并,在萧县四区张庄寨成立建设中学,专员彭笑千兼任校长,副校长为王卓然。4 月开学,学生 600 多人,设师范、中学、建设 3 个部。暑后招收新生 300 人,在王白楼子村设了分校,年底迁往永城,至 1946 年 8 月停办。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1945 年 7 月上旬,中共萧县县委在四区刘店子村张家祠堂召开了 500 多人的党员活动分子大会,吴芝圃传达了中共中央七大精神,并用一周时间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会后,萧县县委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三项工作:一、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减租减息运动;二、整编和扩大抗日武装,对敌发动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迫使敌人成为瓮中之鳖。三、发动轰轰烈烈的劳武结合的军民

大生产运动。

第五节 迎来抗战胜利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8月9日，四面楚歌的日本法西斯向中、美、苏、英发出了乞降照会。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8月11日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8月13日，淮北二地委在萧县传达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并宣布了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布的有关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当日夜，中共萧县县委研究了接收萧县境内敌伪据点的具体方案，并以萧县总队的名义向驻守在萧城、黄口等地的日伪军、伪政权发出了通牒，令其在限期内向我党领导的萧县人民军队缴械投降。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

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苦难而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以不同方式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萧县的抗战史,始于1938年5月18日萧城沦陷。七年来,萧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由抗战初期的1个区委、6个支部、65名党员发展到10个区委、71个支部、1457名党员。地方武装的发展更快,除去陆续上升主力部队的部分,萧县总队尚有1000多人。各区都有50~100人的区队,边缘地区的乡政权还有基干武装。此时,日伪据点普遍处于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包围之中。

第十章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战胜利后，我们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内战的方式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为争取和平民主，萧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与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

第一节 接收县城

抗战胜利后，萧县人民的心情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消除内战，从此摆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生活，休

养生息,重建家园,安居乐业。但是,与人民意愿背道而驰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蓄意制造内战,谋求独裁统治,不惜将人民重新推向战争的灾难之中。

8月18日,侵华日军秉承美国和蒋介石的旨意,武器只交付国民党方面,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中共中央据此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的伟大号召。萧县县委以萧县总队的名义,向县内各日伪据点的日伪军、伪政权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缴械投降。这个通牒没有发生效力。

8月底,萧县军民开始对敌伪展开猛烈的攻击。新四军十二旅三十四团配合萧县总队第三营攻打陶楼伪据点,激战中,萧城伪军五六百人出城接应,被萧县总队击退。陶楼据点的日伪军100多人束手就降。接着,又连续攻克了丁里、吴庄集、岱桥、郭洼、大吴集、青龙集等十余处日伪据点。黄口车站是徐州西陇海铁路上较大的日伪据点,驻日军一个小队,伪军200多人,工事构筑比较坚固,又在交通线上。萧县总队接收据点时,日伪军不愿缴械,武力顽抗,未克,后被国民党接收了。

盘据在萧城的伪军刘胡邦部,800余人,凭借坚固的工事,拒不向新四军缴械。由张震任旅长的四师十一旅,奉命于10月中旬用武力解决萧城拒不投降的伪军。10月2日,长期搞顽伪合流的国民党萧县县政府和伪军暗中勾

结,接收了萧城的伪军。是可忍孰不可忍?旅部决定:按原作战计划执行。为了摸清变化了的情况,张震旅长亲临前线勘察地形,了解工事部署情况,并责令地下党组织详查城内的兵力、火力。为了便于指挥,张震移旅部于县城近郊的老宅子村。待摸清情况后,借鉴过去的攻城经验,反复研究打法。总的部署:三十一团担任主攻;三十三团负责歼灭城北凤凰山之敌,占领制高点;骑兵大队在萧永公路警戒待机;萧县独立旅部署于城东山口,防敌突围,阻敌增援。三十一团第一营加强迫击炮连一个,山炮一门,担任主攻,由城西北角突破。第二营加强迫击炮连一个,担任助攻,由西门相机突破。第三营为团预备队,尾第二营跟进。各营明确任务后,从思想、战术、战斗动作、战斗器材以及步、炮协同诸方面,均作了缜密准备。

10月17日下午3时许,部队从驻地坡里集葛塘出发北行,向萧城开进。行进中,各营、连严密封锁消息。18日零时30分,第一营隐蔽地进至西北角城墙下,占领有利地形。二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西关守敌,并顺利地攻下西关炮楼,瞰制西门。三营紧随团指挥部,进至西关北侧待命。凌晨4时许,攻击开始。霎时间,枪声大作,炮弹轰鸣,喊声四起,萧城上空已是火光一片,突破与反突破的激战顿时展开。

在城西北角主攻方向,一营爆破组在城墙上爆破成功,炸开了一个二、三米宽的缺口。三连迎着炮弹和炸药的

烟尘，迅猛地越过护城河，在城墙缺口处架梯登城。守敌突遭猛烈进击，仓惶溃逃。一、二连紧随三连乘机突入城内，直插东门。敌军很快以一个连的兵力向一营反扑，妄图趁我立足未稳封锁突破口，遭到一营有力地冲击后，残敌调头鼠窜。

在城西门助攻方向，二营积极地组织战斗，以吸引敌人的火力，支援一营登城。他们不顾伤亡，首次爆破未成功，又迅速组织第二次爆破。四连在炸药爆炸的声浪中，将数副云梯靠上城墙。勇士们不怕牺牲，争先踏梯登城，打退城墙上的守敌，冲入城内，打开西门，迎接后续部队进入城内，与敌人逐屋逐院地争夺，战斗十分激烈。为迅速扩大战果，团首长命令二梯队三营从西门进入城内，投入战斗。三营以一个排的兵力沿南城墙内侧向南门方向猛插，防敌从南门逃窜。其余兵力与二营并肩战斗，向东突击，扩大战果。

在各营与敌军进行激烈巷战时，一个敌军官督百余名敌兵，拼命向城北门反扑，妄图重新控制北门，夺取制高点，封锁突破口，以便夺路逃跑。一营二连两个排的战士，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居高临下，猛烈还击，毙敌 20 余人，残敌在混乱中往东回窜。

6 时许，守敌已被逼至东门两侧。一营包围敌一个中队，在火力攻击和政治争取下，迫敌举旗投降。200 余敌人龟缩到预先设防的两个大院内，被三营团团围住。我军乘

胜组织攻击，摧毁工事，冲进院中，生俘残敌 200 人。二营围困的敌人，固守在一个核心阵地中，一时未能将其歼灭。团首长调集火力支援二营，连续对敌射击，敌阵地千疮百孔，防御力量再衰三竭，二营乘势攻克，歼灭残敌。退守城东南之各处敌兵，负隅顽抗，与我展开激烈的反复争夺。激战至 12 时，三十一团及萧县独立旅将城内守敌全部歼灭。

三十三团在主力攻城时也对城北高地守敌发起进攻，迅速歼灭守敌，从而保证了主攻部队三十一团战斗的顺利进行。持续 7 个多小时的萧城攻坚战斗结束了，守敌及其一切装备、物资被全部缴获，俘 70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2 挺，长短枪 700 余支，马 20 匹。

萧城的收复，使淮京津浦路西根据地宣告全部解放，并连成一片。

第二节 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宣传贯彻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对当前时局的宣言》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党把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作为奋斗目标，首先提

了出来。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多有论述，这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一个新的策略性的口号。当时的形势是：中国革命经过抗日战争，虽然取得很大发展，但同反革命力量相比，仍然是敌强我弱，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夺取政权的时机，因此需要一个准备过程。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党在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时候，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战争的准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准备，才能在全面内战爆发时从容上阵。同时，由于我们党有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策略口号，党的一切军事行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击，以至用武装夺取政权，就变得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显然，当时提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或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绝不同于过去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路线。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述，在萧县曾有过学习、宣传、贯彻的过程。此时，萧县的隶属关系也有变动。1945年10月，县委由原来隶属淮北区党委二地委改属华中分局八地委，县民主政府由原隶属苏皖边区行署二专署改属华中八专署，由孙明远任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许西连任县长兼总队队长。

1946年2月底，华中分局八地委为了传达上级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精神，在地委驻地濉溪南丁楼召开了全地区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实际性质是个党校轮训班。萧县派了几十个人，由县委书

记孙明远带队，编成几个组参加学习。学习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澄清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认识。地委书记吴芝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浩然、副政委寿松涛分别到会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要有新的方针、新的任务；讲和平民主已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讲做好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地委要求各县、区的同志回去要进行传达、贯彻。

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地委秘书长孙叔平又亲来萧县，进一步讲解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参加听讲讨论的主要是县科局长以上的干部，也有一些社会贤达、民主人士。孙叔平的讲话，大体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和平这个旗子共产党要高举。如果不举这个旗子要遭到国内外的反对，陷于孤立。因为国民党当时大肆造谣说共产党好战，一些不明真相以及存在正统观念的人就容易被国民党的谣言所迷惑。二是中国必须和平，不能再搞战争。抗战八年死了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要恢复元气，必须搞和平建设，再打内战，经济上也是不许可的。三是国内有许多人怕打内战。国际上也有人说，如果我们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同时，孙叔平也分析了竭力宣传和平对于左右形势将起着一定作用的道理。虽然蒋介石想打内战，但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他也必须有所收敛。在分析了必须和平、能够和平的有利条件以后，孙叔平又分析了内战的可能性。因此，他要求大家充分做好两

手准备，即以革命的两手去反对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但在当时比较稳定的形势下，主要还是竭力宣传和平，否则就会上敌人的当。孙叔平的讲话深入浅出，受到好评。

根据上级的部署，萧县县委专门召开区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宣传贯彻的问题，确定以区为单位先传达到乡级干部，然后由各乡以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逐级宣传，层层贯彻，让群众理解和平、相信和平。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通过逐级宣传贯彻，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全县人民群众渴望和平，但多数人从内心深处根本不相信会有和平。他们认为，日本鬼子是投降了，但蒋介石会千方百计抢夺胜利果实，能不打吗？非打不可，讲和平只是暂时的。在知识界和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憧憬着自由化的生活，和平的调子唱得较高，至于内战的危险却考虑的不多。有产阶级中，极少数的人认为天下只能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是正统。

党政干部中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反应。一种反应是，认为尽管我党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平，广大人民渴望和平，但和平的可能性不大，必须作好打的准备。他们埋怨上级和平讲得多，备战讲得少。另一种反应是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因而放松了警惕。还有一种反应是，认为马上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占三分之一，将来进联合政府的人只能是有文化的

能文能武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偏低的人,到时候说不定就要解甲归田,没有什么干头了。因而,在干部队伍中不正常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不像以往那样艰苦朴素了,吃穿用都比较讲究了;有的干部把家属接到机关和部队驻地长时间居住;有的练兵活动抓得不紧,消极等待复员。

形势发展的情况表明,共产党人太热爱和平与民主,过高地估计了莫斯科三国会议决议的可靠性,过分地相信蒋介石的诺言,致使一些干部片面地理解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精神,过分强调和平的一面,忽视了武装斗争的一面。思想上想的是和平,组织上想的是建立联合政府,行动上想的是划地为界,占住地盘。在解放区边沿设立据点,被认为就是占领地盘的好办法,于是才有了尚口据点与尚口事件。

第三节 尚口事件

深受日寇侵华战争创伤的萧县人民,为开创和平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善良的人民正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一再玩弄假和平真内战反革命伎俩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磨刀霍霍。1946年4月下旬,国民党八十八军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并强占了我尚口据点,造成我萧县总队200多人牺牲,100多人被俘的惨案。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发生在萧县的尚口事件。

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刚刚生效，就遭到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肆意践踏。萧县县委指示全县人民武装只在边沿区防守，决不进入国民党占领区。而国民党李默庵部一个师便急急忙忙从江南调来徐州三堡、夹河寨驻扎，并强占了新四军控制的卧牛山、汉王山、王门、义安山、南北望、姚楼一带大片地区。他们还构筑工事，来势汹汹。1月15日，国民党萧县县长黄体润率两个大队，在国民党铜山县县长耿继勋部两个团的配合下，进犯萧城。3月30日，国民党耿继勋部配合驻杨楼车站的八十八军六十三团向七区区队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八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夏邑县介绍了建立据点可以封锁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经验，地委和军分区的负责同志认为这一经验很好，可以推广。鉴于萧县境内铁路沿线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断向解放区侵犯，抢粮、抢物，妄图扩张地盘的情况，地委与军分区党委决定在萧县的尚口等地设立据点。

对在解放区边沿地带设立据点的问题，在萧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中间有过争论。有的人认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敌不过我们的正规军，不敢轻举妄动，建立据点，既可以控制敌人，也能以此为界，达到占地盘的目的，是新形势下的新办法。有的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暗藏杀机，蠢蠢欲动，尽管我解放区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总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不宜设立据点。虽然对设不设据点有不

同观点，不同意见，萧县县委却没有向上级反应，而是坚决执行地委、军分区党委的决定。

尚口的位置在萧县县城西北，陇海铁路南侧约 5 公里处，东距徐州 30 公里。它是萧县六、七区的结合部，是国民党萧县土顽进犯县城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点建在尚口村北半部地势较高的地方，周围挖有两丈宽、一丈五尺深的壕沟，翻土朝里作为屏障，沟外布置一圈鹿寨。据点大门朝南，留有壕沟的一段没有挖断，是唯一的出入口。据点内构筑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4 月中旬，据点建好后，华中八分区萧县总队副总队长刘为敬、政治处主任张庆怀率直属队和三营的七、九两个连进驻尚口。同时，八分区主力三十四团和骑兵大队一部驻扎在距离据点五华里的陶楼等数村，村与村之间交通沟相连，以便随时相互接应。另有三十四团的四连，由副营长任侠率领，驻守在尚口据点外 200 米处的丁庄，实为据点之桥头堡。

盘踞在陇海铁路北萧县七、八区的国民党萧县反动政府，把尚口据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地伺机破坏。施工前后，其保安团就多次向尚口一带进犯。他们以国民党萧县县长黄体润为首，纠集萧籍 30 多名反动分子，拜请驻徐州的国民党某师师长方先觉攻打尚口。方根据其主子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旨意，当即应允，愿全力支持萧县反动政府攻打尚口。在尚口据点修建过程中，国民党

反动派曾多次派飞机到尚口据点上空盘旋、侦察。

4月26日晚9时，敌情发生急变。据夹河寨地下情报站送来的紧急情报：夹河寨、郝寨、杨楼、黄口等车站均突然增加大量的敌兵，企图不明，要特别注意。刘为敬、张庆怀二人据情报分析，国民党正规军在和谈期间调兵遣将，可能图谋不轨。随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军分区首长与兄弟部队三十四团，并立即向据点内的连排干部作了传达，要求干部战士加强警戒，注意敌情。27日凌晨，国民党八十八军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分数路包围了尚口据点。

27日晨6时许，据点内的部队刚收早操，正在开饭，外面突然几声枪响，全体指战员迅速进入阵地。敌人分数路由南向北压来，重点攻击的目标是作为据点外围桥头堡的丁庄村。敌人开始用一个营的兵力猛攻，四连战士在丁庄顽强地防守。经过数次反复冲杀，敌人死伤过半。

战斗打响后，驻守在尚口外围的八分区主力三十四团，也遭到敌人两个团兵力的包围，企图以优势兵力吃掉三十四团。三十四团全体指战员坚决反击，遂与敌人展开激战，双方来回冲杀，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毙敌300余人。三十四团也有较大伤亡，其中一营被敌人冲垮。八分区首长和三十四团领导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如继续与敌人打消耗战，将会陷入欲胜不得、欲撤不能的局面，不仅达不到援救县总队的目的，且有被敌吃掉的危险。鉴于

此，便让三十四团于中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内地撤退。敌恐中计，未敢尾追。

下午1时，敌人集中炮火轰击尚口据点，在方圆不足300米的据点里，落下敌人800多发炮弹，据点内的工事遭到严重破坏。

敌人用一个团的兵力再次向丁庄猛烈攻击，三十四团四连的全体指战员顽强抗击，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直坚持到下午3时。由于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四连的临时工事大多被摧毁，人员伤亡过大，弹药消耗殆尽，副营长任侠负伤，连排指挥员也大部分牺牲，不得不撤出丁庄，进入据点。

丁庄失守后，据点便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敌人占领了据点南门外的几间民房，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向据点内射击。据点内的部队无法运动，情况十分紧急。政治处主任张庆怀在观察地形时，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副总队长刘为敬面对烈士的遗体，义愤填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重新组织剩余武装，狠狠打击敌人。

战斗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敌人以排为单位从南门口向据点冲锋，刘为敬将八挺机枪配备在南门口地堡内，另配子弹、手榴弹十余箱，重点阻击南门冲上来的敌人。敌人组织的六七次冲锋，每次都要付出重大伤亡。激战到黄昏时分，敌人以连营为单位进行大规模冲锋，潮水般涌向据点，在一阵机枪的扫射和手榴弹的轰鸣中一片片地

倒下去。在据点内坚守的总队战士也有较大的伤亡。在弹药耗尽后，他们继续以石块、白刃相交，以赤拳搏斗，坚持到晚上7点多钟，刘为敬组织余下战士，下达了突围命令。数十名战士紧随刘为敬，乘夜黑向西南方向冲杀。敌人发现后，便集中炮火向突围方向猛轰，突围的队伍已经到达壕外的麦田里，刘为敬不幸中弹牺牲。

尚口据点被敌人占领，据点内400多名指战员，200多人牺牲，100多人被俘，突出重围者仅20余人。

敌人伤亡500多人，强占了尚口。

5月8日，中共萧县县委、县民主政府在萧城举行了“四·二七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后，我方将事件经过向徐州“三人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作了反映。三人小组来萧县调查处理尚口事件时，美国代表哈里曼察看萧城无战事痕迹，又不愿再去尚口，便驱车返徐。

尚口事件用血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教育了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修建据点打阵地战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在战斗打响后，仍死守阵地，伤亡惨重，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另一方面，过于迷信和谈，有麻痹轻敌思想，总认为敌人在和谈期间不敢明目张胆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对于敌情的掌握，我方仅侧重于对地方反动派的了解，而对敌人正规部队的动向，则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分析。

第四节 从“双减”到土改

为了发动农民参军参战,壮大革命力量,巩固解放区,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我党必须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46年5月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个指示将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以各种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目标。指示要求全党“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工作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嚣,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不正确的观点,应给以教育。”这表明了党中央解决土地问题的坚决态度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5月11日至24日,地委在濉溪南丁楼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五四指示》,萧县县委书记胡天禧带队参加了会议。之后,萧县县委于6月中旬在三区的石桃园召开了有区委书记、区长、农会主任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县委副书记朱玉林对前段工作作了总结,传达了八地委5月28日形成的《群众工作会议决议》、华中分局6月9日下发的《关于在减

租减息清算中解决土地问题办法的指示》等文件。县委书记胡天禧在会上作了《果实分配问题》的专题报告。会议决定：一、全面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反奸反霸斗争。二、建立健全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各级农协（农民协会）机关并配备干部，大量发展会员，要求中心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边远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要把所有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区、乡工联（工会联合会）组织，每乡工人 30 人左右者，会长可脱离生产。中心区要建立各级妇联（妇女联合会）组织，配备妇联干部。每乡有一人脱离生产，区二至三人，会员数不少于农协会的三分之一。三、发展民兵，建立民兵领导系统。民兵数目要求占农协会会员的百分之十。区设大队部，一至二人脱离生产；乡设中队部，一人脱离生产；中队以下不脱离生产。四、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中心区每村都要有党员，所有党员都编入组织，数量要求占会员的百分之一点五。五、改造基层政权。中心区要做到乡村制，彻底改造基层政权，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提出的宣传动员口号是：“减租又减息，多置二亩地”、“新旧帐目都能算，农民一齐起来干”、“工农青妇一家人，联合起来好翻身”、“农民要翻身，土地便是根”等等。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全县的土改工作，并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建立各级清算委员会，专门领导反奸清算。

二区与四区的清算试点工作是麦收前开始的。第一步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在贫、雇农中培养积极分子。积

极分子的条件是：出身好，觉悟高，作风正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然后组织农会，建立基干武装，开展忆苦教育，启发群众觉悟，进行“双减”，清算旧帐，反奸除霸，把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发起来。第二步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土地改革。通过调查摸底，根据政策划分成份，分配土地。在土改中动员学校的教员参加丈量土地，工作队员向群众宣传讲解党的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者等政策。

通过试点，摸索出了经验，反奸除霸即在一、二、三、四、五区的全部和六、九区的大部，七、八区的小部分地区迅速开展起来。建设中学 200 多名师生亦深入各区乡，开展宣传、贯彻《五四指示》的工作。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地委决定重建萧县总队。因在尚口事件中，副总队长刘为敬、政治处主任张庆怀、副参谋长阎延年等人牺牲，人员伤亡惨重，萧县总队解体。5月，地委决定重建萧县总队。萧县县长许西连兼任总队长，范文典（原三十四团二营营长）任副总队长，薛光（原分区直属队总支副书记）任政治处主任，李拂光任参谋长，郝长顺（原分区独立旅二团三营营长）任副参谋长。重建的萧县总队编制六个连。从分区独立旅调来一个营编为一、二、三连，县委、县政府警卫连改编为四连，由尚口突围出来的 20 余名同志与三、六区区队编为五、六连，番号仍为华中八分区萧县总队，对外称萧县独立团。

5月中旬的一天，在徐油坊村召开县总队成立大会。

村口设有岗哨警卫，麦场上搭起台子，台前坐着整齐的部队，群众喜气洋洋地围坐四周。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讲了话，农会、妇联会、青联会及各区代表上台祝贺。热情洋溢的讲话，道出军民的鱼水深情，激起一阵又一阵掌声。“热烈祝贺县总队的成立”、“感谢党和人民的支持”、“为尚口烈士报仇”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云霄。

萧县总队成立大会以后，总队领导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五四指示》；同时将总队由张绪庄转移到子观寺进行整训。整训的内容：一是对部队进行土改教育。通过学习和召开诉苦大会，使全体指战员弄清楚是农民养活地主，地主剥削农民，“土地还家，合理合法”。二是进行形势教育。以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依据，向战士们讲五次“围剿”、皖南事变、竹沟惨案、尚口事件等，使大家认清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革命本质。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土地改革，时刻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的进攻。三是进行军事训练。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总队以连、排为单位进行射击、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军事技术的训练。通过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6月，麦子成熟，县政府派出工作队下乡进行土改试点，同时开展夏收保护工作。总队研究决定，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麦收和土改，提出了“保卫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麦收”、“保卫土地改革顺利进行”的口号。为此，将部队部署在可能出现敌人干扰的重要位置上。副总队长范文典、

政治处主任薛光带领三个连驻防永堙、毛郢孜、姚楼一线，警戒徐州方向的敌人。副参谋长郝长顺带两个连活动在马井、曲里铺、东镇店一带，警戒黄口方向的敌人。另留一个连警卫县委、县政府机关。

在永堙附近，群众反映国民党白土乡公所武装经常出来骚扰，抓丁抢粮，百姓不得安宁。范文典派出一个连在夜间隐蔽突袭，活捉其十多个乡丁。一次，国民党县保安团一个连带着几辆大车到毛郢孜一带村庄抢粮，范文典带两个连于中途伏击，保安团被打得懵头转向，扭头向徐州方向逃窜。总队战士追击一阵之后，返回毛郢孜休息。此战使保安团伤亡 20 余人，10 多人被俘。

两次战斗虽小，在群众中影响较大，人民传递着胜利的消息，神秘地传说：“新四军又打回来了。”在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区乡公所不敢下乡催粮催款，保安团也不敢出动骚扰。

附：

为追悼“四·二七惨案” 死难诸烈士讣告

敬启者：军事停战令下，政协会议结束，和平有望，全国欢腾。在兴奋鼓舞之余，更期民主早日实现。詎料国民

党二中全会，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政协决议一手推翻，包藏祸心之反动派，倒行逆施，更变本加厉。

近月来，我萧县边区，部队被袭击，人民遭暗杀，群众被抢掠，荼毒地方事件层出不穷。三月三十日国民党军耿鞞子黄体润部配合驻杨楼站之国民党八十八军六十三团南犯，向我不满三十人之七区队进攻；四月二日国民党孙启元部伙同驻黄口站之国民党八十八军六十三团二营南犯，围攻我驻单庄之八区队，被俘四同志，均遭活埋；四月十六日晚，我五区赵庄乡李乡长被国民党部杜庆年派入我内地之奸细暗杀，甚至无辜群众，亦同时遭活埋，遭抢掠，损失至为惨重。我为顾全大局，每逢来犯，均予退让。

由于顽之抢掠，群众曾再要求我部队驻扎尚口（去年八月为我解放）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国民党八十八军十九日竟然以数千人并配合飞机三架，向我尚口驻军进攻，我军被迫自卫，始将向我进攻之国民党军击退。并向徐州执行小组提出交涉。满望双方严守第六号命令，不料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顾祝同集合八十八军、五十一军两军之众，分数路向我进攻，将尚口包围，即以大炮数十门，机枪数百挺，飞机八架猛烈轰击。我尚口守军，在刘总队副为敬、张主任庆怀同志英勇指挥下，浴血奋战，虽众寡悬殊，仍坚持一日，弹尽援绝，继之以石块、白刃相交，赤拳搏斗，最后我刘、张同志及官兵二百余名，均先后壮烈牺牲。

刘总队副、张主任以及尚口驻守之武装同志，多年敌后抗战，与日寇周旋身历百险，功在国家民族。今在外侮既除，国内停战之后，竟死于国内反动派之手，此足以令广大人民痛心疾首，洒泪疚心。为安慰死者，我们应以复仇之决心，完成未竟之志——革命事业。兹特定于五月八日举行“四·二七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大会。如蒙惠赠挽联、哀词、花圈及烈士遗物等，务请于五月八日前送交县委会、县政府秘书处，并盼届时莅临参加为盼。

“四·二七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会萧县筹备会启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十一章

西 撤 与 收 复

蒋介石在完成了发动内战的准备之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6年7月，国民党军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等交通线部署了27万余兵力，疯狂进犯豫皖苏根据地，萧县首当其冲。萧县党政军团结一致，就地坚持，积极反击。9月，形势逐渐恶化，被迫西撤。一年后，萧县军民为恢复萧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第一节 党政军西撤

1946年6月中旬，八地委召开了由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重点是对当时形势的三点估计：一是通过斗争，造成国共两党联合的局面。对这一点，在传达时已认为可能性

较小。二是国共双方形成拉锯战的局面，我们借以发展武装，巩固根据地。三是在蒋介石重点围攻的形势下，我们有可能丢掉阵地，撤到华北，甚至被挤到中蒙边境活动。这时，地方的公开组织要转为地下活动，地方的革命干部已公开身份不好留下的可跟部队撤走，原来身份不公开的，可留下坚持秘密活动，必要的时候可向敌人假自首。会议认为，全面内战的形势不会很快到来。然而，他们错了。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7月上旬，国民党驻徐州的交通警察二总队侵入萧县城内，接着占领了瓦子口，向三、四、五、六、七区进犯。与此同时，国民党五十八师也进驻徐州以南津浦线上，从萧县九区经永堙向西进犯。萧县瓦子口以东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一区区区长林星锐、副区长丁戒山在执行税收任务时牺牲。八地委、八分区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动员全区党政军民积极开展自卫反击战。为打乱国民党原定的战略部署，迟滞敌人的军事行动，策应中原我军突围，支援苏北、晋南等各地战场，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上级指示，于8月中旬发起对陇海铁路汴徐段300多公里路段的破击战。李庄车站至杨楼车站段长约60华里，由萧县负责破击。萧县总队布置在杨楼车站一带，担任破路和打援任务。萧县的区、乡武装和4000余名民工日夜不停地破坏铁路和桥涵，把铁路来了个大翻身，挖坏了路

基,沿途的通讯设施被破坏无遗,有效地协同主力部队阻击了敌人。

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萧县人民武装部队边战边退,县委、县政府机关先是撤到王寨南孙陶楼,后又撤到四区的胡楼。卫生所、修械所等县政府的下属机关和一区、二区、夹河区的区乡干部,建设中学的部分师生,县直机关的伤病员等,都撤退到李石林西北的朱大楼、洪河集一带萧永边界上。县委、县政府的负责人带领县总队在前方与驻扎在萧县内地的敌人周旋,各区、乡的武装仍坚持与敌人斗争。仗是天天打,路要天天跑,有时一天数仗,一夜几次转移,形势越来越紧张。

8月20日,国民党新五军从蚌埠出发,经濉溪苗桥、萧西一带拉宽40里向西北进犯,驻扎在萧永边界朱大楼、玉皇阁一带的萧县人民政府后方机关受到冲击。由于不明敌情,在公安局副局长单劲之的带领下,由公安局一个排护卫,被迫向西北方向撤离。先到夏邑,从柳堤圈横跨陇海铁路,经虞城、单县、成武、巨野到了郓城,找到冀鲁豫三地委。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王尚三因病随卫生所也撤到路北,后与单劲之相会。两人研究决定,把萧县各区、乡撤出来的七八百人编在一起,统称萧县大队,单劲之任大队长,王尚三任政委。后来,冀鲁豫三分区与路南八分区领导研究决定,身体差的和没有战斗力的人员由王尚三带队过黄河,归冀鲁豫区党委管辖。另挑选精干力量60

多人，由单劲之带队回路南，寻找撤退中失散的县政府人员。他们于9月下旬过陇海铁路，经多方联系，最后到夏邑县的胡桥一带与萧县县政府会合。

1946年8月下旬，在国民党新五军过境的同时，国民党交警二总队也更加猖狂。9月，国民党五十八师与交警二总队会合，在国民党县、区、乡武装配合下，沿陇海路南，从东向西，大肆围歼我县、区、乡革命武装力量。他们每到一处，便网罗特务，抓捕革命家属，并安设据点，建立国民党政权。县长兼总队长许西连临危不惧，指挥果断，县总队副总队长范文典英勇善战。他们带领武装力量，日夜转战，坚持游击战，与敌人周旋。由于主力外线作战，游击队内地坚持，总队的武装与追击的敌人日夜战斗，疲惫不堪。永北、砀南、宿西等地也先后被敌占领，萧县处于孤军作战的局面，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补给困难，吃饭、医疗没有保障，再加上阴雨连绵，天气转冷，战士尚无寒衣，霍乱病流行，伤病员日增，全分区都处于受敌攻击的紧张局面，处境十分艰难。为有利于就地坚持对敌斗争，县委研究，拟建议地委成立萧永指挥部。决定由县委书记胡天禧、副县长张舒民去地委请示，同时把体弱多病的县、区、乡干部和伤员百余人送到分区，派总队一个连护送。不幸，到永城县薛湖附近与敌人的主力部队遭遇，一个连的武装被敌人击垮，干部被冲散。县委书记胡天禧失去联系，只身去了后方，中途被敌人俘去。

形势极为严峻,为了改变困难局面,地委于10月初决定将全区划分为四个工委,武装编为四个支队。萧(县)永(城)两县的武装合并为萧永支队,行政上改为萧永办事处,萧、永县委合并为萧永工委。全地区八个县的干部编成一个大队,叫五支队。11月初,为摆脱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围追,分区命令各支队分路西撤睢杞太解放区。

党政军西撤后,萧县陷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一时。萧县的土豪劣绅与恶霸地主组成“还乡团”,朱大同任团长。于1946年秋进驻萧城,开始对革命家属、积极分子进行普遍登记,全面清查,然后进行抄家、封门。他们疯狂地进行收租、倒租、敲诈勒索。一些革命家属被抓捕后,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仅帽山一带农会会员的革命家属,被捆绑吊打的就有30多户,抄家封门的15户,外逃避难的5户,逮捕农村干部2人。还乡团还规定,家属都要出去找自己的丈夫、兄弟、儿子,非得找回,方准回家。在马井一带,敌人对革命家属采取“赶出封门,家产冲光,树木刨净”的办法,并扬言:谁给革命家属一口凉水喝,一律同罪。南海乡乡长朱言喜被抓去打死,袁圩村基干队员梁三、梁五兄弟俩被“还乡团”抓去活埋。李九店乡吴庄村农会主任张佩清全家八口,除儿媳走娘家未回而幸免外,其余七口人,三人被枪杀,三人被活埋,一个小孩被活活摔死。

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于1946年秋由管粥集搬到县城,

在组织上开始实行强化政策。他们实行“党网化”，在全县成立了11个区党部，108个区分部。他们把民主人士当成不纯分子进行监视。特务机构国民党萧县调查室，加强其党政军特种策报活动，与行政、军警配合，对我党政军西撤后的掉队人员及地下党组织进行侦察搜捕。还开办“感训所”，对我自首人员进行“训话”。

国民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地租与高利贷的盘剥，天灾人祸的侵袭，弄得广大群众缺衣少食，民不聊生，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九店乡农民吴忠义，因遭水灾，租种的土地颗粒无收，实在拿不起繁重的赋税，被国民党乡长孙运堂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当时，黄口地区逃荒要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0%以上。在黄口、杨楼等铁路沿线的车站，难民不顾生命危险爬车外逃，轧死轧伤的事故不断发生。

第二节 艰苦的恢复工作

萧县党政军的西撤是被迫的，恢复萧县的工作始终是艰苦的。1946年冬，党中央派吴芝圃、张国华到陇海路南的豫东地区，12月12日成立了豫皖苏区党委、豫皖苏行政公署、豫皖苏军区。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彭笑千任行政公署副主任。萧县西撤的武装部队及王尚三带往路北的萧

县武装(此时已回到路南),被编入军区警卫团,范文典任团长(因负伤未到任,不久牺牲),王尚三任副政委。

12月17日,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平岗召开了原八分区县区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吴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西撤的经验教训,指出八分区所以没有能够就地坚持而全部撤退的内在原因,主要是“方针不明,决心不够”。他还严肃批评了那种“大敌当前,自动解除武器”的错误,号召大家要以勇取胜,坚决打回去,恢复根据地。会议同时撤销原华中分局八分区建制,成立豫皖苏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寿松涛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许西连任专署专员,李浩然任军分区司令员。

12月下旬,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成立萧县县委、县政府,任命朱玉林为县委书记,张舒民为县长。在此之前,朱玉林、许西连曾派五区区长李建华回萧县做党的地下工作,建立萧西工委,李建华为书记,盛玉峰为副书记,李乐敏为委员,吴武周也积极参与了工委的地下活动。工委的主要任务:一、和留下的同志以及革命家属取得联系,听取反映,互通情报,并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念。二、向周围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宣传革命道理,讲述革命形势,鼓励他们走向革命。三、编印、张贴、散发宣传材料,揭露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四、收集情报,及时转送县委。五、掩护同志。工委还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组织群众撤了作恶多端的顽韦里乡乡长和腰庄、韦道口、

李老家三个顽保长,换上比较进步的民主人士担任。萧西工委当时活动的主要范围是五、八区。地下活动开展比较好的,还有三区的老王庄支部,西杨楼支部,四区的个别支部,等等。在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收复萧县重建政权方面,它们都作了必要的准备。萧县西撤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派孙东民、朱世福作为交通员,与萧西工委经常保持联络。成立县委、县政府以后,又于春节期间派孟繁超等九人,便衣潜入萧西、萧城,分别了解敌情。

豫皖苏军区组建后,于1947年1月,打涡阳,克龙岗,歼灭了国民党五十八师二十九、三十两个团2000多人,很快恢复了陇海路南永、夏、亳、涡、宿西、砀南等广大地区,打开了三分区的局面。2月,为有利于开展活动,三地委指示撤销县的建制,以萧县西南部、宿县西部、永城县的东部三县结合地域成立中共萧宿永工委,书记李华农,副书记单劲之,工委大队长朱若平。工委成立后,东进开辟萧宿永地区,在夏邑县南骆天庙遭敌人三个连武装的袭击。工委大队仅三个排的武装,他们与敌英勇拼杀,部队伤亡较大,朱若平牺牲。此后,单劲之被分配到雪商亳县任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不久又去开辟商南,任商南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原萧县县委委员孙清淮也分配到商亳鹿拓县任县长,李华农调回地委城工部任副部长,萧宿永工委实际解体。因东进斗争形势的需要,工委于6月撤销,成立了中共萧宿永县委,隶属关系及活动范围不

变。书记田启松，县长李品立，大队长由李品立兼任。

1947年9月，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大军主力在徐州与开封之间分五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豫皖苏地区，并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以纵队为单位，分散展开，肃清敌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大力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其所属第三纵队，经萧县东部攻克濉溪口，兵临宿州城下，横扫徐州外围敌之据点。一时，萧（县）宿（县）永（城）等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国民党萧县保安团及区乡武装惊魂未定，不敢远离徐州活动，这是恢复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10月，中共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撤销中共萧宿永县委，恢复萧县、宿西、永城三县。成立了萧县县委，任命朱玉林为书记，王尚三为副书记。11月7日，豫皖苏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训令：撤销萧宿永县政府，成立萧县民主政府，县长由朱玉林兼，副县长单劲之。同时建立了萧县县大队，6个连800多人，大队长与政委皆由朱玉林兼任，副大队长孟庆祥。

萧县县委一方面继续扩大武装，一方面发动、组织群众斗地主分浮财，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至年底，全县建立了石林、袁圩、大屯、王寨、祖楼、红庙、东镇、龙城、穆集、坡里、天门、蔡里12个区政权，大部分区都成立了区队。全县一半乡建立了政权，县大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萧县党政军西撤前的一段时间，曾认真宣传贯彻过《五四指示》，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对于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壮大革命队伍，巩固解放区，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都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因当时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国共关系即将破裂，党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大局，特别是为争取中间势力，以巩固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又必须采取为各方面人士所能接受的适当的土地政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制定《五四指示》是正确的。但是，《五四指示》并没有完全废止减租减息政策，也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其条文，只能部分地改变封建土地关系，而不能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平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党中央批准，将这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文件于10月10日公布于世。

《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这正是《五四指示》中所缺少的内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标志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由部分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土地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使农

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的行动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1947年底,萧县党、政权、武装的建设均有了较大发展。根据地委指示,萧县认真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在中心区搞土改。先是一个区选一个村搞试点,取得经验再行推开。通过土改,发动农民,巩固根据地。二区的葛张庄,在西撤前搞土改时,根据当时地主的表现,作了宽大处理。西撤后他们投靠国民党,打击报复,迫害贫雇农。这次土改,葛张庄的贫雇农自动起来,伸冤诉苦,根据政策同地主面对面斗争,分了地主的浮财。其他各区的试点工作进展较好,大部分群众被发动起来,组织了农民协会。此时,陈粟大军转赴中原战场,萧县国民党政府又回据萧城,整顿武装,组织黑杀队、突击队与我争夺,向人民反攻倒算,妄图扼杀我新恢复的人民政权于摇篮之中。三区区长贾绪朋就是被敌人的突击队杀害的。由于形势紧张,土改工作没有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1948年,是萧县对敌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以军事斗争为主,敌我双方开展了残酷、激烈、反复的争夺。当时,敌人的主力为保住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要地,加强防务,对革命武装不断“清剿”、“扫荡”,并增设据点,扶植地方反动武装。萧县顽政府就是在他们的扶植下,组建了四个营的保安团和实力较强的区队、乡队等多层次的武装力量,装备与其正规部队一样,有的还配备了重机枪、

迫击炮等重武器。

萧县县大队上升为分区五团以后，县区武装也仅有400多人，而且武器低劣，弹药缺乏。敌人的兵力多于我们数倍，我们以巧妙灵活的战术，英勇果断的战斗作风与敌人周旋。1947年10月至1948年1月这段时间，敌人趁我主力外线作战，区、乡队武装就地坚持的空隙，采取夜袭方式向我连续进攻。我二、三、五、六、八区均遭到敌人袭击，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牺牲区长两名，区委书记一名，一般干部战士百余人。我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相机同敌人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遭到严重打击后，改变战术，在二区的丁里，三区的王寨、吴楼，四区的孟油坊、徐庄，五区的孙庄，六区的王新庄等处设立据点，深沟高垒，鹿砦碉堡，驻以重兵。各据点配合作战，一处有事各处支援，并与濉溪的顽敌实行联防，互相呼应，形成严密的碉堡网，构成“萧西的铜墙铁壁”。二、三、六、八区都处在敌人碉堡网的包围之中，地方武装活动比较困难，只能白天隐蔽，夜间活动，避锐击弱，相机作战，打击分散之敌，争取与主力配合，拔掉敌人的据点。

1948年春，国民党萧县县长换了李公达，李扬言“三个月消灭共匪”。他脚穿草鞋，手持大枪，亲临火线。为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他改用远道奔袭，迂回包围，连续“扫荡”，配合主力，全力出击的战术。这时，在军事力量上萧县人民武装仍处于劣势。为了站稳脚跟，县大队和三、六

区区队百余武装,于8月插入敌人腹地接驿集隐蔽。隐蔽的同时,我县、区武装常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李公达和他的主子蒋介石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我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下,以李公达为首的萧县国民党反动武装节节败退。萧县的形势逐渐好转。

第三节 恢复萧县的几次重要战斗

萧县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经过一年多艰苦的恢复工作,已由弱到强,开创了萧县的大好局面。这主要是依靠良好的群众基础与一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扬英勇果断的战斗作风,顽强战斗,艰苦拼搏。其间,有几次重要的战斗,对于扭转萧县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丁庄战斗

1947年11月,萧县刚恢复建制,县大队副大队长孟庆祥即进入萧县,在孙楼、崔口、李石林等地集合起20多名战士,编了两个班,这就是当时县武装力量的雏形。

为帮助萧县开展工作,分区三十六团由柯志强团长率领,活动在萧县西部的三、四、五区,寻机消灭敌人。孟庆祥带领武装人员跟随三十六团活动。一日,孟庆祥获得

可靠情报，国民党保安二团由孟昭信带一个营到大吴集设据点。孟庆祥与柯志强研究，决定消灭这个营，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

当晚，部队从孙楼集出发，深夜到达郝新庄宿营。布置了侦察任务后，孟庆祥带两个班的战士潜入公路边的丁庄，找来几个卖油、卖豆腐的老乡，让他们早上至岱山口、南瓦房几个村探听敌人的动向。敌人一出动，就让他们在庄上大声吆喝“卖千张豆腐皮喽”，同时使劲敲油梆子，以此作为敌人出动的信号，便于我方立即组织部队投入战斗。安排完毕，孟庆祥他们即返回郝新庄。

次日天亮以后，东边村子里传来了吆喝声，孟昭信的保安团果然出动了。孟庆祥和柯志强团长把部队布置在丁庄附近的公路两侧，专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圈。不凑巧的是，敌人走在前面的是郝新庄的乡队，刚到丁庄就打响了。也算孟昭信狡猾，他骑马走在队伍的后面，听到了丁庄响起枪声，就在公路上停下来，接着便命令他的保安团慢慢向后缩。柯团长一看，事不宜迟，便决定出击。孟庆祥早耐不住了，没等柯团长下达冲锋的命令，他就飞身上马，左手提着缰绳，右手高举起马刀，高呼“骑兵排跟我冲啊！”柯团长在后面想喊住他，孟庆祥心急，哪里听得见叫声，就和骑兵排的同志一鼓作气冲到郝瓦房东北地里，和孟昭信的队伍打了起来。他刀劈了敌人的机枪手，待下马夺机枪时，他的战马中弹而亡。孟昭信不敢骑马，混在人

群之中，被裹挟着落荒而逃。

这次战斗，敌人被击毙 10 多人，俘虏 30 多人，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40 余支。从此，孟庆祥被誉为“萧县的夏伯阳”。

小杨楼战斗

萧县恢复政权后，县委、县政府带领县大队武装经常活动在四区的李石林，崔口一带。为了坚持用鲜血开辟的地区，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三区便成了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恢复三区政权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已由 1 个班不过 10 人的区队发展成 1 个排 30 多人的武装。为接受过去的教训，既坚持上级提出的“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原则，又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由于环境恶化，区队常采取白天撤出去，黑夜插进来的办法进行活动。有时插进敌战区，在敌人不注意的空隙地带，住上一天两天，寻机打击敌人的乡公所、保公所的土顽。既对敌人形成威胁，又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成了国民党三区区长颢孙炎宗的眼中钉。

1947 年冬，为加强三区的工作，县委调孟繁超任三三区区委书记。孟繁超到任不久，发现通讯班长刘立本经常一个人外出，有时彻夜不归，行为反常。这是个危险信号，不仅影响个人的安全，也影响区机关与区队的安全。

由于长期残酷的斗争环境的锻炼，孟繁超同区长吴精忠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他们找刘立本谈话，耐心

地对其说服教育，刘承认自己已被顽三区区队长孙孝祖和顽保长孙宣由用 2000 元大洋收买，作为他们的内应，准备乘三区区委机关、区队宿营时，里应外合一网打尽。

面对这一情况，孟繁超与吴精忠决定将计就计，诱敌就范。在做好刘立本工作的基础上，让其与孙宣由约定农历腊月十四日举事。

三区区队当时只有 30 多支步枪和 1 挺轻机枪，而步枪半数为土造，难以对付进攻。于是，他们采取了三项对策：一、及时向县委、分区主力部队（五团）汇报，请求批准作战方案并给予支援。二、通知区队、乡队不要惊扰。三、与兄弟区队联系，请求他们向三区靠拢。

三天过后，分区五团的领导与县委领导共同商定作战方案：以三区区队作钓饵，诱敌上钩，五团再把敌人包围起来，里外夹击，消灭敌人。

具体作战计划：一、由县大队抽调一个加强排，配合三区区队于腊月十三日 11 点前驻进小杨楼，做好工事，封锁消息。二、由刘立本带领敌人上钩。三、五团在天黑后驻进小杨楼西四里的苏庄、王塘。四、整个战斗由县委领导和五团领导共同指挥，小杨楼内由孟庆祥（县大队副大队长）统一指挥。

时值隆冬，天降大雪，地面积雪一尺多厚。区队按计划驻进小杨楼，挖枪眼，堵大门，构筑工事。11 时许，战士们便进入阵地，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深夜，国民党三区区队约 300 多人鱼贯进村。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射程后，顿时枪声大作。敌人看攻不进院内，便放火烧房。房上堆满积雪，哪里烧得着。敌人便向院内、枪眼内投掷手榴弹。我们的战士坚守阵地，英勇杀敌，战斗呈胶着状态，有的院落有被攻破的危险。这时，远处传来五团战士的枪声，由远而近。敌人知道中计，趁五团没有形成包围圈之际，丢盔弃甲，夺路而逃。

此战，击溃敌人两个连，毙敌 12 人，生俘敌排长、突击队长以下 36 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子弹数千发。

马山战斗

国民党县政府于 1947 年底在五区的孙庄安设据点，驻保安团一个营。敌人以据点为依托，经常出来抢粮逼款，坑害百姓。

1948 年 1 月 27 日，我五区区委从情报员那里得悉：次日晨 5 点，保安团两个连出据点，经史庄南去抢粮。

县委书记朱玉林接到情报后，立即同县大队副大队长孟庆祥、分区五团蒋汉卿团长研究，决定吃掉这股出扰之敌。由县大队 3 个连，分区五团 2 个连，五区区队 90 多人共同作战，由孟庆祥统一指挥。

次日拂晓前，部队埋伏在史庄、李九店之间的港河里。部队的几个负责同志背起粪箕，伪装拾粪，随时观察敌人的动态，等待敌人出犯时围而歼之。

敌人果然按时出动了。他们从孙庄据点的西南角出来，一溜长蛇阵，300多人断断续续，走走停停。停住就不能打，一打他们便要往回缩，打不着了。乘敌人继续前进时，县大队四连跟着骑兵排，从西北边插了过去，切断了敌人逃回据点的退路。然后，集中火力在敌人背后猛射。敌人见状，乱作一团，急不择路，慌慌张张向南逃窜。

孟庆祥下达追击命令，埋伏的部队揪住敌人不放，奋起直追。一鼓作气追了20多里。敌人见我穷追不舍，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惊惶失措地上了马山，妄图凭借马山之险，固守待援。

我全体战士在山下抓紧吃了早饭，趁敌人未及构筑工事之际开始攻击。县大队的一连是华东野战军的休养连，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能攻善守，石连长要求担任主攻。孟庆祥、蒋团长作了战斗部署，确定一连担任主攻，二连火力掩护，四连和五团的战士在马山的东北角布防，不使敌人漏网。

保安团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现在已溃不成军。一连攻上山去，敌人哪有招架之力，便分散往山下逃跑，我五团战士迅速包围上去。那个石连长真够厉害的，他带两个班的战士截住敌人一挺重机枪，顶住射击，不让敌人抬下山去。

午后，战斗胜利结束，敌人死伤数十人，被俘130多人，我无一伤亡。这次战斗，共缴获1挺重机枪（五团带

走),4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

吴楼战斗

1948年3月,李公达调任国民党萧县县长。李一到任,即制订了他的所谓防务计划:一、加强保安团实力,充实兵员。二、与宿县、永城、砀山等县实行联防,互相支援。三、在萧西三区吴楼,四区孟油坊、徐庄设立据点,三点连成一线,构成萧西的坚固防线。

3月底,李公达免去保安团团长丁广惠之职,任命王德厚为保安团中校副团长,履行团长职务。王一到任,便亲率保安团2个步兵营,1个机炮连,配合三区、四区、五区区公所及区队计1000多人驻守吴楼据点,对萧西进行“清剿”。

吴楼在王寨西十里,筑有土圩子,外挖宽六米深四米的壕沟,沟外栽木城,架鹿砦,设四层屏障。敌人据守深沟高垒,做着万无一失的美梦。

据点建成,百姓遭殃。保安团、区队日夜出动,抓差,抓丁,拉伏,抢粮,奸淫妇女,捉我革命战士,抓我工作人员家属。据点建成后三个月的时间里,群众被无辜杀害者达170多人。

5月中旬,县委派人对吴楼据点进行了一次周密细致的侦察,将兵力、兵种、武器配备情况以及工事的设置详图等,分别上报给地委和边区党委。边区党委遂作出决定,拔掉吴楼据点,为民除害。

麦收迫近。5月下旬的一天,军区独立旅旅长金绍山亲率三十团、三十四团和一个炮兵营,计2500人,突然出现在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庄。下午5时,部队从吴楼西北入毛河东进至崔庄、梁巷,接着分兵进至张曹庄、任楼、小王塘、小柘园、苏柘园、欧庄、徐河涯等村,把吴楼据点团团围住。当晚,部队休息待命。深夜,部队开始构筑工事,挖300米长的交通沟两条,一条由据点北的崔庄直抵据点外的壕沟,另一条由梁巷直通据点东北角的碉堡。

次日4时许,金绍山旅长下达攻击命令,三十团主攻,炮兵营配合,三十四团打援。在迫击炮的掩护下,我三十团的全体健儿向敌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霎时,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我主攻部队沿交通沟从敌东北角的碉堡处冲了进去,敌众我寡,无法扩大战果。后续部队拥挤在狭小的交通沟内、圩壕内,冲不进去,冲进去的战士也只好退了下来。激战至上午9时,连续发起了三次猛攻,均未奏效。于是,调整部署,继续构筑工事,用土装入麻袋,用条囤垒起七八米高的堡垒,以便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敌据点内射击。火力攻击的同时,我军还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下最后通牒,“如不缴械,弃暗投明,我们动用大炮,后悔晚矣!”

深夜,我军对顽抗的敌人开始全面攻击。我军利用机枪,在垒起的一个个制高点上向据点内的敌人猛扫,用大炮向敌人的指挥所、碉堡猛轰。敌人惊恐万状,坚持到次

日凌晨 5 时许，便弃圩向东南方向逃窜，复遭我驻徐河涯等村的三十四团的迎头痛击。敌人溃不成军，一个个抱头鼠窜，各自逃命。天亮前，敌吴楼据点被攻克。

此战，歼敌 500 多人，敌保安团营长刘安良被击毙，还俘虏 150 多人，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

神树歼灭战

吴楼据点被军区独立旅拔除后，四区的徐庄、孟油坊两据点不攻自破，李公达吹嘘的萧西铜墙铁壁已不复存在。这时，我县大队武装已升编为分区新五团。新成立的县大队编制 2 个连，实有 100 多人枪。萧西大片地区一时成了真空地带。

顽三区区长侯克祥狼子野心，带领他的区队夜宿瓦子口，白天沿萧永公路西犯。

我县政府及武装人员在萧永边活动。由于力量比较单薄，长途奔袭已不可能，打分散孤立之敌实为上策。副县长单劲之、县大队副队长孟庆祥分析了打顽三区区队的三个有利条件：一、顽三区区队力量不大；二、顽区长侯克祥作恶累累，民愤极大；三、我们对三区的地形熟悉，青纱帐里活动比较方便。之后，又议定了作战方案。

1948 年 8 月，单劲之、孟庆祥留下县大队的后方机关，率两个连的精干武装，配合王寨区区队，由五区张集子出发，一下插到萧永公路侧的接驿集驻下。接驿集在萧永公路南侧 300 米处，是一个普通的穷村子。村外四面是

沟，易守难攻，容易封锁消息，军事上是难得的地利。

21日，天未亮，队伍便吃了早饭。为及时捕捉敌情，我部分干部、战士换上便衣，在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干农活。单劲之、孟庆祥两人坐在村后一片坟地的坟头上，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静，指挥全局。

上午七八点钟，敌人在公路上出现了。120多人的队伍，向神树方向运动。

“追上去，别让敌人溜掉！”单劲之下达了作战命令。孟庆祥迅速整理队伍，如猛虎下山扑向神树村。

队伍到了村东头，遇到下地干农活的老乡。老乡告诉他们，顽三区区长侯克祥和他的区队，正在村里吃派饭。队伍停在神树村后的小河里，单劲之、孟庆祥作了简短的动员，分析了敌情，要求速战速决。接着布置战斗任务：王寨区区长吴精忠带领区队绕到神树村南的河里埋伏，防止敌人南犯。村北枪不响，村南不准动；一连连长张瑞武率队从村东突破；二连连长张梦朗率队由村北楔入，再分兵扩大战果；孟庆祥冲锋，单劲之带一个排作为预备队留守村东北，指挥全局，严防敌人向东北逃窜。

一声令下，两连战士直插村里。敌人进了神树村后，只在村西南方向设了岗哨，就以班为单位把枪架起来吃饭。饭还没吃完，有的就被击毙，有的被活捉。

侯克祥、蒋相增一伙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弄得晕头转向，慌忙躲进一大户人家的院落里。这时，顽区队长杜

文美想出去看个究竟，刚出大门，就被机枪打断了双腿，旋即而死。

这座大院被县大队一、二两连的指战员围了个水泄不通，机枪封住了院门，战士们往院里猛掷手榴弹，敌人在院子里已无险可守，只有等死。蒋相增一伙高喊：“你们别打了，我们投降！”随后，他们便把枪交出来，当了俘虏。亡命徒侯克祥，躲到一幢砖墙瓦顶的西屋负隅顽抗。孟庆祥看到一时不能结束战斗，焦急万分，匣子枪推上顶门火就要冲上去。张瑞武一把按住了他，说了声“我去”，随即扔了两颗手榴弹，冲了上去。刚冲到门口，侯克祥一梭子子弹打来，张瑞武肩下连中三弹，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前胸，负了重伤，当即晕倒在地。正面冲不上去怎么办？二连连长张梦朗命令几个战士爬上房顶，揭开瓦片，往屋里扔手榴弹。侯克祥便往屋顶扫射，二连又有几个战士被打伤。

时间不允许再拖下去，驻在滩溪口的敌人、驻在崔口的敌保安团，离神树村都不足20华里，很可能出来支援。侯克祥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不除，战斗不能结束。孟庆祥急中生智，利用与侯的表亲关系，向侯喊话：“表叔，你不要打了，再打你就活不成了，缴枪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侯克祥嚎叫了一声“你说话可要算数”，就把枪扔了出来，承认了他的失败。

大家打扫战场，迅速撤出战斗。一场歼灭战，仅用了

40分钟就结束了。此战，毙敌30多人，俘敌三区区长侯克祥、区党部书记蒋相增等50余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受到豫皖苏军区的表扬。群众拍手称快，欢呼“歼灭了侯克祥，除了个活阎王”。

傅庄战斗

1948年10月间，国民党主力部队某师配合萧县保安团三、四个营，永城县刘子仁部的两个团及永城县的部分土顽，向萧西寻我作战。军分区邢天仁副司令员、余辉副政委率领分区机炮连、萧县县大队两个连、永城县大队一个连、砀南大队一个连和萧县四、五、六几个区的区队退至萧永边界。一日晚得悉，国民党某师正由瓦子口向徐州方向撤走。

当晚，邢副司令员、余副政委召开会议，研究敌情。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主力撤走，其萧县保安团及刘子仁部不敢在这一地区停留，必向陇海路边撤退。我们可在敌撤退的路上阻击一下，击溃其一部。我方将兵力部署在傅庄以西十华里的几个村庄，由东向西的次序为：萧县县大队、分区机炮连、永城县大队、砀南县大队。六区区队共计七八十人，担任保卫萧县县政府机关的任务，同时也作为预备队驻东西一条布兵线的北边，即傅庄东南300米的王庄。敌人在我布兵线南边八九华里的几个村庄。

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六区区队在天亮前进入王庄。拂晓前，我们的哨兵发现傅庄似有哨兵走动，不能断定是敌

是我。六区区委书记孟繁超当即通知大家准备战斗。敌人采取包围的阵势，分两路如钳形，以密集队形向我进攻。这时天已大亮，清楚地看出敌人有数百人，后续部队还不知多少。区队仓促应战。敌人以压倒的优势，几分钟后已把我区队的一个班赶出阵地。敌右翼随即占据了王庄西南角的一片房屋，与我阵地相距三四十米远，继续向我猛攻。敌左翼已进逼王庄后，与我逐屋争夺，我区队腹背受敌。敌众我寡，撤退定会造成惨重损失，坚持已无险可守。千钧一发之际，孟繁超振臂高呼“冲啊”，战士们迅速向左翼敌群中猛冲过去。狭路相逢勇者胜，敌先头部队百余人在我区队的勇猛冲杀下，始之愕然，继之调头逃跑。我区队弃却阵地，全部投入追击中。敌右翼随即占领了我们的阵地。但他们发现其左翼已败退，正惊骇不定。这时，孟庆祥率领的萧县县大队两个连（驻王庄西一公里的破阁村）听到枪声，未暇整队，即蜂拥而至，在区队的右后方呐喊助战，势如山崩地裂。敌左翼百多人见大势已去，向西北方向逃跑。区队正追击敌之左翼，发现敌之右翼在其背后，随即调转方向扭住这股敌人在傅庄展开战斗。区队把敌人压缩到一个大院中，孟繁超正指挥战士用手榴弹进攻时，敌拒守的院墙上探出一个人头，说他是院中的百姓，告知我方院中的敌人愿意缴械。孟繁超遂率领几个战士冲进院中，发现敌人已把枪械堆在一起了。

参战的敌方是刘子仁的一个团。他的另一个团驻傅

庄东北的中南海村，正准备参加战斗，看到前线已溃退下来，风声鹤唳，又不知我军之虚实，被他们的败兵冲了下去。

这次战斗，我们虽只数十人的区队，但有萧县大队、永城大队、砀南大队、分区机炮连作为后盾，敌人在摸不清我之实力的情况下，虽有装备精良的 3000 多人却不敢决战而败北了。

这次战斗共俘敌官兵 90 多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战马 1 匹，小炮 1 门。从此，萧县之敌龟缩到徐州近郊，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第四节 成立萧宿县

1948 年 3 月，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成立萧宿县，建立县委、县政府。县委由王尚三、张岸、张健生（张浩然）组成，王尚三任书记，二张为委员。张岸任县长，张健生任副县长。所辖区域包括萧县的龙山（一区）、朔里（二区）、天门（九区）及宿西县的张集、溪河、蔡里、濉溪镇、相山区等。时值国民党萧县县长李公达配合国民党主力部队大举向萧县西部进犯，萧县和宿西县的正面斗争十分艰苦。三专署专员许西连组织武装在徐暨与顽敌打了一仗后，组织萧县、萧宿县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开展两县的工作。会后，萧县与萧宿县就分开活动了。

萧宿县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是向东发展到津浦铁路沿线的一个空档。增设萧宿县，有利于我们开展徐州西南地区的活动，增加了一个打击敌人的拳头。

萧宿县县委、县政府隶属中共豫皖苏三地委、三专署。随着斗争的开展，组建了县大队，开始仅四五十人，后扩充到两个连，隶属豫皖苏三分区。大队长张岸（兼）、政委王尚三（兼）、副大队长张绍烈（兼），经常活动在濉溪口西刘桥、张集一带。

萧宿县初建，敌我斗争形势严峻，又值青黄不接之际，群众缺衣少食。政权机关人少，部队装备较差，又严重缺粮，经常在张集、蔡里等地筹粮。李公达不断带领保安团骚扰他们，将其挤到西北苗桥附近活动。他们有时带领部队到二、九区活动，有时在铁路沿线的大五柳、镇头寺宿营。一段时间里，他们大都在东部地区开展活动，打击敌人，在游击斗争中发展力量，没有遭到大的损失。

1948年夏，陈粟大军南下，萧宿县配合分区武装向徐州外围开展活动。为配合主力部队反攻，萧宿县军民曾组织两次津浦铁路大破击，翻轨数华里。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为了做好支前工作，萧宿县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豫皖苏三地委的部署，很快行动起来。县设立支前指挥部，张绍烈任指挥，王尚三任政委，赵俊德、李辉为指挥部成员，谢兰、徐钦民为办公室负责人。各区指挥部都是区长任指挥，区委书记任政

委。

根据前线军需粮秣的需要,萧宿县分批成立了粮站、兵站和民站。全县设立的粮站有 33 个。朔里区 8 个:段庄、房武楼、黄湾、吴双楼、丁庄、永堙、后土型和石台子;天门区有 4 个:孤山、寺后、白庄、庄里;丁里区有 2 个:梅村、丁里;蔡里区有 4 个:前土型、蔡里、蒋疃、五柳;濉溪周围有戴圩子、李桥子、仲大庄子、郭楼、渠沟、黄庄、丁楼、王店子、张集子、刘桥、小城子、宋疃、濉溪口、烈山、钟楼等 15 个。兵站有戴圩子、李桥子和丁庄 3 个。各区都有民站,主要负责担架、车辆的安排及民工的食宿问题。

淮海战役期间,萧宿县军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力做好支前工作。战役结束后,又协同萧、永两县积极做好善后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及战后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十二章

全力支援淮海战役

1948年秋，蒋介石集团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调集了7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约80万人，集结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与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妄图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阻止我军南下。针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及时作出了歼敌于长江以北的战略决策。辽沈战役刚结束，党中央即电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阔地区，发起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

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历时66天。萧县地处淮海战役的中心战场。在中共萧县县委、县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萧县人民倾其所有，尽其

所能，冒着枪林弹雨，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支援淮海战役，为人民解放军夺取战役的完全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杜聿明弃徐西逃

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我军歼灭从海州西撤的黄百韬兵团以后，为了防止徐州之敌南逃和蚌埠之敌北援，中原野战军于1948年11月16日解放了宿县城，截断了徐蚌段铁路，使徐州之敌成了瓮中之鳖。国民党“徐州剿总”企图夺回宿县，打通津浦路，于11月25日至28日，派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沿津浦铁路西侧，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沿津浦路东侧南进。第十六兵团四十一军于11月25日夜向萧县孤山集之笔架山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进攻，发生激战。26日，敌一二二师等部向守卫孤山集东南纱帽山的两广纵队进攻。敌以飞机、大炮猛轰，并动用化学炮，两广纵队稍作撤退。是日，国民党第十六兵团的一二二师、一二四师、一二七师又向卢村园山一线华野三纵发起进攻，战斗激烈，敌遭重大伤亡后撤退。28日至29日，华野三纵发动反击，打败一二二师与一二四师，收复孤山集阵地。

在这次战斗中，萧县祖楼区担架团出色地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早在8月29日，豫皖苏边区三地委就向各县发出关于组织常备担架团的通知。10月初，萧县县委

决定由祖楼区组织一个担架团，任命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兼祖楼区委书记王继冉担任团长兼政委，区委副书记张亚南担任副团长兼副政委。担架团共 162 副担架，972 人。另有 1 个民兵排，20 多人，全副武装，负责全团警戒。祖楼常备担架团随华野两广纵队活动，驻防在徐州西部及南部山区。没有伤员时，担架团就帮助部队挖战壕，修工事等。孤山集战斗期间，担架团共运送伤员三次。每次都是全团出动，把伤员在包扎所包扎好，由津浦路前线运到萧县西部张大屯一带的野战医院。担架团不畏敌机轰炸，夜以继日，先后将数百名伤员从前线运到后方，受到上级赞扬。豫皖苏三分区办的《反攻报》报道：“萧县祖楼区担架队，在转移孤山战役伤员时，表现非常好。从包扎所出发至某转运站，往返一百六十里路，又有很多难走的山路，他们不顾一切疲劳，两天就返回了。”

国民党军队打不通津浦路徐蚌段，自觉固守徐州前途暗淡，蒋介石遂决定向西南撤退。1948 年 11 月 30 日晚，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以及徐州地区国民党军政机关、后方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约 30 万人，放弃徐州，分多路经萧城向西南滚进。华野指挥部当即命令 11 个纵队的强大兵力，采取多层、多路尾追和迂回拦击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全线猛烈追击。12 月 1 日，杜聿明的指挥部到达萧县大吴集，邱清泉的兵团司令部到达王寨，孙元良的兵团司令部到达红庙，李弥的兵团

司令部到达曲里铺。3日，杜聿明的指挥部及邱清泉兵团到达永城县的陈官庄。李弥兵团驻李石林，后迁驻青龙集。孙元良兵团驻王白楼，后迁驻李石林。此时，他们接到蒋介石手谕，改变方向向南靠拢，企图援救被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我华野三纵、八纵、九纵从桃山集、城阳、永堙等地，经瓦子口向祖楼方向追击敌人。其中一部已于3日拂晓追至永城县的大茴村，与敌先头部队遭遇。华野的一纵、四纵、十二纵从褚兰出发，以一昼夜一百二三十里的急行军，在张寿楼一带，与敌人的掩护部队遭遇。其余二纵、十纵、十一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渤海纵队，也从不同方向配合追击，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合围。至4日，已形成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圈。12月6日晚，孙元良兵团从王白楼、赵破楼等地向西突围被歼，孙元良化装逃走。华野各纵缩小包围圈，将敌压缩在萧永边境以陈官庄、青龙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敌人突围，我军猛追。一夜之间，突然在萧县境内集中了五六十万部队，比当时全县人口还多，凡地图上标上的村庄都驻上了部队。县政府开始摸不清情况，先迁至子观寺，后移至刘憩集，等摸清情况返回时，已找不到住处。因地图上的村庄都被我方主力住上了，县政府人员只好夜宿秫秸庵子。后来有人提议，再找找军事地图没有标上的村庄，果然灵验。于是，县政府先移住吴集西南角菜园村，后移住任楼。

在此之前，萧县县委、县政府已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支前上。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及县大队副大队长孟庆祥，带领两个连在陇海铁路沿线的萧县七、八区和铜山县四区筹粮并组织运输力量，同时扫荡残顽的地方武装，安定人心，组建和恢复区、乡政权。11月27日，他们接到徐州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敌人向西突围的情报。孟庆祥把情报转交给朱玉林，朱玉林马上抄送分区、专署。分区回信指示：严密侦察徐州动向。29日，孟庆祥带一排人到权楼向王闸口方向侦察。30日晚上11时，即看到敌人出来了。他们一方面派人向上级报告，一方面派副排长带一个班去冲击一下敌人，要求要冲击到敌人开炮，动用轻、重机枪，借以向我后方报警。这个班很快就在韩庄东南角的朱大楼村与敌人接上了火，诱使敌人开了炮，动用了轻重机枪，自己打了自己人。孟庆祥带领县大队撤到郝集一带，在这里收缴了砀山保安团的机枪4挺，步枪200多支。

据豫皖苏军区参谋长陈明义写的《淮海战役中豫皖苏军民》一文记载：“一次，萧县大队大队长孟庆祥带领武装人员插入了杜聿明总部所在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杜聿明一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次，崔口乡民兵队长朱国勋配合华野部队，插入敌人心脏，奇袭敌军一个指挥部，立下了战功。杜聿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他写道：“少数解放军深入蒋军内部到处打枪，弄得蒋军草木皆兵，敌我不分，各据一村，彻夜混战。甚至

指挥部及邱清泉兵团所在地，内外亦发生混战。4日夜，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拂晓前始渐行沉寂。”

第二节 倾家荡产，支援淮海决战

11月上旬，萧县支前指挥部在王寨成立，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与副县长单劲之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各区乡也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各村成立了支前小组。大吴集、黄口、王寨、梅村、瓦子口、杜集等地设立了随军粮站。

杜聿明从徐州撤出的第三天，副县长单劲之就见到了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刘瑞龙。他交待的任务是，部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主要是粮食跟不上，要就地借粮。当时，山东随军支前指挥部也同县长朱玉林联系，要求萧县就地借粮500万斤。他们还担心，在短时间内筹这么多粮，会不会官逼民反？朱玉林回答，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萧县人民已经喊出了“倾家荡产，支援淮海决战”的口号。上级分配给萧县的借粮任务，仅半个月就完成了。三分区《反攻报》作了这样的报道：“白军西进被我主力包围后，各地粮站不能及时建立，别处的粮食又不能及时运来，萧县全体干部和群众响应了上级的借粮号召，半个月的时间（12月3日至17日），五百万斤的借粮任务已大部分完成（祖楼、袁圩、石林三个区因区境有敌人部队，是就地借粮的，数目在五十万斤以上，尚

不在五百万斤以内)。”

一县之内,短时间内筹集 500 万斤粮食,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对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部队来说,又是杯水车薪,仅够一天的粮食。刘瑞龙在《人民全力支前,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文中写道:“这一阶段,由于中原、华东野战军迅速转移集中于一个地区连续作战,前方有一百五十万人吃粮(注:包括支前民工),支前任务空前繁重,急需大批军需物资,每天仅粮食就需五百万斤,运输工作极度紧张。”12月12日,由老解放区运来的几百万斤粮面到达黄口车站,全县迅速组织 300 辆牛车运输。在十天内,把全部粮面运到大吴集、王桃园、郝新庄、王枣园、东镇店等粮站,及时供应主力部队。

在支前工作中,王寨区表现尤为突出。该区共筹粮 120 万斤,烧柴 400 多万斤,大白菜 100 多万斤,组织大车 20 多辆,独轮车 30 多辆,担架 20 多副。支前委员韩克均亲自带领民工送粮送菜,20 副担架跟随四纵战士多次深入前线抢运伤员。另外,王寨区还组织了一个向导队,专门给解放军带路;组织了慰问团两次慰问部队,宰了 8 头猪、60 多只羊,其它慰问品多种;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由 15 个烟酒小贩轮流到战地销售烟酒等日用品。南郭庄村 13 名党员组织 4 个村的群众,从淮海战役开始到结束,共支援军鞋 100 双,衣服 60 多件,送煮熟的青菜 1 万多斤,鸡蛋 1000 多个,小鸡 2000 多只,猪肉 5000 多

斤，丸子 3000 多斤，甘蔗 3 万多斤。为了支前，许多群众把房子拆了，把房梁、门板送给部队构筑工事。刚汇集而来的部队，一时粮食跟不上，群众就有什么拿什么，连山芋都吃光了，留下来的种子也拿出来给战士们吃了。王寨区的支前工作，受到了解放军指战员的交口称赞。该区被评为支前模范单位。

在支前的民工中，不仅有萧县的，更多是外地的。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操着不同的口音，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支援解放军全歼敌人，夺取战役的全胜。由于缺乏现代交通工具，运输主要是人背、肩挑、担架抬、小车推、牛车拉、骡马驮。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忍着风雪饥寒，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日夜奋战在运输线上，穿梭于前线与后方，形成了一支亘古未有、气势磅礴的支前大军。陈毅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一词中，对此壮观情景有着生动地描述：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后方群众不分男女老幼，昼夜不停地加工军粮，赶做军衣、军鞋，筹集粮草及修筑工事所需材料，照顾伤员，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中，萧县（不包括划归萧宿县的一、二、九区）的支前工作成绩大致如下：动员民工（包括随军转运民工和临时民工）近10万人；筹粮1095万多斤，柴草3133万多斤；组织担架5700多副，大小车辆8500多辆。还有诸多难以数计的菜、禽、蛋、油、肉等吃食，以及军衣、军鞋、布匹、木料、家具、棺木、牲畜，等等。

在做好各项支前工作的同时，县、区、乡武装及广大民兵，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据不完全统计，战役期间，我地方武装曾单独参加较大战斗290多次，配合主力作战160多次。此外，还担负着捕捉散兵、看押俘虏、清剿土匪、维持治安等任务。例如，1948年12月3日拂晓，萧县八区颜店村李子原等8人捉了6个敌军散兵，缴步枪6支。同日下午及4日拂晓，李子原带领本村5个农民又捉了12个敌兵，缴步枪12支。该村村民朱小楼、朱传杨、朱传德等8人，带3支“土压五”来到庄北三里的马庄，冲进一处住着14个敌兵的房子，当即缴获步枪11支。4日午后，五区王屯、杨庄、崔小庄的群众，看到杨庄庄前停着敌人一辆满

载军火的大卡车，大家拿着锄头、铁锹等农具，蜂拥而上，把五个押车的敌兵吓跑，缴获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1 挺及炮弹、电台等军用物资。当日下午，他们便把全部缴获品交给了正在追击逃敌的某部解放军。五区民主政府于数日内即收到各村群众送来缴获的步枪 90 支，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1 挺，电台 3 部、弹药 10 余箱。该区各乡办公处亦普遍收到了群众缴来的枪支弹药。五区吴楼村的吴忠奎老先生，自己双目失明，便叫两个孩子去路上拾子弹。13 日下午，他亲自背了 700 发子弹送到区政府。此类事例甚多，举不胜举。

自我军发动淮海战役以来（尤其是徐州解放后），萧县地方武装就积极活动，对地方土匪、散敌进行清剿与政治争取工作，散匪纷纷向我县、区、乡人民政府投诚。国民党萧县保安团副团长胡映熙与一、二大队队长韩登云、杨俊领等集体投诚，交出步枪 150 余支，机枪 15 挺，子弹数千发。大屯区收缴枪支 80 余支，七区 100 余支，八区 150 支。王寨区机枪 3 挺，步枪 40 余支，还有子弹、炮弹等一批军用物资。萧县县大队在截击徐州逃敌中，缴获重炮 1 门，迫击炮 1 门，小炮 20 余门，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30 余挺，步枪百余支，战马 15 匹。

总之，萧县党政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历尽艰辛，不惜倾家荡产，舍生忘死，全力以赴支援和配合子弟兵作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节 大决战中的蔡洼

萧县县城西南十多公里处，有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蔡洼。在中国两个命运的决战中，这里却发生了值得永远纪念的大事件。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委会议即在此召开，并留下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总前委领导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熟悉淮海战役的人都知道，打一场淮海战役的建议，最早是由粟裕提出的，围歼杜、邱、李集团的最后决战，又是粟裕指挥的。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最关键时期，在这里度过了28个日日夜夜。

一代名将粟裕为什么要把指挥部选在这里呢？1948年12月15日夜，黄维兵团被全歼，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为了就近指挥各纵队发动总攻，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华野指挥部从宿县孟圩子移驻蔡洼。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移住后，最先接到的电报就是毛主席代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致粟裕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二是“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电告我们修改播发”。此后，华野即按此指示部署实施。为配合平津战役，进行了20天的战场休整，围

而不打，主要是对杜聿明集团进行政治攻势。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预见歼灭杜聿明集团不成问题，于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请刘、陈、邓、粟、谭五位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的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到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

不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所料，三天后黄维兵团残部被歼。12月16日晚饭后，刘伯承司令员、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乘坐吉普车，从中野指挥部所在地——小李庄出发，沿土公路向30公里外的华野指挥部所在地——蔡洼开去。晚上9点钟左右，粟裕同志听到汽车声，迎到村口，第一个同刘伯承握手。他高兴地对伯承同志说：“啊呀！我们已有十七年没有见面了。”17年前，那是1931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在连续四次获得反“围剿”胜利后，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红军失败，根据地丧失，五位首长先后分手。1934年，先是粟裕随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后是刘、邓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陈毅和谭震林留在赣南和闽西南坚持游击战。17年前的分离与此时的重新会合，标志着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

晚上，刘、陈、邓三位首长住在粟裕住处，即蔡洼村杨

家台子李春华家后院的五间堂屋里。第二天天刚亮，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赶来。吃过早饭，就在粟裕住处开会。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淮海战役结束后渡江作战的问题与部队整编方案。

会间，粟裕拿出一份军委电报，高兴地递给大家看。电文称：“淮海战役已进行月余，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张（震）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烟者，得以其它等价物品代替。此项物款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均担。”大家看了电文都很高兴，粟裕更是兴奋，因为头天早上华野才电请军委准予慰劳部队每人半斤猪肉、五包香烟，谁知军委当天就批准，第二天就把电报发回，并且把每人半斤猪肉增至一斤。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华野请示慰劳部队的电文发到西柏坡后，是周恩来副主席先看到的。周副主席当即代军委起草了这份电报，并请毛主席、朱总司令审批，毛主席、朱总司令马上同意，当即发回淮海前线。

同一天，新华社还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为淮海前线司令部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一篇情文并茂、说理透彻的不朽之作，是射向敌人的重型炮弹。对该文的连续广播覆盖了萧县、永城边境上空，促使杜聿明集团的官兵纷纷弃暗投明。

此次总前委会议，是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休息时，五位首长一起走出屋来，在屋前由随军记者陆仁生拍了一张合影，真实地记录了从指挥百万大军的战场上归来的将领风采。那威威乎大将风度，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跃然合影之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欣赏这张合影时，那定格的画面在记忆的闪回中给了我们诸多新的思索与遐想。

12月17日开了一天会。散会后，邓小平政委回到小李庄，刘、陈两位司令员则驱车北上，赶去西柏坡开会，接受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粟裕仍在总前委开会的地方指挥决战。

这是一处二进的院落，粟裕住的五间堂屋是后院。后院里的东屋是电台所在地，西屋是总机所在地。前院为参谋、秘书和警卫人员住处。就是在这个农家院落，粟裕前后调动16个纵队的兵力，全歼被围困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杜聿明集团的26万人马。在这28天里，粟裕既部署军事攻势，又部署政治攻势，既指挥自己的队伍，又按预定的方案安排敌人的末日。

1949年元旦前后，发现敌方部队调动频繁，有的西去，有的东去，敌人想干什么？华野指挥部忙碌起来，诸位首长作出各种各样的预测。粟裕在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作出结论性的发言：“杜聿明现在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天天挨炮，天也和他作对，大雪纷纷，飞机只能高空飞行。因此，敌人见天上地下来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能企图

拼死突围。虽然敌人是关在笼里的老虎，但要准备它逃出笼来打。”根据这个分析，作战参谋们拿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抽出一些部队在永城东南与东北面组织第二防线，布置一个口袋；第二方案：不让敌人突围，而乘敌人调整部署、兵马混乱时发起进攻。1949年1月2日，粟裕按照第二方案，请示前委并经毛主席同意，于蔡洼下达了作战命令：趁杜聿明集团恐慌之际发起总攻，按先分割包围李弥残部、再歼灭邱清泉残部的计划，各部统一于1月6日发起战斗。

总攻于1月6日下午3时30分开始，顷刻间，敌人的阵地和据点变成一片浓烟火海。我军经过休整，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大军像从天而降，如猛虎下山，枪炮声、冲杀声响成一片。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坦克，加上人吼马嘶，撼天动地。东集团由三、四、十、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一、三旅组成，主攻青龙集方向李弥兵团，由宋时伦司令员和刘培善政委统一指挥。经过两天激战，李弥兵团于8日仓促放弃青龙集向邱清泉兵团靠拢。青龙集被我军占领，杜聿明总部受到严重威胁。杜、邱下令死守青龙集以西罗河两岸工事最坚固的阵地，这里有遍布村内村外的环形防卫体系，给进攻增加了困难。我军正如《奇袭青龙集》一诗中所描述的：“奇袭青龙费苦心，天兵豪气贯星辰；疆场杀敌猛如虎，神出雄狮百战身。”经过罗河攻坚战，东集团很快与西集团、北集团汇合，最后突破了敌人

用汽车、坦克排成的环形围墙。这时，已是1月10日天亮时分，敌人大部已停止抵抗，坐下缴枪。我军迅速占领陈官庄。最后四天激战，后勤司令刘瑞龙有诗曰：“四晚总攻同捣蒜，贼军穷蹙终败亡；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第四节 杜聿明萧县被俘

1949年1月9日深夜，在淮海战役的枪炮声中，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带着副官、卫士等一行14人，从国民党新五军驻地陈官庄，经萧县的夏寨向东北仓惶逃跑。途中，副官尹东生给杜聿明剃去小胡子，并换上士兵的衣服，妄图漏网。

10日黎明，萧县四区张老庄村的村民段庆香父子正在村外拾粪，发现了杜聿明一伙行动鬼祟的人。这伙人不走大路，却踏着麦田里的残雪乱七八糟地簇拥在一起。段庆香抗战初期曾担任过抗日民主政府的情报站站长，略具军事常识，此情此景使他十分诧异，当即安排他父亲回村报告驻军。

副官尹东生跑到段庆香跟前，央求给弄件便衣换上。段说：“我哪里给你弄便衣去。”尹问：“你们村里有部队吗？”段说：“周围几十里、上百里都驻满了解放军。”尹一下子紧张起来了，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金戒指塞给段

庆香,叫他不要声张,妄图溜之大吉。段正焦急万分,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知村外发现敌情的张老庄驻军四纵队十一师卫生处通讯员范正国、崔喜云赶上来了。杜聿明一伙发现有人追来,准备抵抗。崔、范二人借助坟头的有利地形,大声喊道:“什么人,上来一个!”自称是队长的尹东生走上来反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范正国答道:“我们是四纵十一师的。你们是哪部分的?”尹狡猾地回答:“我们也是四纵十一师的,原来咱们是一个师的。”小范又问道:“师长姓什么?”尹答不上了。范正国对他说:“对不起,请把你的枪交给我。这是上级的命令,如确实是自己人,一定还给你。”说话间,范正国已下了尹的枪,并把子弹推上膛,对着尹的胸口命令道:“叫他们全部缴枪!”这伙人便驯服地交出了四支汤姆、一支卡宾、四支快慢机和四支加拿大手枪。这时,休养连的轻伤员也闻讯赶到,将这伙人押回了张老庄村。然后转送到四纵十一师政治部审查。

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把自称蒋军十三兵团“军需高文明”的反复审问,他左支右吾,不肯吐露真情,只是把纸烟一支接一支地猛吸。当“军需”又拿出一支纸烟衔在嘴里时,他身旁的一个伙伴立即打燃火机,慌忙给“军需”点火。我政治部陈主任见此情景,心里揣摩,此人一定来头不小,就一个劲地追问他:“你到底是什么官,还是坦白交待吧,抵赖是枉费心机的。黄维、吴绍周都被清查出来了,你是蒙混不过去的。”“军需”听说黄维被查,蓦地一

惊，忙问：“黄维现在在哪里？”政治部主任告诉他：“你们不久就会见面的。”此时，“军需”语无伦次地连续发问：“你是不是陈毅司令？你是不是纵队司令？”

饭后，政治部把“军需高文明”看押在一间房子内。他乘人不备，拣起一块半头砖，对着自己的额角一击，敲破了头皮，把血涂了一脸，倒在地上装死。解放军的医生替他包扎时，他光是哼哼，一句话也不说。当政治部的同志拿出敌工部门送来的杜聿明的照片和这个“军需高文明”对照时，发现他和杜聿明一模一样，只是少掉一撮小胡子。当天晚上，从被俘的徐州“剿总司令部”副官口中证实，这个装死的“高文明”就是头等战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因为铁证如山，“高文明”自知无法抵赖，才绝望地低下头，胆怯地说：“我……我是杜聿明。”

段庆香发现杜聿明等人并报告给当地驻军，使杜聿明等人被俘，这是萧县人民为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作出的又一贡献。

第五节 总前委蔡洼会议的历史意义

淮海战役总前委，是根据战役的发展，我军参战部队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为了加强前线的统一指挥，于1948年11月16日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决定成立的。中央

军委在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使中野、华野两大主力作战及后勤支前等各项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更加有机地协同作战，是夺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总前委成立后，统筹指挥各部，很快全歼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全歼在望，杜聿明集团也投入了罗网。这时，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主席已经考虑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如何乘胜前进，进军江南，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便于1948年12月12日电示总前委召开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邓小平书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统筹安排。在会议召开的时间上，选择在1948年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之后，而华野完成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尚未围歼之前的作战间隙。在会议召开的地

点上,考虑到华野正在围歼杜聿明集团,作为代司令员、代政委的粟裕和副政委谭震林很难分身的实际情况,将会址选在华野指挥部所在地——萧县蔡洼,并于12月16日安排好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的工作,当晚同刘伯承、陈毅司令员一起,驱车赶到蔡洼与粟裕会合。

时任华野副参谋长、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其1997年2月19日所写的《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1948年底。此时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成为南线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在以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中野、华野两支大军并肩作战,仗打得非常好。”

“1948年12月中旬,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黄维兵团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啃掉,杜聿明集团也已成瓮中之鳖。考虑到平津战场的需要,为防止蒋介石下决心命傅作义集团南调,毛主席要求淮海前线部队,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之余部,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2月12日又电示要总前委开一次会,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并将意见由伯承同志带中央。这样,总前委就决定在华野司令部召开一次会议。”

“当时,华野司令部住在萧县西南一个名叫蔡洼的村子里。听说小平和伯承、陈毅同志要来,我们都非常兴奋。

粟裕同志带着我们一块到村边去迎接。我记得他们几个人坐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小平同志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那么大的村子，不怕国民党的飞机把你们炸了？还是要怕死一点啰。’说得大家哈哈笑了起来。我赶忙插上一句话：‘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得来炸我们了。’面对淮海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军已成强弩之末的大好形势，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在蔡洼，总前委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已经不是淮海战役本身，而是关于渡江作战的问题了。大家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敌人的江防部署，对我军实施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讨论了两大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兵力编成和部署，以及渡江作战的时机和协同等问题。会议休息时，总前委还在一起照了相，就是那张著名的五人合影，使今天的人们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的战斗风采。当时，我们华野三大部门领导同志在旁边，照相时总前委首长拉我们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前去。今天想起来，真有点后悔，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历史镜头啊！会后，伯承和陈毅同志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返回中野司令部。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和总前委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张震同志的上述回忆里，我们不难看出：蔡洼会议

是邓小平书记主持召开的唯一的总前委会议，关系到淮海和渡江两大战役的胜利，历史地位十分重要。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总前委成员、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副政委谭震林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会议的要求，在蔡洼发出了《华野战字第十五号命令》，组织各纵抓紧时机进行战场休整，一面组织兵员和武器装备的补充，充实作战部队，一面抓住战斗间隙，进行战术、技术的研究训练，总结经验教训，使华野全军由 36.9 万人发展到近 50 万人。同时，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和广大指挥员深入前线，深入基层，广泛开展立功选模、火线庆功、战地诉苦等生动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活动，使华野各部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战场休整中，各纵还利用天降大雪，被困之敌饥寒交迫的困境，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政治攻势，使敌人军心涣散。据有关资料记载，从 1948 年 12 月 16 日至 1949 年 1 月 5 日的 20 天中，敌军官兵投降者达 1.3 万人。1949 年 1 月 2 日，粟裕代司令员在蔡洼下达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华野战字第 16 号命令》。1 月 6 日发起总攻，到 10 日 16 时，全歼杜聿明集团 26.2 万余人，击毙邱清泉，活捉杜聿明。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西柏坡举行会议，刘伯承和陈毅同志代表淮海战役总前委，就蔡洼会议形成的渡江作战意见，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专题汇报。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的

决议,明确提出淮海、平津战役后,“几大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并通知第三野战军粟裕、陈士榘、张震:“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部署,迅速投入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1949年2月11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再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康生、粟裕、谭震林:“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这已明示:淮海战役总前委负有渡江战役指挥之责。蔡洼会议形成的渡江作战意见,已进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并付诸实施。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我军发布渡江作战命令。当日晚,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九兵团强渡长江。21日晚,第一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四兵团、第五兵团和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十兵团同时发起突击。到24日晚,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筹指挥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接着又夺取了淞沪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总前委蔡洼会议研究决定的作战方案是正确可行的。它对两大战役的

胜利,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附:

是谁活捉了杜聿明?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没有比杜聿明的官位更大的了。杜聿明为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黄埔一期。

杜聿明是被谁活捉的呢?毫无疑问是解放军官兵。可是,还有一个人现在被很多人忘记了。

据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是“一个老百姓。”

据1949年1月18日《大众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战犯杜聿明落网记》的通讯说,是“一位老乡”。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萧县志》记载:1949年1月10日凌晨,杜聿明化名“高文明”,逃到了萧县的张老庄附近,遇到一位拾粪的农民段庆香。杜的副官把金戒指塞到段的手中,企图让段帮他们换一身便衣。段看他们是大官儿的模样,便向驻在庄上的部队卫生院报告。卫生院官兵便赶上去抓住了“高文明”……

事情很明显,假如没有这位“老百姓”、“老乡”、“拾粪农民”的警觉,杜聿明能否抓住,都很难说。抓不到杜聿

明，淮海战役的战果固然仍是辉煌的，可是，总有点减色。抓不到杜聿明，杜聿明的后半生会成为什么样子？至少全国政协要少一名常委。

电影《大决战》在结束语中，引用了斯大林和美国军事家的惊叹：淮海战役中，“共产党怎么会用六十万军队战胜国民党八十万军队？”其中的奥妙可以从活捉杜聿明的经过中找到答案。

今后，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在中国大概是不会再发生了。可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仍然喜欢把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比作“淮海战役”。历史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人们不大喜欢用“战役”作比，而喜欢用“工程”二字了。如今，名目繁多的工程不绝于耳。用“工程”作比，增强了工作的科学性。而要办成一件大事，首先要科学态度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同时，也要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争取老百姓的支持。

应该记住在活捉杜聿明的过程中，那种依靠“老百姓”、依靠“老乡”、依靠“拾粪农民”的解放军作风，不要太相信“上智下愚”的陈腐观念。不是么，那位参与活捉杜聿明的老百姓，不就是不受黄金的诱惑吗？刚刚解放没几天的老百姓尚且有那么高的道德水平，已经解放四十八年的老百姓，怎么会低呢？

（注：此文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所作，发表在1997年11月16日的《拂晓报》上。）

第十三章

迎接新中国诞生

淮海战役结束，萧县人民获得了解放。但是，连年的战争已使萧县千疮百孔，满目凄凉，加之国民党特务及各种反动势力的捣乱与破坏，萧县的社会秩序动乱不安，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在上级党的关心支持下，中共萧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渡道道难关，以实际行动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第一节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

萧县处于淮海战役的漩涡之中。以青龙集、李石林为中心，方圆 40 里，大地看不见树木，村庄看不到房屋，154 个村庄的 24600 间房屋全部被战火吞噬，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废墟。3 万多灾民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在战役中，群众死亡 1681 人，伤 690 多人，失踪 272 人，损失牲

畜 3900 多头。大战后，留下的纵横交错的网式战壕，折合 7 万多亩。据不完全统计，萧永边境（缺六个村庄）的群众六天共掩埋敌尸 15192 具（其中包括被葬在大屯区单庄村村后的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的尸体）。陈尸遍野导致疾病流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因伤寒、痢疾、脑膜炎、天花等疾病死亡的群众就达 554 人，身染重病的 2152 人。

惨重的战灾加上迅疾蔓延的疾病，严重威胁着战后的萧县人民。1949 年元月下旬，上级紧急从外地调来中外医生 727 人（包括国际红十字会中牟分会派来的医疗队）。其中，内科 393 人，外科 173 人，眼科 161 人。他们组建了 35 个医疗队和 4 个小型临时医院，一天最多治疗 800 人，共使 3 万多患者得到了较好的治疗，治愈 1.8 万多人。医疗队还把治病与防疫相结合，普遍为灾民打了防疫针，尸体多的地方撒了石灰水，对水井进行消毒，等等。

为了使全县人民尤其是灾区群众顺利渡过难关，尽快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县委、县民主政府虽僻处乡间，并没有急于搬进萧城，而是及时成立了由副县长单劲之为主任的“支前、救灾委员会”，紧急动员全县人民，起来进行战场救灾。该委员会下设调查登记、粮食保管、生产建设、卫生防疫四个股，各区、乡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在做好支援渡江战役有关工作的同时，紧张有序地开展战后恢复工作。

县委、县政府对战灾作出了这样的分析,认为它与其它灾害不同,战争把一切化为灰烬,使灾民倾家荡产,必须突击进行救助,迟了会死人。正因为如此,救灾委员会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帮助灾民兴家立业,恢复家园”的口号,要求努力做到四条:第一条,不饿死一个人;第二条,不荒一亩地;第三条,午收前先建一部分贴墙屋,秋种前每户盖一至两间房;第四条,通过救灾,改造旧政权,发展党组织。

为了做到不因饥饿而死亡一个人,县政府先给灾民发放了一部分安家粮。1949年3月,每人发红白面粉15公斤,秋粮25公斤,盐2公斤。随后,又陆续从老解放区运来粮食、棉絮等物资。按灾情程度发放,重灾区每人152.5公斤,二等灾区每人102.5五公斤,三等灾区每人75公斤,共发放粮食434万公斤,棉絮5000公斤。募捐物资的发放,重灾区每人合八尺白布,一至两件衣服(多数是部队捐献的军装),铁锅一户一口,农具每户两镰一锄。重灾区每户还发放能盖一间屋的柴草和木料,让灾民先建一间草房或贴墙屋,暂时栖身。

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是救灾的另一个好办法。罗河(又名王引河)位于萧、永边境,是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阵地,弹坑累累,尸横盈河。县政府经请示上级批准,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灾民进行治理。灾民共出工10670人,每人每天发粮3公斤。原计划5天完

成,结果只用了三天半时间,就完成了64万土方任务,共发粮14万公斤。

由于萧县长期处于拉锯式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敌我双方争夺激烈,战事频繁,以致于河道长期失修,灾荒不断。1949年初夏的两场暴雨,使奎、龙、闸、岱、沙五条河的干流河道全部决口,支流平塌。全县平地积水,86万多亩农田受淹,朔里、陶楼等区发生夏荒。秋季又遭一场大雨,灾民由31万人增加到41万人。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县(缺一个区)逃荒的1.1万户,2.6万人;断炊的3.8万户,13万人。长期战灾加上严重的水灾,导致全县灾情逐渐加重,形成了断炊户逐渐增加的趋势。为了帮助萧县人民渡过难关,1949年国家给萧县发放各种救济粮近2000万公斤。

国家的救济只能缓解萧县人民暂时的困难,医治战争创伤与救灾的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也是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以后对经济上翻身的迫切要求。县委、县政府在解决全县人民特别是灾民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

第一,解决灾民恢复生产、生活存在的困难。县政府在玉皇阁、华祖庙等地建了五座铁工厂,利用战场上丢弃的废汽车、坦克、弹皮等,生产铁犁、铡刀、镰刀、铁锹、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品,无偿地发给灾民。县政府发的农具,

加上灾民非正式的代用农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灾民的农具已恢复到半数以上。

耕牛是农民的宝贝。灾民的耕牛在战火中损失殆尽,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没有它是不行的。为解决耕牛问题,县委、县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发放购买耕牛的补助粮 20 万公斤。重灾区每户 200 公斤,轻灾区每户 150 公斤。一户没能力买,提倡两户、三户合伙买。少买公牛,多买母牛,加速幼畜繁殖。二是组织互助组,采取帮牛腿、搁犴、当牛耳朵等办法耕种土地。三是发动非战区的农民组织代耕队,每保出一犴牲口,自带吃用草料。全县共出动 750 犴牲口,奔赴战区代耕春地 1.5 万亩。

1949 年 6 月,县政府在石林区崔口乡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基层合作社,代购代销农副产品,经销生产、生活用品,方便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

第二,启动和发展农副业生产。当时,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是涝灾。县委、县政府统筹安排,统一部署,对境内龙、岱、奎、闸、沙等河的干流河道,进行固堤、补岸、清淤,对支流也进行了整治,并开挖了不少泄水沟。这样,初步缓解了水灾的威胁,为抗灾夺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副业生产方面,共摸排出 120 多种副业门路,其中大多是四坊五匠,搞得好的也能养家糊口。通过摸底统计,全县共有木匠铺 3000 户,铁匠铺 1500 户,石匠 1000 户,香油坊 3000 户,粉丝加工 600 户,豆腐坊 2000 户,编

织 5000 户，弹花轧花 1000 户，捕鱼摸虾 6000 户，纺车 93163 辆，织布机 13537 架，商店 6000 家，中西医药铺 350 个。根据上述情况，县委、县政府很快在全县建立起 14 个基层合作社，为上述副业生产牵线搭桥，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服务。例如，对于当地有原料，或已加工成成品，而且又有销路的苇席、棉花、豆油等，由合作社或专业公司收购；对花生、黄花菜、烟叶、石榴、鸡蛋、土布等农副产品，则由合作社帮助找销路；对以粮食为原料，销量又不大的粉丝，则限制生产，等等。此外，还组织油坊为政府加工豆油。政府每发 100 斤大豆，要求交 70 斤饼与 8 斤油，剩下归己。油坊户每加工 100 斤大豆，自己便可得到 15~25 斤粮。仅此一项，全县就获粮 120 多万公斤。

第三，组织互助合作，开展劳动竞赛。从 1949 年春开始，县政府即在救灾过程中组织劳动互助，除耕、种互助外，还把男劳力组织起来搞副业。全县共组织副业组 5726 个，有 10 万多人参加，盈利明显。与此同时，还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劳模，奖励生产能手。

第四，学习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县委、县政府鼓励干部、群众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如在农作物栽培上提倡等距、全苗、密植、合理施肥等，推广劳模的经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注重推广优良品种。小麦推广的“438”、红秃头、红花雾等品种，都是当时公认的优良品种。

总之，上级党的关心，县委、县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萧县人民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广大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第二节 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蒋介石反动集团为挽回败局，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或美苏出面“调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为了给自己争取喘息时间，他们打着“愿以中共所提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的幌子，一方面紧锣密鼓地部署长江防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另一方面，则是向解放区派遣了大批特务，使之与其党政军逃离时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一起，搜罗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勾结地方恶霸、土匪、反动道会门头子、反动党团分子等各种反动势力，采取造谣煽动，组织暴动，暗杀革命干部，袭击我基层政权，抢劫枪支与财物等手段，作垂死挣扎。

1949年初，国民党少将衔军统特务头子李华堂，勾结萧县“先天道”与“红旗门”道首，笼络1000多道众组成“先天剿匪总队”，活动于苏鲁豫皖边境地区。3月，他们在黄口南殷楼村组织武装暴动，杀害了数名六区（陶楼区）干部和民兵。在萧、宿、永三县交界地带，国民党特务纠合

土匪、道会门兴风作浪，活动猖獗，制造了多起暗杀与暴动事件。7月初，百余微山湖土匪窜入萧县七区（郝集区）与铜山县交界处，杀人越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7月中旬，又有砀山县唐寨区南蔡庄一带的土匪十余人窜扰萧县。与此同时，县城北关一国民党特务用“拜把子”、“美人计”等手段，拉拢县大队一伤员，与之串通一气，里应外合谋杀县长。段庄乡吴老庙村一国民党军官，与潜伏在县大队的特务相勾结，策动武装叛乱，等等。此外，成股的土匪、特务偷袭乡村政权，杀害基层干部和民兵，抢劫公粮，假冒人民解放军向群众派粮要款等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严重地危害着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宁，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打击敌人的种种破坏活动，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成为县委、县政府亟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及时下发了一系列关于做好剿匪肃特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文件，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及注意事项。1949年2月始，首先进行反动党、团、特人员的摸底登记工作。至4月上旬，县委、县政府两次发布通告，要求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及其它一切反动组织之蒋方人员，携带区介绍信、证件、照片等，由保证人带领，限期到指定地点登记。4月底止，上自团级军官与县党部委员，下至一般士兵及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全县共登记蒋方党、团、特人员1500余人。登记

后,由于救灾任务重,支援渡江战役工作繁杂而紧迫,县委、县政府对这些人员控制不力,致使为首分子大部分逃走,有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

1949年4月,打击反动道会门与剿匪肃特工作全面展开。萧县境内,反动道会门组织名称繁杂,有“一贯道”、“先天道”、“圣贤道”、“中方道”、“先天玄关大道”、“天门道”、“红旗门”、“黄旗门”、“黑旗门”等38种,活动于全县22个乡,650多个村庄。建国前,这些道会门组织共发展各类道首963人,道众9500余人。国民党特务勾结反动道首秘密集会,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建设。鉴于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对反动道会门组织的打击,坚持了争取、瓦解与镇压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主要方法是派公安人员打入其内部,摸清情况,适时对其进行分化瓦解,着重打击反动道首,全面摧毁其组织。与此同时,对一般道众及广大群众,普遍进行反对反动道会门的思想教育。

在打击反动道会门的同时,剿匪肃特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为了集中力量打击萧、宿、永边之匪特,宿县地委于4月6日成立了由11名地、县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萧宿永边剿匪工作委员会”,萧县公安局副局长胡石生为委员。剿工委指挥三县部队、民兵及公安人员,迅速扑灭了这股匪特。青纱帐期间,匪特利用青纱帐作掩护,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和抢劫。特别是在龙城、北

望、郝集等区，匪特活动尤为猖獗。县委、县政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指挥公安干警、地方部队和民兵，三方协同作战，采取政策攻心与军事清剿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匪特组织，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军事镇压。

据1949年萧县公安工作年终总结显示，在9~11月三个月的剿匪工作中，击毙的除外，共抓捕土匪、特务、恶霸、道会门等反动分子485人，缴获各类枪支394支。至11月底，剿匪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卓有成效的剿匪工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反霸斗争全面展开，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 加强党和政权建设

1949年2月，县委、县政府从城西任楼迁入萧城。3月，中共豫皖苏分局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归河南、安徽、江苏建制。萧县划属河南省商丘专员公署代管。萧宿县同时撤销，其辖区内原属萧县的一、二、九区仍划归萧县。此外，原属铜山县的郝集、北望、棠张三个区也划归萧县。此时，萧县共12个区，1个镇，208乡，1494个行政村，93万多人。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副书记戴世雅，副县长单劲之。4月，萧县划归皖北行政公署宿县专区。

为了支援渡江战役，萧县人民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踊跃送夫送子参军。县委、县政府在做好其它支前工作的同时，又从县大队 2000 人的武装中挑选出 700 精兵，由副大队长孟庆祥率领，编入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十八军序列，参加了渡江战役。渡江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

早在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反动集团、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49 年 3 月，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值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萧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好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于 7 月中旬召开了为期两周的组织与宣传工作会议，县、区、乡及地方武装的领导干部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上级党的一系列文件。此次会议，以加强萧县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

设,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与文化水平,使之跟上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步伐,宣传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促进政权建设为宗旨。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功臣思想、太平观念、享乐主义等个人主义不良倾向,少数干部工作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现象及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内部整顿。与会人员对照二中全会精神,在进行自我思想教育、自我检查的基础上,找出了党员、干部队伍工作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极少数违法乱纪的蜕化变质分子,给予了严肃处理。会议还对发展党员、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与文化学习、干部的选拔与培养、区乡干部的轮训、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与贯彻等方面的工作作了部署,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次会议,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与作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至10月底,县委下辖12个区委,123个支部,共有党员1914人(含1117名候补党员)。

党的建设的加强促进了政权建设。基层政权普遍建立,县政府的教育、民政、司法等工作机构和公安、工商税务、粮食、银行、邮政等职能部门相继成立并正常工作,地方武装发展壮大,萧县总工会、青年运动萧县工作委员会、萧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先后建立,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出现了百废俱兴的景象。在淮海战役结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所取得的

巨大成绩，赢得了全县人民的信赖，提高了党的威望。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光荣诞生，宣告了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宣告了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萧县后，古萧大地，万众欢腾。萧县党政军民纷纷集会、游行，以不同方式纵情欢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从此，萧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新征程。

结 语

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

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萧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此间，仅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者就达 15000 多人，其中 3500 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凝聚成一种崇高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自由民主、不畏强敌、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精神的一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悲壮历史过程中，从嘉兴南湖启航的一叶小舟，最终负载起了我们民族走向独立与自由的重大使命——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为了民族

的独立与兴旺，萧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认识了共产党，从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畏行动中选择了共产党。

早在五四运动前，萧县的知识界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新思想的启蒙下，掀起了批孔、批封建专制文化的热潮。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萧县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纷纷去外地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李宪仲、徐文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萧县广泛传播，并逐步影响到社会各阶层。马克思主义唤醒了萧县人民，使萧县人民明白了这样一个革命道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要获得独立和解放，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萧县人民的觉醒，为中共党团组织在萧县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准备了条件。

大革命后期，中共徐州独立支部开始在萧县发展党员，并有一些外地入党回萧的共产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上级党组织先后派人来萧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8年1月，在国民党萧县执监委员会任职的刘亚民等共产党员筹备建立的黄口、王寨、萧城三个支部，是萧县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同年6月，在上级党组织的

关心和指导下，中共萧县第一届县委诞生。在县委的领导下，萧县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形势持续高涨。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的逐步提高，农民运动的兴起，形成了党领导下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1930年夏至1932年秋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的一系列农民武装暴动，虽然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萧县的嚣张气焰，震撼了其在萧县的反动统治，提高了党的威信，但却使萧县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暴动中显示出来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鼓舞和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革命低潮时期，萧县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党员，在萧铜边境坚持斗争，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积蓄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把一个醒来的民族凝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先士卒，将千百万庄稼汉锤炼成了一支无所不在、战无不胜的抗日大军。萧县的各级抗日武装和各类抗日救亡群团组织，即是这支抗日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8月，萧县沦陷后不到三个月建立起来的“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当时华中地区乃至新四军属地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县委、县抗

日民主政府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建立各级各类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使萧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当时，全县人口 50 万，有近一半人活动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中，实实在在地“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与此同时，县委始终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注重在抗日烽火中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建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抗日武装，支援主力部队，使萧县成为八路军与新四军公认的“抗日模范县”。

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创建的萧铜游击根据地，由于有新四军四师和淮北区党委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它在日伪顽并存的险恶环境里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其开展的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的对敌伪工作，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巩固的萧铜游击根据地，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游击战略思想的典范。它为新四军四师挥师西进痛击日伪顽反动势力，收复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重建萧县抗日民主政权，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进步终将战胜反动。历史雄辩地证

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萧县的抗战史，就是中共萧县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县一切爱国力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浴血奋战的过程。

解放战争时期，萧县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在党的领导下与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特别是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中，萧县人民倾家荡产，舍生忘死，全力支持淮海决战。为支援渡江战役，萧县人民踊跃送夫送子参军。编入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十八军序列的七百萧县英豪，参加了渡江战役、成都战役后，奉命进军西藏。为了西藏的解放与安宁，他们无怨无悔地浴血奋战在雪域高原上。总之，萧县人民为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萧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热血和生命把这段历史抒写得悲壮而辉煌。在这段历史里，中共萧县党组织领导萧县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萧县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一真理，坚持和弘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原则和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和智慧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世纪里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附录：

中共萧县地方史大事记

(1919.5—1949.9)

一、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1919年

5月—7月 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不久,北京大学的学生郭清杰和徐州七师的学生到萧县宣传。他们首先把徐属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县)、宿(迁)、铜(山)、睢(宁)八县的学生联络起来,由各县的代表集会徐州,成立八县学生联合会,领导八县的反帝爱国运动。萧县推选徐文雅为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7月—8月 李宪仲等人在萧县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暑假期间,萧县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读书的进步学生李宪仲等人,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带回萧县,并以李宪仲为首聚会萧城,探求革命道

理,宣传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意义,并第一次在萧县喊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

8月 徐州学生联合会派高民、徐文雅来萧县宣传五四运动。他们首先在县第一高等小学发动,然后联络女子学堂、县立国民小学以及全县各乡村小学,成立萧县学生联合会,一高学生徐志昌为会长,王宜周为副会长。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上街游行示威,贴标语、散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巴黎和会”、“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有力地声援了五四运动。

1920年

春 在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下,萧县学联组织“十人团”(即由十人组成的宣传队),分头下乡巡回宣传演讲。先后到瓦子口、白土、永堍、王寨等集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宣传活动。

徐文雅和石民宗两人同在徐州十中就学,同是徐州学运的领袖。他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各种新思潮、革命道理,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俄国革命上,把学习心得通过徐州《赤潮》旬刊发表出来。他们的思想在萧县青少年中颇有影响。萧县也编印了宣传新思想、提倡科学和民主的

《新声小报》。

11月 徐文雅回到萧城，在孔庙召开四五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会后，学生都用白布写上“救国”二字缠在臂上游行示威，并到各商店查禁日货，把查出的日货趁萧城十月古会时拉到龙山脚下纵火焚烧。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1923年

李宪仲 1920年毕业于徐州市立十中，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萧籍学生在外地入党的最早的党员。

1925年

徐文雅于1923年在徐州市立第十中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取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25年在中山大学入党，不久担任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兼粤州区区委学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和李宪仲在广州相会，谈论家乡党的建设，后李宪仲去武汉，他俩分别在广州和武汉以不同方式为萧县早期的党建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夏 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分子开枪镇压学生、工人的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萧县，萧县工、商、学界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将查缴的日货、英货焚烧，把募捐的钱邮汇上海，救济烈士家属。

秋 戴天盆到萧县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戴天盆(共产党员)来萧县后，向各界人士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报告。通过签名，发展国民党员，7月1日主持成立了国民党萧县执行委员会。

1926年

秋 刘亚民在萧县永堙乡办平民学校。在外地入党的中共党员刘亚民(跨党)受组织派遣，由武汉回到家乡萧县永堙开展革命活动，开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培训农民运动骨干，有30多位农民参加学习。

中共徐州独支派三名党员来萧县活动。

11月 郭潜飞到萧县调查农民运动。中共徐州独支农运负责人郭潜飞调查徐州周围的农民运动等情况。在萧县调查后，认为党员刘亚民在永堙办平民学校，教育农民取得显著成效，将来萧县的农民运动，必以此为策源地。

12月 许致远、邓果白等五人从上海农民运动训练班学习归来。许致远、邓果白在上海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

班学习时，由沈毅、邢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月底结业回县后，在家乡薛庄办起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后邓又去武汉学习。

李广琛到萧县进行革命活动。中共徐州独支党员李广琛，趁来萧县视察国民党党务之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国民党县党部的执委丁文魁（丁毅忱）、纵精舜（纵白踪）二人为中共党员（跨党）。翌年春，两人在徐州履行入党仪式，是在萧县入党最早的中共党员。此时，萧籍在外地入党的中共党员还有黄化育、石民宗、徐学曾、卢亚光等人。有的后来回到萧县，参加了萧县的党建活动，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

1月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萧县革命青年纷纷前去武汉参加国民革命。他们分别在政治军事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驻武汉党政训练班学习，有的参加了“二次北伐”，随军开展农民运动；有的参加了讨伐夏斗寅、许克祥的战斗。在这时入党的萧籍青年有谢光亚、孟庆鉴、崔健吾、朱大同、范自中等（皆为跨党）。

6月初 萧城军民欢迎慰问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第十军于6月2日占领徐州。王部路经萧县时，县城军民郊迎20里，并在南书院举行

欢迎会，向官兵赠送慰问袋。

6月中下旬 汪精卫、蒋介石等密谋合作反共。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19日，蒋介石率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迎接冯玉祥，在萧县黄口车站举行欢迎仪式。20日—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将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7月15日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原武汉政治军事学校等处的萧籍青年，随着形势的恶化纷纷离开武汉，寻求新的革命之路。

7月 萧县国民党进行“清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李轩到萧县以整理党务为名进行“清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

8月 直奉军阀反攻，宁汉双方武装均向南撤退，萧县国民党人亦随之星散。有的随王天培的部队去了南京；有的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转移到皖北太和一带。在杨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任训常、胡玄圃等人。他们在该部队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9月 武汉方面撤离出来的萧籍中共党团员相继到达南京，如石民宗、刘亚民、孟庆鉴、谢光亚、陈令远等人。他们聚集在以张原石为首的“中共江苏省委直辖特别小组”（清凉山小组），以临时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联络及组织发展工作。在这一时期入党后来又回到萧县的有王景武（铜山人），陈一民（萧县人），秦雅芬（宿迁人），刘石云（铜山人）等。

12月中旬 国民党军队再次占领徐州，在外地的萧籍革命青年纷纷返萧。这时，刘亚民、孟庆鉴、谢光亚、陈令远、王景武等受党组织派遣也回到萧县工作。他们通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刘汉川（刘云昭，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依国民党机关作掩护，秘密开展中共萧县党组织的筹建活动。

1928年

1月 萧县国民党恢复执监委员会，中共跨党党员刘亚民任常委，丁文魁、纵精舜为委员，朱思伦（朱宜之、后叛变）为秘书。他们对外地回萧的共产党员，通过摸底登记，先后建立了黄口、王寨、萧城三个支分部。时有党员25人（黄口7人，王寨8人，萧城10人）；同时，发展农协会员600人，分布在黄口、王寨、永堙等地。

2月中旬 胡玄圃、任训常、纵封亭等四同志，受中共皖北特委（在太和杨虎城部）派遣，回萧县指导工作。他们和武汉回来的同志共同研究，成立了中共萧县特别支部。胡玄圃任书记，刘亚民、胡文清为干事，受铜山县委领导。而后，胡玄圃去王寨小学任教，借以掩护党的工作。此时，睢宁县共产党员王树璜经组织介绍，到王寨小学任教务主任，协助特支开展工作。

2月底 刘亚民介绍徐州市共产党员王圣时、白夫

桥(后叛变)、沙文生(女)、王承恩(女)到永堙小学任教员,与杜玉堂一起建立永堙党的小组。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组织秘密农协,发展党的组织。

3月14日 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陈亚峰(化名“寅谷”)来萧,在县城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指示“要夺取政权”,即掌握国民党县党部,把国民党员中的进步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争取中间势力,打击国民党守旧派,把全县的党务、政务、财务及武装等重要职权抓到共产党员手里,一时放松了群众工作。

3月底 萧县师范学生罢考,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争取学生的合法权利。4月初选举产生“萧县师范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庆益(刘永之),副主席李和祥,委员有颛孙琨猷(组织)、刘庆澄(宣传)等。

4月中旬 国民党开始在萧县建政,李承霖任县长。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举荐,共产党员谢光亚任公安局长,孟庆鉴任督察长,王景武任县常备大队长,陈令远任副大队长,刘亚民任县款产处主任兼萧县师范校长。他们以执政党的姿态进行活动,逮捕了民愤极大的劣绅邵世恩、刘瑞岐,押送江苏省特别法庭,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全县16个行政局(区)长有半数为共产党员担任。特支书记胡玄圃担任了一区区长,党的机关亦随之由王寨移至县城。

4月 朱大同去张庄寨小学任教,先后发展祖玉敏

(校长)、祖玉英(行政局科长)、祖玉金(农民)、王德山(镇长)等为共产党员(均跨党),组成张庄寨党小组。

夏 共青团萧县支部建立,许西林任书记,有团员10人(知识分子6人,工人1人,农民3人)。

5月5日 中共萧县特别支部改组,王树璜(时为贫儿教养院院长)任书记,干事有胡玄圃、胡文清。

5月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萧县师范学生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实行对日绝交”和“抵制日货”等口号,并组织“反帝大同盟”,深入街道、农村开展反帝宣传。为配合宣传活动,萧师学生自治会创办《晓声》半月刊。

5月底 贺维中(贺云涛,铜山人),王嘉楷由东江经香港、上海返回铜山。通过中共徐州县委介绍,来萧县参加党的活动。在此前后来萧县的外籍党员还有申朝宗、韩均等。

6月25日 中共江苏省委代表罗世藩来萧,决定成立县委。28日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共萧县第一届县委,颛孙钧(孙叔平)、胡文清、胡玄圃、张得名、胡道敏为干事,王树璜、王沛然为候补干事。颛孙钧、胡玄圃、胡文清为常委,颛孙钧为书记。通过了党的组织发展、宣传及训练、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士兵运动、青年运动及其它工作等七项决议案;同时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要求一周

内建立黄口、王寨、县城、永堙和张庄寨党的支部。

7月下旬 前特支书记王树璜(徐海巡视员寅谷报告为王世德),因县委成立大会弹劾其十大错误,并报省委予以处分。他未经县委同意,骗取省委通讯处而离开萧县。

8月 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徐海蚌地区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徐海蚌特委。省委代理书记李富春指出徐海地区前一阶段“夺取政权”的做法是错误的,既没有下层的基础,也没有革命的实际力量,只掌握一些上层职位是存在不住的,要求各县担任上层职务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政府机关,到农村、学校去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

9月 省委派罗世藩同志到徐视察,对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严令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退出,对坚持错误的分别给予党纪处分。萧县的孟庆鉴、王景武被开除党籍;谢光亚、陈亚峰受留党察看处分。萧县的共产党员除个别人外,绝大部分同志都从国民党机关中退了出来。

中共萧县县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改组为二届县委。二届县委仍由七人组成:贺云涛、颢孙钧、胡文清、胡玄圃、王沛然为干事;石广宣、胡道敏为候补干事。贺云涛、颢孙钧、胡文清任常委,贺云涛任书记。

秋 在二届县委领导下,永堙、王寨、黄口、张庄寨、

薛庄、陶楼、郝集、路套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朱小楼子农协在朱玉珂等人领导下，向官僚地主刘子瑜开展了反霸占公集的斗争。

10月 萧县师范学生自治会发起罢课斗争，要求驱逐教导主任黄怀宇、成立全县学生自治联合会。同时，张贴标语、发宣言，号召全县学生总罢课。王寨、永堍、黄口、郝集等学校立即响应，参加总罢课的学生达千余人，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迫使县教育局答应学生的要求。11月初，各校选派代表成立了全县学生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11月 胡玄圃发展路继先入党。而后，又吸收朱玉珂、路永铮（路涤生）、路永圜等为党员，于翌年2月建立路套特支，路继先为书记，路永铮、朱玉珂为干事。有党员15人（农民9人，知识分子6人），分布在路套、杨庄、朱小楼子等村。农协秘密发展会员到四五百人。

11月下旬 胡玄圃因指导萧师学潮斗争而暴露，经特委同意，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三届县委，选举正式干事五人：许西林、颢孙钧、胡文清、张达生、萧雅忱；候补干事刘昭奎、石广宣；常委有许西林、颢孙钧、胡文清；书记许西林。三届县委下辖四个区委、三个特别支部，党员总数200人。

12月5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在邳县八义集附近之曹庄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第六次代

表大会决议,萧县县委出席代表一人(农),参加一人。

12月 萧县教育局为镇压萧县师范学生运动,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同时免去刘亚民师范校长职务,开除李和祥、刘庆益、颢孙琨猷、陈一民、彭瑞、吴孝庭、张长生等七名学生。

冬 永堙农民开展罢更斗争。300多农协会员向国民党永堙区长刘秉周提出:(1)穷人不给富人打更守夜;(2)穷人买平糶粮不准不给;(3)穷人出入自由,不得把穷人当作坏人、土匪盘问。通过说理斗争,迫使刘秉周答应了农协的要求。

1929年

1月初 共青团萧县县委建立。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张雨亭(陈政齐)来萧,在萧城纵大院召开团员代表会议,成立县委。萧雅忱任书记,徐秉玉(女)、颢孙琨猷为干事。

2月初 萧县农民开展年关斗争。县委在旧历年前领导各地农协,发起年关斗争,提出“年关不还帐”、“年关穷人帮穷人”、“年关向地主借粮”等口号。斗争取得许多胜利。

2月 萧县师范学生开展斗争。萧师校方在开学之际,先后贴出开除学生及任命丁文魁为代理校长的布告,

激起学生的愤慨，遂撕去布告，宣布罢课。全县各校学生纷纷成立声援会，支持萧师学生的斗争。3月初，萧师学生游行示威，包围了县教育局，并赴县府请愿，迫使县长刘丙晨答应学生的要求，宣布撤销教育局的布告，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继之，又在实小召开全县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

黄口特别支部成立，李祥龄为书记，郑传舜（郑觉山）、张永祥（老安）为干事。时有党员30人（知识分子3人，农民27人），秘密农协会会员400多人。

路套特支成立，路继先（路少棠）任书记。特支成立后，即领导农协发起反对地主杨学勤的斗争。

春 国民党永堙区公所为加强对该区的控制，架设电线，安装电话。中共永堙支部组织群众三次砍断电线八华里，造成敌人通讯联络中断。

4月下旬 萧县党组织遭大破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段木楨来萧县“清党”。萧师学生刘庆益、李和祥、吴孝庭3人被捕，通缉八九人；路套纵白踪、朱世昌、朱黑等4人被捕，通缉7人。6月间，又相继捕去县委委员胡文清、路套支部委员朱玉珂，团县委委员徐秉玉。全县共被捕13人，被通缉四五十人，不少同志逃往外地，萧县党的组织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5月 中共萧县县委在许岗子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西林、颀孙钧、胡文清、萧雅忱、戴瑞朴

(戴晓东、戴蕴山)、徐秉玉等。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批判和纠正了前一时期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确定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在基层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待革命高潮到来时,以便组织武装,夺取政权。会后,萧雅忱到黄口、郝集,戴蕴山到王寨,许西林在永堙,分头进行基层组织的发展工作。一些已暴露的党员,如萧师学生张兆坤、冯家平等都转入农村进行革命活动。

6月初 中共萧县县委发动群众开展麦收斗争。王寨“农协”在共产党员唐继敏的领导下,组织了30多人的割麦队,三个晚上割了王窑、王庄、王寨大地主的小麦15亩。后因白色恐怖的到来,刚刚发动起来的麦收斗争即停止了。

6月17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撤销,萧县县委遂直属江苏省委领导。

8月 县委委员颛孙钧调睢宁任特支书记。

中共萧县县委在戴楼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3天。县委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总结了前段工作,要求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秋收斗争。

9月 萧县各地普遍发动秋收斗争,提出“大领工资增加三分之一”、“反对冬闲辞退大领”、“榜二八要改为三七或四六分”。王寨、宁园、东西郝楼的大领成立了“大鞭

会”，迫使地主答应长工的要求，长工增加工资 70~150 斤粮食。

萧县师范学生利用罢考、罢课、游行及向新任县长侯绍龙说理等方式开展增膳(增加伙食补贴)斗争。国民党当局极力镇压，三次解散学生自治会，并将学生领袖冯安远、孙启庚、王绍孟等拘留 15 天。

秋 郝集小学团支部建立，方登瑞(女)为书记，朱延贞、纵瑞香为干事。

10 月 全县教师加薪斗争取得胜利。中共黄口特支书记李祥龄联合黄口小学、郝集小学的进步教师，成立了加薪委员会，向县政府要求薪金由每月 20 元增加 20%。全县教师云集县城，多次游行示威，贴标语、呼口号，赴县府请愿，斗争持续两月之久，终于取得胜利。

11 月 利用农村集市、古会举行飞行集会。11 月 18 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李立三的“左”倾观点，确定了“进攻路线”、“准备地方暴动”、“走向地方暴动”的总路线。在这个“左”的路线指导下，萧县党的组织利用农村集市和古会，先后在朔里、永堙、瓦子口、萧城等地散发传单，举行飞行集会，开展革命宣传。11 月 27 日(旧历十月二十三日)萧城古会，萧县师范学生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从县城东门一直散到龙山脚下。

年底 全县发展党员 200 多人，建立了 11 个支部，发展秘密农协会员 3000 多人。

1930年

1月 中共萧县县委改组,彭瑞(彭复中)任书记,委员有萧雅忱、纵翰民、张舒民、刘昭奎、石广宣等。

3月初 中共徐海蚌特委恢复,陈资平任书记,委员有颛孙叔陶(孙叔平)、组织部长孔子寿、宣传部长陈履真,秘书先为秦雅芬,后换孙叔平。同时恢复了团特委。特委恢复后,萧县县委和砀山县委、宿县县委、泗县县委及烈山特支重归其领导。

3月8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对各县发布7条指示:(1)坚决组织同盟政治罢工;(2)做好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3)反对改组派和取消派;(4)在反帝反对国民党的同时,要联系到“七二一”惨案;(5)在两路两矿的罢工中,抓紧建立赤色工会;(6)加紧建立武装、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7)做好童工、女工工作。

3月28日 萧县师范共青团骨干冯安远、孙启庚、王绍孟等多人被捕。

4月6日 中共徐海蚌特委发出“五·一”总示威及整个红五月工作计划大纲。计划要求一些县的农民斗争尽量深入扩大,坚决的领导武装冲突转变到游击战争。为适应斗争需要,各县要按分配数字快速发展党团员。各县党、团县委合并,组成中心支部,建立行动委员会。通过红

五月纪念活动,发动群众、发展组织,掀起革命高潮。

5月 中共萧县县委在李老庄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纵翰民、萧雅忱、李祥龄、谢光亚、冯家腾等10余人。会议由新任县委书记张圣和(张达生,化名宋治邦)主持。会议根据特委指示,讨论了“红五月”的工作,成立了县委行动委员会,张圣和任书记。

全县全面开展“红五月”活动,中共萧县县委成立“纪念筹备委员会”,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九”、“五卅”等都开展纪念活动。五一节组织准备更加充分,一夜之间城乡到处是标语、传单。白天到集市上散传单、搞飞行集会,在人多的地方作简短演说,说了就走。5月4日,黄口小学举行浩大示威游行,抗议反动当局压制学生运动,全校举行罢课,并驱逐了训育主任王体鹏、教务主任吴忠贞。通过红五月活动,党团组织迅速扩大,萧县师范共青团员发展到90多人。革命群众进一步发动,为武装暴动作了准备。

6月上旬 萧县行委在黄口、王寨等地发动麦收斗争。组织短工会,提出“短工上市,工资每天一元”、“短工不做夜工”、“不准中途解雇短工”等口号。通过斗争,短工工资增加1~2倍。同时,组织妇女、儿童拾麦队,抢拾地主的小麦,每人达百斤。麦收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群众组织的力量。

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

通过了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6月13日 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第23号通告，要求徐海地区以徐州为中心布置地方暴动。

6月21日 萧师革命学生二人被捕。国民党萧县县长王公珣亲自带人闯进萧县师范搜查，在李乐智等学生的床下搜出革命传单、标语，遂将李乐智、孙启曾捕去。李乐智于9月21日在镇江英勇就义。

6月 徐海蚌特委召开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农民暴动。开会时被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部发觉，当即派兵包围，由于转移迅速，仅特委秘书秦雅芬1人被捕。

萧县行委部署农民暴动。中共徐海蚌特委书记陈资平、宣传部长陈履真相继来萧，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组织农民暴动的精神。在永堙、戴楼、周庄、李老庄等地多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案。县行委根据特委指示，先后在永堙、戴楼、张绪庄等地召开会

议，增补戴蕴山、胡文清、许致远等为行委委员，决定7月10日（旧历前六月十五）于黄口、王寨、永堙三处举行暴动。其组织暴动的负责人：黄口是张圣和、李祥龄、谢光亚；王寨是戴瑞朴、胡文清；永堙是张舒民、萧雅忱。待三处暴动成功后，会合队伍集中力量夺取县城。

7月10日 黄口暴动。上午10时许，中共萧县县委委员李祥龄等指挥各路暴动骨干力量200余人，随赶集人群分别云集到三处进攻目标附近。在指挥所发出信号枪声之后，突击队以短枪、炸弹攻击敌驻黄口的营房，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小时后，消灭了车站东西两个排。下午3时，消灭了车站北面的一个排。暴动开始后，由黄口小学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上街写标语、散传单、高呼口号，鼓舞群众，动摇敌人。铁路工人于李阁附近破坏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敌黄口区队在地下共产党员张永祥的带领下，参加了暴动队伍。此次暴动，共缴获敌人长、短枪近200支，俘虏100多人。暴动队员程瑞凯、李祥太、李福全、单玉（单衍林）四人壮烈牺牲。11日，黄口暴动队伍按预定计划向王寨转移，打算与王寨、永堙两处的暴动队伍会师。不料，这两处都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同时配合行动。黄口暴动队伍当即在宁园、郝楼休整一日，分了大地主张庆祥、郝鸣扬、郝鸣珠的粮食、马匹、农具给贫苦农民。13日回师曲里铺。黄口暴动使陇海铁路的交通中断了三天，敌人震惊，国民党萧县县长王公珣亲率县警备大队紧跟

追击，暴动队伍分散隐蔽。

7月 胡文清牺牲。县行委委员胡文清、戴瑞朴隐蔽在王寨以西活动。夜间转移时，张棠坊地主张祚敬指使狗腿子埋伏路旁，群枪射击。胡文清身负重伤，在送往洪河集医治的途中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8月底 萧县苏维埃和红十五军第一师成立。徐海蚌总行委宣传部长陈履真到萧县，在帽山窝的周庄召开县行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萧县苏维埃和红十五军第一师，并在萧城、里山、朔里、蔡庄等地再次举行暴动。县苏维埃主席纵翰民（纵夷陀）；红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张圣和、政委纵翰民。会后，连夜准备了军旗、布告和传单。分头去召开会议，加紧暴动的各项准备。

9月7日 靳伯益等被捕。是日下午，萧县行委委员张舒民将暴动宣言和皮球炸弹运进县城。当晚，在靳伯益家的几个党员骨干传达了县行委在萧城暴动的指示后出城，靳伯益、王汉民等人继续开会，讨论次日召开县城党团员会议的问题。夜11时许，他们被国民党县政府公安局科长张祚申捕去。继之，国民党萧县当局又在七区捕去李兆铭、纵衍鹏。经刑讯后，11月2日解往镇江。翌年4月12日，靳伯益、王汉民、李兆铭、纵衍鹏英勇就义。靳伯益等同志被捕后，县行委张圣和、纵翰民、萧雅忱、戴瑞朴、张舒民、许致远被悬赏通缉，革命再次受挫。

11月 中共徐海蚌特委分为三个特委。10月29日，

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蚌埠特委(长淮特委)之后,11月上旬蚌埠特委即从徐海蚌特委析出,特委书记陈履真。后江苏省委又决定将徐海地区划分为徐州、海州(东海)两个特委。徐州特委代理书记孙叔平,萧县、砀山、宿县隶属徐州特委领导。共青团徐海蚌特委随之三分。

11月5日 中共萧县县委在永堙开会,研究第三次暴动。决定纵翰民负责王寨、张舒民负责县城,萧雅忱负责永堙。6日,萧雅忱去永堙开展工作,途经闸河时被捕去,23日在县城英勇就义。

11月7日 为纪念十月革命节,共青团徐州特委举行飞行集会,萧籍学生冯甦(冯安远)、张逸生在黄河滩把戏场散发传单时被捕。12月5日,冯甦在徐州黄河滩英勇就义。

11月下旬 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江苏省委指示,徐海蚌总行委撤销,恢复徐海蚌特委,书记陈资平,宣传部长孙叔平,组织部长孔子寿,秘书戴蕴山。萧县行动委员会亦随之撤销,恢复中共萧县县委,纵翰民任书记,戴瑞朴、张舒民、许致远为委员,同时取消区委,成立中心支部,就近领导几个支部。

1931年

春 中共萧县县委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艰苦奋斗,

顽强工作，先后恢复和发展了 11 个支部，300 多名党员，分布在 32 个村庄。

3 月 中共徐州特委分成铜山、宿县、宿迁三个中心县委。萧县县委归铜山中心县委领导，原县委书记纵翰民调任宿迁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朱大同接任萧县县委书记，委员有张远怀、冷启英、李繁洲等。

夏 团萧县县委重新建立。1930 年 11 月 6 日，共青团萧县县委书记萧雅忱被捕后，萧县团的工作瘫痪。1931 年夏张逸生在徐州出狱，受共青团徐州特委书记派遣，来萧县开展团的恢复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宣传发动，使许多同志重新振奋起来，重新建立了共青团萧县县委，冯家平任书记，张逸生、邓世昌（邓赛林）、朱振琪为委员（后增补李振海）。

9—10 月 抗议日本侵略东北三省。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制造借口进攻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接着侵占东北三省。消息传到萧县，全县各界在黄口召开万人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会后，学生停课宣传。共青团萧县师范支部书记朱延贞到东镇店小学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惨状，唤起群众觉醒。

秋 萧县师范团支部发起驱逐校长孙梅生的斗争。通过说理、请愿、游行等方式，迫使县政府撤销孙梅生师范校长的职务。

冬 萧县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萧县师范、实验小学

以共青团员为核心，自发地组织“萧县学生抗日救国会”。祖宇恩任会长，委员有欧阳道力、王继元、孟凡超等。救国会宣传抗日，查禁日货，发展会员。翌年暑假，各校救国会活动骨干多次被校方宣布停学。

12月18日 中共江苏省委对徐海蚌地区各县的军事工作发出指示信，要求立即组织群众武装，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将萧县西部、宿县、濉溪、永城划为徐海蚌游击中心区的第三区，要求县委制定计划，集中枪支，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

2月初 许致远被捕。同年10月解往苏州，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抗战开始后出狱。

3月 县委发动夺枪暴动。中共萧县县委为贯彻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群众先后发动了夺取张寿楼地主张梦新和王寨地主徐作栋的枪支的暴动，共产党员唐继敏、王洪彬被捕，同年被杀害于镇江。

6月 铜山、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重建徐州特委，特委书记由吴国治代理。新的徐州特委成立后，中共宿县县委、萧县县委、砀山县委归属其领导。

7月 贫儿教养院学生在共青团组织领导下举行罢课。提出“改善生活”、“实行半工半读”、“权太丰(县贫儿

教养院院长、国民党员)吃苦孩子的钱要退回”等要求。经过反复斗争,迫使县长王公珩答应了学生的要求。斗争结束后,领导罢课的谢庆云等学生被开除。

县委贯彻反富农路线。县委委员冷启英在县城召开共青团组织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反富农路线的指示。共青团萧县县委委员朱振琪、李振海、张逸生等被撤消职务,由冯家平另选工农分子组成新的团县委。

7月底 中共萧县县委在五区任小庄召开会议,讨论暴动问题。决定以“秘密准备,突然进攻”的方式举行暴动。计划武装暴动于8月13日首先夺取朔里区公所,然后再向其它各区发展。这次会议参加者有朱大同、冷启英、李繁洲、任予锡、冯家平、张兆坤等。

8月13日 张庄寨、洪河集暴动。8月12日夜,暴动队伍在王寨西朱庄集中,因途中遇雨,延误了时间,遂决定暴动在张庄寨、洪河集举行。13日上午,朱大同、冯家平带领人员伪装突袭张庄寨区公所,打死区队长刘须武,缴长、短枪30支,共产党员任贻任、王士杰、潘孝顺三人牺牲。洪河集方面,在王德山、祖玉敏带领下,接到张庄寨暴动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将地主段林清、孙翠斋绑押,缴枪6支。午后,洪河集被县警备队包围,暴动队伍坚持了一天一夜,遂向西突围。终因警惕性不高,我暴动人员被股匪裹挟到土匪老巢窑山集,一场胜利的暴动又失败了。

8月20日 李忠道(李砥平)、杜慰农被捕。洪河集

暴动之后,李忠道、杜慰农去朔里了解情况,准备再次组织暴动,返回时在萧城附近被捕。其他一些暴露身份的党团员被通缉而外出躲避,萧县革命转入低潮。

8月23日 共产党员唐继敏(戴楼人)、王洪彬(又名王梦涛,永堙人)被捕。二人同年被杀害于镇江。

秋 党、团县委改组。县委书记朱大同调往徐州特委工作,冷启英任萧县县委书记,团县委书记冯家平调团徐州特委工作,高硕仁任团县委书记。

10月 陈履真、万金培被捕。中共徐州特委书记万金培和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陈履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孙叔平接任特委书记。他即刻通知各县改变活动方式,严防叛徒和特务的破坏,使基层党的组织暂时避免了敌人的破坏。

1933年

春 县委书记冷启英调往中共徐州特委任秘书。

4月 国民党中统特务(CC)机关——徐海蚌特别行动区迁到徐州,派遣其组训股长周传家为萧县肃反专员,彭复中(彭瑞,叛变分子)为助理员,对萧县党团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破坏活动。

8月初 共青团徐州特委组织部长练育才(练登魁,永城人)被捕叛变。他假借特委书记名义召集会议,配合

行动区于徐州南天桥附近将特委委员及各县团委书记逮捕，使徐州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叛徒练育才、高硕仁（徐州人）、张桐（宿迁人）、窦远辉（萧县人）等自首后即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录用为行动人员。

8月30日 国民党徐海蚌特别行动区派张树培（叛徒）带领高硕仁来萧县，国民党县长王公珩派便衣协助，逮捕了公安局警士、萧县师范师生、帽山窝农民中的党团员数十人，由高硕仁亲自动员办理自首。

1934年

初 中共徐州特委巡视员朱大同在徐州叛变，并参加了特务组织。同时，在萧县被捕叛变的有张远怀、刘德茂等。朱大同叛变后，经过短期特务训练，于1935年1月担任国民党徐海特区特务专员。

4月 国民党萧县特务室（36号）成立，苏一山（睢宁人，叛徒）任主任，张桐（宿迁人，叛徒）任助理，强制办理中共党团员的自首和登记。至1936年底，萧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强制自首者达400余人。叛变后当特务者有张圣和、彭瑞、许文远、李祥昌、金庆凯（金漫生）、窦远辉、高硕仁、朱大同、张远怀、刘德茂等10余人。

秋 郭子化在枣庄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派张光中到铜山县赵台子（故黄河北）与路继先接上了关系，

先后恢复了杨庄支部(支书张广亮)、朱小楼子支部(支书朱玉珂)。他们坚持“以职业作掩护,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待机再起”的方针,隐蔽地发展党的组织。

1935年

年初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郭子化任书记。

夏秋 先后恢复了路套支部(支书路永铮)、铜山大杨庄支部(支书赵宜路),新建了铜山和尚庄支部(支书王清惠)。

9月 中共路套区委(萧铜边区委)成立,路继先(路少棠)任书记。隶属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所属沛县县委。

11月 郭子化通过宋绮云(中共党员、邳县人)、徐彬如(中共西北特支成员、萧县人),使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与中共西北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6年

年底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

经过一年多隐蔽发展,萧铜边区党员已发展到50多人,积蓄了革命力量。

1937年

3月 郭子化代表特委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中央批准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及其活动，并将其划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

7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由延安回到特委辖区,沿途部署抗日工作。在黄口找到丁毅忱、耿蕴斋,并恢复了耿蕴斋的党籍,安排他们在萧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把黄口地区作为丰县、沛县、萧县、砀山抗日工作的中心。

8月20日 国民党在南京释放政治犯,萧县共产党员李忠道(李砥平)出狱。

10月 中共路套区委改为中共萧铜工委,路继先任书记,委员有耿兴义、王清惠、路永铮、周峰。

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为委员,中共铜山县委书记郭影秋为组织部副部长。

11月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扩大会议在萧县黄口地区孙庙召开。出席会议的除特委委员外,还有丰、沛、萧、砀、铜等县党的负责人。会上,郭子化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他要求各县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待徐州沦陷后,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李忠道同志与行委接上组织关系,负责在萧县陇海路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派于化琪到黄口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在孟吴楼等村发展了孟振声、孟昭林、何光友等人入党。

12月19日 王雪琴任县长,彭笑千(彭其汶,字效騫)任县政府秘书。同时,成立萧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丁毅忱任主任,委员有纵翰民、张舒民、许西连、孙叔平、李忠道、冯家平、杜慰农、张兆坤等,实际工作由纵翰民主持。萧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萧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8年

1月 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曹鹏、李祥顺等20余人组成的民众动员工作团来萧县,在县动员委员会领导下参加民众动员工作。

2月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建立,李忠道同志任书记,陈继仁、李繁洲为委员,隶属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工委下辖李酒店、冯瓦房两个支部,有党员20多人。

2—3月 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先后在唐庙、瓦子口、袁圩、韦道口、路套、醴泉等地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7~15天,每班100~200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亲自来萧县讲民主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介绍老红军童陆生教游击战术,常流教抗日救亡歌曲。

3月中旬 路继先、路永锷、孙善佑、耿春涛等受特委派遣,去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村参加抗日游击训练班。中共萧铜工委书记由周峰同志接任。

4月 中共徐西北区委建立,王文彬任书记,委员有郝中士、陈筹等。萧铜工委、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属中共徐西北区委领导。

5月初 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王文彬在沛县三河涧召开丰、沛、萧、砀、铜五县联防会议,成立五县联防办事处。李忠道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建立抗日武装,加强各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月18日 萧城沦陷。日军第九师团一部自15日起进攻县城,萧城守军国民党军三十二军一三九师及县大队与日军激战两昼夜。18日拂晓,日军攻进县城。当日10时,师长李兆瑛下令突围,萧城失陷。萧县县长王雪琴、

大队长耿继贤和政治指导员王良守城殉职。日军盘踞萧城，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全县民众被杀害者数千人，以牛眠、房庄为甚。

5月下旬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建立。中共萧铜工委组织的陇海大队约200人枪，在周峰同志带领下活动在萧铜边境；孟振声（孟宪铮）、孙善佑同志组织的抗日游击队90多人，孟昭林为队长，活动在四区北部和五区南部；耿蕴斋在孙庙拉起抗日游击队100多人，何光友为队长，活动在五区西北部张大屯、曹瓦房一带。

5月底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在李酒店召开会议，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党团书记郭影秋来到萧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迅速建立党的骨干武装，同时决定派一些同志到孟昭林、何光友的队伍中去，帮助其进行部队的整顿工作。数日后，郭影秋等同志发现该部队成份复杂，纪律很差，乃向工委建议调往湖西整训。

6月9日 孙象涵、黄凤殿、胡方稳等在九区高庄打死赵楼汉奸赵宗禧，举起抗日锄奸的义旗。12日在铜山伊桥建立武装，活动在徐州以南津浦铁路两侧，称彭南抗日游击队。

6月中旬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在李酒店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陈继仁、陈学文、张兆坤等。决定：（一）到联庄会地区开展统战

工作,联合联庄会武装打击驻在县城的汉奸伪组织;(二)将原有武装带到湖西整训,抓紧动员人枪建立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三)动员原县政府秘书彭笑千出任萧县县长,酝酿建立抗日县政权。

7月初 李忠道、陈怀玉(张庆林)、许西连等联合一、六区联庄会及马井的武装,将城南豪绅刘云亭的维持会赶出了县城,并缴获五支步枪。后来又在城南穆楼、城东毛庄及城北营子多处追击、打垮了汉奸伪组织,迫使日军宣抚班头子金啸虎(朝鲜人)逃回徐州。

7月中旬 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萧县抗日游击队在六区张屯建立,李忠道任大队长,冯家平任指导员,共三个中队,六七十人枪。时,中共徐西北区委派尹夷僧、张如带丰、矜及萧县去湖西整训的武装来萧县,并传达了特委的决定:(一)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改为中共萧县工委;(二)将萧县抗日武装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五大队(何光友)、第十六大队(孟昭林)、第十七大队(李忠道),陇海路北萧铜工委组织的武装为独立大队(冯坤远)。两支部队于吴丛林会师后,旋即在全县开展武装宣传。

8月初 部队移驻永堙寨,经过党内外同志再次集议,公推彭笑千为县长,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8月中旬 武装宣传结束,除十七大队留下部分人员外,各部队再次去湖西整训。

8月23日 李忠道、许西连、陈怀玉等带领十七大队部分人员，化装奇袭黄庙敌据点。由王振全、沈凤鹤、袁金玲、张庆白四人组成的突击队以送礼为名，打死岗哨，进入据点，趁日军午睡，冲进去盒子枪一阵射击，由冯家平、陈学文、吴信容等人组成的预备队这时也冲进据点参加战斗。21名日军被击毙20名，逃跑1人，仅用10分钟就结束战斗。歼灭日军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1挺、三八式步枪18支、龟头盒子1把，我无一伤亡。黄庙战斗是萧县抗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它的胜利，鼓舞了抗日战士的斗志，消除了群众的“恐日病”，推动了萧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8月底 彭南抗日游击队在梅村与十七大队会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八大队，大队长孙象涵，指导员李祥云。

9月初 十八大队亢为德、薛玉标等10名战士乘官桥逢集之机潜入集内，打死三堡据点赶集的日军士兵4人，缴三八式步枪4支。

9月中旬 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十七、十八大队为骨干，联合王孝礼、孟昭勤、贾兴兰等游击武装，组织群众破击津浦铁路三堡——曹村段、陇海铁路郝寨——李庄段，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

9月20日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五区胡集召开

2000 多人的抗日联庄大会，揭露张大屯劣绅纵衍芬（纵馨亭，外号纵二别子）的汉奸罪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会后，县政府派纵翰民、孟振声前去警告，要求交出全部枪支并解散维持会，纵衍芬躲藏起来。

10 月中旬 我抗日游击队各大队参加讨王战斗（打丰县汉奸王献臣）返萧，在王寨再行整编。十五、十六大队并入十七大队，又由十七、十八大队编余人员组成十九大队。三个大队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孙象涵，教导员尹夷僧。各大队组织序列为：十七大队大队长王振全，指导员魏佑铸；十八大队大队长谢继恩，指导员李祥云；十九大队大队长许致远，指导员孟宪礼。后又建立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二十大队，大队长吴信容，指导员张登先。

10 月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亦称“中共萧宿永中心县委”）建立。戴蕴山任书记，委员有李忠道（组织部长）、孟宪章（宣传兼军事部长）、纵翰民（统战部长）。中共萧县中心县委辖萧县七个区委、永东支部（支书盛瑞堂）、宿县县委（书记李时庄）、砀南特支（翌年 5 月建立，书记杨元章）。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纸币——萧县地方流通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地方流通券除在县内流通外，周围各县及伪据点都能通用。地方流通券的发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对解决抗战经费的困难起了

重要作用。

10月下旬 十七、十八、二十大队于某日拂晓将张大屯包围，天明发起攻击。因墙高水深，久攻不下。午后得知黄口日军增援，各大队即先后撤出战斗。至翌年2月13日（旧历腊月二十五日），趁纵衍芬唱年戏之机，我二十大队张登先等17名战士潜入会场，当场将纵捉住，并夺取步枪6支，勒缴7支。次日，将纵衍芬处决于行军途中。

11月 在二区纵瓦房村纵翰民家召开萧县东部一、二区抗日群团组织发动工作会议，到会30多人，纵翰民、张舒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从此，开始组织区乡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救国团，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大演武召开首次县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区、乡各界代表40多人，正式选举彭笑千为县长。同时选举彭笑千、纵翰民、孙叔平、李忠道、许西连、张舒民、崔健吾、路涤生（路永铮）、纵止韩等13人组成县政委员会，彭笑千任主任。县政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关县内重大问题通过集体讨论决定。

12月 成立萧县人民救国会，纵翰民同志任主任，张舒民任副主任。在同民运科的配合下，救国会以宣传抗战，发动民众，筹建抗日群众团体，发展抗日武装为主要任务。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机关报——《实报》创刊。社长王继尧，编辑张笑仙（1939年夏任社长）。三日一期，每期发

行 200 多份,最多时达 3000 份,发行萧、宿、永、碭各县。1940 年 9 月转属中共陇海路南地委,社长由地委宣传部长张维诚兼任。1941 年 3 月停刊。

12 月 19 日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十七、十八、二十大队和贾兴兰游击队联合攻打九区伪据点——徐楼。十七大队埋伏在大小山口,阻击曹村、三堡方向的增援日军。午前,埋伏在大山口之一、三两个中队与曹村增援日军遭遇,经我奋力抗阻,打死打伤日军 10 多人。是役,我十七大队大队长王振全及以下干部战士沈凤鹤、胡道恂、孙乐祥、王绍兰、刘明金、李忠印等壮烈牺牲;政治指导员孟宪琛、大队副陈伯英、中队长孟昭林,战士曹林、李风兰、王帮云等光荣负伤。王振全同志牺牲后,张善祥接任十七大队大队长。

1939 年

1 月 1 日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陇海路南各大队奉命去湖西整编。十七大队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第二营,十九大队编入第三营。部队整编后,二总队转至陇海路南继续发展武装。这时,总队长耿蕴斋,政委张如(后为蓝廷辉),总队副孙象涵,政治处主任耿荆山,参谋长孙鹤一。

2 月初 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团来萧。在二总队武

装配合下，团长滕海清亲自率队于中旬再次攻打徐楼伪据点。由于敌人闭寨固守，我多次发起进攻皆未奏效。为避免伤害群众，遂决定撤出战斗。不几日，徐楼汉奸李忠镐乃携家逃往徐州，该据点遂被我九区区队拆除。

2月下旬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在六区阚楼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党员区长以及机关、部队、群团组织的党员干部40多人，戴蕴山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经过一周的学习、讨论，到会同志普遍掌握了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方针政策。

2月 县民运科在王寨、张寿楼、崔口、小阁子等地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50人左右，时间7~15天，至9月，共训练500多人。中心县委负责同志轮流到训练班讲课，并积极培养建党对象，发展党员。训练班结业后，学员分至各区、乡开展抗日活动。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三区王洼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发动各区办学。提出“以抗战教育协助抗日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使学生具有爱国热情、民族意识，从而培养抗战人才”的教育方针。同时成立教育救国会，组织力量编写小学1~6年级的教材。是年秋，县民主政府设立教育科，王继尧任科长。年底，全县办起高小十几所，初小60多所，在校学生达2.4万多人。

3月 县抗日民主政府组建萧县常备总队。县长彭

笑千任总队长，纵翰民任政治部主任，赵蓝修（赵永和）任参谋长（后任总队副，李耀任参谋长）。是年6月，发展到17个大队，8月整训，9月1日改为营连建制，组成6个营，计3000人枪。

3月15日 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初到萧宿边境，在没有全面了解情况之下，于萧县二区东任台子村借与宿县抗日游击总队五大队第二中队联欢之际，采取突然袭击，打死中队长张正福，并打死打伤其部下150余人，收缴张正福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支、驳壳枪50余支、迫击炮2门。这一事件不仅造成我地方抗日武装的重大损失，而且对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亦造成不良影响。1994年，此事经有关部门调查后澄清事实，并报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已对这一事件中错杀的人员给予平反昭雪，并作了妥善处理。

3月下旬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为发展武装，开辟新区，实行东西分进。大队长耿蕴斋率大队部及部分武装向萧县西部活动，大队副孙象涵率警卫连及第三营向津浦路东萧宿铜地区开展活动。月余，二总队武装发展至2000人。5月13日在梧桐整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至此，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历史全部结束。

4月初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各大队转移到陇海路南萧宿永地区活动，应萧十区群众请求，支队长彭明治在彭

笑千县长陪同下率队东进。途经铜七区杨庄时，瓦解周学堂、周学义股匪一部，缴枪 10 余支。中旬，支队抵达解集、贡山山区，在萧十区区队和六抗三支队赵汇川部的配合下，以突然动作攻克宿东重镇——时村，歼灭日军 80 余人，伪军 300 余人，活捉汉奸金耀三，给铜、灵之杂八队以极大威胁。一时，八路军声威大振，我萧十区抗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4 月 日军在二区王台子和三区后洼安设据点，在送给养的路上到处遭我游击队的截击，据点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两三个月后，日军不得不动撤离。

5 月 14 日 中共苏鲁豫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陇海路北萧铜区委改为中共萧铜县委，路继先为书记，委员有朱玉珂、李华农、朱传真、徐传祥。

5 月 21 日 苏鲁豫支队各大队越津浦路东进，活动于萧、宿、灵边解集、张山、贡山，栏杆一带。31 日，敌 7000 余人，加上汽车 50 辆、炮 20 门、坦克 4 辆、骑兵 100 余人，由徐州、宿县、睢宁、灵璧等地分七路向我“扫荡”。6 月 1 日，苏支各大队在张山、贡山、温山、前杨庄等地与敌激战，毙敌 300 余，当夜转移到津浦路西休整。6 月 4 日，向我追击之敌 2000 余，加上汽车 15 辆、炮 5 门、坦克 2 辆，于渺沟、前白庄等地遭我伏击，敌伤亡 300 余而退。6 月 5 日，苏支各部移至萧县二区。朔里出扰之敌 200 余，

行至时村以西,被我苏支三大队杀伤 100 余人。当晚,苏支各部即脱离敌人向永、砀边境转移。

5 月下旬 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移驻土型。拂晓前,濉溪日伪军 300 余人向我三营驻地进攻。三营迅速撤至庄外,占领闸河,大队警卫连亦展开占领阵地,双方展开猛烈射击。中午,敌见势不利,乃向东南方向撤离。是役,我副连长胡方稳牺牲,连长蒋相训、排长张学智等数人负伤。

5 月 26 日(旧历四月初八) 日军 200 多人,伪军 1000 余人,加上汽车 30 余辆,由徐州、萧城经瓦子口向西行进。萧县常备队获得情报后,在上杜集至孟庄寨地区伏击。上午 8 时与敌人接触,我向敌反复射击,使敌不能前进一步。上午 11 时,我即迅速转移阵地。是役,日伪军伤亡数百人,我无大的伤亡。午后,日军对我进行报复,杀害上杜集群众百余人。

6 月中旬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在四区崔口举办党员训练班。时间一个月零四天。参加学习的有支部书记,区、乡党员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 120 人。主要学习党章、党史、群众工作及党的建设。杨兴瑞担任训练班班主任,县委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这期训练班的学习,为区、乡党的组织培训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6 月 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来苏鲁豫支队视察工作。决定分兵进击,开辟抗日根据地:一、苏支四大队

(大队长梁兴初,政委王鸿鸣)返回陇海路北,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以保持华北、山东八路军的联系;二、苏支三大队、七大队(含一、二营)、独立大队合编为苏支第七大队(大队长耿蕴斋、政委郭影秋、参谋长田文扬、主任邱子明),随支队部活动于萧、宿、永、夏、砀等县,与新四军游击支队相配合,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三、苏支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游击七大队之三营(由大队副孙象涵带领),随代政委吴法宪东进,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经十几天急行军,跨越津浦铁路,于7月中旬到达宿东。

6月底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书记戴蕴山调鲁西南地委工作,李忠道同志继任中心县委书记,陈继仁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夏 萧县青年救国团(后改为青年救国会)成立。主任吴忠培、组织部长王彦(王尚三)、宣传部长欧阳如文。(青救会主任在吴忠培之后,有杨兴瑞、姜克、王彦先后接任)。

7月 县委根据湖西区党委指示,研究成立萧县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委员会,彭笑千任主任委员,戴晓东、纵翰民、李忠道、孙叔平、王子石、马济民、李厚庵任委员,并派纵翰民去湖西区党委报告。区党委发给贺信,作为统一战线组织。

7月7日 萧县军民近万人在张新集召开抗战两周

周年纪念大会。我党、政、军负责人在大会上发言，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阐明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7月29日 宿县、永城、萧城、黄口之敌步骑500余，向我芒砀山苏鲁豫支队驻地分进合击。其南路经大茴村、李石林抵达王白楼子宿营，北路进抵西镇店。支队部发现敌情后，营长周长胜率三连至南路敌后尾追。30日拂晓，南路之敌步骑各百人进至朱大厂、小刘庄一线，向我僖山阵地开炮；北路之敌步骑300余经鱼山进至刘厂、小马沟一带，对我驻僖山教导大队形成包围。上午11时许，教导大队沉着应战，待敌迫近时发起射击。三连于敌后开展麻雀战，对敌造成威胁。下午四时，营长周长胜带三连摧毁朱大厂敌炮兵阵地，迫敌仓惶后撤，我教导大队遂发起追击。是役，共毙伤敌300余，打死战马数十匹，取得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

8月 萧县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在四区梅庄成立。县委妇委书记张明任妇救会主任，陈一民、单继英任副主任，委员有刘天钧、韩志清等。

8月下旬 萧县抗日游击支队（简称萧支）在蒋新楼建立。支队长吴信容、政委孟宪章、政治处主任崔文彬，共三个营（相山大队年底编为第三营），1500人枪。

秋 萧县农民救国会（简称农救会）在四区张寿楼召开成立大会。会议讨论了“农民救国会”的宗旨、组织原

则,规定不分阶级、阶层,凡愿意抗战救国之农民,均可吸收为会员。农民救国会分县、区、乡三级。通过选举,张舒民为县农民救国会主任,孙清淮、沈修德为总干事,杨兴瑞、张祚兴、张长文、孟晴辉、祁世华为委员。秋后,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普遍建立。至年底,全县农民救国会会员达12万人,青年救国会会员10万人,妇女救国会会员3万多人。各区分别建立了党的区委和支部,中共党员发展至2000人。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一年,坚持领导萧县人民抗战,获得上级表扬。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来到萧县视察工作时,称赞萧县为“抗日模范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来萧视察后著文有如下记述:萧县是江苏一个边沿县,该县在彭县长领导下,抗战情绪高,群众组织的好,减轻农民的负担,一入萧境,便表现一种新的景象。如果你没有证明文件,远方来人是行不通的,必须把你送到联保处对你进行盘查。六、七岁的儿童,口中都会唱救亡歌曲,不论在乡村或田野中,远远就会有歌声传来。虽然临近徐州,但仇货是绝对看不到的,资敌物资也没有出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该县公民实行抗战总动员令,坚持执行中央各项法令。

9月10日 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致电彭明治、吴法宪,传达中央指示:陇海路南之皖北、苏北地区划归中原局领导。路南之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调往陇海路北。同时,

中共豫皖苏区党委派刘作孚持电报前来萧县传达中央决定，萧县党的关系即从此由中共苏鲁豫区党委转属中共豫皖苏区党委。

9月 县长彭笑千率警卫连去萧十区开展工作，途经白土镇，得悉日军50余乘军车三辆于次日上午由徐州去孤山敌据点。特务连、“萧常”五营和陈文海游击小组相配合，埋伏在张山口萧桃公路两侧，并设置路障。中午，敌军车驶入我伏击圈，遭我突然袭击。敌弃车而逃，我获得大批军用物资，三辆汽车遂被我烧毁。

9月底 由王寨出扰之敌百余人，携小炮数门，在神树与我萧常一营一连遭遇，一连后撤。上午八时，敌追至郭楼与我一营三连接触。三连占据有利地形向敌射击，敌多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战斗中，我三连二排排长孙启厚见敌溃败，跃出工事向敌夺枪，不幸中弹牺牲。下午四时，接营部通知，三连即撤出战斗。是役，毙敌数十名。

10月14日 驻濉溪日伪军步骑百余人，沿滂汪山东侧向北“扫荡”。待敌进至刘窑、罗里村我“萧常”三营二、三连伏击圈时，被我三面包围，敌乃仓惶南逃。是役，我毙伤日军大尉松井谷治以下十多人，缴战马一匹，皮带、望远镜等战利品。

11月7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新四军六支队驻地——涡北新兴集。他指出：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

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和改造政权。将永城、夏邑、萧县、宿县联成一片，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刘少奇走后，刘瑞龙留下参加区党委的工作。

11月21日夜 铜山县国民党顽固派耿继勋集中五六百人之兵力包围了八路军铜北办事处——千里井，打死我干部战士20余人，俘我办事处副主任阎树堂以下百余人。后又枪杀、活埋办事处干部阎树堂、路继光、贾挺模及其家属、革命群众数百人。这一反共事件对萧县抗战形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共陇海路北萧铜县委及其武装遂转至陇海路南活动。

11月下旬 县长彭笑千带萧县常备队一营、特务营一个连及总队剧团去陇海路北宣传抗战，孤立、打击顽固派，影响四区刘瑞岐。当部队驻扎在三座楼、纵老楼、梁老楼等村时，萧城、郝寨、曲里铺之敌400余人分三路向我进攻，萧县常备队一营坚决予以还击。当晚撤出战斗，彭去陇海路北活动计划未成。

12月5日 驻徐日军步兵500余人，骑兵数十人，附汽车三辆、大炮两门、小炮数门、轻重机枪数十挺，经陶楼、曲里铺等地，企图占我大吴集为据点。7日，萧县常备队一、二营和萧支二营在阚楼、吴蒋庄、大吴集与日军激战，击毙敌70余人，我军伤亡8人。

12月中旬 萧常副参谋长种继臣去十区接任五营营长，途经夹沟东北杨柳堤村时，被顽固派张立钧部捉去

活埋。

12月17日 民运科长孙叔平著《抗日农民运动讲话》，印成32开石印本在广大干部中散发。这篇讲话对农村中的各阶级、农村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农民运动者的任务、领导农民的艺术等方面作了精辟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抗日救国实际结合起来，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对广大抗日干部战士、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教育，深入人心，使抗日群众组织很快发展到铁路沿线、县城周围和徐州附近，推动了萧县抗日农民运动深入发展。

12月 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成立。耿蕴斋任总队长，谭友林任政委，辖萧县抗日游击队（即第七团）和宿西独立团（即八团）。

12月21日 萧、宿、永、碭及陇海路之敌对我萧宿永地区进行“扫荡”。我萧县之抗日部队分别置于机动位置，配合一、三总队与敌周旋。23日，敌由萧城分三路向西进犯。24日，各路“扫荡”之敌会合于永城东北之刘河。六支队主力一个营深入敌后游击。25日晨，我一总队各部埋伏于李石林西之枣园，截击由刘河东进之敌步骑炮联合兵种千余人，汽车12辆。我以机枪齐集射击，激战5小时，敌因道路破坏，不便行动，复遭我前后夹击，乃分数路向濉溪、瓦子口方向逃窜。该敌在溃散途中，于李石林焚尸16具，祖老楼焚尸41具。是役，我伤亡47人。28日，各路“扫荡”之敌撤回原地，我获得冬季反“扫荡”之重大

胜利。

1939 年底 县委社会部调查情况不细，被日伪特工欺骗，误派吴孝香等五人两次进入徐州日伪机关，致使吴孝香被诱捕干伪，张祚胜牺牲，这是县敌工工作的一大教训。

12 月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继仁调任宿西县委书记，辛程同志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0 年

1 月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宣传兼军事部长孟宪章调往皖东北工作，夏峰继任宣传部长，姚运良任萧县抗日游击支队政委。

新四军六支队派李耀任萧县常备总队参谋长，褚精益任政治部副主任，沙枫任萧常五营教导员。

1 月中旬 驻孟庄寨伪军 200 余人向上杜集进犯，萧常一营置一、二连于赵庄、彭瓦房，三连置上杜集村东抗日沟内。待敌距我不到百米时，三连首先开火，一、二连在侧翼猛烈射击。敌见遭我伏击，大部分都滚到抗日沟内。我完成阻击任务后立即向他处转移。是役，毙敌十多人，获战马一匹。

2 月初 豫皖苏区党委派组织部长周季方来萧县传达形势，提出改造政权。强令县委于三日内接管县政府的

大印,换成共产党员当县长。在区党委的压力之下,萧县县政委员会在王白楼子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张舒民、许西连、崔健吾、王子石、马济民、纵止韩等。会议是利用分别交换意见的形式进行的。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的形势,讨论了萧县的政权改造。会上,彭笑千提出辞职,并建议县长职务由民政科长许西连代理。

2月27日 彭笑千等到达涡北新兴集,新四军六支队政治部在精忠堂举行欢迎大会。会上,彭笑千详细介绍了萧县抗战工作的基本经验:第一,统一战线比较巩固,国共两党能够团结,共同协商,共同领导,共同工作。第二,各种工作能够把握时机,随各种环境的发展而变化。第三,得到新四军、八路军的帮助和影响,使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第四,有坚决抗战、不畏难不怕苦、积极工作的干部,这是工作开展的中心动力。

3月初 抗日民主政权县参议会成立。张静波任参议长,孟晴辉、路继先任副参议长,张舒民、胡海平任秘书。

3月8日 萧县妇女救国会代表大会在王柳园召开。到会代表300多人,会期5天。会议制定了萧县妇女救国会章程和工作纲要,选举陈一民为妇女救国会主任。同时,大会还编写了《萧县妇女救国会组织概况》,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致敬电。会议期间,张明调出,都志(李伯

仲)任县委妇委书记。

3月上旬 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一团(孙象涵部)一、九连在萧十区活动,与萧常五营相配合,在时窑伏击云台出来抢粮之日军。九连埋伏于时窑,二连占领后山,萧常五营在青冢湖、张山等处保障侧翼。上午九时许,敌进入我伏击圈。我机、步枪同时射击,给敌以大量杀伤。黄昏时,时村日军派汽车增援,我遂撤出战斗。是役,毙伤敌近百人,我伤亡20余人。

3月16日 日伪军步骑炮联合兵种2000余人,汽车百余辆,从萧城分五路向萧永边境大规模“扫荡”。18日占据瓦子口、祖老楼、高窑、李石林、王白楼子、张大屯、大吴集等地,构筑工事,四处烧杀淫掠。我一、三总队及地方武装以内线坚持,主力转至外线与敌周旋。24日,我主力部队开始总攻,先后打击了李石林、王白楼子、张大屯、青龙集、程蒋山出扰之敌,并袭击了黄口之敌。

3月18日 第一次参议会在王柳园召开,选举纵翰民为县长,冯蕴言为县政府秘书。同时决定于4月1日县长宣誓就职。

3月 孙大兴(孙明远)任县农民救国会主任。以后,农救会主任依次是:颀孙敬祖、戴世雅、朱庄俊(朱渭川)。

萧县常备总队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萧县抗敌总队(简称萧总)。耿蕴斋任总队长,李耀任政委,参谋长陈景龙,政治处主任褚精益(后宋治民)。萧常改编后,特务营

留下不到两个连，营长孟振声，教导员周武烈。后特务营编走，只留下两个排。

4月1日晨 我一、三总队及萧总各一部与砀山、永城、王白楼子、黄口、张大屯各路围攻之敌千余人激战于磨山、禧山、陶山、柿园、李黑楼一带。突围战斗自晨至晚，我反复冲杀，战况十分激烈。先后毙敌300余人，敌终被击退。是役，我伤亡200余人。一总队队长鲁雨亭壮烈殉国，萧县县直干部张雪亭、卓汉章及洪河大队教导员张祚瑞、中队长杨振瀛等英勇牺牲，县长纵翰民负伤。

4月上旬 萧铜办事处（一区东北部）主任孙亦庄（孙朝州）、中共一区区委书记兼农民救国会主任李继昌在郝寨被敌捕去，解送县城，月余被杀害。

4月 萧县伪政权建立，邵世恩为县知事。

由于敌人“扫荡”，萧常五营400余人在沙枫带领下跳出包围圈，转移皖东北，编入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一团。

5月 萧县独立团建立。团长赵海丰，政委李忠道，参谋长康平，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共六个营（含中共陇海路北萧铜县委一个营），1700余人。

苏皖纵队陇海支队第一团（孙象涵部）派二营营长亢为德率六连返回萧铜地区。不久，部队发展到两个连，形成了营的建制。亢为德为营长，朱德群为教导员，吴端胜为副营长，群众称之为“亢营”。“亢营”在萧铜地区津浦路

两侧坚持游击战，对打击敌伪，保护抗日战士家属，巩固我抗日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5月14日 萧县国民党县长朱大同在陇海路北管粥集宣布就职，并组织县政府，成立常备团与我抗日民主政府相对峙。从而使萧县形成了顽、伪、我三方面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

6月初 我六区区队蒋正红率一个班到古城乡保卫麦收，同时动员新兵入伍，遭到国民党刘瑞岐部队的突然袭击，俘去全班战士，排长蒋正红被杀害。

6月中旬 萧支支队长吴信容率九连奔袭刘瑞岐，至萧张公路北黑柳树，刘顽北逃，九连返回郝新庄宿营。次日晨，伪军20多人押送十辆大车沿萧张公路东来，九连赶至公路截击。当一排登上公路拦车时，百多名日军从对面路沟中钻出，双方战斗胶着。下午，支队部派二营支援，九连方得以撤出战斗。是役，我伤10余人。

6月中旬 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其第一梯队（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六八九团及新二旅之六团）进入萧境后留下六八七团活动数日，与永城东来之敌400余人（附汽车18辆）在瓦子口激战一个下午，毙伤敌百余人。敌溃。

6月24日 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为支援新四军途经萧境，于下杜集附近二鬼台与蔡里、烈山、濉溪口、永堙、瓦子口之敌激战竟日，毙伤敌百余人。敌退。

7月 八路军三四四旅和新二旅与新四军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下旬，黄克诚率三个团东进，四纵队重新整编为四、五、六三个旅，原活动在萧宿永之一、三总队编入主力部队。一总队改编为六旅十七团（团长刘子仁），三总队七团编为六旅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八团（宿西独立团）编入四纵队特务团。

县独立团六营在杨洼村伏击由黄口据点出扰的日伪军。因侦察敌情不准确，战斗打响后发现日军竟有50多人，还配有钢炮、机枪。此战我伤亡十余人，牺牲排长一人。不久，营长李祥龄被解职后调任区长。

7月10日 萧总二营、萧县独立团五营分别驻在吴老家、吴酒店牵制敌人，确保我主力部队作战计划的实施。次日晨，突然遭到黄口、曲里铺、东镇店之敌包围，奋战四小时，我借青纱帐安全突围。是役，萧总二营营长陈芳明负伤。

7月至秋收前 县委在张庄寨至袁圩一带活动，曾组织农、青、妇群团接连办了几期训练班，每期50~60人。针对反顽斗争形势进行深入教育，提高了区乡干部的思想认识，更加坚定了反顽斗志。

8月 豫皖苏区党委派萧望东、向明等来萧县，在张庄寨组织萧、宿、永、夏、砀反顽指挥部。并在锦桥村召开萧县党、政、军数百人大会，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与国民党

顽固派作坚决斗争。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陇海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组织部长何启光，宣传部长张维诚。路南地委辖萧、宿西、夏永碭三个县委。萧县县委由辛程任书记，委员有戴世雅、夏峰、纵翰民、赵海丰、张元卿、孙清淮。

8月21日晨，敌从马阁进占孙庄，萧总一部进至杜马庄与敌接火。经过猛烈射击，杀伤大量敌人。敌复以炮火还击，萧总因五名干部负伤而撤出战斗。敌追至戴柿园，遭一连伏击，死伤十多人，恼羞成怒，竟放火烧群众房屋。

9月1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 萧县独立团二营驻陶墟。庄里据点日伪军21人，携大车10多辆到田窝抢粮。参谋长康平当即指挥二营阻击。因敌据石塘窝顽抗，二营请“亢营”三排增援，激战一日，将敌全部歼灭。是役，计毙敌16名(日军9人，伪军7人)，俘伪军5人；缴获掷弹筒1具，机枪1挺，步枪16支，手枪1支，指挥刀1把。“亢营”三排长孙修义英勇牺牲。

秋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减租减息章程，并先后在李石林、三河、红亭、宁园、葛张庄等处开展试点。

10月 萧总二营在永城县大苗村附近对日作战。撤退时，因交通沟中断，我牺牲副指导员刘仁芝以下30多人。

10月19日 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豫皖苏边区首当其冲。

11月初 萧县抗敌总队奉命调往淮上，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特务团。总队长耿蕴斋调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

11月7日 驻瓦子口之敌出来“扫荡”，十八团政委方中铎率队与敌周旋。政治处主任喻新华带领团直机关人员向山城集方向转移，行到张大屯西南傅庄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机关人员被冲散，宣传队多人被俘。

12月12日 耿吴刘叛变。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彭雪枫进军淮上，豫皖苏根据地中心区兵力较少时，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耿蕴斋、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团长吴信容，在第六旅十七团团团长刘子仁的阴谋策划下，于12月12日在萧永边境叛变，扣押我党政军干部八九十人，造成流血事件。随后，耿吴刘挟持其所属部队近2000人投降汤恩伯，使萧县、砀山、永城北等地为其控制，豫皖苏边根据地受到重大损失。

12月 镇头寺突围。亢为德营和两个区队驻镇头寺，遭到徐州、曹村、夹沟等处数百敌人的包围，亢营借助浓雾突围脱险。

12月底 八路军第四纵队及豫皖苏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动员，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撤销了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整顿各县地方武装，并为四纵所属各旅划定活

动区。区党委在涡北召开干部会议，吴芝圃作了《关于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耿吴刘事件经过的报告。

1941年

1月1日 吴信容亲自率队冲进五区区队住地董屯，缴去长短枪数十支，捕去干部及区队人员。同日，又收缴四区区队一个排的武装，四、五区抗日政权遭到破坏。

1月 孙大兴任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派遣陈品诗、张祚升等打入祖老楼日伪据点，为我收集日伪情报，并掩护我抗日军政人员。

1月27日 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主力旅。同时成立萧县独立旅，纵翰民任旅长，李忠道任政委，康平任参谋长，陈其五任政治部主任。独立旅下属两个团：一团团长赵海丰，政委辛程；二团团长孟振声，政委王静敏，副团长周纯麟。

3月20日 萧县独立旅一部在永城南消灭汝中区顽区署，缴获步枪17支，俘虏47人，我无伤亡。

3月31日 土顽刘瑞岐乘刘、耿、吴叛变之机，明目张胆地大举向我进攻。我独立旅部署在萧县四区朱楼、何桥、夏寨一线准备迎敌。下午三时，我主力向崔口刘瑞岐主力驻地出击，计划先消灭刘瑞岐，然后再向西扩大战

果。不料，敌情突然变化，刘先向罗河（又称“王引河”）方向我独立旅二团三营防地进攻，使我主力扑空。三营与四区区队在罗河与敌激战三个小时，因敌兵力增多，遂沿河向东南方向撤退。是役，我三营损失近百人，副营长萧新庭被俘。四区区队损失惨重，区长张长文牺牲。

4月1日晨 萧城、朔里、祖楼、瓦子口、濉溪等处日伪军数百人，从东、西、南三面向我县政府驻地——徐暨分进合击。事先未获情报，战斗全面展开后，我了解到敌人意图，遂决定突围跳出外线作战。三营一部抢先占领制高点，运用地形牵制敌人；另一部分与八区区队配合向西冲杀，突出重围；县政府部分人员随“亢营”沿山沟向东突围。经过反复冲杀，敌人被我击退。下午五时，小雨沥沥，各路枪声稀疏，我县政府和作战部队安全转移。是役，我伤亡20多人。三营三连指导员吕渭滨和八区区长李祥林壮烈牺牲，孙启诗右肩中弹不下火线，某15岁小战士以小马枪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其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4月4日 “亢营”移驻龙泉寺。夜间，副营长吴端胜将六连战士骗至梁庄，欲投顽县长朱大同。次日晨，亢为德营长得知后，即派连长蔡书仙前去劝阻。许西连也前去做争取工作。数日后，吴承认了错误，又将部队带回了营部。

4月初 萧县独立旅警卫营在宿西与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因荣易治带宿西大队叛变投顽，营长王长信（王保

哲)被捕。

4月12日 新四军四师反顽战斗失利,萧县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奉命赴涡北集中。县政府许西连、冯蕴言及张立轩、王可风(王继尧)等七八位同志提出并经县长纵翰民同意,留在萧县坚持斗争。他们于24日转移到皇藏山区,在“亢营”及九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活动。

4月 萧县独立旅在参加涡北反顽战斗时部队减员,后编入新四军四师十二旅三十四团。团长张永远,政委李忠道,参谋长孟振声。

5月3日 萧县独立旅二团一营营长周武烈(时为抗大四分校学员),在濉溪南苗庄与国民党骑八师作战中牺牲。

5月4日 新四军四师转移至皖东北地区,萧县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亦随军转移。县直机关干部编为干部大队二中队,纵翰民任中队长。各区武装编为萧县大队,大队长孙清淮,政委辛程。下属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周××;二中队队长葛玉环;三中队队长孙明远。东撤之后,区党委派何启光在宿西召开会议,安排地下工作,指定戴世雅、张祚兴、王纪珍三同志组成萧县地下县委,戴世雅任书记。他们分别隐蔽在濉溪城郊,联络没有撤退的党员,开展秘密工作。陇海路北萧铜县委干部跟随东撤,萧铜县委结束。

5月初 萧东办事处成立。许西连任主任,冯蕴言任

秘书，吴端胜为办事处副主任。同时，成立九区区公所，徐明轩任区长，以皇藏、官桥、桃山三个乡为依托，公开坚持抗日活动。当时，国民党顽县长朱大同乘我立足未稳，亲率两个营（400多人）的武装向萧东进攻。我事先得到情报，分两路设下埋伏：一路由许西连、许致远、蔡书仙带“亢营”两个排埋伏在汪庄北头沟里，一路由朱德群带“亢营”一个排和九区区队埋伏在皇藏峪南山。这天夜间九时许，土顽进入我汪庄伏击圈。我先发制人，以机、步枪猛烈射击，顽军大乱，四处溃逃，我获全胜。此役，打击了朱大同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萧东军民的斗志，“亢营”两个连失散人员尽快归队，恢复了原来的阵容，为坚持萧东抗战奠定了基础。

5月上旬 许西连、朱德群、许致远三同志去宿东，见到淮上行署主任雷明，汇报了萧东的情况，并请他转告区党委。雷明同志对坚持萧东抗战非常支持，临行时给活动经费500元（边币）。

5月下旬 中共豫皖苏区党委派遣随军东撤的朱玉林（朱玉珂）、路少棠（路继先）、王尚三（王彦）、徐林生（徐学龙）、朱若平（朱延贞）、朱振东、朱传真、谢继恩、冯家香、毛廷秀等返回萧东，与许西连等配合，领导萧东斗争。

6月 中共萧东临时县委建立，朱玉林为书记，路少棠、王尚三、朱德群为委员，隶属宿东地委。

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民政处长彭笑千没有随军东

撤而返回萧县，与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秘书张舒民等人一起做吴信容部的争取工作，要求其“坚持抗战，反对磨擦”。

6月下旬 国民党县政府驻七区刘庄，夜间遭黄口伪军包围。书记员苗光远被打死，县长朱大同及其政府人员被俘，仅县政府秘书赵闾仙只身逃脱。

7月 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去宿东，向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吴芝圃同志汇报工作。吴芝圃指示：(1)当前我们在萧东只是有个立足点，力量很弱，尽量隐蔽，不能树敌太多，应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如争取谁、打击谁、缓和谁；(2)应采取灰色面目出现，要求两党停止磨擦，共同抗战，以利发展自己的武装；(3)把彭笑千、张舒民留在萧西，做吴信容支队的争取工作。萧东临时县委、萧东办事处根据吴芝圃的指示，遂确定了“争取吴信容，缓和刘瑞岐，打击朱大同”的斗争策略。并派谢继恩去萧西，与彭笑千、张舒民交换意见，他们亦同意这个策略。

7月下旬 在彭笑千的活动下，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到六区郝庄寨，与刘瑞岐的代表郝晴瞻就双方划分地区、停止磨擦、联合抗日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 “亢营”深入萧县二区活动，乘机打垮了国民党二区区队（区长窦远辉，系朱大同的嫡系，国民党特务）。

刘瑞岐方面以潘静庵、赵闾仙等为代表，萧东办事处

以民政科长张立轩为代表,于九区卯山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萧东办事处及“亢营”以九、十区为活动范围,刘瑞岐则活动于二区以西,停止磨擦,联合抗日。

仁和集会议后,纵翰民请示区党委同意,来萧东向许西连、冯蕴言等党外同志检讨县委在东撤前所犯的错误,并取得了党外同志的谅解,加强了党与他们的联系。

10月 亢为德为办“良民证”去南京看病,在宿东时村镇照相时被叛徒发现而被敌人捕去。

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带部队驻二区庙山坳,刘瑞岐派政治部主任潘静庵前来慰问,企图改编萧东武装。许西连严词拒绝了刘瑞岐的要求。

11月 新四军四师将“亢营”改编为九旅二十五团独立营(亦称萧铜独立营),派二十五团政治处主任顾寒星(梁鸿志)为营长。“亢营”经过整顿后,很快发展到四个连。一、二连由副教导员范文典带领活动于津浦路西;五、六连由营长顾寒星和教导员王亦平带领,随县委活动于津浦路东。

1942年

2月 吴信容支队地下党支部建立,朱达川为书记,时有党员10余人。

津浦路西国民党地方武装王传绶部分三路向我活动

中心白场、沈峪进犯，我萧铜独立营一、二连予以痛击，歼敌一个排，俘虏 20 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 20 余支。接着，五、六连在津浦路东又打退了刘子正（驻股北区顽军）、张立钧（铜山顽伪）的进攻。通过两次战斗，控制了皇藏山区，建立了路东区 and 路西区，成立了区队和乡武工队。

3 月 3 日（旧历正月十七） 萧铜独立营配合九旅进攻灵北张小圩子，全歼土顽赵觉民、徐志远部千余人。接着，乘胜回师，拔掉赵庄伪据点，迫使杨楼敌据点撤离，建立了萧十区，使萧铜地区联成一片。

3 月上旬 彭笑千被国民党押去临泉，被汤恩伯部软禁起来，我萧西统战工作受挫。

3 月 24 日（旧历二月初八） 吴信容暴病而死，其弟吴信元接任支队长。

3 月 中共萧东临时县委改为“中共萧铜县委”，增补孙明远为副书记，顾寒星为委员。同时，萧东办事处亦改为“萧铜办事处”，许西连任主任。

王子石任国民党萧县县长，三个月后，由刘瑞岐接任。

春 由于环境恶化，隐蔽在濉溪镇近郊的萧县地下县委负责人戴世雅、王纪珍去宿东，张祚兴去萧铜。萧西地下工作即由萧铜县委负责。

我九区区委书记毛庭霄在白庄活动时，遭曹村日军

的突袭而牺牲。

8月 中共萧铜县委书记朱玉林被伪军张立钧部捕去，曹介任县委书记，委员增补朱冬岩、沙效葛。

9月 萧铜独立营整编为萧铜总队。编制三个营，1500人，总队长许西连，政委寿松涛，副总队长顾寒星，政治处主任孙朝旭，参谋长吴端胜。

萧铜办事处由王可风、刘永之等在津浦路东郑楼创办萧宿铜中学。根据服务于抗战的教学目的，开设政治课、文化课，采取短期培训的办法，每期50~60人，至1946年停办。

刘瑞岐以两个支队约3000人的兵力于某日拂晓向萧铜抗日根据地沈峪、白场一带实行包围。萧铜总队一营隐蔽在小山口、泉口附近，以小股部队与敌作麻雀战。黄昏后，乘敌撤退之机，于张山口、孟村一带进行伏击战，给敌重创。

10月 彭雪枫师长在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表扬萧铜边区抗日游击战时说：“九旅独立营（萧铜独立营）在许西连、顾寒星等同志领导下，夹着津浦路，时而路东，时而路西，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

刘瑞岐对萧铜总队一营进行搜索，追至铜山县蛤针窝。一营留小部在山上垒石作工事，佯装阻击，暗中将主力转至铁路附近。当晚，一营沿津浦铁路夜行60里至曹

村南旺庄宿营。九区区队到铁路附近隐蔽。

11月 刘瑞岐亲率王传绶、赵永和两个支队向我皇藏峪大举进犯。他们驻土盆、纵窝、陈林、五眼泉一带，连营六七里，企图一举将我吃掉。我部在路西分散隐蔽，使顽军扑空。庄里、曹村两据点之日军闻讯出动，分东、西两路包围皇藏峪，顽军仓惶而逃。待通过龙岗山口时，朱若平同志率九区区队给以猛烈射击，毙伤顽 20 余人，粉碎了刘瑞岐的大规模进攻。

冬 我一营驻张山口东孟村，铜山土顽耿继勋（耿聋子）一部在郭公礼带领下对我夜袭，被我一营发现后奋起阻击，在杨堡将其击溃，郭公礼被我击伤。

1943 年

1月13日（旧历腊月初七） 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挺进第一纵队马海川支队投敌，编入伪军郝鹏举部。此时，日伪以大吴集、黄口、朔里、曹村等为中心，在全县设立了 24 个据点。

2月6日（旧历正月初二） 刘瑞岐在萧西实行恐怖政策，张舒民、冯家平被迫转移到萧铜地区。

3月 萧铜地区成立党政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寿松涛，副主任许西连，委员有曹介、孙明远、顾寒星、冯蕴言、张舒民。

3月11日 国民党第2路挺进军总司令王仲廉率55军李守正部三个团及江苏保安第三、第八两个团东进，配合八十九军韩德勤部向新四军四师及淮北根据地进攻。萧铜总队奉命在津浦铁路三堡至夹沟段负责阻击。我一方面将部队部署在铁路两侧阻击，一方面大造“欢迎国军反攻徐州”的强大舆论。同时，破坏铁路、袭扰敌人，造成日军对铁路加强控制，日夜巡逻，使王顽被迫于21日绕道宿南任桥过路。待王顽越过铁路时，韩德勤部已被四师主力歼灭。28日，王仲廉又匆忙率部向津浦路西撤退，行至三堡附近，复遭我路西区队袭击。王顽不敢恋战，在仓惶西逃之际，丢弃许多枪支、弹药和马匹，均为我区、乡队所获。

4月3日 中共萧铜县委书记曹介同志在闵贤集葛王村召开会议时被夹沟日伪军包围，区长赵成智当场牺牲，曹介同志被捕，后被日军杀害于宿城。曹介同志被捕后，姚克(王学文)接任萧铜县委书记。

4月4日 我九旅二十七团与萧铜总队二营袭击奎河岸老庄之顽二挺七纵朱大同部500余人，毙敌43人，伤20余人，俘官兵24人；缴获步马枪24支，子弹520发。我伤亡20人。

4月17日 伪苏淮特区淮北剿匪司令胡泽普，派出步兵2个中队，骑兵60余，并强拉民夫，妄图在萧铜云台修据点。当日晚，我萧铜总队向该敌强袭，约两小时，敌伪

逃窜。我获步枪 9 支，驳壳枪 1 支，手榴弹 8 枚，子弹 273 发，俘伪分队长以下 10 余人，将所修工事全部拆除。

4 月 30 日 顽第七纵队朱大同部袭击我驻新庄子之三分区独立营及股北大队，当即发生战斗。是役，我缴获步马枪 2 支，俘敌 1 人，毙敌 20 余人。我消耗子弹 500 余发，伤战士 7 人。

5 月初 张震同志来萧铜，研究扩大武装，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之事。决定将宿县股北区、灵北尤集区划归萧铜地区领导，萧铜办事处改为萧宿铜灵办事处。将股北大队编为萧铜总队第三营，营长张怀禄，教导员冉宪义。

5 月 26 日 顽保安三团配合挺进七纵朱大同部在官庄设据点，会合顽萧十区谢璧如的萧东支队，计 1300 余人，窃取官庄、前程两个村庄的房屋、土地，砍伐了周围 10 多里内的树木，修围寨、筑木城、设牢房，捕杀我抗日军政人员，为害当地群众，造成数十户人家流落在外，逃荒要饭。

夏初 萧十区顽区长谢璧如在桂山乡谢小庄，将我区委书记张立平（张祖英）、财粮员陈陶二同志捕去。张、陈经严刑拷打，始终不屈，被残酷杀害于后马家顽据点。

夏 中共萧宿铜县委改为萧宿铜灵县委，寿松涛任县委书记，姚克（王学文）任副书记，委员有顾寒星、孙明远、孙朝旭等。同时成立了路西工委，姚克兼书记，李华农为副书记，李秉枢、张祚兴为委员。

中共萧宿铜县委派宣传部长沙效葛(化名张振远)去萧西祖老楼日伪据点,领导萧西秘密党的工作,建立了祖老楼地下党支部(有党员8人)。而后,沙又去青龙集伪据点开展秘密工作。

6—7月 日伪、顽联合向我萧宿铜地区进攻。路东官庄顽军沿奎河向栏杆、孟寨我萧铜总队驻地进攻;时村日伪经刁白山由南向北夹击我栏杆、孟寨部队;路西王传绶部约两个营向我一营驻地皇藏峪进攻。我萧铜总队与九旅二十七团相配合,于奎河岸新庄桥向顽军展开激烈的反击战,顽军被我击退。继而,又打退时村敌伪,取得了路东战斗的胜利。我一营在路西由副营长刘为敬率领,登陈林西山岭、刀山(胖妈顶)制高点布置阻击。不料,敌先头部队与我同时到达,随即同顽敌展开了对刀山制高点的争夺战。我副营长刘为敬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二连连长孟庆祥随之英勇冲杀,战士们斗志高昂,无不以一当十。激战两小时,顽军不支,狼狈向西溃逃。是役,毙伤顽数十人,俘虏20余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50余支。我副营长刘为敬光荣负伤。

7月27日 我萧铜总队六、七连过路西与一、二连会合后,当夜向梧桐一带搜索。28日晨在梧桐发现刘瑞岐之四支队(赵永和部)6个连,当即将其包围,令二连突入村内,激战一小时将顽击溃。后我分头进击,上午10时结束战斗,计毙伤顽10余人,俘顽20余人,缴轻机枪一挺,

马5匹，子弹数百发。我伤亡3人。

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五)我在镇疃寺召开保长和开明士绅会议，宣布成立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祖宇恩，副区长李星原。同时，区委和区队亦宣告成立，张祚兴任区委副书记。

秋 在奎西区和萧十区，以张汝义(原国民党区长)、郑振辉(反动地主)为首，与派进来的国民党特务郑月桥相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发起反革命暴乱，被我抗日民主政权破获，并予以镇压。

萧铜七区胡锡三以教会为掩护，发展反动组织，并建立情报站，进行反共活动。被我查获后，捕送我淮北行署处理。

10月 萧铜办事处在活动中心区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对开明地主，通过政策教育说服他们接受“双减”；对拒不接受教育而又民愤很大的地主，组织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如皇藏乡地主胡兴理，拒不减租，继续放高利贷，并虐待保姆和雇工，群众意见很大。经过说理斗争，打击了他的威风，维护了群众的利益。

官庄伪军八九百人，押着十几辆大车从栏杆过奎河向袁庄、黄庄、赵庄、新庄子一带抢粮。我萧铜总队三营得情报后，部署七连沿奎河南进，从新庄子东头攻击；九连从新庄子西头、赵庄东头出击；八连从北面向新庄子突击。我军士气旺盛，一举将敌人冲垮。敌丢下大车狼狈逃

窜。此役，毙伤敌 10 多人，俘虏 3 人，缴枪 3 支。我八连一排长马文化负伤。

路西土顽王传绶、刘瑞岐两个支队，吴信元支队在刘子仁命令下也派一个营配合，分南北两路，进入皇藏地区，夹击我萧铜总队。我总队一、二营部署在曹村、泉口一带隐蔽，用区乡队搞麻雀战袭扰他们。顽军扑空后，回到二区梧桐宿营。我一、二营尾随至梧桐附近隐蔽，拂晓前突然袭击王传绶部。除打死打伤者外，王部被我俘虏 20 余人，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20 余支。待其摸清情况后，我已回到九区休息。

10 月底 萧铜地区日伪、顽、我斗争日益尖锐，顽固派策反活动猖獗，办事处副主任吴端胜的重要亲信已叛变投敌，造成我根据地内部有些动荡。为稳定局面，巩固内部，纯洁革命队伍，县委决定将吴端胜及王凤楼、欧如亮、王茂松等分别予以处理。吴端胜在送往邳睢铜军区改造教育期间，持刀行凶，砍伤我警卫人员，遂被军分区决定处决。

11 月 17 日 我萧宿铜县总队副总队长顾寒星率三营七、八连于凌晨进攻赵庄伪据点。由于我地下人员孙成绪、盛玉珍(曼侠)作内应，在我进攻之时放下了吊桥，结果一枪未发即将伪军解决。缴枪 40 支，俘伪区长阎维新以下 50 余人。

冬 我萧宿铜县党、政、军干部开展整风学习，除少

数领导骨干到华中分局及淮北区党委轮训外，多数干部坚持岗位，每天挤出一些时间，阅读整风文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写学习笔记，然后由组织分别进行考核。经过一冬春的学习，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我军西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作好了思想准备。

我萧宿铜县总队一营在路西区队配合下，对南犯铜山土顽进行一次集中打击。某日拂晓，我进驻汉沟、蛤针窝，严密封锁消息。下午三时，沿汉王庙、周棚、闸河口等十几个村庄进行兜剿。次日拂晓前到朱庄发现驻敌，随即进行包围。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将铜山土顽仲延标两个连及其营部击溃，俘虏20余人。经此打击后，铜山土顽很长时间不敢南犯。

1943年冬—1944年春 萧宿铜县领导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发动群众大搞生产互助，学习吴满友经验，推广奎西段庄组织起来生产铁木工具的试点经验，同时开展“让租让息”，削弱封建剥削，兴修水利，救灾度荒等工作，以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1944年

1月初 顽三十三师段海洲部张大傻纠合官庄、后马家与马栏伪军张立钧部，分四路向我铜七区杨庄、官庄

一带抢粮。我萧铜总队六、七连在顽撤回途中予以截击，断其尾部，歼敌一个排，俘虏10余人，缴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我追张部至宝光寺，其躲进据点内不敢出来应战。

2月 彭笑千从太和国立21中逃回萧县，继续做争取吴信元支队的工作。

3月初 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二纵队(刘瑞岐部)改编为第七纵队。其第五支队王传绶部扩编为第四十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一一八支队(支队长胡应西)，一一九支队(支队长谢壁如)，一二〇支队(支队长郭孝冉)，计1500余人，配有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1000多支，炮2门。活动于萧县二区以东，专门对付我路东新四军及萧宿铜抗日根据地。

3月下旬 后马家、宝光寺顽军三十三师张大傻(张克修)部近千人，到杨庄集东南官庄一带抢粮。萧铜总队政委寿松涛，副总队长顾寒星率二营(缺五连)及三营出击。我六连受阻，七连被火力压制，总队又令四、八、九连进攻。在冲锋中突破敌人防线，敌溃退。是役，毙伤敌30多人，俘虏10余人，七连缴获捷克式机枪一挺。我七连长周纯朴、九连排长李惠田牺牲，八连班长王正连、三营通讯班长张兴文负重伤。

4月初 萧铜总队一营驻宿北区冯庄、胡疃，夹沟伪军一个中队出来扫荡，遭我一营和宿北区队的严重打击。

伪军伤亡中队长张朝瑞(张海侠)以下 20 多人,我伤亡战士 7 名。

4 月上旬 萧铜总队一营驻镇疃寺、胡疃等村,日军 30 余人去大五柳抢粮,途中遭我伏击,敌人溃散。我乘机将敌人包围在胡疃山上,后曹村、夹沟之敌前来增援,被围之敌乘机突围,我与之进行肉搏。此役,计毙伤敌 10 多人,我伤 3 人。

4 月 15 日 在奎西区郑楼召开萧铜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萧宿铜灵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许西连为县长,陈敬伍为县参议会参议长。大会通过了年度财政预算和公粮累进征收办法。同时,对县政府机关的人事作了安排。秘书:冯蕴言、任慎修;民政科长张舒民,副科长张立轩;财粮科长朱振东,副科长徐明轩、朱传真;教育科长王可风,副科长杨化龙(杨兴瑞)、王祥义;司法科长孟振声,副科长谢继恩;公安科长张建淮(张元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对两面、三面政权的改造,进一步扩大了我一面抗日政权。

4 月中旬 我萧铜总队一营驻宿北区,某日夜袭击清水沟日伪据点。宿北大队扒铁路、切电线,给予有力配合。白海龙(尖山人,铁匠)在据点内作内应。经过一阵激战,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是役,我拔除了清水沟据点,俘伪军 30 多人,缴弯把机枪一挺,步枪 20 余支。我副教导员张恩远同志牺牲。

初夏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集中五六万兵力向中原地区进攻。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部 40 万人望风而逃，38 个市、县沦入敌手。为挽救中原危局，新四军四师准备西征。此时，我萧宿铜党政军干部组织专人收集情报，筹集物资，为迎接新四军四师西进作好充分准备。

5 月 17 日 我萧铜总队二、三营和民兵大部对萧宿铜中心区阚疃伪据点进行围困，打时村、路疃增援之敌。围困五天敌人未来增援，我便采取强攻，不到半小时阚疃之敌 50 余人全部投降。我部队撤出阚疃进驻林湖休息，同时组织群众拆除据点。这时，时村日军 20 余人，胡泽普伪军千余人前来阚疃驱逐我拆据点的群众，并占领了阚疃。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周纯麟团长令总队火速将阚疃之敌击退，师骑兵大队隐蔽在奎河岸内准备迎敌。我再次向阚疃攻击，敌向时村撤退，骑兵大队跃马挥戈将敌分割包围，我获全胜。此役计砍死砍伤敌百余人，俘敌 200 余人，缴获机步枪 200 余支，平射炮一门。

6 月 萧铜总队部及所属三营驻段庄，曹村日伪军 100 余人到阻沟寺抢粮，寿松涛政委令三营派少数人前往草堂子伏击，排长赵承胜率队前往。当我前哨班杀伤敌人后，由于部队联络中断，没能及时撤退，田勇云、武思良等三人牺牲。敌因情况不明，亦很快退回据点。

我萧铜总队战士孙元卿、钱书才、孟庆林、赵玉明四人，于上楼村击毙王传绶部连长兼陶墟乡乡长王志忠及

其护兵多人，缴获长短枪 5 支，挖掉萧县土顽东犯的耳目及先锋，受到我县政府和县总队的嘉奖。

7 月 萧铜总队奉命改编为淮北军区三分区萧铜独立团，团长顾寒星、政委寿松涛。

8 月初 张舒民奉彭雪枫师长指示，绕道兼程返回萧西，配合彭笑千策动吴信元部起义。

8 月 20 日夜 我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九旅二十五团和骑兵团，由彭雪枫师长率领于曹村北桃山地段分数路快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萧县境内。萧宿铜部分党政干部及萧铜独立团一、二营随军西进。

8 月 21 日 小朱庄战斗。是日晨，我十一旅由城阳分两路向前后梧桐、时村土顽王传绶部发起攻击。王传绶集中四十纵一一八支队、三纵七支队一大队（刘瑞岐部）及四十纵警卫连、独立大队共 15 个连，约 1600 人，于小朱庄固守待援。我 21 日中午完成包围后即作攻坚准备。23 日即行炮火轰击，轻重机枪于屋顶瞰射。经四个小时炮火射击后，王顽前沿阵地被摧毁。13 时发起总攻，三十一团一营向南门攻击，一举占领西南角土堡。三十二团一营由西北突入，与顽对峙格斗占领围墙。王顽不支，亲率 300 余人，从东圩突围。我三十二团和骑兵团奋起阻击，前后战斗约两个小时，计毙伤顽纵队司令王传绶以下 300 多人，俘纵队副司令王忠鼎以下 1300 多人，缴获炮 2 门、轻重机枪 35 挺，步枪千余支，子弹万余发。

8月24日 小朱庄战斗结束后，二十八纵队三支队吴信元部于吴集北大孙庄宣布起义。顽第三纵队刘瑞岐闻讯后即率部及县府人员 3000 余窜往陇海路北，二纵一支队刘子仁部亦迅速退至永城境内。

9月1日 徐州敌千余人集结于曹村、夹沟附近，5日越津浦路西占领萧县之城阳、梧桐、白顶山、杜集等地，7日返回徐州。

9月4日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姚运良政委亲率三大队，配合吴信元部向穆集以东顽三纵七支队奔袭，土顽相机逃窜。我追至陇海路附近，将顽七区中队全歼，俘 25 人、毙 2 人，缴步枪 13 支。

萧县新开辟地区与萧宿铜暂时合并，仍称萧宿铜县，纵翰民任县委书记兼萧铜总队政委，彭笑千任县长，许西连任副县长兼总队长。时，已发展区乡武装百余人。

9月11日 夏邑县八里庄战斗，我新四军四师歼灭顽二十八纵李光明部。师长彭雪枫不幸殉国，遗体送萧县王白楼子村装棺入殓，次年 2 月葬于洪泽县半城。

9月12日 路东顽段海洲率三十三师一部、特务团及补充一、二团为右纵队，经由灵北朱山子、北马集、张山、贡山到孙寨韦集集结；顽十四纵苗秀霖率二、三、八三个团为左纵队，经由渔沟、尤集、贡山，向刁山、白山集结。该两部共 6 个团的兵力，经由符离集以北地区西窜。在韦国清、彭明治的指挥下，我萧铜独立团三营配合七旅及九

旅将其一、二、八团一部，三团全部共千余人截歼于刁山、白山、周场一带。残敌退回永安集、时村等伪据点附近，其西进计划被粉碎。

9月下旬 商丘之敌奔袭萧西王白楼子、王柳园我军驻地，并继续在萧永地区“扫荡”，27日返回商丘。

9月 为稳定社会秩序，学校相继开学。时有高小10多处，初小224处，冬学每区5处，教员315人。高小学生650人，初小学生约6000人。县民主政府还创办了萧县中学，校长杨兴瑞，教导主任黄维华，总务主任郑趣白，设中学和师范两部。11月底招收学生220人，教员12人，规定了生产教育、民主教育、爱国教育的方针，没有固定校舍，在四区杭子一带流动教学。

10月中旬 顽暂一军军长王郁文亲率暂十四师、骑八师、五纵魏振铎、二十八纵刘子仁、二十九纵蒋心亮等部万余人，由涡、蒙地区向我萧宿永地区进攻。韦国清、彭明治复率七旅全部、九旅一部西进与路西部队会合。我萧铜独立团一、二营及萧县独立旅置陇海路附近，阻止路北耿继勋部及刘瑞岐部南进。16日，我军于永东菊集、阎楼附近与顽接触，迫顽暂停北进。19日，顽步、骑6000余人向我永北保安山、夫子崖阵地进攻。我环保安山、芒碭山等地构有工事，顽势不猛，且慎重前进，我为紊乱顽之部署，争取时间，待路北八路军到达后再行出击，故以三十二团、三十一团小部出击。20日，顽骑八师开始向我后洼、

芒碭山阵地进攻。我将其击溃后，复以二十、二十六团出击，当晚击溃其军部。21日，我全线出击，顽不支即退。我跟踪至永西酃阳集，歼其暂十四师一团及二团一部。该师溃不成军，骑八师亦被击溃，王郁文几乎被俘。此役，计毙俘顽千余人，我追至涡阳北关而止。

11月4日 萧宿铜抗日民主政府召开行政扩大会议，确定五项工作：（一）用各种会议和方法转变干部的旧作风、旧观念；（二）根据政府减租减息法令协助群众工作；（三）减租减息法令要切实执行；（四）武装配合作好边缘区工作，积极开展对顽伪的斗争；（五）在萧县征收公粮1000万斤，以粮食收流通券3000万元，并规定了征收办法。

11月24日 新四军三师七旅配合萧县独立旅越过陇海路奔袭萧县土顽刘瑞岐。刘部自我西进后，盘踞陇海路北，与敌伪勾结并不断南来我根据地侵扰。25日拂晓，我遂向郝集、段庄、刘套、彭新庄、迎风口、刘店等处发起围歼。俘顽政治部主任潘静庵以下300多人，刘瑞岐部支队长赵永和起义，孔广玉、刘典邦等投降日伪，刘瑞岐带40余人逃窜。是役，我毙顽营长1人，我牺牲营长1人，伤10余人。陇海路北顽据点均被我拆毁，我南北地区联成一片。

11月下旬 萧、宿、永、夏地区顽军大部肃清，我开始转入政权建设。淮北苏皖行署二专署成立，彭笑千任专员，纵翰民任副专员。萧铜分别建县，原萧铜县三分之二

干部调来萧县，成立萧县县委和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属淮北二专署)，县委书记由孙明远接任，县长许西连，副县长张舒民。萧铜独立团一营留萧县组建萧县总队，县长许西连兼任总队长，县委书记孙明远兼政委，总队副扶廷修，参谋长刘为敬。这时，全县已建立了5个区委、8个区公署，72个乡政权(其中一面政权30个，两面政权31个，三面政权11个)，新发展区乡武装783人。

11月下旬—12月 为肃清土顽残余，维护新生政权，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出布告，要国民党党政军(包括三青团分部、国民党区分部、区分队以上骨干，连以上)人员向政府登记自首，并交出党证、团证、名册等。对主动登记自首的宽大处理，对罪大恶极而又拒不自首的予以镇压，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有很大一批人向政府作了自首，对从政治上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5年

1月 中共萧县县委在二、三、四、五、六区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通过运动，建立各级农民救国会，发展武装，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2月6日 四区区委在屈楼发动周围1000多农民

群众,开展对屈楼大地主屈大瞎、屈培经、屈三妮的说理斗争。使屈楼三家地主退回谢楼、李平庄等九个村佃户的地租 17067 斤。

2月16日 伪淮海省长郝鹏举应萧县土顽刘焕文之请求,派七庭宾师向萧县西部“扫荡”。萧县独立旅、萧县总队配合四师十一旅,在张震同志指挥下,于祖老楼、青龙集之间痛歼伪顽,并乘胜拔除了青龙集、祖老楼等伪据点。是役,我歼敌 500 余人,余敌窜回徐州,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 300 余支。四师参谋长张震负伤。

2月 建立萧县总队第三营,孙清淮任营长兼教导员,孟庆祥为副营长,陈海波为副教导员,全营 200 多人,活动于五、六、七、八区。

淮北二专署将萧县中学与永城中学合并,在萧县四区张庄寨成立建设中学。专员彭笑千兼校长,副校长王卓然,教务主任张宇锐,教导主任李维夫,总务主任黄维华。4月开学,招收学生 600 人,设师范、中学、建设三部。暑后在王白楼子设立分校,招收新生 300 人,年底迁往永城县丁陈集、郭窑,至 1946 年 8 月停办。

3月14日 六区区委副书记阎继文在王楼召开对地主郝云松、王德昌的说理斗争大会,参加群众 2000 多人。群众揭发郝、王曾杀人行凶,一致要求偿命。郝云松当场低头认罪,交出步枪 2 支、盒子枪 1 把,倒回粮食 5000 余斤。

3月中旬 吴信元支队4个营1500余人,改编为萧县独立旅,吴信元任旅长,副旅长欧阳圣德,政治部主任杜慰农。该旅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麻瑞全,二团团长郝长桂。

3月 成立夹河区,葛玉环任区委书记兼区长,闵凯任副书记,邓塞林任副区长。

4月 县委设立城市工作部,部长姚一非,副部长李华农、张笑仙。后姚一非调走,李华农任部长。

5月 二区先后在葛塘、葛张庄等地发动组织三次说理斗争大会,开展减租减息,县委副书记朱玉林亲自参加大会,到会群众4000余人。群众对葛塘地主葛元赞展开说理斗争,葛元赞低头认罪,当场向佃户退租。

夏 全县农民救国会普遍建立,各区区队分别发展到50~100人,绝大多数的乡建立了基干队,村建立了民兵组织。

7月上旬 中共萧县县委在四区张寿楼召开500人的党员活动分子大会,地委书记吴芝圃传达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并用一周时间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会后,萧县县委领导群众开展了三项工作:一、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二、整编并扩大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三、发动轰轰烈烈的劳武结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7月 县政府教育科长王可风在四区锦桥村举办全

县教师训练班。

8月13日 淮北二地委在萧县传达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宣布了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的七道进军命令。中共萧县县委于13日夜即研究了接收萧县境内敌伪据点的具体方案。并以萧县总队的名义向驻萧城、黄口等地的日伪军、伪政权发出通牒，令其在限期内向我缴械投降。但由于蒋介石命令日伪就地“维持治安”，我们的通牒没有发生效力。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萧县总队在党的领导下，及时拔除了丁里、大庄、吴庄集、陶楼、岱桥、郭洼等日伪据点，使陇海路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萧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四、解 放 战 争 时 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1945 年

8 月 二区在符离集以北、小李庄以南的津浦铁路线上,组织了1000多人用两三天时间扒铁路,孤立和打击日伪据点。

8 月底 新四军十二旅三十四团配合县总队第三营攻打陶楼据点,激战中萧城伪军一三九团500多人出城接应,被我击退。陶楼据点的伪军100多人就降。接着,又赶跑了岱桥、郭洼等据点的伪军。

9 月初 我县总队攻打黄口据点。黄口是一个较大的日伪据点,有日军1个中队,伪军200多人。未克。

10 月 2 日 国民党县政府抢先派人接收了萧城的伪军政人员,形成顽伪合流。

10 月 18 日 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一团在萧县独

立旅和萧县总队的配合下，攻克萧城。全歼守敌 700 多人，缴获机枪 12 挺，长短枪 600 余支。国民党萧县十三支队长孔广玉、二区区长郭效冉、二区驻萧城办事处主任陈凌霄被俘。

10 月下旬 为了巩固抗日胜利成果，县委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决定将郭效冉、孔广玉拉出示众，彻底清算其罪行。县委在坡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将郭、孔二人枪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10 月 29 日 将淮北二地委、二专署、二分区改为华中八地委、八专署、八分区，萧县隶属八地委领导。

12 月 7 日 黄体润任国民党萧县县长，加强了顽萧县反共势力。

12 月中旬 八分区将萧县总队一、二营升编到分区十二旅三十四团，县总队副扶廷修任团长，王枫任县总队副队长。

12 月底 萧县总队第三营升编为分区主力。

年底 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全县有 87 个支部，1457 名党员。

1946 年

1 月初 将战斗力较强的区、乡队上升编成新的萧县总队，共 400 余人。县长许西连兼总队长，县委书记孙

明远兼总队政委，刘为敬任副总队长，张庆怀任政治处主任。

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双方颁布了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协议的规定，徐州地区也成立了“三人军事调处执行小组”。萧县县委指示全县人民武装，只在我边沿区防守，决不进入国民党占领区。

1月13日 国民党李默庵部一个师从江南开到徐州三堡、夹河寨，向我解放区进攻。凌晨，国民党以一个团的兵力公然向我姚楼进犯。为维护停战协定，我县大队三连和夹河区队在姚楼东进行阻击，激战半日，后因众寡悬殊，我方于上午11时撤出阵地，姚楼遂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随后，他们又强占了我解放区的王闸口、王门、义安山、北望、南望等大片村庄，并构筑工事，准备继续向我军进攻。

1月15日 国民党县长黄体润率两个大队，在国民党铜山县长耿继勋（耿聋子）部两个团的配合下进犯萧城。在龙山子、郝店一带遭我县总队的打击。激战数小时后，我军撤出战斗，萧城遂被占领，至下午3时国民党军撤离萧城。

1月 由于国民党军不断向我边沿区进犯，萧县县委一面向全县人民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一面向华中八地委和八分区报告。分区于22日派联

络部长毛更甃及陆一函、张笑仙赴徐州和军调三人小组我方代表韦国清联络，在王门被国民党驻军无理拦阻，软拘一天一夜，对方最后以“安全无保障”为托词，予以拒绝。

2月 八地委在濉溪南丁楼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县委书记孙明远带领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后，八专署秘书孙叔平又专来萧县讲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进行逐级贯彻，在学、政、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3月 县委书记孙明远调地委工作，胡天禧接任县委书记。

因敌人对津浦铁路严密封锁，路东和路西联络困难。经华中分局批准，将原萧宿铜县路西之天门、路西、宿北三个区划归路西八地委、八分区领导。其中，天门、路西两区归属萧县，宿北区归属宿西县。同时将原夹河区和路西区合并，仍称路西区。

3月30日 国民党军队耿继勋部配合驻杨楼车站的八十八军六十三团南犯，向我七区区队进攻。

3月底 八地委、八分区决定在萧县的尚口等地设立据点，以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陇海两铁路向我解放区进犯。

4月初 国民党县政府对我设立尚口据点大为恼

火，多次派兵袭扰。我县总队之七、九连和分区三十四团二营四连在尚口据点驻守，三十四团在尚口外围陶楼等地防守。

4月19日 国民党八十八军一部配合萧县保安团向尚口进攻。我县总队在三十四团的配合下，激战1天，毙敌100余人，晚上将敌击退。

4月27日 国民党八十八军和萧县保安团约8000余人，从黄口、杨楼、夹河寨分数路向尚口据点围攻，凌晨将尚口包围。在空军的配合下，他们以大炮数十门、机枪数百挺的强大火力向我尚口据点猛烈攻击。我驻守部队县总队二营奋起迎战，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攻击。我伤亡惨重，坚持一天，最后弹尽援绝，副总队长刘为敬、政治处主任张庆怀和200余战士壮烈牺牲，100多人被俘，仅20多人突围。我驻陶楼之三十四团增援无效，被迫撤退。

5月初 徐州三人小组来萧县调查处理尚口事件，美国代表哈里曼借口萧城无战事痕迹，拒绝去尚口，便返回徐州。

八分区帮助萧县重建县总队，从萧县独立旅抽调1个营，又从分区十二旅调来范文典、薛光分别担任副总队长和政治处主任。

5月8日 县委、县政府举行了“四·二七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大会。

5月中旬 县委在徐油坊召开了庆祝重建萧县县总

队大会，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讲了话。

5月11日—24日 地委在濉溪南丁楼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县委书记胡天禧带队参加了会议。

6月20日 县委在三区的石桃园召开了有区委书记、区长和农会主任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县委副书记朱玉林作了前段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组织到会人员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并对斗争地主的策略和果实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会后，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短期训练，并建立了专门领导反奸清算的组织——清算委员会。

6月26日 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全面内战。

7月初 县委以贯彻《五四指示》为中心，分别在二、四区进行清算试点工作。接着，反奸清算斗争即在一、二、三、四、五区的全部，六、九区的大部和七、八区的小部分地区迅速开展起来，建设中学的师生200多人亦深入各区开展宣传，贯彻《五四指示》。

7月18日 国民党交警二总队从夹河寨进犯并占领萧城，19日占领了圣泉寺、岱山口、瓦子口等处后，继续向我三、四、五、六、七区进犯。7月18日，徐州以南津浦线上的国民党五十八师一八三旅从九区经永堙向西进

犯，我区乡武装被迫向西转移。

8月8日 我一区区长林星锐和分区情报分站站长孙东民一同去杜集接收情报，被敌包围袭击。区长林星锐和随后前往的副区长丁戒山牺牲，乡长刘步廷及彭瑞昌被俘，后被敌人惨杀在萧城。孙东民突围，县政府又任命孙东民为一区区长。

8月10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的敌人出击，发起了陇海路破击战。一夜之间，占领了砀山、兰考、杨集、李庄等10余个城镇。我县总队配合八分区武装攻克黄口镇和黄口车站，消灭黄口守敌数十人。同时，县委发动了四五千民工，在孙清淮等同志的带领下，经过两三天的奋战，将杨楼车站至李庄车站四十余里的铁路、桥梁、通讯设施全部破坏。

8月中旬 岱山口至瓦子口以东地区被敌人占领，后又不断向西蚕食。县委、县政府先后撤到了三区的孙桃楼，四区的胡楼，卫生所、修械所等一些非战斗机关和一区、二区、夹河区的区、乡干部，建设中学的师生及伤病员等，都撤到了李石林西北朱大楼、洪河集一带的萧永边界上。

8月20日 国民党新五军从蚌埠出发，经濉溪苗桥、萧西一带向陇海路急进。驻在朱大楼、洪河集一带的萧县后方机关受到冲击，由公安局副局长单衍纯带领向西北撤退，公安局长王尚三也随卫生所撤到陇海路北与

单衍纯会合。北撤人员，被冀鲁豫军区编为两个大队：武装人员编为陇海支队萧县武装大队，大队长孟庆祥，政委王尚三；干部及其他人员编为干部大队，大队长单衍纯，政委由王尚三兼任。

9月初 国民党五十八师的三个团和江苏省保安团与交警二总队在萧县会合，挤得我县、区、乡武装无地存身。县长许西连、副总队长范文典带队与敌周旋，于9月下旬被迫撤离萧县。

9月3日 由朱大同任团长的地主“还乡团”进驻萧县，对我革命家属和积极分子进行残酷迫害，我区、乡、村基层政权全部被摧毁。还乡地主趁机进行反攻倒算，勒索群众，全县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9月下旬 单衍纯从北撤人员中挑选精干力量60多人，越过陇海路，到永城的胡桥与我县政府会合。其余人员由王尚三带过黄河，由冀鲁豫区党委分配工作或安排学习。

9月底 县委书记胡天禧，副县长张舒民带领区乡干部、勤杂人员、年老体弱的干部和伤病员百余人，由县总队第三连护送去地委汇报工作，途中经永碭公路时与国民党军交警二总队遭遇，经短时间战斗，向南撤退到毛河涯，胡天禧失散，被敌人俘去。

10月初 地委为了改变困难局面，决定将全区划分为4个工委，武装编为4个支队。萧、永两县武装合并为

萧永支队，行政为萧永办事处，党内为萧永工委。

10月7日 八分区副政委寿松涛，带领分区三十四团、骑兵大队、萧永一支队，在潘道口与敌交警二总队激战一天，晚上进入萧县，经樊小屯、大吴集、陈庄、任楼、蒋新楼、张湾子等村，一直打到濉溪西、永城南，一路与敌多次激战。对那些反攻倒算，罪恶多，民愤大的还乡地主豪绅作了惩处，为人民壮了胆，解了恨，基本上灭掉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

10月8日 分区参谋处副处长孙以仁叛变，向敌人泄露了我军的机密，使我西撤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10月 地委为了保存干部，减轻战斗部队的负担，决定送一批干部去冀鲁豫六分区。其中有萧县的高钧泰、杨道昭等数十人。

11月初 我西撤人员全部撤离八分区，进入睢杞太解放区，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

11月 在八区成立了萧西工委，李建华任书记，盛玉峰任副书记，李乐敏为委员。

12月初 范文典在柘城东杨塘与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张岚峰部作战时负重伤。

12月12日 豫皖苏区党委、豫皖苏军区成立，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萧县西撤武装及由王尚三带往陇海路北的武装被编入军区的警卫团。范文典任团长（范因伤未到任，不久牺牲），王尚

三任副政委。

12月17日 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平岗召开了原八分区县区以上干部大会,并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西撤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八分区在坚持对敌斗争中“方针不明,决心不够”的错误。同时,宣布成立豫皖苏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撤销八分区建制。他号召全体干部坚决打回去,收复根据地。

12月下旬 豫皖苏三地委决定成立萧县县委、县政府,任命朱玉林为县委书记,张舒民为县长。派孟繁超等九人便衣从永西插入萧城、萧西了解敌情,为收复萧县作准备。

12月30日 朱玉林派孙东民、朱世福到萧县与萧西地下工委书记李建华联系,传达县委指示。要求他们联络西撤时失掉联系的党员、干部,为恢复萧县政权作准备。

1947年

1月1日 豫皖苏区党委召开了东进誓师大会,接着即开拔东征。途中战涡阳、克龙岗,歼敌2000余人,很快收复了陇海路南永、夏、亳、涡、宿西、砀南等广大地区。

1月中旬 地委指示撤销萧县建制,成立萧宿永工委,工委书记李华农,副书记单衍纯(劲之),大队长朱若

平。

2月初 工委东进开辟萧宿永地区，途中受阻，骆天庙一战朱若平在追击逃敌时牺牲。4月，因东进斗争形势变化，工委撤销。

3月 敌人以永城为中心，继续向我“扫荡”。三地委动员全体干部和指战员与敌斗争，口号是“开辟永东，确保永西”。

春 国民党县党部根据上级的命令，在县、区设立工作小组，实行“党网化”，全县组织了15个工作小组，成员有123人，致使我党员很难活动。不少党员、干部、积极分子被迫自首，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叛变投敌。

5月12日 豫皖苏三地委决定，以分区主力一个连配合原萧宿永工委干部组成一支精干武装，由田启松带领进入永东，开展游击战。

6月 成立萧宿永县，县委书记田启松，县长李品立，副县长谢继恩，孟庆祥任县大队副大队长。

夏秋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各种苛捐杂税的加重，加上8月连续15天的水灾和接踵而来的霍乱流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缺衣少食和乞讨异乡的悲惨境地。黄口、杨楼车站爬车逃生的难民不断被轧伤轧死，真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9月16日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陈毅、粟裕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第三纵队进入豫

皖苏地区,从黄口、杨楼之间横跨陇海铁路,经萧县西部和南部东进。国民党县政府人员仓惶出逃,国民党徐州外围的大部分武装很快被扫除。

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口号。同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陈粟大军回师途中,在萧县的南部进行宣传。

11月17日 三地委决定撤销萧宿永县,恢复萧县、宿西县。任命朱玉林为萧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单衍纯为副县长、县委委员,不久调王尚三任县委副书记,张祚兴为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并成立了萧县县大队,朱玉林任大队长,孟庆祥任副大队长。

11月 县大队在分区五团支援下,于城西丁庄伏击顽保安二团1个营,歼敌10多人,俘敌30余人,缴机枪1挺,步枪40多支,顽营长孟昭信逃掉。

12月初 我袁圩区公所被敌偷袭,牺牲7人,失枪3支。

12月5日 我王寨区公所遭敌三区区队袭击,区委书记兼区长贾绪朋等二人牺牲,副区长梁浩斌、副区长李玉林负伤。

12月 根据地委指示,县委认真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首先在石林、袁圩、王寨、朔里、大屯等解放区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并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农

村，发动群众斗地主，分浮财。

年底 全县建立了石林、袁圩、大屯、王寨、祖楼、陶楼、黄口、天门、朔里等区政权，大部分区都建立了区队，全县近一半乡建立了政权。县大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948年

1月1日凌晨 我驻蒋新楼之五区公所，遭到国民党四、五区区队袭击，牺牲区队长韩云璋和一名班长，被俘去战士五名，在县城被杀害。

1月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有些地区在批判和纠正了“土地会议”之前强调的“九照顾一批准”的右倾错误后又发生了“左”的倾向，有些同志犯了急性病，将地主扫地出门，使地主大批逃亡，对中农利益亦有侵犯。针对这些问题，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及时、坚决地给予纠正，进一步贯彻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使土改运动得以顺利发展。

1月18日 我黄口区区长蒋相善在大屯区的胡屯被驻黄口的国民党伞兵袭击牺牲。

1月24日 我王寨区区队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在王寨西南的小杨楼组织了一次诱敌入窟的战斗——小杨楼吊坏战。此役，击溃敌2个连，毙敌12人，生俘敌排长、突

击队长以下 36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数十支，子弹数千发。

1 月 29 日 豫皖苏军区独立五团和我县大队在史庄设伏，把春节前出来抢东西的孙庄据点的敌人三面包围。敌向西南逃窜，直追 20 余里至马山，歼敌 200 余人，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8 挺，步枪百余支。这一胜利对萧县的恢复有重要意义。

2 月 27 日 国民党正规军二十四师两个团配合萧县保安团、人民自卫总队共 3000 余人向我控制地区“扫荡”。我县大队组织各区区队英勇奋战，打击敌人。经大小 30 余次战斗，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坚定了战胜敌人、保卫我解放区的信心。

2 月下旬 我县大队升编为豫皖苏第三军分区新五团，副大队长孟庆祥和邢志和随县大队升编，邢任参谋长，孟任副参谋长，郝长顺任副主任。

3 月 8 日 我新五团在王寨西南郭楼设伏，计划歼灭王寨据点出犯的敌人。战斗中，在张湾子与敌整编八十八师二十一旅遭遇。是役，虽然我们只有 6 个连的兵力，同数倍于我们的敌正规军激战一上午，但却以牺牲 18 人的代价，赢得了毙敌 200 余人的胜利。

3 月 10 日 成立萧宿县，王尚三任县委书记，张岸任县长，张绍烈任副县长。萧县一、二、九区和蔡里划属萧宿县。

3月17日 国民党起用沦陷前曾任过萧县公安局长的李公达任县长。李一上任就招徕重兵，增设据点，构成所谓“萧西的铜墙铁壁”，将我挤到萧永边境，加之我县大队升编，活动更加困难。敌人组织黑杀队，经常袭击我区、乡武装。

3月18日 在分区主力配合下，拔除了王寨顽据点。

3月底 新成立了县大队，调新五团副参谋长孟庆祥任副大队长，郝长顺任副政委。

5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旅长金绍山率部攻打敌人的重要据点吴楼，三十团配合炮兵营主攻，三十四团打援。凌晨4时开始攻击，次日凌晨5时攻克，歼敌500余人。我三分区新五团赶跑了徐楼据点的敌人，孟油坊据点的敌人也仓惶龟缩到萧城，萧西的“铜墙铁壁”即告坍塌。

5月底 我主力调走，敌人不断从萧城西犯。主力一来，他们就龟缩萧城。此时，萧县处于拉锯状态，萧宿县武装也被挤到濉溪以西的苗桥北部一带活动。

7月上旬 我六区副区长张福成在大吴集北陶楼遭敌袭击牺牲。

8月初 我县大队一部在石林区杜庄村击垮敌四区四区队一个排。

8月21日 单劲之（单衍纯）、孟庆祥率领县大队在

神树村出奇制胜,仅用 40 多分钟时间就歼灭了国民党三区区队,打死打伤敌 40 多人,生俘 50 多人。敌三区区长侯克祥,区党部书记蒋相增被生擒,缴获轻机枪 2 挺,步枪数十支。此一战基本上扭转了萧县的局势,受到豫皖苏军区通报表扬。

9 月 县委指示石林区试行小乡制,彻底废除保甲制,乡直辖自然村。

萧宿县配合分区主力对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进行破击,翻轨数里,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的战役。

9 月 20 日 萧县成立战勤指挥部,朱玉林任政委,单劲之任司令员,冯子均(家平)任副司令员,下设组教、保卫、供给、总务四个股。

9 月底 在分区副司令员邢天仁的指挥下,我碭南大队、雪枫大队、萧县大队,分区机炮连等在中南海村以南摆开东西 10 余里的阵势,准备迎击由南而来的刘子仁部。早晨,敌在傅庄与我军接触,我红庙区队配合萧县大队奋起迎战,俘敌 80 多人,缴获步枪 80 余支,战马 1 匹。

10 月初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县委决定祖楼区组织一个担架团,任命王继冉(县农工部副部长兼祖楼区区委书记)为团长兼政委,张亚南(祖楼区区委副书记)为副团长兼副政委,全团担架队员 972 人,162 付担架。

10 月 在全国大反攻的形势下,县委指示,对萧县

的国民党开展一次政治攻势，争取分化瓦解敌人。

10月中旬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向徐州方向运动，国民党军纷纷向徐州龟缩。10月上旬，萧县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纷纷逃往徐州，萧县形势迅速好转。

10月29日 各区区队升编县大队200余人。

11月6日 淮海战役开始。根据支前总指挥部的命令，萧县祖楼区常备担架团出动，随设防在徐州南津浦线上的我两广纵队活动。该纵队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四昼夜，顶住了敌孙元良兵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猛攻，尤以萧县境内的卢村寨、大方山激战最烈，工事大部被毁，我军伤亡严重，但阵地始终为两广纵队英勇坚守，粉碎了敌人南逃的企图。其间，祖楼区常备担架团除转运伤员数百人外，还帮助部队赶修工事。12月初，担架团复员回县，两广纵队首长给萧县县委写信赞扬了担架团的工作成绩，三地委《反攻报》刊登了担架团的事迹。

11月初 华野部队在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萧宿县供应粮食，抢运伤员，给以大力支援。县委书记王尚三任萧宿县支前指挥部指挥，带领全县军民积极投入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11月上旬 萧县在王寨成立了淮海战役支前指挥部，朱玉林任指挥，单劲之任副指挥。各区乡也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各行政村成立支前小组，大吴集、黄口、王寨、梅村、瓦子口、杜集等地设立随军粮站。全县的支前工作

迅速展开。

朱玉林带领县大队两个连到陇海路沿线(当时的七、八区和铜山县的第四区)扫荡残顽,安定人心,恢复区乡政权,筹粮、组织运输力量支前。敌保安团副团长胡映熙与大队长韩登云、杨俊领等 200 余人投诚,交出步枪 150 余支,轻机枪 15 挺,子弹数千发。大屯、王寨、郝集、黄口等区均收缴了一批土顽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

11 月 13 日 人民解放军进驻萧城,萧县全境解放。

11 月 24 日 为支前需要,县政府发出训令,修复瓦子口至王寨、张大屯、黄口和瓦子口至胡庄桥(萧永公路上)两条公路。沿路区乡发动组织群众,仅用五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两条干线的修复任务,并将各区内的所有公路、桥梁等运输必经之路修建完竣。

11 月 我华东野战军歼灭敌军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圩,豫南来援之敌军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于双堆集,迫使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于 11 月 30 日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经萧县向西南逃跑。华东野战军在 200 里宽的大地上分四路展开追击。

12 月 1 日 奉军分区指示,孟庆祥带县大队一个排武装侦察敌情,在城北李庄与徐州西逃之敌相遇,随向逃敌开火,借以向我后方报警。后将小屯村里的顽砭山保安团 400 人包围缴械,计机枪 4 挺,驳壳枪 10 支,步枪 200

余支。

12月4日 杜聿明部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于萧县西南、永城东北的李石林、青龙集、陈官庄一带，歼灭了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孙只身逃窜。前线我军转入战场休整。

12月15日 全歼黄维突围残部，华东野战军又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标志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第三阶段开始。为方便指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从宿县孟圩子移驻萧县朔里区蔡洼村，至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结束，共住28天。

12月17日 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华野指挥部蔡洼村杨家台子召开总前委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方略、渡江作战的计划和方案以及部队整编问题。会议休息时，五位首长在粟裕住地杨家台子李春华家后院的五间堂屋前石榴树旁，由随军记者陆仁生照了相，留下了总前委五位首长具有历史意义的唯一的合影照。会址1949年列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9年

1月6日 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开始发起总攻，10日全歼该敌26万多人，击毙敌第二兵团司

令邱清泉,李弥化装逃跑。至此,淮海战役结束。

1月10日 杜聿明一行10余人化装逃跑,被萧县四区张老庄村农民段庆香发现,遂向驻该村的华野四纵十一师卫生处休养连报告,卫生处通讯员范正国、崔喜云立即追捕,活捉杜聿明等人。

1月 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军民从掩埋敌人的尸体着手,做好战区的善后工作。萧县处于战场中心,共有154个村庄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毁掉房屋24600多间,死亡群众1681人,伤690多人,失踪272人,损失牲畜3900余头。县、区、乡分别成立了支前救灾委员会,单劲之任萧县支前救灾委员会主任,一面支援大军渡江,一面开展战后恢复工作。全县发放灾民安家粮1000多万斤,耕牛贷款粮300多万斤,建立了5个农具加工厂,用战场上的废铁赶制农具9526件,免费发给灾民。上级紧急从外地调来中外医生700多人,国际红十字会中牟联谊会也派来了医疗队,组织了35个医疗队,4个小型临时医院,先后为灾民注射防疫针6万多人次,有3万多人得到了较好的治疗。

1月25日 县委在任楼召开支前总结会议。在70多天的支前工作中总共筹粮1095万斤,柴草3100多万斤,组织担架5700多付,牛车8000多辆,小车540多辆,民工9万多人。

2月 萧县县大队编升到十八军。

县委、县政府机关从城西任楼迁入萧城。

3月 县委发出指示，在积极抓好战后救灾工作的同时，要加强教育工作及严防反动道会门活动。

萧宿县撤销，原属萧县的龙山区、朔里区、天门区仍归属萧县。同时，又将铜山五、七区的一部分划为萧县路西区，并对部分区作了调整，时为十个区。至6月，萧铜县撤销，棠张、褚兰两个区又划属萧县，路西区改为北望区。此时，萧县共12个区，208个乡。县委书记兼县长朱玉林，副书记戴世雅，副县长单劲之。

为修复陇海铁路萧县支援枕木2万多根。

县委成立萧县总工会，主任陈玉山，副主任汪友云。

3月底 豫皖苏三分区、三专署、三地委撤销，萧县由河南省商丘专署代管。4月成立宿县地委、宿县专署，萧县属宿县地委、专署领导。

4月初 为了支援战区群众春耕生产，全县发动二、三、五、六、七、八区计750具牲口，带全套农具、口粮、草料，并自带粮种25500余斤和各种菜种、瓜种支援战区，单劲之住魏桥指挥。

4月 宿县地委为集中力量扑灭萧、宿、永边区之特务、股匪及反动道会门组织，成立了萧、宿、永边区剿匪工作委员会，委员由11人组成，萧县公安局副局长胡石生为委员。

县委成立萧县青年工作委员会，李建华任书记。

4月底 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各区分别作了工作汇报。副县长单劲之就淮海战役战场情况及战区救灾方针、任务作了报告。

5月1日 全县各区举行了庆祝大游行。

5月 县委为保护好解放后第一个麦收，根据地委指示精神，作了组织看麦队的补充指示。

发还因为支前超额支用农民的粮食 151 万斤。

5月底 县委召开午征工作会议，县委委员、区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搞好午收、午征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从而保证了解放后第一个麦收的顺利进行。

6月初 为切实搞好午征，县委再次召开午征扩大会议，朱玉林、单劲之分别作了重要报告。会议决定开始实行农业累进税。

6月19日 县委决定扩充地方武装千人，输送主力部队 200 人。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并成立了萧县独立团。

7月 县委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县委副书记戴世雅作了总结报告。这次会议对壮大党的队伍，搞好干部的培养与选拔以及做好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7月中旬 县委发出关于排除夏季水患、加紧修岸补堤、快种晚秋、排解群众纠纷、反对悲观思想的指示。

7月底 县委召开县委委员会议，各委员分别报告了下乡了解的情况。

9月初 县委发出关于审查内部的紧急指示。

9月 为支援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萧县运送粮食1200万斤,于9月15日完成。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萧县人民饱享这胜利的喜悦,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10月1日 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全县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奔走相告。

后 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暨中共萧县地方党组织建立 78 周年之际,我们谨将《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一卷)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是萧县党史工作者 20 多年来在史料征集、整理、编纂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省、市委党史部门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在萧县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亲自过问和指导该书的编写工作,中共萧县县委书记孟宪会、县长王宗元非常关心该书的编写工作,并给予经费上的保障。县委副书记朱学亮多次听取党史研究室负责人的专题汇报,了解和指导该书的编撰工作。

本书是经有关业务人员集体研究讨论,分工执笔完成初稿的。第一、二、三章由王宇良执笔;第四、五、六、七、八、九章由吴孝桐执笔;第十、十一、十二章由张祚林执

笔；第十三章及结语由王宇良执笔。大事记部分，1983年完成初稿，至2001年又两易其稿。这期间，于凡洲、王于柱、侯丙生、张祚林、胡永善、徐孝敬、彭宜亭、程祖光、张笑仙、孙贤明、欧道松等同志，先后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在大事记不断充实与提高的过程中，侯丙生、孙贤明做了较多的工作。插图部分，由县文联主席李鹏与王宇良整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宇良对全部书稿作了统一的修改和把关。

本书的编写，吸取了周边市、县中共地方史的编撰经验。书稿完成后，分别呈送中共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萧县县委领导审读。县委书记孟宪会审阅了书稿后，欣然为之作序。

编著这样一部政治性、学术性都很强的党史著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尝试。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做到忠于史实，客观公正，秉笔直书，写出信史。但由于年代久远，部分资料欠缺，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所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2006年7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1卷/中共萧县县委党史
研究室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199-568-6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党史—萧县 IV. D235.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117635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一卷)

作 者: 中共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黄 艳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568-6

定 价: 42.00元
